封面与目录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作者：陸鏗

ISBN：9789571323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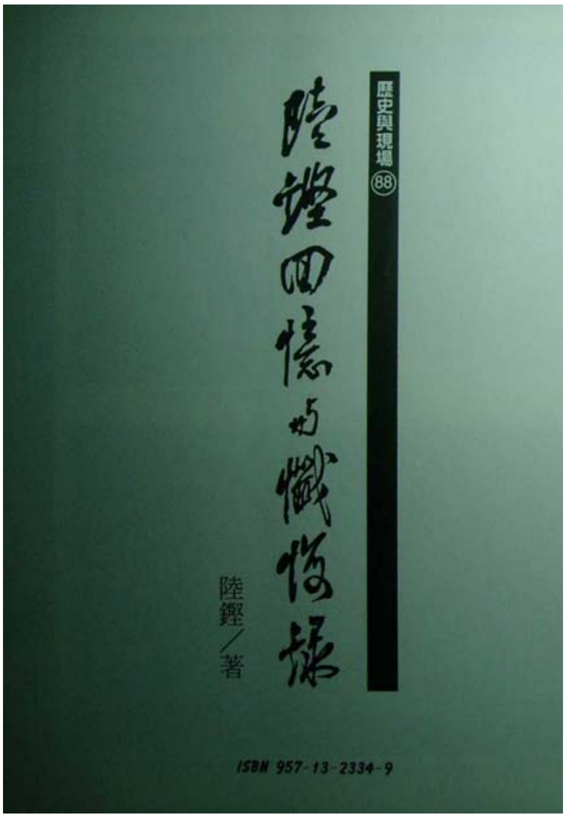
定价：NT$ 450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1997.07.08

编辑者言

感谢网友提供原书，为本书 pdf 格式的编辑，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本书修订本经过仔细的校对，错漏之处难免存在，希望朋友们阅读时及时指出，不胜感谢。——乡村骑士 000217





作者简介：

陆铿(1919-2008)号大声，笔名陈棘荪，云南保山人。为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二次大战中任中国驻欧战地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因维护新闻自由，先后坐国共两党的监牢廿二年，但坚持持专业记者的志节不变。

目录

永葆乐观，拒绝死亡——代序

我一生以新闻记者为职业和事业。自一九三九年开始从事新闻事业至一九九七年，五十八年的经历可以概括为：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既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坐过共产党的牢。出狱来到海外后，一九八二年因为写了一篇〈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遂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时间长达八年。直至一九九0年才走下台湾的黑名单.紧接着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先生赴美时，帮了一点忙，一九九一年被中共中央文件第三次点名（按：因访问胡耀邦曾在一九八七年被中共中央文件点名两次），并被列入中共黑名单。一个人既坐两边的牢，又上两边黑名单，可谓百年难逢之异数。

一九九六年七月，台北纪念雷震先生百年冥诞，许信良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宴请与会者。席间，朋友们谈起我的遭遇，有人说：“会不会坐民进党的牢”，许信良连称：“不会，不会！”而从民进党主席特别助理陈文茜小姐诡魅的浅笑中，我感到也难说。

答李政道夫人问

还记得是一九八三年的事，在纽约，数理逻辑专家汪浩教授请客，文学家陈幼石那时还是他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客人除我外，还有李政道伉俪、戏剧家吴祖光和舞蹈家江青等。

席间，李政道太太对我说：陆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牢，怎么还会是这个样子？我说：我理解你的问题，按一般的想法，一个人长时间坐牢，一定是弄得“壮心与身退，惨戚非朱颜”，说话不敢大声，甚至见人不敢抬头。而我却若无事然，仍大声谈笑。问题的关键，我是一个记者，记者多半是海阔天空。我生就一个乐观的性格，加上新闻迷，凡事想得开。我曾对香港中大新闻系的学生举例，一九五一年在中共搞大镇压运动时，我主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死亡，而是：如果我被杀，新闻标题怎么做？因为我当时被指控的罪名是代表阎锡山接收云南，又是云南人，又在卢汉易帜所谓“起义”后，专机飞昆明。杀我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我考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题目：“万人争看杀陆铿”。自己满意极了，暗暗得意了两天；而那时同监房的人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愁眉苦脸。

廿二年怎样过来的？

后来在很多场合，都有朋友问我，直到最近在台北南港还有朋友提出问题：廿二年呀，你怎么过来的？

我怎么过来的？恢复自由已经廿一年，来到海外自由地区也已经足足十八年了，还没有系统地小结这个问题，在〈回忆与忏悔录〉快杀青之时，似乎应该有个答案。

通过简单的思考，得出了简单的结论，就是八个字“永葆乐观，拒绝死亡”。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懂得生死操之于上帝，而非操之于个人。我凭什么死亡呢？

凭什么拒绝死亡

回顾一下廿二年的狱中岁月，主要是依靠五个东西：

一、与暴君作健康比赛，一定要活过毛泽东，不能比他早死，一定要比他晚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独裁者的死，必然带来政局的变化，而政治犯的处境，也必然随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以生活条件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根本不能比。但应看到自己的优势，第一，比他年轻，时间在自己方面；第二，毛生活条件优裕，但他自己糟蹋也很厉害，自己关

在监狱，被迫清心寡欲，也是长寿之道；第三，自己心里有上帝，心里有平安；而老毛单是残害百姓，诛杀功臣，心里就无平安；第四，要看到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是被迫害者；而老毛是站在邪恶的一方，是迫害者。从历史发展看，正义必走向光明，而邪恶必归于灭亡。

二、要能适应最艰难的环境，学会绝处逢生，本着好死不如赖活的原则，绝不自杀。而且要善于自我陶醉，自得其乐。

比如我曾长期单独监禁，与外界绝对隔绝，这是中共对于他们认为问题严重而又不肯交代或交代不清的囚犯的一种惩罚。一个监舍分六个监房平列，面对一扇高墙，留有一个约四公尺宽、廿公尺长的小院，供单独监禁犯人每人每日洗马桶兼散步半小时。我就充分利用这半小时，把马桶冲刷的干干净净，并抱着马桶以舞步让桶底对着骄阳与人同享阳光普照。

再比如，天天看阳光破窗而入也是一种享受，一条金线，由短变长，由细变粗，到正午金光洒满监房，精神自然为之一爽。正午过后，阳光又由粗变细，由强变弱，最后慢慢告别。日积月累，承阳光之关照，到后来已达到看阳光比用表还准。一看阳光照到什么高度，知道该吃早饭了，马上就听到卫兵叫“开饭”，不禁拍腿叫绝，盖无案可拍，只能拍腿也。

坐牢前享受阳光，认为天经地义，没有什么感觉，坐牢后才晓得阳光实在是人类的救星，它绝对大公无私，它照耀皇帝，也照耀犯人。

还有一例，对中国文字的奥妙也是单独监禁体会出来的。因为当时不准有任何活动，只准定定地坐着反省自己的所谓“罪恶”。终于发现为什么要叫坐监，而不叫站监、卧监或睡监，原来监本来是要坐的。

虽然是小小的发现，也带来了乐趣与满足。

三、借单独监禁，心灵真空，借而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平日忙碌得要死，根本不肯能有反思机会。现在坐下来了，回首人生历程，觉得有些遭遇，似乎不可思议，但却可以摸索出一条必然的发展规律来。虽然必然中有偶然，但偶然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必然。就拿我横冲直闯、一直闯进监狱的过程看，看起来是偶然的因素，冷静思索分析，这正是我天不怕、地不怕、自恃有胆有识、逞强行险侥幸的必然结果。正所谓“久走夜路必然遇鬼”是也。

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我身上也屡次应验。比如，揭发孔宋，看起来是祸，结果是福，至少坚定了为新闻自由奋斗一生的志节。再如，董显光先生还在一九四九年底就任命我为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如我不是回昆明坐牢，而是到台湾履任，看起来是福，但以我的个性、作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势非送命不可，其惨况可能比沈元璋、李荆荪还惨。也是一项意外的收获。

四、要善于魂飞天外，想过去的快事、乐事、好事。岂不闻：“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单独监禁是与外界绝对隔绝的，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有一天忽然收到家里送来的一瓶鱼肝油丸，使我眼睛突然一亮：原来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任何字了。感到药瓶上的每个字都是那么美丽。平时谁会欣赏小小药瓶上的字呢？可这药瓶上的字，我反覆看了好多天，从中发现仓颉之可爱。并连想到黄帝，因而魂飞天外矣。

五、抓住机会，进行反攻，实事求是，不编假供。

一九六 0 年正是中共对外宣布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最重之一年。光是安徽一省就死了六百万人这是我出狱后听到的。

那时，连管监狱的干部都吃不饱肚子，更不要说犯人了。最高的营养是每人每两天配给一小碗”小球藻”，也就是狱方建了几个大水池养青苔煮水给犯人喝。而经常有犯人饿死，

已经不是秘密。

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0年第二次单独监禁的两年中，我只吃到两只煮熟了的鸡蛋。还是家人向云南省公安厅第八处（管审讯）处长胡殿斌苦苦哀求于中秋节日获准送入的。因为太难得了，所以我连蛋壳一起吃下去。在心理上这两只鸡蛋被我视为“上帝要我继续活下去的一种启示”（“文革”中胡被诬为假共产党员，愤而自杀，不知是否与这两只鸡蛋有关。）

一九六0年的一天我正饿得发昏的时候，突然叫提讯，被带出监房走到狱部的一间会客室里，一位个头很大、服装整齐的干部翘着二郎腿，靠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抽香烟，他见我进去，就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递给我一支烟，我说：“不会，谢谢！”看样子，此人不是一般干部。

他马上带着笑脸说：“在国际上走的记者，那有不抽烟的，别客气了。”

我说：“真的不会，不是客气。”

他问：“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我冲口而出地说：“不好！饿得要死。”接着我抓住机会抗议：“发生自然灾害，全国都吃不饱，我没有话可说。但你们强调的是改造，既然改造，为什么连马列的书都不给看一本，恐怕太过份了。”

他说：“你现在的情况是问题没有交代，或者说交代不清。不过，看书不是问题，可以考虑。”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尺见方的一张传单：

控诉饿死人

全国饿死人，责任在共党。共产党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结果弄得赤地千里，饿殍载道。这明明是中共中央政策错误，如不及时反省，改弦更张，必将引致民变。

人民无负于共产党，共产党有负于人民！

拥护共产党的一个平民

我一看，自然反应说：“这个字很像我写的。”

对方马上说：“你到底是经过改造的，一看就承认了。”

我说：“我说很像我写的，并没有说，就是我写的。这里面是有差别的。”

他说：“你看，你是经不起表扬的，我刚刚表扬你，你就翻案了！”

我说：“不是翻案，要实事求是。”

他说：“人的思想总有个过程，你即使承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试想我是关在这里单独监禁。没有笔，没有墨，也没有纸。即使我能变戏法样地变出笔、墨、纸来，有什么人能替我带出去呢？又有什么人敢张贴呢？因此，根本没有可能性！这无法解释得通。”

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无法解释得通的太多了，你还是考虑考虑吧！”

接着，他按铃，一个警察进来。他吩咐“叫金所长来！”

金所长进来后，第一句话是“报告厅长！”我才知道原来是厅长大人驾到。后来了解他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但中共习惯，副职都按正职叫。听他问金：　　“陆铿现在吃什么饭？”

“号子里的饭。”金答。（昆明监狱称监房为号子，关在监房里的犯人，是连劳动都不准

的，借口为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还有什么饭？”

“还有劳动饭。”

“还有什么饭？”

“还有重劳动饭。”

“从明天起陆铿吃重劳动饭。”（按：重劳动饭是可以吃饱，以从事重体力劳动。）命令下达后，站起来对我说：”传单，政协圈子里很多人一看都说是你的大笔，你一看也说像你写的。我们的政策你是了解的，想想清楚。”扬长而去。

第二天送来了一厚本《列宁文选两卷集》。这一来，不但从饿死的边线上得救，而且配搭了精神食粮。

我如饥似渴读了《列宁文选两卷集》三遍，只差做列宁专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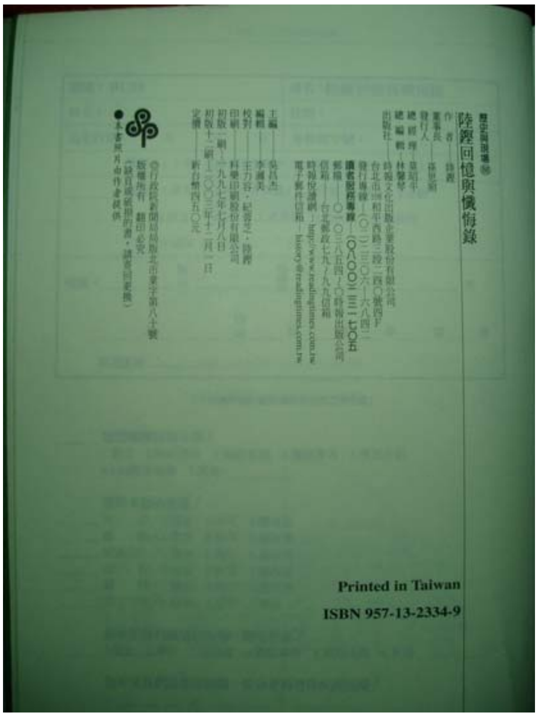
至于对厅长大人的“想想清楚”的命令怎么覆命呢？我婉转地利用他叫我写交代的笔墨纸写了一封信，本着唯物辩证法的道理，说明这张传单绝不可能出于我手。并谢谢他叫人送来的书。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至于重劳动饭是不是继续吃，金所长是没有胆子问的。而厅长大人日理百机，又怎么会想起下达取消陆铿吃重劳动饭的指示呢？

我，奇迹般地越过了饿死这一关。

再一次实现了拒绝死亡。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插图



歷史與現場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作者—陸鏗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
總經理—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主編—吳昌杰
編輯—李濰美
校對—王力容‧紀秀芝‧陸鏗
印刷—科樂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
初版十二刷—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一日
定價—新台幣四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十號

●本書照片由作者提供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2334-9





▲陸鏗（著歐洲戰地記者服）、陸鏘（時任青年軍中校政工科長）兄弟，1946年與父親大人攝於南京。



▲1941年和丁中江（右）參加陪都記者自貢訪問團，站在自流井的鹽包上留影。



▲好不容易在美國賓州養老院找到了恩人李惟果。



▲陸鏗的老師、三四十年代中國在國際上最著名的記者趙敏恆和夫人謝蘭郁。



▲1948年于右任競選副總統，陸鏗任發言人，與《新聞天地》另三位創辦人卜少夫（右二）、樂恕人（右一）、劉問渠（左一）攝於南京寓所。



▲抗戰時期政校同學集會重慶南泉，與戴傳賢、陳果夫合影。（右一馬星野、右三陸鏗）



▲1946年與于右任、邵力子（右三）在南京郊遊。（右二陳丙一、右一樂恕人）



▲1948年南京《中央日報》新聞研究班結業。（中間三陳：陳果夫、陳立夫、陳布雷）


▲1945年9月在巴黎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總部的四個戰地記者。(左起毛樹清、陸鏗、樂恕人、余捷元)
▲蔣緯國與石靜宜。(陸鏗1947年攝於徐州)
▲與毛樹清在阿姆斯特丹巧遇蒙哥馬利元帥。
▲1948年在南京設宴歡迎謝壽康夫婦，由于右任、張厲生、王世杰、謝冠生、張道藩、劉文島、桂永清等作陪。
▲1947年在南京，蔣介石夫婦送別馬歇爾。(後立者爲陸鏗)


▲1945年11月1日給茶花女墓獻花。(右起陸鏗、徐兆鏞、樂恕人、丁垂遠)
▲1945年陸鏗與樂恕人擔任駐歐戰地記者。
▲1945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校園。
▲在巴黎與《法蘭西晚報》的女記者。
▲1947年2月參加中國記者團視察戰後廣島。
▲一別45年後重訪波茨坦，特別到當年美、英、蘇三巨頭會議廳憑弔。



▲1948年應閻錫山（中）之邀率領首都記者團訪問山西。



▲1948年5月率首都記者團訪問北平，在北京電影製片廠與影星陳燕燕（中）、謝添（右二）及團員。（左後三起林家琦、李蔚榮、凌敬堯）



▲1947年參加中美通航訪問白宮。



▲備受苦難的陸鏗胞妹陸敬賢。



▲陸鏗的三個兒子：可望、可信、可人。



▲陸鏗與兩個女兒，左爲南軍，右爲南達。



▲雲南二監之「圖書室」爲陸鏗所題。



▲李廣平和陸鏗的三個孫子，可望、可信、南達。



▲中國大陸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京劇名旦關肅霜。



▲重慶政校同學張淑貫。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1980年陸鏗在香港重逢蕭乾。（右起胡金銓、蕭乾、胡菊人）
▲在日本橫濱朱世明墓前嚎啕大哭。
▲接受許芥昱教授邀請在舊金山州立大學講毛、周、鄧。
▲與李荆蓀夫人方佩倩爲李荆蓀掃墓。
▲1987年與李香蘭東京重逢。


▲1981年8月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演講，與費正清合影。
▲1986年11月1日在紐約爲唐德剛（右）和夏志清（左）和解。
▲伍集成、伍宗琳父女和龍繩文等雲南同鄉歡聚於香港。
▲陸鏗歡迎王丹鳳，促成左中右文化人共聚一堂。前排右起唐乙鳳、卜少夫、王丹鳳、鄧慧娟、羅孚。後排左起戴天、法、日、美駐港領事、胡菊人、陸鏗。
▲1979-82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採訪學，與部分學生合影。左一爲香港電視女強人之一張郁標。



▲1992年6月29日台北重逢張群。



▲陸鏗、崔蓉芝1988年春在北京拜會梁漱溟。



▲陸鏗爲維護黃少谷清譽，與于衡不打不相交。



▲與徐復觀攝於蔡元培墓前。



▲1993年與新聞界友好。前排右起：潘海麟、顏文閂、施克敏、潘霈。後排右起：張繼高、王洪鈞、歐陽醇、周培敬、陸鏗、楚崧秋、袁暌九、劉紹唐歡聚。



▲半世紀老友團聚台北。（右起蔣緯國、陸鏗、丁中江、衣復恩）



▲1993年6月中國大陸三名人（左起許家屯、胡績偉、李鋭），在美國明大聽陸鏗談展望大陸新聞自由。



▲與大特務沈醉因同「窗」而成好友。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1985年5月在北京與廖暉偕其父廖承志。
▲1985年5月在上海訪問汪道涵。
▲1985年7月24日與李鵬（右）、姬鵬飛（左）會於華府。
▲1985年在紐約訪問中國大陸國防部長張愛萍。
▲1985年5月10日在北京中南海訪問胡耀邦。
▲1985年5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會見鄧穎超。


▲在紐約與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夫婦。
▲與劇作家吳祖光攝於北京。
▲與司馬文武在美國。
▲陸鏗與卓以玉教授。
▲1983年與台獨元老郭雨新會於華府。
▲許信良在洛杉磯辦《美麗島》，鼓吹革命，接受陸鏗訪問。
▲與康寧祥（右）和新亞洲文化基金會主席范止安在台北。


美中國學生學者第一屆代表大
T CONGRESS OF NESE STUDENTS IN THE
▲與劉賓雁、朱洪在普林斯頓。
▲出席中國留美學生學者第一屆代表大會，與美參議員憲孟和嚴家其攝於主席台上。
▲1989年9月與嚴家其、高皋巴黎重逢。
▲參加中國民聯二次代表大會與戈揚、劉賓雁、劉千石、阮銘、錢達、蘇曉康、萬潤南、馬大偉、吾爾開希等合影。
▲在北京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家中。
▲1992年4月與黃雨川、徐東濱分別頒1991年傑出民主人士獎給陶百川、吳宏達和香港民主黨（由何俊仁代表接受）。


▲與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梁漱溟之孫梁欽東攝於洛杉磯。
▲顧毓琇先生考證蘇州顧陸遺跡指在。
▲與國民黨第一尊大炮黃宇人攝於加拿大。
▲1992年與許家屯在洛杉磯討論許氏《和平演進》文章。
▲曾敏之（右一）在港話行，朱啓平、孔文梅與張文達作陪。
▲1991年8月在洛杉磯和崔蓉芝為許家屯祝壽。



▲與朱撫松、徐鍾珮伉儷在台北話舊。



▲1993年冬訪張學良於台北。



▲接受霍英東贈送其企業在廣東開發新市之畫冊。



▲陸鏗與焦仁和就兩岸關係漫談。



▲陸鏗與李志綏（中）、戴鴻超在洛杉磯。



▲參加第三屆兩岸三地新聞研討會，左起潘煥昆、葉明勳、陸鏗、袁暌九、王洪鈞。



▲陸鏗對李遠哲說：「2000年閣下可能會當總統」。



▲與柏楊、張香華、崔蓉芝在台北。



▲與世界級考古學家張光直在台北南港。（中為張教授助理胡家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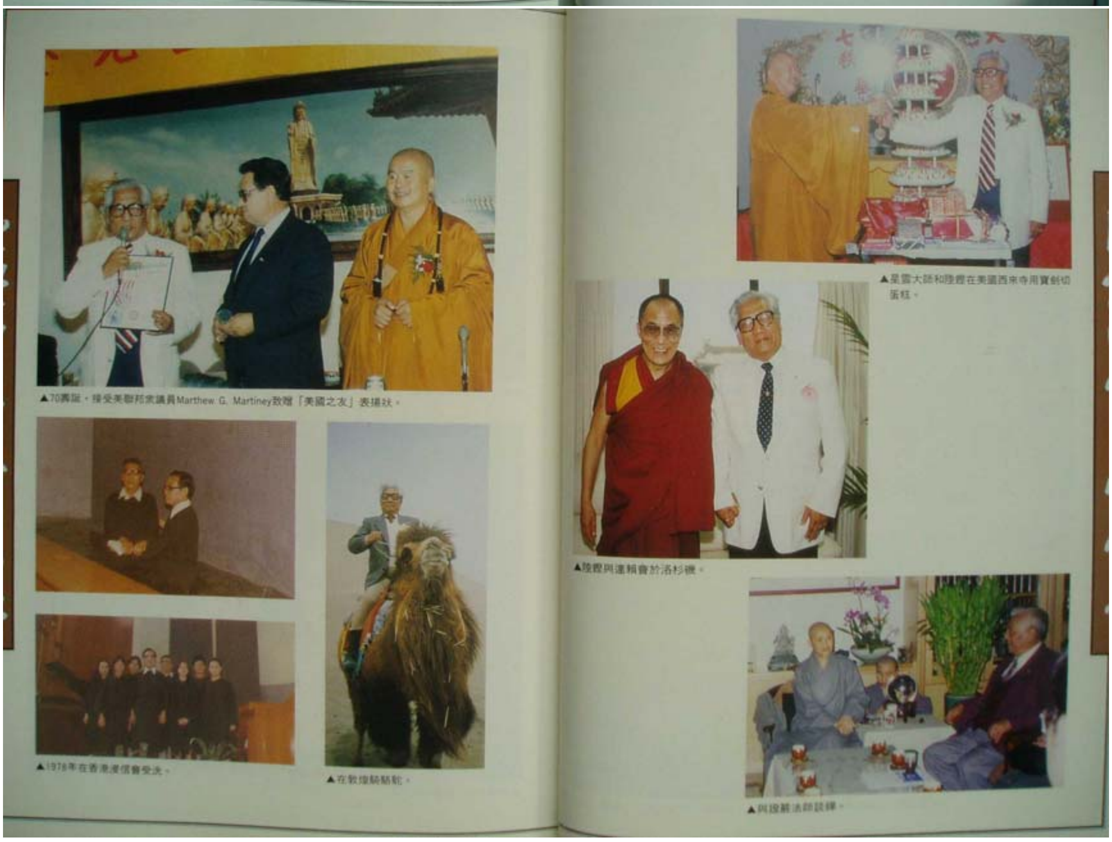


▲兩岸三地文化界人士聚首。（右起潘耀明夫婦、薛曉光、龔小夏、戴晴、樂黛雲、金觀濤、劉青峰夫婦、湯一介、陸大聲）



▲與張佛千、張玉法、劉紹唐、曾永義、袁暌九等人歡迎余秋雨（右一）。


跨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
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 主辦
▲1996年兩岸關係緊張時與友人訪問金門。
▲在企業家戴一義（左二）帶領下，與阮銘、卜大中、崔蓉芝參觀台塑六輕看抽沙填海。
▲參加紀念雷震百年冥誕。（左起陳宏正、聶華苓、殷海光夫人、陸鏗、程績寬）
▲顏色佳追蹤李登輝與各報記者合影。
▲李登輝在康大校園石橋上大聲說：「陸先生你怎麼來了」。


▲70壽誕，接受美聯邦眾議員Marthew G. Martiney致贈「美國之友」表揚狀。
▲1978年在香港浸信會受洗。
▲在敦煌騎駱駝。
▲星雲大師和陸鏗在美國西來寺用寶劍切蛋糕。
▲陸鏗與達賴會於洛杉磯。
▲與證嚴法師談禪。



▲陸鏗70大壽與崔蓉芝。



▲黃昏之戀：陸鏗和崔蓉芝。

实大声宏，性真情切——历经沧桑一记者

杨国枢

陆大声兄的大名久已如雷贯耳，但真正认识则是最近几年的事。这一年来，大声兄在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面对青山，埋头撰写回忆与忏悔录，见面的机会便多了。大声兄为人朴实坦诚，交往的年代虽然不长，但我对他倒有老朋友之感。《陆铿回忆录与忏悔》出版在即，大声兄命我作序，便觉无可推脱了。

大声兄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处世率真诚恳，实话实说，毫不矫揉做作。他是云南人，从小生长在湖北（襄阳），但声音宏大、容貌厚实、体型高壮，颇类燕赵之士。于右任本“实大声宏”之意赐号“大声”，可说良有以也。他喜欢交朋友，且能见真情，讲义气，别人很难抗拒和他论交，成为敌人更是不易。他交友不拘一格，三教九流无所不亲，朋友遍及新闻界、舆论界、政治界、学术界，而且友情久而弥坚，不因久不见面而磨灭。

作为一个人，大声兄最令人感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也做过共产党的大牢，前后共有二十二年，时间不可谓不久，但长期的惨痛经验似乎并未在他心中留下什么伤痕。他的人生观好像并未产生负面的改变，他还是那么乐观，那么积极。这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不只是胡适有，陆铿有，而且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共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偏好渐进的改良主义，便是因为他们在性格上具有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暂时的悲观，不会长久的丧志；只有暂时的消极，不会长久的沉寂。他们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或打击，经过疗伤止痛的过程，又会重振精神，再度乐观而积极。

作为一个人，大声兄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作为一个记者，他是一位坚忍不拔的自我实现者。正因为前者，才能成其为后者。在五十八年的漫漫成人岁月中，他既未从军，也未从政，更未从商。他历经种种横逆，忍受着重重苦难，终能坚守记者的信念和职志，卓然成为一位令人钦佩的名记者。从本书所记述的众多事迹看来，大声兄之所以能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坚守记者的信条，能在长期的监禁中屹立不摇，主要是因为记者的工作不只是他的“职业”，而且是他的“志业”。记者的工作既是他的志业，乃能在其中安身立命，久而久之，记者的工作就和他的生命、生活合而为一，再也难分难解。大声兄五六十年的记者生涯，毫无疑义的见证了一件事：他的自我生命已经在记者的志业中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实现。就这个意义而言，大声兄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自我实现者。在社会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下，一个人能成为一位自我实现者，便算是不虚此生。

在漫长崎岖的记者生涯中，大声兄已经通过了种种严酷的考验，彰显了他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对新闻自由的坚持，为记者的社会角色树立了突出的典范。年轻的记者们若能细读本书，必可心领神会，学习到很多宝贵而难得的经验。

大声兄的这本大著，不仅记述了他的为人、他的志业，也记述了他与众多历史人物的交往事迹和访问内容。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大声兄直接接触或访问的历史人物甚多，如蒋介石、胡适、于右任、张群、徐永昌、杜聿明、孙立人、卢汉、邵力子、陈布雷、周恩来、邓颖超、马歇尔、司徒雷登，甚至与其中不少人维持长久的友谊关系。由于工作上的方便，新闻记者常能看到或听到一般正式记载中所未曾涵盖的事情。例如，书中详述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他奉陈布雷和陶希圣之命，通知胡适本人国民党愿推荐他为总统候选人的经过，并接受

为胡适撰写候选人小传的任务，情节颇为细腻动人。这一类有历史意义的记述，书中时有所见，都值得治史者参考。也就是说，这本书包含了很多有关史实的记载，值得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人士仔细阅读。

以上是我阅读大声兄回忆录部分的感想。至于忏悔录部分，主要涉及大声兄的感情生活和家庭生活，我就不便置喙了。我只想借此机会向大声兄及其家人祝福，希望他们能在历经大时代的苦难之后，勇敢的激素追求自己的梦想，缔造新的人生境界。

永远奔驰中的野马

司马文武

把陆铿关在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自写回忆录，好像一只森林里的老虎突然被关在栅栏里面，朋友们都觉得有点残忍，也不大相信他真的能够如期写完。因为陆铿的精力太充沛，活动力太强，谁也栓他不住。果然他经常找借口往外跑，不过，这些借口都有堂皇的外衣，因为都跟新闻有关，一听到新闻，陆铿似乎就不顾一切地往外冲。然后又乖乖地回来。在孤灯下，振笔疾书，龙飞凤舞地如期完成他一生的忏悔录。这种专业的工作纪律和他的野马精神，伴随他长达五十八年，至今仍然站在采访前线，每碰到新闻，还是莫名亢奋，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

邓小平去世当天午夜，他连续打了三次电话才联络到我，告诉我这个大新闻。碰到这种大事，他几乎压抑不了他的亢奋，接连几天，不是写稿，就是接受访问，每天睡不到三小时。岁月在他头上留下白发，但似乎并未在他心理上和精神上留下痕迹，他仍像一匹不停奔驰的野马。

我读过许多欧美老记者的回忆录，他们的经历令人羡慕，但他们太幸福了，不只可以结交权贵，到全世界各地自由采访，退休时还过着社交名人生活。台湾和大陆记者从来没有这样好命。陆铿别号大声，但以前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压迫下，坐了廿二多年的政治牢，一生漂泊，虽然相交满天下，但却只能勉强靠稿费为生。两袖清风，几无身外之物，与欧美专业记者富裕的生活，无法相提并论。

近代中国大陆出现不少杰出记者，尤其在对日战争前后。不过，他们在战乱的政治漩涡中，逐一淹没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记者，都无法对不义的社会，长期保持超然与客观的态度，因此早晚必定被卷进去，他们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根本无法找到新闻记者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选择立场。结果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留在大陆的记者，如果不是参加共党的文宣队伍，就是被斗被整被关被杀，几乎无一幸免，陆铿即在大陆坐牢廿二年。逃来台湾的，上焉者改行不问政治，中焉者寄身新闻学界，或者写风花雪夜的人情文章。下焉者甘为文宣打手；压制新闻自由，忘了自己是谁。而台湾在日据时代，本来也有一些记者，但刚要发芽却被压死，没有成长的机会。

因此不论大陆或台湾，都看不到专业记者的典型，记者缺乏职业尊严，找不到真正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志的资深记者。尤其是对两岸的政治，都能保持密切的关心，而且思想仍能赶上时代，头脑仍然清楚的，看来看去，只有陆铿

十五年前，我在主编党外杂志的年代，即开始向从大陆跑去美国不久的陆铿要稿，他一口气为《八十年代》（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了三篇文章。一、作蒋经国邓小平的客——邀访李汉魂将军夫人。二、访问中共驻美大使柴泽民。三、访问台湾驻华府地下大使蔡维屏。

这是他首次帮台湾的媒体写稿。

虽然他于一九八一年曾经来过台湾，但后来数度申请均未能获准。因为他那次在台言行留下“不良记录”。这次他为我们所写的文章，更触怒当局，尤其那篇把蒋经国和邓小平相提并论的文章，在当时相当犯忌。但是，好戏还在后面，因为不久他又应我们的建议，写了一篇《请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的文章，希望他专任党主席，这下子更不得了。情治单位都认定他是中共派出来的间谍，对台负有特殊任务。

他在美国访问中共驻美大使和国防部长，又到大陆访问许多要人，交游广阔，台湾怀疑他有政治背景，这在当时是很容易理解的。尤其是大家从没有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人，仍然这样跑来跑去，很少人相信他只是一名专业记者。

他为人热忱坦率，很容易赢得信赖，但他访问要人也有许多诀窍，有时故意让人“跑马”，再想办法把他拉回来，胡耀邦就因为这样而不由自主的讲了许多自己会后悔的话。他人情练达，很懂得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即使很尖锐的题目，也会很自然地被引导出来，这是资深记者的看家本领。

陆铿讲理重义，当年他是《新闻天地》的发起人之一，这批老朋友，后来虽然政治立场互有远近，但他仍然把政治和友谊分开来看。他曾为系狱十多年的老报人李荆荪的冤案与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昇据理力争。对于他所认识的党外朋友，不论得意失意，他都一样地热情。他的朋友遍布各地，其来有自。

他靠跑新闻和写稿为生，每天奋笔疾书，不论客厅、餐厅，不论噪唠安静，他为稿债所逼，凭着惊人记忆力和过度的好奇心，他搜集资料，寻找新闻题材。那种锲而不舍，天涯海角也要追踪到底的紧迫盯人功夫，很少人能够加以抗拒。这种独立自由的工作，需要坚强的意志。他那野马般的性格，老虎般的生命力，配合这种工作纪律，构成波涛起伏的一生。

他早年为了新闻工作而不顾家庭生活，晚年又为了爱情而抛妻别子。他的记者生涯有些不完的故事，他的感情世界有太多的忏悔。这本书所写的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这位始终站在采访前线，努力超越自己，把所有生命投注在新闻工作的前辈，其实也是自为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披荆斩棘，努力建立专业记者的尊严，让大家以后不需要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

没落门第说家世

●世事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唐·杜甫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元曲〈儿女团圆〉

我是一个一生以新闻为职业、也为事业的人。

在五十八年的记者生涯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想解答的；一个没落门第的家世，究竟对我的记者生涯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是云南保山人，从小生长在湖北襄阳。

在我脑子里，长期存在这样一幅家的图画：高大的两扇黑漆大门，上面有两个狮头的铜环。宽度逾十公尺的五级石阶，门牌号码是襄阳县司令部后街一号。因祖父曾任襄郧镇守使署高级参谋（镇守使张联升），人称“陆参谋家”。高大的大门后面是八扇绿底洒金花的二门。进得门来，两旁是传达室和警卫室，传达室里有两个人，警卫室平常空无一人，只有当军阀过境时有的到我家做客，带上警卫，才派上用场。我家对街的大墙，就是驻在湖北襄阳的军事长官的司令部所在。这里在我记忆中先后住过张联升、岳维峻、方振武、阮肇昌、林逸圣、范石生等等，蒋介石直辖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鼎鼎大名的康泽，也曾在这里威震一方，最后做困兽之斗时，作了共产党的俘虏。使这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又多了一个故事。

当一九三 0 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所谓蒋冯阎大战前夕，蒋介石在同年四月下旬视察平汉路防务时，还特别到了襄阳，访问隆中诸葛亮隐居地之余，也曾到我家小坐两小时。

由于我家有一大间颇带书卷气的会客厅，字画全部按春、夏、秋、冬季节的更易而改换，遇到喜欢附庸风雅的驻军首长有时候就要借我家宴客。对于当年的军阀在我家驻足印象比较深的是率部过境的石友三，这是一位以翻云覆雨“倒戈”有名的将军，一下拥护冯玉祥，一下靠拢蒋介石。记得一九二九年他驻足我家，气派十足，特别从武汉运了十几箱英国制的汽水到襄阳，这是我和弟弟妹妹生平第一次喝汽水。石友三的参谋长姓谢喜欢下围棋，我刚十岁，父亲教我陪他下一盘，陪的结果竟然把他打败了，父亲斥我“无礼”，石友三反说我父亲“无理”，我觉得这个倒还近人情。

当父亲结交军阀时，我家的状况已经是日落西山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已到了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步，传达室仍养着两位传达。名叫王德三的，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且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名叫史朝贵的，胖胖的，反王德三之道而行之，笑口常开。客人来时，先得有他们两个中的一个通报或引路。有时还端着一个漆托盘，上面放着访客的名片，入内报告。在这种气派下，客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这家人常常穷得连买米的钱都要大费周章，以致两位传达先生要站在他们的岗位上“枵腹从公”。

一个幼年的心灵，对这种怪现象自然会发生疑问：为什么穷到这种地步，还要摆这种谱？祖母的解释是，再穷，面子总是要撑的，而且这两个传达，他们十几岁时就跟祖父，和家庭成员没有分别了。王德三已成家立业，儿子都做事了，生活没有问题，只因为念故主之情，在他自己家里也没事，所以到我家“上班”，完全是尽义务。如果哪天我们家开不出伙来，他就回他自己家吃饭。史朝贵是单身汉，无家可归，当我们家揭不开锅盖时，老王也会邀老

史去吃上一餐两餐。另外老史在我们家当差期间，结识了一批朋友，少数的钱他还可以代我家张罗借一点。

我祖父陆寿图，号椿桥，是个山水画家，在得意时又结识了一批文士，比如清末名状元陆润庠就和我祖父认了同宗，给我祖父写了好多幅字。光绪年间祖父在河南做官时，逢慈禧太后过寿，曾办过皇差，弄了一大批古董字画。我家家道中落以后，先是卖古董，后是卖字画。到古董字画都卖的差不多时，只好进当铺，先是当首饰，后是当皮衣，再当绫罗绸缎服装。因为根本找不到赎当的钱，常常是“死当”弄到后来不管我们家里拿什么去抵押借钱，人家都不接受了。抗日战争发生后，落魄到有时只好一早拿盖着的被子去借高利贷，得一块钱，用以备办一天两顿饭，我父亲就在这天傍晚之前想法子弄一块一毛钱回来，把被子赎了回来。这种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

我记得读初中时，不时会收到父亲派传达先生送来的字条，上写“今午不必回家”，就知道又没有米下锅了。有时候我就趴在桌子上睡一觉；有时饿极了，就跑到舅舅家去狠吃一餐。

我们的老家在云南保山，原籍江苏吴县，陆家在三国时就是大族。据顾毓琇先生考证，苏州顾、陆遗迹，迄今犹在。我家祖上是明初时被迫迁到保山的。

保山原系永昌府的府城所在地，出产丰富，为云南有名的大县，有“银保山”之称，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中的孟获，其故乡就在保山县城外的金鸡村，迄今金鸡村还有孟获的后代。抗战时期滇军中一位善战的团长孟葆初，也在我家住过，就是孟获的裔孙。

按保山陆氏族谱，明初以永昌（即保山）为滇西边府，邻近外国，遂根据戍边政策把江南衣冠巨族赶到永昌戍边。明太祖朱元璋以陆氏远祖陆烈曾为元朝“五经博士”，属“历史反革命”，乃钦点陆烈戍边。陆烈年老，请示以长子陆琦代父应召赴滇，也就是落籍永昌的陆氏一世祖。结合我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派后，一九五八年被以“历史反革命”判刑劳改，看来是历史的重演。

至于陆氏最早的来源，在西周时，舜的后裔妫满为周陶正，武王以太姬妻之，封卫陈地，是为胡公。到陈公子定（敬仲为谥号）奔齐，子孙世为齐卿，至田和得国为田齐。有庶子封于平原县陆乡，才有田姓改为陆姓。到了汉代，有一个子孙当了江苏吴县的县令，从而世居吴县，子孙繁衍。正如清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顾可学撰隆昌陆氏世德碑文曰：“东吴旧族，诗书门第，迁徙徼外，化民移俗，济济衣冠文物之美，以科第起家，在内则为名御史，再为则为贤牧伯，子孙头角矗矗者，正未可量也。……”这里所谓的东吴旧族，显然是根据《三国志》，陆绩为吴郡吴人，有“怀橘遗母”的逸事传世。陆逊也是吴郡吴人，世为江东大族，逊子抗、抗子陆机、陆云，都是陆门菁英。

五代末陆氏有避难江右的，遂为金溪陆族。金溪陆族最有名望者为陆象山、九渊先生。明代又实行了大迁移，远在江苏吴县的陆氏族人被迫迁到了滇西边区。

陆氏在保山几百年形成了一个大族，城内有黉学街陆家、朱紫街陆家，乡下有牛旺。摹落墩陆家、施甸陆家、三台山陆家、杨柳坝陆家等等。我祖父是属于黉学街这一支的。按族谱所记，他是永昌陆氏十三世祖陆芝的长子，陆芝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三岁时，有一晚被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乳母抱着到一个她相识的回民家里看娶新媳妇，不料，当夜发生回民领袖杜文秀抗清起义，官兵残酷镇压，激起了回汉两族人民互杀的惨剧，我们黉学街陆家被起义回民灭门，只留下我曾祖父这一个根。曾祖父完全有奶妈养大，结婚生子，才有了我祖父。

祖父自幼好学，尤其喜欢画中国山水画，对于八股文却重视不够，只中了秀才，未考上举人。但他风流自赏，以书画自娱。后来，清朝政府公然订价卖官，祖父就决定离开云南到

外面闯天下了。他先到了北京，后转到河南开封，在巡抚衙门谋得一个类似今日秘书的职务。后外放到光山、宁陵两县任知县。这两县地处河南东部，靠近信阳，是比较贫瘠的地区，光山在现代唯一的人物即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一九四三年在重庆时，我采访邓颖超时提到这一点，她很风趣地说："这样说来，你祖父还是我们的父母官哩！"

辛亥革命前不久，我祖父参加了云南同乡黎天才将军的幕府。星海革命爆发时，黎天才将军驻军南京，我祖父就担任了他的参谋，后随黎天才到了湖北，就在湖北定居下来。在军阀割据时代，湖北一度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势力范围。萧耀南被吴任命为湖北督军时，我祖父因与萧"交称莫逆"，被萧任为当时湖北最肥的一个差使——襄阳张家湾厘金局局长，是专门收取货物税的一个机构。当时，四川、陕西、河南的货物，凡经鄂北都要纳税。祖父的个人收入年达数万银元，其收税数量之大，可以想见，被视为直系军阀吴佩孚重要的财务補给点之一。

据祖母说，我出生前后的两三年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是我祖父官运财运最好的三年，被祖父母视为陆门带来好运的麟儿，乳名取名襄麟。在我周岁的时候，家中办酒筵庆祝，贺客千人，轰动襄樊。我不仅帽子上缀以金质十八罗汉，连脚上戴的装饰品也是纯金的。

最巧的是我出生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阴历钱七月廿六日。（当年闰年七月）七月廿七日祖母过五四大寿，我刚好赶上，喜上加喜。我受祖母特别疼爱，随她长成，最后为她送终，祖母信佛，喜说"缘法"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我们家的情况则为一世而败。祖父由于钱来的太容易，花起钱来也就满不在乎。他连续娶了六位夫人，把襄阳城里二十年代初期最好的一所住宅，用高价典了下来，占地数亩，且有假山竹林，除雄伟的大门当地无匹外，还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厅堂，在招待客人时可以并排安放四十辆轿子，正中门上方，高悬盖有大总统印的徐世昌给我祖父的一块匾，亲书"急公好义"四字，大小尺寸，超过哈佛燕京图书馆陈列的那一块徐世昌所书横幅。如今很不多见了。

我在读小学时，常常约一些小朋友在厅堂里踢皮球，祖母就警告我，小心碰着大总统的匾。

此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我们家中有一条两公尺多宽、二十多公尺长的柏油小径，两旁有花台搭有葡萄架，说明那座房子的确是够大的。一九八五年相隔近半世纪，我到襄樊市去探访故居，发现已改为一所小学校，唯一留下的一点痕迹即还有一块假山石，的确不胜沧海桑田之感。正如《桃花扇》里所说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我父亲陆幼樵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按理祖父号椿桥，他的名字应该是幼桥，他偏偏以樵代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一个特殊环境中。我祖父在清朝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入民国后又增添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三。我祖父在与湖北督军萧耀南做了换"兰谱"的弟兄时，就把我父亲寄给萧耀南做干儿子。萧也许是为了笼络我祖父，也许是真的喜欢我父亲，把他按年龄排在萧的八个儿女之后，称为"九少爷"。我父亲由于自由受宠，养成了"衙内"习气，不肯好好读书。当时为赶时髦，萧耀南把他送到汉口天主教一间教会学校去。他带头在学校胡闹，法国神父校长决定让他退学，他跑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法国神父给家长写封信说明情况。正当校长全神贯注写信给督军解释为什么要开除"九少爷"时，我父亲已偷偷把神父道袍上系的绳子牢牢结死在可以转动的大圈椅上，并狠狠地给神父校长两个耳光，拔腿就跑。神父猛地站起来回击，不料他身上的绳子已捆紧在座椅上，座椅又把他压倒在地，几乎受伤，气愤之余，决定循外交途径通过法国驻汉口领事要求惩凶道歉，闹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一来萧督军对于调皮捣蛋的"九少爷"再也不感兴趣了，就派人专车把他从武汉送到襄阳交还给祖父。他因没有好好念书，所以一辈子除中年担任过襄阳电灯厂首任

厂长外，从未固定做过什么事。

祖父母认为他完了婚可能会变得规矩一些，便很快地为他迎娶了陈家四小姐陈韵言、我的母亲。那知他照样唱戏、票戏、玩坤伶，我祖母曾跟我讲过两个有关父亲的荒唐故事。一个就是上面说的打法国神父校长；另一个是在民国九年我祖母过五五大寿之日，我也满了周岁，决定举办堂会庆祝，自是一番盛况。堂会主要的戏码是汉口名旦小月红担纲演出《穆柯寨》，但祖父母万万料不到当晚为小月红主持文场打小鼓的竟是我父亲。我母亲气得流眼泪，我祖父更是一怒而退席。因为在旧社会“戏子”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世家子弟这样做被视为轻薄、失格。

我的母亲陈韵言，一九 0 一年出生于南京，外祖父是南京人，也是做官的。我母亲是陈家四小姐，读过私塾，也上过学堂。十七岁时在襄阳由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和我父亲结婚。结婚后，生了我和一个妹妹。因我父亲心花，夫妇感情发生了裂痕，但我母亲幼读诗书，从幼年起就接受了“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教育，虽然一肚子委曲，却只有认命，从来不和我父亲吵闹，彼此见面点点头为礼。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两年娶了第二位太太，生了三弟一妹。

祖母是懂得媳妇的痛苦心情的。可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儿子，便主动承担起教养长孙的责任，让我母亲有多余时间回娘家去，和她的姐妹兄嫂在一起过比较愉快的日子。

我舅舅陈鸣霄家，也是个大家庭。外祖父自南京游宦到了襄阳，因感于襄阳是诸葛亮隐居的地方，隆中就在离城三十华里之地，有钟灵毓秀之气，就购屋住下了。舅舅陈鸣霄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出任襄阳电报局局长，有两位太太和独子陈韬石。后来我表哥子承父业，也做了襄阳电报局局长。我母亲的大姐，我们称大姨妈，是位寡妇，和当地首富杨家的一位居孀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同行，夜同宿，形影不离，用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同性恋”了。我母亲的妹妹我们称五姨妈，嫁给湖北南漳县最大的地主赵馨陔，因为赵也讨了小老婆，所以五姨妈也常常回到娘家来享受团聚之乐。五姨妈有个女儿叫赵学筠，当五姨妈本人在中共土改时被斗自杀后，学筠就易名惠晨在襄阳当了中学教员，故事是很曲折的。我还有一位善良而能干的姨婆婆，她原本是伺候我外祖父的丫鬟，后收房做姨太太，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相处甚得。我母亲一年大概有九个多月在舅舅陈家，不足三个月在我们陆家。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还不满十七岁，母亲因患癌症逝世，她当时也不过三十四岁。停柩于襄阳县城外真武山，俗称局公山的一个娘娘庙里，历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弄得尸骨无存。一九八五年我去襄阳损招母亲的遗体，连那座娘娘庙都不见了。除了自责自己的不孝，徒呼奈何！不过，在襄阳我见到了睽违几十年的表兄陈韬石和表妹赵学筠，恍如隔世。

父亲与祖父的关系闹得愈来愈僵，他干脆脱离家庭到内蒙去参加冯玉祥的部队，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他跟石友三弄得很热的渊源。有一年他从张家口到了北平，由于他是个戏迷，恰遇京戏泰斗余叔岩演出，他竟把冬天的皮袍子送到当铺里当掉去听戏，然后就写信向祖父母求救。那时，祖父正出任湖北南漳县长，父亲慌里慌张地写了封双挂号信寄出，以为万无一失。当时中国的邮政是信件每经一邮局就盖上一个邮戳，这封信在湖南全省试投，转了一大圈，信封背后的邮戳几乎盖满，信封都快盖烂了，仍无法投递。信退到了北平。父亲当时饥寒交迫，一听挂号信认为救命钱寄到，那知原来是自己少写了一个北字，湖北南漳县变成了湖南漳县，当然是无法投递了。我父亲就有这么荒唐。

父亲荒唐是荒唐，做人却比较重义气。我年轻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襄阳大抄家。时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当时祖父的六位太太，四个都已过世，因家庭经济破败，只能分散营生。祖父带着四祖母和两个小叔叔迁往武汉市，父亲照料祖母和我们及大伯母一家留住襄阳。某夜，家里来了两个客人，一个面貌平平而表情深沉，不苟言笑；一个虎背熊腰，一脸杀气，都是河南口音。因襄阳与河南新野交界，我基本上分得出鄂北口音与河南口

音的不同。平时来了客人，父亲都命我出见，称呼对方为某爸爸（祖父辈的朋友）或某伯伯、某叔叔（父亲辈的朋友），而这次对两位河南客人则不作介绍。但我从父亲的表情上已感到这两位客人来路不同，颇为神秘。第二天凌晨，天刚亮，父亲把我叫醒，命我到后门去探视一下，看看通向城墙的果园中有没有人，特别是又没有武装士兵出现。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已得到消息，今晨地区司令部将派武装士兵前来我家大搜查，主要是抓这两位河南来客。我到后门看后，如果无人监视，就赶紧把这两位客人从客厅领出果园指给他们通往城墙的路。就在我奉父命吧这两位神秘客送走返回家把后门关上走向前院时，发现满院都是持枪的武装士兵，如临大敌。父亲一见我，他知两人已遁去，便神气活现地跟奉命搜查的一位营长说："你想想，我们是什么人家？怎么可能窝藏土匪头子？简直是笑话。"那位营长声明他是奉命行事。上面得到确实报告，有两个人进了我们家。希望我父亲把人交出来，大家都方便；否则他们每间屋子都要看看。我父亲表示可以，但提出："老太太的卧房不能搜。"理由是祖母年纪大了，受不住惊吓。那位营长也很精明，他说："我只派一个人进去，拜侯一下老太太。"于是父亲陪着他进了祖母卧房，口称："奉司令官的命令来看望老太太。"祖母明知家里出了问题，故作不知，表示谢谢后，请他坐下，并叫奉茶，寒暄一番。父亲看他老盯住祖母房里一个大衣柜，便顺口对祖母说，他有一件夹袍留在祖母房中，可能就在衣柜内，顺手把两扇柜门打开，营长的一对眼睛如鹰隼直逼柜中衣服，失望之余，赶紧告辞。这时，几十名士兵也分别由连排长率领，纷纷向营长报告，上房、下房、厢房、客房、厨房、花园、后院、统统 看过。营长叫在大厅集合，然后向我父亲敬礼，连称"惊动！惊动！"而去。搜查部队开走后，祖母把我父亲叫进她的房里去教训一番，指出仗义救人，无可厚非，但要看是什么人。有两句话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你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竟窝藏起江洋大盗来了？！"父亲辩解说，这些人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我听父亲这么一说，尽量把这两个怪客跟梁山好汉对上号。一个勉强可比拟李逵；一个根本不够格局，算不了一条汉子。直到一九四六年，事隔十五年，父亲到南京会我，我问他一九三一年的两个河南怪客，他才说出是当时被通缉的豫西（河南西部）土匪头，后来被著名的土豪别廷芳收编了。

抗战时期，父亲带着继母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避居湖北郧阳，又称郧县，那是和陕四邻近的山区，生活非常困难。弟妹都是吃包谷稀饭长大的。二弟陆锵高中毕业后到了重庆，我把他送入张治中将军主持的军中文化研究班学日语，继参加十万知识青年从军选拔入政工班，成为蒋经国的门生。一九四七年初，我又把他送到德国，入柏林自由大学第一期，在德国度过了大半生，并入了德国籍，在《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创建了中国组，连续服务十五年。一九八八年退休赴美，在洛杉矶享受着德国较高的退休金待遇，是我们全家唯一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三弟陆锟，一九四八年我把他送给时在徐州任装甲兵团团长的好友蒋纬国将军去当装甲兵，曾参加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一九五０年在台湾犯了逾假不归的错误，当时台湾形势紧张，治军从严，几乎枪毙，是纬国保住了他一条小命，现在台湾成了老兵。四弟陆钰，十四岁起在昆明当橡胶厂工人，现任在昆明以工厂老师傅之身退休。大妹妹敬贤因患心脏病逝世，关于她的情况，我以后还会写到。小妹妹敬慧，一九四八年在武汉从军，参加"抗美援朝"，后专业读大学，五十年代起就在大陆医药卫生界当干部。我的继母一生辛劳，六十年代逝世于昆明。

抗战后期，我到欧洲任中国驻欧战地记者，一九四四年冬出国前，意外地接到父亲从河南叶县寄到重庆的信，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现在河南叶县正下着大雪。叶县郊外一个茅草房屋里，有一堆稻草，稻草上睡了一个老太爷，他已陷入绝粮状态。你猜他是谁？他就是你爹，赶快寄钱来！"我当然只有遵命，把已换得的官价外汇在黑市上卖出几百元寄去给他。

一九四六年秋，我在南京《中央日报》出任副总编辑兼采访组主任，父亲到了南京住在

我家，有一天晚上，他不声不响摸到新街口《中央日报》大楼里去，告诉守门的说，他要会陆副总编辑，是陆的朋友，传达请他到编辑部等待。经常有人为新闻的事来访，多被安排在采访部我发稿的座位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他自称是会我的，就和一班年轻记者龚选舞、漆敬尧、潘霖、许佳士、张力耕等搭讪起来，问："你们这位主任厉害不厉害？"他们说："可厉害啰！"再问："你们恨他不恨？"答："不恨，他对我们很好。"记者们反问："你认识陆副总编辑？"他答："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再问："是他要你在这里等他的吗？"答："我刚刚从他家里来。"正在这时，总编辑李荆荪走了进来。因李和我们两家都住大阳村十二号，楼下楼上，已见过面，进门就亲热地称呼他："老伯"，而且告诉说："大声有个应酬，马上就到。"弄得一班记者一头雾水，莫明其妙：陆副总编辑的朋友，李总编辑怎么称他为老伯？直到荆荪向大家介绍说明这就是大声的父亲，大家才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说："这位老人家太会开玩笑了！"

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他却有东方朔式的幽默。这与他的出身、际遇不无关系，因为生长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特殊的家庭，所以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他说和我是朋友，一点不假，从我懂事的那一天起，他和我谈话就好像对朋友样的。从不显示父亲的威严，对于我的朋友和同事自然更随便了。

父亲到了上海，住在《新闻天地》杂志社里，卜少夫、黄绵龄两位好友热情接待了他。有一晚他忽然提出："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想去玩玩，在南京，考虑到大声，不方便。"绵龄后来告诉我说，只好把他交给少夫安排了。

父亲坎坷一生，却能逆来顺受。对我们做儿女的，从来不作空洞的要求，像一般封建家庭要求于儿女的：光宗耀祖，光大门庭。我告诉他我选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虽然辛苦，却有意义，准备干一辈子，可能一辈子都穷。父亲说："穷没有关系，只要不穷的愁眉苦脸就好了！"我父亲真是穷了大半辈子而从不愁眉苦脸。记得一九四八年六月患脑溢血于武汉逝世前，我赶去看他，他指着围在他病床前的继母和弟妹，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今后要累你了"溘然而逝。

回想起来，我做记者所以做得比较潇洒，而且"见大人则邈之"，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家庭背景不无关系。其次即胆子大，敢想敢闯，对于金钱不大在乎，喜爱朋友，还有即喜欢女人，这多少受了祖父、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以遗传学的观点看即遗传因子，用共产党的观点看则为"阶级烙印"，所以非狠狠镇压与改造不可。

另外一点值得一提，在我们家穷的没有饭吃时，最初是父亲出面向祖父的朋友或他自己的朋友借钱，但"朋友救急不救穷"是中国社会人情交往的通则，而我父亲从来是有借无还，直到后来没有人借钱给他了，就命令我前往，不是找这个爸爸，就是找那个伯伯，我不肯去，他就大骂，而且威吓，问我：是不是看着全家饿死？且教我如何措词。我从代父借钱中，逐渐体会出说话的技巧。这对后来当记者做采访工作，多少有了无形的助益。说句笑话，采访新闻总比向生人借钱要容易些。

漫天烽火归故里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尽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墙铁壁，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高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男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北平近郊的宛平县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随即向我全国进攻。中国人民为了不做亡国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掀起了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浴血抗战。

随着日军近迫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决定迁重庆，即后来通称的陪都。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本军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血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下令封锁马当要塞，一九三八年六月底马当要塞失陷，战火即将烧到武汉。我们寄居在湖北襄阳的家，决定疏散。七十三岁的祖母提出要回云南保山故居。用她的话来说："生为保山人，死为保山鬼。"我父亲就把护送祖母返里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我已满十八岁，高中刚毕业。

在湖北时，家里人谈起老家来，都说是"万里云南"，有一种远不可及的印象。但祖父的原则是在外不置产，将来回云南。虽然有一个时期，年入数万金，但在不置产的原则下，不买一分地、一片房，所居到豪宅，还是"典"来的。以示落叶必须归根。没有想到破落至一蹶不振。父亲因为穷，拿不出足够的路费，他给我的钱，只够我和祖母祖孙两人从襄阳到湖南常德的汽车票。临行前夕，他把他唯一的一件呢子大衣从箱底翻出来，朝我身上一披，说："祖母从小把你带大，你现在已满十八岁、成人了。应该回报她老人家。他老人家既然决定要回云南，你就招呼着回去吧！路费不够（仅为全程车资的十分之一）只好将就：好在战时军车多，你就闯闯，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你能把祖母送到老家。到老家后，你可找个事，养活祖母，直到她百年以后，你的责任就算了了。这件英国呢大衣是我唯一的财产，实在不行时，也可变点钱。"

我发现这是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日本军队很快就要打来，父亲决定带着继母和弟妹们避居鄂陕交界的郧县。祖母一心回归故里，我又是从小由她带大，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只有硬着头皮把这一重担挑起来。

我祖母娘家姓赵，自幼知书能诗，并且是保山有名的美人。及长，嫁到保山山区一个姓杨的大地主家，不到一年，丈夫就去世了。我祖父生性风流倜傥，原来就听说我祖母是个大美人，某次在一庙会中得见，惊为天人，但因名花有主，只能望风怀想，等到得悉杨家媳妇居孀，遂不顾一切，化名变姓，到杨家投效当长工，借以获得接近美人的机会。不到一年，终于攫取了祖母的芳心，于是效法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相约私奔，不辞而别，因此祖父在家乡有"保山唐伯虎"之称。另一说祖父把他本人的画作多幅连同一封长信留下，准备带着祖母远走，不料临行前被杨家发现，祖父因在留下的信中已经表示了将来一定报答，就乘势要求入赘，祖母也向杨家坦陈了经过，表明了心迹。杨家在"事已至此"的情况下，勉强同意招赘，并让他们双双离开，远走北京。祖母离开保山时二十二岁，回到保山时已经七十三岁了。

由于传统的封建意识，关于祖父母的故事，作为孙子平日是不可能得知的，直到送祖母返乡，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才在路上从祖母口中得知一个轮廓。后再在保山县中教书时才打听到两种说法。

半个世纪的沧桑，加上回乡之行艰苦备尝，使老人家自然产生了“往事何以堪，对景难排”的感慨。记得当我们好不容易到达贵州时，她不胜感叹地跟我说：“五十年前我跟你祖父离开保山，每天按驿站的行程走是六十华里，特别难走的地方，还走不到六十华里，几个月才能够到北京。五十年后，要方便多了，但想不到还是这么难走。”

这一路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难民图，扶老携幼，面有菜色，踉踉跄跄，不是孩子的哭声，就是老人家的叹息，还有就是妇女的悲嚎。当时，中国交通落后，所谓“京滇公路”（南京至昆明）迟至抗战前夕才修通，尤因日本侵略中国，疮痍满目，整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中挣扎，所以显得特别凄惨。再加上，我和祖母是没有路费的旅行者，其艰难困苦自然更异于一般人了。只举一个例子，在这次旅行前，我的生活经验是比较贫乏的，虽然在高中时闹过学潮，但很少接触社会，而我和祖母的路费到湖南常德就用光了，距离家乡还有几千里，怎么办？只好照父亲临别赠言去找军车。没想到头一次就碰了一个大钉子。

我嗫嚅着向一个军车驾驶员请求搭车，也就是俗称的“搭黄鱼”。他问我：“愿意出多少钱？”我坦陈地表示“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对我做看右看，几乎把我当“神经病”，最后干脆两个字：“滚开！”

唯一支持我继续去碰钉子的力量，就是父亲的临别赠言——“天无绝人之路”。接连碰了三次钉子，几乎没有勇气做第四次试探时，终于遇到一位面貌诚实、心地仁厚的军士，他是以驾驶班长的身份，自己开一部并带领两个驾驶员各开一部运子弹的车子从常德开往芷江的。我向他说明了我们祖孙两人的困境，因为是第四次向人告苦了，告苦的整段话，经过再三打磨，听起来可能比较动听，我表示愿意做他这个小小车队的杂役，听他指挥，要求他把祖母和我免费带到芷江。心里打的是“前进一步是一步”的算盘。

驾驶班长把我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只问了一句：“你是学生吧？”我说：“是的。”他就同意了。规定我做三件事：一是遇着车子抛锚，修理时，要配合驾驶员递上工具，修理后收拾收拾。二是需要加水时，负责提提水。三是每天的行车日报由我填，不懂怎么填时问他。就这样，我欢天喜地的做了军车司机的助手。

从常德经过沅陵、辰溪到达芷江。祖母是坐在驾驶室里，我只能平躺在塞满卡车的子弹箱上。子弹箱码的高度超过了卡车左右及后部的三块木板。当车篷全拉起来的时候，我想坐在子弹箱上都不行，整个人只能把腰腿都伸直了插进车篷，像僵尸一样直挺地躺着，人和子弹箱之间，只有一条摺叠的薄薄军毯。中途吃饭或车子加水，或到站休息时，人要像翻铁杠似的，双手用力攀住车篷后面的铁杠，慢慢把头伸了出来，然后拉出身躯移出双腿，纵身跳下。当年十八岁的小伙子，身体素质算是好的，头一天勉强顶得住，第二天就感到背脊好像在跟子弹箱打架似地，酸疼难耐；浑身酸痛。第三天、四天，简直受不了了，还得咬紧牙关忍受，只有咒诅该死的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在湘西崎岖不平的公路上，躺在毫无弹性的子弹箱上行进，即使是钢筋铁骨，也会把骨架抖散。车到芷江的时候，我走路腿都打飘，困乏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幸得祖母沿途鼓励我，并以佛家的因果律教导我，使我如饮甘露，重振精神。

当时，湘西土匪出没无常，趁国军在前线抗日，政府自顾不暇，于是更形嚣张。少数车辆根本不敢行进，习惯上都要结成车队才敢走。我们到达芷江后，参加的这个车队是在芷江等了将近一个星期，由二十多部车子组成的。有公路局的客车、西南运输处的运货卡车，还有军车。另外与我们同时到达的有一部小轿车，是一位国军副军长和他太太坐的。这位黄副军长随身带了副官和卫士，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人们就请他指挥车队。我本人也经原来同行的驾驶班长为我祖母代找到另一个驾驶室的位子。芷江出发前，黄副军长约集了所有的司机，规定了路上联络照应、首尾相顾的方法，比如车子中途出了故障，相互如何支援等

等。乘客们也彼此安慰，说有黄副军长同行，是遇到了贵人。

车队浩浩荡荡，一路平安无事。抵达湖南贵州交界的晃县时，大家几乎是以欢呼的口吻说："托黄军长的福！"黄副军长经众人一捧，也有点飘飘然的味道。公然说："不要看我随从的人不多，我们的火力，对付一两百个土匪决不成问题。土匪大概知道我在这个车队中，所以不敢碰。"晃县，也就是中共建政后改称的"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紧邻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它的西郊有一个西南大旅社，我们整个车队的乘客包括司机，总共三百多人，一起住进了这个三进大宅院改建的旅馆，有一两百个客房。黄副军长住在最后一进第三院，我和祖母跟押运子弹的三位司机同院。房间的布置很简单，一张木质双人床，除被子垫褥外，挂有夏布帐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木质洗脸架，架上放一只铜盆，如此而已。

我因路上太辛苦了，倒头便呼呼大睡。大概是半夜三点钟，被祖母推醒，只听人声鼎沸，大家惊恐地叫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刚刚披衣下床，听见几声枪响，就见一群土匪手持火把在吆喝声中冲进了我们的院落，不但有女土匪，而且有娃娃样的小土匪，其中几个孩子顶多十一、二岁，全身着黑衣，发出"呵！……呵！……"的呼啸声。这时，只见人流滚滚而进，不仅院子里黑压压一片，连走廊上全是土匪，一个土匪头子发布命令："注意，所有的旅客统统从客房里走出来。举起双手，站在你们的房门口，听候检查。有枪的缴枪，有枪不缴，躲在房里不出来，格杀勿论。"话音未了，只见院墙上高处都站满了土匪，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持枪，有的持刀，还有的持矛。院子里继续有土匪涌进。事后得知此次行动竟有一千之众。黄副军长因旅馆内线出卖，一枪未发，已先在众旅客之前被缴械了。

土匪走到祖母和我住房的门口，我才发现祖母怎么不见了。当时几乎急得要昏过去：回头一看，两个土匪，手持火把已冲进了我们房内，高声叫喊："帐子后面躲的什么人，快站出来，我们要开枪了！"我定睛一看，帐子果然在火把的照耀中抖动，我这时反而清醒过来，不顾一切冲进房内，高喊："不要开枪，使我祖母，我叫她出来。"然后三步并成两步，走到床后面把全身颤抖的祖母搀扶出来。湖南到底有楚文化的传统，土匪马上打了一声呼哨，喊进一个女土匪来，搜我祖母全身。女土匪一眼就看中了祖母手上的一对红绿相映的翡翠玉镯，命令马上取下来。祖母说已经戴了四十多年了，确实取不下来。那个女土匪用力取了一下，祖母痛的哇哇叫，我见她痛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接着一个男土匪警告祖母说，你再不取下来，就用刀砍掉你的手臂。我听到这句话后，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冲动，便说："我来替你们取！"拿起我祖母的两只手，把两只玉镯对准一敲，铿然一声，双双落地。就在这时候那个男土匪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还骂了一声："肏你娘"！我被打得眼冒金星之际，只听那女土匪一面捡地上的碎玉镯，一面说："可惜！可惜！这么好的一对玉镯子。"

说起这对玉镯子真不简单，原来还是光绪年间，我祖父在河南做官参加为慈禧太后做寿准备礼物而搜罗到的，一红一绿，红翡绿翠，既润且透，虽不能说价值连城，确是我家最贵重的东西。当我家破落以后，祖母也曾想过把这对东西取下来去变卖，可无论怎样也取不下来。据她说，戴上后四十多年只取下过一次，还是三十多岁时用肥皂水慢慢打滑取下来的。她之所以不顾生命危险躲在帐子后面，也是为了这对玉镯。

土匪在祖母和我的两只箱子里翻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临行拿走祖母的一件皮袄和我父亲给我的那件大衣。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个不停。土匪抢劫，来去如风，大概只用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即呼啸而去。我因被土匪打得小便急了，土匪前脚走，后脚就往厕所跑。那知跑到公厕小便还未解出一半，便听到墙后厕坑有微弱的声音在喊："救命！"原来，西南大旅社的厕所，前面男女隔开，各有入口，后面粪坑则是共通的。我跑到后面一看，一位女太太趴在粪坑坑口，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我于是冲到过道大喊"救人哪！"很快就来了一个饭店工作人员，和我一起把她拉了上来，问她住在几号房间，她竟说记不清了，再问有没有同行

的？她直摇头。我只好扶着她到祖母和我的住房里，替她打水清洗，祖母就帮她换衣裤。等清洗完毕，让她喝口茶休息休息，才知道这位太太姓谢，也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家属。先生在前方抗战，自己决定回到后方家乡贵州去。，为了保住身上捆的一包金玉手镯和钱财不被土匪抢走，就在土匪命令大家站出房来高举双手时，乘混乱溜进了厕所，后来还是感到不保险，就决定躲在厕所粪坑所在地，天黑不小心掉进了粪坑。据她自己估计，若不是土匪退去得早，再耽搁一下，她一支持不住倒下去就完了。也是命不该绝，死里逃生。

谢太太千恩万谢说我救了她的命，拿出一叠钞票来酬谢。而我祖母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说，这只是缘，决不能收她的钱。我也说，我并没有为她做什么事，只是碰巧而已。谈话中，她了解了我们祖孙的情况，主动建议我们不要再乘运子弹的车子了。邀我们和她同行，互相有个照应，车票由她负责，就这样，一起结伴到了贵阳。到贵阳后，她还为我们祖孙买了两张由贵阳赴昆明的车票，我祖母送了她一串佛教的唸珠。

这件事，使我有了绝处逢生、救人自救的机遇。加上后来从贵阳到昆明、再从昆明到保山老家，各种各样奇妙的遭遇，比如，一到达昆明，就遇着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招考练习生，我获考取，被安排在总收发室做一位辅仁大学毕业生何先生的助理，学到不少东西。并因夜间主动加班工作，结识了厂长王守竞博士，受到鼓励和教益。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回到老家就持印有“资源委员会”字样的名片，去拜访保山县长杨天理，目的是求职；没有想到接谈后，竟变成由他请我出任县中公民课专任教员。深深感到父亲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确有道理。问题在于自己必须持前进的生活态度。年轻时的冒险犯难，乐于助人，自然成为后来锲而不舍、遇事乐观的记者性格的组成因子。

回忆往事，深觉老子的祸福相倚论断之妙。

抗日歌声响边城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唐·岑参

从烽烟遍地的中原，回到寂静无声的边城，看不到半点抗战的迹象，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敌人的铁蹄，已把祖国的河山蹂躏的不成样子；无数的同胞用头颅和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卫国诗篇和乐章。为什么同是神州大地，这里却没有任何回响，难道高黎贡山和澜沧江竟把全县的人都与世隔绝？

一九三八年的夏末初秋，回到保山的第三天和祖母在陆氏宗祠住下来以后，就以一个省外回乡青年的身份，拜访了当时身兼保山县立中学校长的保山县长杨天理。杨给我的印象，即深沉而有智慧，话不多，静静听我讲，我告诉他，我对故乡的失望之情，与整个抗日的大环境太不相衬了。问他准备怎么适应滇缅公路即将打通的新形势？

也许因为杨天理先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有一定的认识，他承认，保山的升平景象是一个病态，应该想办法将气氛变一变。但要变必须有人。他从我口中听说我曾在湖北老河口参加过《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之一光未然（即张光年先生）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队，问我愿不愿留下来在县中教书，同时利用课余时间选拔一些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宣传？这正是我拜访他希望达到、求之不得的事。一方面解决了职业问题，可以借教书赡养祖母，一方面也为抗日大业尽一点报国之忱。

兼校长派我教初二的国文，初三的公民。公民实际上就是三民主义教育，在他想来，我来自抗日中心中原地带，多少可以给学生一些新的概念。

当年（一九三八）保山只有两间中学，一间是云南省立保山中学，一间即保山县立中学。两间学校都位于黉学街，毗邻而居。省中由于规模、经费、师资都比县中略胜一筹，学生普遍存有高县中一等的情节。县中学生面对现实，也找不到清除自卑心理之路。

自从我在县中展开以抗日宣传为中心的各种课外活动后，比如组织抗日歌咏演唱，抗日活报剧演出，从各种可能的报刊中剪下有关抗日战争的图片集中起来，举办抗日图片展览，以及组织抗日演讲比赛等等。一下子县中面貌焕然一新，几百学生的抗日精神就像朝阳一样的喷薄而出，学生们自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多年来存在的县中矮省中一截的自卑心理消除了。省中的学生甚至向省中校长杨玉生提出：县中轰轰烈烈，省中怎么办的问题。我本人在得到学生拥护的同时，还被县长聘为保山县教育委员会委员。保山有很多学产，教育经费是比较充裕的，问题是怎么用那些钱。

就在一九三九年春，又是作家又是记者的萧乾，沿滇缅公路采访来到了保山。因为县中的抗日宣传活动搞得比较出色，县里的人就建议他访问县中。到了县中，学校又让我出面接谈，萧乾朴实的态度和对人的诚挚，感动了我，从他身上受到了启发。我原来就有做记者的冲动，一九三八年底曾为缅甸《仰光日报》写了保山农民为滇缅公路流血流汗的报道，成为我从事新闻事业的处女作。会到萧乾后，通过长谈，更激发了做记者的热情。我一九三九年春担任《仰光日报》的通讯记者，直到在重庆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后还为该报提供通讯。

一九三八年寒假开始时，“保山县抗日救亡宣传团”以三十个县中的学生组成。我被任命为团长，一位比我年长十多岁姓杨的老师被任命为副团长。到县长授旗前夕，有人反映“救亡”两字不妥，是共产党的提法，按国民党的提法应该是“救国”，我被杨县长喊道县衙门去考问一番。我告诉他，“救亡”、“救国”都是为了抗日，用不着扣字眼。而遍及大江南北的“抗日演剧队”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命名的，能说是共产党吗？杨天理终于被我说服。后来我才了解县长的开明与当时云南在龙云这位“云南王”领导下，把昆明逐渐变成“民主堡垒”有一定的关系。

我带领宣传团在各乡镇巡回演出，节目有活报剧、抗日歌曲大合唱以及抗日战争形势报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我们的宣传活动多数是配合乡镇赶集的日子，那里热闹，就在那里出现。又不需要搭台子、拉布景，很适合农村因陋就简的条件，随意花钱少而收效大。农民普遍反应说，听了我们唱的抗战歌曲和作的抗日形势报告，知道了中华民族确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变了懵懵懂懂的思想状况。这对后来的保山承受日本疯狂大轰炸，掀起同仇敌忾的情绪，多少打下一些思想基础。蒲缥是保山县属一个有名的乡镇，当地有一个大地主名叫李尧，不仅为蒲缥一霸，也是保山豪绅。他的女儿读省中，两个侄女李乔芳、李榴芳读县中，是我的学生。李尧本人非常封建，对于任何新生事物都采排拒的态度。我们宣传团开到蒲缥时，杨副团长考虑到我们是男女合演，恐怕李尧以“有伤风化”出面阻挠，那就砸锅了。他和我商量，我于是提出一个渐进的办法，第一天只作抗日战争形势报告和演出抗日歌曲大合唱：活报剧和话剧都暂不演出，听听反应，如果一切顺利，第二天再推出男女合演活报剧的节目也不迟。

第一天演出的结束，反响甚好，几乎有口皆碑，于是乘势在第二天推出全部节目。事后，听说李尧只讲了一句话：“就凭这些娃娃们唱唱叫叫就能抵住日本人的进攻吗？”不过，几年后，保山遭到日本飞机的疯狂大轰炸，一位老先生倒说了句公道话，告诉他的女儿说：“幸而前几年的抗日宣传团给了我们一点挨炸的心理准备，否则忍受不了了！”这话后来在保山普遍流传。

就在抗日宣传团巡回各乡镇工作反响越来越好时，有一天下午三时，我正指挥全体团员在一个空场上练习唱歌，唱《松花江上》，指挥棒刚刚举起来就停在空中不动了，只觉一阵心烦意乱，那支不到二两重的指挥棒，竟有千钧重的感觉。我一下变得呆若木鸡，同学们纷纷呼唤："陆老师！陆老师！"正在大家乱作一团、扶我稍息时，一匹马冲到我的面前，只见一个全身穿黑的年轻人翻身下马，结结巴巴地叫道："陆老师不好了！你祖母要过世了，请你赶快回城里去。"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急愤之中，喷出一口鲜血来。

想想，我明明知道祖母在病中，竟然把她丢在陆氏宗祠托一位家门的堂嫂照料，自己带着宣传团跑出来，这一下追悔莫及了。等我骑上马冲回县城，冲到陆氏宗祠祖母床前，她脸上已盖上一张黄纸。晚了！晚了！我除了放声大哭，又能做什么呢？问堂嫂祖母是几点钟过去的？她说，是三点零五分。我一算时间，我的宣传团是三点钟集合好的，我指挥大家唱《松花江上》不正是三点零五分吗？当时，一阵心烦意乱，不正是祖母等不及我最后和她见一面而撒手西去的时候吗？

过去，曾听到说，至亲的人有"心灵感应"或称"电传感应"的精神交流现象，回忆我伯父因爱妾被其夫人逼迫自杀而死，愤而弃家到洪湖参加红军革命，成为贺龙的部下，不幸，在中共搞肃反扩大化时被杀了头。某夜，忽然跑到我祖母帐子前，掀开帐子，喊声"妈！"以无头之身向祖母告别，祖母惊恐中大叫，把睡在身旁的我吓醒。问"什么事？"祖母说："你大伯回来了，但是没有头。"继后辗转获悉，大伯陆振之确实死在洪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心灵感应"这个提法，想不到事隔十多年，竟直接有"心灵感应"的经历。

按照父亲给我的任务，祖母逝世之日，也就是我尽完责任之时，可是，怎样把祖母安葬好，也是个艰巨的挑战！这时，只有向宗族族长求援。由于"陆氏宗祠"实在我祖父的故居上建盖的，我提出请各族长凑出一笔安葬费来，等于集体为宗祠补偿地价，而这一笔钱我不经手，由各位族长组织一个治丧会办理。所幸祖母的棺材钱是县长兼县中校长批准由县中借垫的，杨县长自然站到我这一边，认为由陆氏门中原来建盖、管理宗祠的人负责治丧是合理的，各族长鉴于县长站在我这一边，他们也不得不表示接受我的方案。加上我是保山县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祖母出殡之日，县教委会发动了县中和县城各小学的中小学的师生三千多人来送殡，据家乡人说，是多年来保山少见的一次盛大的葬礼。整个送葬的行列中，披麻戴孝的只有我一个人，家族中人只臂缠黑纱。当时，既感到有点凄凉，又感到有点自豪，我走在送葬队列中默默地思念祖母的一生，而我不负祖母将我养育大，助成了她完成"身为保山人、死为保山鬼"、热爱故土的心愿。

感谢祖母，她的慈爱温婉、重视人的价值、强调心存忠厚，和做人的大度，成为我选择一生做记者的最大动力。

当兵走上新闻路

●独立亭亭命世雄，男儿何必哭途穷，卢骚寡妇淮阴母，慧眼豪情不愿逢。——于右任（咏史）

一九三九年，在家乡安葬祖母后，决定走向抗战司令塔的重庆。

重庆其时已经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也是青年人向往的圣地。不过，应当明说，思想左倾

的却把延安看作“革命圣地”。我可能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用共产党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具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对于过左的一套东西不能接受，加之思想上受到伯父投奔共产党、不幸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被清洗杀害的心理暗影，因此不愿意去延安，而选择了重庆。

这当中，牵涉一场师生恋，甚至因而一度被误会为“拐逃女生”而遭软禁，失去人身自由一个月，在做政治囚犯之前就做过“私家囚徒”，留待后面写八个女性的故事中交待。

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另外两个是南京与武汉。七八月的天气，酷暑蒸人，每天都是汗流浃背。在举目无亲又穷困无告的情况下，只能住在四川人所称的“鸡毛店”里，过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报考各种各样的职业，如报馆校对、补习学校的教师、工厂车间记录员、商店仓库管理员等等，结果，都是失败、失败再失败。

有一天，由重庆南岸过江回市区，走到趸船，才发现身无分文。万般无奈中，只有耍赖皮，抢在一位女士的前面，到接近渡轮时，三步并两步，快速登船，当收票员收票时，我头也不回，手置肩头，以大拇指向后一指就上了船。售票员拦住后面的女士要两张票，这位女士声明她是单身，还出言大骂“骗子！”我在船舱里只能以心跳回应。

大概在“七·七”对日抗战两周年的前夕，好不容易考取了齐世英先生为董事长设在重庆子石的军事编译社做助理编辑。报到之日，总编辑和我谈了二十分钟的话，就交下一本《马克辛机关枪构造》叫我重写，把原来生硬的译文修改得尽可能口语化、通俗化一些。这对我来说，比理解刘伯温的“推背图”还难，工作成绩之糟是可以想见的，试用第二周，就被辞退了。

依靠得到的一个星期工资，又继续从报纸广告上找工作。最妙的是连考《国民公报》的校对都未获录取。两年后，一九四一年参加“陪都记者自贡访问团”结识了丁中江，他时任职《国民公报》，才知对外招聘是个幌子，用什么人早就定了。有一天，到重庆化龙桥国民公报社中江的住处去玩，中江还在编辑部找出我的考卷共同“欣赏”一番，相顾大笑。他打趣说，如果那时我们取了你，你现在还不是在编辑部熬夜伏案工作。由于中国报纸有一个坏传统，把校对看成编辑部最低级的工作，其实校对的好坏，直接影响报纸的质量。

基于曾参加过光未然（张光年）领导的战地演剧队，见到教育部巡回演剧第二队招考队员，于是前往报考，先考了笔试，题目是“戏剧与抗日救国”，得以录取。继考表演，亦获通知。没有想到在入队口试时，一位姓姚的队长问了一下家庭和本人情况，竟表示从我的考卷看，有较高的水准，因此，不可能安心当个演剧队员，他们不愿意将演剧队当成临时歇脚的旅馆，所以决定不予录取。我表示愿意立下五年不走的书面保证，仍是拒收。万般无奈中，只好窝在鸡毛店里发呆。

当时，我能送进当铺的衣服都送进去了。最惨的是把仅有的一件长衫和三件衬衫中一件较新的送进当铺，换到一点钱，准备付鸡毛店的宿费时，莫名其妙地竟连同一个小皮夹子一起被窃了。

走投无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只好到重庆复兴关上去按报上某部招兵广告，志愿申请当二等兵。

陆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师是直属蒋委员长领导，由大特务头子康泽统率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改编的队伍。别动总队队员，起码的军衔为陆军少尉，所以编组正规部队后，有官无兵。军政部下令由各军管区补充，仍然兵员不足，不得已只好登报公开招募，广告上写复兴关招收学兵，而复兴关是中央训练团所在地，招牌非常响，我决定去碰碰运气。经过极其简单的身体检查，就被收容了。每天按《步兵操典》的规定，从立正、稍息做起，接受不算

严格的军事训练。生活待遇非常之差，除发给一套单军服、一条毡子外，什么都没有。吃的是抗战时期有名的“八宝饭”，也就是不但有稗子、稻草、还渗了沙子、石子，有时外加老鼠屎的糙米饭。就是这样的饭也吃不饱。为了吃饱，只有比快，谁先吃完，谁先装饭，落后的只好望着空饭箩叹气。由于那时养成的狼吞虎咽习惯，我倒现在吃饭还是比一般朋友都快。朋友有时惊讶我吃饭的速度，我只有坦白地说是当兵抢饭吃养成的习惯，抱歉之至。

在一次连长征求谁会唱抗日歌曲的晚点名上，我站了出来，他就命令我教大家唱抗日歌曲。从〈大刀进行曲〉教起，每次晚点名都教，得到了连长的赏识。大约两周后，连长找我作了一次个别谈话，就改调我为文书上士，帮助造名册。不久，我从报上看到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招考学员的广告，便向连长请求准我报考。

照理来说，我是不可能考上的。因为当时政校在全国大后方五大城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昆明招考大学毕业或肄业三年以上的学生，报考者极为踊跃，平均十中取一。而考试的科目国文、英文、三民主义、史地、国际常识五门得分加起来以五除，平均分数起码要在六十分以上，才能依序选拔录取，极为严格。而且，我面临报考证件的问题。

凭什么证件去报考呢？情急智生，从报纸上的“遗失声明”得到了鬼主意。有一天我看到《时事新报》上刊出一则遗失声明，是北平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刊登的，说他遗失了政治系的毕业证书。于是我就千方百计打听到重庆中国大学同学会，去问如果证书遗失，他们能不能补发证明？据答，同学会不能，不过可以代转给当时住在重庆交通银行四楼的老校长王正廷先生（曾任中国外交部长）处理。于是，根据政校招生规定新闻班乙组必须大学肄业三年以上才能报考，我就在《时事新报》上刊出下面一则“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本人一九三七年六月肄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三年级期满，因七七抗日战起，仓促离平，战乱中江肄业证书遗失，特此登报声明。陆铿”（行笔至此，应该坦率承认，当台北为国民大会副议长谢隆盛的学历真假问题发生争辩时，我的心都会跳，这也是一种连锁的忏悔吧！）

这里还要交待一下我的名字，我原名陆敬孔，是祖父起的。离开私塾，报考高小，受到“五·四”运动后打到孔家店思潮的影响，便跟祖父说，与其敬孔，何不敬先，在祖父同意下改名敬先。经过战乱的锻炼，觉得光敬先还是不行，应该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声音，因而改名陆铿。

“遗失声明”刊出后，写了一封信给王正廷先生附上“遗失声明”，要求赐一证明。他很快寄来一张秘书起稿、本人签名盖章的证明书，持而到政校报考，居然得以参加重庆区的考试。

国文题我到现在还记得：“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幸而入小学前读过两年私塾，对于孔老夫子的言论，多少背得一些，且小有领悟，于是用小我服从大我的道理，把个人与国家对日抗战结合了起来，意外地得到了八十五分（这是进校后查到的）。英文底子太差，只得到了三十分。史地和国际常识都在七十分以上。最突出的是三民主义，拜綦江软禁、被迫狠读了一个月之赐，竟名列全班第一，以九十五分上榜。五门平均达七十分，以乙等录取。这一非常偶然的结果，说明了人生往往会遇到意外的机遇，体现祸福相生的道理，我若不是被演剧队拒收，或未遭软禁，整个命运也就变了，想当记者只能是空想。

说起政校的新闻系、科、班是相当复杂的。记分：

新闻系，高中毕业考入，读四年。

新闻科，高中毕业考入，读两年。

新闻事业专修班，又分甲、乙组：国民党党报中级以上人员，经保送、审查合格，受新闻专门训练半年。乙组：大学毕业或肄业三年以上或具有同等学力、曾任编辑、记者三年以上者，经考试录取受新闻教育一年。

新闻事业专修班总共只办了一年，甲组两期，乙组一期，我是属于乙组的。说句笑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们班是个非常奇怪的组合，最老的同学伍云，一九三九年就已经年过五十，如果现在还活着，一百零八岁了。最小的我，当时刚满二十。全班四十人，坚持做记者到底的，只有在下一人。

不过应该指出，政校培养的新闻人才，三、四十年代如李荆荪、朱沛人、邵德润、钱震、林遇选、周天固、黎世芬、黄印文、彭河清、林家琦、毛树清、徐钟珮、张明、潘焕昆、耿修业、陈裕清、乐恕人、董品祯、徐佳士、王洪钧、赵廷俊、漆敬尧、龚选舞、陆以正、齐振一、李蔚荣、杨孔鑫、江德成、潘霦、周培敬、冷枫、余也鲁、薛心镕、张云鹄、刘成幹、田玉振、朱培璜、杨天毅等，其中有的并非新闻系所而是其他系所卒业的，对中国新闻事业或新闻教育，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想荆荪和沛人还分别遭到白色恐怖和赤色恐怖的迫害而致丧命。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像美国一样地为新闻事业而牺牲生命的新闻工作者立碑，他们的名字都将嵌在碑上。至于正大迁台后培养的新闻人才，那就更多了。如李金铨、张作锦、黄肇松、石永贵、旷湘霞、郑瑞成、陈世敏、汪琪、黄年、陈国祥、项国宁、马骥伸、黄天才、李瞻、潘家庆、李四端、张锦华、罗文辉、郑贞铭、王力行、赖光临、吴丰山、陈启家、徐荣华、周玉蔻、黄清龙、王念慈，还有学新闻而在其他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如林怀民、于宗先、黄文雄、焦雄屏等，充分体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气势。

我在重庆南温泉，正式接受新闻教育虽只有一年，但有幸遇到了极好的老师。如班主任马星野师毕生贡献与新闻教育和新闻专业，他把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所学的新闻学理论结合中国新闻事业的实际，传授给我们，强调新闻道德和记者操守，是我们得益极深。教授采访学的赵敏恒师是公认的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记者，为国家新闻界所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我们遇到了英美大牌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他（Thomas Chao）就伸大拇指。教授新闻写作的俞颂华师，是循循善诱的学者。而教授社论写作的王芸生师，为张季鸾后的《大公报》第一只笔。在思想上，影响我最深的元老报人于右任先生关于革命新闻事业的演讲，从《神州日报》到“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以至《民立报》的一个接一个地代表新生力量向腐朽势力的挑战，正如右老说的：“新闻事业是国家进步及民族文化解放上的神圣事业”，以及流露的“我还想作新闻记者”的感情，更大大激励我奠定终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志节。

在这里，我要感谢作家、也是记者萧乾兄对我的启蒙。一九三九年春滇缅公路上我们的巧遇，他的言行在我身上收到了潜移默化之功。当时他已是名记者了，不惜向我这边地中学教师进行访问边疆人民对全民抗战和打通滇缅路的各种反应，并及时笔记。他谦和、总是带着微笑的态度，使我印象深刻。而他所表现的献身新闻事业的热忱，更使我受到鼓舞。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到了南温泉机缘成熟，接受了右老诸师的教诲，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走上献身新闻事业之路。

半个多世纪的记者生涯，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但总的感觉是一种自豪的美好，或者说，美好的自豪。每当我的学生问我对记者生涯的感受时，我都坦诚相告：如果下一辈子叫我选择职业和事业，我的选择仍然是新闻记者。

事实证明，记者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事业，从服务人群来说，影响是至深且广的

先贤范仲淹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记者来说，既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又何尝不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呢？我为什么活到七十八岁还在新闻第一线采访，让我告诉朋友们一个秘密，因为乐在其中。

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

●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梁启超

一九四０年八月告别了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当年按制度是采取毕业后分配工作的。我和徐钟珮、沈锜、乐恕人等四人，被学校一张介绍信分配到位于重庆城里两路口巴县中学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徐、沈毕业于大学部新闻系，英文较好，被派做英文新闻检查，在魏景蒙指导下、朱抚松带领下工作。魏在国府撤退台湾后成为行政院新闻局长，朱在外交界脱颖而出，徐也成为名作家。徐、朱在重庆一起工作。有了感情一九四三年结婚。朱到台湾后，随叶公超转入外交界，历任驻外大使，七十年代做了外交部长，徐一度是非常活跃的外交夫人。沈在台湾也做到外交部次长。这是后话。乐和我则被安排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The Voice of China）传音科（即新闻部兼节目部），这是一个主管对海外广播的部门，每天用十几种语言对外广播，成为战时中国唯一对外发出声音的机构。鉴于它任务重要，在行政系统上划归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而在业务指导上则划归国际宣传处管。

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是《孽海花》作者曾孟朴的公子、在上海办《大晚报》有成，指导他工作的则是他的老战友、曾任蒋介石英文老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国际宣传的副部长董显光先生（Hollington Tong）。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基督徒，对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表现出很大的爱心，谈话总是带着期许，在他身上找不出半点官气。在他领导下工作，是非常快乐的。

乐恕人和我的名义是助理编辑，工作是每天把中央通讯社的新闻写成口语化的中文广播稿。我还得兼任国语播音员，常常在半夜两点钟一个字一个字地播报中央社的"记录新闻"，供应沦陷区的抗日志士和抗日前线的军中文宣工作者发行油印报刊用。遇到疑难的字，还得作解释，比如翁文灏的灏子，要说："三点水加风景的景，旁边再加页码的页。"工作辛苦，待遇微薄，但因为直接服务于抗战事业，所以精神状态甚佳。

就在这个期间，常常为了应付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要跑警报。有时第一次防空警报尚未解除，第二次警报又来了，最长的时间持续四、五小时，吃饭睡觉都受极大的影响，可是人们在情绪上除了加深对敌人的仇恨，既没有气馁，也没有怨言；相反地，有时还能自得其乐。比如，英语播音员马彬和（Pin.ho MA;英文名 J.A.Mac Causland）先生，这是一位热爱中国、放弃英国籍加入中国籍，无偿地参加中国抗战事业的伟大国际友人。他是苏格兰人，出身牛津大学，英文造诣之高固无论矣，而中文修养之深亦令人佩服。比如，我和他第一次互通姓名时，我说姓陆，他马上问是不是陆象山的陆，令我大吃一惊。记得有一次在防空洞里听他讲朱子治家格言，当时竟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心理，希望防空警报持续的时间长一点，可以多听听马彬和先生的宏论。

马彬和不仅用中文名字，穿中国长衫，说中国话，而且不修边幅，胡子满腮也毫不在乎，对人彬彬有礼，文如其名。有时他因工作的事给传音科长彭乐善先生写信，签名的时候恭恭敬敬写上：弟马彬和顿首再拜。彭乐善先生一九八八年在纽约逝世前有一次跟我谈到这位"中

国人民之友”还表露了无限的敬佩与怀念之忱。

由于中国对日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仅投身于抗战的中国人信心百倍，努力工作，就连一些热爱中国的外国朋友也劲头十足，不辞辛劳。如后来在宋庆龄主持的儿童福利基金会长期任职的爱泼斯坦即其中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凡是担任播音工作的没有一个迟到的，风雨无阻。我最记得，有一次日机轰炸，全城停电，偏于上倾盆大雨，我们想马彬和今晚不会来了，因为他住在十多里地之外，那知在对伦敦广播的晚上十时节目还差五分钟，只见他一袭阴丹士林布的长衫，拿着一张淋着水的红油漆纸伞，长衫的下摆和裤脚全湿了，翩然而至。只问了一句：“停电，我们的广播不受影响吧？”当然不受影响。《中国之声》的工作信条是：抗战继续一天，我们的声音就要保持一天。马彬和先生表现的对中国的爱心和敬业精神，使《中国之声》的每一个同事都深受感动。

在日本飞机对重庆轰炸中，一次巴县中学中弹，我和三个同事住的简易竹篱笆房子被炸毁，衣物全部被埋在土中。我还和同事开玩笑说，只要身上不被埋就不怕。那知就在这话说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和政校新闻班同组毕业同学高怡伦到乡下去看一位朋友，夜里遇到空袭，我们两个躲在山边的石崖下，不料日本人的炸弹就在我们周围爆炸开花，只觉一阵疾风吹来，伴着一声巨响，形成飞沙走石的局面，颇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整个人被埋在石子泥土里。等完全清醒过来，高怡伦才发觉他的一只耳朵震聋了，后经过医生检查，证实耳朵鼓膜震破，可见炸弹威力之强。

震惊国际的重庆防空洞大惨案，是现代战争史上很少有的惨剧。当时重庆最大的一个防控洞可容纳一两万人，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把洞口炸毁，由于空气不够，后面的人向前面挤，希望冲出来，前面的人不支倒地，竟把洞口堵死。人越来越推挤，空气越来越稀薄，死的人越来越多，一次空袭，单在一个防空洞里，近万人完全窒息死亡。事后，市政当局光是派卡车对运送一个个脸部发黑的尸体，就足足拉了十天。用“惨不忍睹”都无法形容当时的惨况。——这都是日本侵略者欠中国人的债

就在那种环境下，人们抗日意志仍然是高昂的。我们常常哼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的〈热血歌〉。坚强地进行着个人的工作。非常其妙的是，对于生活的苦，完全没有计较，而且知道这苦是长期的，有时候甚至以苦为乐。当时，一心一意想的，是对国家如何能做更多更好的贡献。周围的人都是在乐观奋斗，听不到一句唉声叹气，看不到任何愁眉苦脸。只是考虑到自己是学新闻的，在广播电台虽然也干的是新闻工作，总不如做记者可以自由发挥。当时中国广播事业，只有播音员，没有记者（全国范围包括延安皆是如此）。于是，我和乐恕人商量向彭乐善要求做记者，直接采访新闻。彭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他答应有机会向董显光先生报告。后来，他说，Hollington 同意了，但在行政系统上须尊重电台台长冯简，最好写个报告请冯简批一下。冯简是北洋大学出身的科学家，以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对于新闻事业的观念还停留在邵飘萍、林白水的时代。他不懂现代新闻事业的运作，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了“准予试作访员”。“访员”是民国初年对记者的称呼，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名片，四出采访新闻。

当时，四十年代初期，在一般人脑子里，所谓“新闻记者”只能由报纸派出。连通讯社记者，都似乎很勉强，怎么广播电台也跑出记者来了？因此，我们要一面采访、一面向采访对象解释，新闻有三种：一是“读的新闻”——报纸；二是“看的新闻”——纪录电影；三是“听的新闻”——广播。真是费尽唇舌。有的人甚于同情，勉强应付几句。有的人嫌麻烦，断然拒绝。有的甚至怀疑莫非是招摇撞骗的。常常有一种事倍功半的感觉。

恰恰遇到政校新闻班甲组同学朱培璜创办《侨声报》，先出三日刊再出日报，邀我和乐恕人加盟，我们便参加了。离开了广播事业大概半年，《侨声报》结束，又回到广播大厦工作。同年秋我受任中央广播电台编审总干事，并为特别节目进行采访。

一九四二年曾任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好运，他带着《天下一家》（One World）的著作来到重庆访问，受到了热烈的接待。同年十月三日，宋氏三姐妹在范莊举行晚会欢迎。我事先跟何柏身、彭乐善中央、国际两台传音科长讲好作一联播节目。当威尔基先生由蒋夫人宋美龄、孙夫人宋庆龄、孔夫人宋霭龄陪同在晚会上出现时，我就将一个带座的麦克风连着线拉到台子上“啪!”地一声放下，不料，受到便衣保安人员的喝斥：“干什么？”我向他解释这是广播电台准备向国内外作现场广播的。他听也不听，一面说：“去、去、去!”一面就去拿掉麦克风。我才赶紧向宋美龄说：“Madame! I am correspondent from the Voice of China “（我是“中国之声”的记者）接着用中文说明希望以今天的晚会做一个特别节目。蒋夫人于是向周围跟随的人示意：“让他，让他!”我才大胆地对着麦克风向听众介绍说：“今天是重庆各界人士欢迎曾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威尔基先生的园游会。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和孔夫人宋霭龄女士都出席了大会。现在是现场实况广播。”从这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实况广播，广播新闻也才比较受肯定。一九四五年在伦敦，BBC 邀我做他们远东节目的特约评论员，讲述同年七月和另一位中国战地记者毛树清随艾森豪威尔将军进军柏林的经过。BBC 向听众介绍我时，称我为中国第一个广播记者，我颇有一点当之无愧的味道，台湾话叫做“臭美”。

回头叙述《侨声报》的一段奇遇。这张报纸只办了半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另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即出钱创办《侨声报》的同学朱培璜，他是崇拜陈嘉庚的，而当时当权的蒋介石则认为陈嘉庚为“左倾”侨领，有点讨厌，比较喜欢被他视为“右倾”侨领的胡文虎。在蒋看来，《侨声报》也是一个麻烦。但就是这张以华侨和归侨为读者对象的小小的三日刊，居然成为战时中国第一张爆出最大新闻的报纸，也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异数。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的重庆，我和乐恕人在侨声报宿舍睡得正熟，忽然被原在广播大厦结交的一位工友小杨叫醒。（广播大厦离侨声报社一箭之遥）——顺便提一句，小杨是办公室的听差，他除了供应茶水，有时还替我买早点，但我对他一直平等相待，通过一年多的接触，到我离开广播大厦时，彼此已变成朋友。

小杨匆匆忙忙地说：“彭乐善（《中国之声》的传音科长）刚刚听到 BBC 广播，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彭科长兴奋得叫了起来，他正打电话报告董副部长（指 Hollington Tong），我就跑来告诉你们。”我赞美了小杨具有灵活的新闻头脑，和恕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印发号外，但因《侨声报》自己没有印刷设备，于是两人分工，由他去广播大厦找彭乐善抄新闻，我倒中央社找一位我们称之谓“钢板大王”的政校新闻班学长周培敬来刻蜡纸，出油印号外。恕人到广播大厦时，正好遇见董显光，乃向董打听，董先生说：“我要到官邸报告委员长，没功夫和你谈，去问彭科长吧!”等恕人把新闻从彭处抄来，我也把周找到报社，于是印出了五百多份十六开大小的太平洋大战号外：

日空军袭珍珠港马尼拉（眉题）〈美日大战爆发〉（大题）〈日方宣布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美总统下令动员三军对日作战〉（副题）

（本报特讯）据此间国际广播电台收音部收得英国 BBC 广播公司广播称:八日晨一时（重庆时间）日空军轰炸机群自太平洋上某地之航空母舰起飞，分袭檀香山美海军根据地珍珠港及马尼拉。当日空军进袭之际，适为日使野村、来栖在美国务院呈递日政府致美某种文件之时。日方于发动战争后，即宣布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美政府已召集最紧急会议，动员海空军对日作战。侨声报号外。三十年十二月八日　晨六时。

号外印好后，担任《侨声报》经理的高怡伦以及周培敬、乐恕人和我像疯子一样地分兵几路当街大叫："号外！号外！"免费分送给路人，轰动了山城。过了一阵，《中央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也分别引发了号外。

侨声报社附近一家西药行，看到我们的号外后，临时四处派人收购了一大批西药，并即可把自己药店的药价成倍上涨，发了一笔"太平洋战争财"。

太平洋大战爆发后，自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这么惊天动地的新闻，在中国竟由一张小小的三日刊首先发布，而来源还是收听广播。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时在中国，收音机尚未普遍，听广播的人较少，听国际广播的尤其少。重庆的国内广播机构和国际广播机构，虽在同一大厦，除特别联播节目外，一般缺乏联系。尽管国际台已得到这个消息，作为国内台的中央台仍姗姗来迟。而国际各大通讯社的新闻当时是按合约由中央社转发。中央社电务部虽每天廿四小时抄收国际电讯，十二月八日凌晨三四点钟时已经抄到有关消息，但值班的报务员限于英文程度，看不出这是惊天动地的新闻，所以阴错阳差让我和恕人两个初出道的年轻记者有了这一幸运。

后来，在重庆流行一种说法，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战时由大特务戴笠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电台收到日本海军方面秘密往来的电讯中，经过破译，已获得日本可能行动的情报，而且把这一情报及时传达给了美国政府。而美国方面看不起中国，认为以中国的科技水平，不可能得到如此尖端的情报，不予置信，当然也不做任何防卫准备，结果吃了大亏。

还有更神奇的说法，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得到这一情报后，故意留中不发，让日本突袭珍珠港，使美国海军受到损失，只有如此，才能激起美国民气，展开历史性的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所谓消灭法西斯的全球大战。

不管怎样，太平洋战争，为中国人对日抗战展露了胜利的曙光。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这天起，中国人的心情显然愉快多了。也就是说，胜利已经在望。

欧洲战地记者行

●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南朝梁·〈木兰诗〉

●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汉·童谣

一九四四年，整个欧洲战局发生了有利同盟国而不利轴心国的转变，希特勒自进攻莫斯科遭到拿破仑同样的命运以后，以改变攻势为守势。盟国大军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决定大反攻，六月六日 D•Day 在诺曼第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大公报》驻英记者、作家萧乾在伦敦的蒙哥马利元帅总部申请得到批准，随军采访，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一个战地记者，也是唯一参加诺曼第登陆战的记者。诺曼第登陆后，盟国大军东西夹击，中央通讯社记者余捷元也于一九四四年底自远东赶到欧洲随军采访。

一九四五年春，毛树清和我分别代表《中央日报》《重庆世界日报》、恩施《武汉日报》和《中国之声》(The Voice of China）亦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首的盟国远征军总部随军记者的行列，英文全名是 War Correspondent Accredited by SHAEF(Supreme Head-Quaters of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巴黎盟军总部发给我的战地记者证的编号是一0四六，说明随盟总的记者已逾千数，我是一个迟到者。我当时年龄

不足二十六岁，自然是后进。战地上活跃的同业，年龄最大的已近七十，是祖父辈的了。

我和树青不仅有同学之谊，且自一九四 0 年起就同时在新闻圈打天下，当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国大军开辟第二战场，于法国诺曼第登陆后，当时已为五强之一的中国，决定增派记者到太平洋战区和欧洲战区随军。我得知此讯后，既为自己争取，又为树清申请前往。（毛时任昆明中央日报主笔）

一九四四、四五年，在欧洲盟军总部申请批准随军采访的中国记者共八人。实际到战地的六人：萧乾、余捷元、毛树清、卢铿、乐恕人、（代表中央日报）、丁垂远（代表新民报）。另二人已在盟总挂了号、领了证，但主要任务是分驻巴黎、伦敦，担任中央社巴黎分社主任和伦敦分社主任的徐兆镛和任玲逊。

当时，以我的资历和英文程度是不够资格担此重任的，主要是对我特别爱护的元老报人于右任先生，请邵力子先生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梁寒操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结果获得批准。应该承认我的出国并不是凭真本事。在外交部办了护照，同时在财政部外汇管理局按规定申请到五千六百美元包括旅费和生活费的外汇，当时官价二十元折合一美元，而黑市已到二百多元法币换一美元，可以说是享受特权。云南乡前辈、属于我祖父辈的原政学系领袖李根源、印泉先生知道我非常穷，赠金以壮行色。

幸运的是，一九四五年春，告别重庆、从昆明飞跃驼峰到达加尔各答时，除与树清会合外，还遇到了生物学家、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谈家桢教授。这位遗传学权威摩尔根的关门弟子，时年三十五，长我九岁，长树清七岁，自然成了三人行的老大哥，我们称他“老板”，相约以“Go Dutch “的方式同行。他生性旷达，风流倜傥，决不作“假正经”，而是随遇而乐（不是“随遇而安”）。带着我们一起逛加尔各答，访新旧德里，喀拉奇采风，直到开罗作客，一路上充满了人生的探奇和轻松的欢笑。而且此一结识，导致了我和谈家桢这位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传人半世纪以上的友谊不坠。老谈以八八高龄，将于一九九七在北京召开世界遗传学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可喜可敬。

由于战争状态，空中交通并不太方便，常常为候机而滞留；到达开罗后，和老谈告别，他飞美国，我和树清转赴欧洲。当我们从开罗飞阿尔及尔再飞马赛到达巴黎时，希特勒大势已去，只剩下表演最后一幕的困兽之斗了。

苏军在东线，美英联军在西线，东西夹击，进攻柏林。希特勒临死前还有意制造一个大矛盾，在西线以重兵抵死，在东线配备较少兵力，故意造成俄国佬先于美国佬攻占柏林的复杂形势，给盟国内部留下冷战的诱因。

我们飞抵巴黎后，很顺利地在艾森豪威尔总部公共关系处办好了手续，取得了证件，住进了专门接待战地记者的旅馆。然后到军中商店（PX）买了和美军军官同样的制服包括军帽、臂章，打扮和包括艾克本人在内的美军军官一样。区别只是他们胸前有勋标，五彩缤纷，而我们只有一条绿底金线绣的 War Correspondent（战地记者）胸章。不过对镜自顾也很神气。当时按规定受上尉待遇。照国际惯例，如果被俘，将升一级，敌方将以少校对待。因此记者间常开玩笑，比如随空军出发轰炸柏林时，彼此互祝不要升为 Major（少校）。

巴黎的斯克瑞甫（Scribe）旅馆，是艾森豪威尔总部特别为战地随军记者准备的，相当于战时重庆巴县中学内的国际宣传处所设的外籍记者招待所一样，在当年物质缺乏、粮荒、肉荒、煤荒、十分困难的巴黎，仍然设备齐全、且廿四小时有热水供应，每天只收当时约合美金十元的一百五十法郎房金，二十五法郎一顿的晚餐，有鱼肉可吃，且大多是大西洋的另一岸美国运来的，战地记者们虽然不时放言高论，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群被盟总奉养的“天之骄子”。

当时在战地旅行是不收费的。只要是盟军占领后驻扎的地方可以随意飞来飞去，且手续简便，只消头一天打一通电话，告诉公共关系官员，第二天什么时候要飞什么地方，到时候就有美军开着吉普车，拿着填好的机票到旅馆来接，一直把你送到机场。因此，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事，头一天感到巴黎的饭不好吃，想到伦敦的中国街去吃中国小馆，当然也想顺便看看朋友，特别是朱抚松、徐钟珮这一对，第二天就飞伦敦了。

不过到伦敦则需自订房间，这件事多半是麻烦当时在伦敦中宣部伦敦办事处工作、八十年代在台北出任外交部长的朱抚松兄。而且伦敦的旅馆费用比巴黎高出很多。因为没有记者旅馆的优待，一切贵客自理。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一日，斯克瑞甫的饭厅里爆出了西线记者即可进军柏林的消息，新闻专员发出了请各记者准备在七十二小时内启程的通知。盼望的日子终于要来了，兴奋之情，人人溢于言表。廿九日晚盛传三十日出发，结果，七月一日清晨六时才分南北两路向柏林前进。

以战胜国的心情像战败国前进，这种轻松，还是生平第一次。

同行的人，具有双重经验的，即曾于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参加胜利进军的，一百四十六个记者当中，不过二十个。算起来，已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盟国远征军总部战地记者柏林参访团出发了。中国方面只有代表中央社的余捷元、代表中央日报的毛树清和代表中央广播系统的我。曾经担任《中国之声》顾问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代表郭宁，特别送我们一个总名字："三中央"。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传媒除《大公报》、《新民报》少数民营报纸外，还是国民党中央控制。

我们分在南路的记者由美军机护送（北路是由英军机护送）自巴黎绕道飞往慕尼黑再飞威玛。

威玛，是歌德的故乡，加上威玛宪法，在人们记忆中是座名城。但我们面对的威玛，却是一座好像死去的城市。十几个美国工兵静静地拆除主要街道上的铁丝网。我们走了两条街，才开始看到第一个德国人，这是一位满身黑色衣着的老太婆，骑着一辆脚踏车，身后跟着一群小孩儿，毫无目的地奔跑，看样子年纪都不超过十岁，其中两个竟能念出我们简章上的中国（China）字样。德国孩子们的教育程度给了我第一个印象。

七月一日正逢礼拜天，我们走进一座教堂，竟找不出一点祈祷的痕迹，战争把人们的一切都带走了，连宗教信仰也不例外。斜道里转出一个扶杖的老头儿，从他不完整的英语中，我们知道，威玛所有教堂的钟声已三个月没有响了。

军政府设在堆满瓦砾的花园别墅中，间或有德国人走过，都冷然张望一眼，他们好像从这里找寻一点什么，但当守卫的美英宪兵和蔼地向他们回看一眼时，他们又羞涩地低着头走开了。我心中泛起的是——亡国的味道真难受！

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记者营（Press camp）竟分设在一件旅馆和两座德国私人住宅里。分配我们的一座，主人原是一个纳粹军官，当然，早已人去楼空，从墙上的照片里辨认得出这是一位希特勒的党卫军官。家里的陈设相当华丽，会客室一架大钢琴，只有重庆广播大厦的一座勉强可以比拟。玻璃柜中几件水晶制品也很精致，我们没有带漱口杯，非常抱歉，借用了一件雕刻极美的水晶杯漱口。

细雨濛濛之中，六十辆吉普组成的记者行列，依序离威玛向柏林前进。每辆吉普上三个记者、一个驾驶军士或士兵。一个法国女记者高唱马赛曲，好像要把几年的闷气，一口吐净。我们的车号是六 0 九。驾驶者是一个美国士兵，偏偏他名字的音等于"亲爱的"意思的"打宁"。弄得同车的一位六十开外年纪的老记者嗫嚅不安。

行进中，在农村的小镇，偶尔见到德国妇女集聚而观，她们大概是想一瞻盟国记者的风采，当车子开动的时候，她们很自然地举起手来，频频挥动；我们当然也赶紧答礼。偶尔走过三几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残废军人，其中一位驻足凝视，对着这种情形，眼光流露出似乎仇恨又似乎不解的表情，这种多重涵意的光芒发自同一对眼睛里，只有黩武者被打败后才会有吧！

红十字医院，是这班残废军人唯一的安慰，初初踏进残破的德国，假若你要找到一个比较有生气的地方，那就是红十字会医院。任何盟国的旗帜没有它显眼，没有它多，任何工作人员，没有他们愉快，没有他们轻松，在一个满目荒凉的环境里，能够轻歌婉转，只有那些臂上佩戴红十字的小姐们。

东向哈雷进发，平坦如水的双道公路上，使人不能不佩服德国的交通建设，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养路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农田中，虽露出青翠之色，而小村落中饥荒之象已露，由威玛至哈雷全程一百五十公里，只发现一只鸡，四五个菜园，也只有一两片油绿菜。最后，在离哈雷廿五公里的一个小牧场里，看见一个老太婆正牧放着一群小羊，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奇迹。互相招呼："快看！羊群。"

车子亭子路上早餐的时候，我们曾跑进一个村庄里一瞥，差不多，十个人中有六个妇女，两个小孩，然后剩下两个男人，不是年迈苍苍，就是断手缺足。——这就是战争。

谈到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众口同声呼喊食物。一个体格相当高大的老太婆，哭丧着脸叙述她六个月体重减轻六十磅的经过。她的两个小孙子也从白白胖胖变得骨瘦如柴。本来，饥荒和战争是一个循环的链条，那个国家制造战争，那个国民承受饥荒。

哈雷是一座建筑相当整洁的城市，街上行驶着几辆破旧的电车。店铺里空着架子，比起威玛有城无市又好多了。不过，饥荒的惨况在这里仍触目皆是。

十几个德国孩子，仰望着高楼上的美国士兵，众口同声地呼叫："请再丢一块!"不丢吧，可能于心不忍，丢吧，眼看着一块巧克力糖下去，至少有两三个孩子抢得擦破了膝盖。

这是谁形成的惨剧？

问希特勒。

初见红军

红军向西移动，我们记者团的车队则是向东。七月二日看到了他们的先头部队，三日都是大队人马。平射炮大约有三十门的行列，颇有气势。最后点缀一小队哥萨克骑兵，别有风味。

因为记者团的行列与红军行列恰好为相反的方向，彼此互相挥手打招呼而过。也许是他们的服装与美军军服一比相信见拙，尤其在疾风中颤抖的瑟缩样子，使人们对史达林格勒的保卫战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当然，一个是生死关头，一个是胜利进军，环境不同，心情不同，所表现的态度也就不同。从哈雷到柏林的沿途可见，德国人民的房舍窗户里，是不是会伸出一两个帽子上有红星俄国兵的头，有时候，并吹着口哨，或举起德国孩子以表欢迎。在我内心里泛起的感情却很奇怪，不是欣然，而是不快。虽然，中苏当时是同盟国，但我总觉得德国被苏联占领是人类的不幸。我没有发觉，热战刚停，冷战已在我心头升起。

直到我见到红军里面的妇女辅助队员，心里才舒服一点。短发，身着草绿色军夹克，面露微笑。她们多半尾随着军官，坐在小车子里。只有两个女炮手站在炮车后面，显得特别威风，挺着胸膛，挥手而去。

出哈雷四十英里，见到苏军在路旁竖立的白底红字的木质布告，这些德文布告的内容是："德国人民将在苏联的领导下踏上复兴大道。结语是：希特勒虽然死了，德国并没有死！"最后署名——史达林。

树清一向比我正统，及时产生了一种连锁反应；希望将来进军东京时，能有类似的日文布告，最后签署的名字是：蒋中正。——怎能想象，这在当时产生的高尚的憧憬，最后却变成带有悲剧色彩的讽刺。

七月三日下午一点钟，抵达离柏林十二公里的才南道尔夫镇（Zehlendorf）。公共关系官员宣布，柏林城尽是断瓦颓垣，找不到适当的住处，记者营就设在这里。至于何时入城，下午八时的记者会中宣布。

记者会准时举行，很多同业议论纷纷，为了抢先报道德国投降后的柏林第一印象，不少人遭到失败。只有两个例外，那是脱下了战地记者服，单着一件军衬衫跟着首先入城的美国兵混了进去的家伙。大家判断，一定是合众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他们一路都在紧张地较量。

第一个失望的消息，就是在波茨坦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不许任何记者接近会场采访。经过一番质问，才知道完全是史达林的意见。一位年纪较长的记者，抖地站了起来质问两点。："一、史达林的意思是这样，是否杜鲁门和丘吉尔的意思就不能那样？二、假若史达林硬不同意记者采访三巨头会议，记者们能不能采访杜鲁门、丘吉尔的两巨头会议？"答案是可以想象的：没有答案。这不过是代表大家一吐不满之气而已。

柏林惨景

"柏林城里的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当我们在柏林城里巡视了一周回到新闻营的时候，担任驾驶的美国年轻士兵打宁很天真地问出这个问题。

诸如破壁颓垣、瓦砾遍地、十室九空，对于劫后柏林都没有这句话来的恰当。全市的房屋屋顶多保存百分之十。所以，在我们 匆匆发出的新闻电报里柏林建筑百分之九十被毁的估计，事后一想，都嫌不够。

大部的建筑毁了原形，连空架子也很少剩下。中国驻德大使馆可能是最幸运的，六层楼只有最上两层被毁。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奉召返国后，柏林馆务就停顿了。不久，老牌汉奸王揖唐听见了这个消息，就向南京的傀儡政府主席汪精卫推荐了自己两个"犬子"，分任伪政府驻西班牙和德国的使节。大儿子王德炎，去了马德里；二儿子王德寅，胖胖的，左颊上有一颗黑痣，眼光迟钝。捡起一张扔在他代办办公室写字台底下的照片看看，一副不成才的样子，据大使馆留下的唯一德籍女书记阿尔倍兹说，他是四月七日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午夜逃亡马德里去的，可以说是狼狈逃串。

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看了看整个使馆，连马桶间的镜子都被人拿掉了，其余的可想而知。大批文件、书记，散落在地上。据阿尔倍兹说，在柏林最混乱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得到军队的许可，成群结队进来搬东西往乡下。

三月二十三日，留在柏林的一部分华侨，包括学生和商人，在大使馆成立了"临时柏林华侨联合会"，宗旨为"谋柏林华侨之安全与福利"。华联主席严敦炯，在德专攻航空工程七年。当下的工作，是登记侨胞。到我们去的那天，一百华侨，有八十人的志愿是要求回国。这包括中共建政后在科技方面有杰出表现的过祖源、过晋源兄弟。

七月三日傍晚散步，遇着一位德国妇人带着一个小孩儿匆匆上前招呼。我和树清战地记者肩章上绣有金色的 China 字样，使她想起死去七年，曾在我国欧亚航空公司任飞机师的丈

夫——孟沙先生。她颤抖着出示她的证件，并特别说她丈夫曾为蒋委员长驾驶过飞机，三年旅居中国，使他们全家奠定了对东方古国的爱。她现在九岁的女儿，就是在中国出生的，也是中国给孟沙全家最好的纪念品。她表示，以她的家世，以她的教育，以德国的国民训练，是绝对不应该向我们要求什么的。但是，今天，在严重饥饿、营养不良和儿子得了水肿病的情况下，她想问，能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盒半年没有吃到的肉糜，一包四个月没有喝到的咖啡，一块三个月没有用到的肥皂，为她的孩子们，特别是那因严重营养不良、濒于死亡的儿子求助。当然，我们应允了，她约好我们抽空去看看她布置有中国竹画、陈列有中国花瓶及铺着中国地毯的家，以证明她没有说假话。

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日，记者营供应比平日丰富。我们准备好她要的东西，另外还与管伙食的美国军士商量好价购五磅面包，说明实情，下不为例。（孟沙太太有四个孩子，大孩子因病躺在家中）。乘坐吉普车送去时，一路上，我和树清讨论着：一次的帮助，够吗？除了孟沙一家，又有多少德国人期待着同样的帮助？又有多少欧洲人期待着同样的帮助？

有一点，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接触到的德国人，包括孟沙太太在内，战争给他们带来那么深重的苦难，但他们对于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并未流露痛恨的情绪，而是默默地承受苦难。我曾向孟沙太太提到这一点。她的反应是，责怪希特勒有什么用。我当时想，大概这就是德国人。

吉普车回程中，转向一个红旗招展的广场，看到了杜鲁门、丘吉尔、史达林三巨头的像。大概是为了纪念罗斯福总统，在三巨头像对面，悬挂一幅德黑兰会议图。四十八响大炮声中，美国布瑞德雷将军和苏联布朗罗夫将军先后为正式实行军事占领致词，从此确立了三个占领区。东区划归苏军，西南区划归英军，西北区划归美军。

晚上，一大群记者聊天时，互相问：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最多十年。《檀香山日报》的女记者考林斯说。这位小姐在柏林时，每次记者会都喜欢坐在我的旁边。树清还以此开玩笑说“她看中你了！”因此半世纪不忘其名。

一个可容纳五万人的大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平看去有五十个两丈见方大窗户并列的大厦。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直看进去，除了几十根大理石的方柱子，就是一堆堆砖瓦、木头和水泥块。第二层楼，伸出的一座小阳台上，一大群美国兵叠起罗汉，大叫“希特勒万岁！”为谑。我赶忙拍下这历史的镜头。原来这就是希特勒每次对着德国民众，手舞足蹈、声嘶力竭的演讲厅。而这座建筑就是战前威名赫赫、世界瞩目的希特勒总理府。

入门三丈深，躺着两辆破小汽车。旁边小半个、也许只是四分之一的大地球仪，很多记者同业围着议论，认为这就是希特勒为了征服世界，每天抚弄的宝贝。过去，早就有希特勒玩地球仪的传说，想不到会在魔窟里见到破碎的地球仪，上面糊了不少屎尿的残迹，原来是苏军攻入时留下的，先来是发泄对希特勒的痛恨。

在第一进第一层楼上，散乱着无数的会计表册，有一张总结的数目，竟超出原表册上印的百亿一项。另外在百亿前加了一条红线，有同业判断可能代表千亿。一位懂德文的法国同业如获珍宝地叫道：“呵！这明明写着‘总理一九四四年办公费’。真是惊人的消耗。”接着，这位“仁兄”毫不客气地把这张纸折叠起来放进他的皮包里，说了一句：“对不起，纪念品。”

会计室的旁边是一件保管室。两个高有一丈五尺的保险箱，上半截都被苏军用小钢炮打通了。堆积的石灰层下，发现好几百个纳粹十字勋章，每个十字中央有一个 “卐”字。不是制于一九三八年，就是制于一九三九年。这是希特勒准备用来征服全欧洲后将赏有功将士的。在纳粹德国属最高荣誉。据说，苏军捷足先登拿走了无数个。剩下这几百个埋在石灰堆下，所以称为盟军总部记者团进军柏林的最好纪念品。第二天在同一层楼中，还发现几桶镀

金和银质的珐琅勋章和奖章，记者都随便拿。乐恕人在我们后进柏林，他一口气拿了廿多个各色勋章、奖章，全部别在胸前照了一张像作为纪念。我拿的这些章，除了送好朋友作纪念品外，一直保存到一九五一年中国大陆全国镇压反革命，举国形成恐怖气氛之时，我家里人分三晚每晚揣几个在口袋里，一一丢进昆明翠湖。

在我的印象中，还有一个镜头始终不能磨灭，就是我们一群记者在总理府第四进其办公室的墙角，发现了一张希特勒的一尺二寸像，同样被苏军拉了屎。一位美国同业不顾污秽地举起来："请看这张倒霉的'英雄'脸!"我自然联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话："诚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英雄"在一九四五年的柏林，成了最大的讽刺。我当时想，假使一个英雄崇拜者来到这里，一定会嚎啕大哭。

在希特勒的地下室内，大家看到了一个红皮萝卜，希特勒是在断粮的情况下在这里出了永不投降的命令和与柏林共存亡的誓言。从这个红皮萝卜，我们可以推想英雄末路到了什么程度？苏军进柏林后，为了想找希特勒的下落，几乎把总部的地皮都翻了一个过。据说，在地库里找到了三具烧焦了的尸体，有一具尸体的牙齿经过检验，判定像希特勒。

究竟是不是希特勒呢？柏林之行后，来自各国的新闻同业兴趣都集中在希特勒的死上。德国老百姓，有的说他死了，先吞毒药，然后放火自焚。瑞典红十字会会长曾发表谈话，说希特勒是由侍从注射毒针而死，然后火焚。希特勒的一个护士，宣称目睹希特勒极其情妇依娃的尸体旁放置了几桶汽油，准备焚化。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准备到纽伦堡采访大审纳粹战犯，下榻于法兰克福附近的威士巴登记者营。有一天半夜忽有警报长鸣，据说发现了希特勒的情妇依娃，所有同业，倾营出动，忙了大半夜，一无所得。不过在思想上都有所得：希特勒虽然死了，但在德国的空气中，仿佛还能感受到他的呼吸。这个混世魔王对德国人民精神上的影响的消除，起码要经历一个世代（Generatinon）。

饥饿恐怖

欧洲战地采访印象最深刻的即战败国让人民的痛苦。首先是饥饿，已到了恐怖的程度。苏军占领柏林后，官兵的粮食，全取之于德国。苏军有些部队吃得近乎浪费，老百姓却饿的只能维持呼吸。由于男性多数不是成了战俘就是战死，但见妇女成群结队背着筐子、提着篮子，到远离城市二三十公里的乡间去找山果与野菜，只是为了一饱而奔波终日。早晨天亮动身，晚上天黑了才能回家。路上不小心，所采的山果与野菜还有被抢的危险。本来，德国的社会治安是不错的，但，饥饿起盗心，奈何!

更可悲的是，苏军入城后，把市民分做五等待遇。第一等是重工业工人，第二等是轻工业工人，第三等是电务员，第四等是一般平民，第五等是老弱平民。以面包定量分配说，第一等每日可得七百克，第五等只能得一百克 ，因此，出现大量的水肿病人。加上受了欺侮，无处诉苦；遭了抢窃，无处告发。至于良家妇女用身体交换食品，更是惨极人寰 。面对这种情况，树清因而发出："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亡国奴"的感慨。

根据我们在柏林的了解，战争结束之后，很多人是靠极少量的面包和饮用大量的水，勉强维持生命。因此，多数孩子们的肚子都胀得像鼓一样。

在柏林，记者同业们当时虽然还没有发明"冷战"这个词，但开始感到冷战阴影已在柏林上空晃动。

记者招待会中艾总部的一位将军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柏林的情况，表示自七月美英军队进驻之日起，柏林就实行三国共管，现在是苏、美、英，以后还要增加法国部队。记者的问题

集中于德国百姓已到了饥饿死亡的边缘，而俄国军队还要威逼德国平民供应俄国大兵的食物，请问这种状况怎么办？

答覆是：美国只能尽其在我，除了美军的食粮全部是由美国运来外，德国城市居民部分的配给粮食也是美国供应。各位记者先生，进军柏林以来，所有吃的东西，包括矿泉水，都是来自美国，美军曾就德国粮荒问题，与苏军会谈，但俄国人强调他们受战争破坏度最重，国内老百姓本身吃的粮食都成问题，军队在德国，只能就地取食。他们还说，美国迟迟参战，本国没有收到任何战争破坏，应当多尽国际义务。

记者追问："是不是可以说，俄国人已经吃定德国人了？"

答覆是："由你自己判断。"

"这样岂不是没有公理了吗？"另一位记者追问。

答覆竟然是："如果你实在认为不公平，你可以找一位律师，帮他们告状。"全场为之大笑。

事后回忆，东西方"冷战"，就是从这次记者招待会发出了信号。

在柏林，饥饿不仅笼罩着德国，而且笼罩着整个欧洲，德国人固然陷入饥饿状态，其他国家的人也好不了多少。记得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次理完发后，我告诉理发师擦点油吧！他非常惊讶地说："先生，你说什么？油，如果有油，我早就吃进肚子里去了。"这话也使我五十年难忘。

我们到维也纳的时候，奥国人的饥饿情况已逐渐缓和，但如果那一家面包店出现一批面包供应，仍会是但地报纸的头条新闻。

记者营是恶在维也纳的 Weisserhahn 旅馆，规定每一位记者每个星期六晚餐时可以请一个客人，平日不许有外客。战地记者们便用这个机会带来奥国小姐到旅馆里晚餐，而维也纳的女孩子也以能交上战地记者做朋友为荣，因此，每逢星期六下午，旅馆大厅和餐厅人满为患。吃完饭后，各个记者都心照不宣地带着临时女友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不知是那个缺德的家伙取了一个名词，叫"进军维也纳"。摄影记者们特别放肆，常常在大庭广众中宣扬自己的"战绩"如何"辉煌"，大家对"人欲横流"的嬉戏都不以为耻。

战争，真是一股无所不摧的摧毁力量，它不仅摧毁一切物质建设，也摧毁人们的心灵，包括人的尊严。

而居于战胜国一方的人，常常会忘其所以。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德国碰到一位美国律师，当感恩节大家一起吃火鸡时，他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说有一次别人问起他的职业，他的答覆是"占领者"（Occupartionst）。

在当时，我和其他人一起的反应，竟是一阵哄笑，不但没有感到他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对，还觉得新鲜、有趣。殊不知在得意忘形的环境中，自己的心理已发生了扭曲而不自觉。

纽伦堡看戈林

大审纳粹战犯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德国纽伦堡纳粹当最初崛起之地举行。

十一月初，我从法兰克福乘火车夜车到纽伦堡。和一位从伦敦来的律师睡上下铺。入睡前，两人聊天，知道他是没国际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之一，来为受审的纳粹战犯辩护的。我很奇怪，战犯们的罪行已是客观事实，还有什么可辩的。但这位律师说，战犯固然已经由盟国依法逮捕受审，可是，根据人权，他仍可以为自己提出辩护或请律师辩护。因此，这次大审纳粹战犯，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久违二十名受审者，每人安排一名律师。这对我来说，是

个新课题——人权。

四十年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晚在北京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先生，提到魏京生的问题，我发现，人权对于这位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同样是个新课题。

胡耀邦说："讲到人权，我们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他们标榜的是一种抽象的人权。前两天，不是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吗？有些法西斯分子的人权就不能保护嘛！他杀了那么多人，他侵犯了别人的人权，你还保护他？"

我到达纽伦堡时，先找到记者营。局势大审的纽伦堡正义宫（Palace of Justice）不远的地方，搭好了为前来采访大审的记者们住宿的帐篷。因距离大审还有一段时间，各国记者只是预先来了解一下情况。中国记者这次预定来听审的只有代表《大公报》的萧乾、代表《中央日报》的乐恕人和代表中央社的余捷元。我在记者营遇到老友萧乾，因审判尚有待，他告诉我到别处打一转再来。我决定先去看看审判大厅，如有机会，最好能找到关押纳粹战犯的地方看看戈林。

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戈林是盟国即将审判的第一号战犯，值得一看。

大审法庭所在的纽伦堡正义宫，我去看的时候正在装修，是把原来的两个厅打通并成一间，准备容纳四百人。好几个德国工人正在叮叮当当地工作，他们正日夜赶工。

待审的纳粹战犯就关在纽伦堡法院附近附属的监狱中，有美国占领军派兵警卫。我要求见负责看守的军官，一个年纪二十多岁、中等身材、面貌和蔼、名叫杰克的中尉军官出面接谈，他的姓因时间隔得长久忘了。交谈之下，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安全不出问题。因此要对关押中的纳粹战犯日夜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防止他们自杀。他们都是分别单独监禁，按规定，除必须衣物和卫生用品外，任何东西都不许带入监房。一日三餐，不准与任何人接触，家属亦不准接见。只有盟国法庭批准的辩护律师可以见。我拿出证件，说明自己的身份是来自中国的随艾森豪威尔将军总部的战地记者，曾随盟军进军柏林，原是准备来旁听纳粹战犯的，因为开庭还得等候两个多星期，而我必须赶到捷克去采访世界青年大会，翌日就要离开纽伦堡，请求准许我到关押纳粹战犯的看守所看一看戈林，哪怕是看一眼都行。主要是中国人很关心这次审判。

为了取的这位负责看管的美军中尉的合作，我从口袋里掏出在柏林总理府拿到的希特勒时代最高荣誉的铁十字勋章（Iron Cross）送给他作为纪念品。这位中尉一面感谢，一面说他可以陪我走一趟。不过事先约法三章：一、不能惊动；二、不能拍照；三、开审前不能发表消息，说见到了戈林。他说：戈林虽然是战犯，也得尊重他的人权，不能像到动物园样地看他，只能一瞥就走。

中尉陪我通过门口有卫兵守卫的看守所铁门进入里面，迎面是一条笔直长约六十英尺，宽约十英尺的走道，一边是高约三十英尺的围墙，，一边是一排分成六个单间的监房，戈林就关在第一间里。每间监房长约二十英尺，宽约十英尺。监房的门是铁制的，每扇门有一个大约像普通杂志大小的活动小窗门，安装着玻璃，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整个囚室，显得空荡荡的，最显眼的是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单人床。床上铺的不薄，由一张黄色的毛毯罩住。洗手间不见，可能是套在侧面或后面，很不显眼。室内的光线不错，窗户都是钢化玻璃，主要是防止自杀。

当我透过小窗门看戈林时，他正坐在床上，头微微上扬，似乎在回忆什么。我和陪我探看的美国军官脚步很轻，尽可能不惊动他。但他显然已经察觉，霎那间就把眼光直射囚室之门，似乎有心要保持元帅的威仪。仅仅一瞥，即把视线移开，仍然回到他的遐想中去。

我当时对于戈林的耳朵为什么那么灵，感到不解。因为我特别留心不要有脚步声，而他仍及时听到。直到我本人五年后坐了牢，经过长期关押，才发现，世界上犯人的耳朵是天下最灵的。想到小说中的形容词，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楚，不仅哑然失笑。

戈林和照片上的他，没有太大的区别。碧眼棕发，态度端庄。胖胖的脸，仍带红润，只是比原来消瘦了一点，肚子倒是小多了。眼睛仍炯炯有神，胡子也刮得光光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向后梳的头发，照样梳得很整齐。身上穿的一件黄色德国空军军官便服，显然已经很旧了。原来元帅服上的领章、肩章和胸前的勋标、勋章，当然都“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离开监房、走出法院大门时，我问负责看守的美军中尉：你的最大责任是什么？他说：防止这些纳粹战犯自杀。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戈林在被送上绞刑架的前夕，还是自杀了。

纽伦堡大审，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开庭，至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结束审判，历时近一年。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戈林第一名被提审聆听判决书，法庭判处绞刑，他当场要求枪决，但被法庭拒绝，并决定在十月十六日凌晨二时执行绞刑。他就在走向地狱前不到四个小时，服下入狱前准备好的氰化钾，了断一生，避免了上绞架。

这件发生在四十年代中期的震惊国际的事，直到九十年代初期、相隔的半个世纪，才揭示了戈林自杀之谜。

原来传说戈林自杀是咬碎了事先装好的一只假牙，假牙里预藏了氰化钾。事后证明这一传说不确实，他是把装有氰化钾的小瓶放在一个奶油罐中，带进监狱，以备最后之需。

根据有关材料揭示，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是被纽伦堡纳粹战犯法庭判处死刑的囚犯与家属最后见面的日子，但戈林拒绝这一安排。还把桌子上摆的家庭照片全部撤下去，交给自己的律师。

十月十五日，即处绞刑的前一日，是戈林决定自杀告别人间的一天。他以读书打发时间。究竟读没读进去，天知道，不过，他还写了笔记，表现了一定的从容赴死的态度。

这说明，随着关押时间的增长，特别是审讯做出结论以后，戈林等的待遇有了改善。我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看戈林时，不要说囚室内看不到照片和书籍，连桌子也没有一张。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戈林熟悉的宫廷神父盖莱克前来向他作告别祈祷，他在与戈林谈话时，并未透露执行绞刑的确切时间。大约在当晚二十一点二十分，中尉道乌特走过他的囚室时，看见戈林仰面躺着，手放在毯子上，看上去睡着了。中尉作为知情者，很惊讶，面临最后时光的人，竟睡得如此安详。

提供有关戈林弥留之际证词的，是看守本海姆和约翰逊。本海姆被约翰逊替换下来后，约翰逊成了戈林死亡的目击者，他是二十二时三十分接的班。此时，戈林正仰面躺着，双手伸出放在毯子上，这一姿势保持了五分钟，随后举起左手，像是要挡住刺向眼睛的光线，又躺向毯子。然后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直到二十二时四十分，他举起双手，把他放在胸口上，把头歪向墙，这时表针指向四十四分。一、二分钟后，囚室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吼声，戈林窒息了。约翰逊赶紧叫道：“快，戈林出事了！”

戈林之死，在狱中引起震惊，负责看管的安德鲁斯上校十六日对报界发表消息说：“戈林未受绞刑，他在昨晚二十二时四十五分服氰化钾自杀了。”他还补充说：“需要查明的是，他是如何弄到毒药的。”战犯审讯法庭的公诉人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反应是：“法庭的全部工作都因此黯然失色。”

美国里查德将军下令对此事进行调查，十九日检查了戈林存在囚室中的个人物品，在奶油罐中发现了毒药瓶，结论是，戈林在整个在押期间都藏有毒药，但毒药藏在监狱储藏室中，而不是在他身上，所以未被发现。问题时戈林如何能在严密监视下，在自己选择的时间把它顺利取出的。

答案在半世纪后终于找到，原来是戈林以金笔、手表贿赂了看守军官杰克·维利斯，他要帮助戈林，需要做的只是：当戈林从其奶油罐中取出一小瓶装的氰化钾时，把眼光转向别处一两分钟就够了。

关于听审纳粹战犯过程，乐恕人因为是开庭前夕在场的唯一中国记者，这里引用他的记述如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是一个历史的日子。纳粹战犯从这天起在纽伦堡盟国军事法庭上开始受审。希特勒、希姆莱、戈贝尔等畏罪自杀，其余的戈林、赫斯、李宾特洛甫、杜尼兹、巴本等二十人身列战犯名单的全都带上了法庭。法庭是一间宽约五十尺、长约九十尺的房间。后进楼上下是百记者席，中部是美英苏法的检察官席，前部左右是被告席，被告前面是二十位辩护律师席。前部右方是美英苏法四国法官席，他们背后插有个该国国旗。法官席前面临近被告的律师席，是法庭书记和翻译人员的座位。四周楼上玻璃窗内为特定的摄影和广播记者席。法庭采用英、法、饿、德四种语言。各个席位上都有选择语言的设备。法庭区域由美军警戒，法庭外面有坦克巡逻，以防意外。记者和工作人员进出，都要检查通行证。

开审前一天的晚上，公共关系部按各国在盟军总部记者的比例，发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记者证给二百六十名来自各国的记者，其中美国九十，英国五十，苏联三十，法国三十，波兰五，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捷克各两三人，我们中国记者在欧洲盟军总部登记的只有八人，给我们留了两席。可是头三天出席听审的只有一人。

不过，恕人回忆发记者证的那一晚，倒是令他非常兴奋。当叫道 China 时，突然在记者群响起一片掌声，他就在众人的鼓掌欢迎中，频频挥手致谢。拿到特别记者证回到座位时，有不少英美记者和加拿大、荷兰记者跑去和他寒暄，有人问国共冲突问题，他作了解答。还遇到曾在重庆采访的美国 NBC 记者 Poster 问说：“只有你一个来？”恕人告诉他中央社的余捷元说要来，还未到。后来才知是误于等飞机，改乘火车，所以晚了两天。《大公报》的萧乾继后也去了。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正式开审，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纳粹战犯身上，受审者分前后两排各十名，正襟危坐于木椅上。其后有八名白盔白带的美军宪兵站立监视，两端也各有一名宪兵手持白色木棍，守护者战犯。摄影记者们争相摄取镜头。戈林显然是最大的目标，虽然瘦了三十磅，仍保持胖的体型。其次是一九四一年私奔英国的纳粹党副首领赫斯，脸色苍白，头发也快秃光了，眼眶深陷，望去就像个阴谋家。第三名是德国外长李宾特洛甫，身着咖啡色便服，面色红润，头发银灰。他是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签订者，也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策划人。最令记者想不到的，看上去最文雅安详的是德国海军上将、德国潜艇部队总司令、投降政府负责人杜尼兹，他坐在后排第一位，正对着戈林。战犯们任何行动，都要由两名美国宪兵紧紧跟着，大小便都不能免。他们也表现出很合作。

“法官入席!”在司仪高叫声中全体起立，法庭内立刻肃静下来。首席法官英国的杰弗瑞爵士（Lord Geoffrey）宣告：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审判，本法庭代表全世界的人民，我们将履行我们神圣的任务，决无畏惧，也绝不宽纵。”

接着由四国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当读到戈林协同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时，戈林站起来

想发言，及时被法官制止，因为还不到抗辩的时候，戈林只好垂头丧气地坐了下去。正如苏东坡《赤壁赋》上说的："固已是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全部审讯历史十个月零十天。最后判决，除曾任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在近东活跃一时并任官至副总理的巴本及另外两人免于判刑外，都受到惩处，严重的如戈林判处绞刑，为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作出了示范。

教皇会见两个中国记者

欧洲采访生活中，最感到荣耀的是在梵蒂冈会见了天主教教宗庇佑十二世(Pius XII)。

八月初，我和树清自德国乘美军吉普车到达意大利。访问佛罗伦斯外，还到凡蓉娜（Verona）凭吊了罗密欧和朱丽叶殉情之地，最后到罗马欣赏古罗马的风光。

那已是墨索里尼被人民群众吊死在米兰以后，中国和意大利新政府刚刚建交，只派出一个代办薛光前前去建馆，在梵蒂冈则从战前之战后一直保持着公使级的外交关系。中国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博士，是一位留法研究中西文学的前辈，当他旅居巴黎时，和徐悲鸿、张道藩等结成了兄弟伙，被尊为大哥。他的法文造诣甚深，以法文翻译的《桃花扇》一剧，二次大战前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先后上演，轰动一时。比利时国王观剧后，赞赏不已，比利时皇家学院选他为院士。从那以后，谢博士的文名比他外交代表的身份还要受到欧洲上流社会的尊重。

树清和我到达罗马后，谢公使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答应安排我们见教皇（现称教宗）。当时，教皇接见客人，分为三等，第一等称私见（Private Audience)，即单独接见，可以对谈，这是对待红衣主教、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第二等称特见（Special Audience)，即小范围接见，可以谈几句话，这是对待各国部长、议会领袖人物和国际知名人士的，如权威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第三等称普通见（Common Audience)，这是集体觐见，不能谈话，只能接受教皇祝福。跪在前面的能一吻教皇手上的戒指已是荣幸了。谢公使表示，因为他和教廷国务卿私交很好，可以为我们争取教皇特见，但并无把握，实在不行，只有普通见了。

无巧不成书。八月十日罗马关于日本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以不胫而走。谢寿康公使在他住的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大旅馆（Grand Hotel）里设宴欢迎前几天到达的、其时身份为天主教中国南京教区主教的于斌主教和我们两个记者。四人谈话的主题，是中国到那个时候（一九四五年八月）还没有一位红衣大主教，正式称呼为枢机主教（Cardinal)。二次大战前，原有七十人，教皇逝世后采封闭式集会互选教皇，得票最高者当选。(大战期中死去近半数，其时只剩三十多位)。谢寿康说他曾经想教皇表示希望教皇任命一位中国籍的红衣大主教，教皇答应大战过后考虑。树清和我异口同声地说，非于宗主教莫属。于斌听了非常高兴自不待言。

晚会进行时，传来了比较正式的日本接受波茨坦会议规定的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和树清都欢喜的跳了起来。谢寿康公使马上开陈年香槟庆祝，于斌主教说，他是不喝酒的，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也要浮一大白。

正在连连碰杯时，教廷国务元来电找谢公使，通知说，教皇已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报告，为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表示祝贺，决定翌日、八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在教廷教皇上书房，以私见礼接见原由公使代办为提出请见的两位中国记者。当谢寿康博士接完电话转述这一信息时，我激动得和他拥抱，树清也赶紧和他握手称谢。于斌主教举起香槟酒杯既兴奋又风趣地说："看来，八年抗战是为你们两个抗的了！来，为中国的胜利干杯!"

第二天，树清和我身着整齐的战地记者服，谢公使穿起配有勋章和绶带、金线镶边的大

礼服一起乘车赴梵蒂冈教廷。我第一次看到由各国志愿人士组成的教廷卫队，金色头盔配着金边蓝底、领和袖都绣有花纹的制服，神气极了。当谢公使和我们乘坐的插有中国国旗的礼车驶入教廷正门后，卫队举枪致礼。下车后，由教廷国务院礼宾司司长迎接，并陪同走进皇宫，接着内务大臣也是一位红衣大主教，把我们带到教皇上书房。教皇身着白衣，头戴米黄色盖顶小帽，先和谢公使握手为礼，继由谢分别介绍树清和我，教皇和我们一一握手后请我们入座。他坐在上书房上方的长约三公尺、宽约一公尺五的写字台后面、一张白底金边和金色雕花高靠背椅中，我们两个记者合坐一张足够三人坐的金扶手紫丝绒沙发，谢公使则坐在我们对面的单人沙发上。我注意了一下四壁，除教皇写字台后面有一张圣母玛丽亚的油画像外，别无所有。简单中反而呈现庄严。

教皇庇佑十二世赞美了中国对日抗战，说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对世界和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祝福中国人民在战后重建家园中取得光辉的成就。我们感谢教皇的破格接见，说这不仅使我们两个中国记者感到光荣，也是对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所作的牺牲奉献给予肯定，我们一定要把教皇对中国人民的祝福传回国内去。我们试探性地表达了中国老百姓希望中国也能有一位枢机主教，教皇表示他已考虑到这个问题，不会使中国人失望。后来，教皇发表了任命中国北平教区总主教田耕莘为枢机主教，即俗称的红衣大主教，于斌落空。谢寿康告诉我们，主要是教皇考虑到于斌总主教过于政治化。不过到了五十年代，于总主教也被选为枢机。

教皇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内会不会发生严重的内争？（他避开用内战一词），也反映出他了解世情。当时，我们很有信心地回答说：中国八年对日抗战，损失惨重，人民渴望复兴、建设。今后必将全民团结，恢复战争的创伤，建设符合“五强”之一（当时世称美英苏中法为“五强”）地位的国家，永保世界和平。

教皇听了我们的回答，表示很安慰，很高兴。再一次为中国人民祝福，最后用拉丁文说：“上帝护佑中国人民！”谢寿康公使及时为我们作了翻译。我们再一次感谢教皇的祝福。

接着教皇从写字台上的一个金属盒子里，取出两枚有教皇庇佑十二世头像的纪念章，从座位上走出来，我们也赶紧站起来，他分别为我们两个别到衣襟上，俨然授勋的模式。

再鞠躬致谢后，我提出希望得到教皇的签名照，带回中国，让大家瞻仰一下教皇的风采。教皇笑着点头应许，并伸出手来和我们握别。

第二天教廷就送来八乘十二寸的教皇照片，上面签有 Puis XII 的名字，而且附来了一张教廷公报，公报上报道了教皇借鉴两个中国驻欧战地记者，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人民祝福的消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错估了国内的形势，抗日的烽火刚停就发生了全面内战，辜负了教皇的美意。

当我们离开罗马时，谢公使特别为我们组织了一场晚会欢送，出席的客人中，竟有教皇的一位侄女光临，亭亭玉立，明丽照人，树清和我除了各请她共舞一曲外，未敢造次。

一九四六年谢寿康博士卸任教廷公使回到了南京，为了报答他在罗马队无门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在南京中央日报大楼设宴欢迎，而应邀作陪者为监察院长于右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内政部长张万生、司法部长谢冠生、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及其法籍夫人、国民党中常委、曾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被当时南京新闻界称为由记者做主人的最出色的一次宴会。连我的老师，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第二天在报上见到照片都说：“大声，你真有本事，请了那么多要人来给你陪客。”我坦率地回答：“主要是沾于先生的光。”我安排这次宴会的基本考虑：谢是留法前辈，故将当时南京政坛所有留法的部长一网打尽；谢又是江西人，故找来他的江西同乡桂永清。于先生是党国元老，他出面自然使

这一宴会有了主心骨。如果讲规格的话，这是我的记者生涯中以主人身份邀集的空前绝后的一次宴会。事后反思，为什么在一九四七年七月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揭发孔宋贪污案？成功地办了欢迎谢寿康伉俪之宴，不知不觉地壮大了自己的胆子，也是埋在心底的一个因素。

感谢《传记文学》社长兼主编刘绍唐兄，他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以谢寿康为《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二期封面专题人物时，在封底发表了这一宴会的集体照，看来是谢博士夫人提供的，其时谢已逝世，我还在大陆。而我所有的照片，历经劫难皆成灰，只有靠有心的朋友收存了。

会洋和尚陆征祥

研究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从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起一百多年来，日本带给中华民族数不尽的屈辱。其中，最穷凶极恶、充分暴露其忘我之心不死的就要数日本。

一九一五年，日本向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代表袁世凯在这一草约上签字的就是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

陆征祥和我同姓陆，我从接触近代史开始就对姓陆的出了这样一个人，感到遗憾。当记者后，了解此人在欧洲一个天主教修道院出了家。等我和毛树清一九四五年到了布鲁塞尔，遇见一对比利时皇族的小姐，从她们那里打听到陆征祥出家的修道院就在紧邻布鲁塞尔附近布瑞斯城外。这一对姐妹的姐姐 Christine 主动愿作向导，陪我们作探访陆征祥之行。不过，按规定，这个修道院女性是不能进入的，Christine 表示他可以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等我们，让我们不要为她操心，尽量与我的陆门同宗畅谈好了。

“两位先生不远万里而来，看一洋和尚感何如之!”

一位头上有两条受戒的线、鬓发略显斑白，扁嘴，弯腰，年已七十三岁的老人，金丝近视眼镜，全身黑色道服迎了出来。他是得到圣安德勒天主教本笃会修道院院长的通知出见的，能相信这就是廿一条的签订者，后来曾任北洋内阁总理，到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战后巴黎和会时的中国首席代表吗？

赫赫之名，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同时用一种怀疑的目光，凝视这位打扮得有点像中国尼姑的洋和尚。他自一九二八年起，住进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不需人关怀，不要人慰问，潜心地向着自己向往的天堂，一步一步走自己的路。自民国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共同生活廿七年的比利时籍的夫人逝世之后，就交卸了中国驻瑞士公使的职位，跟中华民国的官场道了“再见!”民国十七年一月十四日起，成为圣安德勒修道院的一员。

十七年来的生活很平静，除了基督经典的自修外，就是学外国文。老人本来对英、法、俄文就有很高的造诣，尤其法文，在中国人中有史以来可能还是第一把交椅。

当然，我们近代的外交家向顾维钧、钱泰、金问泗、谢寿康、胡世泽，法文的修养都很高，但专就文字本身的研究说，还得让这位外交先进。比如拉丁文，一些住在中国的法国和意大利的主教和神父，过去基于成见认为中国人愚笨，不可能学会。老人却学的既精又通。尤其对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孔子不亚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结论，为法比学界叹服。对传教事业的长期精心观察、研究，也得到了中国教区独立发展的认识。并为事实所验证。

三个钟头的长谈老人多半倾向于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他比较得意之作即主张外交“超然主义”，无党无派。八任外长（顾维钧七任居次），进行三次外交事务改革，从组织架构到专业训练，为提高中国外交人才素质，奠定了基础。

老人谈话中，提到次数最多者为清末外交家许景澄，差不多每五分钟就说一次“许文肃公”。陆自中国第一个外国语言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毕业后即随许氏使

俄，任翻译，甚得器重。

三年俄国生活以后，交际场合中认识了比利时国籍的太太。当时，许氏对这一段姻缘很反对，理由是驰名一世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是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的。因此，许氏再三给陆以警告。但情深似海，终于以如不结婚，宁愿去职的决心，完成了终身大事。许氏在胡惟德先生的劝告中也就马虎地过去了。只是玩笑地幽了一默："子兴（陆的号）！你学外国学得很彻底，连太太也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没有儿孙，你太太又先你过世，希望你进修道院去，这是外国的习惯。"

想不到一语成谶，"玩笑话竟变为事实"。虽然事隔将近半世纪，七十三岁的老人，仍从微笑中露出一股年轻岁月的青春之光，点缀着美丽的回忆。

我问老人："您信天主教是不是受了夫人的影响？"答曰："她是天主教徒，但她从未以宗教的要求加诸丈夫。只是她虔诚的宗教生活，给了我高尚的熏陶。"其实，稍微留心一下即可发现，政治舞台上走下来的人，从"功利境界"转入"道德境界"是很自然的事。

谈到过往十七年的修道生活，老人很兴奋，他说："我是一个钱没有，而在这里舒适地生活了十七年。修道院里，不但有裁缝、木匠，而且五畜俱全。最初进院时，还有些小工厂。我越过越健康。做官三十七年，最后两袖清风。廿一条签订后，本来曾以外交总长立场，建议袁世凯准设养老金制度。不久袁世凯下台，建议也就落空了。"老人幽默地告诉我们说："幸亏找到这条路，否则恐怕早就饿死了！"

当时（一九四五秋）与老人同修的，大约一百二十多位修士，年纪从二十几到七十几岁。同样的服装，配着同样严肃表情，由一位在天主教会中很有地位的莱士院长领导着。莱士院长听说我们曾到过梵蒂冈，而且，教皇待以私见之礼，赠以签名之照，因而特别欢迎我们进迎宾大厅与全体修士共餐。

进餐前，先与院长见面，然后由一秘书引导入席。他特别介绍说，两位今日的作为就是两个月前于斌总主教和金问泗大使坐过的座位。设于梯形席位上端院长席之左右两边。修士依入院先后排列坐于两侧。陆征祥这位唯一的中国修士被排在左侧第七位。一片寂静的进餐中，我特别注意到他进食的速度，和我与树清差不多。表示老人的生命不会太短。大约二十分钟，院长木槌一击之下，全体起立，顺序外出。大家目不斜视，只有我们两个记者无拘束地欣赏大厅大壁画——"最后的晚餐"。

在大约进入礼拜堂读经时，老人得院长许可陪我们在花园中散步、漫谈。阳光照耀的花丛中，提起了签订廿一条的往事：

"当时的情形确很仓卒，先是日本公使回国述职，袁世凯请代向天皇请安。到这位公使再转来北京后，就向袁说：'天皇很好，问候大总统。另外带了一点东西来，请看看。'原来就是廿一条约。袁世凯机智地当场没有接受这条约，说请递给外交总长。

外交总长孙宝琦接到以后，惊慌失措，不知所从。那时，我刚从欧洲回国，孙来就商于我，并且要立刻把这难题转交给我，说已得袁同意，请我继任外长。我因身受国恩，国家面临危局，岂敢不竭尽智虑以报。谒袁后即挺身而出。此全属政治义务，幸而获得英美法俄各国公使情报的提供和精神的支持，勉强敷衍了一个濒于亡国的局面。

记得签字前夕，我告诉袁世凯，从此我陆征祥千秋万世被人唾骂！不过，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我却没有承认，如军器一律限用日本制造，警察中日各半，顾问遍设全国，并要扶助日本佛教传信。至今想来，还觉安慰。至少还保存一点国格。

当时，国人知道我是职业外交家，对日本的国际政治并没有什么牵扯；我虽不敏，但比

之大家所称的‘亲日四大金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他们四个来，还多少可以稍受原谅!”

陆氏叹了签订廿一条简单的经过以后，不无感慨地说：“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负咎，因此，从不愿和人提起这件事。即使被问到，我也礼貌地拒绝回答。二位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临别时，老人告诉我们他对国家的思念之忧。说：“二十多年没有看到国家的面貌了，而且，这个面貌又是那么新鲜，那么健壮，那么充满了活力，列为世界五强之一，我一定得看看。这里的院长已经允许替我安排一个愉快的旅行。这里的总管爱德华神父，基于对中国的倾慕，资源担任我的秘书，跟我回到中国。”

我们除了向他祝福，并问：“有没有意思到梵蒂冈一行？”答覆是：“是的！希望在回国前完成此愿。”

最后志愿秘书送出了老人手著的法文《回忆录》，共分四部，一、外交生活；二、政治生活；三、宗教生活；四、中国天主教之发展。附有两张插页分印着蒋委员长和蒋夫人的照片，一张背后印的是“一人定国”，一张背后印的是“国之慈母”。我和树清看了以后，多少有点失望。互问：“有这个必要吗？”

归途中，我们向 Christine 致谢，她为我们牺牲了大半天时间，简单地介绍了会晤经过。然后把老人的法文《回忆录》递给她请她一看。我和树清交换彼此心理上复杂的反应。似乎还未完全摆脱“功利境界”，虽然已经苦修十七年多了。“心如明镜台”，看来还有很大的距离。

十七年的岁月并没有从其眉宇间完全磨净当年烙印下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的阴影。

做一个宗教家谈何容易？！政治这个东西，确实深沉难测。

战地记者被视为“钦差大臣”

在欧洲战地，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经历。我们几个只不过是来自战时中国在欧洲战地进行新闻报道的记者，但所到之地常常被当地华侨和留学生视为求助或申诉的对象。甚至把我们视为“直达天听”的“钦差大臣”，向我们倾诉对某些中国外交官的不满。

一九四五年七月初，树清和我到达柏林的第三天，就有已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萧云来约了两三位中国留德学生找到了我们。他们说，中国是属于战胜的同盟国之一，留德华侨和留学生从报纸上看到中国被称为“五强之一”，非常振奋。而柏林解放后，却没有任何代表派来。他们历经战乱，遭受苦难，现在流落异域，不但无工可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多数是在半饥饿状态中，依靠官方少量的配给为生。幸而有的华侨还能在黑市上做点小买卖，换点粮食，互相调剂一下。他们希望我们代向中国政府反映，最好给他们一个回国报效的机会，至少也要通过外交途径，让英美盟邦知照占领军当局，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这对树清和我都是新问题，答应他们回到伦敦和巴黎后把这一情况分别向顾维钧大使和钱泰大使及驻法武官叶楠反映。

叶楠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多年的叶楚伧的长公子，其夫人袁晓园，致力于中国文字的研究，对政治有兴趣。叶多少有些惧内，曾在和我们几个记者闲话时流露过一句话：“女人对政治有兴趣会给男人带来麻烦。”五十年代后，夫妻双双靠拢北京，是他太太的促成，还是他的主动，不清楚。不过，我发现一个现象，原来父亲位居国民党枢要的子女，后来改变立场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颇不乏其人，著名的如陈布雷的儿女，国民党败象未露时即左倾并成为共产党员。而傅作义将军女儿傅冬（原名傅冬菊）成为“北平和平解放”

的关键人物，更是一个典型。

叶楠在我们几个战地记者的要求下，做了件好事，先后分批把留法、留德、留奥及留荷、比的中国留学生交涉了由美国军用机免费送回中国。这里面有一些后来颇有成就，如在中央航空公司任至总工程师、后来随“两航起义”为中国大陆航空事业直至航天部作出显著贡献的杭效祖和在医学界颇有成就的过祖源、过晋源兄弟都是典型。

此外，在巴黎中国大使馆的舞会上遇见两位在法国学音乐有成的女士，一位叫周小燕，是湖北商会会长周苍柏的女公子。一位叫蒋英，是鼎鼎大名的军事家蒋百里的女公子。我们几个战地记者请她们共舞时，引起不少注意。我还鼓励周小燕回国传艺。五十年代，她们都已返回中国，周小燕一度是叶公超的朋友，后来嫁给曾经跟电影明星白杨结婚又离婚的导演张骏祥。蒋英嫁给了钱学森。从巴黎舞会所见，周受到男士的欢迎显然超过蒋，但从婚后的家庭安乐、幸福看，蒋又超过周。人的命运，真是很难说。

我们几个驻欧战地记者在欧洲首先遇到的中国外交使节是驻法大使钱泰，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兢兢业业，按照政府指示办事，惟缺乏开创性。比如，日本投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结束，巴黎街头悬旗致庆，最初只是挂美、英、法、苏四国国旗，我们看了很不舒服，也有华侨就此向我们问，于是我们便在钱泰大使的宴会上直接向他提出，中国抗日战争，远在一九三七年展开，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在整个二次大战中，中国受害最大最深。法国是后来借盟国之力勉强争取到“五强”之一的地位的，不像中国是硬打出来的。而今天战争打赢了，他们竟只挂美、英、苏、法四国国旗，置中国而不顾，连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忘了。我们认为您，作为驻法大使应当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

钱泰大使是一位谦虚有礼、木讷寡言的人，他不但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且为此亲自去到法国外交部，会见那位中学教员出身参加“自由法国”运动、成为戴高乐重要助手的外长皮杜尔，皮杜尔也从善如流，马上表示通知有关方面照办。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巴黎解放一周年，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已经悬挂五国国旗，次序是美、英、法、苏、中，中国还是敬陪末座，心中不免耿耿。退一步想，中国旗能飘扬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也多少可以扬眉吐气了。

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作为老外交家，风采自然不同一般。他的夫人出身印尼黄姓富商家庭，表现出一种高贵的气派，我们在巴黎出席钱泰大使的宴会上，第一次看到大圆桌上有一个较小的旋转的圆盘，菜放在圆盘上，客人可以自由取用，据说，就是顾维钧博士出任驻法大使时他夫人黄惠兰发明的。到了伦敦，顾大使欢宴我们，其夫人话不多，但彬彬有礼地提出一两个问题，让我们几个记者尽情发挥战地见闻。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当她知道树清和我到荷兰时，巧逢威廉敏娜女王六十大寿庆典，她不问我们对女王的印象，而是问对女王公主裘丽安娜和其夫婿伯纳德亲王的印象，因为，当时欧洲对荷兰王室有一种传言，即皇家为了保持生女以继承王位的传统，选择夫婿要找智能较低的人。平心而论，我看伯纳德亲王的仪表确实差劲，像个白痴，也就老实以告顾夫人，引起小小哄笑。而顾少川博士则不动声色，真不愧老外交家。

我们到荷兰时，没有去拜望中国驻荷兰大使董霖。董霖号为公，抗战后期他出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秘书时，我就认识他，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原因是，树清和我不论到阿姆斯特丹和海牙都遇到一些华侨向我们诉苦，二次大战期间，他们冒险犯难，好不容易靠出入封锁线经商赚一点钱，因为怀念家乡的亲人，总想寄一点钱回去，而战后荷兰的银行不通汇，向董大使提出后，董允诺代他们想办法拨兑，结果把钱交给了大使，却得不到任何回音。催问也没有用。只有请我们向重庆蒋委员长反映，为他们主持公道。我们当时听了华侨的投诉，因众口一词，遂对董产生反感，不去看董，连电话都不打给他，也不作调查研究，便根据华侨

所说写了一封信寄给重庆蒋委员长侍从室。事后想想，非常莽撞。　　不过对于在荷兰的华侨怎么能通过封锁线经商赚钱到了解了一下。原来是三十年代（一九三五至三七年）曾任蒋介石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德国将军福根豪森（Von Alexander Falkenhausen）当时被希特勒任命为驻荷兰总督兼驻荷兰德军总司令，此人对中国怀有好感，对在荷兰经商的华侨网开一面，下令凡是华侨因经商通过封锁线而被捕捉的，都宽大释放，免于追究。这样无异为华侨创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因为在战争时期只有往来封锁线上走私才能发财。这位将军战后贫病交迫，蒋夫人闻讯曾通过当时驻德军事代表团给予帮助。

在瑞士，我们也听到一个关于中国外交官走私而被有关方面查处，货物充公，本人因持有外交豁免权而未予追究的颇不光彩的事。这位先生是中国驻意大利代办，往来于意、瑞边境时走私出了问题。此人后来在纽约一间天主教会大学里出任到重要职务，对于设立研究中国、特别是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基金作出了贡献。

在意大利，不论罗马和米兰的华侨对中国驻意大利代办薛光前博士都表示不满。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已被视为五强之一了，派出来的外交官还和从前一样？我们请他们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他们说，这是指的官味官腔官架子，对华侨摆官谱，对于保护华侨权益，敷衍了事，而怕同外国人交涉。他们特别强调，意大利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还怕什么？令人费解。米兰华侨工商联合会的外交主任伍尚进，就点薛光前的名说，薛代办到罗马上任后，对米兰的侨胞，既不慰问，也不给予侨务上的照顾，华侨们很不满意，希望我们“报告回国”。

在瑞士，也有侨胞向我们发牢骚，对中国驻瑞公使梁龙表示不满，说这位先生只是每年一度双十国庆露一下面，而且国庆酒会非常寒伧，备办的食品既不精，量又甚少，简直有失堂堂大国的国体。他们质疑：中国政府财经再困难，恐怕也不会克扣驻外使馆办国庆招待会的钱吧？

当然，在国外的外交官也有很出色的。譬如驻教廷公使谢寿康，不仅在教廷受到尊重，各国驻教廷使节也和他保持很好的友谊，美国罗斯福总统驻教廷代表，就成了谢的好友。在罗马，谢也很活跃，广结善缘，罗马的华侨就说，幸亏有谢寿康博士给中国人撑撑面子。

我们几个同业在欧洲冷眼旁观，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职业外交官办外交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多半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根本谈不上打开局面。谢寿康博士为什么做得出色呢？因为他是学者，学者所见者大，经济上不会斤斤计较，加上谢本人待人以诚，自然而然就处处受欢迎了。

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像顾维钧大使，可谓标准的职业外交官，从民国成立就涉足外交界，一直为国效力，不但抵御了帝国主义加在中国身上的侮辱，而且，在有的外交场合还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尊重。

巴黎凭吊茶花女

欧洲战地记者的生活，用多姿多彩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在巴黎著名的 Pere Lachaise 墓园凭吊茶花女墓，就充满了诗意，反映了“情”这个字是“天下一家，”没有国界的。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是法国“清明节”。

当时，乐恕人、毛树清、丁垂远和我，从盟军占领下的萧瑟德国，聚集到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总部所在地、充满新生气息的巴黎。中央社巴黎分社主任、也是在艾总部挂了号的的徐兆镛和中宣部驻巴黎办事处代表林咸让，来到作为记者营的 Scribe 旅馆看我们，大家约

着一起出游。

我的当时认识了《法兰西晚报》的一个女记者，从她口里知道了 Pere Lachaise 是胜地，很多名人像音乐家萧邦就安息在那里。入境随俗，便建议不妨来一个扫墓行。扫什么人的墓呢？不外英雄与美人。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归纳为两个：拿破仑、茶花女。

讨论的结果是，应当舍拿破仑而就茶花女，理由：从法国人的观点看，拿破仑诚然是英雄。但，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角度考虑，他却造成了大量生命的死亡和数不清的孤儿寡母。加之，他的墓我们中的一半已经看过，不过是在巴黎第七区一圆顶大厅内的一口红色大理石棺。而茶花女墓是在广阔、美丽的 Pere Lachaise 墓园，有树有花，地下埋葬着不少名人，地上更有无数盛装的游人，大可一看。

最可贵的是茶花女代表一个“情”字。正如元好问的词里所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从人生的意义说，情是人类心灵之美的体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笔下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elia），在一八四八年的小说里出现，一八五二年的戏剧里出现，是确有其人的。她在小说和戏剧里的名字叫 Marguerite Gautier；真名叫 Marie Du Plessis， 她正是小仲马的情人，十九世纪中叶巴黎的一位名妓。虽然身处社会的最底层，却有 一刻非常善良的心，为了爱情，不惜自我牺牲，显现了高贵的品质。因此，时间过去一个世纪，玛格丽特（Marguerite）这个名字，仍是爱情的一个象征。

老天也为茶花女的悲剧叹息，十一月一日这天，天气特别阴沉。我们六人分乘两部汽车前往自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存在的著名墓园。得见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男男女女大都身着盛装，手捧鲜花，多数是菊花，涌向坟场，在许多目前默默致哀，悼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或心目中崇拜的名人。

茶花女的墓，在万塚坟堆中，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砌坟的石头已泛黑色，坟上砌的一块镶边的碑，约一公尺高，一公尺五长，相较其他坟墓，并不突出。不过，当我们六个中国人，其中五个身穿盟军军官服装，恭恭敬敬向茶花女献花致礼时，却引来大批法国人围观。不少人对我们这一行动，啧啧称奇，低声议论。

两位看来三、四十岁、穿戴不俗、风姿绰约的少妇，和一位穿戴比较朴素的少女，以好奇而友善的态度和我们之间有了如下的对话：

“能不能知道先生们从哪里来？”

“中国!”

“中国！我的天！那么远。”

“你们知道中国吗？”

“当然知道，和日本人打仗得胜的。”其中一位在作答时多少流露得意的表情，显示其见闻广博。并反转来向我们提问：

“你们怎么会鲜花给 Marguerite”

“因为她是天下的一大情圣。”树清用英文回答后，林咸让又用法文重复一遍。

另一位显得窈窕的女郎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中国真不愧是文化古国，中国人真多情，真可爱!”

归途中，恕人曾占一绝记此事，时隔半世纪，不但我、连他本人也记不得了。当执笔回忆这一段五十一年前的往事时，只能以李白的两句诗作结：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附带想起一件事，当我们凭吊茶花女墓时，巧遇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工联巴黎会议的朱学范团长和团员、曾任中共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也到这个墓园游览。这位延安来客，表情相当严肃，当朱学范把他介绍给我认识时，我说：“我们是来给茶花女墓献花的。”他惶恐的眼神似乎流露出不知茶花女是何许人也。难怪，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这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应该是避之则吉。他能来到茶花女墓前，呼吸一点不同的空气，对于认识另一个世界多少会增添几分玫瑰的芳香。

《中央日报》历经沧桑

●党外无党，囊括长才，进取保守，相济无猜。进取过激，是日恶化；宁闻碎玉，果愈全瓦。保守已甚，腐化是惧，或闻倒车，或封故步；补偏救弊，赖有谠言。后知后觉，努力宣传。严戒讦攻，多筹建设，忝属同志，敢告主笔。

中央日报万岁！

蔡元培敬祝，民国十七年二月

以上是蔡元培先生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发刊的题词。当时正值南京、武汉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所谓“宁汉分裂”将合未合之际。直到宁汉合作以后，《中央日报》才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迁到首都南京出版。

从蔡元培先生的题词，反映出当时创业此报者，既反对过激，也反对保守，就是“允执厥中”的意思。但，事实上即是国民那个党的喉舌，报道和言论当然要跟着党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在蒋中正领导下，力主忍辱负重，提出：“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中央日报》配合国策著论，对抗战持缓进态度，自然引起爱国群众不满，所以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就被群众冲入报社捣毁过一次。

中央日报设原行总编辑制，社长名义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领；直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改行社长制，程沧波先生为首任社长。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蒋先生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中央日报》适应党政需要，在牯岭首创暑期庐山版，是为《中央日报》有地方版的开始。“庐山谈话会”达成全国统一抗日的共识，《中央日报》才成为一张坚决主张抗日的报纸，党性和人民性也才合一。

一九三七年底，政府自南京撤退，移驻四川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中央日报》一度在长沙出版，三八年九月才在重庆复刊。同时成立了邵阳、昆明两分社，在战时后方开展西南五省的发行网。

一九三九年日本对重庆实行疯狂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不但陪都处处可见瓦砾，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及时事新报五报社都受到毁伤。为了保持战时首都不能一日无报，决定组成《重庆各报联合会版》，前后维持了一百天；一百天后各报又分别出版。

程沧波才子文章受重视

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到一九四0年十月，中央日报社长由程沧波担任。程沧波是一位才子，文章写得好，其传诵一时之作乃与章士钊的一次笔战。一九三三年初，共产党创党总书记陈独秀与俄人牛兰被捕，由南京地方法院审判，章士钊受陈独秀文人为辩护律师，章在庭上俨

若演讲，旁若无人，并将辩护词油印在其下榻之饭店分发，主旨为："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图谋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图谋推翻国家。""国家号为立宪，选民大抵享受依法变更宪政之权，愚主陈独秀偶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及布达未来之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之通则。自信确有法据，深协人情。"

程沧波针对章的论点，一九三三年四月廿六日在《中央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与章士钊）。继后，章在上海《申报》刊文辩难。同年五月七日，程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章没有再作回应，程沧波的文名因此二文而大盛，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由杭州致函程谓："为之喜而不寐"。南昌行营秘书长、政学系巨头杨永泰也由南昌致电申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蒋对程的欣赏。

程主《中央日报》八年半，直至一九四 0 年秋因桃色事件下台。自古才子爱佳人，原来，储安平在程领导下任《中央日报》编辑部主任，其妻子女作家端木露茜，不仅人长得漂亮，文章也写得好，程为之动心，乃趁储安平赴英学习机会，穷追而得手。储得知此事，在其乡前辈吴敬恒（稚晖）先生面前告了程沧波一状。吴言于蒋介石，蒋把程喊去骂了一通。中央日报社长社长势难继续当下去，乃呈请辞职。于右任先生爱才，且认为"风流无罪"，随把程沧波叫到监察院任秘书长。端木露茜女士也为这一段感情纠葛，写了一篇相当轰动的文章：〈蔚蓝中的一点暗淡〉刊于重庆《大公报》，风传一时。

程去职后，《中央日报》先后由何浩若、陈博生、陶百川、胡健中任社长，直到对日抗战胜利，陈训悆主理社务一短时期，由蒋亲任马星野出长，实现了自给自足，改变了《中央日报》长期以来都靠国民党中央拨款之称的局面，破天荒第一次赚了钱，而且迈向了企业化。适值国土重光，报纸发行及于全国，而且经过八年举国一致的对外抗战，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主席的声望有若丽日中天，尽管有中共的军事对峙，但多数国民党人都相信，或藉和谈，或凭兵力，一定可以达成一匡天下的目标。

马星野精心办报创奇迹

南京《中央日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作为首都第一大报，确实也颇有一点顾盼自雄的味道。正如时任《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在《龚选舞回忆》一书中写的："有史以来的中国记者，声势之大，气焰之高，当无有逾于抗战胜利、复员还都后的那一阶段。"

而与龚选舞同在在《中央日报》任记者、后在台湾新闻传播界受到普遍尊重的徐佳士，在《中央日报》三十年纪念集上，以"不颁文凭的学府"为题撰文指出："中央日报的年轻的采访组，经过半年多些的严格训练，就变成了当时全国新闻重心南京的最强悍的记者圈。上海和平津大报驻京记者，把中央日报的采访组列为每日必须去『走动走动』的地方。"原因无它，《中央日报》的独家新闻，不仅权威，且快而准。

事实上，当时的《中央日报》，确已成为首都新闻中心，连外国通讯社，诸如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等，都要参照《中央日报》的有关政经新闻发稿。

这里面，有主观的原因，中国记者向有文人论政的传统，讲究特立独行，"以天下为己任"、"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传统；也有客观的原因，八年抗战赢得胜利，民气高张，而国共和谈双方，都在高谈民主自由；作为友好盟邦的美国，又介入中国的内争，民主与反民主成为它检验中国进步或反动的标尺。南京《中央日报》从社长到编辑、记者，无形中形成一种共识，要为中国的民主作出贡献，必须本着"新闻自由"的原则办报，全力以赴。当然，这里面也有斗争。

南京《中央日报》自一九四六、四七、四八年的情况颇为微妙，报纸的发行人兼社长马星野先生是一位新闻学者，出身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一九八四年密苏里新闻学院还颁给

他杰出校友奖），有办一张好报的理想。而他的国民党中央党校毕业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地位，却对他是一种约束。加之，我们这位老师书生秉性，谦谦君子，以慎为键，更决定了他的作风，不敢放手大干。但他到底是有报业理想且受过当代新闻教育的人，所以看到他的学生们生龙活虎，大展拳脚，也就不愿过多地干涉，而是采取的放任政策，让我们一班弟子分任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经理、副总经理，尽情发挥。

马星野师后来在台北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有一大群青年人，全市朝气蓬勃，说做就做，如生龙活虎，鱼跃鸢飞，活泼泼的。我出一个主意，他们立刻去做；我热心，他们比我更热心；我兴趣来时，他们比我兴趣更高。因此，轰轰烈烈，把一个南京“中央日报”，干得十二分有劲。无论销路、广告，都蒸蒸日上，不但打破《中央日报》之记录，亦打破了所有南京报纸之记录。这都是得力于这批青年人才之干劲。（见马之骕著《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经历》）

先日报后中央路线正确

《中央日报》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创办以来，一直都是赔本的，赔了十八年的本。到一九四六年马星野师接长才开始赚钱。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快而准；报纸杂志化，销路自是日日上升；有一个时期，刊登广告甚至排队，令人难以想像。因此，实行了企业化，成立了董事会，我们几个政校出身的编经两部主管人员，都被派为“党股代表人”。国民党有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中央日报》一向被视为CC派掌握的国民党喉舌，报社董事长就是陈立夫。而我们一群青年人，则秉持新闻自由的原则工作，以办好报纸为目标，不管CC或DD。

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身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对我们的新闻自由做法看不顺眼，他提出“先中央、后日报”的主张，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机关报，当然要以站在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而我们这班年轻人却提出“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来个针锋相对；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报纸如果办的没有人看，中央立场即使站得极稳，又有何用？《中央日报》有史以来没有赚过钱，现在赚了大钱，说明只有先把日报办好，然后再于不知不觉间反映中央立场、观点，才是合理的的途径。

马星野先生本其对新闻事业的信念当然也欣赏学生们的努力，不过他深知陶希圣的份量，不愿得罪陶先生，所以在报纸的言论上完全尊重陶，而新闻上则对学生放手，因此，我们就能大展拳脚。同时，注意在礼貌上尊重“陶公”（这是《中央日报》上上下下对陶希圣一致的称呼），使他在受尊重的情况下不致干预编务。

陶希圣负责社论。主笔室除陶任总主笔、王新命任副总主笔外，还聘请了元曲大家卢前（冀野）和方豪神父、钱纳永、戴杜衡、殷海光、张文伯为主笔。从阵容上看是比较强的，但因领导思想的保守，并未起到领导潮流的作用。最引起争议的社论，莫如陶公针对学生以“反内战、反饥饿”为名闹起的学潮，主张“操刀一割”。他有这种思想意识，对我们这班年轻人在新闻报道上的自由化，自然颇不放心，时有微词。

与陶截然不同的是看起来年纪比陶还长的王新命先生，他是一位老报人，思想开放，富正义感，常给我们打气，经常向我们宣传一个基本观点：新闻自由靠争取，不能靠赐予。

南京《中央日报》新闻没有禁忌，有很多实例，比如，漆敬尧受命到经济部采访孔、宋贪污国家外汇内情，冒险拿到调查报告。徐佳士刚入行跑新闻不久，因文笔不错，安排他参与了国大新闻的集体采访，交代他一个原则：如实报道。他听到国大代表因国军军事不利，提出“杀陈诚以谢国人”。他就照写，我也就发稿照登，后来几乎影响到《中央日报》迁台出版事宜。

我本人与军令部长徐永昌将军的交道，如今回首往事都感到有点荒唐，却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央日报》的自由度之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徐永昌将军以军令部长、密苏里舰上代表中国受降的身份，经蒋主席派为政府代表，与马歇尔、周恩来为国共和解事举行“三人小组”会议，一直拒绝见记者。我竟在《中央日报》上发消息说“徐永昌失踪。”引起马歇尔为此致电蒋介石委员长，蒋介石又命陈布雷向《中央日报》查询真相，听我说明情况后，布雷先生在电话中连责两声“胡闹，胡闹!”结果，不打不相交，反而促成徐每次会后向《中央日报》提供开会情形，使我们掌握到“三人小组”会议的全貌，新闻报道既快且准。我因此事还和徐永昌将军建立了特殊的友情，此是后话。而在陶希圣先生看来，这种作法完全不合规矩，是非常不可取的“脱序行动”。

此类“脱序行动”发展到极致，即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南京《中央日报》揭露孔、宋贪污国家外汇三亿多美元案，几乎引起一次政潮。此事的来龙去脉，另章详述。连言行一向谨慎的马星野师，事隔四十年在台北接受马之骕先生访问时，仍以之作为争取新闻自由的典型事例介绍。马之骕先生在《新闻界三老兵》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争取新闻自由与时效，这是马先生留学美国学来的唯一的新概念。三十七年夏因刊“中孚杨子公司”新闻，差点惹出大乱子，当局严讦查询新闻来源，马先生本新闻记者信条，不透露新闻来源的基本原则，幸好，当时任采访主任的是政校毕业的学生，挺身而出，表示甘受处分，也不能违背新闻道德，说出新闻来源。经过这个学生勇于负责，甘愿接受处分之后，当局反而认为这个学生很好，显然是政校的骄傲与成功，因此，终于获得谅解，不加追究了。

直到一九九六年七月七日，台北集会纪念雷震先生百岁冥诞，马之骕先生为主其事者之一，与我不期而遇，并致赠其大著，特别在书中有关段落批明：“这个学生就是陆铿。当时我们『二马』斟酌的结果，没有写出名字，是设想一旦他（指我）想来台湾时，不准入境。”

以做官代办报必遭淘汰

马之骕先生和星野师当时有此考虑，不足为怪。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不落井下石，大骂“匪谍”以示其本人坚贞者，就算不错了。具体反映在《中央日报》出版三十周年纪念集，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南京时期和五十年代台北时期，总编辑是李荆荪，竟不敢写出。原因是一九七0年特务头子沈之岳制造一大冤案，将荆荪以“匪谍”罪名下狱，判处无期徒刑。《中央日报》当时撰写报史时，为了回避荆荪之名，竟在总编辑一项留下空白，不敢正视历史的畏惧态度，与中共保守派的作法，如出一辙。活脱脱呈现出国共两党对列宁主义教条影响下的难兄难弟、可笑亦复可怜的窘态。

一九九0年冬，当时身任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的楚崧秋先生，在好友袁睽九兄陪我去拜会他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才能使《中央日报》办好，我向他提供了“先日报、后中央”的南京经验。据了解，央报迁台初期还是不错的。后来只因出身宫廷的个别人，刚愎自用，摆出“忠党爱国”的姿态，不是办报，而是作官，违背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反对新闻竞争，且排挤菁英骨干如戴杜衡、江德成等，以致央报江河日下。

事实上报纸办好办坏，是一个主导思想的问题，是以考虑百姓所需为主导，还是以揣摩上意为主导。《中央日报》六十九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只有心中有百姓，行动为百姓，实事求是，公正客观，这张报纸才能反映百姓的声音，维护百姓的利益，为百姓所接受。

宣布徐永昌失踪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唐·杜甫

●万一禅阕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清·龚自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盟国代表在美国密苏里主力舰上举行接受日本投降典礼，代表中国的正是时任军令部长的一级上将徐永昌（号次宸）将军。

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八年，牺牲军民无数，而最后代表国家受降的，竟是人们不大知道的徐永昌将军。而蒋主席指定徐，正说明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徐将军鞠躬尽瘁，辅佐统帅完成抗战大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他平日很少抛头露面，但在大本营作战决策上，却是既能观照全局，又能料事如神的一位“智多星”。

对于徐之所以被蒋指定承担这一最光荣的使命，我是一九四九年在东京与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夜话，听到朱将军的介绍，才得以释疑的。而朱，正是徐选拔为受降代表团成员之一，作为徐的主要助手同行。

据朱世明说，蒋委员长这个人在军事上是很自负的，他对徐次宸（永昌之号）的认识，正是不打不相识的结果。一九三 0 年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可以说是决定中国由谁领导之战。在这一次大战中，冯的部队不是被击溃，就是被收买；而阎的部队由徐永昌指挥，终能全师而还。从而使蒋先生认识了徐永昌是一位将才。徐后来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政经建设方面，也表现他不同一般的识见。更了不起的是，他由清末部队的一名马伕出身，而兵，而士，而官，矻矻苦学，终于完成陆军大学学业。朱从接受徐的领导中深感徐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在军人中是不可多得的。

我了解朱是一位既有才、又自负的军人。问起他对中国军界人士最佩服的是谁，他说：徐次宸。还补充了一句，委员长指定他代表中国受降，其身任军令部长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徐参与运筹帷幄，建立了只有委员长才清楚的功勋。

我对徐永昌发生兴趣，原因是和他打交道，不仅成为我记者采访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南京《中央日报》“先日报、后中央”编辑路线的成败利钝。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

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内争突显出来，神州内战，一触即发，而这一内战又与美苏争霸、冷战出炉不无关系。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和平解决中国内争，派遣马歇尔将军（因系五星上将，亦称马歇尔元帅）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调处。原来“三人小组”，政府代表为张群，共方代表为周恩来。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政府决定还都南京，张群因身为川人，了解川情，必须留川坐镇，蒋乃派徐以军令部长身份继任政府代表。当然，也是为了适应军事调处形势所作的安排。

徐性格内敛，为人行事可以“诸葛一生唯谨慎”概括，不喜见记者。而且认为“三人小组”会议事涉重大机密，不宜向外透露。而共方代表周恩来出于统战运用，对记者则表现友好，且善于在答问中透露共方如何顾大局的信息。我作为《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自然希望见到徐永昌，但多次往访，均被拒绝。到军令部时，被告以“部长除外开会”，或干脆：“不在”。到南京傅厚岗徐之寓所，不是说：“不在家”，就是说：“还没回来”。有时下决心守候，亦不得要领。

连续碰壁后，遂写好一纸请求徐见一面。如忙，只要秋接谈十分钟。并向每次出面说“不在”的中校参谋表明：“明日上午同一时间再来，至少请徐部长约一个时间，如果照往常一样说‘不在’，我就在《中央日报》宣布徐永昌失踪。”那位参谋听我口出狂言，上下打量一番后不禁“哼”了一声，并用眼色表示不屑一顾，转身就走，意思即“量你小子也不敢！”

翌日再访，果然又尝闭门羹。我于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一天在《中央日报》刊出以“徐永昌失踪”为标题的花边新闻。具体日期已记不准。而中央日报保存之合订本自南京运台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次火灾中付之一炬。

最先看到这条消息的，是马歇尔的侍从副官伍国庆上尉（Captain Ernest Ng）。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责任是每天一大早就将《中央日报》有关国共和谈及军事冲突的消息，口译英文读给马歇尔听。当读到“徐永昌失踪”一则时，马歇尔马上挂电话找 GEMO(这是英文委员长 Generalissimo 的简称)。GEMO 否定了这条消息，但马帅说，这是 Goverment Organ（政府机关报）刊载的，GEMO 只好答应查明再覆。

就在“徐永昌失踪”新闻刊出的上午十时不到，蒋的“文胆”陈布雷一个电话打到编辑部，我早已有备而应。不过，想到布雷先生向来晚睡晚起，这么早就麻烦他老人家，不免心中自责。他问：“今天你们登的有关徐部长的消息，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三人小组进行和谈，作为记者，可以见到中共代表周恩来，有时也可以见到马歇尔将军，就是见不到政府代表徐永昌将军。到军令部找，说不在；到傅厚岗他家里拜访，还是说不在；有时候，没有办法，只有去听周恩来的一面之词。不得已，我写了一个短简给徐部长，说明如他再不见我，就宣布他失踪。他果然四访而拒见，我也就宣布了。这也是情非得已……。”

“胡闹，胡闹！”我的话尚未讲完，布雷先生就在电话那边连连批评我“胡闹”了。

但事后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告诉我，布雷先生是老报人，深知新闻工作之艰苦，他向总裁（当时国民党内如此称蒋）汇报时，把你在电话中跟他说的，婉转地向总裁报告了。总裁听后顺口说了一句：自己人也不妨见一见。所以布雷先生一面把这一情况通报了徐部长，一面通知了我。徐部长决定明天在他家中请你喝茶，商量一下怎么做。徐部长做主人，你是客人，我是陪客。不过，我要向你打招呼，你老弟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胜利了，要谦虚一点，不能任性而为啊！

彭学沛的话说得算是客气，这与他的政治背景有关，他本来属于汪精卫系统的，汪做了汉奸后，他转头到宋子文名下。宋出任行政院长，他在宋的推荐下做了宣传部长。但他以为《中央日报》是在 CC 系掌握中，不知道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非 CC 卒子，他对我打招呼，既把责任加在我头上，也有警告的意思。

徐次宸身材魁梧，儒将气质，到底是经历过大阵仗的人，一见面就摊牌。他说被派出任“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完全是奉命行事，他是军人，谈判非他所长，过去不愿见记者，是怕出言不当，造成不利情势。《中央日报》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报纸，为了事情简单化，今后“三人小组”若有重要决定，他可以如实告知《中央日报》，至于消息怎么发，由《中央日报》斟酌情势和政策决定，他没有意见。

我一方面对他的这一决定表示感谢，一方面对于过去对他的冒犯，表示道歉。

彭学沛当时就说，今后就这样，凡遇“三人小组”会议作出决定，就由卢铿和徐部长联系，徐部长把情况告你们，你们好好记下来。至于消息怎么发，发什么，不发什么，由《中央日报》负责，但要注意不出问题。看看次宸先生的意见怎么样？

徐永昌当即表示就这样吧！不过他特别叮嘱说，消息怎样发是个很大的学问。而中共在

宣传上最善于争取主动，尤其像周恩来这个角色，连马歇尔都表示佩服，称其“精敏异常，为鲜见的人物”。遇到我（徐自称）这个人，生来个性就不喜与人争。个性如此，任务如彼，只能照道理行事。希望《中央日报》能助一臂之力。

彭学沛马上插话，既轻松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可不要帮倒忙呵！”不过，这样一来，到使我信心大增，认为既然徐永昌承诺每次“三人小组”会有重要决定他可如实相告，那关于和谈新闻，我们做到准确而快捷，将无问题。而蒋介石的行踪，因为我已与蒋的专机驾驶长衣复恩上校建立了友谊，常常可以从他的动向得知蒋的动向。比如，有新闻线索透露，蒋将有庐山行，但究竟什么时候去，谁也不知道。我只消大哥电话给衣：“复恩，你明天去不去九江？”回答是：“明天不去，后天去。”我马上就派出记者先行一步，到蒋介石抵达牯岭之翌日，头条新闻：蒋主席昨天抵庐山，配合现场特写通讯就一齐刊出了。

这种情况，只要有两三次，新闻权威自然建立起来。造成外国通讯社驻南京记者非“拜山”不可，美联社的米尔克斯（Horald Milks）因而跟我变成好朋友。

从新闻报道逐渐是徐永昌将军对《中央日报》有了信任感，我们也得到很大便利。由于他几乎三天两头就会见到蒋主席，所以消息非常灵通。马歇尔对他也开诚相见，比如，远在一九四六年夏，一般人都认为国军处于有利地位时，徐就告诉我，他从马歇尔处得到的信息，指出国军常常因不遵守“三人小组”协商达成的条件，给共方以口实，结果造成因小失大。也就是国军小失信，而遭共军大报复。尤其国军高级将领常常误认不利为有利，结果招致东北局势日益向不利于政府而有利于共方形势发展。东北共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扩充到四十万之众，而且装备精良，其原因即由于政府军政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也。

再以政治协商会而言，明明有利于蒋主席领导，并不利于共产党，因为和平统一建国，国民党仍是执政党，共产党只是参政党，不管怎样，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府，共产党只掌握几个地方政府；连共产党的军队，也编入国军系列，有什么不好。偏偏陈立夫先生他们一伙就反对，硬把政协协议推翻。殊不知现在的情势是，搞清一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徐次宸先生和我交往，相互沟通越来越好。比如他曾主动提到美国不满国府政治无能与贪污。引用马歇尔批评的“自私、腐化、顽固”。而他觉得最后一点还不够。他举中央军吃空额情况严重为例，有的向地方索要无度，以致上下交恶，兵民交怨。我问题，为何不直告蒋先生，他说，在正式会议上都提了不止一次。但何敬之（指何应钦）不懂，陈辞修（指陈诚）不改，而蒋先生亦不悟。言下不无感慨。我请徐从军人的角度对蒋先生作一评价，他说：“蒋先生作战英武果断，惟对治军差池。是受蒙蔽，还是有顾虑，就很难断了。”

到我在《中央日报》揭发孔宋贪污大案后，徐一方面为我担心，怕出事，叮嘱小心应付；一方面转述了他的一位好友（后来我得知乃魏道明）的评语，“年事人老境者，无不受少妻支配，只是程度轻重而已。”我当然理解是指蒋夫人宋美龄而言。并明确表示，蒋庇护孔宋不仅不利于国家，亦不利于孔宋。如能依法薄惩，让其逍遥异邦，则公私两利矣。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应阎锡山邀率首都记者团访问山西，并应傅作义邀访问平津。离南京前向徐请益，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介绍北京八大胡同韩家台的一名妓女给我，告以此女来自山西，温柔大方，北地胭脂，不同于南方姑娘，芳名玉兰，可以一醉。

到北平后，在《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老大哥向导下，果得遇此姝。年约二十五六，身材高挑，谈吐不俗，语及上将军，口称“徐爷”。原来她另有一个名字，觉俗气，玉兰之名乃徐将军所取，盖徐在南京私邸园中有一奇葩，形色皆似玉兰而甚大，叶似橡树，香味甜美，徐偶于傍晚欣赏此花，悠然神往。徐之之友、曾任考试院副院长之贾景德曾为此赋一诗，惜事隔半世纪，足足五十年，已无力记忆矣。

每每想到作为一个记者，跟采访对象、年纪长自己三十二岁如徐永昌这样的军政人物打交道，主要是本诚信二字，友谊竟可以发展到分享美色，亦奇缘也。

随蒋介石东北行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明·顾炎武（海上）

●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根。——唐·李商隐（汉南书事）

是和是战自己找答案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之身，自南京飞往沈阳，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东北行。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被日本侵占到光复，十五年来的一件大事。

一九四六年春，我应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老师之命，自维也纳经伦敦、巴黎、纽约回国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恰遇马歇尔将军以美国杜鲁门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处中国内争，作为一个记者，必须了解背景，掌握情况。但当时，除了从中央宣传部例行提供的宣传大纲得到一点空洞的原则性指示外，要想知悉党国真正的和战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向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社总主笔陶希圣（我们一班年轻人称他为“陶公”）探问，他只是强调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走狗”，为了争夺政权，已经四处作乱。蒋主席为了使人民在八年战乱后有一休养生息机会，接受美国调处，前途未卜。再问他政府的基本方针究竟是和是战？他却避而不答，只说一些笼统而空泛的道理。可能他也不清楚蒋先生是怎么想的。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靠自己摸索去找答案。也就是《孙子兵法》说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通过对国共双方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探索和战底蕴。

走上国共内战第一线

最好的方法就是到第一线走一趟。从新闻采访的实践中去找答案。

当我知道蒋老先生将有东北行后，边及时和蒋的专机驾驶长、空军空运大队长衣复恩联系，衣山东人，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为人刚正重义，且富基督爱心。他为我安排与天主教南京教区于斌总主教同乘“美龄号”专机飞沈阳。

行前，去看新闻界元老于右任先生，因为老人对我一直关爱有加。当时，国府派在东北的保安司令长官是杜聿明将军。杜和陕西的另外六位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张耀明、马励武等共七人，是于先生在上海写了一封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两位的推荐信，并脱下自己的狐皮袍子换了钱，把他们送到广州去投考而入学的。当我把准备赴东北实地采访的打算向于先生陈明后，他老人家勉励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并把我叫进书房，拿起笔为我写了一短柬作为给杜聿明的介绍信：

> 光庭弟：陆大声弟来沈，希予招拂。
>
> ——右任·卅五年五月

美龄号上于斌谈形势

“美龄号”专机设备舒适。主舱内相对而列两张单人沙发床，由于斌总主教和我各占一张。我们结识与重庆；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罗马又有同时作中国驻教廷公使（后升格大使）

谢寿康博士客人的机缘，因此很亲切，我请他躺一躺、休息休息，他说，还是聊聊天吧！

于总主教，号野声，黑龙江人。基于乡情，关注东北较深。蒋先生到沈阳后请他马上去，是要他以东北人的身份帮助政府宣导民众。我问他对东北局势怎么看，他强调苏联看到美国向日本透了原子弹，并得到日本天皇决定向盟国投降的消息后，才投机向日本宣战，出兵东北，抢夺胜利的成果，把日本在东北的重工业设备全部拆卸运到苏联。又把从日本关东军手上缴获的武器转交中共军队，而且千方百计阻止国军接收。所以，在他看来，史达林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且用“心狠、手辣的大阴谋家”为史达林画像。

我又问他对蒋先生此次东北行估价如何？也许他考虑到我是《中央日报》记者，答话有所保留，连说：“蒋先生英明睿智，必可扭转大局。”以我当时的水准，还不能判断他此话是真是假。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

到达沈阳后，被安排在当时最好的宾馆“中苏联谊社”下榻，刚巧同住一层楼的都是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上将为首的云南部队的师长以上的将领，包括我的堂姐夫许义浚在内，有十七八位。早晨吃早餐时，孙请我和他并坐，席间一位中将参谋长，在分发蒋先生和每位将领单独合影的照片后，有感而发地说：“委员长期望我们滇军发挥台儿庄战役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在东北打一场漂亮的仗。”

事后我和孙渡将军私下谈话，问他的看法，他慢吞吞地说：“那是民族矛盾（指抗日战争），这（指在东北进行的内战）怎么能比？”孙渡的号与龙云相同也叫志舟。云南有两个志舟，一个要渡海，一个要上天。对云南人说来，都是杰出人士。孙出身与云南讲武堂，为唐继尧妹婿。台儿庄会战时任五十八军军长，痛歼日军，立了战功。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升任上将，胜利后受命统帅开赴东北之滇军。孙早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开口即讲矛盾，在他看来国共内战只是阶级矛盾，不能与全民抗日的民族矛盾相提并论。

沈十万群众热烈迎蒋

五月底六月初的沈阳，因蒋主席夫妇亲临东北慰问军民，整个社会呈现一片跃动的气氛。

五月廿九日，沈阳举行全市市民欢迎蒋主席大会。超过十万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满含欢喜地与会，表现出乐呵呵地热烈情绪。刚从欧洲回国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盛大的场面，旗影与泪光交织，欢声与掌声互动，大受感动。

蒋先生对群众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东北为三民主义实验区”，显示了对东北的期望，反映出对东北的重视，也是他这次东北行根据观感所得而下的结论。

我到东北临时大学参观访问，被学生包围，自己变成了访问对象。他们关心的重点是东北形势的发展，问题集中于国共会不会在东北大打内战。学生会主席坦率地表示，原来很多同学看到战火在东北燃起，感到前途渺茫。蒋主席一来，觉得有希望了。

杜聿明对局势不看好

市民迎蒋大会的第二天，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约我恳谈，却得到了另外一种印象。杜因为于先生的介绍，把我当私人朋友，请我到他的官邸见面。首先问：右老身体可好。接着，就讲东北这一场仗不容易打。共产党是蓄谋已久，国军则是仓促应战。他提及中央处理游击队和伪军投诚的问题过于躁动，结果便宜了共产党，增强了共产党的的兵力。而马歇尔的调停，主观上是想帮政府的忙，客观上却帮了共产党的忙；杜聿明用了四个字形容：“越帮越忙”。

杜对当时的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将军也流露了不满情绪，指出，从收复地方的过程中，暴露出政治不能配合军事的大缺点。这一点，孙渡和后来我在长春会到的远征军名将孙立人都有相同的看法。

孙立人跟我谈他的切身感受：“有时候，军队接收一个地方，竟找不到一个县长来安民，结果，政治反而牵涉了军事。”

杜当天头戴一顶小毡帽，披一件军大衣，一点不像指挥数十万大军的司令长官，谈话也很随便，他告诉我，蒋先生第二天要对这次到沈阳开会的师长以上将领训话，我可以去听。到时候他关照他的副官长到保安司令长官部大门口接我进去。我知道这是他为了回报于先生的叮嘱给我的“新闻照顾”。

蒋强调军人把仗打好

一九四六年五月底的一个早晨，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大礼堂里总有三四百挂着金星肩章的军官，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将星云集的景象。蒋主席身着戎装，威仪凛然，强调东北是中国的咽喉，世界和平的关键。没有东北就像被人卡住脖子。民国肇建三十五年，之所以迭经变乱，问题就在东北。因此，每一个革命军人必须以战略眼光看东北。

接着话题一转，指出东北戡乱，对每一个革命军人来说，皆为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将士用命，誓歼顽敌。至于和平谈判，他说，那不是你们应当操心的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是：“军人的责任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你们只要把仗打好就行了，别的事体你们不要管。”我当时听到这两句话，直感到背脊发凉——看来，这一场内战是非打不可了。蒋先生这样讲，明明是发布战争动员令，没有半点和谈的意思，所谓“和谈”原来是对付美国人的。我庆幸通过这一采访已掌握了观察评估时局的钥匙。

蒋先生训完话步下讲台时，一眼发现了我。他马上沉下脸来问随侍在旁的杜聿明：“这是什么人？”将“炯炯目光对”着我，这正是一九三七年郭沫若所写的《蒋委员长会见记》中特别点出的那双眼睛。在那一霎那之间，我发觉自己心跳，但很快想到孟子《尽心篇》提示的“说大人则藐之，忽视其巍巍然。”因此，杜聿明的答话我听得很清楚：

“报告校长，这是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卢铿。前几天才从南京来的。”

我也马上双脚并立，两手垂直，两眼直视，喊了一声“校长”（蒋抗战时期兼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对蒋的查询表示了礼貌的回应，蒋则微微点首。当全场将星目光一起注视着我时，我才发现自己与整个会场肃穆的气氛是那么不调和，全体一律戎装肃立，怎么容许一个身穿美军夹克、挂着一架莱卡相机，多少带有满不在乎神情的青年人站在队列之侧。何况，这是蒋先生对高级将领的一次极具机密性的内部讲话啊！

作为记者总是要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的。就凭蒋的一问，杜的一答，我不但当天顺利过关，还争取到第二天随蒋先生乘“美龄号”专机有沈阳飞长春，由长春飞北平的机会。我对杜聿明、衣复恩两位都是这样说的：“我既然在老先生面前曝了光，等于被了案，你们让我在『美龄号』上有一席之地，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何况我还是乘『美龄号』来的。”复恩重友情，用手指点着我说：“大声呵！你可不要太随便。”

登机之晨，杜聿明请白崇禧吃早餐，顺便约我共餐。白当时是国防部长，我问他对东北局势怎么看，他说：“最坏事的是苏联，他们表面上敷衍我们，实际上帮助共产党。我们派团到大连、旅顺视察，他们都重重阻挠。”

北平上空美龄号遇险

登机飞长春，蒋、白、杜在主舱策划军机，我和蒋先生的侍卫长俞济时在后舱聊天。飞

抵长春时，郑洞国和孙立人来迎，并将蒋、白、杜请到一个休息室听他们的汇报。我本来想进长春看一看市容，衣复恩告诉我时间来不及。预计只停一小时。不过我仍见缝插针，对孙立人作了三分钟的访问，当时说明不见报。知道了政治未能配合军事的问题。

一小时后继续作北平行，万万想不到“美龄号”飞离长春时，飞机的一个轮子收不起来了，幸而衣复恩沉得住气，放慢飞行速度，约迟一小时到达。化险为夷，安全降落。

北平机场冠盖云集，由李宗仁以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以华北剿匪总司令身份，率领北平市长何思源等文武百官恭迎蒋先生如仪。而我则成了北平市副市长张伯谨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两人的采访对象，他们极欲得知和战大计，把我约到官舍晚餐，我只能讲感觉，不能泄机密。

到北平的第二天，《华北日报》赵效沂、《大公报》曹旭东、《申报》张剑海、南京《中央日报》王洪钧和《中央社》北平分社赵晓风以“罗汉请观音”方式宴我于东兴楼。谈话主题是让我以“随节采访”所见所闻解答一个问题：“内战会不会大打起来？”

我根据东北实地见闻，陈述了苏联是千方百计支持共军控制东北，而国府坚决要规复东北，双方都是剑拔弩张，形势相当严峻。

我虽未明说会大打，但因我的调子是低的，同业们自会感受到前途未可乐观。

忽略普遍存在幻灭感

也许，由于我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虽然，眼看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前途未卜，但认为中华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国家好不容易取得世界五强之一的地位，在联合国组织中已得到了肯定，不管情况怎么糟，总会走出一条路来的，所以讲话对前景依然看好，做梦都没有想到国民党会垮的那么快。

当时，憧憬着出现和平民主的奇迹。作为一个大时代的记者，应该有一点时代的使命感，因此，在六月三日随蒋先生回到南京前，还抢在六月二日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专文〈东北十五年来一件大事——蒋主席慰问行〉。描绘了东北同胞由日满统治的麻木，到得悉中国胜利的兴奋，到横遭苏军掠夺的惊恐，到卷入国共内战的痛苦，到蒋氏夫妇慰问燃起的希望。却未能看到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定，神州大地已普遍存在幻灭感。

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苏东坡

马帅是否八上八下庐山

先作一个说明，在我记忆中，一九四六年夏，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元帅为调处国共内争，促成国共和谈，曾八上八下庐山。但一些报刊文章却把它说成七上七下。究竟是八还是七？考虑到这是半世纪前的事，虽然对自己的记忆力，特别是往事的记忆很有信心，但到底已年近八十，而此事关系到历史的准确性，因而花了足足一天的时间，到台北的国家图书馆去查看微型胶片，终于查清是八上八下。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南京《中央日报》第二版刊出题为“马帅昨抵牯岭——定今日谒主席交换意见”的报导：（本报十三日牯岭电）没特使马歇尔将军，今日八上庐山，下午五

时半到达小天池，马夫人以例前往迎接。……明确地证实了是“八上”，而非“七上”。至于“八下”虽未能从报纸上找到有关报导，但同月十一日有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于二十日上午十一时驱车赴宁海路访马帅的报导，说明马帅下山的时间不外是九月十四日至十九日这五天之中。

不过，美国国务院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马歇尔使华报告书》，马帅自称：“在蒋委员长自七月十四日至九月底居住牯岭期间，我访问牯岭九次。”经查有关资料，马帅很可能把最后一次飞九江接他夫人返南京之行也算进去了。

马帅吻夫人留下“接吻峰”

马帅一上庐山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传媒记者一大早有的候于九江二套口机场；有的候于庐山脚下的好汉坡；我和上海《新闻报》陈丙一、《大公报》周榆瑞、《南京人报》王孚庆、《东南日报》赵浩生等则候于小天池，与在小天池等候的马帅夫人聊天。因为她前两天已应蒋夫人邀请先来一步，布置居所。我们问她对庐山的印象，她连称：“太美了！真是好。没有想到能享受这样的福地。”当时，南京恒温已高达华氏九十度。她居然也知道“中国三大火炉”之说，南京名列其一。问我们另外两大火炉是不是汉口与重庆？我们赞美她了解中国情况。她说正在学习。强调：“没有尝过南京的酷热，就不知道庐山的凉爽是多么美好。”

我为马帅夫人留影后，二女记者要求与她合影，得欣然同意。还问我：“照片什么时候有？”答以“明天。”

谈话间，但见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一轿当先，在前引路而来，马帅和司徒雷登大使的轿子紧跟而至。同来的有美大使馆参事史密斯、外交部礼宾司科长王季征和马帅的两位主力伍上尉、宋上尉。

马帅一见夫人迎候，连呼“下轿！”记者群还来不及一拥而上，马帅已拥着夫人热烈接吻了，于是大家争抢镜头。马帅夫妇丽影双双映于国军九十九军抗战将士纪念塔下，暮霭中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马帅等重新上轿起行后，周瑜瑞忽法奇想，跟我说：“大声，把小天池更名为『接吻峰』，你看如何？”我答：好！“不愧为才子记者。等一下，我就转告王灵官（时任江西省主席王陵基，西川人给他取了个诨名。）”

马帅、司徒大使登庐的新闻传得很快。下午一时牯岭街头就聚集了很多人，想一瞻马氏夫妇和司徒风采。所有商店门前的石阶都变成了“临时看台”，不少人扶老携幼而至。有的商店，不知是否从庐山管理局局长吴仕汉处得到指示，还悬挂了中美两国国旗。但听一声：“来了！……”，人群中爆发出热烈掌声。马帅夫妇和司徒大使面露笑容，频频点首、挥手答礼。

司徒登牯岭，流露忧虑情

司徒雷登博士抵达为他安置的行馆时，我因在南京时就和他熟，特别去看候他。老人风趣而潇洒地说：“今日牯岭群众的欢迎，令我感动。”因马帅夫妇结伴而来，问起他的夫人，老人不胜今昔之感地说：“二十年前我上山的时候，她还活着。”原来司徒夫人已经逝世。从司徒这句话，我知道他曾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参加过蒋先生的庐山谈话会。

过了一会儿，山上的中国记者同业一拥而坐，希望听听司徒雷登博士对国共和谈和美国参加调处中国内争的看法。我代表同业提议：“我们今天跟司徒大使谈话，希望用中文。”老人很轻松地说：“随便！”司徒强调：“我爱中国。此次担任这个职务，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帮

助马歇尔将军，为中国的和平而努力。我希望我的共作不致失败。”但他对我所作不发表新闻的谈话中流露的因国共两方都无诚意而担心和谈失败的忧虑，对大家并没有讲。就在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大使向蒋主席呈递了国书。

蒋主席在接受司徒大使的国书后，举杯向司徒祝贺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全国人民的好朋友。道出公谊私交之深厚。但由陶希圣执笔的七月十九日《中央日报》社论题为“局势的演变——敬告司徒雷登大使”，则无异宣判了国共和谈之死刑：“问题演变到警惕，已明确的是呈露了两个极端，共产党所执持的极端是叛乱，政府所持的极端是维护国家纪纲与统一。”从而得出结论“我们今日如要解决问题，关键已不在怎样的‘谈’，而在怎样的‘做’。”

美国愿望好，国共成见深

对照一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将军以总统特使身份使华时宣示的美国对华政策：“协助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平的国家。一个强大、统一而民主的中国为联合国理想之实现及实现和平所必须。”并指出，“美国政府相信至为重要的是：一为国共应协商停止军事行动，一为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

美国这一善良愿望是好的，只是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过低估计了国共两党的顽固与执着，认为美国出马调停，双方必给面子，殊不知两党各有打算，一个是决心消灭对方，一个是“彼可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哪怕马歇尔是五星元帅，十星元帅也白搭。

不过应当交代清楚，虽然双方都无和平诚意，用马歇尔的话来说：“彼此对对方都存在着恐惧心理”，但面子上的事还要做。就蒋先生说是要借此争取美援；就中共来说，则是借谈判使美国承认共产党是中国的一个合法的政治竞争者，从而打破国民党作为美援唯一对象的垄断。

由于中共当时从全面看是处于弱势，所以趋向和解，在谈判中给马歇尔以较诚恳的印象，这是马歇尔临行前，应我之请接受不发表新闻的访问中夸赞周恩来的原因。而蒋委员长，马帅称之谓 Gemo，则给他以敷衍了事的印象。

跟着轿子跑，路边抓新闻

正因为这种状况，马帅本着“诚能感人”之心八上八下庐山，希望挽回危局。当时的情况是，蒋先生在山上，周恩来在山下，马又不能勉强周上山，只是往返穿梭找突破点。不过此人到底是一位阅历深、涵养好的将军，所以尽量不动声色，且和记者保持距离。

马帅每次上山，我们都跟着他的轿子跑。他则坐在凉轿中看侦探小说，对于任何问题都不答覆。最初还问一问，到后来，也没有同业问了，但大家照样保持着随轿而行的兴趣。

在山上，由于这个活动范围小，可以看出来，蒋夫人常常到马帅夫妇住处走动。有一次她安排的可远眺鄱阳湖面的含鄱口之游，我事先得到消息，便先行一步等候。

七月十九日下午六时，蒋先生身着中山装、蒋夫人和马帅夫妇都身着游山便装，在小道上出现。除侍卫官外，就是励志社的摄影师胡崇贤紧紧跟随。但见蒋先生以右手托着马帅夫人一声不吭在前，蒋夫人挽着马帅又说有笑在后，缓步而行。

突然，听到蒋先生一声中英混合语：“Darling，我们在哪里 picnic？”带有宁波口音的问话，觉得别有风味。也是我第一次听蒋先生说英文。印象深刻。

另一印象深刻的是——

在山上，记者路遇要人是家常便饭，不少新闻或小特写材料，会不期而遇。最有趣的是

我们一群记者巧遇蒋夫人于牯岭小学，大家一下把她围起来。先谈山居生活，没有什么特别。问她对和谈的看法，她却说了一句带文哲味道的话：“政治一如气候，阴晴不定”接着我们问：宋子文和孔祥熙做了那么大的官为何还要经商赚钱？蒋夫人对这一问题似乎有点生气，她反问：“经商赚钱有什么罪过？你们难道没有看见美国的高官不少出身于商界。”当时，我们的国际知识不够，未能了解美国的大商人当官以后是要辞去公司职务的。而且气氛已经弄僵，谈话无法继续，也只好看着她挥挥手道声“Bye”而去。

谈判告破裂，关键在苏北

我在庐山两个月，及上山前后接触到的人，从蒋主席夫妇、马歇尔夫妇、司徒雷登大使以及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先生，和当时代表国府谈判的陈诚将军、徐永昌将军、邵力子先生、王世杰先生、张万生先生、雷震先生；和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先生、张君劢先生、章伯钧先生、罗隆基先生、左舜生先生、陈启天先生等，终于摸清一个问题，国共和谈破裂的关键是苏北。

一九四六年六月卅日是蒋先生在马帅以美国退出调处的压力下，宣布东北停战到期的日子。后来之所以弄的很僵，问题僵在苏北。我在撰写回忆录时于中研院近史所读到《王世杰日记》得到证实。

到了七月一日，周恩来为了争取继续停战，甚至全面停战，向马歇尔提出，政治问题请蒋先生同意交由邵力子、王世杰、陈诚三人和他（周）及董必武商谈；而整军问题继续由马歇尔和他与徐永昌三人商谈。

七月二日晨，蒋先生约周恩来面谈，邵、王、陈三人在座，晚间周、邵、王、陈、董五人会谈，问题的关键集中于苏北：蒋先生坚主共军非退出苏北不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但在共方，毛泽东已作出其他方面均可让步撤出，惟苏北例外。周恩来只能谨守此底线。马歇尔为了调处这一死结，提出由联合国或美国监督用选举方法，解决中共在苏北之区域行政问题，当王世杰将这一意见向蒋先生报告时，被蒋先生大骂了一顿，指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一情况是一九四八年五月我从邵力子先生处得悉的）从而决定到牯岭消夏，既可暂避马歇尔催促全面停战，又可在庐山这个远离京沪嚣烦的消夏胜地，比较冷静地对全盘局势作一评估。

这就是当年蒋先生突然决定飞庐山的原因。

马歇尔为化解僵局，八上八下庐山，但僵局却无法化解。八月六日蒋先生对共产党提出了五项条件，在周恩来看来比六月卅日前还倒退。八月八日马帅向蒋先生摊牌，表明他来华调停的目标是促成一个统一的新生的中国，不是蒋的某些顾问（指陈立夫等顽固派）所想象的使共产党就范，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们（陈立夫等）的某些作法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结果马帅不幸而言中。这是直到一九八五年在华府我重逢司徒大使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回顾四十年前往事，傅在叹息声中忆往所道出的庐山谈话内幕。

同年在美国，宋希濂将军和我谈往事，也不胜感叹：蒋先生和国民党顽固派太短视、也太无信心，为了小小苏北的行政权放不开，竟把整个江山丢了。跟傅泾波所谈不谋而合。

马帅幽默感，谈判终于成

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调处国共冲突，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不过他却成功了一件谈判。

那已是蒋先生下山回南京后的事。九月廿七日在南京宁海路行馆草坪上，他主持了他的侍从副官伍国庆上尉婚礼的茶会。到会的美国客人我认识的有司徒雷登大使、美国太平洋舰队莫瑞海军中将和美使馆参事白德华，都是阁第光临。中国客人有“中国空军之王”称号的

衣复恩中校夫妇、蒋主席侍从武官夏功权中尉、军令部外事处长皮宗敢少将，以及新娘子阎伯筠小姐金陵女大的一群同学。还有一个小客人，即在婚礼进行时端着放置一对结婚戒指银盘的衣复恩的儿子治凡，特别逗人喜爱。至于记者，只有在下一人。

马歇尔平时都和记者保持一段距离。没有想到这次茶会上主动和我打招呼，一向沉默的他与我进行了三分钟谈话：

“什么时候下山来的？”

“是不是指庐山？那已经三个星期前的事了。”

“你们在牯岭的生活可真忙？”

“将军居然记得我们这一群时常麻烦你的记者。”

“你们其实挺可爱的。”

“今天该很高兴吧？”

“是的，很高兴。不过，心里还有些事。”

“我想声明，今天来到这儿，不是为新闻，而是为友谊。”

“其实，今天我已经是一件事谈判成功了。”

“呵？”

“看今天这一对。”

记者在思绪上经过一个惶惑，即刻恍然大悟，原来马帅所指的谈判成功，不是指政治而是指爱情。爱情的谈判有成功的日子，政治的谈判又何尝不可成功。

因此，记者说“将军一定会有另一次成功的。”

（以上对话抄录自一九四六年九月廿八日南京《中央日报》刊出的〈马歇尔成功了一件谈判——记伍国庆上尉婚礼〉特写，署名是我的号，本报记者大声。）

我的一些朋友读至此，一定会批评：任你陆大声怎么说，马歇尔所追求的终极是美国的利益。——一点不错，马歇尔远涉重洋来华，主要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工作，但美国当时希望中国和平民主建国，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是符合的。问题在于掌握中国命运的两个党，都是依照列宁模式建立的。他们是把自己党的利益、甚至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正是中国的悲剧的根源。

马帅覆函陆铿，反映国府夕阳

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旧金山航线开航。中国航空公司邀请新闻界人士组织代表团参加开航礼，并访问美国。应邀赴美的有我的老师、战时曾任路透社中国经理、远东总经理、战后出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张国勋、上海《大公报》经理费彝民和代表南京《中央日报》的我。我一如二月访日模式，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身份前往。

这个访问团里有一个特殊人物，即曾任上海商会会长的王晓籁先生。会讲笑话，且喜讲荤笑话。

我们第一站飞到夏威夷的檀香山，参观日本人一九四一年突袭的珍珠港。美国已在珍珠港建一纪念馆，总的印象是只留历史记忆，并未散播仇恨种子。

第二站到旧金山参观，除走了一趟金门大桥外，即参观联合国成立大会时的会场，当时

借的是一个剧院，无任何文物的痕迹。大家回忆往事集中在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上。代表团十人，政府代表四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社会贤达六人：董必武代表中共，李璜代表青年党，张君劢代表民社党，胡适博士、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和《大公报》经理胡霖代表社会贤达。

当时，在二次大战中国际新闻界备受尊重的赵敏恒老师道出一段秘辛，中国代表团之所以有如此包容性，主要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先生的结果。罗斯福希望中国赴旧金山会议之代表团，能让中共及其他政党代表参加，并告知白宫已邀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共和党人士参加美国代表团。蒋先生接受了罗斯福的建议。王世杰通知中共提名，对方提了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蒋先生认为周太能干，怕他的锋芒压倒政府代表，便选了在清末中过举人的董必武。

第四站到华盛顿，由中央社驻华府特派员卢骐新陪同参加了杜鲁门的白宫记者会，记者会前，杜鲁门的新闻秘书、也是一位老记者出面接待，介绍了白宫记者会的传统。记者会后，杜鲁门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一一握手，由赵敏恒代表大家简单致意，杜鲁门对代表团的到访表示了欢迎。

其时，国共和谈已经破裂，马歇尔也已回到美国出任国务卿。中共军队且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国军连连失利。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最重视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希望之所寄，就是美援。

但是，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却定的很清楚：“一个不统一的和被内争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认为是美国援助的适当地区。”

到一九四七年中国记者团在白宫和杜鲁门会见时，美国对华援助几乎全面停止。只剩下空军训练计划和一项海军训练计划，总额不得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期限不得超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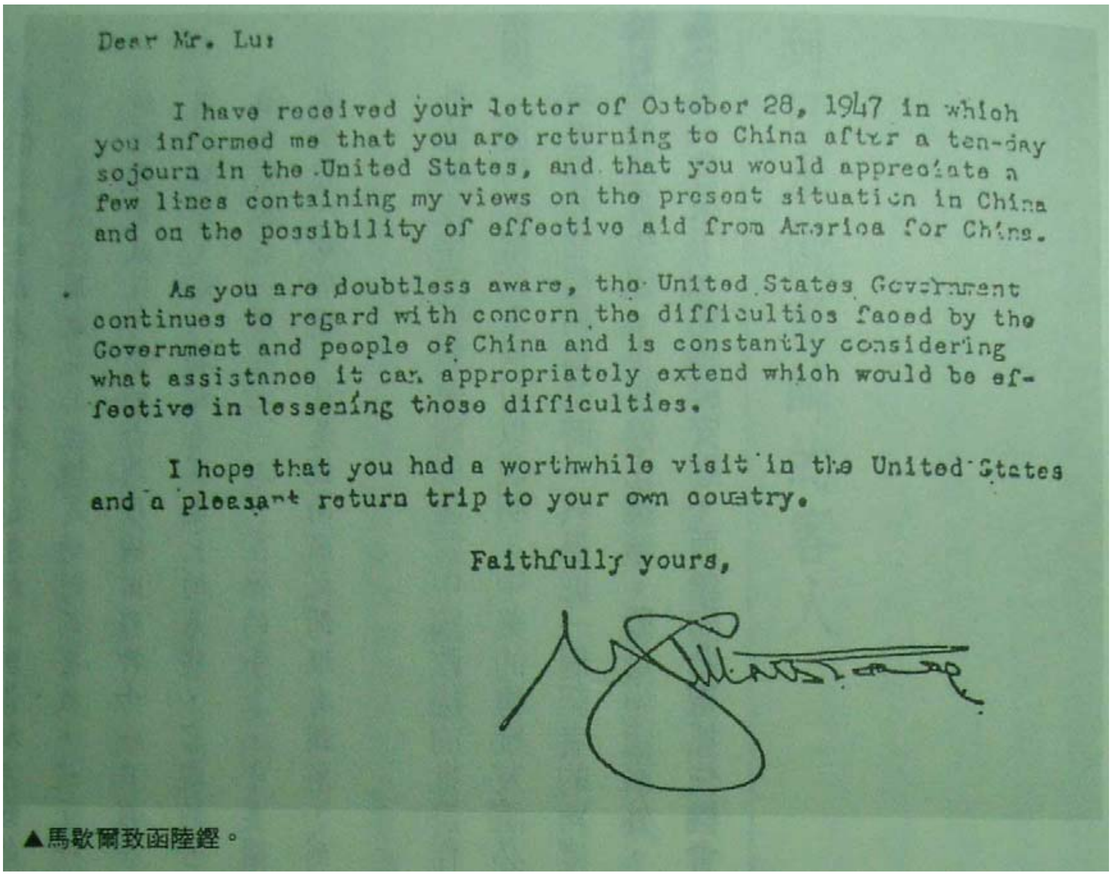
因此，我利用访美的机会，在十月廿八日返国前夕写了一封信给马歇尔将军，简单回溯了一九四六年夏他八上八下庐山期间为调处国共争端殚精竭虑，任劳任怨，给中国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而在伍国庆上尉婚礼上他对中国记者的赞许，更使我难以忘怀。我请他以美国国务卿、又曾参与国共内争调处的中间人身份，就中国现状及美国继续援华的可能性，谈一谈他的看法。

我的信十月廿八日寄出，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写来了回信，二十六日收到，二十七日在《中央日报》以显著地位发表。原文如下：

陆先生：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来信收到。承告知访美时日后即将返回中国。你希望我谈谈对中国现况和美国有效援华可能性的看法。你一定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所面临的困难，一直十分关切，也正在考虑本身所能给予有效协助，以减轻此一困境。

希望你对美国的访问有所收获，并祝返国之行愉快。

乔治·马歇尔（签名）



Dear Mr. Lu:

I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of October 28, 1947 in which you informed me that you are returning to China after a ten-day sojou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you would appreciate a few lines containing my view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and on the possibility of effective aid from America for China.

As you are doubtless awar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regard with concer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is constantly considering what assistance it can appropriately extend which would be effective in lessening those difficulties.

I hope that you had a worthwhile visi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pleasant return trip to your own country.

Faithfully yours,

▲馬歇爾致函陸鏗。

当时，蒋先生正为美援发愁，国民党更可以说是患了“美援忧郁症”，陶希圣得知马歇尔有信覆我，大喜过望，乃及时执笔写了以“马歇尔国务卿的信札”为题的《中央日报》社论，并由中宣部通令全国各地央报一律照刊。

社论一开头就说：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氏对于本报记者陆铿旅行美国时以书面提出的询问，致函作简明的答覆。现在中美两国人士正注意美国援华问题，议论纷纭，我们发表马歇尔国务卿这一珍贵的书信，深感光荣，并确信其有澄清视听的影响。”

接着指出：“我们特别重视马卿对于中国的正确认识与诚挚友情，这一正确认识与诚挚友情是以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为基础。我们今日发表马氏的书信，我们之所重视者，仍然是这基于两国传统友谊的认识与情感，由此简明语句而充分表达。

美国援华政策怎样才是适时而有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今日注重的是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是经由马歇尔国务卿十一日报告和这封信而重新确认了。中美两国之间有其牢固的联锁。这一联锁有其历史的基础，客观的条件，与共通的目的。我们深信马歇尔国务卿是最能掌握这一联锁之一人。在他的手上，中美关系只有进步，决不动摇。这并不是说两国之间不会有一点隔膜。这是说两国之间纵有误解，到了最后必能澄清。”

社论的后半部针对美国舆论对中国政经的批评做了答辩。归结于中美两国追求世界和平的目标相同，从马歇尔的来信可以说明，中美的传统友谊必将继续发展。完全是一些空话。

我在当初写信给马帅时，只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探寻一下美国援华的动向。因为当时美国舆论对国府已经失望，主张停止援华，置身中国事外。没有想到，马帅的覆信，竟给一筹莫展的国民党当局，带来了一点精神安慰，而让陶希圣抓住机会，作了一篇为国民党自我打气的文章。

到日本做麦帅的客人

●服民之心，为得其情。——宋·苏洵（申法）

●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管子·五辅）

一九四七年我被派代表南京《中央日报》，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英文称为“Editors Party from China”。应盟军占领日本统帅麦克阿瑟之邀请到日本做麦帅的客人，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自上海启程，到三月十五日返国，一共八十天，先看了战败的日本，后看了韩国。

在当时日本全国闹着交通荒、火车每天挤死人的情况下，盟军总部居然特别为记者团开了“开了大使列车”专车视察各地。这列车包括交谊室、餐室、卧室等，设备周到，招待尤其细心，第一次点心上还做了中国国旗，而日本人往往于“大使列车”离站时，一致九十度鞠躬。返回东京时，火车站长特别开放原为天皇行走的大红毯道。至于到各地均有美军宪兵开道，汽笛长鸣更不消说了，在在表示出了这是“麦帅的客人”。

回到南京后，连续发表十八篇报导，于同年五月集结成书出版，书名《麦帅治下的日韩》，是我生平出的第一本书。

我的老师、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为这本小书写了序，说明为什么要派我代表报社前往。当时，中央宣传部是希望马先生去，如果马先生无法抽身，按理是由总编辑前往，因为这个团本身就叫“总编辑团”总编辑李荆荪和我亲如手足，他为了给我机会，说动了马老师，由我以代总编辑身份前往。星野先生序中有如下一段：

在抗战期间，陆先生代表中国广播事业和报纸，驻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总部，为欧洲战区中最活跃记者之一；去年，他应南京中央日报之约，自欧洲经美返国，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适值马歇尔将军在华，他对于马帅调处工作之各种报导，凡是中央日报的读者，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两个月前麦克阿瑟将军邀请中国记者赴日视察时，我们便毫不犹豫地请陆先生代表南京中央日报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三位五星名将，陆先生因此都得到机会接触；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三个战败国——德国、意国与日本——之情况，陆先生都也有机会做实地的考察与分析。

报界竞参加，轩然大波起

不过，马先生的这一推荐，虽被中宣部长彭学沛接受，却在新闻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南京报界素有“龚大炮”之称的《教育日报》社长龚德柏，在该报发表了以“责问中宣部长彭学沛”为题的署名社论，并附有小标题：“何以不派我如日本参观”。此外还约同《新民报》陈铭德、《大刚报》毛建吾和《南京人报》张友鹤联袂到中宣部向彭学沛抗议。

抗议的理由是，麦帅此次邀请中国赴日记者团原希望十个名额中官民各半。而我方的名单则几乎没有民营报业代表。虽然《大公报》王芸生列名其中，而在龚的社论中却指为言论“反叛国家”；并说该报曾接受政府拨给官价外汇廿二万美元，“亦可称事实上之党报”。

龚最妙的话是：“盖记者有资格声称：政府若仅派一个人赴日参观，我亦有被派之资格，而派十人前往，亦未派到我，更使人愤慨万分。”

他理由是：“一、三十余年专门研究日本问题，所著《征倭篇》可与韩信登台谭、诸葛

亮隆中对鼎足而三。二、报纸地位在南京民间报纸中忝列第一位，有被克林姆林宫随时注意之光荣。三、就年龄资格讲，记者痴长五十七岁，现役报人中，只胡政之较我大一岁。这次中宣部所派的，有人比我女儿年龄还小。而对我这老记者，且为精力最强、斗志最旺之记者，则使之落空，真不知是何用心？”

这最后一点，显然是针对我的。当时我未满二十八岁，因此，龚德柏先生与彭学沛部长发生争吵时曾有：“陆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之说。

龚既表现出一种气势凌人的态度，彭也不客气地答覆说：“人选已定，无法变更。”龚、陈、毛、张四位遂提出：“那我们只有致电麦帅，加派可以十足代表民间报纸的人赴日，甚或另行组团前往。”彭学沛最后表态是：“你们要致电麦帅，尽管打电报好了。”弄得不欢而散。

麦帅为何邀记者团赴日

麦帅管制日本，颇有“一意孤行”的味道，因此各方对他都不满意。不仅中国、英国、苏联不满，连美国也多责难。最后，跟杜鲁门总统闹翻掉，并不使人意外。但麦克阿瑟自信力极强，他有世界眼光，自以为雄才大略，对得住同盟国，即使有些误会，到了解事实真相时，自会化解。

中国对麦帅的不满，主要认为他对日实施的是姑息政策。

有一次，出身《民立报》的老报人邵力子先生和我们几个记者聊天指出：“麦克阿瑟管制日本的政策，只有反苏好战的人才会满意。”并解释说：“麦克阿瑟这样做，目的只是反苏，他尽量姑息日本，培植日本的再生，作为反苏的基点。”

其他国府要员像孙科、吴铁城、王世杰，对麦帅政策也难以认同，只是避免作正面批评。在私人谈话中他们却流露：“日本颇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在大战中翻身。可是，结果一定使日本大失所望。”

中国民间对麦克阿瑟的管制日本政策，不无恐惧之心，怕日本军国主义在麦帅庇荫下复活。抗战胜利以来，中国对日本是很宽大的，但后来却被日本的现实给冲淡了。日本在美国扶植下，经济复兴很快，甚至对中国构成威胁。比如，日本棉纱运到香港，比中国棉纱价廉得多。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启程赴日时，却被麦帅挡驾。中国侨民在日本很多，侨务当局想派人慰问，交涉半年，迄未成功。中国派赴韩国的代表团早已组成，由邵毓麟率领，希望通过联系，逐步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到代表团在上海候机飞韩时，麦帅来电挡驾，以致等了一个多月，仍折返南京。总之，中国人看麦克阿瑟与日本的关系，简直是个谜。

麦克阿瑟可能也了解这一点，他曾给司徒雷登通信，问起中国方面对他管制日本的反应。司徒对他说：“从报纸上看，和对私人接触所知，中国人对你管制日本政策的反响，都不甚满意。我把这事告诉你，也许会使你灰心。因为你一心一意替盟邦服务，而对日关系最密切的中国却对你不满。你既然问起这一点，不得不据实以告。”

以上这一段秘辛是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先生告诉我的。傅还说，美国对麦帅管制日本的姑息、纵容更不满。但日本对麦帅治日则口服心服。

先邀美派团，后邀中派团

麦克阿瑟相信，不满于他的人如能到日本看看，便会了解他何以如此做。于是，美国记者团在霍华德（Roy Howard）率领下被麦帅请到日本参观了。麦帅为了表示他是盟军统帅，而非仅为美军统帅，请了美国，再请中国，然后考虑英国、法国。这是基于一、中国是对日

作战八年的国家；二、中日之间一衣带水，关系密切；三、中国人对他的扶日政策不满；希望以事实使中国人了解他的政策。

中国记者团抵日后，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向我们作了简报：一天中午麦帅请他共进午餐，谈谈有关日本对中国赔偿问题。席间决定，在赔偿办法确定之前，先行撤迁中国迫切需要、而运到中国就能使用的日本机器如火车头、发电机等等到中国。

谈到霍华德率领的美国赴日记者团时，麦帅对朱将军说，他的管制日本政策，应该为全世界所了解。美国了解之外，应该是中国。因此，他请朱世明将军转达中国当局，派出中国新闻界有地位、有影响、能代表中国舆论界的新闻记者到日本实地看一看。把所见所闻在中国发表，当可使中国人了解真相。条件是：人数最多十位，最好排的记者能讲英语或日语。朱问麦帅，希望什么人来？是各报社长？还是主笔？麦答：希望是有观察能力，且为中国人民相信其观察结果之记者。

于是朱便拍电报告外长王世杰，王觉得很好，报告了蒋介石主席，蒋也觉得很好，指示王和中宣部长彭学沛商量决定人选，因此有了此次日本之行。

人选挤破头，团名费思量

由于此行动见观瞻，人数有限制，王、彭当时即预料会挤破头，故决定秘密进行。原则是要有代表性的人参加，为体现走宪政大道，还要顾及各方面，既要有党报，也要有民间报纸，并要照顾到地区。

经过各报激烈的竞争，最后公布的名单是：团长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曾任中央社驻东京特派员、北平《晨报》社长、重庆《中央日报》社长、日本问题专家。团员：王芸生，《大公报》总编辑、《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作者；陈训悆，《申报》总编辑；崔万秋，《中华时报》总编辑、日本问题专家；陆铿，《中央日报》代总编辑；牛若望神父，《益世报》社长；王云槐，北平《时事日报》社长；俞大猷，天津《民国日报》总主笔（唯一女团员）；宋越伦，《东南日报》主笔、日本问题专家；范厚勤，中央摄影场摄影师。

中国赴日记者团于二月十日在南京举行预备会，名称一下提出五个“中国记者赴日”下有视察团、考察团、访问团、参观团、观光团。经反复推敲，觉得都不妥，最后确定了“中国赴日记者团”，可谓“煞费苦心”!

我们一行十人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离开上海的。当快飞抵东京时，因东京机场火警，改在硫磺岛小憩，入夜才到达东京。我在飞机上接到南京传来的信息，我的第二个儿子可信廿六日降生了。

麦帅宴记者，夫人讲话多

廿八日在东京第一株式会社大楼，麦帅总部举行欢迎式，并听取占领日本之简要报告，当天接受麦帅午餐。

麦帅高达的个头，身着配有五星简章的军便服，既显威仪，又很亲切，他和夫人热忱举杯欢迎中国记者团到日本。他对中国全民抗战八年，表示深切的敬意。希望大家用自己眼睛、耳朵和心多看、多听、多了解。他强调：“占领日本的最大目的，就是在短期内能将真正民主精神灌输于日本人民。因为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不是由军事力量可以解决的，必须由人类精神上的觉悟来解决它。”

席间，麦帅说话不多，关于中国国家的，只有一句：“希望中日之间能很快建立起互惠的贸易。”不过，他却很风趣地提起蒋主席的年龄，他说：“六十岁还应该算青年。”反之，他太太却非常喜欢讲话，从徐永昌将军参加受降典礼送麦帅的玉鼎说起，一直说到马尼拉的

天气。当然对中国的赞颂，对中国领袖的敬佩，以至于对中国记者团的关心，都一一表达了她的衷诚。

对于住在日本，她说很过得惯，并且，从日本的壁画起，样样她都好象喜欢。连侍候她和麦帅的日本侍役，她都非常满意于他们的服务，并且介绍说："这般人从格鲁大使驻日起，就很忠勤地工作了。"

记者团在日所遇到的美方人士，除了麦帅夫妇以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直接负责占领军事的艾格伯克将军，他以美国第八军军长的地位，统帅三个军团。战前在北平的短期居住，使他认识了吴佩孚，谈起吴佩孚的晚节来，他还鼓掌称赞"大帅"。同时兴奋地说起东条自杀的事，他说，当时为了使东条不能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曾竭尽一切的可能救活了这日本第一个刽子手。当东条苏醒过来之后，连向他说："对不起"时，他曾经幽默地反问道："请问你是指那一个时候的对不起？是自杀的这一霎那，还是过去三年的硬仗？"

引导日本人走上民主路

日本天皇裕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决定接受盟国所提的"无条件投降"，使麦克阿瑟元帅不损一兵一卒安然地坐上了占领的宝座。

当时的情况是，在日本投降之日，不但海外尚留驻着五百万大军，就是本土上也有二百五十万战意沸腾的部队，只要天皇放下武器的命令一点及不到，占领的局面就不堪设想。结果，居然靠着天皇的一句话，一切都归于平静。以致据说当时在菲律宾伫候麦帅佳音的麦帅夫人，从东京传到麦帅的平安家报后，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天皇。

麦帅利用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威力"将占领命令一件一件透过天皇传达下去，居然诸事顺遂，样样办到。一年半来，由于麦帅对日本管制的优容，是日本人民和天皇之间，似乎有了共同的默契：天皇叫他们投降，一定有天皇的道理；过相当的时候，天皇也一定会叫他们翻身的。因此，中国记者团在日本访问期间，大家感受到日本人民对未来似乎都有一种期待的感情流露于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和天皇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反映在当裕仁天皇奉麦帅之命访问农村以减少神性的时候，裕仁自农民所得到的狂热虔诚的崇拜，反而增加了他的神性。老百姓跪泣而迎，大家以哀兵的心情，恭谒了这位败帅。

从麦克阿瑟说，占领日本的任务，最主要的还是指导日本人民走上民主之路。对于天皇，这个民主的大绊脚石，如何对待，倒也煞费苦心。因此，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七日和一九四六年五月卅一日，先后两次把裕仁叫到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去"垂训"一番，以减少日本人对天皇长期具有的近于神明的尊崇与迷信。

占领之初，如何处理天皇，在日本有四种意见：一、宣布天皇为战犯，废止天皇制度；二、强迫裕仁退位，并废止君王政体；三、强迫裕仁退位，令他十四岁幼子在摄政下继位；四、准许裕仁保持皇位，但在新宪法上使他成为"俘虏"，取消特权。

麦帅促天皇神化到人化

东京帝国大学曾为这一问题举行一次测验，在一一三一名学生中，百分之四十主张维持天皇制度，限制天皇权限。

也许正由这种知识分子的民意表现，新宪法在麦帅指导下制定后，就体现了这种既维持、又限制的形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裕仁颁布的新宪法第一章"天皇"一章中，第一条规定："天皇乃日本之象征，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主权所存在之日本国民总意。"第四条规定："天皇，仅实行宪法所定关于国事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之权力。"

根据我在日本的接触与了解，反对天皇的唯有共产党，其余各党派都有肯定麦帅保存天皇反映出这位将军的睿智。因为，天皇在日本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而兼为政治的组织的结。假若这个结被斩断，整个社会与政治都可能完全崩溃。至少二十世纪是如此。

麦帅所要求于盟军管制下的日本，是安全第一，而天皇正是一种安定剂。所以，任苏联如何坚持提出天皇为战犯，应交付远东国际法庭审判，麦帅从管制安定着眼，在中国、英国的支持下，在盟国对日委员会的讨论中，终将苏联的提议否决。

不过，麦帅一方面保护了天皇，另一方面也同时给天皇以民主教育。一九四六年元旦，天皇在新诏书中承认自己并非“神圣”，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尊麦帅命令而行的。同时，日本宫内省也宣布天皇的财产三十七亿多日元（实际当不止），已以百分之九十七上了国民财产税。各种迹象显示，麦帅是有成效地进行着天皇从神化到人化的工作。

日对外贸易作翻身跳板

根据我们在日本实地的考察了解，战败的日本刚缓过气来，就千方百计地设法翻身。而麦帅所支持的日本复苏工程，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恰好成了翻身的跳板。

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一年半的日本对外贸易看，输入总额是三亿二千万美元，美国占百分之九十五·七，何三亿美元。输出总额是一亿九千万美元，其中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四，合一亿三百余万美元。表现了美日在经济上的休戚与共。

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的丝织品、毛织品都有飞速的发展，而且是以几何级数上升。当时，盟军总部向我们介绍说，日本五年恢复完全的丝业，三年恢复独占世界市场的人造丝。

这里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事例，说明美国扶植日本真是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在盟军总部的支持下，日本在一九四六年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丝织品展览会，不但把美国的专家请到东京，连美国的裁缝也被专机请到了东京。这些人，在日本人的“恭聆教诲”下，就美国人的需要，及时作出各种设计，他们不但说明了美国小姐太太们喜欢什么花纹，而且建议用什么色调。果然，专家裁缝访日后不到半年，纽约丝织品市场的百分之七十五就为日本占领。而且，一切设计费用，完全由日本政府出钱，厂商不必操心，只管照样出成品好了。这种官商合作的精神，为日本对外贸易凭添一股生气。反映了官民同心协力为翻身创奇迹。

记者团同仁，与日本各方面接触后发现，日本人通过战争的教训，普遍有个共识，即要在二、三十年内借军事复兴来翻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借经济复兴来翻身，则事半功倍，手到擒来。他们唯一感到不便的是军事占领迫使他们缩手缩脚，不能充分施展。

恢复自由身，急盼签合约

我在朝日新闻社三月九日的盛宴中，曾问过该报的编辑局长（即总编辑）信天韩一郎：“日本人现在还很想念台湾及韩国吧？”

“不。”

“为什么？比如当你们没有糖的时候，难道不会想起台湾？当你们缺乏米的时候，难道不会想起韩国吗？”

“朋友，我们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草签对日合约，让我们在合约签订以后好好地有一个自由的对外贸易，从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希望的一切。”

我对这位日本同业发出的问题，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就在五天前、三月四日与日本国会各党领袖会谈后，接受日本首相吉田茂晚宴，晚宴食品简单，最令人难忘的是咖啡没有糖且不说，吉田茂还特别声称：“抱歉，咖啡无糖供应，因为台湾已还给中国了。”当时我坐在

广岛帝大出身的崔万秋大哥边，他是日本通。我说，你能不能代表我用日语问问吉田茂，是不是不服气？万秋大哥低声说："我们是客人，何必跟主人发生争执呢？"但是，吉田茂给我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却无法释怀。

日本败亡后，东京政治舞台，最初是锣鼓无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在麦克阿瑟民主教育鼓励下，全日本政治结社共有两千九百五十一个，其中全国性政党只占十三。比起意大利来，总算谨慎多了。不过，比较有基础的政党如承前政友会余绪的自由党，和前民政党化身的民主党，都多少有旧的军国主义倾向，只是披上了民主的外衣。而这些党，他们所盼望的就是朝日新闻编辑局长所反映的——早日签订和约，让日本恢复自由自主之身。

在他们与我们会谈的时候，也许出于策略的考虑，也许由于时机未到，发言者大多对中国表示了忏悔。如像自由党议员北聆吉说："日本人到今天，因为自己进到民主革命的关系，才开始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精神。希望今后中日能够协力，以求有贡献于世界和平。对于蒋主席『以德报怨』的态度，日本人民将永志不忘。"

对照一下以后所发生的事实，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把侵略中国，说成"进入"。说明在盟国占领期间日本政治人物出于形势和策略的考虑，尽量发挥"用忍"精神，处处表现听麦克阿瑟的话，避免跟盟总对抗，以求麦帅放心，争取在麦帅大力支持下与盟国缔结和约。暂且忍辱负重，从经济着手，恢复国力，借麦帅的权，赚自己的钱，等到有一天财大了，自然也就气粗了。

比起德国来，日本太幸运

我是亲眼见到德国战败后的惨况的，同德国比起来日本太幸运了。同是战败国家，德国所有的一切都崩溃了，从希特勒的骄傲到德国女人的严肃。而日本呢？似乎任何东西都该留下了一点。

显然，盟军总部官员向我们做简报时指出，东京已被炸毁百分之六十五；大阪甚至毁了百分之七十；但一九四七年三月距离日本投降，不过一年半，所见到的是：工厂已冒出了如战争时代的浓烟；大公司新产品的广告已经鲜艳夺目的点缀在高大的墙上；电车、高架车、地下铁路，也许显得旧一些，但比起德国战败后，大部分的居民都要"安步当车"，不知好多少倍。再拿电力和自来水来说，即使极端偏僻的村庄也从来没有停过。就连广岛这个吃原子弹的地方，当我们去看时，也是一片太平景象。

中国赴日记者团三月七日从京都乘盟军总部特备的"大使号"专车，到达了与战争同归于尽的广岛。

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是我想探寻的问题。据陪同的美军军官介绍，这个廿四万五千人口的城市，在一颗原子弹下送命的，是八万三千多人，带伤的超过十万。奇怪的是有的离爆炸中心只有十公尺的人，反而没死；而远离中心几乎千码外，也有送命的。怎么解释？信佛的日本人把这归因于因果。

广岛赤十字医院院长竹内釼接受我的访问时，大谈辐射。他说，他原患心脏衰弱及胃病，经过原子弹一炸，心脏反而变为正常，胃口也大开了。

另外一位生还者、居住广岛十四年的天主教德籍神父克里恩奈琪（Wilheln Kleinnorge）当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原子弹投掷时，他还穿着睡衣躺在二层楼上一个小房间的帆布床上读一本教会杂志，忽然眼前一阵剧烈的银光，听不见任何响声，他就昏过去了，当苏醒时，发觉自己被震出房外的花园中。究竟如何震出的，完全莫名其妙。事隔两周，感觉已受内伤；到东京医治，检查出白血球大大减少。在原子弹炸后的余生者中，有的是烧焦

后皮肉复生；有的是腿部烧得缩短；最可怕的是辐射疮，长期溃烂无法复元；而有的虽经原子弹大劫却若无其事。像《广岛末日记》的作者佐佐木辉文医师，跟竹内釖在一个医院工作，却毫无感觉。

至于广岛人当时的反应，一般人都很安静，没有呼喊，没有咒骂，只有呻吟。克里恩奈琪神父听见一位妇女说："他们这么厉害的武器，战争实在不能再打下去了！"叙述至此，克里恩奈琪加强一句："那时，萦绕在广岛人脑海中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广岛是死亡了，战争是否同时死亡？"

无尽事隔半个多世纪，广岛已经再生了。日本人每年利用纪念广岛受难，制造他们需要制造的舆论，以至复活军国主义。而长期遭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那年那月才能彻底摆脱战争的阴影？！看看台湾海峡的风云，想想朝鲜半岛的雷雨，能不忧心？虽然对麦帅管治日本的成效，特别是民主化，不能不佩服，难怪"老兵不死，风仪永存"。但太平洋何日才得真正的太平？

韩国复国面貌一瞥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唐·刘禹锡（金陵怀古）

我们看了战败的日本面貌后，转到了韩国。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由东京飞汉城，十五日返还东京。

韩国独立中国力争而来

韩国跟日本一样是战败国吗？当然不是。那她是战胜国吗？似乎也不是。不过，研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开罗会议的人都知道，是由于中国方面据理力争，韩国才获得独立的保证。当时，丘吉尔反对韩国独立，罗斯福模棱两可，蒋先生则将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日本战败后美苏双方大军的进驻，有了北韩三十八度线的割分，造成了韩国一分为二的悲剧。

这是一个富于悲剧色彩的国家。我们的韩国行虽然来去匆匆，却发现了那里的人民，多多少少都表现得气愤填膺。

从一九一０年算起到一九四五，足足三十五年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生活，用韩国人民的话来说："真受够了！"

一位韩国的革命老人跟我说："你问韩国在日本占领下曾得到什么建设之利吗？日本人除了在汉城盖了几栋洋房，如总统府之类，为侵略者本身居住以外，我们韩国人一无所得。相反的，我们的血都被他们吸干了。"用韩国新闻协会会长的话说："日本对韩国实行了全面剥夺。"

日本对韩国行全面剥夺

事实上，日本在韩国的一切建设，都是以韩国作他的附庸。比如汉城最繁盛的商业区不如南京夫子庙的一条街。商业如此，工业也如此；经济如此，政治更是如此。

据美军驻韩的霍奇强军代表布朗将军向中国记者团简报说："在日本占领韩国期间，所有行政上的职务，甚至于生产上的技术工作，都完全由日本人担任，韩国人顶多参加一点不

用思想的劳力而已。日本人战败撤走后，在韩国要找人把邮电局接受过来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接收行政机关了。在韩国有理想、有主张的政治家，固然是凤毛麟角，就是在行政技术上比较有学识、有经验的人，也不可多得。所以，一旦国家重新掌握到自己手里，都有一点茫茫然不知所措。”

而中国记者团从和韩国朋友的接触中，仍然感到这个民族的希望。一个韩国记者问我的印象，我说：“不管怎么说，为韩国、为世界着想，韩国成为韩国人的韩国，到底是可喜的事。也许像美国人所说的，韩国人今天在政治学上还是个小学生，但有了自由，自然会开阔眼界，积累经验，逐渐提高，有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的。”

金九拟自杀促美苏撤军

关于政治上幼稚和冲动，倒有一个事例：

日本投降后，韩国的政党一下冒出了五百多个。后经美军驻韩司令部登记、整理，还是承认了二百三十多个。这使我想起了战败后的意大利，一天之内产生了六个新党，一时传为欧洲战地笑话，实在有点不公道。

在一九四七年，南韩最大的党派有四个，一是金九领导的独立党，一是金性洙领导的民主党，一是李承晚领导的民族统一本部，再即共产党化身的南韩劳动党。而这些党与党之间，除南韩劳动党与北韩共产党等于一家外，其余各党加上二百多个小党的政纲与政策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韩国虽已获得了独立的保证，但尚未独立，所以每一个党都以独立为号召。

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反常，因而也就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思想上的冲动。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回到汉城的金九先生，竟然有人向他建议在一九四六年“三一”韩国革命纪念大会上，当众来一个为国牺牲的自杀，以激起全民族的愤怒，借而迫使美苏双方驻军自韩国撤走。

金九先生本人呢？也居然接受这一建议，准备如此做。后来还是有人开导他说，这一种纯粹东方的哲学思维太不科学了，美军也许因此有撤退的可能，但对苏联军队来说，顶多增加哈哈一笑。不要说死一个金九，就是死十个金九，史达林也是相应不理的。韩国面临美苏对峙的国际形势，只能正视现实，努力自强，等到现实跟理想接近了，韩国的光明也就来到了。

中国记者团到汉城后，特别拜望了中国的老朋友金九先生，他一脸沧桑，略显老态。我们是在重庆认识的，因此彼此对重逢都感到高兴。我们问他，最迫切希望中国帮他们做的是什么？答覆是希望中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帮助韩国早日参加联合国。而这与在美军扶植下组成的韩国立法议院议长金奎植博士向中国记者团表达的愿望一模一样。金奎植不愧是博士，他除了表示希望中国帮助韩国能早日摆脱被占领的境地之外，还提到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而今韩国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经济上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韩国人总结他们的成就，韩国之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影响是重要因素之一。回溯五十年前的汉城之行，确有不胜沧桑之感。当年韩国的悲剧如今已逐步向喜剧转化，我为韩国人民祝福！

破坏了朱世明、李香兰的恋爱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杜甫（别房太尉墓）

●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李商隐（哭刘司户）

我为什么要把回忆录加上“忏悔”二字，在前言中已有交代。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中，破坏了朱世明将军和日本歌影双星李香兰的恋爱也是一桩。

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三月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应占领日本之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邀请赴日参观访问，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给我留下了头脑灵活、识见宏远、风度翩翩、言谈不俗的印象。

回到南京后，除撰写长篇报道《麦帅治下的日韩》发表于三月至四月的《中央日报》外，还为《新闻天地》写了一篇综合报导。内容分五节：一、日本政局可能于最短期内发生变化；二、日本再建生产事业之展望；三、麦帅管治日本已变为抚育；四、中国驻日代表团使命重大；五、关于朱世明团长。

一拙劣报导 朱世明撤职

“关于朱世明团长”这一段两百多字既不像新闻报导、又不像政治评论的玩艺儿，竟直接导致朱世明将军在蒋老先生看到《新闻天地》的揭露后，用当时蒋老先生的大秘书、后任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先生的话说：勃然大怒，下令解职。

原文如下：

〈关于朱世明团长〉

朱世明之为人清廉，聪明，有魄力，如果一心一意发挥其根据代表团使命而应有之管制精神，确可有为。惟最近数个月以来，该团第四组副组长张凤举为了升官的关系，将其介绍与日本女间谍李香兰（山口淑子）相识。李在沪助敌为虐，在东北参加奴化工作，罪该万死，但姿色与技能均胜人一筹，故得漏脱法网回国。目前与朱过从极密，不但有违管制精神，且影响工作效率，同时难保不生其他弊端。比如麦帅方面，因此已看轻代表团。

现在东京的中国人，都盼政府为了爱护朱世明，为了爱护国家计，迅速设法由国防部将此漏网之李香兰引渡回国，加以处分，实为公私两益之事。

而这一段东西，严格说来是不尽不实的。

一、所谓“日本女间谍”这一顶帽子加在李香兰的头上，不仅对她是一种侮辱，也是违背新闻道德的，因为没有事实根据。

二、所谓“在沪助敌为虐，在东北参加奴化工作”则是无限上纲。事实上不过是唱了几首歌，如《中国之夜》、《夜上海》、《夜来香》等等。说什么“罪该万死”，简直是信口开河。

三、所谓“漏脱法网回国”，更是不通。一般人误会李香兰是中国人，而李香兰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日本人为日本工作，而且只是唱唱歌，演演剧，何罪之有？战争结束后连战俘都要遣返，她为什么不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呢？

四、对于李香兰与朱世明过从甚密所加的评语，完全是“自由心灵”。比如说“麦帅方面因此已看轻代表团”，只是想当然耳。

最后说什么“现在东京的中国人，都盼政府迅速设法将李香兰引渡回国，加以处分。”说明主观判断李是像金碧辉、日文名川岛芳子一样的中国人。殊不知李并非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她只是在天津认了一位中国干爹而已。

更拙劣的是说：“现在东京的中国人都盼政府”如何如何。如果给笔者加上一项“强奸民意”的帽子，也不为过。

总之，这是一篇非常拙劣的东西，事隔半世纪作此自我批判，之多只能表达对朱世明将军和李香兰女士的歉咎之情。并为新闻同业留下一个反面教材的事例。

我为什么来此一手？分析当时的思想冲动，有三点：

首先，个性好管闲事，痛恨小人动作。听到驻日代表团的人攻击张凤举先生（原为北师大教授）为了升官如何用“美人计”博取朱的信任，不加调查了解，便信以为真。

其次，自认为代表南京《中央日报》，而央报当时为全盛时期，朱世明将军接待记者团，我虽年轻排位不能在前，但亦应排于中间，不能排后，似乎受重视程度不够，因而产生一种病态心理反弹。

其三，当时入行不满七年，缺乏专业记者修养，自以为是，任性而为，犯了错误，还很得意。

将军吐心声 真情感人深

就在朱世明将军卸职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我乘车采访，途经外交部，见他伫立于公共汽车站排队等车，乃命司机停车，请他上车送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问：“General Chu(我自认识之日起即如此称呼他)！怎么在这里等车？”

他既直率又幽默地答日：“还不是你老弟照顾的。”我除了连声道歉，还能说什么呢？

到达颐和路他朋友借助的房子，我坦率地向他说明了当时为什么要来此一手。究其实是一种虚荣心作怪，问题的根本是道德修养差。单是按一个专业记者的要求来说，利用手上的笔发泄个人的情绪就是大错。

没有想到，他听了我的自责后，竟向我打开了他的心房：

在一般看来，能够出任抗战胜利后首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是很大的荣誉。而从他的角度则不然。虽然是一种光荣的职务，但却使不上劲。而且他原是想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好好建设一下家乡，一展抱负。可是竞争的人太多，特别是程颂公（指号颂云的程潜老将军）也想做，他当然只好退让了。到东京，给麦克阿瑟进军唱配角，麦帅是那样的性格，那样的强势，而朱将军的性格也是很强的，一坐下来就吵嘴不是办法，只好接受麦帅的决定。心情相当抑郁。

加上，他和夫人不合，夫人长驻纽约，全心奉献给了耶稣基督，出任世界女青年会总干事，忙的全世界到处飞，他只是在夫人每次路过东京时到机场和她礼貌性的会晤一番。（我后来在东京曾应约同赴机场迎接朱夫人一次）

在政治、爱情两不满意的情况下，李香兰走进了他的生活，她是那样的玲珑剔透，明艳照人，而且像小鸟依人般地投向他的怀抱，英雄爱美人，天下皆然，古今相通，爱到疯狂时，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他们依偎着走出神奈川县的叶山别墅，曾一度兴起双双投海了此一生的念头。

还是李香兰劝他说，她不足惜，而他却是国际关注的人物，要多珍重。因此，他们之间决非一般的男女关系，而是真正的恋爱。

我听了他的敞开胸臆，有肝胆相照的感动。从而再一次对加诸他们两人身上的伤害，加深了一层自责。从此，我和他也就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商震恋下女 东京传蜚文

一九四八年东京传出继朱世明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的商震将军，因与服侍他的日本女

子安田，有了感情关系，安田怀了孕，商震却准备将她辞退。日本妇女后援会站在维护人权和妇女权益的立场，发了传单。要求商震将军必须负起男子汉大丈夫的责任，与安田女士结婚。而商震在代表团长解职、他的原配夫人在美国逝世以后，也就和安田在东京办了结婚手续，并定居东京，双双曾访问北京。这是后话。

当我从东京盼朋友处接到这张传单后，也作了简单报导，不过汲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未加任何评论。偏偏这篇报导又被人反映到蒋先生那里，商震因而被解职。

那时已到了一九四九年，有谁来接替商震呢？在外长王世杰的推荐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关注下，蒋先生又批准朱世明将军复职了。

就在朱世明将军复职的一九四九年春，《天地新闻日报》在广州创刊，我记得他送了一副丝绣白底黑字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表示祝贺之意。当我在广州被捕下狱、请保候训、逃到香港时，他特别由东京致电其原来的主人秘书许振南先生转我，电文很简单："盼来东京小住。"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飞赴东京的原因之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住进了中国驻日代表团招待所，战前是日本农林大臣的官邸。十几个下女伺候三个客人，中国西北棉纱大王、蒋纬国将军岳父石凤翔先生；曾任南京市长、广州市长、铨叙部副部长、传说曾和蒋夫人订过婚的刘纪文先生；再就是我。后来我因爱热闹，搬进了东京的"外籍记者俱乐部"。就在这个时期，结识了李香兰，她已从朱将军口中知道我是朱的朋友，曾请我到她家小坐；我曾请她到记者俱乐部跳过一次舞。顺便说一句，朱出任第三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时，与香兰已不来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曾应约到他的叶山别墅度周末，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是一位名叫 Cecelia 的中国女士。我们三人在叶山还进行了一次短程的脚踏车比赛。

重逢李香兰 青春倍惊心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在日本重逢李香兰。相隔近四十年，按她的实际年龄和用"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形容，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按她展现的风貌来看，如果世界上真有长生不老之药，李香兰大概就是吃了这种药的，所以年过花甲，望之四十许人，既柔媚多姿，又大方热忱，故人相对，分外亲切。我忍不住和她来了个拥抱，实在太激动了。那时，她已结婚两次，第一次是一位雕塑家，第二次是日本驻缅甸大使。她本人为自民党征召竞选参议员成功，出任参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每次赴日，都与李香兰见面，她曾为我三次设宴，并邀请我的朋友马崇六老将军、李嘉伉俪、戴国辉教授和《朝日新闻》元老记者吉田实等参加。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对我的亲如兄弟的好朋友胡菊人的关怀。当她知道《百姓》半月刊是我和菊人美美伉俪共同创办，艰辛备尝时，她毫不犹豫将《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无代价交《百姓》出版，而这本书连售七版，对于《百姓》确是一种贡献。而且，两度邀请菊人、美美访日，去作她的客人，一切费用由她负担，均为菊人婉谢。她说，主要是出于对文化事业的尊重，对文化人的尊重，对菊人的尊重。

这反映了李香兰的思想境界已超越了日本的范围，而关照中国、关照亚洲了。

但令我感伤的是朱世明将军的晚年，由于中国大环境的变迁，使他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影响。在国民党已经败相毕露、而中共统战深入外交界，不少使馆发生效忠动摇、甚至"起义"事件后，驻日代表团自然也不能不受波及。

朱世明将军失守美国教育的，具国际视野，心胸开阔，《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发表，无异宣告了国民党外交的末日，若不是韩战出现了契机，形势怎么发展，真是"天晓得"。

而朱对于代表团属下是采取尊重个人选择的态度，只要自己不投共就行了。但这种君子之风，怎么能容于当时台湾的特务政治呢？他的受国民党排挤是必然的。要不是蒋夫人对他了解较多，恐怕连自由都没有了。

我哭朱世明 冰心怀故人

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九日就在和李香兰重逢第二天，我约了好友乐恕人和原为朱部属后为旅日侨领的陶萃权、陈乃昌两位先生，四人一起到东京朱的墓前鲜花，鞠躬致哀，并默默地告诉他，李香兰现在很好，政治、文化都表现成熟。请放心！不料一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回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东京，名作家冰心女士收到有人带给她的信息：毛泽东到北京后，曾问起："冰心女士现在哪里？"答话是："在东京。"毛说："可以请她回来嘛！"

冰心问我："你看我跟文藻能回去吗？"我说："只要毛关心到，回北京就没有问题。"冰心说的文藻是指她的丈夫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应朱将军邀请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二组（政治）组长。还有一位吴半农教授出任第三组（赔偿事务）组长。冰心女士则任代表团子弟小学校长。

当时，。毛盼望冰心女士回北京的事，已传遍代表团，朱世明将军又一次和我聊天，他也认为冰心和两吴回归比留在东京有意义。结果，他本人因冰心等的回归，受到蒋介石的怀疑一度被叫到台北面训，并失去信任，遭到解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决定自东京经香港回昆明，冰心特在家中亲自做福建菜送行，当时她和我开玩笑说："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了，我的干女儿多得很呵！"我说："那吴教授早已以朋友待我，怎么办？"冰心说："没关系，各了各的。"

没有想到，跟冰心女士一别就是二十七年，一九七六年我决定离国赴港前，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宿舍去拜望了"干妈"，感谢她对我的关爱。虽然她和文藻先生都经历了反右的风暴，文藻先生还和他的得意门生费孝通教授同时被划为右派，但冰心对历史曲折的道路则似乎看得非常清楚，轻轻一句："我们都有幸遇着大时代。"这是何等的豪情！

就在这次见面时，冰心女士对朱世明将军仍表示怀念，说："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对于朱将军最后默默地在无人照顾下逝世，三天后才被发现尸首；说了一句："太可惜、太遗憾了！"

正如杜甫哭友人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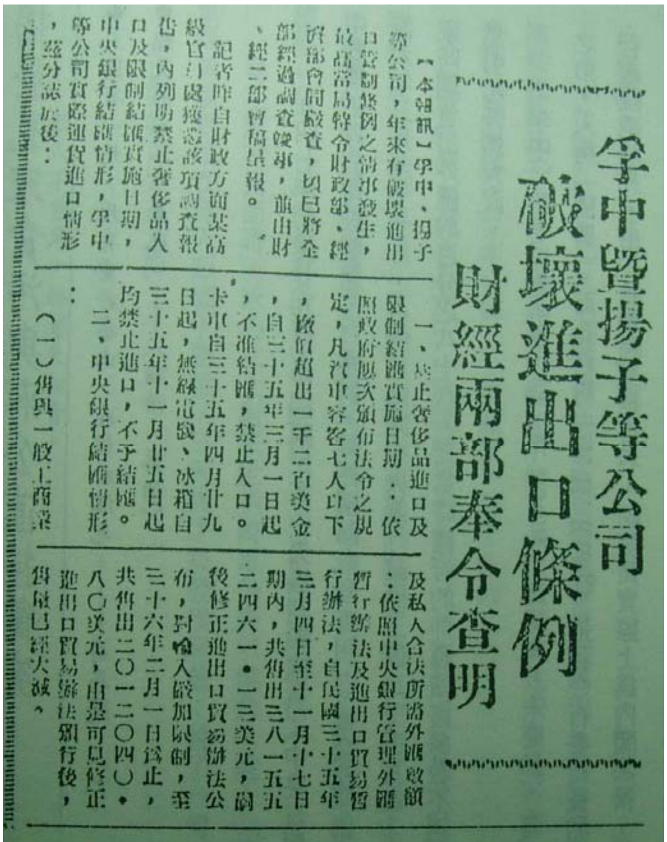
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

揭发孔宋贪污与蒋公直接冲突

●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 临大节即而不可夺也。—— <论语 · 泰伯>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登载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发孔、宋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十一月，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三亿三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而当时国府的外汇储备总数不过五亿美元。这一大案的揭露，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孚中暨揚子等公司
破壞進出口條例
財經兩部奉命查明

【本報訊】孚中、揚子等公司，年來有破壞進出口管制條例之情事發生，最高當局特令財政部、經濟部會同嚴查，切已將全部經過調查竣事，並由財、經二部會稿呈報。

記者昨自財政方面某高級官員處獲悉該項調查報告，內列明禁止奢侈品入口及限制結匯實施日期，中央銀行結匯情形，孚中等公司實際進貨進口情形，茲分誌於後：

一、禁止奢侈品進口及限制結匯實施日期：依照政府歷次頒布法令之規定，凡汽車容客七人以下，售價超出一千二百美金，自三十五年三月一日起，不准結匯，禁止入口。卡車自三十五年四月廿九日起，無線電機、冰箱自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起均禁止進口，不予結匯。

二、中央銀行結匯情形：

（一）售與一般工商業及私人合法所需外匯數額：依照中央銀行管理外匯暫行辦法及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自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七日期內，共售出三八一五五二四六一•一三美元，嗣後修正進出口貿易辦法公布，對輸入嚴加限制，至三十六年二月一日截止，共售出二〇一二〇四〇•八〇美元，由是可見修正進出口貿易辦法頒行後，售匯已經大減。

▲1947年7月29日，南京《中央日報》四版，節錄孔宋貪污案。

“孚中”的老板宋子文（T. V. Soong）是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之兄和孔夫人宋霭龄之弟，人称“国舅”。而孔祥熙（H. H. Kung）是蒋介石委员长的连襟，抗日战争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由于蒋兼院长是挂名，副院长实际上为内阁阁揆，全国财经大权一把抓，而他最拿手的措施，就是印钞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面对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及中外舆论对孔的抨击，遂把阁揆的位子转交给宋子文。宋自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一直是帮蒋搞财经的。宋为哈佛大学毕业，自认与美国关系不同一般，常常挟洋自重。孔在中国人心目中为“土财神”，而宋则为“洋财神”，孔、宋在中国成了“财阀”的代名词。共产党攻击国民党有“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孔、宋就居其二。他们两家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的短短八个月内，就贪婪地把国家掌握的外汇大量占为已有，并违反进出口条例，疯狂进口外国产品图利，活活呈现了吸血鬼的面目。

接收变“劫收”，丧失了民心

本来，国家的经济在抗战朝间已经是百孔千疮，抗战胜利后，党、政、军、财、文各方面的大员蜂拥到京、沪、平、津，从日本人和汪精卫汉奸政府手中去接收权力和财产，结果，变成了“劫收”，出现所谓 “五子登科”的局面。接收大员一夜之间就拥有了金子、房子、车子、女子，加上位子（官位）。原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本来盼望国府官员凯旋归来，“斯民于水火”，而政府宣布汪伪发的钞票只能二百比一兑换法币，简直就像冷水浇头，公众反应无异抢劫沦陷区百姓。等到接触那帮如狼似虎的官员后，满腔热情更化为冰块。国民党的大好局面，转瞬变为既倒的狂澜、将倾的大厦。

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中共的军队在内战战场上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优势日益丧失，国军的士气也日益低落。为了给前方战士打气，国民党中央组织了庞大的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我随中央常务委员刘文岛为团长的豫鄂慰劳团到了河南新乡一带，在王仲廉部队与士兵开座谈会时，最使我感到震惊、不可想象的事咧，莫如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前线与共产党军队打仗，战壕的士兵口渴时想喝一口水而不可得，因为后勤部门没有配备士兵携带军用水壶。对照一下豪门的穷奢极侈，如孔、宋家族花费大量的外汇从美国进口包括化妆品在内的各种日用品，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当时比较有头脑的学者和有理想的从政者

都已预见到国共双方的战争，国民党必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已丧失了民心。

谁应负内战失败的责任？在一九四七年夏天各种因素还没有完全显露明白以前，社会舆论从社会生活现象观察，认定蒋介石的亲属和亲戚是罪魁祸首。不论堂堂议坛或民间谈话多把矛头对准孔、宋，有的锋芒直指蒋夫人，提出“女人误国”之说。《救国日报》的龚德柏先生并举出唐明皇在马嵬坡杀杨贵妃以安抚六军的故事，暗喻蒋介石应杀宋美龄以慰国人。这当然只是一种激愤的表示，事实上这种意见蒋老先生也不可能听到。

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国民参政会在南京举行。这个会产生于抗战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包括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比如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都是参政员。在国民政府一九四八年行宪前，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会的作用。国府的立法院反而是聊备一格。一九四六年底虽然制定了宪法，但因尚未行宪，一般人注意政治动向，仍把焦点对着参政会。

失败谁负责？孔宋是祸首

当时参政员对政府的激烈质询，成为人们精神上最大的慰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共产党代表和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人的发言，反而是国民党代表和亲国府人士的质询，如六十年代移居加拿大有“大炮”之称的黄宇人，后来出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和远在民初就任国会议员的浙江大老褚辅成等，常有极精彩的提问。黄宇人这拿大炮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十三次会议中带头提出拟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帐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案，连署包括刘蘅静、齐世英、王正廷、刘文岛、陈肇英等一〇三人。决议为交常会依法律程序办理，只是走了一个过场。当时我就产生一个感觉：难道国民党没救了？

一九四七年春，傅斯年先生曾发表一篇烩炙人口的鸿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读来真过瘾，我为此特别打了一个电话向他致敬。当时，我以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之身，前往参政会旁听并采访。听到参政员们就扬子公司、孚中公司一案对孔、宋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套取国家外汇，提出措辞尖锐的质询，很受感动，认为是正义之声。财政部长俞鸿钧（O. K. Yu）则提出使人听了从内心深处厌恶的答复，处处拿蒋介石做挡箭牌。如当参政员问起扬子、孚中公司破坏进出口管制、利用政治特权大量套取外汇的问题时，俞鸿钧首先只是说政府当慎重处理。后来在被追问时，才说：“最高当局（指蒋介石）已命令财政经济两部会同调查”。再问“调查的结果如何”时，他却毫不客气地说：“已呈报最高当局。”再问：“参政会能不能代表老百姓要求得知调查结果？”俞鸿钧竟蛮横地答道：“这要请示最高当局。”左一个“最高当局”，右一个“最高当局”，把整个会场的气氛弄得僵极了。有的参政员气得脸色铁青，有的参政员则在散会后破口大骂：“他妈的！这些家伙脑子里除了最高当局什么都没有。”

年轻人义愤，豁出去再说

我离开会场回到报社途中，胸中也感到一股莫名的悲愤之气，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冲动：为什么不可以在报上揭发这一大贪污案呢？跟着就想到以《中央日报》、党的中央机关报的地位，能够重拳出击吗？岂不是造反？再一想到记者天职，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惑。终于年轻人的义愤战胜了世故的考虑，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再说。回到采访部就给负责专跑财经新闻的记者漆敬尧（后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主任）一个任务，叫他全力以赴，千方百计拿到财政经济两部关于扬子、孚中两公司违法套汇的调查报告，并告诉敬尧，我将配合他采取行动。当我下定决心与孔、宋战斗时，社长马星野、总主笔陶希圣完全不知情，只和总编辑李荆荪打了一个招呼，他也没有特别当真。

就如战役展开前分析敌我形势一样，我分析了一下整个情况，要拿到孔、宋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贪污国家外汇的调查报告，只有两个采访渠道——财政部和经济部。财政部既有孔祥熙安下的钉子，又有俞鸿钧奴才式的效忠，对此一定是全面封锁。要想突破，只有从经济部下手。当时，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之举，经过政党协商，把农林、经济两部划出来由青年党人掌握，左舜生出任了农林部长，陈启天出任了经济部长。我当时跑国共和谈及政府改组新闻与陈启天很谈得来，便在有一天晚上，喊着漆敬尧一起到陈启天家去拜访，一方面拜托他今后多给敬尧一些方便，一方面直截了当地跟他谈起孔、宋案，我怂恿他放一响炮，为青年党参政争光。我说：“你是青年党的部长，我是国民党的记者，两党合作后就可立即公布案情。”当时，陈说了一句：“非同儿戏！”

回到报社，我把准备揭发孔宋的构想，具体告诉了总编辑李荆荪和另一副总编辑朱沛人，而且说，准备从经济部下手，有可能最近就拿到调查报告。沛人连声叫好！荆荪知道我真的要干了，面有难色，主张慎重，他说，党报揭露这种大案，影响太大，恐怕承受不住。因为我和荆荪是同班同学，情同手足，便跟他带开玩笑带认真地说，我如果弄来了，你不登我就跟你打架。

没有想到，就在看陈启天后一日，漆敬尧把这份调查报告从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那里拿到了。他向邓透露了我们前一晚对陈的拜访。拿了就往报社跑，当他递给我时，我情不自禁地在他肩头猛拍一掌，敬尧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得意的傻呼呼笑容。

党报揭大员，京沪同震动

到了上班以后，李、朱、我三人碰头商议究竟怎么处理。我要求头版发表，荆荪却反对发表，说此事关系太大，即使发表也要取得社长马星野老师的同意，我们不能害他。我力辩马老师从不管新闻怎么发。他可以往我们几个学生身上推，如果事先告诉他，他反而要背起责任包袱了。沛人做和事佬，提出折衷建议，叫我和荆荪各让一步，发，不发头版，发在第四版。因此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这一天，在中国报业史上开创了党中央机关报揭露党的中央大员贪污的先例。下仅震动了南京，而且轰动了上海，以及全国其它大城市。当上海《新闻报》和《大公报》全文转载这一消息后，我的老师、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先生还特别打电话向我祝贺，并告知反应强烈。

原来是合众社驻南京记者张国兴，看到七月廿九日《中央日报》后，凭他对中国政治背景的了解，在转发这一调查报告时，加了一个导言，指明这是在魏德迈将军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来华作调查旅行期间，CC 派所控制的《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向宋子文、孔祥熙控制的两家公司开炮。这样就把一项新闻揭露弄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不仅国外的报纸刊载了这一消息，上海的英文报纸也刊出了这一报导。蒋夫人恰巧那几天在上海，她为此而生气打电话给蒋老先生，推辞了返回南京的日期。这是后来出身官邸的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告诉我的。她当然很容易接受派系斗争的判断。蒋老先生的震怒，自不待言。

就在此事中外喧腾之时，中共的新华社也以国民党发生内哄着笔，将此事报导为 CC 系要以打倒孔、宋在蒋介石面前争宠，并藉而笼络人心，故在《中央日报》上作了这一揭发。还附带提到，“年轻记者陆铿”的名字。这对蒋老先生说，自然是火上加油。不过这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中共在全国大镇压时，我已被关在他们的监狱里但侥幸未杀的原因之一——他们因为新华社的报导，对处理我就比较慎重。按中共审讯人员的话来说：“你的身份太神秘，问题太复杂，需要详加调查，才能定案。”结果杀人的疾风吹过了，幸免一死。

蒋召集会议，勒令查来源

七月三十曰蒋主席在黄埔路官邸召开了会议，除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李惟果、陶希圣

出席外，财政部长俞鸿钧也被喊去，追究为何财政方面官员竟将调查报告泄漏给记者？同时指示李惟果、陶希圣向《中央日报》彻查消息来源。

我在发表这一调查报告前，有意识地要给俞鸿钧一点苦头吃。鉴于俞鸿钧张口闭口以"最高当局"作挡箭牌，我在新闻导言后的第二段一开头故意加上"记者昨自财政方面某高级官员处获悉该项调查报告"。心想，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再拿大帽子吓唬人！俞鸿钧受了蒋介石的训斥后，随即回到财政部召开司局长会议，勒令泄漏消息给《中央日报》记者的高级官员赶紧自首，否则查出来后最高当局就要以泄漏国家机密罪论处。把在座的财政部高官个个弄得很紧张，纷纷站起来表态，绝无泄漏消息情事。但《中央日报》消息明明写着此消息来自财政方面，又作何解释呢？

就在七月三十日下午，俞鸿钧痛苦之余，无可奈何，只好派出他的亲信、与文化界有较多联系时任其机要秘书的黄苗子（四十年代重庆"二流堂"的名人、八十年代在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成名书法家）到中央日报社找我，想一探究竟，并告诉了俞鸿钧遭遇到困境，希望我能告诉他一点线索。我当然是用一套"太极拳"把他应付走了。直到三十八年后在香港重逢苗子，我才向他致歉。因为在苗子找我之前，李惟果部长已经和我通了电话，他简单地问："消息是从那里得来的？"我也简单地答："来源未便奉告。"他在电话里说："我是宣传部长呀！"我说："我知道，但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他说了一声："再说吧，我现在有事。"就把电话挂断了。

李惟果部长后来告诉我，当时考虑到他平常跟我接触较少，我对他也认识不够，对他可能没有信心，只是先在电话里试探一下。他决定分别找马星野社长、陶希圣总主笔跟我谈。马先生卧病，陶先生因而承担了叫我交代的任务。

正如前述，由于在办报立场观点上，陶公（报馆上下都这样称呼他）和我们年轻人是有分歧的，虽然平常大家客客气气，但实际上却貌合神离。

在揭露孔、宋的消息见报之日，七月廿九日下午，马星野社长正在生病，他打电话找我，我把发表这一消息的心路历程告诉了他，并表示责任由我一力承担。马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大声，你太冒失了。"以后就未再过问此事。

陶希圣查案，成短兵相接

七月三十日，陶希圣先生入夜来到报馆，请我到总主笔室谈话，当时因有两位主笔戴杜衡和殷海光在座，不便深谈。我提议到社长室，因马先生不在，主任秘书周天固也下班了，房子是空的，于是陶先生和我在社长室展开了第一回合的"短兵相接"。他说："发表有关扬子、孚中公司的调查报告，这件事闹大了，上海各大中文报纷纷转载，英文报也大作文章，总裁非常震怒。你过去在报上刊登徐部长失踪，总裁已经原谅了你，可你没有接受教训，胆子越来越大，这一次一定得好好把事情谈清楚。消息是从那里来的？是自己采访的，还是外人送来的？你为什么要发表这个稍息？而且还要发头版，你是什么用意？目的何在？"我见陶来势汹汹，一改平日和颜悦色的态度，我把心一横，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我是有计划，也可以说有预谋要发表这一消息的。陶表现出来的惊诧之色，是我过去从未见到的，眼睛睁得很大瞅住我，甚至一度把眼镜取下来对我端详一番。他的吃惊反而使我感到好笑。于是把怎样听到参政会的辩论，俞鸿钧怎样拿"最高当局"作挡箭牌；参政员是如何气愤；我如何下决心要搞到这个调查报告，加以揭露。我说："陶公，我已向社长马老师说了，责任由我一力承担。但消息来源我不能讲。"陶希圣听了我的陈述后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怕你承担不起啊！好好考虑考虑。"就起身走出社长室，我也回到编辑部。把跟陶公短兵相接的经过告诉了荆荪。荆荪叫我作好思想准备，以承受即将来到的压力！

七月卅一日，《中央日报》在陶希圣的设计下，玩了一个“小数点”游戏，以三栏加框刊出“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为题的既像更正又像声明的方块，内称：“前日（本月二十九日）本报记载孚中、扬子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之新闻一则，各报颇有转载，本报对于此项记载，特声明如下之两点：㈠本报记者未见财政、经济两部调查报告之原件，故所记各节与原件当有出入之处。㈡本报所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查实孚中公司结购外汇为一五三七七八七・二三美元。扬子公司结购外汇为一八〇六九一〇・六九美元。中国建设银结构外汇为八七七・六二美元。”三亿一下变成三百万，真是高手。

李惟果谈话，提及魏德迈

七月卅一日，李惟果先生来到报馆找我单独谈话，他说他已了解了在彭学沛做部长时代我闯的祸（指在报上以花边新闻刊出徐永昌失踪以报复徐拒绝接见我那件事）。然后，以缓和的语气说道：“年轻人嘛，总不免有些冲闯，只要是正路，就没有问题。”接着，他说已经从陶希圣先生处听说了我发表这一调查报告的起因，但没有考虑到大环境，魏德迈将军受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在中国调查实况，很可能共产党及反政府的人藉此加强对政府的攻击，直接影响美援。总裁要了解消息来源，并没有处分什么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知道一个全貌。”

我说：“美国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民主，党的机关报揭露政府的弊端也是民主的表现，我不认为调查报告的揭露会影响美援。至于说出消息来源，按照记者信条是不可以的。我请求最严厉的处分。”

李惟果笑着说：“你想到处分，自然不肯说了。其实，说出来不见得有处分，不说出来倒可能处分。”

我重申我愿意接受处分。李惟果摇摇头，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想想，明天好好谈。”

大概就在七月卅一日深夜，向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拿到这个调查报告的负责采访财经新闻的记者漆敬尧，陪同邓翰良到南京大杨村十二号我家里来看我，他说这几天的情势很紧张，财经两部都在查，如果我们说出调查报告是他从机要文件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他将被判重刑，而他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妻儿，所以特来求我，话犹未完，扑通跪倒在地。

我在极端惊诧、没有任何考虑的情况下，也赶紧跪下，并马上把他一齐拉起，请他坐下。告诉他，做记者有做记者的信条，对消息来源保密是信条之一。现在责任完全由我一力承担，连漆敬尧都不攀扯，当然更不会攀扯他，我即使杀头也不会泄漏，请他放一百二十个心，但对他因此而担惊受怕表示歉意。他连声称谢而去。

也就在卅一日上午，为了防止有关方面来查原稿，我特别从校对室把原稿抽出销毁，而且写了一张字条给校对长，万一受到查询，不妨出示我的字条。

为了使漆敬尧避避风，我决定把原派到庐山等蒋主席上山的记者龚选舞调回南京，让漆敬尧去庐山接替他的工作，并顺道返湖南岳阳探亲一行，轻松一下。

李陶同约谈，盘根又究柢

八月一日，对我的约谈开始了，地点分别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室、中央日报社长室和中央饭店。

部长李惟果，四川才子，美国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对于新闻自由有一定的观念，因此，约谈中多半采取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办法。副部长陶希圣，曾随汪精卫到南京，后又与高宗吾携同日汪密约投效蒋介石，在委员长侍从室任第五组组长。对刑名之学深有研究，故对待我的问题，多操“晓之以利害，喻之以法威”手段，务求很快地使我说出消息来源，

可以向蒋交卷。在八月一日至八月四日的时间中，他们有时两人一起和我谈，有时分别和我谈，真可以“舌敝唇焦”形容。我思想上感受到空前未有之压力，但没有一点惧怕。

两位部长盘根究柢，对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了解，我坦率地告诉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地记者的生活经历，坚定了我终身献身新闻事业的志趣，对新闻自由的执着，成了我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ＢＢＣ广播学院的一段学习，时间不长，却使我对海德公园的民主着了迷，进而对“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大感兴趣。我认为中国要得救，只有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而自由的新闻事业就是照亮这条道路的火炬。

李惟果先生对我海阔天空似的陈述，似乎不无兴趣，只是偶然提醒我：“恐怕太理想主义吧？!”“这样想当然可以，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呢？”陶希圣先生对我讲的一套根本不感兴趣，他劝我：“不要逃避现实，浪费时间，还是赶紧把消息来源讲出来吧!”

当时，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支配我横下一条心，坚持记者信条，拒谈消息来源。任你千方百计，我只有一个主意：头可断，血可流，消息来源不可说。当对方讲得入情入理时，我不免产生共鸣，甚至产生一种自责的想法；当对方语涉威胁时，我则以沉默相对，甚至产生来一次“生命的赌博”的念头。

当李、陶两位向蒋老先生汇报说，我强调记者信条不能违背，拒绝讲出消息来源时，蒋老先生明确指示：“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么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李、陶两位从黄埔路官邸出来以后，严肃地把蒋老先生的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给我。我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勇气，大声地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

陶出言威胁，陆给以反击

李惟果听到我的答复后，最初表情很不自然，似乎感到诧异，但很快地转为和颜悦色，以充满关爱之情的语调劝我说：“老弟，你要冷静地考虑，不要负气，不要任性。”而陶希圣则铁青着脸警告我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我当时有负李惟果先生的教导，不但没有冷静对待，反而顶撞了陶希圣先生，我说：“陶公，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脑袋是可以不要的。”李马上打断我的话，以责备的口吻说：“陆铿，大声，你不可以这样对陶公讲话，陶公警告你，是为你好呀!”幸而当时李是正部长、陶是副部长，所以在李的宽容下，陶也没有发作。不过，当他们向蒋老先生汇报后，老先生极为震怒，表示要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时任内政部长的张厉生先生参加黄埔路官邸会议后，及时通知了我，说情况很严重，可能会被捕受审，而且可能交给宪兵司令部办，还说，陈布雷先生、李惟果先生和他本人都不主张交给军统来办这件事，叫我做一点准备。无异透露消息给我，是有人主张把我交给军统的。张厉生先生留法勤工俭学出身，在国共和谈时是我经常采访请教的对象。慢慢熟了以后，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为人清廉，多少具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情怀，对国事蜩螗，也偶尔流露叹息。他对我揭露孔、宋，甚为同情。我当时对被捕审讯倒不怕，怕的是刑讯逼供。于是接受张厉生先生的建议，跑到一向对我关爱备至的新闻界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公馆，向于先生报告了全部经过，请求于先生向宪兵司令张镇打个招呼。

于先生马上叫他的副官宋子才挂电话找到张司令，我听于先生在电话里说：“你是真夫（张镇之号）吗？《中央日报》的陆大声，可能送到你的司令部来。我告诉你一句话，不准用刑！不准用刑。”张镇在电话里连声“是!”“是!”表示谨遵于先生的吩咐。不过，他说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我这个案子的指示。

风暴已扩大，美国亦重视

揭露孔、宋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暴，不但南京的政治圈有了强烈反应，在外交圈也引起了重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此特别召开了内部会议，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巴特渥斯（Butterworth）就此事向司徒雷登作了一个全面的演示文稿，并向来华调查中国情况的魏德迈将军也作了同样的演示文稿，司徒雷登还叫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Philip Fu）注意一下黄埔路官邸将采取什么行动。事隔三十多年后，傅泾波先生在华府他家中跟我谈起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美方的动向，还风趣地说了两个字："好险!"

当我得知可能被捕受审以后，就和李荆荪商量，究竟是在家里被捕好，还是在报社被捕好。商量的结果，认为在报社被捕较家里为好。因为孩子太小，我的大儿子可望，三岁半；二儿子可信，不满半岁；荆荪的大儿子李元尚在襁褓中；荆荪的母亲李老太太，岳母方老太太年纪都大了，怕军警骤至，会吓倒老小。惊动邻居，也是不安。当时我们同住南京太平路大杨村十二号，楼上楼下；同院住的还有中央社编辑部编辑沈宗琳和《申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周亚夫。

我的妻子杨借珍，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对政治和新闻一向都无兴趣，平日注重钻研技术，强调平安是福。而这一次对我拒绝说出消息来源的作法，却百分之百赞成。当我准备被捕时，她为我收拾了一个旅行包，除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及换洗衣服外，特别放进一把扇子。南京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她怕我在监牢里会热昏掉。

按照约定，李惟果部长八月五日到报馆接我去一个地方，当时在思想上是准备进宪兵司令部受审。八月五日一大早我就拎了旅行包，由荆荪陪同一起乘车到新街口报社。当妻子牵着大儿子、奶妈抱着二儿子和荆荪夫人佩倩一起并排为我送行时，我还是笑嘻嘻地并无半点难过，只是汽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向送行的人挥手时，心里才猛然浮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凉感。

不是去坐牢，总裁要召见

到报社不久，李部长就乘车来到了新街口中央日报大楼，他一面上楼一面问："陆副总编辑呢？"我在楼口迎接了他。他说："我们走吧!"我说："请等一分钟，我拿一下旅行包。"他却说："不用了。"我一时情急表示："坐牢不换衣服怎么行？"他才说："不是送你去坐牢，是总裁召见。"

车子从新街口到黄埔路途中，李惟果以极为热情的口吻告诉我，事情看来已有新发展，究竟结果如何，还要看总裁召见后怎么说。因此他强调："老弟!你今天的对答很具关键性。"

到达黄埔路军校蒋氏官邸。一进门就有侍卫官唱名："李部长到!"给人一种威严感。接着空军武官夏功权中尉（后任国府驻美代表、驻乌拉圭大使）、海军武官邹坚上尉（后任国府海军总司令、驻韩大使）双双出迎，握手后请入会客室。

当我跨入会客室时，一眼看到蒋老先生正从最里面起坐室的一把沙发中站起来，身着白夏布大褂，伸手向一个白磁缸子里取了假牙双手安上，然后稳步走出。我跟着李部长向他一鞠躬。只见他手轻轻一摆，示意叫我们坐，我也就一屁股坐下，面对面地听他教训。李部长隔一张茶几坐在另一张沙发上。

没有想到蒋老先生第一句话竟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这个问题我已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着什么。既已豁出去，我就大着胆子说："报告校长（以政校学生的身份如此称呼），是不是准我多讲几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着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么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那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么打？!。"

豁出性命易，慷慨陈词难

接着，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认为经济已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政府高官不管老百姓死活，只顾大量钦财，甚至利用特权把国家的外汇占为已有。整个国家外汇储备不过五亿多美金，扬子和孚中公司竟弄去三亿多。宋子文先生和孔祥熙先生都是国家重臣，公然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进口大量奢侈品、包括化妆品在内，大大有损政府的威信。

我像放连珠炮似地越说越起劲，强调与共产党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决不能简单化，更不能盲目乐观；陈辞修将军说："三个月可以消灭共军。"如今呢？共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军呢？再从党的各派系看，究竟有那一个派系、那些人，是真正在为国为民全力奉献的？像陈立夫先生口头上讲得很动听，但实际上仍然是把 CC 与其它派系的斗争置于国共斗争之上，表现得偏狭自私，眼光如豆，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纲领，那是要全国一致拥戴校长您和平民主建国的。参政会上很多参政员放大炮，多数都是放得很有道理的。可惜校长没有能够听到。就以质询扬子、孚中两公司的案子来说，并不是要拆政府的台。如果国家很穷，少数官员很富，是会失民心的。我们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先生在答复参政员质询时却左一个"最高当局"，右一个"最高当局"，妄图拿"最高当局"堵住别人的口，不仅堵不住，而且引起反感，甚至把反感转到最高当局身上。结论是，党和国家都面临着危机。

这时，我注意到，随着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后他的头竟有时候随着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于是我斩钉截铁地作了结语：

"我为什么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丑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最后，我缓和地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遵照他的指示说出消息来源，我说："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消息来源即不诚不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蒋老先生的反应显然良好。我接着说："校长，虽然我的动机是好的，但作法是错的，影响是很坏的。因此，请求校长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说到这里，我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

李承担责任，蒋说不处分

就在我站起来的几乎同时，李惟果部长也站了起来，一板一眼地说："惟果身负宣传重任，有亏职守。此次《中央日报》犯大错误，责在惟果，说明平日督导无方，对年轻同志启迪不力。陆铿年轻，激于爱党爱国热忱，有失操切；观其动机，似可原宥；考虑影响，责有所归。为伸党纪，请求总裁给惟果以最严厉之处分。"

蒋老先生看我两人都站起来请求处分，也站了起来，严肃地以宁波官话宣告说：

"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还以右手比了手势。

我看到李部长满面兴奋之色，突然灵机一动，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一面口称："谢谢校长！" 一面两腿并立，深深一鞠躬。蒋老先生点点头，李惟果也微微欠身说了一声："总裁，我们告辞了！"就引导我走出官邸。两位武官在门口立正送客。

坐进汽车后，李部长用力向我背上拍了一下，迸出一句："老弟！真有你的！"直到这时，他才告诉我一个秘密，在这件事发生后，他因连续几天劝我讲出消息来源，往往深夜才回家。他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劝他不要逼我太甚。他本人也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在职责上有必要叫我讲出消息来源，向蒋老先生复命；一方面又怕我真的讲出消息来源，问题弄得不好收拾。蒋老先生催问紧迫的那几天，他回到家里时，夫妻俩对话，第一句竟是："讲了没有？"

“没有。”“好！好！”

李部长说：“我夫人已与我约好，到事情解决时，我们要请你吃饭，她要亲自做菜慰劳你。”我当然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大概就在八月中，李惟果伉俪设家宴请我们夫妇并请李荆荪伉俪作陪。佩倩因为要带小孩未能前往，由荆荪陪我和惜珍赴宴。李夫人汤佩芬女士比惟果先生年长一岁，烧得一手好菜，殷勤待客，惟果先生开玩笑称她为“李母汤太夫人”，汤夫人学养甚深，评人论事，见解不凡，对我颇多勉励，其音容笑貌，虽相隔四十年记忆犹新。

揭发孔、宋贪污案究竟怎么会由一场政治风暴忽然急转直下，据事后李惟果先生暨夫人设家宴为我庆贺时的谈话，及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在宾州访问惟果先生共同作的分析，计有五个因素：

事急转直下，因素约有五

一、在孔祥熙、宋子文和蒋夫人看，《中央日报》敢于揭露孔、宋，决不是青年记者所能做、所敢做的，背后必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由于《中央日报》一直由ＣＣ系控制，而美国合众社又明指此事乃ＣＣ系对孔、宋之开炮，因此连蒋老先生都接受了这一看法。但他听我谈话，语及陈立夫时，直指其偏狭自私，眼光如豆，反映了我并非CC系的工具，打破了原来的判断。用英文来说，就是弄得Confuse了。

二、此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注意。国民政府对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是很重视的。在《中央日报》揭载此事时，美国前驻苏和驻法大使蒲立德代表《时代》（Time）和《生活》（Life）杂志到了南京，他在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接触时就问到此案。这是董先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东京告诉我的。

三、正当此事在南京引起一场政治风暴时，魏德迈将军代表杜鲁门总统有中国调查之行。魏氏此来希望推动国府走向民主政治，而此事至少可以作为中国愿意推行民主的一个标志。当魏德迈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蒋主席讨论中国民主时，蒋氏即以此事说明中国正在向民主政治迈进。双方谈话已加载《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附录。此事原来看是负面的影响，结果产生正面的影响。

四、当时在主席官邸开会研究此案消息泄漏的来源时，一致认定，不是财政部，就是经济部。《中央日报》消息点明为“财政方面某高级官员”，可能是记者故意转移视线，俞鸿钧在财部经过彻查，保证绝非出自财政部。果尔为经济部泄漏，部长是青年党的陈启天，则牵涉到联合内阁党派合作问题，如处理不当，影响将更扩大，不能不慎重。

五、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国赴日记者团应麦克阿瑟元帅邀请分赴日、韩考察。三月归来，蒋主席在黄埔路官邸邀宴。当时，老先生问起日本下一届内阁将会由谁组阁。记者团的日本通，如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申报》总编辑陈训□诸位先生一致说是鸠山一惫。而我因在日时曾访问过日本社会党领袖片山哲，对社会党当时的实力及日本民间情绪有所了解，便说：“我有不同的看法。”陈等皆表诧异，蒋老先生鼓励我说：“好！你讲讲看。”我于是说：“依我看，不会是鸠山，而是片山。”并列举了几点理由，陈博老以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说：“绝不可能！”其它人也附和。这场小小争论可能给蒋老先生留下较深印象。事过一月，日本大选揭晓，片山当选。李惟果先生分析，蒋先生虽然约我吃过饭，但名字与人凑不起来。等到召见谈话时，才慢慢想起原来这个“捣蛋鬼”，就是半年前预料片山登台的那个青年人。

从风谲云诡一变而为天朗气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具决定性的还是蒋老先生没有毛

老先生的超帝王心态，特别是那种讨厌、痛恨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视人命如草芥，所谓“无毒不丈夫”也。这也许是蒋被毛打败的原因之一吧？！看看《人民日报》邓拓的下场是多么的悲惨。他不过是写了一些杂文。每当回忆到这一段经历时都不禁引起片片遐思。

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谈何容易！

奉命通知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

●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唐·元稹*

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九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这是继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制宪国大后的行宪国大。当时国共和谈已经破裂。以蒋中正主席为首的国民政府提出了“戡乱建国”的口号，希望在美国的支持下，打败共产党而消除心头大患。

但在美国方面，则按照美国人的思想方法总是希望国府能推行民主，最好是美国式的民主。

一九四七年底我访问美国回到南京，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谈话中，他竟很坦率地和我说：“美国政府任命我当驻华大使，一方面因为我爱美国，也爱中国；另一方面也知道我是蒋委员长夫妇的老朋友，想通过我对蒋委员长进行一些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

说老实话，我当时是吓了一跳。当然，我知道司徒雷登博士因为知道我是《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也知道我揭发孔、宋的事，在他看来至少具有民主愿望，加之，那天说好是“off record talking”，不发表的，所以他讲话也就比较随便，但我对他这句话的反应仍是感到刺激，甚至感到中国人的自尊有点受伤害。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的眼中究竟是一个什么地位？国民党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蒋总裁，在美国人眼中又是什么地位？而我却在为这个党效忠。我尽量沉住气，不动声色，希望听听他的下文是什么？原来是希望国民党早日行宪，最好是多学一点美国的民主。

开行宪国大的政治背景

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看法，国民党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已经是江河日下，要挽救这种局面，只有依靠两个东西，一是蒋介石亲自领导，并团结一些有志之士，来一次比较彻底的革新运动，并改组政府为各党派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再一个就是适当数量的美援。而前者与后者又是因果关系。司徒说：“你刚刚看了杜鲁门总统回来（指参加中国记者团赴美在白宫见到杜鲁门），你会有一些了解；只有国民党行了宪、施行了民主，美国舆论才会转向，美国政府也才能在美国纳税人面前为蒋委员长说话，让他们拿出更多的钱援华。难办的是委员长过于固执，在他的控制下，事情越是恶化，他越是感到必须担负全部的重担。”司徒雷登向我解释，他不相信蒋（先生）是如通常意义的所谓自负和耽于权力的人，但问题的可悲，在于他自信比任何人更了解局势，并更富有经验。这样，对其他人的作用，就不可能有恰当的估计，更不要说重视了。

我问司徒先生：“您是否向蒋先生提出过扭转形势的建议？”他很明确地答覆：“提出过，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而且还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庐山就提出过了。”我说：“当我们为了采访国共和谈新闻跟着马歇尔将军八上八下庐山时，就听说你和他（马歇尔）和蒋先生常常发生

争执。”司徒说：“蒋委员长和马歇尔将军个性都是强的，我有时起个调和作用。”司徒博士一面说一面摇头。我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了这位有深厚中国情结的美国老人的忧虑。

不过，很多美国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包括司徒老人也未能免，即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因此，凡是和美国友好的国家，特别是贫穷落后对美国有依赖的国家，应该向美国学习，全盘照搬美国经验。

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劣势已充分暴露，杜鲁门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也更为露骨。与此同时，美国舆论公开批评蒋介石独裁是中国的不治之症。宣称，美国纳税人不愿拿自己的钱维持一个腐朽的独裁统治。

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旬，杜鲁门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谈话，表示希望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将自由份子容纳进去；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国民党，特别声明，美国不希望在中国政府中有共产党人。我看到声明后，又一次去访问司徒雷登大使，他告诉我说：“蒋委员长已明确地表示，适时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还政于民。我们（指美国）希望中国从此开展新局。”

这就是蒋介石主席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九日召开行宪国民大会的主要政治背景。

何人当总统，蒋舍我其谁

问题来了，行宪的主要节目就是选出总统和副总统。同时，由总统提名立法院行使同意权，通过总统对行政院长的提名，以组织“行宪内阁”。

什么人当总统呢？从蒋先生说，当然“舍我其谁”。但副总统却成了问题。孙科以太子之身，打着“中山哲嗣”的招牌，一心想把副总统弄到手。于右任以党国元老又加上西北众望所归的身份，受到不少立、监两院的北方籍委员的拥护，他们提出“南方人当总统，副总统应该是北方人；武人当总统，副总统就应该是文人”的论据，有相当的说服力。程潜凭着军界前辈的“宿望”，加上湖南军人的支持，根据“无湘不成军”的理由，坚持“湖南人打天下有功，副总统应该是湖南人”。李宗仁更别开生面，投美国人之好，在北京向一班学者、教授大送秋波，提出“民主”“革新”的口号企图引致中外舆论的好评，造出声势，先做副总统。然后取蒋介石而代之。

蒋介石得知李宗仁对他的威胁，在李的“呼声最高”时，向何应钦、白崇禧表示：“最好军人不要参加竞选”并表示他本人的初衷，也是不准备参选的，言下之意，只是为了不规避责任，才不得不出面。

对于这一变相的命令，李宗仁巧妙地来了个“回敬”。放出空气说：“如果总裁放弃，我也放弃。”换句话说，如果蒋要当总统，我也要敬陪当副总统。而且采取实际行动，带着未来的副总统夫人郭德洁女士到南京各大旅馆去登门拜望各省国大代表，亲自出马拉票。同时由桂系大将李品仙将在安徽省主席任内搜刮的大量民财，一车一车运到南京做竞选费用；选票能拉就拉，不能拉就买，用送来会飞机票等各种名称，大搞贿选。

蒋介石为了对付李宗仁，全力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除了指示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党组织的力量给予支持，并命令“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以特务的力量给予帮助外，还不惜出面打电报给阎锡山和傅作义，指定山西、绥远两省的票，全部投给孙科。但他没有料到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大。由于蒋直接干预竞选，倒反促成了一切反蒋势力最终团结到高唱民主的李宗仁周围。

突然出奇招，请胡适出山

就在总统、副总统提名的前夕，蒋介石突然要出一个非常巧妙的政治出击，表示要支持胡适出面竞选总统。这是一箭双雕的作法，一方面考验一下国民党人对他的忠诚，借此打击

一下李宗仁的气焰；一方面向美国人暗示，他本人并不贪恋权位，愿意走向民主。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就在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后三天的晚上，蒋介石文胆之一的陶希圣（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南京《中央日报》总主笔），在中央日报社向我探询有关总统选举特别是副总统竞选的第一手情况。自从一九四六年三月我在《中央日报》任职以来，陶希圣每当写重要社论之前，都要问问我有关和谈进展及各党派各方面的最新政治行情，作为他掌握的背景材料之一。说到这次竞选，我告诉他以至白热化阶段。孙科 、于右任、李宗仁、程潜都使了全力在多方面拉票，争夺激烈。从两千多张选票的趋向看，李宗仁的胜算要大一些。但因势均力敌，初选，任何人都不可能超出半数。

陶希圣听后，沉思了一下，慢慢开口说：“大声，现在的形势是令人担忧的。你知道李德邻（李宗仁的号）如果当选副总统，很可能有一天要演出『逼宫』的戏来。为了副总统人选问题，党内已有分裂之势；总裁向来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誉，现在，他已决定不出任总统候选人，而由我党推胡适之（胡适的号）先生为总统候选人。你对这一决策感觉如何？”我当时脱口而出：“太好了！这是国家之福。在国际舆论方面，也将赢得非常好的反响。”

陶向陆交底，与胡适一谈

于是陶希圣向我交底。他说已奉到总裁指示，要为胡适参选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要马上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要为推荐胡适作候选人写一篇对党内的演讲词，这个陶自己写；要为胡适写一篇总统候选人小传，准备党中央提名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为此，要和胡谈一谈，一方面看看他的反应如何，一方面要把这篇小传写好。陈布雷（蒋的主要文胆）先生和他商量了，这一任务交给我完成。我问：介绍的重点放在什么上面？陶答：突出民主。我说我愿意试一试。”

陶希圣解释了一下，为什么选中我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原因，他首先恭维了我一番，说我观察政治局势比较全面，写文章比较有气势。然后接触问题的核心：“你是报纸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又经手大会重要新闻的发布，有你出面更适之先生接触，比较灵活，如说是正式代表我党，又不是；如说不是正式代表我党，以你在党报的地位也可以说是正式的了。你出面有一个好处，可以使适之先生打消谈话的顾虑，小传可以写的生动些。”

陶希圣告诉我，过两天中央就要为此召开全会。叮嘱说：“在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名前，一定要保密。除胡适本人外，对任何人都不要讲。”

当我站起来要走出陶先生的总主笔室时，蓦然抬头看到墙上的日历，赫然印着四月一日的字，脑子里马上泛起“愚人节”的故事，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我接到这个任务后，思想上觉得很新鲜。一方面基于对胡适的好意，认为他本身就是民主的象征，由他出来当总统，确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意。对于政治、经济、军事都病入膏肓的国民党，说不定是一剂有效的灵丹妙药，可以从此振衰起敝。

从蒋介石来说，我原本就对他存着几分敬仰。在人人认为他必当中华民国第一届民选大总统时，他自己却能急流勇退，舍总统之至尊而让位给一个学者，这真是一个最开明、最智慧、最富政治价值的决定。在世界政治史上，华盛顿为了建立民主制度不肯连任三次美国总统，至今仍成为政治光荣的丰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能参与如此重大的幕后政治活动，也是人生难逢的奇迹。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四月一日胡适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的中午，散会后他刚从主席台后转出来，我就告诉他：

“布雷先生和希圣先生有一件是让我跟您谈谈。”他好想预感到不是一般的事，表示说：“好极了！不知是什么事？”我说：“有关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他一听，马上把原来半低着的头昂了起来，对我重新审视了一番。我提出：“能不能今天下午给我一个向您请教的机会？”他很爽快，约好当天下午散会后一谈。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朝诗人欧阳修写这两句词时，绝不可能预料到八百年后会被运用到一笔政治交易上。偏偏那天的会散的较晚，已经是花灯初上了。

我走出国民大会堂大门时，天边已经拉起了灰褐色的帷幕。汽车一部接一部地开走。胡适博士拉着我的手直奔他的黑色轿车里。我俩坐进去时，胡适告诉司机：“等一等，我们要说说话。”司机也很机灵，索性离开司机座走出车来。这时，为我开车的《中央日报》司机蒋宝华非常灵活地邀他到停在旁边的车里去抽烟聊天，各得其所。

这时，话本来应该由我开始，由于那时我离“三十而立”还差一岁多，年轻、调皮捣蛋，加上好奇，所以在考虑如何完成写小传的任务之外，还存心要看看胡适博士、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师对于可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反应强烈到什么程度。这时，话本来应该由我开始的，我偏不这样，硬逼着他来问我：“布雷先生和希圣先生有什么话请 Mr.Lu（胡适自和我认识以来一直这样称呼我）转告？”我于是用英文回答一句“Congratulations”（祝贺你！）然后把手伸出去，他也情不自禁地把手伸给我，一边握手，我一边告诉他，蒋先生已决定推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民选总统。国民党即将为此召开临时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出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的决议，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陈布雷和陶希圣两位让我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并通过访问为他写一篇人物介绍似的小传，准备国民党中央提名后，在国内外发表。

胡适那时的兴奋之情，很自然地流露。我感觉到他手上出了汗，近视眼似乎放出了光彩，面部保持微笑；我的心跳也相应加速，第一次在一个汽车里进行关系重大的采访——为行宪后第一位总统立传。

谈家世开始，直至哲学史

我略事镇定，建议从家世开始。胡适从他出身安徽绩溪的一个望族说起，父胡传字铁花，受知于晚清大学者、政治家吴大澄，曾助吴修黄河，后在江苏省做官，他因而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铁花先生曾任职台湾，甲午后，与唐景崧、刘永福组织台湾共和国,，反抗日本，后因病卒于厦门。适之先生早岁丧父，幼承母教，博览群书，自幼好学深思，喜对各种问题存疑，养成追求真理精神。十八岁时对汉学和宋明理学即有涉猎，以批判的态度治学，颇多创见。一九一0年在北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以成绩优异获取。同年负笈康奈尔大学，对中国哲学已有研究。辛亥革命之成功，亦促使他认为有必要向美国朋友介绍中华新兴的国家，应邀在不同场合演讲中国问题，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甚受欢迎。一九一三年没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一九一五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随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攻读哲学。由于留学时主持学生会议，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锻炼出民主素养，进而对民主政治建立了信心。在杜威的启迪下，不仅对西洋哲学有广泛的认识，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治中国思想史，继而对人类思想有了深刻的历史性了解。

胡适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学术界的瑰宝，是使全世界学者认为中国学术博大精深的钥匙，也是前无古人的巨著。我又一次调皮地问他：“小传中需不需要写“上卷”二字，他说：“那就不必了。”

五四开路人，新文化宗师

记得说到五四时期的大新文学革命时，胡适先生显得特别兴奋，他不采自我介绍的方式，而采取启发诱导的方式，对我说：“这一段，Mr.Lu 当然是清楚的啰！”事实上我是“五四”

运动发生后三个月才出生的。关于“五四”的知识仅仅得自书本。但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毫不犹豫地说：“适之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开路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宗师，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早已有了定评。”虽然昏暗中坐在车子里面，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却感到他在微微点首。

说到他的政治活动时，我问是不是突出一下驻美大使那一段？他说：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由于不辞辛劳地到处发表演说，使很多美国人认识了中国。他说：“有一个情况，我告诉你，但不一定写出来。我的演讲特别受美国老太婆的欢迎。一度形成了要求援助中国的老太婆舆论。在美国人民心中留下中美友谊之树。”

在结束车中对话前，胡适博士试探地问我：“小传的重点准备发在什么地方？”我说：“当然是民主。民主与科学就是您和『五四』时代的一些先进在中国播种的。您出任总统，正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对中国友好的所有国家的盼望。”他听了以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对极了！民族政治，中国人民已经盼望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应该为它的实现而尽力”

说到行宪后，总统与政府首脑的关系，胡适指出，根据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行政院长即内阁总理掌握行政权。根据宪法行政院长要有立法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同意才能任命或去职，说来相对稳定。胡适博士谈到这里，情不自禁地以为来总统身份表达了他对蒋主席的诚意，着重指出：“如果蒋先生决意不当总统，行政院长当然要请他担任了。”

胡适谈民主，请蒋任阁揆

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和谈？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Absolutely not”（绝不）。

我和胡适谈话的当晚，就将他的小传写成。先送到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先生家里，胡从北京到南京开会就住在那里，请他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他表示满意。然后带回报社交给陶希圣先生，陶看后改了两个小地方，说第二天送请陈布雷先生过目。

这只是准备工作上的一个小环节，大轴在后面。

四月三日的夜晚，程潜和李宗仁分别接到蒋主席官邸的电话，说主席有请。

程、李两人未进官邸之前，就晓得不妙，但一直到主席正式表示希望他们不要竞选副总统时，才明白不妙到什么程度。

蒋主席很客气地告诉他们，为了使中国民主政治奠立一个较好的基础，最好总统、副总统都不要军人而让文人出任，所以除了请他们两位放弃竞选副总统外，并且宣布他本人也不参加竞选总统。程潜的答覆比较恭谨，表示愿意考虑主席的指示。李宗仁因为本钱下得太大了，所以毫不保留的拒绝。

蒋主席最后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是总统，党内的事我可以决定。”

李宗仁也用桀骜不驯的态度顶了回去：“如此重大的事，总裁固然可以决定，但也应该听听全体同志的意见。”

李宗仁反对的理由，说是为了对国家和老百姓负责，蒋主席应该出任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连带地也表明了自己非竞选副总统不可的态度。

当天晚上，陈布雷奉命分访于右任、孙科说明蒋主席的意思所在。

司徒雷登大使私人顾问傅泾波先生，早一日已从蒋夫人的电话中得知了蒋决定提名胡适

为总统候选人的这一决定，司徒及时转知马歇尔，并报告了杜鲁门，美国方面反应甚好。

蒋夫人访美，美方反应好

第二天，国民党临时六中全会便在丁家桥中央党部的礼堂内举行了。我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身份，头天晚上跑到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家里去告诉他，我希望明天去听听。吴最初皱着眉头，表示有点伤脑筋，后来，听我说保证秘密，不发表消息，他无可奈何也是情不可却地表示："那么你来吧！"

四月四日一大早我就钻进了礼堂，坐在最后一排，与中央监察委员狄膺（君武）紧邻。狄告诉我一个消息，大会举行前蒋主席将约集党里的元老先行交换意见。果然，我见吴铁城把吴稚晖、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和邹鲁几位请到一间小会客室。接着，蒋总裁身着戎装由蒋夫人陪同到达。

这个小规模的谈话会进行不到一小时。当于右任先生步出时，我悄悄问他："是不是总裁决定不竞选总统了？"于答："吴稚老没有表示态度。其他人都讲了话。"我问："您是怎么讲的？"于以风趣的表情说："我告诉蒋先生，我要代总裁招待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宣布竞选大总统。"接着一阵爽朗的笑。

全会开始之后，蒋主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提出中心议题——本党对本届国民大会总统、副总统竞选，到底提候选人还是不提？

邹鲁首先发言，他主张总统提名，副总统自由竞选。雷殷接着发言。他的主张跟邹鲁一样。王世杰根据民主理论说，总统、副总统都应提名。

甘乃光反驳，认为如果提名，必将造成一个人赛跑的形式，结果不跑也是第一。

于右任站起来表示，总统非提蒋总裁不可。当他说完下台时，一眼看到已经表示要竞选总统的居正，连忙说："这样，对不起我们的居大哥了！"就因为这句对不起，居正马上跑到发言台表示拥护蒋总裁当总统。

方觉慧、刘文岛、何浩若等纷纷响应邹鲁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是总统由蒋总裁担任是"天与人归"。副总统如果提名，一定造成国大代表选举混乱的重演，提名的当选不了，没有提名的却当选了，请问，到那时怎么办？

田尧山、潘公展、刘威炽、古正纲都坚决主张提名，他们的中心的理论是政党应有政党的常规，选举应循选举的规律，如不提名，一切全失。

张道藩认为提名不提名都有理由，不过应该注意技术问题。曹浩森更妙，他主张总统提一名，副总统提四名，到时候理论、事实都可兼顾了。

蒋提五条件，称庐山定稿

从十点讨论到十二点半，在毫无结论的形势下，蒋总裁以半小时的时间，宣读了他关于谁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的设想，他自己说是今年（一九四八）年初于庐山赏雪时就准备好腹稿的演说。

在这片演说里，他以最沉痛的心情分析了国内外有利于共产党阵营、不利于民主阵营的形势。说今日遭遇的敌人，是比当年日本还要凶毒的共产党。客观的环境，主观的需要，都应团结全国的力量，来打开这垂死的难关。如何团结？他指出最好由国民党推一位党外人士做总统候选人，以示大公。这个人应该具备下列五个条件：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思想、民主精神、且为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三、有决心及能力贯彻戡乱建国之大业，并完成三民主义之建设。

四、能保持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光荣传统。

五、对当前国际形势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

蒋的最后一句话是："国家未能统一，我绝不竞选总统。"

当蒋讲完话后，全场马山显得骚动不安。我和狄膺说："这不明明白白指的胡适吗？"狄一面点头一面答："一点不错。"

忽然间，彭学沛站起来说："我们要讨论。"蒋于是以沉重的语调宣布：

"下午三点半钟继续开会。"

多数仍拥蒋，强调为苍生

就在两个多钟头的空隙里，三百中央委员分成了两大阵营，各抒己见，各陈利弊。多数主张总统非蒋总裁莫属；但也有少数头脑清醒之士，如邵力子、王世杰、雷震、罗家伦、黄少谷、黄宇人等都赞成蒋总裁放弃竞选总统。因为老实说，中国当时的局面，确实要面目一新了。

到了三点半，继续开会，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外，全是一片拥护蒋总裁出任总统之声。彭学沛、李文斋、王宠惠、刘文岛、雷殷、邹鲁、焦易堂、古正纲、黄季陆、张道藩、陈仪、唐式遵、钟天心等等，每个人都是发挥"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理论。

吴稚晖轻轻一句话，但很有力量："这不是了不得的事。"

大鼻子罗家伦不愧书生本色，敢想就敢说。他说："听到总裁不参加总统竞选的表示，有如晴天霹雳。这一霹雳，可以打散国际间多少云雾。不但在国内可以打开一个新局面，就是在国外也可以获得世人的喝彩。这不仅是政治上最高道德的表现，也是政治上最好的战略。我们放眼一看国家的将来，在体察一下国际环境，决不能拿上海投机市场可能的波动，来影响我们伟大的政策。"

罗家伦到底不愧是"五四"宣言的执笔者，出口成章，易于流俗，洋洋洒洒，有理有据，他意犹未尽，正要继续说下去时，邹鲁忽出怪招，提议全体起立拥护总裁竞选总统。一阵纷乱的椅子声响，除了吴稚晖、罗家伦、邵力子、黄宇人、雷震和蒋夫人外，统统站起来了。

直到天快黑的时候，仍是茫茫无所适从。这一下把蒋先生弄急了，以一种责骂的口吻指出："大家都是具有一种苟且的心理，企图维护既得利益，持盈保泰。只望在小圈圈里马马虎虎地混下去，难怪人家看不起，实在因为自己不成器。"

但不成器有怎么样呢？

难怪看不起，实在不成器

经过五日的中常会小辩论，六日的中全会大辩论，不成器还是不成器。

尤其可笑的是一位三民主义青年团出身的中央委员，在六日的全会中说："假使总裁不竞选总统，很多同志都要自杀。"妙！这比绝食还要进步。

六日深夜，京沪各报都收到了美联社下面一则电报，作为蒋主席此项表态的点缀，也是对国民党不成器的讽刺：

"（美联社六日纽约电）《纽约时报》与《前锋论坛报》对于蒋主席万一坚决不竞选总统，

而胡适博士可能出任中国之新总统一节颇有良好之批评。胡适在华府极为人所推崇，其在国内亦因学问渊博、热心爱国及熟知国际大事而为士林所尊敬。如果当选为中国之总统，则中国将获得其最优良之领袖人才。又《纽约前锋论坛报》称选举胡适为总统，则可能使南京政府获得人民之支持，此赢得战争之所必须者也。”

国民党平时是四分五裂的，各派系一向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无所不用其极，独独这次却用一个腔调发言。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桂系”，于右任等元老派及他影响下的西北籍中央委员，支持程潜的以湖南籍黄埔军人为主体的黄埔系，三青团系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领导的 CC 系，一致反对提名胡适。

CC 大将张道藩的发言劝进，声泪俱下，堪称唱做俱佳。而我从蒋介石的表情看出，听了似乎很舒服，曾频频点头。按张道藩的说法，蒋如果不当总统，天都会塌下来。他大声疾呼的话，我至今能记得很清楚：

“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坚决服从总裁的指示，只有这件事情不能服从。因为这不是总裁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我越听越不是味道，越替胡适博士着急，我认为在这件事中，不仅胡适博士受了骗，我也受了骗。举目向会场上一扫，人人都是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只有桂系的程思远坐在一个角落里很得意地跟我眨眨眼睛。

经过会内会外整整七十二小时的斗争，蒋先生于四月六日下午散会前，以“抚顺舆情”的姿态，宣布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提名，同意参加总统竞选。一幕闹剧，到此闭幕。

我当时的思想到确实唯愿蒋介石能够心口如一，不当总统。恐怕失信于胡适博士，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站在维护国民党政权的立场，希望由胡适出来，实行民主政治，使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江山，在美国人的同情支持下，能够不垮。我从司徒雷登方面得到的消息，美国寄希望于胡适。但在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只晓得为自己打小算盘的情况下，任何高尚理想，善良愿望，都将变成水中月、镜中花。

闹剧已闭幕，心照而不宣

四月六日深夜，我带沮丧的心情，问陶希圣：“怎么去向胡适之先生解释呢？”陶希圣说：“算了，越解释越不好，反正这两天参加中央全会的人当中，也不乏他的好朋友在。他们会把情况告诉他的。你以后见着他，不妨装着根本没有这桩事的样子。”

我想，不愧老谋深算，真是高明！四月七日早上，我在国民大会堂见到胡适时，他显然已得到消息，当我和他打招呼时，他只是微微点一下头，就把步子加快走开了。我最初还愿意他可能怀疑是我对他恶作剧，尤其是想到与他密谈的那个黄昏，刚巧碰上了“愚人节”更为不安。后来一想，以博士的聪明睿智，他一定会判断出真正恶作剧的是一群极端自私，眼光如豆，宁愿丢掉江山，也不肯放弃权位的国民党人。”

一九四八年五月底，胡适博士在北大红楼欢迎我率领的“首都记者团”时，一见面就亲切地呼“Mr.Lu!”称我为“老朋友”，说明他对我并无误会，相反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六十年代他在纽约和我一位老兄弟毛树清，还不无怀念地提到我第一个告诉他将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表现的相当潇洒，说明他对此事已经完全了然于心。但作为我来说，始终好像欠了他一笔人情债似地，不免感慨系之。一九九三年春与好友、热心推动文化事业的纺织工业家陈宏正约同彭明敏教授到台北南港胡适墓园凭吊，对着胡适像深深三鞠躬，表示衷心歉然。

我在坐牢时曾思索此事，蒋先生当时是真有意，还是假惺惺？结论是他的确希望由胡适

先生任总统，但智慧不足以坚持判断，而疑惑却造成曲从浅见。正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之言："智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

进一步推想，胡适如果真在一九四八年当上了中国第一任行宪总统，是不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呢？同样不能。即使美援滚滚而来，也无力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原因是整个国民党腐朽了，胡适博士即使贵为总统，仍得受制于国民党。除了书生受气之叹，仍然无能为力。既然如此，不当比当也许对博士的损害还要小些。

胡适的知己好友陈衡哲女士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号《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洛绮思的问题》这一小说，曾借哲学教授孔德白朗写给洛绮思的信表白心迹说："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而胡适博士这个只是被当作工具利用而未能当成总统的遭遇，对大师来说，只不过是天堂地狱的一个插曲罢了。

这件事对胡适博士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回首前尘，除在感情上欠了很多女人债外，涉及政治的债，主要是两桩，而且都是姓胡的，一桩事胡适，在一桩就是胡耀邦。在心灵深处打上忏悔的烙印。

影响半生命运的山西行

●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战国.齐策）

在我记者生涯中，早期影响命运较深的事件，除了和蒋介石的正面冲突外，就要数和阎锡山的交往。

本来是一次单纯的访问，后来因爲卷入了政治，所以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

记者爲了采访新闻与政治人物接触是必要的，但本身卷入政治就犯了大忌，而这应该说是自找的，咎由自取，不怪别人，也应忏侮。

阎锡山深懂舆论之重要

一九四八年春，国共内战的战火烧遍神州，国民党的败象，明眼人已经看到。而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先生却视而不见，这里面有思想方法的问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对方的力量；也有心态和气度的问题，只相信自己人，相信嫡系、学生、同乡…，不能包容所谓"杂牌部队"，排除异己，缺乏宽厚待人之量。最荒唐的是，蒋先生直接从首都南京指挥作战到前线军一级，有时甚至到师一级，完全脱离战场实际，焉得不打败仗。至于共产党的情报员直接打入国防部和胡宗南的心脏，另当别论。而对于利用特权侵占国家财富、人民血汗的"皇亲国戚"如孔、宋，即使案件曝光，也曲予呵护。在这种情况下，江山不丢则是怪事。

当时，中共军队已向国民党区域全线展开战略进攻，徐向前指挥的部队，正向山西太原进逼，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长时期"山西王"的地位，接受美国《时代》杂志的访问，表示他要与太原共存亡，并已准备好了氢化钾，决定一死殉职。

自从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不少省份就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军阀割据。但像阎伯川（阎锡山之号）先生这样卅七年政治地位始终不坠的，为民国以来唯一之人。他能与中华

民国同寿，正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阎锡山自满清王朝末年起，就在山西带兵。民国成立，他是首任山西督军。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阎才接受了来自南京的任命。惟仍在山西割据自雄，且有问鼎中原之意。直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的少数将领被蒋介石用金钱收买，阎、冯两氏的部队被蒋氏击败，他才到大连小息，后返山西，作长期经营之计。

抗日战争发生，中共在西北崛起。阎爲了自保，在拥护中央政府抗日决策前提下，采取联共路线，同意共产党人薄一波在山西组织“牺牲救国大同盟”，简称“牺盟会”，就是以阎为领导、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用共产党的办法对付国民党，也对付共产党，可以说是阎的一大发明。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扩大“解放区”的行动，阎首当其冲。他们开辟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解放区”的一些地盘，事实上就是从阎的手中挖去的。

到了徐向前率领中共军队向阎所管辖的区域进逼，且有一举拿下太原的意图，阎除了加强战备之外，注意到在舆论上寻求支持，这就是阎比一般军头高明的地方。他懂得笔杆子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并不亚于枪杆子。因此，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的访问，先在国际上制造了舆论以后，决定邀请南京（包括上海）新闻界组织记者团访问山西，在国内也为山西掀起一次舆论支援的高潮。至少在精神上使国内外人士都认识到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有效地高举反共的旗帜，并坚持到最后时刻。

很多人不了解，阎锡山为什么在所有的军阀被打倒以后，仍能屹立不摇？而在中共与国民党争天下时，太原又是唯一的共军屡攻不下的堡垒，主要是忽略了此人是一个对政治用心极深、富于谋略的人。而从阎懂得运用舆论这一点看来，蒋介石都不如他，只有毛泽东差堪一比。毛泽东有名言：”凡是推翻一个政权，必先制造舆论，必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同样的，要巩固一个政权，也非制造舆论不可。

阎邀请南京上海新闻界组织“首都记者团”访问山西，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即开始酝酿，四月，阎命其驻京办事处处长方闻（彦光）出面联系，我略有所闻。当时，我因头一年揭露孔宋贪污国家外汇案与国民党发生裂痕，决心求去，所以并未过问此事。

四月间突然有一天，方闻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相商，希望到我家中一谈。他来到大杨村我的住处时，说明阎先生邀请京沪新闻界人士组织“首都记者团”访问山西事，遇到了障碍，关键在于团长人选难产，比较有进步倾向的报纸如《新民报》、《大刚报》声称，如果《中央社》的人做团长，他们就不派人前往。而如果由其他报纸的代表做团长，《中央社》也会有意见。经他与新闻界的朋友商量，有人给他出点子，只有请我出来做团长，才能把左、中、右一齐捏拢来。我告诉他，我已决定离开《中央日报》准备到香港去办报，山西之行只有敬谢不敏了。他左劝右说，务必请我应邀前往，我不爲所动。

过了没有两天，方闻未经事先约定直接冲到南京新街口中央日报社我的办公室来，拿出了阎锡山给我的电报，除了奖饰有加外，最重要的一句为：“务请命驾来并一行。”当时《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以及和我同任副总编辑的朱沛人，都鼓励我走一趟。我还是犹豫不决。考虑的是，既然已经决定脱离《中央日报》，又何必再用《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名义出访呢？而李、朱却提出另一种说法：“不妨来个临去秋波，最后为《中央日报》做件好事。《中央日报》也是因为你的关系，才能成为首都记者团的领队。”面对他们这个既有敦促意味又能满足我虚荣心的说法，我被说服了。人人都有喜戴高帽子的心理趋向，陆大声又何能免俗。

记者团同行者共十三人，包括首都所有的报纸和中央社的代表。我请李蔚荣老弟爲总干事，负责处理一切事务。五月廿五、六日，我们一行由方闻陪同，先自南京赴上海，然后乘陈纳德航空公司（CAT）的包机直飞太原。在太原机场受到了阎锡山的秘书长梁敦厚（号化之）为首的山西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

城门口张贴“陆领队万岁”

当我们一群车队浩浩荡荡入城时，我发现太原城门口赫然贴着两幅标语，左面是“欢迎首都记者团!”右面是“陆领队万岁!”当时觉得太滑稽了，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冷汗直冒的滋味，自然联想到祖母教导我们孙辈时多次提及的“折福”。一个未满二十九岁的青年人竟玩起“万岁”来了。这除了“折福”，还能预示生命中的什么？后来，在监牢里想到这件事，回顾三十岁前走南闯北的岁月，最后落得坐监，与这一“折福”之旅多少有些因果关系。

当时，我告诉梁化之，欢迎标语这样写太不成话了。梁解释说，主要是下面错误地体会了阎主任（当时太原的官员和老百姓都这样称呼阎，阎的正式官衔是“太原绥靖主任”）要热烈地欢迎首都记者团的指示。一定马上通知换一幅，请我不要在意。

阎锡山欢迎记者团的宴会也是够隆重的，他的致辞，不但事先印好，而且上有签名。而我即席答辞，居然得心应“口”，阎带头鼓掌，也可以说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长的鼓掌。

通过五天的实地参观访问和阎本人两次每次连续五小时的夜谈，记者团的同仁对于阎所倡导的“兵农合一”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是以农立国，又是一个没有民主却有大量封建遗毒的国家，不但政治不上轨道，经济也非常落后，虽然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在中国始终没有呈现，很多老百姓长期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态。

尤其是中国打了十多年的内战和外仗，赖以决胜负的兵役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征征募募，此逃彼捕，你拉我顶，使《抓壮丁》成爲最大的讽刺剧。在重庆，只因蒋纬国偶然在一个破庙中看到被抓的准备送到前线抗日的壮丁，连叫化子都不如，飢病交迫地躺在地上等死。向他父亲谈了亲眼目睹的惨况，引起了老先生的关切，叫纬国领路前往视察，一见之下，勃然大怒，当场传呼兵役署长程泽润中将到来，训斥之后，并下令将这位全国兵役最高负责人枪毙。这里还有一插曲，程迷信命相之学，请人批了八字，断言过了当年生日即将大发；不料正在大摆宴席庆寿，时正十二点，忽报委员长急召前往，结果一命呜呼。当时在重庆传为趣闻。反映了兵役乃执政者之大难题。

而这一难题，阎锡山用兵农合一的政策予以解决。将土地问题和国防问题合并处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记者团的同仁看到了显示相当威武气概的阎的正规部队和民兵，特别是面色红润英姿挺发的女兵，都大赞“阎老西确实有一套”！加上夜谈中，阎不知疲倦地侃侃而谈他将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熔于一炉的理论与实践，不得不说出一个“服”字！

“兵农合一”的政策，是自一九三五年红军由陕侵晋时就开始实行，事实证明取得了成效。美国记者曾经发出一个问题，国民党在中国北方控制的城市，为什么太原是最后输给共产党的？而且，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通通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独有阎锡山一直撑到最后，尚以阁揆之身，将国民党带到台湾，成爲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位行政院长，创造了奇迹。也说明了阎锡山够资格是一位历史人物。

用共党一套，对付共产党

不过，在访问山西过程中，我们记者同仁也遇到不愉快的事。反映了阎锡山用共产党的一套来抵御共产党，在某些方面也落入共产党弄虚作假、掩盖眞相的窠臼。

那是在参观太原附近榆次县所遭遇的。当我们乘车到达榆次时，整个县城竟看不到一个人。记者团总干事李蔚荣因为是甘肃人，讲话跟山西相差不多，在一间草房里找到了一位老大爷。经探问才知道原来是县长怕老百姓说错了话，下令老百姓通通出城，不要和记者见面，这也是眞够荒唐的了。

回到太原，我就代表全团向省府秘书长、负责接待我们的梁化之先生提出了抗议说："既然请我们来访问，为什么又用『空室清野』的办法对待记者团？"梁先生当然是表示歉意，这个问题眞正得到解答，还是在和阎先生对话的时候。

阎非常幽默地说："我们有些干部学共产党还学得太差，没有毕业；他们的目的，本来是想隐瞒眞相，结果暴露了眞相。他们把你们记者小看了。各位是来自京沪见过大场面的记者，什么玩艺儿能骗过你们的眼睛呢？我已下命令，不准再故意隐瞒，有什么可瞒的，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面嘛！"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记者团和阎先生夜谈，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兵农合一"的政策爲中心，详细地探问了"兵农合一"执行的情况外，还讨论了山西面对共军的大包围，在阎看来，政治、经济、军事，什么是第一位的。阎提出了把握时代内在的因素问题，涉及到社会制度。他的结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因果，不能刻板地认定孰先孰后。

夜谈中，还讨论到马克思和黑格尔，有记者问他，赞成那一个的主张，阎表示两个的主张都不赞成。他说：心物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配合起来反映效用的。但声明他并不是二元论。

十小时对谈，阎观照世界

首都记者团同仁，通过与阎伯川先生十小时的对谈，得到一个共同印象，即他的视野并不限于山西，也不限于中国，而是观照世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与中华民国同寿的原因；他能一直挺到大陆完全变色、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而山西在他的长期治理下，到中共军队拿下太原前，竟能出现五百党政军等高级干部集体自杀，实现了与太原共存亡的誓言，而被称作"五百完人"的原因。

在太原和阎夜谈时，有的同业问到："共产党是否有留用的日人参加作战？"

阎的答覆是："在作战中时有发现的。"

太原绥靖公署郭参谋长插话补充，共军在兴县控制了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在围攻临汝和应县的共军中，也有日本、朝鲜和苏联人参加共军的炮兵作战，这是俘获的共军所供称的。

这使我想到访问太原前，考虑到徐永昌将军和阎先生的亲密关系，特走访求教。在谈及为什么阎能坚守太原创造奇迹时，徐指出因素之一为抗战胜利后，阎估计到内战必将发生，而山西位于共产党的卧榻之旁，故首当其冲，遂征得日本原驻太原军之参谋长山冈等同意，留下三千日军，这些日军都是很能打仗的，不过几年来返日的已不少，连山冈本人也已回去了。据徐的估计，太原顶多再守一年。而事情的发展果不出其所料。

当与阎先生夜谈时，我没向他求证这件事。第一，点出来会使他感到难堪，而新闻价值并不高。第二，这是中国人的不幸。爲了打内战，国共双方都把日本人留下来帮助中国人杀中国人。第三，整个夜谈的气氛是愉快的，阎当时已年近古稀，陪我们长谈五小时，殊属难能，不应破坏气氛。

夜谈在阎的住处进行，大家海阔天空地想到什么就问什么，阎的兴致也很高，做到有问必答。比如有一问是："阎先生对宗教的感想为何？"他是这样答的："我认为宗教用的是智者利人的目标，是仁的二等力量。按仁的力量说，无所为而为善，是头等功用，有所为而

为善，是二等功用。”我话已到口边：“您自我评价是仁者还是智者？”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自己已有答案，他是一位智者。一看表，夜已深，作爲领队，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告别山西了，为了创造一个更轻松的气氛，我根据事先了解的阎的夫人早已逝世，便跟他开玩笑说：“希望有一天当您再娶新夫人时，我们能吃您的喜酒！”此言一出，陪同谈话的官员马上现出一种非常紧张的表情，记者团里我的一位老友李景芳（抗战时在重庆办《商务日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办《建设日报》）用膀子推推我，示意我闯祸了。未料，经过短暂的沉默，阎竟大声宣布：“好！到时一定请你们各位来！”接着就爆出一阵热烈掌声。原来紧张的官员，也跟着笑了。谈话结束时阎站起来送客，拉着我的手说：“我几年来没有像今晚这样高兴了！希望能做个朋友！”

也正因为这一次的太原行，跟阎打下了一点友谊的基础，一年后果然依靠他的大力帮忙，把我从国民党的刺刀下救了出来（见第一次入狱——在广州坐国民党的牢）。

太原行，还有一个插曲。当梁化之以山西各界的名义在太原大饭店宴请记者团时，由一位酒量过人的女侍应生敬酒，她以挑战的姿态向记者团同仁表示，每位记者饮一杯，她饮两杯，结果我们十五人饮了十五杯，这位小姐连饮三十杯汾酒，面不改色，气不抽丝，其份量足有两瓶白兰地，这是我生平见到的酒量最好的女子。

可惜，事隔四十八年，把这位小姐的芳名忘了。

指控代表阎接收全云南

为什么说太原行影响半生命运呢？

由于太原行认识了阎伯川先生，彼此都留下较好的印象，加上我在广州坐牢，又蒙他出面缓颊，得以出狱。继后阎氏在蒋介石、李宗仁两氏政治斗争中，被拥组阁，承邀为助，因已决定赴日继续新闻事业，愿在海外与阎氏小作呼应，阎亦欣然表示支持。本来单纯的新闻事业，渗进了政治因素，不仅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因为与阎的交往，形成重大政治嫌疑，坐牢四年余，而且在一九五七年六月，被中共划为亲美反苏的极右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三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59）中一字第 1039 号刑事判决书还特别提到：“一九四九年蒋匪垮台前夕，被告（陆铿）又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奔赴日本，筹组东南亚经济通讯社，与徐水昌、董显光、朱世明等反动政客再度鼓吹『中间路线』，妄想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依靠美帝国主义势力，实现其资产阶级的政治野心。”

就因为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专机飞回昆明，被认为是代表阎锡山去接收云南的，这罪名已足够杀头。后来，头虽然未被杀掉，但人已成爲中共专政对象，前后冰封将近三十年，直至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到了香港，才算恢复自由。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决定赴东京办报前，先回家乡云南看看。当时的云南省主席是卢汉。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和他是在庐山认识的。我回昆明，他盛宴欢迎，因为阎伯川先生刚出任阁揆，卢汉对阎的情况完全不知。他知道我曾率首都记者团访问太原，加上云南报纸也刊出过我曾被内定为阎内阁发言人，所以整个宴会的话题就是阎伯川。卢对阎的情况问得很详细，反映了过去从无来往。

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国民党大特务沈醉在他所写《大陆生活三十年》一书第十五页中如下的一段把事实给弄错了！

当时（指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〇年春）唯一能够与之畅所欲言、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狱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他与我私交一向很好。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蒋

介石得知卢汉将要起义的情况时，叫与卢汉私交较深的阎锡山写信，劝卢汉不要起义，并派陆铿带着阎锡山的信，到昆明来作说客。不想陆铿到达昆明，卢汉不但不见，反而把他关进了监狱。

从我上面提到的卢汉宴我大谈阎锡山一段可以说明，阎、卢之间不但谈不到“私交较深”，甚至连普通交谊都谈不上；就蒋介石而言，对于阎、卢之间并无交往，也不会不清楚，断无可能叫阎锡山写信劝卢。不知沈醉的回忆，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会弄得完全与事实不符。

至于我本人从东京起程回昆明，确实准备把家眷自昆明接出以后转赴台湾一行，事先曾与徐永昌将军写信谈及在东京创业之事，徐覆信表示阎先生希望我赴台一晤，所以行箧中带有徐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另有一封日本社会党主席片山哲写给阎先生的信。还附有一张亲笔签名照，上款写“阎锡山阁下”，下款写“片山哲”。而信的内容主要是向阎锡山表示敬意，并希望中日加强合作，特别是片山哲个人希望得到阎的指教。

中共一贯把阎锡山看成顽固的反共代表人物，但他们对于阎与国民党其他的地方领导人的关系并不熟习，沈醉的这一说法，他们不可能判断其眞实性，但至少是一参考材料，何况我本人又实际提供了与阎锡山确有联系的证据。我从东京飞昆明随身带的一皮包文件、信件，下机时除自己毁掉朱世明致王世杰函外，全被中共没收。因此，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共军陈赓、宋任穷部进驻昆明，成立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派到监狱视察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处长阎村就当着其他被监禁的人的面指着我说：你虽有反对蒋介石的倾向，但却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跟阎锡山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就要看你怎么交代了。

新闻卷入政治沉痛教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至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其中包括两年多的单独监禁，最重大的嫌疑是与阎锡山的交往，过程曲折而复杂，把问题交代清楚，使共产党理清一个头绪，并相信我说的都是事实，很不容易。幸而共产党搞政治运动，包括“镇反”、“肃反”都是一阵风似的，避过了风头，也就保住了性命，但所受的折磨，能不能顶得住，也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做记者，尤其是政治记者，要想不问政治、与政治绝缘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如何在新闻和政治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新闻是新闻，政治是政治，不要混为一谈。应把二者区隔开来。避免因采访报导新闻而卷入政治。不要因为新闻采访，接触很多政治人物，结果陷进政治泥坑。

我五十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教训最深重的就是对新闻的兴趣太大，连带地对政治也很感兴趣，结果把一些原则掷诸脑后，任性而为，有时甚至得意忘形，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

具体的例子是阎锡山广州组阁时，有意让我做他的发言人，我何尝不沾沾自喜，觉得身价已相应抬高。还告诉李蔚荣老弟说：“最好是发表而不就。”这说明灵魂深处已经卷入政治，并未彻底清除那些肮脏的东西。以致在许家屯的问题上，抛头露面代许招待中外记者，向李鹏挑战，指李鹏爲“弱智儿童”，再度陷入政治泥沼，连我在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教的学生都感到不解。

他们问我：“老师，你教我们的时候，不是强调记者报导要客观，尤其要避免卷入政治吗？”我除了坦率地承认：“这正是我的问题。”还能说什么呢？

金陵王气黯然收·蒋介石于右任离京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宋·张昇（离亭燕）

揭发孔宋贪污案的旧账，由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绩，又被蒋先生周围的有心人将它重新翻出，作为挽救危局的思想警惕。一九四八年初夏，陶希圣明确在《中央日报》社务会议上板起面孔表示一定要“先中央、后日报”。而且说：“这是大局。”

正式登报脱离《中央日报》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我在南京《中央日报》报头旁与《中央日报》另一副总编辑朱沛人联名刊出广告，脱离《中央日报》，同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递了脱离国民党的报告。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宋宜山，以政校老大哥身份，劝我要慎重。我告诉他，这已是经过慎重考虑了的，义无反顾。

说起我们脱离南京《中央日报》，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当时，南京《中央日报》的编辑部是由政校同学掌握，李荆荪任总编辑，他原在福建国民党的一家报纸工作，后经保送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甲组第二期受训，毕业后留校作新闻系主任马星野老师的助教。再后随马老师到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任职，与政校七期新闻系毕业的凌遇选各拿一科，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马星野先生经国民党中央派为《中央日报》社长，李和凌就随马到南京轮流担任总编辑和总经理，。这也是马老师的新猷，叫“编经轮替”。

原来在杭州《正报》工作的政校六期新闻系毕业的朱沛人出任副总编辑，负责版面。我是在维也纳接到马老师电报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子欧洲经美国返国。三月开始人采访主任，五月随蒋老先生到东北采访，六月登牯岭，遇到了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的盛况。接着采访国共和谈，可谓意气风发。

一九四六年底制宪国大召开，和谈彻底破裂。国大秘书长洪兰友先生找我担任新闻组副组长，负责新闻发布，但主要工作仍在《中央日报》。内战大打起来以后，马歇尔宣布调处任务失败返美，中国的局势也就弄得不可收拾。特别是随着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内部的贪污腐化也愈行败象毕露。其中，以孔宋两豪门最为穷凶极恶，因而有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由《中央日报》揭露中央大员孔宋的空前贪污国家外汇案件。也就在这个时节，内战战场上国共两军优劣之势倒转了过来，正如毛泽东在其文章中说的，共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山东战场整师整军的被吃掉。而后方不论军事、政治都毫无革新迹象，相反却陷入病入膏肓的状态。

致力于《民生报》南京复刊

就在这时，国民党中央面对自己的败象不是加以正视、励精图治，而是讳疾忌医、粉饰太平。李、朱和我眼见国民党沉疴难起，乃决定一同脱离《中央日报》，与成舍我先生合作，使抗战前在南京发行的《民生报》在南京复刊，作为民众的喉舌，起一点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商量好一套具体规划。

我们三个的联名辞职信递出以后，马星野先生固然大吃一惊；陶希圣先生亦觉得情况不妙。他以《中央日报》总主笔见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身份致函我们三人，劝告打消辞意。记得他的信中有“站在一起，吾人方能生存”之句，还打出陈布雷先生的招牌，说布雷先生也希望我们“共体时艰”。而由我执笔以三人名义上陈、陶函中竟不假思索写出“站在一起，吾

人同归于尽”之句，引起陶的愤怒，陈的叹息，马老师也感到尴尬，当面批评我“过份”。

这件事也为以后荆荪在台经历十五年之冤狱埋下伏笔。其实，在我们三人中，李荆荪对国民党的感情是最为深厚的。对反共有一套哲学思想作基础，因此，国民党的大特务沈之岳一九六 0 年诬他为“匪谍”而下狱，确是一种政治大讽刺。

形势发展快过蒋毛估计

可惜，当时大陆形势的发展比蒋介石、毛泽东估计的都要快。老实说，也比成舍我先生和我们三人估计的都快。辽沈战役以后，任何人都看得出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到徐蚌会战，黄伯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被围，国军败局已定。成舍我先生在南京复刊《民生报》的计划被迫流产，朱沛人被请到北京《世界日报》任总编辑；我则留在南京任《世界日报》特派员；李荆荪也就与《中央日报》共命运了。

我为《世界日报》一直工作到北平围城。有两件事在记忆上永远无法磨灭。一是国民党政府发金圆券，那是王芸五先生的精心杰作。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前就拿到了公告，电话《世界日报》并建议发一号外。舍我先生后来给我一信解释未发号外的原因，盖当时北平居民对南京政府已彻底失望，他们考虑到只是如何应付共产党入城，什么金圆券、银圆圈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成舍我勤俭办报感人深

另一件事即成舍我先生勤俭办报、以身作则的作风，是这位报坛怪杰在新闻界广受敬重的原因之一。记得他请我担任《世界日报》驻南京特派员时，我向他提出的唯一条件，即要求有一部代步的车，因为南京实在太大，没有车要全面照顾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慨然答应，及时吩咐司机蒋宝华说：“从明天起，你这部车就归陆先生使用。”这是一部紫红色的美国 Hudson 牌新轿车，我用它来采访新闻，曾引起同业的注目与羡慕，因为它是当时南京新闻圈子里最豪华的一部车。殊不料有一天早上蒋宝华为我开车途经一个公共汽车站时，见到成舍我先生挤在人群中，我立刻叫司机把车停下来请成先生上车，问他：“何必自苦乃尔？”他答得很自然：“既然你采访需要车，当然，归你用，新闻第一嘛！”

世界上有几个这样的报老板？

关键一仗由打草包挂帅

国民党所谓的“徐蚌会战”、共产党所谓的“淮海战役”，是决定国民党在大陆生死存亡的一仗。但蒋总统偏偏选了人们公认的“大草包”刘峙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实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我问“元老报人”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这关系整个大局最重要的一仗，怎么会叫刘经扶（刘峙的号）去挂帅？于先生说：“蒋先生认为他是一个副将！唉！现在还讲这个东西！”

福变成祸，对此，中国历史不乏先例。任何朝代到了末世都会有些怪现象。后来，实际指挥徐州战役的杜聿明进军在其回忆文章中骂道，那根本不是打仗，只是坐以待毙，因为一切调动都得出自蒋总统本人。

提起“坐以待毙”，我的三弟陆锟有亲身经历，他在徐州会战前一年就加入了蒋纬国将军领导的装甲兵。在学兵连受训期满后，开赴徐州前线。据他说，在战壕里，只是坐了四十天，根本没有机会与共军交火。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去迎接南京空投下来的面粉及大饼。往往为抢一个大饼而发生严重伤亡。最后突围时，只落得全连瓦解的命运。他为共军逮捕，关在一个庙里，冒险翻墙逃出。

记得一九四九年四月，我从广州到南京采访，蒋纬国将军告诉我，他最抱歉的是我把弟

弟交给他，结果弄得下落不明。我说，整个形势如此，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就在两人通电话的当天下午，纬国传来了好消息，说从徐州前线回来了两个学兵，其中之一即我三弟陆锟。半小时后，纬国就亲自驾车把他送到我处。由于面部浮肿，几乎无法辨认。后来把他送到上海《新闻天地》社，由总经理黄棉龄兄安排就医，医生经过检查作出结论：人体所需的维他命他全部都缺乏。到底年轻，经过疗养、休息、补充营养，很快恢复了健康。我问他今后愿意干什么？读水？做事？他的答覆是：继续跟纬国将军。而今时历四十八载，当年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年迈的台湾荣民

于右任目睹总统府落幕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三日，我跟于右任先生由他的副官宋子才陪同，乘其林肯牌坐车由宁夏路一号官邸直奔大校场飞机场，当时，交通部次长马崇六在指挥最后一架专机撤离南京，这架飞机称为“国玺专机”，原来其主要任务是运送“中华民国国玺”。但见总统府印铸局长许静芝捧着一个黄绫子包的盒子，毕恭毕敬地向于右任先生和居正先生两位党国元老说：“这就是国玺。”居先生“呵！”了一声。于先生似乎还没有从刚刚路过总统府所见的一幕带给他的感伤中醒来，一脸沉痛的表情。

我后悔，当时不该提醒他老人家去注视那最不堪的一幕。我们车经过总统府时，我先看见周钟岳先生（曾任国府内政部长和考试院副院长的云南大老）书写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接着就看见老百姓正成群地从总统府里搬家具出来，我告诉他老人家说：您看！司机大概也为那惊人的一幕所震动而放慢了车行的速度，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第一天，就参加开国典礼的于右老，面对这种惊心动魄的场景，内心受到极大震动。这真是情何以堪？！难怪，许静芝向他介绍国玺时，他没有什么反应。他的思绪可能又飞到民国元年随同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一幕了。

而今国已不国，玺又何用？！

我陪于右老到机场不到十分钟，但见翁文灏先生也到了。指挥这架“国玺专机”的云南老乡马晋三老大哥还轻松地对我说：“这在你的记者生涯中，也是难逢难遇的一幕！”

飞机从南京飞上海时，于、居两位元老被请在第一排坐。其余的特别乘客除翁文灏、许静芝外，早在我记忆中消失，脑子里只留下几张模糊的愁眉不展的脸。

蒋介石告别南京的一天

一九八五年夏，我在北京重逢一九四九年四月追随于右任先生组成“立监委和平促进团”，准备赴北京促成国共最后的和平谈判的南京时代的国府立法委员、一九四九年后任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参事的李世军先生。

他非常怀念于右任先生。我说，于先生的遗憾之一是没有能促成使蒋先生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于先生在南京碰了一个大钉子，非常生气。他说，当天他在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一月二十一日晨，李世军得到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电话通知，说上午九时在黄埔路蒋的官邸有一重要会议，要他一定出席。他到达时已过九点。进入院子，看到陈立夫、张道藩、谷振纲正在院中踱步，面色阴沉。李走进客厅，已经坐满了人，于右任、李宗仁、张群、何应钦、王世杰、吴忠信等都在座，大约四十人左右。引人注目的是原来挂在墙上的油画都取了下来，背立墙边，说明蒋要再玩一次“下野”游戏。

李在吴铁城旁边坐下后，低声问吴：“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吴答：“等一会儿就知道了。”大约九点半钟，蒋披着黑色斗篷走了进来，与会人员起立，蒋点头回礼，请大家坐下。

然后宣布，他决定隐退，政务由李宗仁以代总统之身负责处理。蒋说："今天要离开这里了。以后的事情，都要拜托德邻（李宗仁的号）兄维持。希望大家以服从中正之心，来服从德邻先生，要把局面维持下去。"

蒋说完后，谷振纲首先站起来，流着眼泪说："总裁，你不能离开！"蒋听后满脸不高兴打断谷的话说："你不要讲了。"当时流泪的，还有张道藩、张其昀等。

蒋表示对战局通盘考虑

谷振纲坐下后，蒋介石站起来，怒容满面地表示，他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有时间休息，对战局做通盘考虑。他强调："我们的军对是好军队，我们的将领是好将领。我们所以打了败仗，就是由于党内的一些败类，暗中与共产党勾结，鼓吹什么和谈尤其是立法院和检察院的一些人，毫不考虑中央的困难。"听到蒋这些话后，黄宇人悄悄跟李世军说："听见了没有？我们都成了罪人了。"

蒋接着说："时局虽然不利。但不要紧，会有办法的。我离开这里后，会对全局作冷静地考虑。"说完后，问坐在他旁边的李宗仁有什么话要说，但见李抽动了一下嘴角，什么话也没有说。

跟着，田崑山站了起来，他指着李宗仁说："总裁走了。你代总统有什么旋乾转坤的办法？"蒋听到此话，马上严词阻止田再讲下去，重申："大家都要服从李代总统。"

这次会时间很短，蒋并没有当着大家宣布他的下野文告，那是事后交由中央社发表的。当他架着黑色斗篷步出时，于先生向他提出释放张、杨的要求，结果，自然是碰了大钉子。蒋此人从来是把战败的责任推给别人。这从他离开南京前的最后讲话也反映出来。按他的逻辑，张学良自是罪魁祸首，岂能随便释放。

广州封报捕人，大声几乎送命

- "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张季鸾
- "面的牢狱之灾，才能表现铮铮铁骨。"——成舍我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徐州附近的大战，以共产党大胜，国民党惨败而告终。

新闻记者消息总是比较灵通的，我在会战尚未结束时，便知道形势将急转直下，因此，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就离开南京飞到香港。

到香港后不久，遇到蒋介石总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元旦文告，表示不计个人进退，促成国内和平。共产党挟在战场上战胜的威势，提出了和谈八条廿四款，等于是叫国民党投降，国民党方面当然无法接受，但当时的情况，蒋介石总统很难继续执政下去，面对桂系白崇禧将军的压力，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好于同年一月廿一日宣布暂行隐退，副总统李宗仁同日发表文告，宣布就任代总统职。其时，国府行政院已迁到广州，李宗仁就职后命令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托病不理，李宗仁的第一炮就没有打响。不过，孙科到三月也干不下去了，于一九四九年"三八"妇女节之日宣布行政院总解职。接着，李宗仁提议由何应钦接长行政院，内阁正式迁到广州，立法院迁移到广州开会，国民党的中常会也在广州举行，广州出现自从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以来从未有的政治热。

赶政治热创办《天地新闻》

当时，我把广州的回光返照误认为还有一段时间的回旋余地，起码西南半壁再拖个一年不是没有可能。鉴于广州缺乏一份像样的报纸，便与好友又是云南同乡丁中江商量，决定在广州办一张独立的报纸，读者的报纸，讲讲老百姓的话，反映一下国民党的夕阳黄昏也好。作为一个记者更想抓住机会看一看政治大转折的压轴戏。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虽有心办报，但所能筹到的钱实在太少，在香港根本开不了张，不得已求其次只有广州。丁中江把昆明的房子卖了，我把老婆所有的一点积蓄和首饰也全部卖掉，作孤注之一掷。由于抗日战争末期十一个朋友一起在重庆创办了《新闻天地》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闻杂志。在广州就把“新闻天地”掉个头叫做《天地新闻》（日报），这多少也是从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汲取了一点灵感。

特别是我们感到有信心的是在南京、上海时结识的一批年轻朋友如李蔚荣、漆敬尧、梁元熹黄汉骅夫妇、沈宗琳、潘启元、梁小中等都愿意参加工作，阵容不弱。

就在开报的第一天，通过空军友人的帮助，将《新闻天地》出版的传单洒向羊城上空，气势倒也不凡。为报纸发行的第一个创举。

由于南京打下的基础，政治新闻经常拿独家，不仅同业侧目，国民党当局也非常伤脑筋，党政军联席会报中不时提出为什么中央头天决定的事，第二天《天地新闻》就会刊登出来？而且立场有问题。

原来是创刊之初，报纸就刊出我的联襟龚选舞写的一篇〈台湾难官百态〉的报导，而遭到国民党深深的不满。这篇描写国民党官员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狼狈景象的文章中，在文前丁中江加进了《桃花扇》的一段作为引子：

当年气焰掀天转，如今逃奔亦可怜。养文臣帷幄无谋，养武夫疆场不勇，到今日水剩山残。

国民党的大官看了勃然大怒，这篇文章成了一次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的议题。出席的人一致主张严惩，而表态最激烈的是ＣＣ系的人，他们认为陆铿出身中央政校竟然反党，无异叛徒。但是讨论的结果提到最高原则只是污蔑，还不能构成罪行。国民党内比较开明之士，基于对我们一帮年轻人比较爱护，便劝我们要注意，小心不要使顽固派抓到辫子。

《天地新闻》日报自三月二十日创刊以来，因为坚持独立、自由，主张民主、和平，在国民党看来，几乎无日无辫子可抓。到了四月廿一日，终于拖出了一根大辫子被国民党抓住。

三月下旬，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派出以邵力子为首包括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共五人为代表，以李俊龙等为顾问的“政治和平谈判代表团”。邵力子先生以年老体衰为理由，实际上他深知这一谈判时不会成功的，所以力辞团长一职，改推张治中为团长。而张治中多少存有幻想，欣然就任。四月一日代表团自南京飞北京，四月五日谈判刚开始，中共就向李宗仁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以十二日为限。李宗仁提出了“隔江而治”的对策，但毛泽东说，无论和战都要过江。

这时，留在南京的部份立监委员公推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率领和平促进团赴北平，团员中多北方人士，其中之一即后来在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常委的李世军，大概就在四月十三日，我接到于先生电话叫我马上从广州飞南京。到南京后，大家商量要找一个人应付新闻界。有人提议程沧波，对其才华颇为赞赏，程曾任监察院秘书长。于先生说另外想到一个人更合适些，因此召我前往随行。等我赶到南京后，原定十六日启行的，不料当天早晨接到于先生大女婿屈武的电话，告以当天将于黄绍竑一起携回张、邵已在北京与中共

方面达成协议的八条廿四款回南京。换句话说，那边谈判已经落幕了，这边还去“促进”什么呢？因此，于先生为首的这个团就作罢了。

点出共军渡江地点惹祸

就在此时，广州方面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共军队“横渡长江”。大家都知道，只要共军一渡江，广州的局面也就是时间问题了。所以，共军什么时候渡江，从什么地点渡江，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这时《天地新闻》日报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就请国防部二厅的一位叫唐龙的绘图员，他在报馆兼差做绘图工作，就他所能见到的军用地图绘制了一份长江防御图，图上由我根据新闻判断表明安徽荻港等几个地点为共军可能渡江的桥头堡，结果，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共军在长江发动全面攻击。果然荻港成为横渡长江的一个突破点。

这一下，国民党内一贯视《天地新闻》为眼中钉的顽固份子，如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高信之类的角色，就一口咬定，如果陆铿不是间谍，为什么《天地新闻》公布共匪渡江的地点，恰恰就是我方被突破防线的地方呢？于右任先生在我被捕后和中江说起这一点，非常气愤，他说，如果《天地新闻》真是匪报，它怎么会实现泄露渡江的地点呢？但在成见与偏见之下，当时在广州执掌大权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报就作出了封报、捕人的决定。按照内政部的有关规定，下令逮捕发行人和总编辑。《天地新闻》请了于右任先生做名誉董事长，由丁中江和我当老板，我们共同邀请了好友董品祯任总编辑，既然逮捕状上写明要逮捕的是发行人和总编辑，我是发行人自然由我和董去，中江是社长，逮捕状上没有提，就由他留在外面负责封报后的善后事宜并行营救。

封报前夕，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当时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奇怪的心理，一点也不畏惧。我还写了一篇告别读者的社论，重申我们办报是为了反映百姓的声音。我们的报纸虽然被封了，而民主自由和平建设的理想终于有一天会在神州大地实现。

最幼稚的是，明明知道官方要求封报了，竟不在具体事务作一些应变措施。比如收各国通讯社电报的收报机是通过中央社的好友周培敬的关系从中央社借用的。再比如排字房的铅字，是我和中江的一个朋友李诚毅替杜聿明在东北办报时留下来、经中江向李借来使用的。既然报纸是第二天要封闭了，头天晚上完全可以集中人力装箱运走，归还人家。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做，慌慌乱乱地忙着要把最后一张报纸编好，向读者告别。直等到第二天上午九时一队宪兵到光复中路的报社，将编辑部、经理部、电务室、排字房都贴上了封条，我才感到追悔莫及。追悔有什么用呢？只能说明自己冲动幼稚。

明知要封报竟不作应变

更幼稚的是当宪兵把握和董品祯押上车时，报馆的同事全围拢在报馆门口目送我们，我看到女记者黄汉骅在流眼泪，就大声说：“办报纸坐牢是很好的机运。大家不要难过，应该鼓掌欢送。”果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丁中江对我又好气又好笑，说了一句“老草（包）!”对照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名句，从容则是从容矣，于事何补？！

四月廿六日香港《星岛日报》发表了如下消息：

（本报广州廿八日特讯）广州警备司令部今日上午十时半指派特务连中尉排长冯锦晴，稽查梁某，及市警局某局员及警长等十四、五人，全副武装，并携带手令和封条，前往光复中路四十三号查封出版仅四十天之《天地新闻》日报社。并依照手令，将该报发行人陆铿、总编辑董品祯逮捕返部审讯。惟并未宣布情由，究竟为了什么？至今还不知道。

（又讯）监察院长于右任闻悉《天地新闻》日报被封、陆铿被捕，即以老记者资格，前往广州警备司令部探问。

同日，香港《大公报》也发表了《天地新闻》被封、陆铿被捕的消息。

中央社发布了《天地新闻》日报被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下令、广州警备司令叶肇查封的消息。

就在报纸被封、我和董品祯被捕的当天，我们住在广州市西关昌华东街的家也被特务机关全面搜查。我妻子杨惜珍、丁中江未婚妻刘蕙如以及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乐恕人的女朋友李玉兰都被搜身。乐恕人本人因患肺病住在伍汉慈疗养院，幸免受惊。

于右任探监惊动粤当局

我和董品祯被拉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后，经所长、一个广东人"验明正身"，问清楚了我就是陆铿，老董就是董品祯无误，叫一个看守兵把我们送入监房。监房大约有十五英尺宽、四十五英尺长，三面是砖墙、正面是木栅子。木栅子是用有臂膀粗的木条钉起来的，木条与木条的距离大约四英寸，刚刚可以容一个拳头伸进来。所有待审之囚都关在这里。抬头一看，绝大多数都是赤着膊的，大约有一两百人几乎是一个挤着一个或坐或站，极少数是靠着墙打盹的。屋小人多，又加上天气热，四月下旬的广州天气已经是够受的了。加上屙屎屙尿都在房内，所以臭气熏蒸。而国民党的监牢是有龙头制的，先进去的囚犯欺负后进去的囚犯，不仅剥削有理，而且动辄打骂。初楚入狱的人，照例是被指定坐在马桶旁边。幸而我入狱时口袋里带了一盒虎标万金油，只有把万金油不断从鼻孔部位擦，擦了半天时间，大概用量过多，鼻孔部位都被刺激破皮了，又辣又痛。老董可能因为他一向是位内向的人，被投入监中就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有如老僧入定，反映了他的修养。我告诉他，像这样，不要三天我一定会闷死。他劝我不要急躁，说："急躁是自己跟自己为难。"而且说朋友一定会设法营救的。并以张季鸾先生的话相勉："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我也想起了成舍我先生的话："面对牢狱之灾，才能表现铮铮铁骨。"心里感到好过一点。

关进去的当天，一口饭都没有吃，一则吃不下去，再就是牢饭看看就怕了，哪还敢下咽。

到了傍晚，忽然一个肩上挂中尉符号的宪兵排长走进监房喊我和老董出来，并叫我们跟着他走，原来是他奉命把我们带到他的排长室去住。我们正疑惑间，他说出了内情：自报他是广州警备司令部特务连中尉排长冯锦晴。告诉说："检察院余院长要来看你们。"使我一下子就解开了为什么特别关押之谜。监察院长探监，可能是国民政府开府以来还未有过的事。我跟老董说："我们大概是生逢末世了，所以才有此殊荣。"品祯警告我："不要胡说八道！"

于先生没来，丁中江来了。我告诉中江，叫他无论如何要阻止老人家（我们几个年轻后生都是这样称呼于右任的）千万不要来。现在已经搬到跟宪兵排长一起住，他可以放心了。

冯排长是个有血性的年轻人，和我们"同居"两三天后，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大大为我们抱不平。他很热诚地说，你们批评政府，还不是希望政府好。若说报上绘图公布了共军渡江的地点，共军恰恰就在那些地方渡江，只能说明你们判断准确。政府如果重视你们的报导，事先加派军力在报上指出的地方堵截，共军也许就过不来了。我听了冯排长的话，不无感慨，便和品祯说：我原来对国民党失望透了。现在听听小冯的议论，看来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中还不无优秀的人才。老董说道是希望所在。

我们被捕后，才知道是国民党各派一致主张抓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开会时有人主张从严惩办，而且说非如此不足以安定广州人心。高信在会上公开宣称："陆铿自认他走过大江大河，这一次非叫他在珠江翻船不可。"执行命令的叶肇，又是广东军阀中有名的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的绰号就叫"剃刀"。所以了解内情的人，非常为我们担心。

阎锡山出面得化险为夷

最初是于右任先生出面营救，但要考虑究竟找什么人说话才最有效，是薛岳，还是余汉谋？而且以他的身份为自己的小朋友的事表现得过于急切，也有所不便。恰在这时救星到了，于先生知道我曾率领“首都记者团”应阎锡山之邀访问过山西，与阎建立了一点友谊。在于先生竞选副总统时，还派我向阎先生联系过，为的是争取山西国大代表的选票。因而就转托阎先生营救。于先生了解，在李宗仁和蒋介石“政治斗争”中，蒋极力拉阎为同盟军，阎在四月中旬曾飞奉化晤蒋，两人基本上达成了谅解。尤其到了四月下旬，共军徐向前部攻占太原，阎锡山的外甥、太原绥靖公署兼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敦厚（化之）亲自召开党政军重要干部会议，同时亲自下令放火把包括自己在内的阎部精英烧死。另外有的精英像阎锡山的妹妹则个别自杀殉难，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太原五百完人殉难，使蒋先生对阎先生更增加几分敬意。所以就在四月下旬自奉化颁命令给陈立夫、吴铁城、何应钦、顾祝同、余汉谋、薛岳等，要他们一致拥护阎锡山组阁，这也正是为什么五月间李宗仁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结果以一票之差在立法院受挫的真正背景。而六月三日再咨文立法院请同意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获得几乎全体一致投票同意。

据于先生在我出狱后告诉我，余汉谋、薛岳等广东军政当局联袂去拜侯阎先生，表示拥戴之忱，临别时问：“阎先生还有什么吩咐。”阎说：“没有啥，只是我的一个小朋友被你们抓起来了。”薛岳问起姓名，阎说：“就是陆铿。我了解这个人，不会是共产党。我愿意和于先生一起担保他。”薛岳等当时表示回去查一查再报告阎先生。后来，他们再把我这个案子提到党政军联席会上，大家为了卖阎先生的面子，才准许请保侯讯。于了解到这次事情既是CC与广东地方联合发动的，就找了与CC有关系的我们云南乡长李宗黄出面保我出来。叮嘱我赶快走！

于是我当夜乘和平轮离开广州赴香港。我是五月中旬逃到香港的，到香港不久，就得到李蔚荣老弟的电话，说阎先生要我回广州一趟。我迟迟不敢行。到了六月初，阎先生原来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又来电话催，并说现在阎先生已决定是行政院长了，别人不会动你的。我才又回到广州。

见阎先生以后，他告诉我，他身边没有什么人了。梁化之等留在太原的干部已经殉难。在广州，主要是贾景德先生做秘书长，再就是卢学礼任参事，方闻管总务，连找一个新闻秘书做发言人都没有，想让我出任行政院新闻处长，做他的发言人。我说：“万万不可。我刚从警备部的监狱里放出来，如果任命我做你的发言人，对您不利，对我也不合适。而且我决定到东京去办报。如果报纸办成了，在海外跟您作个呼应岂不比做发言人要好。”阎先生一听，也有道理，就说：“那我支持你办报。发言人找谁呢？”我说：“发言人当然自己人最好。比如何敬之先生的发言人鲍静安是跟他多年的。但您身边的人多数牺牲了。我建议不妨请蒋先生给您推荐一个人，这样，他会更放心。”阎说，就这样办。不料，关于阎有意让我做发言人的事，贾景德接受一个记者访问时，提到有此可能。结果广州的报纸上在预报阎内阁的名单时，比如朱家骅任副院长、贾景德任秘书长、李汉魂任内政部长、叶公超任外交部长、杭立武任教育部长、关吉玉任财政部长、刘航琛任经济部长，最后提到“行政院长发言人可能由滇籍名记者陆铿担任”。就这么个预测性报导，一九五一年几乎成了我送命的书面证据。

真正有送命危险的是广州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对我以“匪谍”罪名严惩，而且提高到安定社会和民心的原则上。一九四九年六月的我从香港岛广州去看阎先生，方闻很亲切地告诉我说：唉呀！好险。那天余汉谋、薛岳、高信联袂来见阎先生，阎先生提到你的问题，在我送他们三位出门的时候，高信忍不住骂了一句：“丢那妈，又杀不成了！”

事隔四十多年，我和方闻先生在加州奥克兰重逢，彼此都不胜沧桑之感。

永怀于右任·草书慰国魂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有国殇！

——于右任

●陇树秦云怀伟绩，钟山蜀水忆徽音。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乐恕人悼于右老诗

在台湾台北市中心，敦化南路圆环，矗立着一座铜像，一位身着长袍马褂的美髯公，傲视天地。如今，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除非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可能不知道是哪位先贤的纪念像。而这位美髯公，却是当今在台湾海峡两岸同时受到尊敬的少数几位伟大人物之一的于右任先生。

书家大诗人·两岸同尊敬

了解两岸政治气候的人都知道，如今两岸对峙，又时甚至怒目相向。能够为两岸人民共同尊敬的人当然是孙中山先生。除了中山先生之外，恐怕就要数于右任先生了。从政治上说，于先生为国民党元老，追随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一九一二年国民政府组织之初，就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一九三 0 年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逝世。从文化上说，于先生更是在两岸同样受到尊敬的大书法家和诗人。

蒋经国先生生前，总统府办公室中高悬着于先生的一幅对联：“记利当记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而中国大陆陕西西安碑林，至今仍保存着于先生一九三六年捐出他所收藏、价值连城的三百多块古碑。

一九八六年五月，北京展出了于先生的书品二百六十一幅，四百一十三件。这是从右老的故乡陕西和四川、甘肃、宁夏、上海等地以及香港、南洋、美洲征集到的于氏墨迹真品，包括少年时代至病逝台湾前的王体楷书，北魏体书，尤其是草书，自成一种独特风格。笔走龙蛇，大气磅礴，雄健雅致，兼而有之。有的看来如飞龙在天；有的看来如处子玉立。不论台湾、大陆，不少人家高悬于氏墨宝，给人以满室生辉之感。我二十岁起得右老教诲，感谢

他老人家视若子侄。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胜利后在南京右老写给我的字，不是战乱中流失，就是毁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承订交半世纪以上好友丁中江将右老赐他的手书诗词草稿分我两页珍藏；并在台湾古董店搜求，得以新台币数万元购得一条幅。经在古董市场了解，于先生的字，越来越珍贵。香港苏富比去岁拍卖，一副对联卖到六万港元。

格局既恢宏·厚重又慈仁

于先生为人格局恢宏，仁慈厚重。对于求字的人，向来是来者不拒。而且，不问对方的身份、地位，有求必应。在南京，我曾当面问过右老："老人家每天写这么多字，难道不累？"答语是："写字是最好的运动，也是快乐的工作。人家求你的字，总是喜欢你的字，就写吧！"

南京流传一个于先生写字的笑话。有一次，于在家中宴客，醉后作书，一位客人以求得一幅，又再要一幅，也许是于先生感到此人贪得无厌，也许是醉后信笔而书，顺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弄得求书者大窘。当时，右老的秘书长王陆一先生在旁，风趣而机智地给对方出了一个主意，把这六个字拆下来装裱，便可安排成"小处不可随便"。令人拍案叫绝！

于先生在一九三六年秋编著的《标准草书》印本问世时，自序云："今者世界之大，人事之繁，国家建设之艰巨，生存竞争之剧烈，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广草书于天下，利制作而兴国运，此其时矣。"这说明先生对草书寄望之殷。

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特别去拜候于先生。称于先生为"老师"，于说："不敢！"毛说："你老人家在上海对我的教导，永不敢忘。尤其是关于书法的指导，一生受益。"原来，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雨丝暗示和胡汉民、张静江等二十四人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与胡汉民、叶楚伧、张静江等被派在上海执行部工作，指导江、浙、皖、赣四省党务。毛也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尊于右任为师。上海执行部成立时，于先生比推为工农部长，毛在于先生身边工作，还向于先生学习了草书，这就是他称于先生为老师的由来。

于先生认为，字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工具，应当敬意求情。当他知道我是在学习米芾、米南宫的米字时，教导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不断的练。他怎么会想到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期间，长期坐牢，不仅被剥夺了练字的权利连看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写字和写文章一样，多少受情绪的影响。我和于先生接触中发现了一个奥秘，即老人写字时，如果是漂亮小姐磨墨、牵纸，他的字会写的特别神采飞扬。好友乐恕人一九四八年底离南京飞广州前，带着女友、燕大毕业的高材生李玉兰去看右老，由来除赠恕人一幅字送行，还给玉兰写了：

> 浣溪沙·哈密西行机中作：
>
> 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美他雪水溉田畴。风雨忧愁成往事，山川憔悴几经秋，暮云收尽见芳洲。

天马行空势，于草称绝伦

于草看来真是潇洒绝伦，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于先生对于自己写的字一直要求很严。比如，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题赠的"世界春秋"四个字，就是连写了三幅，然后在三幅中挑出一幅交我带到美国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当我在纽约代表于先生把这幅字当面送给阿克曼（Carl W.Ackerman）院长时，他说，这是比什么都好的礼物，反映了中国元老记者对美国新闻教育的期许。

于先生不仅将书法当作艺术品对待，而且，借以抒发“为生民立命”的感情。记得一九四八年春行宪国大在南京举行时，于先生与孙科、李宗仁、程潜竞选副总统，却不能像他们三人有充足的竞选经费，可以送礼、送钱、甚至送金条，简称条子。当时，关心于先生者问先生以什么力量与人竞争？他幽默地答道：“我也有条子。”闻者大惊。因为人人知道他是穷出了名的。后来才知道他决定每位代表送一幅字，足足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写了一千多幅“为万世开太平”，送给国大代表。八一年，我在台北听说，于先生到台湾后仍然喜欢写这六个字，直到他去世大那年、一九六四年一月，还在台北为到访的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团团员每人写了一幅“为万世开太平”。这反映了于先生博大的胸怀。而他在日记中写下具有遗嘱性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遗歌，更成为两岸一致传诵的充分反映民族感情的伟大爱国乐章。

爱护众后辈，激励教诲深

回转头来追忆于右老对我们一班后辈的爱护、激励与教诲。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在重庆南温泉位于仙女洞的政校新闻事业专修班。请到右老以元老记者身份给我们讲课。我们事先翻读了关于老人的新闻史，知道他是清末著名革命报人。一九０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他在上海眼见革命党的《苏报》和《警钟报》被当局封闭，便到日本，一面考察新闻事业，一面向旅日华人筹款。更主要的是谒见了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得到极大的鼓励，并加入了同盟会。豫、晋、陕、甘四省协会，为他举行欢迎会，推他为会长，并筹集办报的钱。因而，一九０七年《神州日报》得以在上海诞生，继后因遭火灾，报社被焚。右老重整旗鼓，先后连创三报：《民呼》、《民吁》、《民立》。称为“三民”。

《神州日报》和“三民”四报，人才荟萃，正如于右老极为欣赏的一位诗人和书法家刘延涛先生的诗句所写：“文字都成开国史，精神放作自由光。”四报之编辑任何经理人如杨笃生、范鸿仙、王无生、谈善吾、王允中、李孟符、杨千里、戴季陶、陈非卿、吴霭林、朱少屏、景耀月、宋教仁、康心孚、马君武、邵力子、吕志伊、叶楚伧、章行严、陈英士、张季鸾、陆冠春、徐天复、刘文典、朱宗良、吴忠信、孙芷沅等，多为一时俊彦。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于先生的号召力。

于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谈起当年办报，眉飞色舞。根据他的经验，指出办报一定要为民请命。与学者密切联系，争取学者在言论上的支持。张季鸾先生后来办《大公报》，就注意到这一点，自称他是“《民立报》的学徒”。右老勉励我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我之所以立志毕生做记者，与右老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他在重庆向我们谈如何做记者时，已脱离报人生活三十年了，一旦回忆起记者生活，仍意兴盎然。他说：“新闻记者是时代最快活的人。世界如此之大，文物日新又新，人所不能到的地方，记者能到；人所不宜见的人物，记者能见；人所急于要知的情事，记者先知。”并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举例说，那一天，重庆绝大多数人都还在睡觉，而你们已在发“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号外了，那多高兴啊！勉励我们要以新闻事业为职志，忠诚服务社会，造福百姓。

待我以子侄，赐号名大声

我们几个年轻人自一九四０年起接近右老，老人一直待我们如子侄，除了基于元老记者对后备的关爱之情外，另有一个历史渊源，即丁中江的父亲、曾任同盟会东京支部长的丁石僧老伯是右老的革命战友，中江入新闻界就是右老介绍的。在重庆《国民公报》由记者而编辑而主笔，一度代理总编辑。右老为了表示他的欣慰，不仅对中江勉励有加，还写了一副对

联送给石僧老伯："苍松含晚翠，玉树发新枝。"

我的号大声是右老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为我证婚时取了作为礼物、连同一副对联送给我的。他说，按中国传统连名带姓的称呼不礼貌，而单名不好喊，特别是"铿……啊！铿"，新娘子喊还差不多，我这么长的胡子是在喊不下去。所以需要一个号，如刘备号玄德，关羽号云长。根据古语"实大声宏"，而做广播记者大声疾呼，加上名铿，铿铿有声，故以大声为号相赠。从那以后朋友即以大声呼我了。

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乐恕人是最早的广播记者，当时，整个中国的广播事业只有播音员，广播时照通讯社的稿子念，没有记者采访新闻，更不要说现场广播了。我们试做广播记者，曾得到右老的鼓励，他说："路总是要人去走的。"后来，我能出国做战地记者，还是右老让邵力子先生写信给中宣部长梁寒操推荐。等到从欧洲回到南京出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更是经常出入右老家中。记得美国原珠笔大王来中国推销圆珠笔，就是先求我把他带去见右老，请老人家试用圆珠笔，而我当时只从新闻角度考虑，帮了他的忙，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右老以圆珠笔写字的新闻及照片，实质上是受美商利用免费为其做广告，而不自觉。直至长期坐牢，反省前半生做的错事，才意识到这也是应该忏悔的一桩。

由于出入右老官邸已成家常便饭。有一天，一班新闻界朋友谈起右老的胡子，睡眠时不知究竟放在被子外面、还是里面。我为了好奇，竟荒唐地到宁夏路一号，推门而入，当时右老正准备入睡，问有什么急事，我乃直告是探美髯之谜，老人大笑，指着装在袋口有松紧的一个绸质袋子里的胡子说："啰！这不是在被子外面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呀！"

另一件事，反映了老人对我们的鼓励有加。

在广州办《天地新闻》日报时，有一天中江和我邀请右老到我们住处小坐，同时约了陈芷町先生和高剑父先生陪右老聊天。高是岭南派大师，谈书论画之余，老人建议高、陈两位何不即席挥毫，芷町先生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幅竹子，剑父先生便补上兰花和奇石，右老赞赏之余，提笔就以我二人的名字嵌入题词，变成了三合一的杰作：

竹有节，兰有香，大声、中江两克当。

可惜这幅名作，在我被广州警备司令部逮捕后，整个住处被抄，就不知下落了。

竞选副总统带来不开心

一九四八年春右老决定竞选副总统，命我做他的发言人。当时我就动脑筋"制造舆论"，倡言总统是武人，副总统应是文人；总统是南方人，副总统应是北方人；这样才能平衡，而有利团结。蒋先生最初表示可自由竞选，后决定支持孙科，劝程潜、李宗仁退选，被拒绝。遂发动核心派系包括情治方面一律支持孙科。并致电阎锡山和傅作义将山西和绥远的票统归孙科。阎原是允诺支持于先生的，后来让国大代表山西代表团团长梁化之告诉我转报右老，情非得已，请予原谅。

于先生非常生气，但因接触的北方国代都向他表态支持，仍认为有望；开票结果第一轮即落选，生气之余，约着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女士和我（包括随侍的宋子才副官）乘车同游明孝陵。于先生对蒋先生发动党、政、军、特力量支持孙科表示了不满。邵先生还在《民立报》时就追随过于先生，肝胆相照，他从整个大局看，指出国民党天下已经动摇，于先生没选到副总统也许是"塞翁失马"。于先生听后，抬头仰望蓝天白云，咏诵了他一九0四年写的拜孝陵诗："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重又抒发了四十四年前的感慨。

要求释放张杨，蒋推给德邻

果然，不出邵先生所料，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第一届国民大会选出的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在南京正式就职，五月九日国府即公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到当年十一月底，国军就在徐蚌会战（中共称为淮海会战）中大败。导致蒋先生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廿二日华北统领军事的总司令傅作义就在北平与共方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

一月廿一日上午，于先生在蒋先生宣布引退后，向他建议释放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杨虎城。结果，蒋向右老说："你去跟德邻（李宗仁号）讲吧！"于先生为此气得要命。我当时正在宁夏路一号于的官邸等消息，但见老人一回到家，进入起坐室就"嗨、嗨、嗨……"地从喉咙里发出一种低沉的吼声，胡子跟着有部分掀动。对我来说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吹胡子"。但听他老人家说："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还不……。"最后两个字完全听不清楚。是觉醒、还是觉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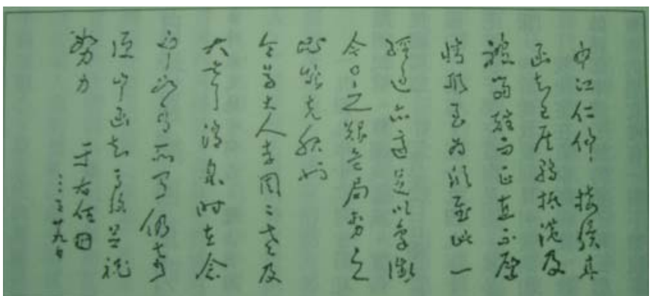
我定定地看着老人，他招手让我坐下，直到他把整个身子放进沙发，才告诉我蒋先生引退的决定，以及他碰钉子的情形。一九九三年秋，在旧金山和张少帅谈天，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于先生向蒋先生要求放他和杨虎城将军的事？他说：没有。我回述了这一段故事，他的反应是："难得于大胡子有这份心。"

右老哭大声，大声献余生

一九四九年我和丁中江、董品祯合作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日报，于先生基于爱护后辈，允任名誉董事长。不料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为了广州安定，对于持独立立场之报纸，必欲去之而甘心。加之陆铿有反孔、宋，并与国民党作对之前科，故作出封报捕人决定。我以发行人身份与总编辑董品祯同时被捕下狱。（详见前章〈广州坐国民党的牢〉）经于先生和阎伯川先生的"关说"，得以取保释放，辗转赴香港、昆明、东京，从此与于先生别。

好友丁中江在于先生逝世后撰〈山高树大于右任〉纪念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追忆的：

民国四十年春，我由泰国和越南遄返台北探视亲友，抵台当天即赴青田街谒右老，老人家一见我面，还来不及握手，就大哭起来，口中喃喃说："大声（陆铿号）大声，我想念他。"因为若干年来，我总是和陆铿一同谒见老人，这次在万劫之后，只见我一人，而陆铿却陷身昆明，老人家见到我，勾起了对陆铿的想念，遂掩面痛哭。我自昆明逃出，虽受人所不能忍耐之苦，却从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可是在仁慈的老人家面前，却像一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回到亲人面前，有说不出的辛酸，因此也大哭一场。后来我返香港，去向老人家辞行时，右老很高兴的对我说："我有件宝贝送给你。"一边说一边在书桌上找，找了一会找出一份报纸，原来是一份《天地新闻》日报，正是查封那一天的。他老人家把报纸摊开，在上面写着："廿四斤行李中留此宝物，以赠中江，念大声不已。"写到末一句，又掷笔大哭。


▲于右任覆丁中江函，提及「大聲消息時在念中」。

当我一九七八年由大陆抵香港，读到这一段记述时，深深体认到这不只是长辈对晚辈关

爱之情的流露，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元老记者，对一个以记者为终生职志的后生在新闻事业使命感上的深切期许。对右老最好的报答即把余生献给从一九0七年、右老廿九岁起即献身的伟大的新闻事业，至死不渝！

自投罗网回昆明，不要收条坐大牢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罗隐（筹笔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东京新闻街外国记者俱乐部看晚报，得见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声明脱离国民党、靠拢共产党，宣布“起义”易帜的消息。也就是说已把原来云南挂的国民党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换下来，改挂共产党制定的国旗——“五星红旗”。使云南从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一夜之间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我马上联想到我的老婆孩子都在云南昆明，我必须把他们接出来。当晚给在昆明开业行牙医的妻子杨惜珍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要回昆明接她和孩子出来。

我决定在东京办报后，除向麦克阿瑟总部申请到《天地新闻》日报出版的许可证之外，还向麦帅总部申请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可望、可信、南达）的东京长期居留证。当我决定离日返昆时，东京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劝我不要冒险的。因为那时大家对共产党都不了解。记得名作家谢冰心和她的先生吴文藻就问过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如何，当时我也说不清。

记得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就是在东京有一次和朱世明将军、董显光先生三人作竟夜之谈。朱说，听代表团的人讲我会看相。请我当晚就替他和 Hollington 看看。董先生大乐，鼓掌赞成。我告诉他们是一九四五年在维也纳等候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采访签证，闲居无聊，跟一个奥国人学的，没有甚么道理，只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和统计。而且中国有句话“相随心转”，说明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影响一个人的相。我说，根据我看，朱将军的运气可能会走下坡，因为他即使欢笑中也带有忧思。而董先生却会走上坡，因为他充满了喜乐与信心。朱问我你自己呢？我说：“所有看我相的人都说我会坐牢，而且是为女人坐牢。”他们哈哈大笑。

一九八六年李嘉和胡菊人及我三人在香港聊天，李嘉告诉菊人说：“大声从东京回昆明被老共关起来以后，在东京的朋友都说：『陆大声看相看准了他会为女人坐牢，但他忘了他的老婆也是女人。』结果回去接家眷就被抓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赵浩生一起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东京办事处去买飞香港的飞机票，我是经香港返昆明，赵浩生则是想到香港会友。但当时机票很紧，只有一张十五号飞港的，我请浩生让我先走。票买好后，电话告诉朱世明将军，他说他有一封重要的信托我带到台湾面交给王雪艇（世杰）先生。我预定的行程是到昆明停一晚，接了家眷，就返回香港转飞台湾。当夜朱世明到外籍记者俱乐部看我，他透露了他对整个局势的悲观，认为国府的局面越来越困难，而派系人事的倾轧却越来越厉害，他深为忧虑。我说在东京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国府的圈子越来越小，东京代表团团长这个位子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尤其是原来有过留日经历的军人。他告诉我，汤恩伯退出上海转到香港后，就想来日本，结果麦克阿瑟很妙，他说汤恩伯是常败将军，不准来。

牢狱之灾似已命中注定

朱世明告辞时已凌晨三时，正因为睡得太晚了，竟误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五点钟派来接我赴机场的班车。也是牢狱之灾命中注定摆脱不了，偏偏在近六点时我会从梦中惊醒，一看表不得了，已接近飞机起飞的时间了。打电话问接线生航空公司的班车来接我没有？她说来过快一小时了，打电话给我，铃响了好几分钟没有人接，她以为我提前走了。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叫赵浩生起来送我，他把他的道奇车开到每小时一百英哩的速度，天还未大亮，在东京街头疾驰。等赶到机场上飞机的门已快关上了。差一分钟我十二月十五号就到不了香港，而下班机是廿二日才开。而我是廿一日赶到昆明坐牢的，事情巧不巧？

还有更巧的在后面。抵达香港后，到航空公司购买飞昆明机票，才知香港到昆明的航线已停了好几天了。我问，现在要去昆明有什么办法？答覆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预缴五十万港元的保证金；二是要有当地政府首长批准飞机可自由来去的电报。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昆明是突变，使很多做生意的商人措手不及，他们都急于回昆一行，包机的钱倒有，不过如能有卢汉同意的电报更为妥贴，但找不出一个人出面联系。

第一个办法我是没门。不要说五十万港元，五万甚至五千我也拿不出。第二个办法我倒可以试试。说来我和卢汉这位原来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当时的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多少有点交情。

一九四六年，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教授在昆明先后被刺案发生，卢汉被蒋老先生召到庐山，不知是祸是福。他本是被派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驻守那里的。到牯岭后知道我任南京中央日报庐山版主任，正在山上，便以同乡的身份把我找去，和他谈谈，想摸摸政治行情。我告诉他李闻案蒋已知道不是地方势力做的，而是陈诚系统的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章下面的特务头子张振国（八十年代台湾歌星张俐敏之父）指挥人干的。原来传说是曾任龙云副官长的杨立德指使，目的不过是想嫁祸。但还不好明白宣布案情已明，故特派顾祝同以陆军总司令的身份去昆明彻查一番。这一查，只会对卢汉有利，为了安定地方民心，至少表面上对卢要重用。我这一分析，后来被事实证实，卢汉印象很深。加上一九四九年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他对阎的个性、作风、政治主张完全不知，所以乘我九月回昆之便在他翠湖青莲街公馆设宴欢迎，我为主客，好友丁中江和昆明各新闻单位负责人作陪。晚宴自始至终都是谈阎锡山。记得我和卢汉道别时，他特别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我们是同乡人，今后要多联系，彼此心照!”这一照，就让我颇有把握地发了一通电报给他，告诉他我已自东京飞抵香港，即将乘机回昆接眷，请他批准。

我给卢汉的电报是十二月十七日自香港发出的，十八日就接到他的覆电，原文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香港（电报代号）陆大声先生：来电敬悉。匪廿六军、第八军奉蒋匪命，正在宜良呈贡集结，向昆明进攻。我九十三、七十四、八十九三军汇合地方革命武力，正聚歼中，一二日内即可肃清，届时再告来机日期。卢永衡。

拜望张群看其禾秆藏珠

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就通知几天来和我联系的云南商人，大家都额手称庆。决定他们出钱我出名，包一架飞机回昆明。其原因，事起仓卒，很多商人在昆的货包括矿产、鸦片极待运出。

回昆明前我特别看候了在香港当寓公的原总统府政务局长陈芷町先生，由于同时创办《新闻天地》的邱楠是他的小舅子，我们一班朋友都跟着邱楠叫他姐夫，告诉他我要回昆明接家眷。他说：“张岳公刚刚从昆明出来，没有几天，我们去看看他吧!”于是和陈芷町一起到了铜锣湾。

张群先生和他夫人及家里人正在吃晚饭。一张方桌三面放的椅子，一面是利用一张床。对于张府上这种因陋就简的情况，我感到惊异：心想，他到底做过行政院长又担任过方面大员呵！为什么情况如此寒伧，可见国民党也有清官。

我们的谈话主题集中在昆明之变上。他说他是十二月九日自成都与第八军军长李弥、廿六军军长余程万，和卢汉的小舅子新编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等一起飞到昆明的。卢汉派裴存藩、杨适生等到飞机场迎接，仍和过去到昆明一样招待在卢汉的新公馆。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沈延世（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来到张下榻之处，说是接到卢主席通知因张长官来昆，所以今天晚上开会，而张完全不知此事，但并未认为是多大的问题。他让沈按着开会通知到卢汉的老公馆去等开会。过了约一小时进来一个军官（后来证实是卢汉的警卫营长龙云青）向他敬礼报告，说是奉命来保护长官的安全，请不要随便走动。他才晓得出问题了。他提出要去见卢汉，龙营长说："卢主席已上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张通过思考，当夜写一信给卢汉，提出要乘原机离开。第二天，杨文清、杨适生代表卢汉来看他，通知说，军机已经不能启动了，安排了环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客机送他飞越南转香港。

陈芷町插了几句话，他说："卢汉因为岳公保了他的命，所以到要紧关头还能表现一点黄天霸窦尔敦的江湖义气。"我说："香港报纸上对岳公脱险议论纷纷，听说北京早已宣布岳公是战犯，故对卢汉此举非常不满，认为他要两面派。（后来还有一传说即中共曾有意以张群换张学良）另外盛传岳公眉毛里有颗红痣，根据相法，这是大贵之相，叫做"禾秆藏珠"，主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我今天来也是想看看这颗痣的。张岳军很幽默，一面摸摸他的右眉，一面说："小小的一颗痣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引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我告诉张岳公我准备回昆明接家眷，以他看，可会发生危险？张群知道我和卢汉也比较熟，加之我是云南人，此行只是接家眷，第一天到第二天走，他说照他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陈芷町听了张群的判断后，开了一个颇有风趣的玩笑，他说："大声呀！你不要照搬岳公的经验呵！你的眉毛里并没有岳公那样的痣。"又引起一阵欢笑。

看了张群先生的第二天，我去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由于《大公报》已左转，老费在港被目为"左派"代表人物。不过因为我们已是很熟的朋友，几乎做到无话不谈，因此他很诚恳地劝我不要冒险。他说："老弟，你不要自视艺高人胆大，但现将面对的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根本不同的。你如果冒险前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的好友、蒋介石专机驾驶长衣复恩当时在港，也劝我不要冒险。

但我过于自信，认为回去是接家眷，有什么可怕的。况且，卢汉给了同意飞昆的覆电，更有所恃而无恐。决定联合同乡商人集体包机，到处打听哪些同乡愿意参加。

极为偶然专机飞往昆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预定当天到航空公司去签约包机回昆。一大早我还躺在床上看报，《星岛日报》送到了。头条消息是"昆明城郊混战"。根据外电报导，蒋介石派出的中央军已逼近昆明城，且占领了飞机场，卢汉的地方部队拼力抵抗，双方正在大斯杀。

一个保山的小老乡做鸦片生意的张维和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老乡，老乡，今天就有一架飞机飞昆明。你要走，可以马上走。"我问他是那里的飞机，他说是龙泽汇（卢汉的内弟，新编第九十三军军长）等为了把云南的鸦片烟运出来而包的。共产党的军队一接管就运不出来了。于是我毫不考虑地喊着跟我住在一起的丁中江的三弟丁燕石（懋先）说："走，你陪我去赶飞机。"当时，中江尚未逃出昆明，他太太刘蕙如和他弟弟燕石还带着一个十一岁的小弟弟、后来已是台湾大大有名的替中华民国打官司的丁懋松律师，住在我们共同的一位商人朋友孙子顺的公司里。我拎着一个皮包、燕石为我抱着一件呢大衣，就这样直奔飞机

场。记得在天星码头赶轮渡时，我们赶到时轮渡已离开趸船，我打开一扇小门，猛地跳上轮渡，燕石也跟着跳了上来。到达九龙尖沙咀时，为了抢乘出租汽车，我们又演出了短跑，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像发疯一样地要抢搭这班前路不明的飞机。到了启德机场，像东京一样，飞机马上要发动了。我再晚一班轮渡，可能就会错开。但见飞机上有两个商人模样的人，后来才知道一个叫蔡文翔，一个叫喻君陶，是贵州籍的鸦片烟商。环亚航空公司的英籍经理因为我连一封介绍信都没有，不同意我上机。我拿出《星岛日报》驻东京特派员的名片和他交涉，而当时星岛是香港最权威的中文报纸，一听我解释是回昆明接家眷，保证家眷接出后，即行付款给他，又拿出卢汉给我的回电证明，他也就勉强同意了。当时，我还向燕石夸耀说：“你看，陆大哥的本事大不大？”燕石连说：“大、大、大!”这一大，就换来了先后长达廿二年的牢狱之灾。

飞机从香港开出，风和日丽，没有一点颠簸。整个飞机只有八个人，计英国籍经理、美国籍正副驾驶、菲律宾籍机械士和无线电员，再就是两个鸦片烟商和我这个新闻记者。到了昆明上空时，我听英国籍经理向驾驶员问：“Have you got anyconnection？”回说：“No!”飞机只好降低高度在昆明上空转了一圈，在飞机上已模糊看到五华山顶的五星红旗了。我再一次听到“与地面联络上了吗？”“没有!”的对话。英国籍经理和我并排坐在一起，问我：“陆先生，你看怎么办，与机场的电台联络不上。”我很自信告诉他：“不怕，降落吧！如果下面是蒋介石派来的部队，他们的司令，我认识。如果下面是已投降共产党的原省长的部队，我这里有他的电报。”英国籍经理说：“好吧，那我们试试运气。”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降落了。

降落到跑道上以后，才看到有军人拿着小红旗指挥飞机滑行，并引导飞机沿着一条两边排满汽油桶的通道行进，直到停机坪为止。事后我才知道是因为卢汉易帜后，空军一部分飞行员在昆明航空站站长蒋绍禹带头用计下，几十人一下开着飞机逃跑了。龙泽汇才下令用汽油桶栏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跑道，任何飞机如不顺从指挥滑动，再也跑不走了。

机门打开方知大事不好

机门打开，十几个武装士兵手提轻机关枪高叫“不许动!”两个商人一下吓得瘫在座椅上，英国籍经理连问两句：“What's the matter？”机组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一脸惶惑的样子，用英语骂了一句粗话。我一看手提机枪对着自己，也慌了，还故示镇静问：“你们是那个部队的？”对方回答“廿六军的!”我再定睛一看，所有兵士的帽子上的帽徽全没有了，既然投降了共产党，怎么还允许戴青天白日帽徽呢？于是恍然大悟，便故作神气地高声说：“请你们报告卢主席，就说‘陆铿来了!’”

大约二十分钟不到，原来任卢汉随从参谋的杨肇骧（后来才得知他在“起义”后已被任命为昆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开着一辆吉普车到了机场。他一见我就说：“老兄，怎么选这个时候来？主席给你电报不是说另告来机日期吗？”我说：“今天有飞机我今天就来了。”在杨肇骧跟负责机场守卫邹副师长低声讲话时，我想到朱世明托我带给王世杰的信，免得落到别人手中对不起朋友，便临时把它连同我在飞机上为日本《每日新闻》写的一篇半成品文章一起撕碎，把信放进嘴里嚼碎。接着邹副师长就命令我们一行八人下机，叫我们坐进一个中型吉普车中去，特别交代一声：“陆先生，你坐驾驶室。”我问：“我的皮包呢？”他说：“放心，到山上会还给你的!”没有料到这个皮包四年多以后才再见，只有一只手表，一个美国银行存摺，一小包洗面用具还在。而它里面所有的文件、照片，都作为“罪证”放进了我的档案。直到这时才知道我们将被押解到五华山卢汉大本营去。但我仍自信十足。

到了五华山上，第一个遇到的竟是我的堂姐夫、原来做过龙云近卫团团长、后出任十八师师长到东北打过内战的许义浚，他表现得很紧张：“你、你、你怎么这个时候会来？”我知道他一贯胆子小，就说：“我是来接惜珍的，你不要管了。”后来我被投入监狱，才知他已

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被卢汉任命为昆明警备副司令。原来他在国民党时期的最后职务是云南保安司令部人事处长。卢汉利用他熟悉保安团主要干部的人事背景，在对抗国军反扑进行所谓“昆明保卫战”时指挥起来灵便一些，便发表他担任这一职位。

在我堂姐夫仓惶退避以后出现的是龙泽汇，他的职务是九十三军军长。由于他是卢汉的小舅子，所以从头到尾参与易帜的活动，扮演着除卢汉以外最重要的角色。我搭来的包机在香港起程前，云南人就说是他包来运鸦片烟土的。卢汉的“起义”投共采取的是政治上靠拢、而经济上逃避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起义”前，昆明就盛传卢汉已将外汇转到美国，而把古玩珠宝运到香港。龙泽汇企图运定鸦片烟，在人们看来也是题中应有之议。这从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防备红卫兵抄家，把大量黄金于黑夜丢进翠湖，而被自己的女儿检举，有一贯的脉络。他见到我时，手里拿着一份《星岛日报》，我一看就是我带来在飞机上看的，原来他的部队搜到后马上献给了他，他一面举着报纸，一面向我说：“陆大声，陆大声，你的胆子真够大，报纸上明明印着昆明城郊混战，你居然飞来了。”他当时流露的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十七年以后的一个月黑风高夜，会把自己严密收藏的黄金偷偷丢进水中，结果被自己的女儿检举，成为昆明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的突出的坏典型，由于刺激过度，得了精神分裂症；最后带着民革云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死去。

盲目乐观，一心要见卢汉

话说回来，进入云南省政府办公大楼后，我们一行八人被指定坐在会客室里，第一个正式出面跟我们打招呼的，是原省政府财政厅长林南园。我和他是保山小同乡，又是政校同学，平日就有来往，因此，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告诉他：“南园，赶紧拿点东西来吃，我们从早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哩！”他很快叫人拿来了饼乾、糖果。于是我招待同行者，还夸夸其谈地说，今晚你们如果没有地方睡，我招待你们到我太太牙科诊所去睡地毯。她的候诊室很大。说明我在实际上已经被捕的情况下还盲目乐观。正当我们吃饼乾时，原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安恩溥到了，一见面，他就讽刺我说：“陆先生，你恐怕是听说廿六军打进来了才来的吧？”我反唇相讥地说：“呵！你的胆子也不小，现在还留在这里，我原来想你可能早就吓得逃离昆明了。”他碰了一个钉子后怏怏而去。

接着传唤我们一行到一间会议室。由以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吴少默为代表的一小群人问话（实际就是审讯）。先问随机前来的英国籍经理，第一个问题：这架飞机是谁包来的？他说是一个叫 James Yang 的昆明商人，杨是经常向他们包机的。旁边有人插话：就是汇利公司的杨永昌。等一下打个电话一问就清楚了。再问第二个问题：陆铿先生怎么会同来的？英国籍经理陈述了我临时要求搭机的经过，他强调看到我的名片是《星岛日报》驻东京特派员，“星岛”是香港最大的中文报，而我说是接太太随机来去，他就同意了。第三个问题：另外两个商人是怎么会同来的？据答是根据 James Yang 的通知。姓蔡和姓喻的商人马上声明，他们是到昆明提货的。第四个问题：飞机没有与地面取得联系，为什么敢降落？英国籍经理对我望了一眼，似乎道歉似地说他们持有通航证，又说出了我和他在机上的对话。主问者才以讽刺的口吻向我说：“陆先生当然是得到廿六军、第八军反扑昆明成功才来的。至于给卢主席的电报那不过是个手法。”看来，他们对于我此行，已有成见。而我却把希望寄托在卢汉身上，卢汉既然给我回了电报，说明他还是讲交情的。跟其他的人扯，反正扯不清，认为一切问题，只要见到卢汉，就可迎刃而解。错误地估计当晚就会恢复自由。因此在吃饼乾时，我还那么轻松跟同机来的一伙人重复说，如今晚没处住，可以到我太太的候诊室去休息那段话。

问讯的结果，出乎我的意外，机组人员被一个会讲英语穿制服的人领去休息；两个商人

被一个警官带走。剩下我一个人被通知说："主席马上就见陆先生。"我心想："卢汉到底还是够朋友。"自然地联想起三个月前在他家里为我举行的盛宴。

那怕天仙也不值得冒险

一个副官来通知了：主席请陆先生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被引导到二楼一间屋子里，走进一看，这那里是办公室，明明是间会客室。迎接我的，不是卢汉，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开门见山地说："卢主席太忙，不能见陆先生，叫我代见。"我一面坐下，一面打量他。五十多岁的年纪，和我差不多高的身材，黑色中山装，衬着白冷的面孔，露出一副奸笑。眼光紧盯着我，似乎要发掘什么秘密。我说请教尊姓，他说姓宋。我马上想到在香港云南同乡处听说的，卢汉领头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而且都是一九二四年大革命时代入党的，后来脱党，四七、四八年看到共产党成气候了，又参加了地下工作。其中一个叫吴少默，一个叫宋一痕，都是云南人。我马上判断，现在跟我打交道的就是宋一痕。我说："其实，见不见卢主席也没有关系。我这次是回来接家眷，承卢主席覆电同意很感谢他。"宋说："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负着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的，接家眷不过是个幌子。"我说："我回来确实是为了接家眷，没有任何任务。"宋说："我们知道，杨医生生得很漂亮，据说是成都中大牙科的校花。但是，在炮火连天中，谁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那怕是天仙，也值不得冒生命的危险呀！"我说："我们记者对危险的看法与一般不同。既然飞机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宋说："那就请陆先生介绍一下这架飞机的来历吧！"我说："我是临时搭机的，具体由什么人出面包机不清楚，在飞机中跟同来的英国籍经理聊天，才知道这架飞机就是十天前张岳军先生坐走的。"宋说："妙！妙！张岳军先生坐走，陆铿先生又把它坐回来了。"我说："我希望明天能坐这架飞机走。"末说："陆先生，既来之则安之。马上就走，你想得太简单了。事情是复杂的。"我说："有什么复杂。唯一不同的是，我和卢主席没有张岳军先生和卢主席的交情。但张岳军先生是个大人物，共产党点名的战犯，我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宋说："你太客气了，鼎鼎大名的陆铿，怎么是个普通的记者呢？有那一个普通的记者可以在炮火连天声中乘坐专机翩然下降。陆先生，我看为了使事情简单化，你乾脆谈清楚，你是负有什么政治使命来的。反正大家都是云南人，好商量。"我重申我是回来接家眷的。宋冷笑一声说："看来今天晚上是扯下清了，你先休息一下，想一想，明天再谈也不迟。"于是他按了茶几上的铃，一个全身警官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我定睛一看，正是我的另一个小同乡、原任昆明市警察总局副总局长李志正。宋起身对他附耳说了两句，李回过身对我行了一个礼。我马上站起来，伸出手准备和他握手，他却不伸手，只说："老乡，请把你身上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放在桌上。"我问："为什么？"宋说："我代表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向你宣布：你被捕了。"

宣布被捕，想吃鸡蛋炒饭

我原来和宋谈话时：心情非常平静，一点也不紧张，中间一度还用手弹着我系的一条非常富有弹性的领带，自己为自己的满不在乎而感到骄傲。因此，一直是理直气壮的。到宋一痕宣布："你被捕了"以后，才感到心头一震，好像心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似的，接着我发觉当我把身上的所有东西掏出来用手帕包好时，我的手已经冰凉。

幸而李志正是老熟人，他陪我从二楼走下大厅，再走上大厅外等着的军用吉普车。上车时我发觉后座已有两个武装警察持枪以待。李志正让我先上，坐在驾驶员旁边，然后他上来坐在我旁边。一声："到总局!"我知道我要被押解到警察总局去了。但我的新闻记者职业冲动，仍驱使我情不自禁地想看看易帜后的昆明，究竟有无变化。可惜眼前是一片漆黑，伴着几点灯火，有一种死寂之感。到达以后，我说："志正，一天没有吃饭，炒一碗鸡蛋炒饭吃，怎么样？"他说："可以。先喝杯茶吧!"说着及时递上一杯茶。坐定后，我问他："跟我谈话的是不是宋一痕？"他大惊："你怎么知道？"大概因为热茶下肚，恢复了镇定，所以我

又由不得自我陶醉了："你难道忘记了我是新闻记者。"说罢两人都笑了起来。

鸡蛋炒饭配了一碟豆腐乳，吃得特别香。绝不夸张，这碗饭的余香，一直维持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我第一次释放回家。

当夜十二时，李以副总局长身份叫来了警察总局看守所金所长，至少带有几分歉意地向我说："老乡，你该去休息了！"金所长把我领进看守所里最里层一个小院、两间监房中的一间，介绍说："这是待质所，是看守所里最好的房子，委屈你了，陆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叫看守员。"说罢把门拉上，只听到一把锁"锵"地一声锁了起来。

回头一看，在地板上铺了一张席子，席子上一个垫被，再就是一张被子，白色的里子，已经发黑，尤其是被头脏得无法形容。我还未躺下就有一股酸臭气味袭鼻而来，我想，这怎么睡得下去，于是对着门洞大叫"看守员！"一个年约六十岁的老看守施施然来到我的门前，问："什么事？"我说："被子太脏了，能不能换一条？"他说："这已经是看守所里最好的了。你是局长交代过要特别照顾的人。"我说："没有乾净被子，请你给一本书看好吧？"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书。好吧，我去替你找一找。"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拖着脚步来了，把书从门洞里递进时，口中念念有词："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本。"我接过一看，原来是竹纸直排石印的一本发黄的书，翻开第一页是四个大字"洞冥宝监"，讲的是十八层地狱的故事。我自己问自己：难道真的跳进了十八层地狱？

春城看守所生涯

● "万事互相效力，让信主的人得益处"——《圣经》罗马书

一夜未眠，万念俱集。首先，想到命运的问题，看来坐牢已是命中注定。

我从十八岁起，在昆明看相算命，相师就说此生有牢狱之灾，而且有生命危险，叫我小心。但我从不把这放在心上。就以这次自投罗网说，硬是千方百计挣来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已经在东京误了飞机，又鬼使神差地从睡梦中醒来，竟而赶上了飞机。同月廿一日，在香港要不是临时有人通知，通知后要不是拚命赶轮渡，赶计程车，抢搭飞机；抢搭飞机时要不是会说几句英语得以与环亚航空公司的英国籍经理沟通，就不会坐牢。而现在居然坐牢了。我常常自诩记者生活是"海阔随鱼跃，天空任鸟飞"。这一下好了，看你怎么跃和飞吧！

妻子埋怨为什么还要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二日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设法通知我妻子杨惜珍到省看守所看我，并请她送被子、垫褥来。经过试探，终于说服一个看守员小徐，为我送一张字条到昆明护国路公生大药房楼上我妻子的牙医诊所去。直到傍晚，惜珍抱着一包行李来了，她说接到我要回来接她和孩子的电报后，已回一电叫我千万不要来。她以埋怨的口吻问："你为什么还要来呢？"我说，我认为来了第二天就可以带全家走，谁知道一下飞机就被捕了。我叫她马上到青莲街找卢汉，要卢放我出去。

当时，中共的部队尚未到达，昆明除了换了一面旗帜，改了一块招牌，原来的云南省政府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所代替，各方面一仍旧贯。看守所中还可以接见家属，住在关押要犯的待质所里的人更受优待。就在我关入十天后的下午，云南大学教授纳忠也关进来了，他

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学者，中国派到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第一个留学生，为阿拉伯文史权威，在云南大学教授中近东历史。而我曾到过埃及，所以两个人交谈不愁话题。他本是一位不参与政治的学者，抗战后期受蒋经国延揽，担任重庆中央干部学校的教授，因而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有了关系，后且被任为云南支团部负责人之一。卢汉“起义”后，大捕国民党党团骨干，并没有碰他。到国民党廿六军、第八军奉蒋命联合向昆明反攻时，卢汉为了减少“里应外合”的威胁，把原来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捕了起来，纳忠教授才变成我的“同窗之友”。他感叹国民党的气数大概是该尽了，所以昆明连三岁儿童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整个社会弥漫着反国民党的气氛。卢汉随时会翻牌，几乎是众人皆知的事，而国民党的特务居然麻木不仁到什么情报都不能掌握，最后被一网打尽。

说到特务，大特务就来了

“说到特务，特务就到”。在一个深夜，我因睡不着觉正在沉思，忽然听到待质所的大铁锁“铛”的一声开了，接着一阵脚步声，我赶快坐起来顺着铁窗的铁栏栅向外望去，只见几个武装警察押解几个头戴黑布头罩的人抱着行李定了进来。第二天，从看守员处打听到原来是送来几个大特务。军统西南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军统西南区副区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周养浩，军统总部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陈希超。这些大特务不仅人被捕，他们携带的大批黄金、美钞也被搜查出来。他们原都是十二月八日从成都到达昆明，准备十日飞海南岛转台湾的。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情势大变，九日就宣布“云南起义”了。卢汉闻徐远举到昆，原来在通知李弥、余程万、沈醉、李楚藩、沈延世、童鹤年、石补天等开会的名单中也曾列了徐的名字。通知送达给徐，徐心有疑惑，决定缺席，但仍插翅难飞。周养浩九日夜宿机场，次晨得悉卢汉投共，想到自己在重庆撤退前奉蒋介石之命曾亲自把杨虎臣父子从贵州押解到重庆，交给军统局本部杀害，光这一桩事，都自付必死，故躲了起来，不料被徐远举供出，后同被列为战犯，未被镇压。

沈醉原来是软禁在五华山上的。昆明争夺战结束后，他也被移送到警察总局看守所内的待质所与其他四个军统大特务关押在一起。

沈醉后来告诉我，共产党明确地告诉他，光是昆明一地，他们就抓了国民党大大小小的特务五千多人，数量之所以这么多，当然与卢汉一夜之间“翻牌”有关，很多特务都是退到昆明候机飞海南岛转台湾的。包括“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和国防部二厅、宪兵特高组及其他不属于以上四个组织的所谓“杂特”。其中以“军统”的势力最大、人数最多。共产党之所以要把沈醉留下来不杀，后来还提名他做全国政协委员，主要是将他作为一本“活字典”。沈不仅长期在军统局本部工作，又曾在军统各训练班任教，了解军统人事。为了要弄清其他特务的背景，就向沈醉查证，由沈提供较详尽的材料。所以沈醉照他自己说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仍然得以活命。而且成了知名的统战对象。中国大陆还准备把他女儿美娟写的《沈醉的故事》拍成电影，后来由于意识形态向左转被搁置下来。

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起到一九五〇年一月，看守所的人越关越多。最初我和纳忠教授两个人住一间囚室，至少有十五平方公尺面积。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底，我被编到一个不到五平方的监房里，结果关了十个人。大家只能头脚颠倒睡，也就是五个人的头旁边扫进另外五个人的脚。有时候实在睡得太难受了，只好靠墙坐着，第二天打瞌睡混日子。后来关进一位中央银行湖南衡阳分行的经理陶天爵，他向大家提议，不妨自得其乐，想办法使日子好过一点，轮流讲故事，并且带头讲《基度山恩仇记》，果然把大家带入另外一个境界。本来，整个看守所生涯，就是一个“关”字。像鸡鸭样地关在笼子里。这一来，以我说，思想就跟着基度山开小差了。

看守所得悉妻子亦被捕

一九五〇年一月底，在看守所得到消息，我妻子杨惜珍也被捕了。这对我来说，一如晴天霹雳。被捕的原因后来知道，主要是她为我的事去找到卢汉的太太龙泽清向她诉苦。并找我原来认识的朋友如昆明市市长、中共接管后因参加“起义”有功改任副市长的曾恕怀等。共产党地下党为了制止她到处呼冤叫屈，同时想从她身上打开我案情的缺口，就把她抓了。

最初是在一个秘密的高楼中审讯，几个审讯员对她进行疲劳轰炸，轮班逼她交代我的问题，也同时交代她的问题。她是一个单纯的牙科医生，大学出来就做医生，没有做过别的事，我的事情她并不清楚。因为她是一个技术本位者，用共产党的话叫“白专道路”，对于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突出的例子是我在南京做记者，在广州办报纸，她连看报纸的兴趣都没有。审讯者实在审讯不出名堂，因为她是牙科医生，就一个一个的牙齿进行考问。三十二颗牙齿都问完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她后来告诉我，审讯中，小便急了，审讯员竟不准她上厕所，她一气一急一出汗，小便竟也忍住了。后来，中共大军入城，鉴于关押的人实在太多，监狱和看守所统统人满为患，以昆明监狱为例，云南易帜前不过关了一两百人，而易帜后一下增加到两千多人。十倍还多。随着中共军队的入城，有些人还需要抓了关起来。在不得已情况下，只好把监狱略加清理，亦如商店之“清仓”。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某种牵连而被捕，也就是并无关押价值的人清放一批，杨惜珍因而出狱。

偶然归主，出现神迹奇事

但就这么一关，把她关成了一个基督徒。直至今日，近半世纪，一直是一位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把我们的家庭带动成为基督徒家庭。

据惜珍说，事情发生在她抓进看守所半个月后，我知道她关在我对面建筑的监房中，便说动了一个年轻的看守员名叫徐文焕的送了一张便条给她，主要是些安慰的话。有一天女看守员刘劲秋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去，板起脸孔问她：“杨惜珍，你为什么害我，你为什么说我为你和你先生陆铿传递纸条？”我太太申辩绝无此事，她没有向任何人提到刘劲秋，也没有任何人向她问过刘看守的事。但对方不相信她的话，厉声叫她：“下去！”

她回到监房后，同房另外两个被监禁的人，一个是黄埔第一期毕业、官拜八十九军军长马励武的太太鄢静芝，一个是龙云的外侄女方玉桃，看她面带愁容，问她什么事，她不敢说。只有闷在心里左思右想，忽然想起鄢静芝曾在劝她信耶稣时敦她的话，你信了耶稣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向主求，不过，祷告结束之前要说：“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才有效。她于目正在入睡前跪下向主祷告，说明自己被看守员刘劲秋误会，非常害怕，如果误会继续下去，她是受刘看守员管的，日子就没法过。请求主帮助化解。化解了以后，还要让她知道主在看守员心里作了工。奇妙的是，第二天这个前一天表现得凶神恶煞的看守员对她不但恢复了过去平易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比过去还要亲切，称她：“杨医生”，甚至问寒问暖。从此，她看到了主的大能，一心归主。以后还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家中。

接管前掌握在押者情况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昆明市举行欢迎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军第四兵团的入城仪式，我们关在警察局的看守所里，都听到锣鼓鞭炮声和扭秧歌的歌声。据事后进看守所的“同犯”说，三十万人倾城出动，报上讲是自清朝到民国以来从未有的盛况。

就在共军入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一个腰系皮带、身着解放军装、面孔白皙、年纪四十左右、操着北方口音的军官，由看守所长陪同巡视监房。到了我所住的监房门口，第

一句问："那一个是苏子鹄？"头发银白的苏子鹄站起来说："我是!""呵！你就是苏子鹄，军统的元老。"苏："不敢!""好，请坐下。"

"那一个是李家杰？"身躯肥胖的李家杰站起来说："我是!""你担任监视杨虎城将军的警卫队长好多年。"李："是！是!""请坐下。"

"那一个是陆铿？"第三个轮到我了。在苏子鹄、李家杰先后站起来答问时，我就想，如果喊到我，站不站起来？心想我是个记者，没有必要像特务样地毕恭毕敬。于是，坐在原地把头一扬说："我是!"对方见我没有起立，先"呵!"了一声，接着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到底不愧是鼎鼎大名的记者。你有反蒋的纪录，但不要忘了，你跟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和阎锡山。"我一时竟想不出一句恰当的对话来。觉得自己第一个回合就输了。这说明共军未进昆明接管前，就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在押者情况。

这位突如其来的视察者走后不久，我们就从看守们嘴里打听到，他是昨天刚随解放军进驻昆明的军管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处长阎村。

很快地，我们得到了通知，三月一日一早把铺盖行李收拾好，准备集体转移到昆明监狱去。

戴镣长街行，气宇更轩昂

三月一日傍晚，在太阳快落山时，昆明市警察总局看守所关押的囚犯，各人背负着各人的行李，两人共铐一副手铐，由武装士兵押解着向钱局街云南最大的监狱走去。事先规定了几条纪律，诸如不准掉队，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如果看到自己的家属亲戚朋友，绝对不准打招呼，违者严惩。沿途百姓驻足而观，指指点点。小孩子发现我们两人共铐一副手铐，惊异地叫了起来："咦！看哪！这些人的手锁在一起。"由于人数多，队伍拉得很长，虽然路旁有不少市民驻足而观，但并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我反而想起了一个年轻人在被国民党逮捕后写的："戴镣长街行，气宇更轩昂"的诗句。

这时，大街上已张贴出由陈赓、宋任穷带头的军管会的布告。我永远不能忘记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长刘子毅对我的第一次审讯。

刘不是在看守所提讯我，也不是在监狱提讯我，而是叫人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去。他中等身材，身着军服，显得很有精神，一副精明的眼睛，似乎要看穿对方的肺腑。他原来是靠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我进去以后，他站起来招呼，然后摆手让我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跟着他也坐了过来。打开他的大重九牌香烟请我抽，我说："谢谢，我不会!"他马上放声大笑说："哈哈，那儿的话，堂堂大记者，那有不会抽烟的道理？"我重申真的不会，他突地站起身来一只脚翘在双人沙发前的一张长茶几对我仔细打量说："你别见怪，我是想从你的牙齿缝中找一找有没有香烟的痕迹。"接着说："云南的大重九真不错，你不会抽，太可惜了。"

他"如数家珍"地说了我的经历："你是天子门生，蒋介石的学生，曾跟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进军柏林，参加中国新闻界访日代表团做过麦克阿瑟的客人，又跟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美国的三个五星上将你都打过交道，好家伙，所以别人称你是十五星记者。对吧？!"

我赶紧声明："这是关在监房里没事聊天、吹牛，别人乱封的。"

刘子毅笑眯眯地说："不是乱封，有道理。临时军政委员会转来了有关你的材料，他们说你是『接收大员』。我就闹不懂，一个新闻记者怎么会变成接收大员？直到知道你的全部经历后，我懂了。

第一次受审，面临两条路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把你接受政治任务的情况作一交代。没有关系，『接收大员』你并没有接收嘛！怕什么？说清楚就行了。另一条路是，拒绝交代，咬定没有政治任务，这是你的一面之词。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我们相信群众的检举揭发，你公事皮包里带的文件、照片，与群众的检举是符合的。你坚持的那一套，回云南是为了接家眷，准备把老婆孩子接到东京去。我们总得派人到日本去调查了解呀！老实说，我们现在不但不可能派人到东京去查证，连派人到香港也无可能。因此，希望你很好地跟咱们合作，政府对你一定宽大处理。假若你坚持不合作，那只有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注意，无限期！那你就别怪人民政府了。”

他的话，很明显，一条路是“合作”，承认自己是负有政治任务来的。他们再酌于量刑，给予处理；一条是坚持自己的实际。其结果就是无期，虽然对方加了一个“限”字，避免了法律名词。但我想起做记者的大原则——尊重事实。如果我顺竿爬，承认了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即使得到所谓“宽大处理”，也违背自己的良知。反覆思索，最后还是拒绝撒谎，事实的演变证明，这一拒绝，无异拒绝死亡。我告诉刘子毅：

“你们共产党一向强调‘实事求是’。如果编造一套谎言，应付过关，对我本人说，违背了良知，对你们也是一种欺骗。谢谢你对我交底。”

刘子毅微笑着吐出了下面的话：

“看来，你对咱们共产党还是有一点认识，你就安心学习吧！”

我了解，“安心”意味着什么。借用白居易的诗句即：“此恨绵绵无绝期。”但与共军政治保卫人员这一回合的交锋，而且是更高层次的交锋（阎村是处长，刘子毅是部长），因事先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对成一个平手。

打下十八层地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底，关押在云南省看守所。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了昆明监狱的生活，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释放。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九日“二进宫”，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才告别昆明监狱。

昆明监狱是云南最大的监狱，也是最有规模的监狱。民国初年在云南督军唐继尧主政时建盖。唐继尧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昆明监狱就参考日本巢鸭监狱的设计，监狱本体建筑为中间一座钟楼，钟楼下面两排房屋分列东、西两侧，有如两臂伸展出去，称为“中排”。其尽头各有一间大厅，大厅好像扇子的扇柄，面对以扇形展开的两组房屋。每组十二列，由六个排道隔开。每一排道有十二间房，相对而立。编号是从一排到六排，每一排从一号到十二号，东西分立，称为东监、西监，完全对称。其特点是值班人员坐在东监或西监的监视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监视到本监每一个监房的门。任何一间监房有异动，岗位上的监视者都可及时查觉，做到“一目了然”。

十八道门象徵十八层地狱

由于日本人信佛教，相信轮回之说，有地狱观念。习俗相传十八层地狱，监狱的设计，也紧扣住这一种传说。由监狱大门进入，两旁为管理人员的办公室，辅以花圃，别有洞天。然后过一石桥，名“奈何桥”。过了“奈何桥”就是一道大门。从这道门数起，到达任何一监房，必须经过十八道门，象徵十八层地狱。自然地给被投入监狱的人一种暗示，已经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初闻这个监狱是民国八年建成的，一九一九，与“五四”同庚，下由产生一种反应：我恰恰出生于一九一九，难道这一监狱就是为我造的？很多人认为命相之学，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我从切身的遭遇感觉到，世界上，人和事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历史因果与现实机遇，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产生非常奇妙的影响。

国民党为什么会被共产党打败？我接触的人多半从国民党本身找原因，我自被中共逮捕坐牢后，学会了从共产党方面找原因，就拿管理监狱说，共产党确有国民党所不及的地方，充分发挥其善于组织之长。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之说，中国民间也有“以毒攻毒”这个词儿。共产党的监狱管理，就是利用犯人管犯人，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实践中落实。

以昆明监狱说，那么大一个单位，两千多囚犯，政治犯关押于东、西两监，刑事犯关押于北监，中共只派了一连解放军，守卫重点放在东西南北四向四个碉堡及大门和巡视围墙。解放军一般不进入监舍，只是遇到枪毙人时才会看见他们。另外派了两个解放军干部，一个叫任勤生，为驻监狱军代表，一个叫林任省看守所长。原来管犯人的牢头禁子，也就是狱卒，一变而由被捕的军统特务担任。带班的称管理员，一般跑腿的称服务员。

用囚犯管囚犯以毒攻毒

这班人有的曾在湖南贵州看守过张学良、杨虎城，有的曾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白公馆看守过叶挺、黄显声。他们在林所长的指挥下工作，三个管理员分别在东监、西监和中楼岗位负责。管理员下是服务员，服务员多到十几个，要日夜轮班，平日主要的工作是当审讯员要审讯囚犯时，由服务员来带领送到监舍外面的审讯室，当被囚者夜间要解大小便时，由服务员开监房的锁放出来，然后再关进去；当每天两顿饭开饭时，由服务员负责分发饭菜，每人每餐一糖瓷口缸饭，大约四两，一点点青菜，另外一口缸开水。遇到每月一次的家属送物日，由服务员到监狱大门口把物品（限于牙刷、牙膏、草纸、肥皂和生病时监狱医生批准开的药）接过来然后送到被囚者手中。除此之外，服务员就三三五五地围在一起聊天。在中共接管之初，管理几乎和国民党时期一样松懈，后来逐渐加紧。被囚者关押的重点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叫交代问题。第一步是叫每个人写“自传”，从八岁写起，包括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出生时间地点、原籍、父母亲情况、本人学历、经历、宗教信仰、政治、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然后就是罪恶言行。写了以后由审讯员提审。审讯员由公安部门派来，有的是连续审讯，有的是一审就摆下，不再闻问，还有的一审也没有审。最可笑的是有一次监狱实行大清理，把犯人分监集合在大操场点名，点到最后竟有被囚者，名册上没有名字，监狱当局反而问他：“你是那个单位抓进来的？”回答是“不知道！”引起一阵哄笑。我心里想，这种人该放掉了吧？！结果，过了几个月，照样在监狱集合两千多犯人一起“上大课”时见到这位仁兄，大家戏称之谓“无名氏”。昆明监狱中，管理人员除了任、林两个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派在昆明监狱实习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任、林的统率下分管各项事务。这些人是国民党一手训练出来的，他们也像某些国民党的官员，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不过转变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是应付环境，看风驶舵；有的是甘为鹰犬，盛气凌人。作风比较平实的有黎兴华、童衍□；作风恶劣、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则为郭佑棠、李襄化。还有一个姓田的管采购，为人随和，有时当着我们这些犯人的面来一点自我嘲弄。虽然他们只是五个人，但反映了在毛泽东对国民党人员留用的政策下，小人物面临改朝换代所表现出的

众生相。

留用人员以极左向上爬

黎兴华担任管教组长，虽然界限划得很清，但比较实事求是，并没有为了向新主表功而故意对被管押者作威作福的情况。而李襄化则一副小人得志的样于，从他对汤尧说的话，就可见其灵魂的丑恶：“你不要认为你是陆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叫你站住，你就不敢坐下。”郭佑棠担任生产组长，在组织、指挥劳动生产时，不仅要求超体力的干活，而且恶形恶状，动不动施行体罚，名曰：“两腿半分弯”，命令受罚者在太阳下两腿弯曲、两臂上举半小时或一小时，使受罚者人的尊严完全丧失，更不要说汗流浃背了。我本人因绗棉衣质量未能过关，就被他罚过一次。最初，还可以忍受，后来弯的时间长了，全身发抖、淌汗：只好学阿 Q，暗暗咒诅国民党，怎么会训练出这样的混蛋，来做共产党的鹰犬，不失败才怪！对比起来，在他们上面的共产党员，对待犯人至少在形式上没有他们那么左。从一九五〇年来看，共产党对我们这班政治犯的管理还是比较松的。除了偶尔“上大课”，由军代表对全体犯人交代政策，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外，强调毛泽东说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们采取的方式，不仅是犯人管犯人，而且是犯人教犯人。由于共产党强调“改造”，故监狱内墙上刷的大标语是：“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惩罚与管制相结合，强迫劳动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原来犯人彼此互称“同犯”，监狱当局宣布可以互称“同学”，但后来又规定回归“同犯”。当时，监狱当局正式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我被指定为“主任委员”，另外指定了七名学习委员，包括两名有少将军衔的国民党政工干部，一个来自云南编练司令部的政工处长刘善述，一个来自中央军某军的政工处长贺良汴。前者广西人，后者湖北人，都能说会道。三个特务，一个属军统，在日本人占领武汉后基于“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哲学，在日本宪兵队对面设立了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的王文蔚。一个属中统，昆明师范学院的职业学生萧亦兵。另有一个军统训练班出身姓任的女特务，虽然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仍要算老账抓起来。还有一个蒋经国戡建大队秘书彭树勋。最后一个就是北伐时加入过中共、早年学过“共产主义 ABC”，后来投降国民党，曾出任云南玉溪县长的宋家晋。

监狱当局在学委会成立会上说，选拔我们几个搞学习工作，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教育程度。指定我为主委，是因为我在南京和国民党闹翻、在广州曾被国民党逮捕，勉强可以算有一点觉悟。不过警告我说：“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是最危险的思想，必须好好改造。”我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地认为“是金子，埋在沙堆里也会发光”。殊不知自己在精神上已做了共产党的“走狗”(Running Dog)。

精神上做走狗还很得意

担任学习委员会后，表面上看与当管理员、服务员似乎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是进行自我教育，而后者则是管理生活，是赤裸裸的做鹰犬；但从实质上看，二者都是一样的东西。骨头都是软的，都是在共产党的专政强力下苟且偷生。不过，做“委员”在心理上聊以自我解嘲而已。

学委会在监狱管教组长指导下每周开会一次，拟订学习计划。共产党强调要抓“活思想”，而“活思想”是根据每个学习小组每晚学习暴露出来的思想汇拢起来，加以综合而成的。五十年代初政治犯最突出的也是最普遍的“活思想”，就是“变天思想”，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发生，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必然战胜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都可以获得自由了。当时包括我本人在内，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幻想中。针对这一思想状况，讨论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由本来参加过共产党的宋家晋主讲，他自称大革命时代的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听过恽

代英、萧楚女这方面的演讲。另外由原来国民党的两位少将政工处长和我助讲，每周三次。我们从“猴子变人”讲起，沿着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说明“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历史的必然”。最初，多数听讲的人，包括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省政府厅局长和一些国民党的将军，过去从没有听过这些说法，还有一点新鲜感；讲到后来，转入资本主义剥削的论述，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束缚，根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听来格格不入，特别是搬出马克思《资本论》的教条，更是越听越糊涂。对于解除变天思想，大家推我作一次报告，我根据欧洲战地所见，说明战争之残酷，所有经历战争灾害的人，除了少数野心家，都对战争深恶痛绝。而且，从世界形势看，苏联已打得很疲了，美、英也没有打三次大战的准备。加上原子弹、氢弹的产生，谁都怕毁灭。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打得起来。当时引用了中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将军（在三十年代，曾与汪精卫、顾维钧、梅兰芳并称为“中国四大美男子”），一九四七年在南京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的一个故事。他奉蒋老先生之命，由西柏林回国述职，蒋老先生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他，第一句话就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黄琪翔的答覆竟是：“打不起来。”接着陈述了柏林所见所闻。冷战几乎是无日无之，但热战，从两个阵营看，都没有可能发动。蒋老先生听后失望之余，就告诉他：“你休息休息吧！”黄原来认为是在南京休息几天就可以返回柏林。后来得到通知，根本不必回任了。

报告后收集反应，只有汤尧比较幽默，他说：“我们的思想问题倒是解决了，恐怕蒋介石在台湾的思想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多数政治犯都犯软骨病

回忆当时参加讲社会发展史，自己对把五种社会制度：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按阶段截然划分，在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在学委会讨论时，大家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给我讲，而我在理论上也是一窍不通的，连马克思《资本论》都没有读过，只是知道列宁有一个论点：“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走到末路，根据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话，夸大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一面，特别强调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记得我当时讲了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在他的女儿十七岁那年，花费一百万美元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园游会，把他女儿介绍给社交界。不要说各种美酒要从欧洲运来，连很多花也是分别从法国、荷兰、义大利订来的。我的目的是要臭资本主义，不料很多人听了我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反而羡慕起资本主义来，并在小组讨论时，以暴露思想的方式说：“原来听说美国富，但富到什么程度不清楚，现在听了福特的故事知道了，福特真应抓来改造。”

而从我自己来说是否真的认为列宁、毛泽东开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就正确呢？天晓得！我口里讲资本主义已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心里却认为资本主义仍有其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仔细观察监狱里关的绝大多数政治犯，都是像我这样的口是心非的“两面人”。比两面人更糟的是国民党的一些党棍、特务和军官，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毫无气节，张口一个“蒋匪”，闭口一个“蒋匪”，有的竟幻想通过大骂国民党，向共产党表示效忠而获得宽大释放。具体的例子是国民党党校一期毕业、身任国民党昆明铁路党部书记长兼云南省党部委员的萧棣华，头一天被抓进昆明监狱，第二天就上报告要求对台湾广播向国民党劝降，不仅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充分说明了其人的无知。像这样的货色居然长期作国民党的骨干，国民党焉得不糟？焉得不垮？无独有偶，出身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二期、身任蒋总统特别警卫组组长的赵秉钰，作为总统近身侍卫，至少在对“领袖效忠”上应该比一般党政官员要稍微坚定一些吧？殊不知，他也和萧棣华一样要求对台广播。如果不是共产党干部在对全体囚犯上大课时，表扬了他们的政治立场迅速转变，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超出常识范围的事。当然，从我自己来说，在“转变”上和他们比较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实质上都是在

“活命哲学”的思想指导下搞政治投机。总之，大家都好像得了软骨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主要是怕死的活命思想主导。加上传统的“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种种“软骨哲学”、“投机意识”作怪，把中国人民族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完全暴露了。

坐牢廿二年两根硬骨头

我在中共监狱里坐了廿二年。遇着不少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特别是因为云南是所谓“起义”的省份，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很多国民党官员原来是从成都飞昆明转海南岛再转台湾的，岂料在昆明候机时做了阶下囚。因此，中共所捕获的国民党文武官员，除四川因是国民党最后一个据点，其人数为全国之冠外，其次就数云南。这从一九七五年底的事例也可得到证明。当时，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释放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所有在押的国民党官员。按当时统计，四川最多，一千八百多人，其次即云南一千五百多。在此之前还处理了一批战犯，云南方面也提供了好几十人。到一九六一年，云南省公安厅又将云南省范围内关押的头面人物四十余人集中起来成立学习队（中共内部称为要犯队）加以优待。我回顾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起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止，两度坐共产党的牢与国民党中上级文武官员接触总有几百人，中国的传统说法是“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文官是否爱财，监狱里无法证明，而武官从上将到少将的将军就有几十，但没有见到一个能够拒不投降慷慨赴死的。而从我的朋友沈醉应我之请为《百姓》半月刊写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录所记，全部战犯中敢于表现出不合作的，也只有一个黄维，但黄维最后还是被软化了。

我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只见到两根硬骨头，一人名李宪隆，被中共宣布抗拒改造于五一年被枪毙。死得相当悲壮。在昆明监狱两千多犯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他虽全身绳捆索绑，但当云南高等法院院长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时，他本面向宣判台，突然转过身来，面向大众，虽被上绑，仍挺胸瞪眼，傲视全场，然后高呼：“打倒万恶的共产党！”“三民民主义万岁！”弄得全场都呆住了。

另一个是一位姓张的年轻人，罪名是“反毛泽东思想”，进监后又被把上“反改造”帽子，因而罚戴大镣。但他毫不在乎，拒绝参加生产劳动。狱方组织其他犯人批斗，他却嗤之以鼻，颇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神态。后来虽被打伤，仍昂首阔步而行。不久，这个年轻人不知被送到何处了，犯人中则传说已被秘密处决。

坐牢诚受难家属更堪怜

一九五〇年中共建政之初，问题如山，特别是如何稳定经济，制止黑市，迫在眉睫，尚来不及发动政治运动。监狱里的犯人虽失去自由，但互相还可以谈话，“同病相怜”一番。最惨的是犯人家属，不仅丈夫、儿子或兄弟被捕，精神和生活同时受到打击，还要设法为关在牢里的亲人送饭。

当时，中共初接管监狱，狱中的伙食实在太差，为了表示宽大，同时藉而减轻压力，准许家属送饭。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家属，有的是军长、师长的太太，有的是厅长、委员的小姐，也不得不屈尊提着饭盒在监狱门口排队。军代表任勤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藉与犯人家属谈话的机会，在某些家属身上打怪主意。他常常就像一只狼犬似地在大门口等待着他的猎物。他看上了一位很有姿色的国民党将军的太太，便讨好地搭讪，问七问八，并故作正经地告诉这位太太说，要好好帮助自己的丈夫争取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并宣传毛泽东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自我介绍他就是监狱军代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找他反映，保证给予解决。这位将军的太大，听到此人和颜悦色的谈话，又看到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对他毕恭毕敬，误认此人真的掌握了自己丈夫

的生杀大权，每当任来搭讪时，不但不严肃拒绝，反而有点受宠若惊。当时连被选拔为狱中管理员、服务员的军统特务们，当他们受命在监狱大门口接管并传递犯人家属送来的食物、药物和日用必须品时，都已查觉任代表对这位太太的特殊青睐是怀着鬼胎的。不久就传出这位将军太太被奸污之事。

我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次被关将获释放，释放前进行隔离审查，发现任勤生跟我一起被审查，才证实了他确实犯了诱奸“犯属”的罪行。到与妻子杨惜珍见面，她回顾在我初入狱时送饭的那一段岁月的委屈时才得知梗概。原来，这位将军太太是在送饭时和我妻子认识的，彼此产生了相互同情的友谊。我妻子原来也是任眼中的猎物之一，她以上帝给她的智慧和作牙科医生取得的社会经验，使任在她的严肃态度和婉言警告前知难而退。

惜珍不胜感慨地告诉我：“我真同情那班国民党高官的太太们，他们当中有的人，除了做太太，什么也不懂。遇到天翻地覆的变局，除了受人摆布，毫无应对的办法。”

政治运动起狱中气氛变

时间推到一九五〇年底，共产党开始搞政治运动了。第一个运动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共产党的一贯作法是，全国一盘棋，要动全面动，连监狱也不例外。所请“社会上刮什么风，监狱里就下什么雨”。

为了配合全国范围的第一个政治运动，监狱里改变了过去几个月来的管教方式，取消了所有文娱活动，如节日自演节目；平日晚饭后学习前打球或看打球；学委会也变相取消，宣布不准像过去样地成天蹲在钟楼上；犯人对犯人上课结束。决定全狱开展“坦白交代与控诉旧社会”运动。找出三个典型，一个是马锳，卢汉的第二把手，官任陆军中将，经蒋介石任命为云南警备副总司令，引起了卢的疑嫉。后警总撤销，马改任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卢汉宣布“起义”的第二天，以马态度消极，配合工作下力，拍桌大骂，并将他关了三天才放回家。不料共军入城后，他又遭逮捕，显然是卢汉同意的。

马在坦白大会上检讨说：“由于阶级本质的关系，对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的革命意志和人民无穷伟大的力量，认识不够，估计不足，顾虑重重，摇摆惶恐，到了解放大军逼近云南，蒋介石将对云南有所行动的时候才被迫起义。”另一个是原云南外交公署秘书陈公献，揭发法帝国主义者对云南人民的掠夺罪行，以及龙云向法国购买军火的内幕。一个是名叫鲁殿光的二十多岁女大学生，揭发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教会进行文化侵略，贩卖“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有“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之说），毒害中国人民。她控诉来自美国阿克拉哈马城、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在昆明传教的莫瑞斯（Morris）牧师，利用传教，奸污了不少中国妇女。并举出实例，说有一位马县长的两位太太，莫瑞斯分别给她们取名马泰（Mathew）和马丽亚（Maria），双双都被莫瑞斯奸污了。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鲁殿光本人坦陈她也被莫瑞斯诱奸，并叙述了第一次上床的经过。

按照狱方规定，是要全狱两千多犯人听讲后分小组学习，还要由大组综合汇报。也许是人性使然，大家对马的交代毫无兴趣；对法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罪行听过也就算了。有一个犯人发言说，什么“隆东公司”（法国在越南所设专门与云南进行军火交易的公司）弄西公司搞不清，倒是对美国牧师“弄洞”的事有一点想法。这种事，硬性强迫不来的，既然不止一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不能说是奸污，更不能说是侵略。

不料，小组将这段话反映给狱方以后，引起了管教干部的大大不满，指为放毒，严令“消毒”，连续由小组批判一周，闹了一场小小风波。

强迫劳改，目的创造财富

共产党初初进城时，干部是很少的，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最初接管昆明监狱时，只两个干部。到后来，从游击队即滇桂黔边区纵队转来了一批，从江南来了“南下工作团”，“公安学校”又加速培养了一批，就多起来了。干部素质一般不高。以文化水准看，职务较高的，低于职务较低的。昆明监狱长给犯人上大课，常念别字，如将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不过，监狱干部对于执行政策，一般都比较认真。比如我在参加制“泡花板”（木料锯末压制成板）时，右手掌被机器压断，及时被送往昆明市立医院手术治疗，幸免残废。经过长期实际体验，认识到毛泽东的一套所谓“强迫劳动改造”政策，实质还是把囚犯看作劳动生产力；让犯人活下去是为了创造财富。绝不是像他们标榜的所谓“革命人道主义”。

由于云南是所谓“和平解放”，政权转换是一夜之间的事，很多有工业技术的人要出走都没有走成。经过几个运动，因为多多少少有些历史问题，所以大都进了监狱。恰逢监狱奉命办工厂，技术力量没有问题，什么人才都有。因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办成了被服厂、鞋工厂、弹棉厂、印刷厂、砖瓦厂、元钉厂、木工厂，还办了机械厂、农业药械厂（制造喷雾器、喷粉器等），最后竟制造出了吉普车，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些产品，还出口到国外。对于参加生产这些产品犯人，不少因为在技术革新上的贡献，获得减刑或奖励。对照国际上基于人权反对中共劳改产品出口，这当中的认知差距，该有多大。

强力专政提高劳动效率

昆明市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对外名称为“金马综合加工厂”，与保定市的河北省第二监狱是中国大陆的两大模范监狱。它之所以称为模范，用共产党的标准来看，第一，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大，劳动生产率高，平均生产值不仅高于其他劳改单位，而且远超越国营厂矿。第二，产品质量过关，不少是出国产品，如二监生产的农业药械、喷雾器、喷粉器即远销国外。第三，没有出“安全”事故。以二监论，监狱长向犯人做报告就公开说：“二监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二十年间没有一个劳改犯逃跑得逞的。跑了几个人，全部抓回来。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户口迁移要公安局批准，吃饭要粮票，你跑到那里去。结果必然是淹死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可以告诉你们，跑出去的没有不捉回来的。只有一个没回来，原来是拒捕，被当场击毙。因此，你们最好是死了这条心，好好接受改造吧！”

我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两度在昆明监狱坐牢，曾被派到鞋工厂制鞋，到被服厂桁棉，到机械厂喷漆，到印刷厂校对，到山坡开荒，最长的一段是到菜园里挑肥、挑水、种菜。主要是种小白菜，这种菜生长期快，产量高，成为犯人的主要副食。在中国大陆一切实行配给，城市里的犯人因为“替社会创造财富”，得与公民一样，每月配给二两五钱油。这一点油，要分五十餐食用。可以想见，小白菜有什么味道。吃了二十多年小白菜（三年大灾时连小白菜都没得吃），所以，一旦获释，自己向家里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再吃小白菜。

劳动不仅是强烈的，而且有定额，有时逼到你非完成不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规定挑粪水到山坡地浇菜，到最后，实在挑不动了，只好咬住牙拚命挣，自己给自己打招呼：“退无死所”。当我刚刚挣上坡，只见旁边一位年纪看来比我稍大的犯人，连着粪水担子，连人带桶一起滚下山去。

校对犯错误成政治事件

在监狱里干体力劳动固然够受的，干脑力劳动也决不轻松。

记得第一次安排我校对的书，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并派了一个国立艺专毕业的画家，也是一个留队人员严浚，和我两人共同工作。

我心想：“杀鸡焉用牛刀。”自己做过大报的副总编辑，校对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当负

责印刷厂的一个姓者的共干，犯人称之谓“者队长”的，问我：“能不能完成任务”时，我毫不犹豫地夸下海口说：“保证百分之百！”

当时，为了慎重起见，采取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校样的办法，轮流作业，眼、脑、口、手齐动，校对了两遍，认为万无一失了，才按规定签字付印。

那知道，一百多页的书，印出来后，竟被发现有四十九处错误。由于这是毛泽东指定共干必读之书，一下造成这么多错误，便被视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共干指出，我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办过报的，即使校对有错，也不应该错得这么厉害。因此，一口咬定是存心破坏，叫我在小组内交代，并接受批斗。

批斗会开了一个星期，由那位者队长亲自掌握，直到我承认是心怀不满，思想骶触，仇视马恩理论，企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颠覆人民民主政权，批斗才算告一段落。

过了一周，姓者的找我个别谈话，我就老实告诉他，所谓“骶触”“仇视”“破坏”“颠覆”，都是提高原则，上纲上线，为了小组过关说的话。真正的关键是对于校对工作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太大意了。过去干报馆都是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参加过校对工作，而且把校对看得既简单又轻易，殊不知其中有大学问。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比如“陆铿”，明明错排成“陆监”，看起来仍是陆铿，所以不知不觉就错了，有鬼使神差之感。加上中国文字千变万化，常常造成阴错阳差。

姓者的听了我这段话后，大不以为然。他说：“你把校对工作说得这么神秘，我才不相信呢！哪天，我自己来校一校给你们看。一个字对一个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知识份子的毛病，就是把很简单的事，说得神乎其神。”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共干之间也常常进行大批判。所有的批判稿，事先都要由印刷厂翻印。有一天，刚好我手上有一份待校的大批判稿。我说，这份稿是否请者队长校一校。

于是，他把袖子一捋，说：“好吧！让我来！”他把校稿与原稿都摺起来，并在一起成平行的两条线，然后一列一列地红笔比对下去，但见他紧张得头上直冒汗。校完以后，封面还有三个大字，即“大批判”，我说，这张封面也请校一下，签个字才好付印。

他用红笔点着，口头念着“大……批……判”，就签字。洋洋自得地说：“你们把校对说得难得不得了，我就不信邪，今天当面校给你看看。”这时，我已发现他造成的错误，但为了使他亲身体验一下“存心破坏”的味道，所以顺便奉送他一顶高帽子：“者队长以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来校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等到第二天，成品印出了，装订好了，封面上“大批判”三个字，赫然变成了“大判批”，者队长才慌了手脚。他马上调自己签过字的校稿来查对。认为这里面说不定有阴谋破坏。等到他看到“大判批”三个头号字下面，正是他恭恭正正的签名“者炳华”时，才不由得一面苦笑，一面摇头说：

“咦！天下真有这样的怪事！”

学习最痛苦创三通过关

监狱里，最痛苦的倒不是生活苦、劳动重，最痛苦的是学习。狱方规定每晚两小时小组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监规纪律。强调暴露活思想，并结合检查自己在监内的一切言行。因为学习是固定天天必行的，而监内的言行有毛泽东规定的“只许他们规规炬炬，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大原则，所以极少越轨的人和事。因此，学来学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味同嚼蜡，却非嚼不可。如不发言，就被视为思想抵触，得检查思想，痛苦更大。不过，这样一来，倒对其他人是个解救，因有了斗争对象，不愁无话说了，而被指

定检查的人则变成十个人的痛苦由一个承担。有的担得起，有的担不起，担不起，甚至发生自杀或把愤怒转到提意见的人身上，来一个同归于尽的惨剧。在狱中就发生过一个犯人把对他提意见的小组长用门贡打死的事。

时间一长，经验教训一多，有心人终于总结出“三通过关”的应对学习之法，即先臭骂自己一通：“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社会的渣滓，人民的罪人”，“除了剥削寄生，什么都不会，该死！”然后赞美共产党一通：“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武器”。最后表态一通：“决定以感恩的心，加强自己的改造，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老实改造，认真学习，积极劳动，报答人民政府的再造之恩”。

总之，翻来复去就是这一套。学习给人的折磨，对人格的扭曲，真是刻骨铭心。事隔近二十年，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悸。

在毛泽东封建法西斯个人独裁统治下，全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讲话。那怕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如刘少奇者，到头来也不免冤死在独裁制度下。何况被共产党视为阶级敌人的囚犯呢！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在这种强力专政下，作为犯人，无可选择。除了每天超额完成劳动生产任务，只盼望着能吃两顿饱饭；周末能够“打牙祭”，吃两块肉；每月能看一次电影；也就心满意足了。

有些更“积极”争取立功赎罪的犯人，常常像猎犬一样闻闻周围的气氛，听听有什么反动的语言，及时向干部报告，在狱中称之谓“打小报告”。有的人专门干这种事。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干部边走边说：“有些犯人真伤脑筋，屁大一点的事都要来反映，又不能告诉他说，以后不要反映了。”

我因为为人大而化之，说话随便，而且有一个基本观点，反正我的问题，不决定于监狱，甚至不决定于云南，而决定于整个形势，所以随便别人打什么小报告，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发扬“死猪精神”，再大的灾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直到后来一九七六年云南方面奉中共中央指示把我的档案调北京审查，一位劳改局长和一位科长两人带着我的两箱档案上京，我才知道光是廿二年狱内外对我的检举揭发报告，就有一箱。而这些东西对最后处理我的案子，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当在狱中时，对我起码起到威慑作用。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奥妙。

背铐五十二天吃饭如猪狗

共产党监狱，一般很少搞刑讯逼供。但五十年代建政之初，承袭了苏联格伯乌的那一套，用刑是家常便饭。最通常的是把人的大拇指拴上电话线，通上电流，然后摇动电话机以逼供。昆明监狱的老犯人不少尝过那个味道。

我本人第一次入红牢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一九五三年底当局因所有控罪都不成立，准备“教育释放”。但国民党警官学校出身的李襄化为了立功心切，在得知我即将释放时，突然利用监内关押的保山陆家一个年轻人向我要了一双袜子以备冬天御寒，便以我严重违犯监规罪名，罚我戴背铐。也就是两手反背铐起来，不但无法睡觉，吃饭也只能像狗一样，用下巴将碗中的饭粒拱倒在床板上，然后用舌头舔食。狼狈像真正一如猪狗，甚至猪狗不如。

这样的折磨足足五十二天。后来，我才知道是释放前的最后压榨，看看能不能压榨得出

一点他们所想像的材料来。还美其名日“榨甘蔗”。因为左手腕铐伤，最初出狱三年不能戴表。现在事隔四十四年，天阴下雨左腕还会疼痛。

后来跟我在要犯队一起学习的原昆明中央银行经理赵康节情况更惨。他以划为“右派分子应声虫”而挨斗，戴着脚镣被其他犯人猛踢，结果铁镣嵌入足踝，造成终生残废。不要说身受其痛，一旁得见都感到毛骨悚然！

毛把大陆弄成一个大监狱

在中国大陆坐牢要看运气。一等牢当然是在首都北京。尤其是秦城监狱生活设备，如卧具、如厕所，可以保持一定的清洁度；有自来水用。伙食方面，也保持基本营养。

二等牢即直辖市，如上海、天津及各省省会。像济南、西安、成都、昆明。牢房的清洁卫生有一定的制度。吃饭除一九五九至六一这三年，全大陆饥荒，大量饿死人，其他时间一般可以吃饱。

三等牢遍及各地区，有如国民党时期的专区和县属的监狱。不仅物质条件差，更严重的是干部政策水平低。有很多监狱，动不动用刑。

以云南为例，五十年代初，搞过大量刑讯逼供，最常用的是把犯人的大姆指拴上电话线，通上电流，搅动电话机以逼供。八十年代初，通过劳改工作检查，查出对犯人的刑罚有三十多种。这是我在留队生产以后，因为同干部的界限不像当犯人时那么严格，加之我一九五八年是因划为“右派”“二进宫”，不少干部了解我的情况，故尔另眼相看，对我说话也就比较随便，无意中会谈出一些内情。

三十多种刑罚中最常见的有扣饭，不准吃饱；罚站，两腿半分弯；夏天罚烤太阳，冬天罚穿短裤，立在寒风中挨冻；捆绑、吊打；带镣运石头；超过力所能及的背石头，关禁闭；利用山洞挖掘小禁闭室，关进去的人根本无法伸腰，一直把人整成残废为止。有的干部借提讯、谈话为名，诱奸甚至强奸女犯。

昆明附近的光明农场，犯人在大饥荒中饿极了，偷偷跑到水塘捞苦菜叶子吃，水塘有粪有蛆，犯人用水把粪、蛆冲掉，被干部发现，竟不准冲水，迫使犯人吃带粪蛆的菜叶。

更残酷的事例发生在鹤庆造纸厂，这是曾担任云南省代主席的李宗黄先生的故乡。一九五九年，全国大饥荒，有一个犯人实在饿得不得了了，便公开叫肚饿。劳改干部便弄来一盆糙米饭，追着这个犯人当众吃下去。最后实在吃不动了，哀求道：报告队长，我不敢了，下次再不敢叫肚子饿了，不行，非逼这个犯人把这盆糙米饭吃光不可，到了半夜，出了人命，这个犯人肠子爆炸而死。

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共大搞冤、假、错案，相应地大肆扩充监狱和劳改队及劳教队。以云南为例，一九五八年所谓“大跃进年”，全省人口一千八百万，监狱竟达九十多个，犯人在二十万人以上。到了“文化大革命”，犯人和监狱大增，更不必说了。

毛泽东时代，从思想禁锢的角度看整个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大监狱，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感受，岂仅限于监狱里的囚犯。

大特务才子沈醉谈杀人

● 新诗御制竞相传，日向君王诵百遍，堪笑杜鹃空泣血，衰颜何事博人怜。

——沈醉在昆明监狱讽刺思想改造诗

沈醉十八岁就参加军统，是戴笠一手培养的大特务。五十年代起，经共产党战犯管理所改造十余年特赦，一九八一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他出版的《我这三十年》回忆录中，写昆明监狱生活一段时，提到当时唯一能够与之畅所欲言、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狱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

其实，我和沈醉是一九四九年九月才经好友丁中江介绍在昆明认识的。由于我们共同具有喜交朋友的性格，可以说是“臭味相投”，所以很快就谈得很深。比如，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已经败象毕露，蒋介石眼看大陆不保，决定向台湾撤退时，我们在昆明谈起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仅仅三年内战就被送掉。我认为主要是蒋介石的格局、心胸、识见都不够大，到已经以全国领袖自居了，军队还分正统和杂牌。在中共处于劣势，希望参加联合政府时竟拒绝和解，执著于武力解决，错估了形势，违背了民心。而沈醉则强调要不是戴笠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就撞机丧生，使蒋介石失去了耳目，国民党不会垮得这么快。

当时，我批评他夸大了戴笠的作用，但中共建政以后，暴露的资讯和材料证明，国共内战共军之所以能转败为胜，确实得力于共产党员已普遍打入国民党心脏。国军作战方案中共中央往往比国军部队长先看到。负责作战计划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竟是长期潜伏在国府军中高层的共产党员，这不是开玩笑？从这个角度看，沈醉的看法，也可说不无道理。

沈醉是读过旧书的特务

沈醉号沧海，据他说这个号还是他母亲取的，意在勉励他做人要心胸宽广，见事要豁达通明。幼承母教，读书不少，受益甚多。他连诗的平仄都是母亲教的。当在昆明监狱面临生死抉择时，还做了一首念母诗：

终宵坐立听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险讯频传心欲裂，危害不信胆能寒。夜焚积稿诗同劫，晓看遗书血未乾。含泪临窗遥拜母，长怜老幼倍难安。

就在一九五〇年底中共决定在全国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夕，沈醉以战犯之身被送往重庆与云南区提到的其他战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集中管训。临行前，公安当局叫昆明监狱的被服厂专门给他制作了一个黑布头套，在眼部留两个洞以便保持视线行走。偏巧，就在他戴着头套和脚镣离开监狱时，我被从监房里叫出来提讯，碰个正着。他见到我时故意将头部对着我，把脚上的镣弄得特别响，而且把两只手加大摆动的幅度，我马上就看出了这不是沈醉吗？我也情不自禁地跟他点点头，只差没有说再见。押解我从审讯室回监房的警卫问：“你为什么向他点头？”我急中生智，乾脆把问题说穿：“他吃我家送来的饭好几个月，他要走了，点点头也是很自然的。”再问：“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答：“沈醉。”警卫一听“呵！”了一声。接着以温和地声调说：“知道了就算了，回到号子里千万不要讲。”我了解，我把问题说穿，反而变成主动，因为如果追究我的错误，押解的警卫先有错误：为什么会让陆铿碰上？监狱里也是条条道路通监房的。狭路相逢，咎不在我。

为沈醉而组织起来吃饭

一九五〇年春末夏初，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处长阎村，突然提我问话：“陆铿，你认不认识沈醉？”“当然认识，而且说来还是朋友。”“那好极了！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我们刚接管不久，一切还没有上轨道，尤其是伙食供应。你们都是家里送饭，每人每家每天送两顿。我想把柏天民（陆军中将，云南省保安副司令）、唐宇纵（陆军中将，原第七军军长，昆明铁路局局长）、罗春波（云南绥靖公署中将政工处长）和你组织起来。四家人轮流送饭，每家每两天送一顿，每一顿要送够五个人吃的。沈醉参加你们一起吃，吃白食；他在解放前跟你们四人都认识，你不会不同意吧！”

“组织起来!”这四个字给我印象很深。共产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组织起来”，打败国民党也是靠“组织起来”。我答覆阎村说：“这个安排很好。问题是柏、唐、罗三位是不是同意？”阎说：“都同意了。”我问：“那天开始？”他答：“明天。你今天就写好一个条子。告诉你家里，从明天起，你们四家轮流送饭，次序是陆、柏、唐、罗。每两天轮一次，分上下午，每次送的要够五个人吃。沈醉跟你们吃，就不必提了。今天下午送饭来时，就把条子带出去。”

组织起来的吃饭地点，按阎村指定在沈醉住的中排单间里，记得我家里是用一个大竹蔑编的提篮，内置三菜一汤，外带一样咸菜送了进来。沈醉摆好碗筷，致词，用：“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成语表达对我们四人和四人家属的感谢。并主动承担洗碗的责任。他还风趣地给“组织起来”的五人会餐取了一个名字叫“将王餐”。根据是他们四人皆是将官，我做记者，有“无冕之王”称请故名，这也反映了沈醉的幽默与才气。最令人难忘的，他讲自己奉命杀人的故事，作为饭后的甜点（dessert）。

沈醉多次说：“我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沈醉一九三二年入军统，先后担任过情报、行动、训练、总务以及独当一面的站长，官至少将。杀人最多的时候是一九三三、三四年的上海。杀的名人包括史量才、杨杏佛、唐有壬。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搞权力斗争，汪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唐有壬被任为外次，汪倚为心腹，权重一时。唐的女友湖南才女黄碧云（蕴之），博通古今，兼工诗词，乃被金屋藏娇于上海。南京政要每周赴沪度周末，已成惯例，碧云上海法租界居处遂成汪系人马聚会中心，饮酒、打牌、唱戏、跳舞，乃至议政，随心所欲。

一九三四年沈奉军统杀唐命令。照他在五人共餐时对我们讲的：“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黄的住所，将唐一枪毙命。”

无巧不成书。一九四五年我和毛树清、乐恕人在巴黎任战地记者时，得识黄碧云女士，已经是“徐娘半老”了。原来，她是中央社记者黄印文的姑姑。唐有壬死后，汪精卫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到海外散散心，一散就散居巴黎十二年。提起唐公子仍默默含情。

沈醉讲起杀杨杏佛和史量才，则比讲杀唐有壬具体得多。他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杀杨杏佛先生，不单是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亲密关系。而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杨带着儿子小佛登车驶出住处时，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枪同时射击，杨因爱子心切，用身子袒护小佛，结果自己和司机中弹而亡，小佛仅腿部受伤。宋庆龄为此公开谴责了卑鄙的政治暗杀。沈醉后来在戴笠的指使下，还设计了一套对宋庆龄制造汽车车祸让她弄得不死不活的计画，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最后取消了这个计画。

至于蒋介石要杀上海《申报》、也是当时中国最权威报纸的老板史量才，主要是史坚持言论自由，不时批评国府施政之不当，社会上并有其同情共产党的传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咏赓父子以及咏赓的朋友邓祖询乘私家汽车沿京杭国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务们就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国道上，横停一部车，伪装损坏待修而阻拦；及史车开至，首先对准轮胎开枪，先将坐在车前被误会为保镳的邓祖询击毙。史氏父子弃车奔逃。结果父被射死，子得幸免于难。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蒋介石、汪精卫还悬赏缉凶。但很多人都估计到是出于蒋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证实。只是后来沈写《军统内幕》，关于杨、史被暗杀经过，和沈在狱中饭后和我们四人聊天时所述有出入。沈当时以谈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他如何奉命杀人，事后还得到奖励，如杀史量才全组就得了一万元银元奖金。但到八

十年代，距离五人漫谈三十多年之后，则写成他“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只是在叙述杀凶手时，说是六人，却只列出五个名字，那个没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

原来口说是直接行动，后来书面写成间接参加，这一矛盾怎么解释，这里不存在畏罪、卸罪的问题，因为命令出自蒋介石。以我对沈醉的了解，可能是五〇年初一时兴起，夸夸其谈，口沫横飞，毫无遮拦；到经过三十多年“改造”：心灵上多少产生自责，文字上打了一点折扣，也是思想门争激荡的一种反应。

沈醉才情横溢是特务异数

沈醉是个才子型的人，诗书皆通。加之，大半生做高级特务，见多识广，性格比较开朗，分析判断事物，也比较敏锐。比如，中共在监里大量利用军统特务担任管理员和服务员，沈醉就开玩笑说：“这叫以毒攻毒。”而且判断说，用犯人管犯人，事半功倍。特别是像军统这些人，以共产党的话来说，“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自认必死无疑。为了求活，他们对共产党交给的任务，一定完成得非常好。因此，他向我们四个打招呼，在送饭篮子交出时，千万不要夹带任何纸条在任何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地方，如果被负责传递的服务员搜查出来，将会遭到很大麻烦。果然，沈醉对我们的警告发出下久，监狱当局就宣布一个国民党官员，在其家中送饭菜盒子的底部用饭粒粘住小纸条，与家人秘密通信被查出，严重违犯监视，给予戴镣处分。

沈醉的判断力也是值得佩服的。比如在他和孙渡、马锳、汤尧、曹天戈、徐远举、周养浩等押送重庆前，他就判断，这几个人一定会转移，虽然转到何处不知，但绝不可能长留昆明。我们一同吃饭的三中将问他们三个的下落呢？他说：“你们会在昆明。”果然，到一九五一年开展大镇压运动、简称“镇反”时，三中将第一批在昆明枪决毙命。

沈醉访港与台特务斗法

一九八〇年底，沈醉带着他的小女儿美娟来到了香港。到后第二天，我陪他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国产西装，稍微打扮一下。我当时的经济情况还不容许找裁缝替他量身定做，好在他对于物质的东西看得很淡，此来主要是看看已办了离婚手续而另外与一位军队出身的商人唐如山先生结了婚的原配夫人粟燕萍女士。一九五〇年在昆明监狱时我就听说中共三野的粟裕副司令员，曾以沈醉叔丈人的身份，派了一位姓黄的高级干部来向沈醉详细而具体地交代了中共的政策，而沈醉后来的表现，也确实未负叔丈人的期望。难能可贵的是沈沧海见到粟燕萍和唐如山时，不仅彼此互相谅解，而且十分亲热。沈认粟为妹、唐为弟，并建议称他本人为：“三哥”，圆满地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一幕。

比较紧张的一幕，是国民党对沈醉的争取回归。那时，蒋经国还没有死，国民党在香港地下活动还很频繁，他们见沈醉到港，根据他和军统极深的渊源，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必然会抓住机会，飞向台湾。于是怂恿沈醉留在台湾的女儿，带了五万港币到港欢迎父亲“弃暗归明”。当把五万港币呈上时，说明是在台的孩子集体孝敬父亲，聊表心意。沈醉最初拒收，表示他生活简单，不需要钱，后经女儿苦苦哀求，才勉强收下。不料过了一天，竟提出请父亲写张收条以便返台出示给其他兄妹，露出了破绽，反映国民党特务之愚蠢低能。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沈醉将儿女的孝敬原封交还，轻轻说了一句：“怎么经过几十年的失败，还没有一点进步？”

后来，国民党只好请出香港何东爵士之子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的何世礼将军与沈联系，何乃派一女秘书与沈接洽。何到底棋高一着，表示，一切尊重沈的决定，愿意留港可提供住所，如有意赴台，当提供交通工具。同时约好设宴欢迎。正在此时，亲共的《新晚报》刊出有关沈醉报导，沈醉表示意向甚明，探亲会友完毕即返北京。何只好取消前约。整个过

程，他全部告诉了我。正如沈在回忆录中表明的与我的关系："我们无话不谈，而且相互保密"。我当时的态度是，不替沈出主意，由沈本人确定方向后，再与他共同分析利弊，以期有助其应付突发事件。留港期间空闲时即应我邀约为即将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创刊之《百姓》半月刊撰写《战犯管理所见闻》。

国民党特务对付沈醉的最后一招是摸清沈醉居港生活的规律，于清晨多数港人尚在梦乡时，利用沈醉晨间散步，采取集体包抄、突然袭击方式，劝沈赴台与子女团聚。沈乃沙场老将，自然应付裕如。但感觉麻烦日增，于是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九日携爱女美娟匆匆离港。《新晚报》当晚报导是这样写的：

"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向的十字路口上，他并不旁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

提前返京出任政协委员

在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均以战犯改造之身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一年，中共再度提名沈醉与另外几名"战犯"出任同样职务，名单在形式上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意见时，不料竟有人提出"沈醉此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表示反对。此次香港行，在中共看来"沈醉经过了具体的考验"，终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的一次常会上通过了沈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同年圣诞，沈醉自北京寄我新年贺卡时，特别告诉了他的这一喜讯。我知道沧海喜诗好词，遂在覆卡上把唐孟郊《登科后》诗易一字覆他：

春风得意马蹄疾，何（原为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九八五年，我应约到北京访胡耀邦，专门抽时间去看望老友。沈沧海热烈欢迎之余，还送我一千元人民币零花，用他的话是"以报解衣推食之义"。理由之一，他的稿费多得用不完，请老朋友分用一点。

一九八九年，他在北戴河游泳不慎摔伤成骨折。来信说："《百姓》收不到，也看不到你的《新闻信》了"。附寄<骨折住院有感>诗二首：

一

一失足成股骨折，病床滋味少人知。

教训深深长受益，耄年学步不为迟。

二

雄关险道惯遨游，失足偏偏是坦途。

且喜从今知慎步，祸能转福最难求。

从这两首诗，使我感到原本生龙活虎的沈沧海竟也有了暮气。

进入九十年代，知道沧海得了癌症，一直记挂着他，也通过两封信。一九九六年三月底收到了北京于三月廿日寄出的讣告，知道他于三月十八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

不管怎样，沈醉是一位当代历史的见证者，可以说无愧平生。

云南易帜经过和国军攻昆失利

●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宋·司马光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宋·苏洵（辨奸论）

在监狱里廿二年，正如监狱当局负责管教工作的一个中共干部批评我的：“陆铿犯的记者职业病是无药可医的，当了犯人还要采访新闻。”一点也不错，就在廿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我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终于将云南天翻地覆、所谓“起义”的故事，冒着带镣带铐的危险弄清楚了。而在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九年，其中有五年即一九五五到五八、一九七六到一九七八两度被邀请参加了中共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囚犯一变成为民主人士，又把我狱中采访所得做了认真的查证核对。从这个故事中，读者不但可以看到一个省的翻覆，也可追寻到一个时代终结的痕迹。

当我两度入狱，和我关在一起的“同犯”（监狱当局一九五0年允许被关押的人互相称呼为“同学”，五一年大镇压开始，就规定互相称呼为“同犯”。有人说彼此并非同一案犯，称“同犯”不通。但那不是咬文嚼字的年代。）高至陆军上将，低至地方小特务，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其中相当多的人都参加过卢汉的所谓保境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的终结就是在云南换了旗子。直接向我提供过有关情况的有卢汉宣布“起义”前先行逮捕的国府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有代表卢汉与地下党挂钩的云南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严中英，有奉蒋介石之命必要时取卢汉而代之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的孙渡，有奉蒋介石之命发动昆明反击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有国府中央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又为卢汉策反李弥和余程万的原云南省警务处长李鸿谟和昆明《观察报》社长李耀庭，有长期任云南外交特派员公署秘书的陈公宪，有卢汉专门用来更国民党中央打交道的智囊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以及被卢汉封为清客、写的一手好字、有“末世王孙”之称的李鸿章曾孙李广平。

故事要从国民党的政权讲起。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实质上也是靠蒋介石用枪杆子从军阀手里夺取过来的。但是从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虽然经过了廿二年的建政，中国并没有真正统一。山西阎锡山始终掌握自己的“王国”。青海、宁夏的马家也形成伊斯兰格局割据。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以及后来的邓锡侯、潘文华等等拥兵自重，盘踞在“天府之国”。而云南更是龙云的天下。至于西藏、新疆更不要说了。

共产党在延安为了打到国民党而制造舆论，由陈伯达写了一本书《中国四大家族》，揭发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在云南，同样有云南“四大家族”，实际上只能称为“四小家族”：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这是一个以彝族亲属家系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而集团的领袖和灵魂就是龙云，这是一位读书不多而视野开阔的将军。举一个最小的例，谁都知道宋子文是一个眼高于顶，自以为是，甚至连中国话都不愿意说的洋博士，但是他偏偏会对龙云着迷，结为知交，从这也可见龙云的魅力。

至于龙云与卢汉，既是亲表兄弟，有着血统关系，有是同时出道闯江湖的。卢汉虽然格局不如龙云，但他却是一员战将，为龙云打天下的先锋。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命令杜聿明以武力解决龙云，龙云被迫到南京接受软禁，但蒋也发觉要使云南社会安

定，仍得借在云南有威望的人，卢汉被视为第二个龙云，曾被蒋任命为越南受降的司令官，也算有了“知遇之恩”。李、闻案发喧嚣国际，卢汉的主席位置，蒋介石本来是制定李宗黄代的，这一下不再需要代了，大踏步地上了五华山。直到一九四八年大局丕变，云南以地处边陲、情况特殊，共产党很快地利用云南的特殊性建立了地区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领导人名义上是莊田，实力派则是黄埔军校转化的中央军校八期毕业、曾在卢汉手下当过团长的朱家璧。对这一支部队，卢汉不但不打击，相反地还予以纵容、甚至供应枪枝弹药，借而予下一着棋。最后并假借“消灭边纵”为名，向蒋介石讨价还价，得到将地方保安团改编为两个军的经费和武器，成了他“起义”的资本。

龙云在南京接受软禁三年，最后利用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中大败，南京政权摇摇欲坠，特务宪兵对他的监视松懈时机派其亲信、英文秘书刘宗岳到上海找到龙的老朋友陈纳德包了一架飞机，一九四八年底化装出南京。在广州小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到了香港。龙云结束了软禁的生活，而龙云与卢汉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情势是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国民党的天下不长了。卢汉也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他的旧部、被共产党在东北俘虏的滇军一个团长张秉昌回到昆明传达的中共中央对卢汉指出的三条出路：一事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最后被抛弃；二是国外当“白华”（“白俄”的变称）；三是走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路。而中共希望卢汉走第三条路。此外，在卢汉心里有一个大疙瘩，就是一九四八年锦州战役中他的被俘的叔叔卢浚泉，一直耿耿在念。他希望借他的起义之功，能把亲叔叔从共产党手中要回来。事实上，共产党也深知他和他叔叔的亲密关系，预先放话，如果卢汉在云南起义，就宽大释放卢浚泉。卢汉经过深思熟虑，按照张秉昌的信息，派了抗战时期曾在武汉见过周恩来的宋一痕为私人代表秘密取道香港北上，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了起义的诚意。正当宋一痕于四九年八月回到昆明时，龙云于八月十四日在香港招待记者，由云南省议会副议长李一平代表他发表谈话，宣布云南即将在龙云推动下起义，在香港报纸上引起了轰动。却使卢汉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虽然事先龙、卢在“起义”问题上达成了谅解，按龙云给卢汉私信的说法：“滇事由弟主持，外面接头由兄负责”。但正如卢汉在龙云宣布“云南起义”后的反应：“内外分工，也不能乱搞呀”!

就在龙云在港谈话的消息传到广州后，李宗仁、阎锡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为防滇变，用桂系的鲁道源兵团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而卢汉得到张群的支持，张群又利用蒋、李之间的矛盾，说动了蒋介石，由蒋向阎致意继续让卢汉主滇，不过要加强部署对边纵部队的进剿，使云南最后成为一个坚实的反共基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在重庆召见卢汉，为了安卢汉之心，特派蒋经国到昆明作为“人质”，换取卢汉的重庆之行。一时之间，云南政要为卢汉是否作重庆行，展开了舌战。最后是卢汉相信了张群安全保证，冒险前往，见蒋后声泪俱下，誓言决无二心，云南局势之所以谣言叠起，主要是龙云急于投共。蒋不知卢汉善哭，竟信其言，不仅让其来去自由，且比准其将保安团改为正规军，并拨给大量弹药及黄金，卢汉回昆后，上演了一出假整肃的闹剧。

正当蒋介石决定将云南作为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国民党中央军是机关大批向昆明转移时，共产党的刘邓大军兼程向大西南挺进，十一月十五日克贵阳，二十二日占桂林，三十日陷重庆。原来被认为白崇禧指挥下的华中剿总十几万大军会在广西跟中共军队打一场硬仗，人们万万想不到几乎是不战而溃，只有黄杰所部逃入越南。最为蒋介石欣赏的战将、黄埔一期的宋希濂率领的精锐部队经过力战，亦于十一月在重庆南部的南川一带被歼，宋希濂本人被俘。正所谓兵败如山倒。早就有意投向中共的卢汉，便选择了十二月九日张群衔蒋介石之命到达昆明这一时机，以绥靖主任的身份发出通知，说明张长官莅昆，，订当日下午九时在

青莲街卢公馆开会。第一个到的是沈延世（空军第五路副司令），他匆匆走到张群下榻之所，告诉张群说：从飞机场到市区沿途警戒森严，部队正在调动，与寻常不大相同，恐怕会有意外事件发生。张群却说“不至于吧”！？后来与李弥、余程万、石補天、李楚藩、童鹤年、沈延世、沈醉等在会客室里老等卢汉不到，石補天才溜到外面去看究竟，结果被警卫干预又走回会客室，这时大家才感到有问题了。沈延世方才想起他来赴会之前成都方面有一紧急电报到昆明，嘱他分转李弥、余程万，他因想到今天反正大家要在一起开会，就未派人及时送交，放在口袋里准备面交，临时换衣服又忘了带来，而今懊悔不及。当场被李、余等骂了一顿，据沈延世后来在监狱里向我分析，成都密电可能是蒋介石临时得到昆明不稳消息，通知第八军、廿六军加强戒备的。如果他不是作风一贯大而化之，收到后即限时专送，说不定后来的局面不会是这个样子。李弥、余程万如果不是成了瓮中之鳖，两军配合进攻昆明，卢汉是招架不住的。从这一点，我又得到了一个相信“数”的例证。也就是哲学上的偶然性，往往在历史进程中起到出人意表的作用。

至于卢汉义释张群，张群在香港只告诉了我，他写了一封信给卢汉，但没有谈信的内容。在狱中我听李广平说，他曾从交信给卢汉的杨适生口中听到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对卢的处境他能理解。他本人无军权，留下也无用。望念昔日旧交，放他离去，则感激不尽。他保证今后到国外去当寓公，再不过问政治了。从而使我联想到，张群之得以脱险，关键还是卢汉和他的交情，对他的投桃报李，并不是因为他眉毛里那一颗痣。

说起云南易帜后的昆明争夺战，也是惊心动魄的。蒋介石得悉卢汉叛变后，马上命令汤尧以陆军副总司令身份飞到沾益组织指挥所，指挥第八军和廿六军加上五个宪兵团合力进攻昆明。十二月十五日，第八军的先头部队与卢汉的警戒部队，开始了接触。到十七日第八军为右翼、廿六军为左翼向昆明夹击。卢汉考虑到防守兵力支持不住，只好缩短防线御敌。卢本人日夜守在五华山上的警备司令部，他知道他下面的掌军的人如龙泽汇只是“绣花枕头”，根本不能打仗，所以只好亲自出马，夜晚就在沙发上躺一两个小时，可以说是拼上老命了。

先是十二月十三日当卢汉的部队开到昆明东郊的大板桥去缴第八军教导师的械时，双方就发生了战斗。卢汉就叫龙泽汇说服李弥夫人，当时她和被扣的李弥一起被安排住在龙泽汇家中，单独去到大板桥，劝告第八军部队停止军事行动。事实是她到了大板桥就对部队长说：“你们就打吧！打得越凶，炳仁（李弥的号）出来就越快。你们不打，炳仁就无法出来了。”而她回来以后答覆龙泽汇则说，保安团的炮弹打中了第八军的总部，死伤无数，激起第八军官兵的愤怒，表示非打到底不可。他们声称，只有见到李弥，才肯放下枪杆。李弥也就顺水推舟，表示只要他出去，就不会再打了。

但当李弥和他的夫人私下谈话时，问起她第八军官兵士气，在他们的寝室里，李夫人撩起她的旗袍说：“看！这就是他们的答覆。”原来使用鲜血写的“誓死报仇”！而且所有的签名也都是以血签下的，显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后来这段故事在第八军中传为佳话。

卢为了缓和第八军的进攻，决定放李弥走，但李弥并不答应以劝说第八军撤军为交换条件，只说他的部下攻城的口号是要救他，让卢汉看着办。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李弥自始至终表现为大丈夫气概。当卢汉的警卫营长龙云青冲进会客室大吼“举起手来，不准动！”时，其他的将领都被弄得目瞪口呆。只有李弥沉着地问：“这是搞什么名堂？”又当他和余程万双双关在五华山光复四楼一室时，卢汉派随身参谋、“起义”后升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杨肇骧去探视，余忙着和杨打招呼，而李则站到窗口念〈正气歌〉，给杨肇骧“极为倨傲”的印象，显示了军人本色。

第八军和廿六军分两路进攻昆明，十二月十八日进入最紧张的状态，十八日晚廿六军拿下了飞机场，十九日东南两线发起总攻，二十日后第八军占领了昆明以北高地，卢汉看事态

有点抵不住了，他知道廿六军进攻昆明的口号之一是营救余军长，而余本人也表示愿意说服廿六军“起义”，便决定释放余程万以缓和攻势。余于廿日打着白棋乘吉普车进入本军的炮兵阵地后，还带去了卢汉的四卡车银元。及时制止了向昆明开炮的行动，指挥部队退往呈贡。已经深入昆明东北部的第八军发觉友军停止射击，并已撤退，恐怕孤军深入遭遇不测，也只好撤退。所以到了廿日深夜一场激战戛然而止，连卢汉都感到意外。

到了廿一日炮火声全部停息，香港《星岛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昆明城郊混战”，倒楣的我，以拼命三郎的姿态上演了自投罗网送货上门不要收条的一幕。

杨肇骧以昆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一九六三年五月）首篇发表的“云南起义记事”一文关于我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接收大员〉的降临

十二月二十三日（按：应为二十一日）上午，香港英国环球航空公司来电给昆明的代理人汇利公司经理杨永昌，谓该公司有飞机一架将于上午十时飞昆。杨永昌接电后，即到五华山找省府总务处长邹凤石转报卢汉。卢汉就把我找去并指示：英国政府还没有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能让英国飞机飞来昆明。并叫我设法阻止。经我了解，去电阻止已来不及，空军电台又与英机无联络信号，不能阻其来昆，遂向卢汉建议仍让英机降落，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卢汉即命我到飞机场去处理。我先打电话给机场司令张有谷，请他把英国飞机扣留起来，驾驶员与乘客分开监视。我赶到飞机场时，英机业已降落。该机系送走张群的飞机，驾驶员系马来（西）亚人，与我见过几面。我找来翻译人员询知该机因前曾得卢汉发给准予维持昆港交通的许可证，见有人来包飞机，有钱可赚，所以又飞来了。我和张有谷检查飞机，除了几桶汽油之外，另无货物。机内乘客只有两人，其中一人为陆铿，云南保山人，曾任蒋介石《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一九四九年夏曾代表蒋介石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到昆明会见卢汉，与我也有一面之交。他见我后行色怆惶，立即将怀中所带信件撕碎揉成一团悄悄的掉在座椅下边，并向我介绍另一乘客说是贵阳造纸的经历，要求搭我的车子进城。我指定专人派车子分别将陆铿等二人和飞行员三人解往警备司令部，并将陆铿揉丢的文件找出来，但见上面都是一些密语。陆到警备司令部后见副司令许义浚，即请许说情（陆为许的内弟）。许不了解情况，未便作主。旋将陆等二人送陆军监狱管押，飞行员三人则送警察局看管。事后才了解，蒋介石已任命陆铿为李弥的云南省政府的教育厅长，陆铿是在香港国民党报纸登出“收复昆明”的消息后，向英国环球航空公司包了飞机，作为“接收大员”飞来昆明的。殊不知昆明并未被收复，“接收大员”成了送货上门的俘虏。英国飞机一架已被扣下，其驾驶员三人则经教育之后遣送出境。

汤尧在昆监谈国军进攻昆明失利及他率李弥、余程万赴台北见蒋介石经过， 关于国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日已攻入昆明，因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被卢汉收买临时退却，第八军恐孤军深入被歼，亦行撤退；传说余到台湾后已被蒋介石枪毙。我在狱中曾就此问汤尧，他告诉我余随他赴台并未被杀，蒋对未攻下昆明，反而以阿 Q 的哲学表示说：“留一点人情余地也好。”汤尧本人即以被派到大陆以陆军副总司令之身指挥军事，也是国军日落西山的写照，内部斗争始终未停。这段话事隔四十年，记忆模糊。一九八九年致函养老杭州的原总统府第三局局长、第九兵团司令，也是我昆监“同窗”的曹天戈中将，愿闻其祥。他于同年四月自杭州写来了〈一九五 0 年一月国民党部队在云南被歼始末〉一文并附诗一首：

半生戎马真耶梦，梦到残桥人乍醒，

敢教是非人怎说，留待终审付苍穹。

兹摘有关国府迁台初期内秘辛如下：

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顾祝同鉴于汤、李、余三人意见不能统一，特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周芸繁和空军第一区副司令易国瑞飞蒙自，邀汤尧、李弥、余程万三人飞往台湾详商。一月五日，汤、李、余三人飞抵台北，前往欢迎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对汤尧说：“陈诚当初极力反对顾祝同把国防部搬到台湾，经屡次交涉无效。另一方面，阎锡山已经组成袖珍内阁，也因为这个原因，准备迁往马尼拉。后来不知道谁的建议，利用孙立人和陈诚间的矛盾，就由国防部电令孙立人负责替国防部找办公房子。孙立人果然仗着国防部的撑腰，开了一个师到台北市警戒起来，这样，行政院和国防部才得在孙立人掩护下搬进台湾，陈诚为了这件事，气愤成病。他向蒋介石建议，把才逃回来的胡宗南赶回西昌，把顾祝同赶回大陆指挥军事，顾妻得知这个消息，天天哭泣，担心顾年老体弱，吃不了这样辛苦，所以正物色一位适当人选去代替。可是钱大钧、韩德勤等都不肯去，其他的人多半资望不符，不便提出，照目前情形看来，我想你倒可以承担代替一下，既可解除顾祝同的困难，又可减轻胡宗南的负担，他们自然会感激你，也会全力保荐你的。”汤尧表示愿意，但要求多给一些部队，许朗轩说：“目前不能要求部队太多，部队一多，就形成重点，又必然会牵涉到要顾总长亲自去指挥的问题。只要你将来有人，给你另成立十个军都可以。这不过是一时之计，等你在大陆站稳了脚，番号装备都不成问题。”汤尧也就动了心，对许朗轩说：“好吧！大势已去，大官都怕死，孤臣孽子就由我来当罢！”（这段话原是根据一九四八年何应钦在上海江湾军医院养病，汤尧前去探访时愤慨地有所指而对汤说的）。

一月五日晚，顾祝同当同汤、李、余三人去见蒋介石，蒋把汤先夸奖了一番，并说：“这次没有攻下昆明，留一点人情余地也好。”蒋又把李弥、余程万责备了一顿，又问余程万：“卢汉给了你多少钱？”余吞吞吐吐地回答说：“四万元银元”，蒋若无其事地说：“我给了卢汉很多钱，为什么只给你这一小点呢？”

狱中性饥饿与色胆包天

-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论语子罕）
-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监狱里的性饥饿，已到了恐怖的程度，不是亲历者，不能体会。白居易有诗：“壮者不可耐，饥火烧其肠。”这是指的缺乏食物。监狱里的犯人对此感受特别深切。而性饥饿，尤甚于烧肠之痛，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男女界限严格难得一见

云南省二监，因为是模范监，各方面都要做出模范成绩。在男女犯隔离方面，也是做得很认真的。首先，男女犯分别管理，平日根本见不到面。只有全狱的活动如监狱长或政委上大课，才同时集合在大操场上，这时，男女也才能引颈瞭望对方。但因管教人员一旁监视，稍不小心即被呵斥：“看什么？”搞不好，吃不完兜着走，当晚还得作重点检查，接受批判。

其次，所有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队长、指导员、干事，都是女干部。有时也有男性队长兼领女犯管教工作，但他的助手肯定是女的。他本人为了避嫌，也很少到女犯劳动场所，更不要说女犯住处了。

其次，由于同属被服厂，为了照应不可避免的生产片料分配、工序衔接、物质交流、技术交流，多半指定年纪较大、案情单纯、而且经过考验的男女犯进行公务接触，但都有干部

从旁监视，不得逾越各项规定。

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男女犯近距离如一两公尺内相看，那都是非常难得的。什么叫做“相看两不厌”，只在狱中一瞬间。

刑满留队接触机会增多

一般来说，彼此都当犯人期间，男女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微到几乎类似中六合彩。但刑满留队做所谓“生产员”以后，机会就比较多了。因为你本人已属半公民性质，不论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做了结论。干部在心理上要负的责任也相应减轻，加上一般每周可以回家或外出一次，见到异性也不会那样丧魂失魄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男性生产员，一旦出现在女犯中间，你会感到无数的眼光向你射来。如果你再找机会跟对方说上一两句话，你可以发现，对方所流露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如果碰巧传递一小件东西，比如一个线綻，一把尺子，两只手碰触那怕只是几厘米部位，你都会感到对方的手在发抖，甚至有一股热流传出。而眼睛里放射的语言，比李清照的词还要幽美，还要缠绵，还要引起丰富的联想。

春节大检查性饥饿暴露

到了每逢春节大检查，所有犯人都要分监、分舍把自己的行李物件钜细靡遗地全部抱到大操场，摊开来由干部检查。我在释放前两年的春节，从两个意识形态比较开放的干部口中，竟听到了不可想像的情况。

这次的大检查先从女犯队开始，她们来不及作任何事先准备，因为是突击，所以竟发现了一些想像不到的阳具，有的还沾着血迹。有橡皮的，有软木的，更多的是布套塞进棉花的，还有一个铝皮的，真是匪夷所思。这些女犯从那里弄来这些东西？其中一位干部说得妙，这证明人是万物之灵，可以由无变有。特别是女人，更是灵上加灵。不过，这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恐怖、多少残酷。

就在这次大检查的阴霾尚未散尽的时候，突然大厨房的伙食总管犯人李凤翘被点名检查了。原来，他利用干部对他的信任，掌握两千多人的吃饭事务，在一个负责烹调回教伙食犯人马培忠的同情下，和有时轮班到大伙房取回教伙食的女犯马竹英勾搭上了。

月黑风高夜男女犯偷情

李凤翘人高马大，马竹英青春年华，乾柴烈火，一点就燃。他们两个真是色胆包天，事先约好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李凤翘在深夜一时，趁马竹英在女犯宿舍轮值守夜之机，翻墙进入，由马竹英架梯相迎，成其好事。

事发后，负责厨房管教工作的干事李文达，除了向狱部检讨自己的失职外，特别组织一个检查小组叫李凤翘交代问题。俗话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虽监狱亦不例外。因此，犯人中很快便流传了“李马相会”的故事。甚至说，因为值夜班都是两人一组，李凤翘与马竹英的幽会第一、二次在另一女犯的怜悯下，放了他们两马。好事不过三，在“第三次接触”时，另外一个女犯就提出要分一杯羹了。只是李凤翘不中用，那种极为紧张的偷情，对他来说，一个已应付不了，岂可枪挑两巾帼？只好哀哀告饶，请求“宽大释放”。

事情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原来，马竹英的肚子大了。怀孕三个月后，终被检举揭发出来。

老干部承担小生命降生

幸而，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指导员严素清是一位老干部，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承担了责任。除了自己向公安厅劳改局写了检讨报告之外，还提出建议，由狱方另在监狱附近的林家院乡下为马竹英租屋一间，一切费用监狱负责，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严素清的论点是：这

是一个错误的情况下劳改工作出现的错误，但新的生命没有错。后来听说生出来是一个男婴，交由公家的育婴组织去扶养。这孩子如果健康成长，现在也该大学毕业了。

女干部偷情献身留队

犯人固然有性饥饿的问题，干部中同样有。一位湖南籍的女干事，就不惜献身给留队人员伙食团的管理员董家彦。这件事直到"文革"到临，在留队人员中开展政治运动才揭发、交代出来。这个夜莺的丈夫死得也奇特，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木工车间主任之尊，在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跑到监狱苹果园偷摘苹果，不慎失足跌落粪水池中淹死。

我常常被朋友问起，国民党的牢和共产党的牢哪个牢比较好坐？我的答覆是：从管理制度看，共产党的牢要好坐一些，因为它基本上按制度办事，不像国民党的牢有黑金之手渗入。但共产党的牢剥夺人知的权利，实行新闻封锁，大搞思想控制，更不要说像柏杨在台湾绿岛可以著书立说了。而且一般坐的时间太长，人们要活着出来很不容易。特别是遇着一些满脑子充满极左思想的干部，有时候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追根溯源，问题出在党性压倒人性的列宁主义上。而列宁主义不仅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如今还是中南海当局的指导思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摆脱了列宁主义的幽灵，中国这个民族也才能得救！

大杀人时差一点就被送上刑场

-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 *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唐元稹（放言五首）*

以中共的提法所谓"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中国大陆就解放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这一年零四个月时间，主要进行了政治布局、军事扫荡和经济整顿，从三个方面希图找到稳定政权之路。

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在二月廿一日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共廿一条。由于一九〇五年袁世凯当政时日本提出了廿一条，给中国人民的刺激太深，人们看到共产党提的镇反廿一条，自然产生一种连锁反应——怎么又是廿一条？

对我个人来说，廿一也是一个敏感的数字，一九四九年自东京经香港回昆明，一下飞机就被捕坐牢，正是十二月廿一日。现在，中共不仅制定了廿一条，而且选在廿一日公布，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你越有忌讳，忌讳的东西就越冲着你来。

准备杀人监狱加强管理

监狱里为迎接全国大镇反，采取了逐步收紧的措施，当然有些措施囚犯看不到，看得到的是，首先把原来按"以毒攻毒"原则起用军统特务担任监舍的管理员、服务员，一律收监。整个监房全部由解放军管理，规定囚犯有任何事包括解大小便，要请求开监房的门，都要喊"报告大军"，由值班的军士开门、关门。

其次是取消家属送饭，一律吃牢饭。沈醉和我及三中将戏称的"将王餐"也同时取消。五人各归各号，并规定我们，自当日起，即使互相遇见，也不准打招呼。原来准许囚犯晚饭后可以到操场散步、甚至打篮球，也统统取消。

原来，一大早、甚至天刚亮就有囚犯纷纷跑到大操场一端的大厕所解便，不分排道、监房，先到先蹲；镇反开始后，也规定要一个排道、一个排道地集体解大便，限制每次四十人蹲四十个茅坑，只准五分钟就要“完成任务”，一听哨子响，就得揩揩屁股、拉起裤子，让第二批人去解。

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唐事。但实践证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是无穷大，可以创造奇迹，向一切不可能挑战。

最初一两天，还听到有人向管理的军士请求宽限一两分钟，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几天之后，但见每四十人排队一批批地走向茅坑，背对背分两边蹲下，不要一两分钟就听到霹雳啪啦一阵粪便入坑声，不能不佩服“人为万物之灵”。

强迫学习镇压自己条款

“镇反”运动开展前，规定每晚学习监规纪律两小时，而镇反运动展开后，则改为全天学习。除了上午十时、下午五时两餐饭之外，就是围着镇反条例廿一条谈认识、谈体会。已经谈得无话可说了，还得深入再深入。

中共自认为革命政党，把所有反对它的个人和团体一律视为反革命，根本不承认有政治犯。在他们看来，承认政治犯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对无产阶级说来，“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国家所必须对人民负责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务”（见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二日北京《人民日报》社论）。而且用毛泽东的话来强调：“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因此，在镇反条例中，从第三条起，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直到第十五条，都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只是提法改变一下，定为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最轻也要处三年或五年徒刑。

不仅条例突出从重，而且在第十七条中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

学习镇反条例的同时，还要学习中共中央讨论书记彭真有关镇反的报告。最莫名其妙的是彭真引用所谓责备共产党宽大无边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其实这是一句反讽，彭真却把它作为镇反的舆论依据，结果就是杀人越多越好。

在安排所有囚徒学习镇反条例廿一条后，监狱当局毫不隐瞒地向被囚者表示：现在全国开展镇反，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你们最好放规矩一点。并抓紧时间，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减轻或免予处刑。

最残忍的，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被杀者在被杀前要根据官方公布的条例，一一“对号入座”，说明自己该死，有的还加上一句“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毫无反抗意图，而是引颈就戮。这反映无产阶级专政它就能凭恐怖造成这种完全违背人性的局面。

五一年大镇反，昆明是三月三日开始的，人称“三·三镇反”，当时为了教育群众，实际上是吓唬群众要规规矩矩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除零星枪毙人外，每周六或周日举行一次镇反游街示众。把要杀的人，五花大绑，背后挥上一纸糊的标子，上写反革命分子，由军警押解，平均两人押一人，站在敞蓬大卡车上，车队最前一辆车高悬毛泽东语录：“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还由军乐队引导，沿途吹杀人军号。

当时，昆明监狱尚在市内钱局街，第二年才迁往西郊，因此，在押的人在监房内都能清晰地听到：“哒，哒哒底！……哒哒底哒哒！哒哒，……哒底哒，底哒哒哒，哒哒哒！”的号声，不约而同地说：“杀人号响了！”

从三月三日起，光是从钱局街监狱拉出去枪毙的人，每周三十六个，几乎成了规律。而

三月三日第一批枪毙的，原来和沈醉及我五人一块吃饭的国民党三中将柏天民、唐宇纵、罗春波都无一幸免。通常是枪毙人的早晨才张贴出布告。群众围观后，如发现自己的亲人在布告上，就要准备到黄土坡刑场收尸。有些家属和街上的小孩还跟着敞蓬大卡车跑。这些具体情况是我释放回家以后才得知的。

待决之囚表现从容镇定

镇反期间，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待决之囚表现的从容、镇定，毫无张惶失措的样子。只是在监方加强管理，如解便排队并严禁互相交谈的规定宣布后，我发现了一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穿上了各人自己的新衣。

原来，监方对在押者穿衣并无明确规定，什么衣服准穿，什么衣服不准穿，从未提及。而发的囚衣，只是每人每年一套单衣裤，每两年一件棉衣，如此而已。平日大家都是补钉盖补钉地穿。镇反风暴到来时，忽然之间，各人都把初入监时带进的衣服不约而同地穿出来了。中山装、西装、夹克、大衣、毛衣、甚至罗斯福呢的军装，都一一出现。这意味着，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迟早是要被枪决的，还爱惜什么衣服，反正都要充公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本来是李商隐写男女之情的名句。牢狱生活告诉我，真能体现这句诗的神髓的，只有彼此都是待决之囚才反映得特别深刻。

人的眼睛会讲话，也是在镇反高潮时发现的。当头一天听到杀人号吹过，第二天在操场排队等候解便时，但见人们互相用眼睛打招呼、说再见。有的是一睁一闭，流露一种凄凉之情；表示说：来生再见！有的眼露微笑，表示好好保重，不要难过。有的则怒目圆睁，反映胸中充满愤恨。也有的邪着眼露出鄙视的眼神，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曾任中央社总社编辑部主任、昆明《中央日报》社长的钱沧硕先生穿了一件蓝布大褂，曾任中央社昆明分社主任及云南省新闻处长的潘仲鲁先生穿了中山装不约而同地向我打招呼，沧老特别把眼镜取下来，微微点首，藉示道别，从此未得再见，潘仲鲁兄两眼紧闭，还用手托着下巴。出狱后得知，钱、潘两位是三月中旬同日受难的。

当时，枪毙人都是凌晨四点多五点，由值岗的卫兵走进监舍的排道对准每个门洞喊“某某号收行李”。大约十五分廿分钟开门，让你自己背着行李出来，在岗位上集合，然后押上卡车到指定地点听候宣判；宣判后游街示众再枪毙。因此，有的人睡不着就竖起耳朵听，只要听到喊“某某号收行李”，就知道又“走”了一个。

杀四〇九却错喊四〇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喊“406”！一翻身爬起来，就向门洞张望，因为监房是不关灯的，所以模糊看到一个戴军帽的头对着我下命令：“406 收行李！”

“五雷轰顶”是旧小说里的字眼。我当即感觉好像轰的一声炸雷从天而降，似乎一股特大的气流当顶压了下来，一下震昏了。接着，产生了一个意识：难道就这样完了吗？自己给自己的答案是不行！不能这样死掉。于是鼓起勇气，高声大叫：“报告大军！”

很快地，一个军士来到监房，冲着门洞问：“叫什么？”我说：“我是 406，报告大军，恐怕是弄错了？”他说：“错什么，叫你收行李，你就收行李。”我大声说：“我还没有结案呢！”意思就是案都没有结，怎么就要上刑场？

我一面收行李，一面想到老婆、孩子，不禁悲从中来。

所有同房的人全都醒了，有的还乾脆坐起来，看我卷铺盖，但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正做到了死寂。

大概过了十分多钟，听到排道里又有脚步声了，脚步声中止在我的监房门外，原来叫我收行李的那个军士，重新发出了命令：“406，铺盖打开继续睡觉。409，收行李。”说罢，就离开了。

但见409一骨碌爬了起来，他的愤怒不是对着监狱执勤军士，而是对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

我向他表示：“我知道我还没有结案，我只是说，恐怕是弄错了。我绝没有意攀扯你呀！”

这时，405 号开腔了！“409，你也可以报告呀！”过去被称为沈胖子的原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为了打破僵局，提出了他的建议。

于是，409大声喊：“报告大军！”岗位上回应很快，原来给他下命令收行李的军士又来到门洞外，409说：“报告大军！我也是搞错了。”对方很干脆：“没错，你不是叫沈焕章吗？快收拾你的行李。”话还未讲完，但见沈焕章一下就瘫在床上，泪如泉涌。整个房里再度出现一片死寂。

还是409打破了沈默。他坐起身来跟我说：“老陆！黄泉路是不好走的。我连袜子都没有一双。你的袜子能不能给我一双？”

我连说：“当然，当然。”一面选一双长筒袜递给他。

沈焕章穿好袜子，背着行李准备走出监房之前，最后的话是：“我只有一桩心事拜托同房的各位，今后不论哪位有机会到台湾，请设法告诉我太太，我是什么时候走的。”

原来，沈焕章随国府机关撤退，事先把太太、儿子送到了台湾。他原定十二月十日自昆明飞海南岛转飞台湾，那知倒楣偏偏遇到卢汉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从此变成了阶下囚，并冤枉送了性命。本来，监规规定是不准互谈案情的。到了镇反运动开展后，大家巧妙地藉“联系实际”暴露了案情。沈焕章是青海人，研究藏传佛教，认识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曾护送班禅入藏，任顾问兼无线电总台台长。被捕前最后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第二处处长，就因这个身份被划为特务。审讯人员所持的理由是，所有军事部门的G2 都是搞情报的，为什么独有沈焕章例外。因而指他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事实是当时的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认为，西昌地处藏族地区，为了表示重视民族团结，第一处按例主管人事、总务，第二处就管民族事务。而把主管情报改为第三处。谁会想到这一番对藏族的好意，竟使沈焕章蒙下白之冤而送命。

新新闻联系上了沈太太

我一九七八年自昆明经北京到了香港，一九八〇年访问台湾，和老友蒋纬国将军重逢吃第一餐饭时，就拜托他代寻沈焕章夫人的下落，纬国说，沈太太的姓名都不知道，相隔数十年，要想找到她，只有靠上帝了。不过，他愿意尽力而为。当时，受命临时监视我的安全局沈处长在座，也表示愿意尽力。

一九八二年我因一篇《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一九九〇年走下黑名单，再度多次来台。一九九二年八月，应邀到《新新闻》和编辑部的编辑记者漫谈新闻生涯，谈到了406与409的错号，陈柔缙小姐于该刊二八三期作了报导。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报导被沈焕章太太的朋友看到了，并转给了在基隆市立医院养病的沈太大。沈太太在这个医院当护士数十年，已退休，因瘫痪而住院。她的儿子也不幸得了精神病。她得知四十年无音信的先生的下落后很激动，写信表示希望和我见见面。我由陈小姐开车到基隆会见了躺在病床上的饱经忧患、一生苦难、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向她详细讲述了沈先生遇害的经过。她当时表示，对丈夫的冤死虽然很难过，但知道了下落，那怕是坏的下落，也比没有下落好。

无论如何心可以放下了。

翌年，得悉沈太太病逝基隆的消息，我唯一的祈祷就是她能和睽违四十多年的沈先生在天堂见面，像他们这样善良的人，是应当进天堂的。

奉命译美国牧师自白书

回头再谈一下，当我被命令收行李上刑场时，凭什么说：“我的案还没有结呢？”这是有根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镇反条例公布后，头脑特别敏锐的关押在监狱的人马上就断言：“共产党要杀人了。”有的还说：“要大杀特杀。”

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热河省主席、陆军上将孙渡，当时也关在昆明监狱。他告诉我，年轻时曾读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镇压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孙渡这话说了不久，他因在战犯之列，被移送重庆集中，后来与沈醉、马锳等转送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

就在孙、沈、马等移走不久，云南省公安厅负责审讯工作的一位科长（后升任处长）胡殿斌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

他说：“镇反条例你们已经开始学了。有的犯人反应说共产党要杀人了。是要杀人。但不会杀你，因为你的案子还没有结，你的案子案情太复杂，需要到国外去调查。你来自东京，起码要到东京去调查。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还不可能派人到日本去。过去，刘部长已经告诉过你，连派人到香港去调查，暂时都有困难，因此希望你坦白交代。你咬定回云南是接家眷，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我们和你都不能急。也就是说，短期内对你还不能作出结论。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们有一个外籍犯人，他叫莫瑞斯，是美国牧师，作恶很多，我们让他写了一个坦白书，一时找不到人翻译，就由你来翻吧！”

我当即表示，我的英文程度差，如果翻译不准确，会影响案情的处理，是不是另找高手。胡当即说，就是你了，有困难我们给你一本字典。另外派两个犯人做你的助手，查查字典，抄抄写写，三人集体行动。原来是为了互相监督，我当时只能幽默地想，共产党也懂“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所幸派来的原来是彼此已有接触的“窗友”（铁窗之友也）。一个是空军上校徐应鹏，一个是陆军少校董坤维。坤维是云大前身东陆大学创校校长董泽、雨苍先生的长公子、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外甥。军校毕业后，在军队工作一段就弃武就文，在昆明一家美术社搞设计，也被天翻地覆的大风暴卷进了监狱。

监狱交下翻译的莫瑞斯的《自白书》（Morris，My Confession），写了厚厚一本，可惜他的名字已忘，只记得姓氏，是美国奥克拉荷马（Oklahoma）人。他先被派到云南丽江一带传教，深入纳西族人社会，除传播基督教义外，在帮助发展纳西族文化、特别是对纳西语文拼音化作了一些贡献。在医疗卫生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他的问题，据他自己交代，主要是男女问题。在一九五〇年监狱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就发动一个名叫鲁殿光的女大学生，在犯人大会上揭发了被莫瑞斯诱奸的经过，而且绘声绘影。莫瑞斯在《自白书》里也坦陈了这件事，并交代了和一位马县长的两个太太发生了男女关系的经过。马县长是国民党的官，共产党接管大陆后被捕劳改，两个太太生活无着，依靠教会，并替教会工作，结果为莫瑞斯所乘。莫瑞斯作为一个牧师，起码是背叛了耶稣基督，违犯了十诫。他大概在镇反高潮过后，就释放回美国了。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由美西飞美东中途在奥克拉荷马小停，还一度泛起打听莫瑞斯下落的念头。

妹夫之死和胞妹被斗——兼谈云南小台湾和龙云

●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宋·欧阳修（纵囚论）

枪毙前大叫，赶快来收尸

就当我在看守所时，得到了我妹夫穆凤藻的死讯，他死的很惨，但很壮烈。据我妹妹敬贤后来告诉我，凤藻被杀的那一天，五花大绑，在云南峨山县城游街示众。经过其家门口时，大声喊道："四妹快来帮我收尸呀！"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即我的胞妹其时正在昆明陪嫂嫂给我送饭，只好叫他自己的妹妹收尸。这也因为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杀人是只管杀、不管掩埋的。

一个人上法场接受枪毙之前，还这么镇静，是要有一些定力的。记得陈公博在苏州监狱枪毙前，打个盘脚坐下之后，回头向行刑者说："请吧！"何等的从容。虽然他是人民痛恨的汉奸。

我妹夫穆凤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毕业后就参加康泽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抗战后，别动总队改编为正规部队，他才改在正规部队里当个副营长，后升为副团长。抗战末期调到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因上级指挥错误，战斗失利，翻过野人山退回到滇西。不久也就退伍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易帜后，一时各地地方武装蜂起，有的是基于习惯性的反共，听到卢汉靠拢共产党，心有不甘，凭着自己手里控制者一些枪就干了起来；有的是完全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认为可以像国民党时代那样搞一个山头割据，霸占一个山寨，关起门来，继续其"独立王国"的生涯。更多的是接受国民党的委任状，组织起"反共救国军"来，利用无线电跟台湾或云南境外的国民党组织或部队联络。打出的旗子，五花八门，有"反共救国军"、"反共自救军"、"人民救国军"、"人民革命党"、"人民自卫军"；一些反共青年也组织了"大同党"、"自由党"、"民主党"、"青年反共党"、"社会青年党"、"中国人民党"等等，当时在云南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反共武装。单是后来被蒋介石派为省政府主席的李弥，在滇南就组织了几百股总数超过亡人的武装队伍。凭着山高、林密、箐深、交通不便，民族杂居和出入国境方便等条件，与共产党政权展开了斗争。我的妹夫因为他有军事训练基础和实地作战经验，便被他家乡峨山县的反共人士拥戴，接受了"滇南人民反共自卫军"金绍云的委派，一度带着队伍攻打过易门县城，以与金绍云呼应。结果成了时代的祭品。

义助丁中江，被列入另册

再说我胞妹敬贤，她本来在襄阳省立五中初中毕业，与杨惜珍同班，准备上高中。抗日的烽火突起，加上母亲病故，父亲便把她嫁给了别动总队的已婚男老乡穆凤藻。穆是一个头脑单纯、生性耿直、木讷于言的军人，和我妹妹几乎很少说话。那时我已回到云南，妹妹写给我的信里有一句话，令我永远难忘："日本人的侵略，迫使我成为爹卸脱家庭责任的牺牲品！"

随着日本侵略深入中国腹地，"嫁鸡随鸡"，她跟穆凤藻回到云南峨山穆家。穆参加远征

军赴缅甸，她就带着孩子在当地国民小学教书，小镇上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人称“陆老师”。

云南宣布起义时，她恰好来昆明看刚刚开设牙医诊所的既是老同学、又是嫂嫂的杨惜珍，暂留昆明。卢汉的“昆明保卫战”结束后，原准备返峨山，未料，原任《平民日报》社长的丁中江，已成为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捉拿的首名要犯。中江决定逃跑，我妹妹陆敬贤就被选择作为掩护的条件。当时他们化装成一对乡下夫妇，由大观楼下船，横渡滇池到呈贡，乘夜启行，送行的只有丁伯母一人。那知到呈贡时，国军廿六军已先一日撤走，中江失去了要找的目标，乃和敬贤折返昆明，躲藏在滇池边的福海村。直到一九五０年一月，才由他一个表兄赵仁甲陪同乘车逃向中缅边境，不料将抵缅境时，汽车不慎翻车落入谷底，全车仅中江一人奇迹般的得活，最后终于脱险偷越国境。敬贤则被逮捕，并遭刑讯，但坚不吐实。就像她后来表示的，我宁愿以死保护丁大哥，因为他重要，我不重要。所以未有交待出丁中江下落。她本人则因多次被拳打脚踢，从此罹患心脏病。继后三十年，直到一九八０年她因心脏病在昆明去世为止，每逢大陆发动政治运动，她都以掩护丁中江外逃罪名，成为斗争对象。长期成为大陆列入另册的“内控对象”，一直控死为止。

云南小台湾，孤山扯大旗

回头再说，与我妹夫发动叛乱直接由关系的金绍云是五十年代初云南三大反共组织中的一支。他的叔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金汉鼎上将，金是朱德在护国军时的战友，其级别比朱德还要高。金绍云凭藉其叔父的声望，在华宁、江川、澄江一带独霸一方，利用小孤山四面环水的地势，成立了他的独立王国。

这座小孤山实际上是一个岛，它矗立玉溪地区晶莹秀丽的抚山湖中，气势巍峨，风景绝佳。陈赓、宋任穷率二野四兵团进驻云南后，曾多方设法招抚金绍云，金不但不理，反而扯起了“滇南人民反共自卫军”的旗帜，加强了岛上的防御，凭险据守，并称这个岛为“云南小台湾”。

到了五０年九月，陈赓派出了四兵团的精锐警备师向“小台湾”发动了攻击，金绍云利用乱石作掩护，全力抵抗，但因共军来势太猛，只好放弃滩头阵地，固守小孤山的主峰。后来共军除正面进攻外，还派突击队攀登上岩羊也难攀登的绝壁，向小孤山南北面迂回，金绍云见大势已去，才带着一批心腹乘坐大木船向抚仙湖的北面撤退。因为船上人太挤，金绍云为了博得部下的效忠，同舟共济，竟把自己的妻子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打死，以免超载翻船。金绍云最终于水中被俘以后，仍以仇视的眼光昂首望着小孤山顶刚刚换上的五星红旗。

监狱的干部用这个他们所谓的“反面教材”教育我们这些“犯人”，印证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即被打倒的剥削者必然力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但我在大陆近三十年所见所闻，像金绍云这样的“拼命三郎”，以少敌多，搏斗到死，是很少很少的。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部队在兵败如山倒的狂潮中，绝大多数都是不战而溃。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犹作困兽之斗者，更是稀有动物。

龙云在昆明批评共产党

一九五０年我在监狱中眼看到不少参加对中共武装斗争失败后被捕的人，不断被押解进来，各个都是垂头丧气，安纯三就是其中之一。

安纯三原来是卢汉下面的一个师长，当国共内战形式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时，受命当了昭通专员。昭通是龙云、卢汉的故乡，这里的专员传统上都有为龙、卢管家护院的责任。安纯三到昭通不久，响应卢汉的“保境安民”口号，和龙云的三儿子人称龙三的龙绳曾联合

策划了“云南人民革命军”，由安纯三任总司令兼第二纵队司令，龙三任第一纵队司令，总队下有支队，支队下有大队，总人数约一万左右。

当时龙云在香港积极策划云南起义，看到卢汉举棋不定，便想自己在云南组织一些武装力量，除派旧部万保邦在滇南组织了“云南人民革命军”外，直接命令安纯三和他的三儿子在滇东动起来。到卢汉起义后，安纯三和龙三照理应跟着起义，接受改编，他们却另谋“高就”，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扯出了滇东南反共救国军的旗帜。后来中共派兵进剿，安纯三投降被俘，龙三则极力抵抗，最后退守龙家大院被火箭炮消灭，全家大大小小除了跟一个滇剧女演员生的孩子小宝福得以保命外，全部被打死。

一九五 0 年龙云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回到昆明公开批评中共说:“龙绳曾反革命，杀他是应该的，但小孩子没有罪，一起杀掉，实在说不过去。”

一九五七年龙云被划为右派，表面原因固然是他批评了苏联，而深层次原因，我一九八五奶奶在北京听一位民革中央任高职的朋友说，他的桀骜不驯的态度，早就触怒了毛泽东。他在南京时经常骂蒋介石，跑到北方有经常骂毛泽东。他不懂得毛泽东是不能骂的。

九十年代北京拍摄的《龙云与蒋介石》，对龙云作了异乎寻常的肯定，从一个角度反应了邓小平时代的特色。

被划为“亲美反苏极右份子”

●谀言顺意而易说，直言逆耳而触怒。——宋·欧阳修（为君难论下）

●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明·朱柏庐（治家格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我自日本东京经香港飞返昆明一下飞机就被捕，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才获释放回家。入狱之日，体重八十一公斤，狱中得肺病，最严重阶段，体重减到五十二公斤，真是“判若两人”。释放前，被安排和干部生活一段时间，稍得恢复。

离开监狱之日，公安部明确告诉我：“你出去，就在家里休息休息，不要做任何事。以你的身份，也很难安排工作。根据你的历史情况，安排低了，对外影响不好；安排高了，我们不放心。好在你爱人是个牙科医生，生活没有问题。”

回到家里以后，主要是养病。妻子杨惜珍除了负责家庭生活，还要照顾孩子。从我来说，不要说购买书报，连理发钱都得她供应。她为了我的自尊，常常塞一些零花钱在我口袋里，但我心里总感到不适味道，因此常常会无名火起。

教缅甸总领事中文叫停

恰巧，缅甸在昆明开设总领事馆，总领事吴茂茂铎在北京缅甸大使馆任参事时，就请了一位教授用英文教中文。到昆明后，找不到适当的人教，我经一位朋友介绍去应聘，虽然我的英文程度很差，但因他学的是当时中国外长陈毅的演讲词，我还可以对付；于是双方讲好，每周教一次，每次两小时，付酬人民币十五元。这样，我每月可以有六十元收入。

哪知教了三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突然一位公安厅的处长跑到我家里，声称要做我的“参谋长”。参谋什么呢？原来是建议我别给缅甸总领事做中文教师了。理由是，“你讲任何一句话，对缅甸总领事来说都是情报。而你这个人一向直言无忌，我们和你打交道四年多，太了

解你了。”因此，劝我就在家里继续休息，反正有一个工资较高的医生老婆。

我说：“靠老婆吃饭，在旧社会是耻辱，在新社会是剥削。这种日子不能过。我必须自力更生。”对方听了我的表态后，就问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做？我说：“今天，一切都讲‘组织’，没有组织关系是无法找到工作的，这你们比我清楚。”他反问：“你不是有很多朋友吗？”我说：“提起朋友，解放前的昆明市长，解放后任副市长的曾恕怀，是朋友，但连他的亲侄儿想找个工作都找不到。”再问：“北京方面呢？”我说：“北京方面我只认识邵力子和张治中两位先生。”他说：“那你就给他们写封信吧！”我当即拒绝说：“我从来没有写信求职的习惯。”他撂下一句话：“你再考虑考虑吧！”就告别而去。

周恩来安排我参加统战

第二天，这位“参谋长”又来了，也表示他们已经研究了。建议我给邵力子先生写封信。因为，我在关押期间，邵先生在北京听说我在昆明坐监死了。还由民革中央派专人到昆明了解情况。他们答覆说，陆铿并没有死，还在继续改造。“邵先生既然这样关心你，你也应该给邵先生去封信。”

我听了参谋长的意见后，仍然表示不愿意写。不料对方说，你就写是我们要你写的。我看非写不可了，于是提笔给邵先生一信，感谢他对我的关爱，并谈了别后迄当时的情况。

想不到，邵先生很快就有了回信。他的信中有几句话，我至今仍记忆清楚：“几年来均以你况为念。今得来信，快何如之。周恩来总理经余转达，亦表关切。盼即寄一简单自传来京。”

自传寄出不久，云南方面即通知说：“中央指示，请就近参加统战，在云南省政协工作。”

于是，我向吴茂茂铎告别。回忆我和他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最可怕的，因为什么坏事都敢做。”

省政协在我参加工作后，组织了廿几位国民党将领，经常写稿，对外广播或发表于海外中文报刊，为统一大业效劳，而我就被派为这班人改稿。由于很多人过去都是朋友，所以工作氛围还算轻松。

到一九五六年省政协大会时，我被推代表阮肇昌、周开勋、陈子干、管长治、李慕郓、×××等六位国民党将领、一位国民党立委杨适生和我自己八人以“国共第三次合作”为题发言，进一步为中共统战作吹鼓手，朋辈戏称“八仙过海”。

听毛泽东鼓吹“双百”发言

一九五七年三月，被邀请聆听二月廿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以及三月十二日的讲话，我当时的感觉是，毛的话相当诚恳。他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指中央）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毛号召共产党外的一切志士仁人，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当时，毛提出这些论点的背景是，中共建政七年，经过土地改革、“镇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了，剩下的主要是他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为了集中力量建设强大的国家，就根据“双百方针”，于五七年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整风鸣放。而在国际上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作了批判史达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共也不能不是一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大鸣大放，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毛泽东当时能因势利导，就像他后来说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中国大陆通过鸣放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说不定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可能在三十年前就得以发芽。无奈毛泽东在精神状态上是一个“纸老虎”，一戳就破。特别对“党天下”的批判，他错误地认为是民主党派要造反了。他对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意见，不加分辨地一律视为对中共的挑战，认为人家要跟他夺江山，于是翻脸。把神舟大地出现的一点民主生机，用最恶劣的手段扼杀掉，公开宣称这是“阳谋”，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列入专政对象，而且，一专就是廿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据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他们三位建议举行反右运动卅年纪念的报告透露，到一九八六年还有右派生活在福建的深山里。

提“化敌为友”响应大鸣放

一九五七年四月底五月初，大鸣大放在全国展开，老作家、我的同宗大姐陆晶清从上海写信到昆明给我，劈头第一句话即：“春风是否吹到了春城？”原因是当时在大陆，政治气氛确有春风荡漾的味道。特别是知识分子颇有一点受宠若惊、喜不自胜的感觉，于是在互相通信时，大都互相鼓励鸣放。我考虑到一封简单的信，说不清春城的春色，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春到春城〉。介绍了后来被称为“右派言论”的一些讲话，比如云南省副省长龚自知指出“一方面大丰收，一方面饿死人。这一现象我不能理解。”一位“起义将领”说：“共产党不是‘立信’，而是‘立怕’。”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毛主席不是不能唱红娘，而是要唱‘三堂会审’。”（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幽默地说，周恩来可以唱红娘，他就不行）。一位医生更写了一首很妙的诗，题为〈再续《阿 Q 正传》〉；“自从入城以来，大小纱帽乱戴，有的称侯称王，有的制台抚台。老爷做堂理事，干部站立两旁，下跪知识分子，旧的技术人员。哪些出身不好，哪些常发牢骚，哪些历史复杂，哪些常反领导，哪些纯技术观点，总之，不是好人，与我在屁股上打、打、打，有的挨打八百，有的打了三千，有的两臀红肿，有的皮开肉绽，这是上级帮助，首先承认错误，从此觉悟提高，然后叩谢恩典。左思右想，浮想联翩，辗转反侧，终夜不眠。《阿 Q 正传》，再读一遍。”

陈晶清大姐看到我给她的文章，回信告诉我，如果发言，最好不要谈个人遭遇（指我曾冤冤枉枉地关押了四年多），要从大处着眼。

这是我后来发言，为什么拣大题目的原因之一。

中共云南省政协党组，动员在云南的民主人士大鸣大放，我是对象之一，由政协秘书长杨青田找我谈话，鼓励鸣放。第一次我以不懂中共的政策婉拒。第二次，说怕提不出什么好意见，而他指出我曾到过三十四个国家，见多识广，发言质量一定高。第三次我就干脆告诉他，我有顾虑，万一讲得不对头，算起账来如何得了。杨向我重申了“毛主席的政策”：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无则加勉。

告诉我有话尽管说，说错了也无所谓。

于是，我辈说服了，决定在千人大会上向共产党体保护三点建议：

一、考虑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理由是：天下事未可料，不但中美两国人民会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和灭国政府也会有一天友好相处的。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在国际关系上应该避免小家子气。美国政府仇视我国是他的事，共产党应当拿出解放全人类的气度，化乖戾为祥和。从远处看，中国永远不会亡，美国也会永远存在世界上。

二、建议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各大学改学英文以代俄文。理由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在国际关系上和学习先进经验上都显得相当偏狭。不少共产党员的思想中，凡是苏联的都是好的，凡是美国的都是坏得。不但政治上如此，科学上也如此。结果为世界所公认不可少的工具知识——英文，都以应用范围显然狭窄的多的俄文代替。像这样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恐怕是不容易的。过去由于政治上强调一边倒，在很多事情上造成盲目地学习苏联，使建设事业在某些方面受了损失。

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来，虽然也偶尔提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学习，但总显得有些羞羞答答的。为了使国家现代化，大学里应改学英文，扩大视野。

三、建议准许办民间报，唱唱对台戏也不妨。理由：现在只有官报，没有民报，民主空气就很难说。读者读报，无所选择，形成“强迫与志愿相结合”；为了发扬“双百方针”，允许一些老记者办民间报纸与党报唱唱“对台戏”也不妨。关键在于：报纸究竟是办成教科书、布告牌，还是办成人人所乐于享用的精神食粮。

（以上建议均见一九五七年七月昆明出版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辑要》一书。有趣的是，全国右派分子言论涉及外交的竟出于两个云南土包子，一为我提对美化敌为友；一为龙云就抗美援朝批评苏联不尽国际义务，反而为军火供应向中国逼债。）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当我把此三点建议为主要内容的发言稿写好后，拿去请好友丁中江的老母丁李毓英女士过目。中江兄弟幼承母训，得益良多。我自一九四一年与中江结交后，即蒙丁伯母教诲有加。一九五四年出狱后，每周至少向老人家请益三次，老人洞察世事之深刻，为许多政治人物所不及。她看了我的发言稿后，及时向我提出警告：

“多言贾祸，历史殷鉴不远。社会已有‘放长线钓大鱼’之议，何必冒险？”我乃禀告老人，我亲耳聆听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录音，语极诚恳，如自食其言，何以取信于民？丁伯母笑曰，中国有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由于云南地处边陲，信息不灵，北京《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我仍放言高论，结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赶上了“鸣放末班车”。我发言后，当即听到一片叫好声。有的说：“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有的说：“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大记者，发言具有国际水平。”我听了这些溢美之辞，颇为得意，陶醉于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可笑情景中。

不料，就当我的言论以大字标题在《云南日报》登载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云南政协党组宣布为亲美反苏的极右分子。政协政治学校拉起了大横标：“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陆铿揪出来！”接着就是大会套中会，中会套小会，小会在转大会，一个紧跟一个地斗争开来，命我彻底交代猖狂向党进攻的动机、企图、目的。

最初，我不服，我说：“这些话不是我自己要讲，而是你们请我来讲的。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请人讲话，讲了又来算帐？”

政协负责人说：“不错，使我们请你讲的，你为什么不讲好话，偏偏要讲这些坏话？”

“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话！”——我抗辩。

“是站在你反动立场这样看的！”——他答覆。

我气极了，真想臭骂他几句：再一想，骂有什么用？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除了你不想活，只能忍气吞声。正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为一个人举办一个展览

为我一个人的言论（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讲话）举办一个展览会，在我一生中也是个很别致的经历。

“右派分子陆铿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展览”，在我被揪出批斗一个月后，在云南省商会大厅里举行，两千多尺面积的大厅，四周墙上贴满了揭发批判我的漫画和文字。当局的要求是不但要把我斗倒，而且要把我批臭。

在这个原则下，揭发批判都是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展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陆铿其人，把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工作，说成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甚至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暗通款曲。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欧洲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说成是为美帝张目。把国共和谈时采访报道和谈新闻，说成是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舆论。把在南京《中央日报》揭露孔宋大贪污案，说成是“狗咬狗”。把握独立办报，被国民党查封，本人在广州下狱，后转东京继续奋斗，说成是妄图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于美帝支持下在中国粉墨登场。甚至把我被迫加入统战行列、参加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字工作，说成是与台湾方面勾结，钻入人民队伍，破坏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大业。如果按照展览指出的我的罪行，不要说终身劳改了，杀头都够资格。

展览的第二、第三部分更滑稽，分别用我的两段讲话做靶子，然后大作文章。如“陆铿要我们与美帝化敌为友”，然后，就以“美帝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为题，从“望厦条约”讲起，列举美国一系列侵华罪行，最后得出结论：陆铿的主张是要使中国变成为美帝殖民地。在“陆铿攻击苏联、反对学俄文”的栏目下，列举苏联建国以来一些列伟大成就和帮助中国的不朽功勋，把世界上一切重要发明都说成是俄国人发明的。最荒唐的莫过于说无线电也是俄国人发明的。而意大利的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早已成为中国中小学生的常识。

展览展出一周后，负责当局要我也去看看，用他们的话是“接受教育”。我看了以后，不但不觉得好气，反而觉得好笑。监督参观的人问我笑什么？我顾左右而言他地指出：“你看，这张像，画得很像我，胖嘟嘟的！挺有意思。”

事后，负责人文：“陆铿看了展览，反应如何？”监督者就据实以报。引起负责人大怒，把经手筹备展览的一个名叫赵邦屏的干部喊去训了一顿：“你们怎么搞得？不但没有按照领导意图丑化右派分子，反而美化右派分子，连右派分子本人看了都说有意思。赶紧改画！”

又过了两天，我被通知，第二次参观，我问：“不刚刚参观过吗？怎么又要参观？”监督者才讲出了内情。这次参观，我别的都不注意，只注意我的画像，一看，原来脸全部变了，胖改变瘦不说，并且一律涂上绿色，中间带黑，给人以阴森的印象。负责人喊着我的名问：“陆铿，你再次参观了展览，思想上有什么反应？”我说：“所有陆铿的像都不像陆铿，参观者可能会怀疑展览材料的真实性呢！”他听了我的答话，显出一脸尷尬的表情。

我被点名批斗之初，是有些懊悔的，思想上找出各种可以逃避这一灾难的可能性来自我谴责。

比如，如不参加统战，如不接到陆晶清大姐的信，如听从丁伯母的话……等等，后来经过思想斗争，得出结论，像我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即使一言不发，也会被划为右派。原因是平日的言论，就够右的；加上大陆报纸全部由官办，反右一起，所有报社的投稿都送到北京集中审查，凡是右派言论趋向的，一律发交投稿者的所在单位，予以追究。后来得知，我写的〈春到山城〉一文，虽未发表，亦已由上海《文摘报》转来昆明。

思想通了，批斗就批斗吧！反正时也运也命也，在劫难逃。

千人大批一滴泪就捕

接着，政协系统揪出的右派越来越多，自己的孤立感也渐渐没有了。记得，十几个右派分子集中编成一个学习小组时，我还开玩笑说：“德不孤，必有邻。”最能说明这一运动无情

的事例，莫过于有一位朋友名叫汤汝光，他以民族资本家的身份参加民主建国会，成为统战对象。因为表现积极，反右后纳入领导小组。正当宣布开大会批斗我的前夕，传出了汤汝光跳进昆明大观楼附近的河里自杀了。原来，他听到自己也可能被划为右派，痛不欲生，一死了之。

我因为坚不承认是意图颠覆中共政权，被批斗的九个月中，常常遭到疲劳战术的围剿。又加之我被领导小组认为“态度顽固”，为了肃清我的“恶劣影响”，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和云南政协，特别为我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事前，组织了将近十人的长篇发言，从多个角度批判我这个人和我的反动言论。领导的要求是：“揭发得淋漓尽致，批判得体无完肤”。我被通知，准时到会，不得迟误。

当时，右派分子还准许回家，我告诉妻子，我可能出事，让她做好心理准备。事实上，由于我曾有广州、昆明两次坐牢的经验，她也见怪不惊了。大会开始后，右派分子被指定单独坐在一个靠门的角落，我被命令做笔记，以便针对检举揭发批判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检查、交代。大会由云南省委统战部的一个处长主持，会场贴满标语，到会的人态度都非常严肃，当宣布批斗大会开始时，口号声就震天动地的喊了起来，我记得第一句就是“把右派分子陆铿斗倒斗臭！”另外一句也是很够刺激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心想，今天是非被迫承认意图颠覆红色江山不可了。

那知当一位在东北海城“起义”的将领任孝宗发言时，他大骂我是“无耻”，直接搞人身攻击，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当时，我气得几乎流眼泪，决心不顾一切给予反击。

揭发批判告一段落，大会主席问我：“右派分子陆铿，你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有什们话讲？”在一般的情况下，被批判者都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深刻反省。我大概是正当三十八岁的盛年，一挺身就走到麦克风前，我说：“你们组织这个大会，照你们的说法是帮助我，教育我，既然如此，必须考虑帮助的效果，教育的效果，因此，发言就应该有很好的准备，我听说已经是准备了半个月，结果，拿出来的东西，像任孝宗的发言，把恬不知耻，念成了刮不知耻，真是刮不知耻。”

没有想到，这一段话，激起了会场气氛的爆炸，马上积极分子带头狂呼口号：“不许右派分子翻案！”“不许右派分子嚣张！”“不许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陆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个在东北海城“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名叫李鸿泰的大高个，从会场后高举拳头朝我冲将过来，我几乎没有考虑就跑出了会场，我的脚踏车事前已放在门口，跨上了就飞奔。还听到李鸿泰在我身后破口大骂……。

次会开了不久，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九日晚，我的住所前突然出现警察巡逻。到深夜十一时，两辆轿车开到门前，几个彪形大汉拥着云南省公安厅审讯处的副处长高建章进来，高是我第一次在昆明监狱坐牢时打过交道的审讯员，时隔四年，他升官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陆铿，这是逮捕令，你签字吧！”我一面签，他一面说：“想不到你会‘二进宫’呵！”

我签好字，就被带上了背拷（双手反倒背后铐住）。坐在沙发上等公安人员对我全家进行搜查后送监。这时，小便突然急了。我告诉站在身旁的一个持枪公安人员说“我要小便。”他说：“你就去吧！”我问他：“戴着背拷怎么解手？”他反问我：“谁叫你犯罪？”

一旁听我和公安人员对话的大儿子可望，当时已有十三岁，他插话说：“爸爸，走吧！我帮你解裤子。”

我自从被划右派批斗到逮捕，将近三百天，从来没有真正伤心过，只有当孩子为我解裤子的一霎那，我心酸了，一大滴眼泪掉在孩子的手上。

“文革”我藏“保险箱”

●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明·沈明臣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明·顾炎武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掀起了“全面内战”，死伤无数；对文化古迹破坏之严重，尤属空前。即使迄今仍不敢公开批判毛泽东残民以逞暴行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浩劫”。

而在这一场“浩劫”中，被中共指为“反革命能量极大”、刑期坐满仍须留监严控的我，竟然因为被被关在监狱里，得免于难。不论我的家人和朋友，事后都告诉我说，你幸亏关在监狱里，如果，文革时在外面，非被造反派斗死、打死不可。像我这样的人，在革命造反派的眼中，是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十年文革虽饱经风雨，但居然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谓奇迹。

因为右派言论而唱“二进宫”

我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九日因被划为“亲美反苏的极右分子”，批斗九个月后，结合历史，判处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被再次投入劳改的。当时对二度入狱，有一个名词叫唱“二进宫”。关押在有“全国两大模范监狱”之一称号、位于昆明市西郊的云南省第二监狱。二监之所以被选为“模范”，一是关押多为重要反革命犯和长刑犯，而因管理严密，没有发生犯人越狱逃跑得逞事件，其次即劳动生产创造财富较多。

坐监，身体上的折磨，只要有一定的体力还能承受，最吃不消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但是固定每天晚间八时至十时的所谓“学习”，轮流发言，讲些假话、空话、歌功颂德的话，而且成年累月地讲，其痛苦用“煎熬”两字形容，也难以表达于万一。

好不容易，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硬是一天一天地熬过了，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廿八日，监狱当局传令“叫陆铿到狱部”。其他人都恭喜我刑满释放、可以回家了。那知进入狱部后，监狱长从公文夹中拿出一张纸来对我宣布说：“按照法院判决的刑期，你今天刑满。但上级有个指示，你好好听着：查陆铿反革命能量极大，不适于在社会上生活，仍须继续控制在监狱里，加强改造。狱部考虑到你在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准你跟其他刑满释放留队生产的留队人员一样，搬出犯人宿舍，同留队人员住在一起。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暂时不安排劳动任务，主要是学习，继续交待没有交待的问题。除非批准，不许外出。”

“文革”到来整个大陆发疯

文革到来，这个大陆好像发疯一般。以云南来说，和广西一样，被称为重灾区，造反的敌对派别，是真刀真枪地斗，死了不少人。在云南，经过多次较量，最后剩下两派，一派叫“八二三”，指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三日成立的“战斗队”，另一派叫“炮兵团”，指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而成立的“造反组织”。两派都声称“坚决维护毛主席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路线”，而且分别以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为靠山，但却势不两立，甚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消灭对方。

当时，昆明市划分所谓“八管区”和“炮管区”，行人随时当街受检查，俨然戒严状态。入夜时，如发现对方有进逼本管区行动，家家户户都受命敲面盆示警，有时一夕数警，使善良的老百姓生活于惶惶不安的恐怖气氛中。

由于两派对立，不少夫妇、父子、兄弟、姊妹，因属于不同的派别，也怒目相向，分道扬镳，严重的还发生杀人命案。昆明还一度盛传两派武斗的结果，一派的一个小头头被另一派捉住，竟演出当场剜心下酒的惨剧。我身为记者，因无法查证，对此存疑。广西发生大量“人吃人”的野蛮行径，后来在香港得见文革期间的具体报道，只能慨叹，具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程度？！

监狱竟成为安全“防空洞”

人们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在文革高潮时期的中国大陆，最安全和保险的地方竟然是监狱。当时，监狱被称作“防空洞”、“保险箱”。甚至很多人想进监狱而不可得。

拿我举例，以我的历史状况，既当过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又随蒋老先生飞东北，上庐山，在国共和谈时，还随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再加上反右运动中正式被划为“亲美反苏”极右份子，这种人在文革高潮期，必然是主要斗争对象。这是我的家人和朋友的一致看法。很多历史情况比我远为简单的都死于非命。不是被斗死，就是自杀身亡。文学家、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经学生批斗后，选择了跳昆明北门外陈圆圆梳装台前的莲花池毙命，就是千百例中的一个。

而我因已关在监狱里，被人遗忘。这样在神州一片血腥的恐怖中，牢房反而变成“洞天福地”，这恐怕是古今中外都找不到的先例。只有集中国帝王专制和希特勒法西斯独裁和史达林红色暴君统治于一身的毛泽东才会创造这样的“奇迹”。历史事实说明，在迫害知识分子这一点上，毛泽东所造的罪孽，远比希特勒、史达林要残酷得多。

百姓和干部同时被杀害

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狂飙下，通过专政手段和互相残杀的“全面内战”，文革十年受到严重迫害、包括杀害的中国人民，据研究“文革”史的朋友估计，在两千万以上。根据“四人帮”打倒后，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的材料统计，“文革”十年但是被诬陷迫害的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包括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有四百二十五人。中共党内受迫害的总人数为七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人，被迫害致死的有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人。而云南“赵建民特务案”这一案被迫害致死的，即达一万四千多人。试想，即使按官方统计，党员干部都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该死多少？而这些冤死的孤魂野鬼，都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的。

对已被关在监狱的人，红卫兵曾一度有意冲击监狱，因周恩来的事先加意防范，作出“不准冲击监狱”的规定。加之，打落水狗没有比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得过瘾，所以幸免于难。

就我所在的昆明监狱说，只因被划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投降分子”的监狱长梁曰文已经自杀，狱内矛盾“焦点”消失，两派眼睛向上看，而省造反派和红卫兵忙于省一级的抢枪夺权，也就把监狱给放过了。

不过，当社会上武斗激烈展开时，监狱当局也作了红卫兵冲击监狱的准备，有的留队人员怕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则照吃照睡。并以开玩笑口吻说：要发扬“死猪精神”，盖死猪不怕开水烫也。

对于继续专制对象的留队人员，监狱里当权的造反派并不轻易放过，在社会上接搞“划线站队”运动时，也要在留队人员中展开“清队学习”。

一开始时审查“文革”期中反改造言行。诸如污蔑言论，牢骚二话，反改造活动，投机倒把，男女关系等无所不包。而我的“发扬死猪精神”，也成为重点之一。继之是逐个检查

自八岁开始到当时的全部历史。究竟运动目的何在，谁也不知道，不过是为斗争而斗争，为整人而整人罢了。

专政对象也要效忠毛林

学习首先开展所谓“三忠于”活动，即“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所有宿舍墙上、门上都用喷漆漆上“忠”字和葵花装饰起来的毛泽东头像，表示对毛的忠诚和热爱。原来计划每人床头都喷“忠”字，后来有人说“这些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资格。”才作罢。

当时，留队人员住的是大宿舍，谁的是双层床，在拥挤不堪的宿舍里，还要腾出一面墙壁，喷上毛泽东头像、葵花和林彪印在毛语录上的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题词。作为礼堂的饭堂墙上也同样喷上这些东西。总之，形成处处有毛像，遍地有葵花，象征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先分组在宿舍做“早请示”，其程序是：一、齐唱〈天大地大〉，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二、背誓词：内容是“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保证，绝对忠诚地听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三、读颂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四、重点份子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提保证，保证在当天交待自己所有的问题。

在宿舍做完仪式后，重点份子挂上牌子，每人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上写其罪名，如“现行反革命犯”、“盗窃犯”等等，集合到饭堂。到饭堂后，以上“早请示”仪式再做一遍。重点份子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像前下跪、提保证，群众还要根据其表现提意见。有时齐排排地跪着六、七个人，显得非常“壮观”。晚饭时，仪式再重复一遍，不过，早请示改写“晚报告”，重点份子的保证改为“明天交待清楚”。而进行仪式的次序是先饭堂、后宿舍。

对于以上有如神经病的作法，没有任何人敢提出半个字的异议。

毛泽东以知识份子为敌

在“清队学习”中，云南省第二监狱六十多名留队人员，挨得最惨的依然是知识份子。这与毛泽东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矛头多指向知识份子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我想到千家驹先生的一个观察，千老是著名的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亚当斯密的《原富》都有深刻的研究。从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说，一贯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能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受聘为训练高级统战人士的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才离国赴美小住，一九九四年回到深圳。居美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千老谈一九四九年初他和几位高级民主人士，应中共之邀由香港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毛泽东的一段，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毛对千老等北上，表示欢迎之意后，就分别问客人原来主要经历，千老答是在大学里教书的。毛泽东马上酸溜溜地说：“啊！你是大学教授呵！我原来在北大图书馆当个助理员，一个月吭巴郎八块大洋。”说罢哈哈大笑，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高级知识份子的敌意和今日你们已入我彀中的得意神情。毛泽东精研帝王学，流氓出身的汉高祖“慢而侮人”是有历史可考的。联系到毛泽东公开说：“知识份子实际上是最无知的。”千老发现毛的思想深处有一种痛恨、至少是厌恶知识份子的情节；特别是入主北京后，这一情结反映得尤为突出。而毛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这一情结推到顶峰。毛曾公开表示，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共产党、实际就是毛本人坑的反革命知识份子不知比秦始皇要多多少。而敌视知识份子，恰恰是毛把自己造成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受到百姓唾骂、最终在中国大陆将会出现批毛运动的社会基础。

既然，知识份子在文革中普遍成为斗争对象，监狱里对于整知识份子当然也不会放松。

二监原来在生产组下有一技术股。其中绝大多数是解除劳教的工程技术人员，文革中被监狱一个负责整留队人员的谌姓干部称为“反革命黑窝”。来自昆明机床厂的工程师肖焯，被视为反革命首要份子，经过近半年的斗争，结果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真正搞出来的具体问题，不过是精通无线电技术的黄永祥传布了莫斯科电台和台北电台的广播消息。

但运动中的斗争确是非常激烈的，肉刑在所难免，更加残酷的是日夜轮番斗争，当时有一位昆明机床厂的总会计师钱能充，曾因牢骚二话在重点审查中，连续跪了二十四小时，更换了各种各样的姿势，其情况之惨，到今日还不能回忆，他当时双目紧闭，双眉紧蹙，面部呈痛苦不堪状，低声“唉哟！……”不止。最后几乎是整个人瘫在地上。结果还要被斗争者猛踢。而斗争者同样是留队人员，活画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惨景。

被斗拒下跪宁死不受辱

轮到我被斗了。我因为参加留队学习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高潮基本上过去，也即是说，有幸避开了巅峰状态。更重要的是，主持斗我掌握会场的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河北人王慰苍和安徽人于燿，他们对我有些同情，而我本人因看到钱能充一跪廿四小时，弄得不可收拾，实现自己跟自己到招呼，“士可杀不可辱”，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跪。而且检查一下自己留队以来的言行，除了在听到传闻“红卫兵”可能冲击监狱，说过“发扬死猪精神”的自我讽刺的话以外，没有什么反革命言论。估计其他人也揭发不出来什么东西，因此坦然相对。

没有想到，对我的斗争会一开始就叫我站出来。我于是走向墙角，面对二、三十人。其中，一个姓史的、一贯以打手姿态出现的国民党小特务就大叫“跪下!”马上有些人随声附和，我站立不为所动，这是，姓史的更狂叫“跪下!”附和者也跟着叫各种各样的口号。我仍然置若罔闻，挺直身子以对。就这样坚持约两三分钟，姓史的高声大骂：“右派分子陆铿，你不要自以为是高级知识份子，你不过是个‘臭老九’。”（按文革中，对知识份子一概称为“臭老九”，那么前八种人，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之外，就是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

当时，还是担任斗争会召集人的王慰苍开腔：“我们要他彻底交代污蔑文革的言论。告诉你陆铿，对抗是没有出路的。你只有好好交代。”我心里明白他是为我打破僵局。

我于是交代了我所说的：“发扬死猪精神”的思想过程，指出“主要是怕红卫兵小将来冲击监狱，他们的冲击目标不会是监方干部，而是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现在列为“重点组”的，更是敌人中的敌人，罪大恶极如我，必然首当其冲。因此，当指导员要我暴露真实思想时，我就坦诚说出了。指导员问我，你既然这样想，打算怎么办？我说，既然已是专政对象，而且身在监狱之中，只能本着俗话说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发扬死猪精神了。我这话刚说完，斗争我的人中间竟忍不住发出了笑声。这是，有的极左份子就提高嗓门严正批判我“放毒”。说：“陆铿这个家伙，心怀叵测，他是故意散播破坏言论，造成我们的恐惧心理，也是对革命小将的攻击、污蔑。革命小将是坚决维护毛主席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路线的，他们怎么会冲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呢？”结论是：“不能容许右派份子陆铿继续放毒。”“一定要把右派份子陆铿斗倒斗臭!”

斗争会得继续进行下去，于是，我交代了自己改造和继续改造中的错误和存在问题：

一、反动新闻记者的职业病根深蒂固。喜欢打探消息，比如关于“冲击监狱”；关于“干部自杀”，都钻头觅缝地想法知道。

二、自我估价偏高，不像一个接受改造的人。比如，尼克森访华后，劳改干部问我的看法，竟大言不惭地分析《上海公报》的难产，指出哪些方面是美方让步，哪些方面是中方让步。

三、狂妄自大，随便代人请命。如对女犯指导员严素清说：“四中队女犯改造得很好，指导员可以多给她们减一点刑。”听到七中队的留队犯人希望发给工作服，就向队长者炳华说：“队长，生活上的问题不要扣得太紧了，能照顾就照顾一点。”当受到批评时，还强调说：“我也不是为我自己。”

四、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严重，看问题不脱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比如说“八个样板戏反映的文化生活，与八亿人口的大国不相称。”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曾说搞不懂“克己复礼”错在什么地方。

五、崇洋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当犯人的时候就喜欢吹国外的经历，留队以后，仍有流露，思想深处存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流毒。看到昆明修地下防空洞，有一段两年尚未修好，竟说，在美国造一条长度相同的船，恐怕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不仅是反动的思想，而且是洋奴思想的反映。

六、劳动生产方面，不仅体力劳动没有过关，连脑力劳动也没有搞好。在印刷车间校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本书错了四十几处，返工上千小时，造成严重浪费。提高原则就是破坏。

七、腐朽没落意识会不自觉地浮现。如当被编入“重点组”后，认为是被其他留队人员打小报告整的，散布清末流传下来的《剃头歌》：

> 自古头堪剃，而今尽剃头；
>
> 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
>
>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
>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意在提醒批斗者，不要过份。因为，到头来，批人者人恒批之，斗人者人恒斗之；实质是对政治斗争的讽刺，甚至破坏。

八、对前途问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在小组上散步一种荒谬论点：过去海外关系多，对自己是大麻烦；今后海外关系多，对自己是好条件。而且，公然说，总有一天，小汽车会开到监狱大门口，请陆铿先生上车。

我的检查讲到这里结束时，竟在批斗会上引起哄堂大笑。跟着来的就是一阵激烈的批判：做白日梦；痴心妄想；拒绝改造；心存变天；意在恐吓；破坏运动。而最恶毒地是针对我所说的“死猪精神”，污蔑为“死猪复活”。但这一说法，却使本来是非常严肃的一场斗争，在轻松的气氛中结束。倒是非意料所能及。

“死猪精神”面对恐怖专政

我的事例，证明了一个问题，在留队人员中进行的“清队学习”，不过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为了整人而整人的闹剧。而实际上则是对已经经过劳改折磨的人的神经，再一次的折磨；并是对承受折磨的力道的考验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所谓等待处理的重点分子，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只有个别神经特别脆弱、而在劳改中没有经过冲击的“幸运者”，面对这种突然的风暴，才会吓得魂不附体，这正是军统小特务侯德生为何自杀的原因。

侯德生原来是军统外围小特务，中共建政前参加了地下党工作，因而解放后得以成为留用人员。到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被算旧账而判刑劳改，在二监服刑一段时间就留队就业，很快专为工人。

在当时，留队人员转为工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工人被毛泽东定为领导阶级，与阶下囚是共产等级社会的两个极端，这中间原来是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侯德生以一个军统特务身份竟能转为工人，更加令人惊羡不已。

工人和留队人员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是在不同的地方。至于政治地位，那就更加截然不同了，一个是专政者，一个是被专政者。

一九七二年春天，“清队学习”已接近尾声，留队人员中，该批该斗的都已批斗过了，被审查过的人，包括我在内，集中在一个重点小组内，等待处理，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不管经过多少折磨和恐怖，运动总算过去了。

一天下午，侯德生突然被送到留队人员的学习小组来，管教干部简单地介绍了他的情况，宣布自即日起侯在留队人员中交代问题。语气十分和缓，没有引起任何震动。侯所交代的问题也平平淡淡。

侯当时是机械车间保管员，宣布重点审查后，就交代了原来的工作，并照例被派一留队人员监视。

大约三四天后，中午十一点左右，突然有人交头接耳传告说：“侯德生自杀了，死得好惨！尸体已及时送走。”

据目击现场的人描述：侯死在作为他的宿舍的楼梯底间仅可容身的房子里。他将两个炸药雷管接在灯头插座上，两手合握导线两端，雷管咬在口中，自死亡前一瞬间，他用双手将两根导线搭拢，只听到轰然一声，雷管爆炸，整个脸的下部化为横飞的血肉，散布与小小的斗室内，尸体倒在血泊中，而导线依然紧紧握在手中。……

侯死得十分轻率，但死的方法却惨不忍睹。非出于极大的恐怖或愤慨，断难由此一着。但也有人开玩笑说，他主要是缺乏我所说的“死猪精神”，尚未烫到，就先了断了。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屡遭坎坷，备受折磨，生死置之度外，并不一定是坏事。正如唐·元稹诗句：

> 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

中国终有一天全民批毛

毛泽东临死前总结他的一生指出，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就是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怎么解释文革是一场浩劫呢？

据大陆学者朋友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念于一九六四年，鉴于中共政权机构出现的严重官僚主义，决定实行整风，搞“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后来与刘少奇的矛盾日益尖锐，牵涉到路线之争，认定按组织程序必定遭遇阻碍，乃决定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没有料到，运动一起，很快失去控制，几乎弄得不可收拾，最后凭借着群众对他的迷信，方得以收兵。这一场运动，固然打到并整死了他的对立面刘少奇，但因大量内部文件示众，也把中共的阴暗面彻底暴露，让人们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暴虐与肮脏，从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迫使当局不能不走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毛在筋疲力竭的状态下走完了生命的历程。邓小平应运而起，

制订了“以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但是，邓小平为了共产党的存亡绝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否定毛主席无异否定共产党。”因此，不仅继续维护毛泽东这一幽灵，还提出了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内容的四项原则。

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先后和访美的三位大陆文化界名人周而复、朱子奇、赵复三对话，我说终有一天，中国会出现全民批毛。除朱子奇持异议、和我有所辩论外，周、赵两位均未表态。用英文来说即 No Comments。当然，结论靠历史来做，我坚定地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法国大革命的结论是法国大革命后一百多年才作出的。而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会作出。

巴金先生希望建立的“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在二十世纪不能建立，也许到廿一世纪会在神州大地出现。

我写文章喜欢引用杜甫的两句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请朋友们允许我在《回忆与忏悔录》里再引用一次。

空军英雄的受难

●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元《合同文字》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曹雪芹

一九五〇年的春天，监狱里忽然来了中国空军的四条汉子。其中三个都钉了脚镏，沈延世，是杭州笕桥航空官校第一期毕业的，被捕前任空军第五路副司令，他戴的镣最粗，总有十多公斤重；张俊位和徐应鹏分别是航空官校二期和四期毕业，分任空军第五路司令部补给处中校处长和作战处上校处长。徐应鹏在抗日战争中“八一四”与日本空军空战中立功，后来在一次空战中全身被烧伤，跳伞得救，是一位空军英雄。他和张俊位戴的镰比沈延世要细一些。另一个是空军机械学校出身的王秉立，被捕前任空军昆明航空总库库长。

由于他们身穿的空军军官制服比较讲究，气宇也比较轩昂，再加上三副铁练在脚上，走起路来铛铛锵锵，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按监狱规定是不准谈各自的案情的，而我因为与空军有段特殊的渊源：妻子杨惜珍曾在空军医院任牙科医生，我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也认识，特别是与蒋老先生的专机驾驶长兼空运大队长衣复恩是好友，对空军有一种特殊感情。加上新闻记者职业本能的反应，很快就和他们有了沟通，了解到他们的情况。

原来，沈延世是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决定投向共产党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的当晚就与其他六名国民党要员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童鹤年、石补天，一齐在卢汉客厅中被捕的。共产党接管云南政权后，把他送到共产党处理国民党被俘官兵的一个组织“解放大队”去审查。徐应鹏也和他同在一处，他们知道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而且家眷都已去到台湾，因此非常盼望能与家人团聚。当时尚未被捕仍在昆明机场为卢汉工作的张俊位、王秉立去探望他们时，四人便商量逃走。后来由张俊位联系上一个神秘客，而这个神秘客是一个军校出身的鸦片烟商，也要逃出昆明，他得悉住在江川的保安团长王耀云决定率部叛变，脱离中共的控制，便与王约好带着这四位空军一起冲到边境，然后由这四位空军出面与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总部取得无线电联系，要求台湾作空中支援，然后把这支队伍拉到越南去，向

已抵越南的国民党黄杰部靠拢，听候蒋委员长的调遣。

这个计划按当时大陆混乱的情况是可行的。沈延世等四人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廿八日按双方约好的时间，坐马车由昆明市到了市郊的大板桥与神秘客会合，那知神秘客抽鸦片烟误了事，竟晚到两小时，不要说两小时了，两分钟对于要逃跑的人都是够受的，总算盼星星盼月亮把这神秘客大烟鬼盼到了。四人搭上的旅行车经晋宁向江川方向奔去。那知车行不到两小时，车子就出了故障，怎么办？除了走路没有选择。对于几位空军来说，因为曾受军事训练，问题不大。但对一个大烟鬼来说，问题可大了。他由两个人架住向前奔，等到赶到与叛变的保安团约定的江川县城，部队早已等得不耐烦先一日开拔了。因为王耀云这一团是按计划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派出的军代表统统杀掉起事的，必须争分夺秒地向边境挺进。为等候这四位空军推迟了半日出发，空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人影，只好拖着队伍狂奔。失掉与叛乱部队的联系后，四空军和神秘客决定追赶，不料追到玉溪时，神秘客的鸦片烟瘾又发了，他们一夥人住进一个马店里去歇脚，不料被人密报，当他们前进到峨山时，投宿的马店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空军英雄变成了狗熊被捕了。原来，中共占领大陆初期，打着“解放”的旗号比较得人心，加之，老百姓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一心归向共产党，因此，到处是义务情报员。从此，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渡过了二十六年的岁月。廿六年！

一九五〇年夏我们所在的昆明监狱第一次遇着杀人。

原来的国民党昆明市卫生局局长到一九四八年出任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的杨青田，在中共建政后出任省人民法院院长，他是中国人所说的“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后来在“白色恐怖”大杀共产党时脱离了共产党，在“云南王”龙云的宽容政策下，得以保全性命，终于做了国民党的官。但当国民党败象毕露时，他又在云南地方形成的反蒋政治气氛下，成为进步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在省参议会以维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标榜，处处设法抵制蒋介石的徵兵徵粮政策，而继龙云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为了保持云南的所谓“边陲的特殊性”也乐得对亲共势力做顺水人情，因此杨青田等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卢汉在昆明易帜。

中共接管云南后，杨就被任为省人民法院院长。到了中共决定对全省的骚乱和金融市场的黑市予以严重打击后，杨就被派为“高级刽子手”的角色，由他召集全体在押犯人讲话，明确宣布“为巩固革命秩序”，“依法判处朱文高和吴云赓死刑立即执行”

朱文高是昆明老福源金店的老板，他因有一个弟弟朱志高在龙云下面做警卫营长而比一般金商有名。中共入城初期，金融极为混乱，他便进行黄金和银元投机成为黑市的要角。吴云赓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活跃的鸦片烟商，与国民党军政界都有来往。

犯人的心态本来是变态的，加上昆明市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地交错着，好像竹篱笆一样，因此，当吴云赓被杀后，犯人中很快流传着他的年轻的姓张的太太长得如何漂亮，交际舞跳得如何好的传说，把议论重心放到女人上，结论是中国的老一套观念：自古红颜多薄命。

可是，四个空军的心态，却与其他人不同，沈延世因为身体比较胖，大家喊他沈胖子，生性乐观，笑口常开，平日表现得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候走路时还故意把他戴的脚镣有节奏地弄出“音乐声”来。吴云赓枪毙以后，他突然变得沉默了，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暗地向他打听，他才说出被枪毙的吴云赓就是帮助他们外逃未能成功的神秘客。而今吴云赓既已枪毙了，他耽心下一批要杀的就会轮到他们四个空军了。如果按中共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他（沈延世）是最初提出外逃的，可以算是首恶，因此死期恐已不远。

我基于一种同情，也是记者的职业病作怪，便主动向沈延世作了一次“新闻分析”。

我列举四条理由说明四空军不会杀：第一，根据法院院长杨青田向我们宣布的朱吴的罪状及中共的杀人布告，所以要杀朱、吴，主要是“巩固革命秩序，打击金融投机”；而你们的逃跑目的在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即使说还想投奔国民党，也是未遂犯，他们没有理由杀你们。第二，吴云赓的罪状中，只提到他煽动王耀云部叛乱，并未涉及帮助你们逃跑。第三，中共刚刚建政而各地叛乱纷起，金融市场混乱，为了杀鸡儆猴，必要拿人开刀做典型，你们已关在监狱成了瓮中之鳖，把你们杀了，起不到任何典型教育作用，因为原来的空军除了少数的机械士，在昆明地区已经逃光了。第四，如果要杀你们，一定事先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不会跟大伙放在一起。朱、吴被杀前都被停止跟大家一起生活学习，而你们现在却和大家一样。所以不会太严重。

沈胖子对我的“新闻分析”表示满意，果然，在一九五一年的大镇压之后他们就被宣布判刑了，沈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张俊位判七年，徐应鹏六年，王秉立两年。在决定把他们送劳改队强迫劳动以前，解除了沈、张、徐三人的脚镣。沈幽默地跟我说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成语“如释重负”之妙。他初脱脚镣竟有身轻如燕、飘飘如仙之感，走起路来脚打飘，大概《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戴着脚镣穿裤子是一大学问，这是刑事犯人积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共接管后才传授给政治犯。办法是：

先套上一只裤脚，其余部分塞进镣与腿间隙内全部穿过，拉出后再全部寒一进另一镣与腿间隙内，拉出后再套脚，然后拉上，全部裤子就穿上了。

三个空军军官足足戴了两年镣，直到五一年大镇压过后判刑，才取下镣转到劳改队。从此和我音讯断绝。

一九五四年我获释回家，到处打听沈、徐的下落，五五年才知徐应鹏在昆明市郊的班庄村石场敲（搅拌水泥用的）石子，我和妻子特别买好一些日用品去看他。

他和别的犯人一起，风雨无阻地坐在露天的石场上，把石块用铁锤敲成直径一公分左右大的石子，名曰“公分石”。按规定定额每天敲好的公分石要有半公尺见方的一堆，也就是每个人每两天要敲出长宽高各一公尺的一堆石子来。劳动强度之大，简直不可想像。手裂腿破都很少完成定额。差不多天微亮就出工，要太阳落山后才收工，尤其在刮风下雨时，淋着雨敲石子简直苦不堪言。我们夫妇去看徐应鹏时，按劳改队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谈话，经一再要求，准许我们到他劳动的工地去看一眼，但不准打招呼。我们看到徐应鹏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美军呢质衬衫，一条蓝布的劳改犯人的单裤，腿部缠着一些旧白布条，双腿分开，两腿中间放着一块有面盆大的石块，他正埋着头把有如人的拳头般的石头敲成碎石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岁月敲碎，把生命敲碎。我们走过他面前仅仅两公尺远，他竟没有抬起头来望我们一眼。说明他是把全副精力贯注在碎石上。我们却注意到他苍白的脸和极度疲劳的表情，以及一副勉强撑住的骨头架子，不忍卒睹。一位抗日战争中的空军英雄竟落到如此的惨境！上帝，你在哪里？

他在班庄石场因劳动强度太大，营养又奇差，实在拖不下去，患了重病，体温总在 40C 左右，陷入昏迷状态。幸有一个劳改医生基于同情治好了他的病。后来我与应鹏重逢，问他怎么过来的？他说这与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有关，碰巧昆明西山有一副传诵人口的对联：

高山仰止已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

这副对联给了他启发与鼓励，虽然抬头看已无路可走，但只要发挥韧力活下去，总会发

现别有天地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正是圣诞节的日子，上帝显示了他的大能，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宣布凡是大陆在押的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国民党人员，全部释放，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徐应鹏和我同时在这一天参加了中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召开的“释放转业大会”。会后叫每一个被释放的人填写志愿书，填明恢复公民权后愿意做什么。有的填做小学教师，有的填做中学教员，有的填做图书馆员，有的填做公园管理员，有的填做工人，有的填回到农村务农，也有填家人团聚的。

徐应鹏来跟我商量，他是非常希望与在台湾的妻儿团聚，又怕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万一填了到台湾与家人团聚，不获批准，今后政治运动来了，安上一个通过长期改造仍然怀有二心、企图归向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罪名，岂不惨了？！因此，他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要慎重对待这件事，准备选择一条比较平稳的路，即回到江苏句容老家跟侄儿去务农，将来有机会再图与妻儿团聚。

我告诉应鹏，这个决定万万要不得。根据大跃进以来中国农村的情况，年轻力壮的人都不见得有一口饱饭吃，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指望挣工分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如果指望你的侄儿，他还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自顾不暇，将来，你会弄到走投无路，说不定会因自己做出的这个错误决定而自杀的。至于申请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虽然冒险，但这个险值得冒。因为这是中共公开申明的政策，他们不好意思自食其言，而且这是一个对台湾统战的手法，中共并非有爱于国民党在大陆上的这批文武官员，但他们要做样子给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看，所以信守诺言即按政策规定办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就你本人说，既然有了这个机会而放弃，将终生懊悔。退一万步说，即使因要求家人团聚今后被批斗也是值得的，因为至少无愧于心。总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应鹏经我一番分析，他终于把回句容务农的决定取消，回转头来考虑我的建议了。就在他考虑申请回台的夜晚，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半夜里见我起床到后门外去小便（我们睡在一间大房子里）他也跟了出来。我问他考虑好了没有？他摇摇头，这时，明月如镜，大地一片银白色，映着我们两个黑影，我非常严肃地跟他说：”应鹏，我送你一句话——过了此山无鸟叫。你好好躺在床上想想吧！”

第二天清晨，大夥都起床，在洗脸漱口的时候，应鹏告诉我：“大声，我想通了！今天就填表申请回台湾。”

不久，他的申请得到批准，在云南全省一千多释放的人中引起轰动。而他本人几乎是在申请批准的同日，接获他的女儿徐南屏从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写来的信，告知他的妻子张乐民已到了美国，希望他也能到美国团聚。他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有关部门，也很快得到同意。先赴北京再转香港。临行前他特到我家辞行，表示对我们的友谊终生不忘。

也就在徐应鹏与家人团聚的喜剧上演的同时，发生了沈延世抱恨终天的悲剧。沈比徐年长资深，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考虑问题比较复杂，更加上他在小龙潭煤矿劳改时遇到了一次“诈监”，在一个深夜，所有监房的犯人，同时惊叫起来，似乎要一起冲出监房的样子。有如旧时军营里的“诈营”（台湾叫闹营），也就是睡在一个军营的士兵半夜三更同时惊起，冲出营房，到操场怪叫，遇有富有带兵经验的军官，高声叫一声“立正！向右看齐。”就可促使大家肃静下来，恢复理智，然后依照命令回营睡觉。

小龙潭煤矿劳改犯的“诈监”，弄得管理人员非常狼狈，他们惊惶失措之余，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待这一事件，由于沈延世身为国军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为全煤矿几千劳改犯

中官阶最高者。加之他平常为人比较随和，犯人之间相处，表现比较轻松，有时还讲一两句笑话，于是，共产党干部以阶级分析方法，便认定“诈监”事件为沈策动，且曾将他解往云南开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判处死刑。后经上级法院调查了解，确系一种莫名其妙的群体自发的下意识反应，才不了了之。

但是，这一下，不仅是沈胖子被折磨得变成了沈瘦子，而且吓破了胆。因此，在劳改后期，处处小心谨慎。

当沈延世听到煤矿政委向在押的国民党高中级人员宣布一律释放转业，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时，他第一个反应是：此中莫非有诈？根据以往劳改二十六年的经验，不敢相信共产党会容许像他这样的人有自由选择。甚至认为很可能是再一次的一如五七年“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因此，他来个将计就计，在小龙潭煤矿举行的释放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宽大处理，让他恢复公民权，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他表示，受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教育，已认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光明前途。他愿留在大陆，贡献自己的余生。云云。

沈延世的这一表态，得到共产党干部的大会表扬，于是抓住他作为典型，向大家宣布这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和党的劳改政策的教育感召下，真正改造好了的表现。

就在沈延世得到表扬后的一个星期，他获知徐应鹏申请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已得批准的消息，在极为震动之余，槌胸顿足，大骂自己该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向共产党干部坦陈过去表态愿意留在大陆，是假的，是不相信政策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心是在台湾，连作梦也梦见台湾。他所以隐瞒真意，编造假话，主要是错误地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特别是“诈监”那次吓破了胆。请求人民政府体谅他全家在台湾已盼望团聚二十多年，准援徐应鹏例，批准他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结果，不但没有批准，而且，在大会上被批判了一通。共产党的干部指出，像沈延世这样的假改造，不老实，是反动本质的表现。证明他是国民党的孤臣孽子。证明毛主席的教导的正确，也就是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沈延世必须留在国内继续改造。根据政策，遣送他回浙江绍兴原籍，希望他能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老沈抵达杭州后，写信到昆明给我，说这是他一生遭到的最大的打击，比五一年在昆监被宣判为有期徒刑十一年的打击还要大。他之所以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除了历次政治运动已经使他变成“惊弓之鸟”外，再就是缺乏一个可以说知心话互相商量的朋友。而徐应鸥因有我就近商量，得以如愿以偿。

根据他的情况，少年时期就离开了绍兴农村，而且，自从离开就没有回去过，如今这么大的年纪，要他回农村去自食其力，无异死路一条。他考虑到他的问题是云南方面处理的，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云南能够通知浙江，请浙江方面从统战角度考虑，准他留在杭州，像曹天戈（最后一任国军第八军军长，曾关押于昆明监狱）一样，在浙江省政协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知道我已回到云南政协，请我就近代他反映一下他的困难。

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曹天戈以“同窗之友”的情分给我来了信，告知沈延世以心脏病突发而死。我了解他是急死的。他的死，使我对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叹。命运之捉弄人，有时实在太残酷了。

张俊位和徐应鹏一样，填的志愿是回台湾和家人团聚，中共批准经香港转台湾。但在他之前申请回台的十个战犯，都遭到碰壁，台湾当局拒绝入境，导致一位叫张铁石的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原来，张的儿子在华航工作多年，为其父申请入境，有关方面已经同意，张乃对中共方面不告而别，由九龙的兰芬酒店转到与台湾关系深厚的徐亨开的富都酒店，准备入

台。那知台湾方面因无人敢在批文上签字，造成谁也不愿负责。而香港方面的居留期已到，张铁石又不能回头跟其他仍和中共方面保持联系的释放战犯一起到香港移民局去办延长居留签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自杀。自杀后，香港舆论大哗，台湾方面由于感受压力，才派张的儿子到香港认尸，且举行记者会；形成与大陆方面争夺一具尸体，落得“活人不要、要死人”的批评。

张俊位本人，幸亏他的女婿也是蒋家孝字辈的，在总统府工作，通过走后门算是得准回到了台湾。但因劳改期中身心受到摧残，而到港后申请入台，迟迟不获批准，心急如焚，坐卧不宁，他跟我说，比坐牢还难受。实在不能理解，一生为党国拚命，只是偶然的事件，卢汉叛了国民党，自己落到共产党手里，长期坐牢，好不容易从监狱里出来，要求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台湾当局居然不准，怎么能使人不生气？他毫不含糊地说，他的病主要是气出来的。后来，依靠女婿和女儿的努力，得进台湾，临行在香港和我握别时，他非常伤心地表示：“看来，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祝福他和家人团聚后逐步恢复健康。事实上，回台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徐应鹏在经港赴美时，向台湾申请过境台北探望一下儿孙，台湾当局不但不批准，相反地还延缓了应鹏大儿子一家人赴美的时间一年多。应鹏夫人张乐民幽默地说，大概是要给我们一点惩罚。应鹏本人脾气极好，从不动怒，为此也忍不住骂一声：“毫无人性！”

政治这玩意儿，究竟有多少人性，本来就很难说。

更悲惨的是，所有要求从大陆回台湾的人，到达金门以后，全被国民党方面集中在外岛施行秘密的管训，勒令“交代问题”。共产党是规定任何一个政治犯，他们称为“反革命犯”，都要从八岁起作详尽的书面交代。而被释放返台的国民党官员则被国民党当局勒令交代被囚禁的全过程，而且要经过无数次的名为谈话、实为审讯的拷问。其实，两边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依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称他们为“难兄难弟”。这一套专政的把戏，说“一丘之貉”也好，说“难兄难弟”也好，总之，中国人同时经历了“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考验，也许正是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惩罚！

红色政权下的恋爱悲剧

-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屈原（九歌·少司命）
-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宋·苏轼（蝶恋花）
-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唐·杜甫（梦李白二首）

李广平，李鸿章曾孙，工书画，爱京剧，学问渊博，修养极好，翩翩公子，惜生不逢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被视为专政对象。关鹔鹴，京剧演员，文武兼修，功力深厚，光彩照人。她的表演艺术，不仅风靡大江南北，而且远及国外，佳评如潮，被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关、李相逢，一个爱才，一个爱艺，一个未婚，一个未娶，因有情而相爱，而生死相许。不幸遭遇反右运动狂飙，被迫分手，造成一大悲剧。而我因于两人的友谊，特别与李广平肝胆相照，在悲剧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坏的作用，成为终身大恨之一。但愿他们两人天堂相逢，生不能为夫妻，死则成伴侣。使我得赎罪咎于万一。

李广平，名家环，号小宋，安徽合肥人，一九一六年生。为李鸿章曾孙，云贵总督李经义之侄孙。祖父经述，生父国熊，行三；继父国杰，乃李鸿章长孙。广平有一书画章，镌“三十九郎”，意为他这一辈大排行属三十九。如满清政府不倒，将由国杰袭侯爵。国杰初无子嗣，由广平承继。因此，与满清或李府有历史渊源者，见广平仍以“侯爷”相称。曾镌两章相赠，一曰“淮南公子”，一曰“末世王孙”。

广平面目白净清秀，中等偏矮身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人谦逊有礼，一看即世家子弟，一口道地京腔。幼年庭训，受专馆师傅严格教育，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佛学、哲学均有很深造诣。在燕京大学讲《长恨歌》，每周三次，连续半年。文史功力之深，可以想见。

广平擅诗词、书法，亦作画。他的字学本王、赵，尤擅赵孟頫。写来圆润而秀雅。一九五七年应邀参加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之中国书法大展。展品颇受欢迎。而他本人在昆明被划为右派。北京《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刊出讽刺漫画，广平身着清朝官服，头戴红顶花翎，题曰：“末世王孙妄想变天”。负责国际文化交流单位基于政治考量，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周指示继续展出。盖中共有一原则“内外有别”也。广平多才，自幼接触古字画，颇有心得。一九三五年，十九岁，就受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义务担任书画鉴定。他曾跟我谈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一位破产的朋友，住亭子间，仅剩一床，床架上用一幅旧字画横铺作帐子，雨水漏浸已有渍印。李往访闲聊，抬头一看，“啊！这是唐伯虎的仕女嘛！”这位破产的朋友因此一语得救，将画重新装裱变卖，没有几年，竟挤进上海大企业家之林，常说，“全靠李先生一眼发现唐伯虎。”

毕生下工夫，最深乃京戏

惟广平自称，他一生下工夫最深的，不是书画，也不是诗词，而是京戏。在北京，与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皆有来往，广结艺缘。

六十年代初，尚小云到昆明演出，每场都赠送广平最佳座票数张。演出之于，同游春城附近名胜，有不少诗词唱和。临别写对联一副赠尚：“青山犹故我，白发又逢君。”尚画了一幅西山龙门回赠。广平弟子杨修品曾见此画，惊其不凡。广平乃告修品月：“戏剧大师，学养极深，诗词书画皆精。若没有书卷气，只是一般的跟斗虫而已。”修品曾为文载于一九九０年十一月一日《云南政协报》，提及其师之言，并举一故事，说明其师广平乃一位伯乐：

他早年在北京时，有一天和著名京剧艺术大师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逛天桥，忽然听到茶馆里的清唱，嗓音很好。进去问了情况，知是一个家境贫寒的青年人，在这里谋生罢了。李先生感到这是一个很可造就的人才，应该介绍名师学艺。听其戏路与梅兰芳先生相近，就写了一封介绍信引荐又赠送了一笔路费，叫他到上海去。这个青年到了上海多时，始终没有遇到梅兰芳先生，路费也快完了，无可奈何，在一个戏班下海，挂出牌子“梅兰芳正传弟子×××”。恰巧梅兰芳先生路过见到这戏牌，感到惊奇，就进去看戏。这青年人在台上认出梅兰芳先生，吓呆了，声不能出，眼睛发直，像个木偶。场内一下子喧哗嘶吼起来，梅兰芳即上台解释：“后生演戏见我来，所以怯场，责任由我负，我愿意代演。”戏迷们当然高兴极了。事后，梅先生问其冒名的根由，他就拿出李广平先生的介绍信。梅兰芳见了书信，就说“淮南李公子所荐，没有错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正式弟子。”在梅兰芳先生精心指导下，那青年终于名闻遐迩。他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

那年我看了张君秋主演的影片《望江亭》，和李广平先生谈起他精湛的艺术，李先生才和我讲了这段从未向人讲过的往事。我建议先生写信给张君秋叙旧，先生说：“当初只是为了不埋没人才，故而推荐，不图日后，现在何必写信呢？”又说到：“人才难得，但也要碰上好老师。马连良是大舌头，言菊朋是左嗓子，周信芳是沙脖子，他们如果不是名师指点，因才施教，不要说成为艺术家，做个普通演员，人们都还认为不够格呢。”

鹣鹣具天赋，苦学得献艺

关鹣鹣与李广平由认识而亲近而相恋而生死相许，也是起于一个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个是京剧毕生爱好者。

关鹣鹣一九二九年八月廿五日生在湖北汉口一个满族人的家庭，小名大毛。父亲关永斋满清正黄旗后裔。当时为汉口新市场大舞台京剧鼓师。鹣鹣自幼受到京剧陶冶，但因家境清贫，无力请名师学艺，只能约几个小姐妹（包括后来成名的武汉市京剧团的赵艳秋、北京京剧院的赵燕侠）到大舞台练功。她腰里用绳子一扎，在台上翻“前跷”，一翻几十个，比别人翻得快，翻得好。

她当时虽未从师，但因生活接触的影响，加之聪明好学，成了无师自通。为了想学戏，见了人，不管多大岁数，就要求教她吊嗓子、耍耍刀棍，一些有功夫的人，见孩子可爱又可怜，也就教她一两手。逐渐地她父亲发觉了女儿这方面的天赋，当她十四岁主动要求拜师学艺时，便让她拜在汉口大舞台当家花旦雪艳香门下。不久，雪辞班而去，又拜在继起挑班的王韵武、戴绮霞夫妇门下。取名关鹣鹣。按拜师随师姓的行规，故称戴鹣鹣。形同卖身契的“约”立下后，奶奶要她记下三句话：“女孩儿家，一定要嘴紧、手紧、裤腰带紧，切记！切记！”

经过四年的勤学苦练，钻研琢磨和登台献艺，不仅唱得珠圆玉润，也打得惊险百出。到了一九四六年，由李少春在武汉的演出得到启发，决心向唱做双绝、文武全才的京剧艺术奋进。同年在上海，更从四大名旦梅艳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演出中，吸取灵感，受到教益，提升了自己的艺术境界。

一九四八年满师，恢复了姓关，在长沙唱了一个短时期的戏，因时局动荡不安，带着奶奶、妹妹和师傅及几位同行到了春城昆明，在西南大戏院演出。与于素秋唱对台戏。于素秋的班底包括裘世戎、梁次珊等，阵容强大，演出的云南大戏院也远较西南大戏院为高级。尤其著名须生马连良在云南大戏院唱起了开锣戏，关鹣鹣遇到了最强劲的挑战。

但她毫无惧色，每场上双出戏，不是一文一武，就是一生一旦。第一晚《金钱豹》、《凤还巢》，第二晚《红娘》，第三晚《铁公鸡》。一个女角能演金钱豹，反串张嘉祥，引起了轰动，连马连良都因好奇前往观赏，作出了“关鹣鹣前途不可限量”的评论。后来，马连良在演全本《乌龙院》时，搭配的阎惜姣竟请关鹣鹣饰演：海报贴出后，春城戏迷为之轰动。

马连良在北京时就认识李广平，昆明演出送了最好座位的票请李指教。李第一次欣赏关的才艺，就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艺人受尊重，形势已更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宣布“起义”，把五华山上的青天白日遍地红旗换成了五星红旗。政治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关鹣鹣的演艺生涯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云南大戏院由老板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到一九五一年经政府接管改行工资制，关月工资定为七百元，不仅全云南第一，在全中国大概也只有梅兰芳等少数人才是这么高，远超过毛泽东、周恩来。关鹣鹣有感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尤其是云南从一般群众到当时主持云南军政的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对他的看重，主动要求减工资三次。她本人也逐渐爱上了四季如春的昆明。

更富传奇性的是春城昆明，她找到了生命史上第一个春天，与李广平、这位“末代王孙”由相识到相慕、相悦、相爱。用她的话来说：“我差一点嫁给了他。”

广平与大声同窗抒胸臆

广平在云南易帜后，为了安全，住到卢汉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朱丽东的家里。没有想到，在军管会逮捕朱丽东的时候也把他一并带走。最安全的地方，一变而为最不安全，当他在昆明监狱和我重逢时（我们结识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卢汉宴会席上）彼此都不无感慨，但能成为“同窗之友”也属奇缘。那时，共军尚未入城，管理松懈，我们两人便天南地北，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据告未婚妻陆湄，是我同宗，可惜跟他从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结伴赴重庆时病死在路上。到昆明后，虽有不少人介绍大家闺秀相识，但趣味却不相投。

广平除抗战时期曾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军官发生一次面对面的问答几乎出事，再就是与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为研讨日本问题有所接触，此为，从未卷入实际政治；任卢汉秘书，亦不过为一“清客”。中共为了建立“革命秩序”，大举抓人，也顺便抓了他。后来，准备开展镇反运动，监狱人满为患，便让他取保释放。国学大师刘文典，为其安徽同乡，知其人、爱其才，把他保了出来。

狱中，规定囚犯劳动，我和广平被派挑粪。我的经历促使我勉力可以应付，而广平自出娘胎，首次遭此苦役，为减少肩头疼痛，不得已将一枕头垫在肩上，摇晃而行，一时在囚犯中蔚为奇观，甚到引致看守人员捂嘴而笑，风传全狱。

广平出狱后，经一位精通金石镌刻商人张屏之介绍，租屋独居于昆明黄河巷二号。因生病，又经张介绍找陈斌医生医治，而陈的诊所就是租的关鹔鹴位于长春路独门独院楼下的厢房。陈斌夫妇知道广平身世，欣赏他温文儒雅，待以朋友之礼，并介绍关鹔鹴相识。站在广平面前的以不是和马连良合演《乌龙院》的阎惜姣了，而是不施脂粉、一身布衣、举止大方、说话坦率，平淡中流露灵气，亲和中透出魅力的大姑娘。

一九五四年一月，我从昆明监狱放出来，广平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发现了一位京剧奇才。并道出了对这位大姑娘的第一印象。强调关鹔鹴为人素质的不可多得，说，“你一定要认识她。”后来，我和关鹔鹴直接接触，感受到她的真诚而无半点虚伪，豪侠而不失女性柔媚：真是难逢难遇的奇女子。我们同称她小关。

关、李之间，一个是以京剧为生命的专家，一个是对京剧研究有素、所见者广的行家；一个待字闺中，一个单身贵族；两人不见面则已，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那是很自然的事了。

双双入爱河，结缘靠京剧

一日，小关忽发奇想，要看看广平的生活环境，事先未通知，突然跑到昆明黄河巷二号李的住处，恰遇我在座，她进门一看，露出吃惊的眼色，大叫：“啊，好雅致呵！”面对墙上的画，桌上的花，和堆满的书，她承认第一次领会了什么叫“书香”。

第二次是小关遇到一句唱词，很难入调，去向广平请教。她说，从科班学唱，一直用腔自如，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唱词，简直没法唱。广平一看，马上指出是写词的谬误，七个平声字连在一起，怎么能唱呢？于是更改了几个字，使之平仄相调，小关当就试作一腔，果然音已绕梁，喜得跳将起来，只差没有拥抱广平。

为了表示感谢指点，小关在主演《红娘》时，特别送了两张票给广平，广平邀我同时观赏，我敬谢不敏，因为对京戏没有兴趣。而当晚小关不但专门设置一茶几在做前，且以笔砚香茗待之。广平即席填了一首〈钗头凤〉：

萧孃曲，双环续，氍毹基榭翻新作；舞袖窄，罗裳薄，千般袅娜，十分颜色，各各各。

张生恨，红娘怨，成全了却鸳鸯愿；情脉脉，清歌和，樱桃引破，珠玑流唾，个个个。

——右调　钗头凤 关鹔鹴邀赏红娘作

广平并书

后来，关唱全本《玉堂春》，是学梅派唱的。特请李到她家细听细评。李听后，写了近万字的评解。一腔一字均为之指正，关不禁佩服其内行之卓见，更敬仰其对事之认真，这是使她进入爱恋的原始动力。

继后，两人坠于爱河，小关频频写信，广平连连作词，其中有一首和友人《春雪词》（八声甘州），他的爱徒杨修品三十年后记得两句：一是“一笑飞眸”，一是“醉拥鹔鹴裘”。可惜失传。

防户籍警探，见小关义气

一九五五年秋季的一天，关鹔鹴在长春路住宅楼下客厅拿着一只棍棒耍，嘴里念念有词，做着打彩球的姿势，边舞边唱，指着李广平说：“还有个你呢！”我刚跨进客厅门，听到了这一句，忍不住抚掌大笑，便对小关说：“你的彩球何必抛呢，干脆递给广平不久结了。”小关接腔道：“声音小一点，我们这里的户籍警察很讨厌，常常会闯进来。”

原来，陈斌医生的老太爷，字啊卢汉易帜前任云南省邮政局长，一九四九年后被戴上了一顶帽子，名曰：“群众管制”。分管他家的户籍警，三天两头上门问长问短，连陈医生的客人或病人都不放松，也要查个究竟。当时，这种情况在昆明很普遍，我家因我的关系，也是如此。有一次我见到户籍警察居然随便走进加来翻我桌上的书信，忍不住勃然大怒，当面批评这个至今还记得名字叫杨开文的警察，问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叫他出去，弄得我家里的人非常紧张，说我“闯了大祸！”不得了！我表示，了不起再去坐牢。

但陈老太爷却不是这种态度，对户籍警上门奉之唯恐不恭。每隔半个月都要写一份汇报上交。陈斌医生因医病而结识的朋友，见到户籍警上门也知趣地走避，免得啰嗦。陈斌鉴于这种情况，曾向关鹔鹴表示：为了对她不造成影响，有意搬家，小关反而以搬到那里都是一样，劝陈一动不如一静，显示了对朋友的义气。

恋爱竟代讲，年轻演喜剧

小关有时约广平和我到她家聊天，有一次关主动问起广平的岁数，我代广平答覆是一九一六年出生的。反问关“你呢？”她说：“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生。”还加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做媒？”我的回答是“责无旁贷。”三人哈哈大笑。

一九五六年云南政协大会，休息时，小关要我陪她到名中医吴佩衡大夫处看病。吴老医生也是政协委员，为人幽默风趣。诊脉后一面处方，一面开玩笑，你这个病的方子很容易开，陆大声三个字就行了。

第二天，关约李到昆明的一个风景区大观楼见面，不巧李又生病，他忽发奇想，让我代他应约，我毫不考虑，就骑上脚踏车去和关相会了。关先到了庾家花园，见我乘兴而来，问了一声：侯爷呢？我据实以告。她幽默地说：“你们真不愧是哥儿们，谈恋爱也可以请代表。”

我告诉她一点不假，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做广播记者，爱人杨惜珍在成都中大医学院学牙科，放寒假，我忙得无法抽身，和我一同做广播记者的乐恕人，家在成都附近的双流，要回家探母，我就托他顺便抽时间去陪陪惜珍，他居然陪她在华西坝青春岛上赏月两次。返重庆后，我还专门请他吃西餐，谢其代谈恋爱。一九四三年我结婚时，恕人除作一长朗诵诗在婚礼上朗诵外，事后还作一抒怀绝句：“当年曾是小姑样，今日红妆伴陆郎，我不多情心已碎，忍堪人世尽沧桑。”一时在朋友中传为佳话。

小关听后，就说，你们朋友有这么好的友情，真难得！我说：今天无月可赏，我们就赏赏花吧！我向她介绍了庾晋侯先生建造庾家花园是从苏州名园和日本箱根汲取了灵感，以及

庾家的故事。问她约广平是不是想讲讲心里的话？她当时讲了她奶奶对广平的影响不错，还称广平为“侯爷”，因为他们原是满洲正黄旗人，对清朝当然是有感情的，对李鸿章家的人也就有几分敬意。只是认为广平的身体不好，有些担心。她奶奶认为她的年纪已经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虽然不少人追求，其中包括昆明军区一位搞文化工作的上校，她奶奶总是认为不合适。而她太爱奶奶，希望找一个对象，奶奶满意，其次才是自己满意。

我听了她这番话非常吃惊：小关竟如此孝道！我告诉她，照顾奶奶的心态是应该的，但不要忘记自己选丈夫。她问我，广平对她是不是很喜欢，愿意考虑婚姻大事？我说，是的，他只是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太好，而你的健康又是如此的好，因而有点焦虑，怕对不起你。

这时，她向我讲了她的生理状况：“从十四岁起入行，来了月经怎么处理，连起码的卫生常识都没有，再加上，练功要求非常严格，动不动挨打。而身上分文没有，月经来了，甚至没钱买纸，也不敢向师傅要，有时甚至把墙上糊的脏纸撕下来做亲垫，这就犯了痛经病，痛起来，甚至会昏迷，好惨！”

我问她为什么不找医生，她说，西医说是痼疾难治，只能给点止痛药。昨天找吴老医生，他却开了一个玩笑。

鹔鹴为广平，深识愁滋味

除了生理状况，她也谈了政治状况，她感谢共产党对她的培养与爱护；说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戏子，新社会成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真是翻了身。她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加入了共产党。而作为党员，结婚选对象要组织批准，她担心广平是李鸿章的曾孙这一点，会成为阻碍。

我当时跟她说，共产党不是有两句话，叫做“有成份论，不是唯成份论，重点在政治表现”吗？像广平，他怎么能选择他的家庭出身呢？

小关当时只是叹了一口气。

时间进展到一九五六年，广平和我都被安排进了省政协政治学校，这是一个对中上级民主人士进行思想改造的场所，小关对广平鲜明地成为统战对象很高兴。有一次我们三个加上张屏之四人一起谈到他们两人的婚姻大事，我说，和下面谈没有用，反正小关已经通天了，把握机会跟周恩来谈，说不定就能解决。如果论起家庭成份来，周恩来还不是官僚家庭出身；毛泽东也是富农、接近地主的家庭；康生更是大地主家庭。共产党喜欢把人分为好成份、或坏成份，把马克思、恩格斯当作老祖宗，偏偏马、恩如果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成份都是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正是历史的吊诡。”我强调了一句。

小关调皮地问：“什么叫吊诡？怎么说起吊死鬼来了，唉呀！兆头不好。呸，呸，呸！”弄得大家都笑了。

就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根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建议：“关鹔鹴是个全面的人才，应该让她出国演出。”小关被通知作出过准备，先到上海会出国带团的团长、上海文化局长徐平羽。陈斌医生为她饯行，广平和好友张屏之应约作陪，这餐饭吃得很长，李、关谈得很久，两情依依不舍。关抽得个空向张屏之请教，她和广平的事要不要和徐平羽一谈？张答：如果徐平羽问到她的终身大事，不妨提出广平的状况作个试探，听听他的口气，再作决定。后来关到上海有信给陈斌夫妇，提到见徐时，就是“照张先生说法说明”；徐未置可否。而我始终认为只有周恩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才敢于表态。据关说，自一九五三年周在昆明看过她的戏，对她一直表示关怀，还主动介绍妇科权威医生北京协和的林巧稚大夫给她看病。有一年她到北京演出累病了，周还向带团的团长问，你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个星期再演？答覆当

时是可以。

就在关出国之前，她到黄河巷与广平作竟夜之谈。两人和衣而卧，广平告诉我，广平告诉我，他认为男女之间既然要结婚，天地交泰就应留在结婚之夜。我问他这是周礼哪一条？他以微笑作答。可谓“标准的书呆子”。

谢幕六六次，访欧显奇技

关与童芷苓同时出国，分别在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东德和西德演出，小关受到的欢迎远在童芷苓之上。尤其是她的武功已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而利用背上的靠旗回击敌方之利箭使洋人体会到什么叫“叹为观止”。真正的艺术是不分国界的，人们一看就懂。《德意志报》对小关的评价是：“她是中国的歌唱家、舞蹈家、武术家？不，她是超乎一切之上的伟大的艺术家。”在西德，有一场演出创造了谢幕六十六次的最高纪录。

就在出国这段时间，小关给广平的情书不断寄来。广平只拿过一封给我看，其中有一句话使我大吃一惊：“我生平第一次为你做贼。”原来她在中国民航的国际航机上见到一本《中国画报》，里面是一幅宋人山水，画的相当精致，她就悄悄把它撕将下来寄给广平。关回国后，很少到陈医生家就直接到黄河巷与广平相会了。这是他们热恋时期。

老毛施阳谋，陆李同中计

好戏不长，轮到该我忏悔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和广平同时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发言。我心里有些冲动，广平对政治一向兴趣不大，淡然处之。

到鸣放开始，共产党鼓励大家发言，我开始也表示：不懂党的政策，不知从何说起：后来我经不住引诱，加上好名的冲动，一如在〈被划为亲美反苏极右份子〉一章所述，陷入了老毛精心布置的右派泥坑。

最混蛋的是自己入瓮还不够，硬是拉着李广平不、陪葬，至今思之，犹愧对故人。

当政协发动大家“大鸣大放”时，广平毫无兴趣。到我听了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十二字真言后，不但自己相信而且向广平宣传、说服。他表示提不出什么意见，我说，我代你想了几点很精彩的意见。（精彩个屁！）广平是位君子，向来不愿意过于拂人之意，加之和我肝胆相照，又见我“大鸣大放”后博得一片叫好声（殊不知仅为一周效应），便接受我的建议，加了下面的话（见《右派分子反动言论辑要》）：

“现在，虽然提出跟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结果，民主党派不过得一点残羹冷炙而已。龚仲钧当副省长都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其他甚么代表、委员、厅长、局长那更不问可知了。”

就凭这几句话被正式宣布划为右派分子，报纸上还提高原则著文评击，说是连“末世王孙”都想趁机复辟，作为牛鬼蛇神齐出笼的一个例证。

小关痛责李，辜负苦心意

当我们两个双双都划为右派时，正是关鹔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因《打焦赞》一戏得金质奖章，誉满中外之时。小关的父亲关永斋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除了嘱咐她注意身体、安心演出外，告知她在云南，龚自知、杨克成、陆铿、李广平等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据小关写给李广平的诀别书透露，她父亲还在我和广平的名字下划了红杠。她痛切责备广平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太不听话了。

广平接到这封信后，沉重地连续地向我说了两次“完了！”并说，小关行前已从她的上级处得悉，共产党将在国内发动一场大运动，千叮万嘱他小心，不要乱讲话。

我问广平，“当我劝你发言时，你为什么不把这一情况告知我呢？”广平说：“鹔鹴慎重告诉我这是党内的秘密，绝对不能泄漏。我答应了她不告诉任何人。既然是任何人，自然也包括你陆大声在内，为重诺，所以连你也未告知。现在，事情已经明朗化了，鹔鹴和我鸳盟已解，所以才告诉你。对不起！”我除了说一句：“你这个书呆子”还能说什么？！

不过，听了广平这一段话后，更加重了我的自责。好不容易“千里姻缘一线牵”，关、李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一对，结果，竟因我的自以为是，一错再错，而导致广平划为右派，终于拆散了鸳鸯。当然，从大环境来说，既是无产阶级专政，又遇到了反右，似乎在劫难逃。我个人因为平日的表现，右派早就定性了，不管发言与否都会被揪出来，就凭寄到上海《文汇报》那篇〈春到春城〉的文章就够资格了。而广平如果不是我怂恿他发言，他顶多只是改造中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共产党即使基于阶级对立观点，不批准他们结婚，但不能阻止他们恋爱。

越想这个问题，我的罪孽越重。事隔四十年，如今忏悔，犹感痛心！

我虽然及时向云南政协和统战部说明李广平的发言搞是我代拟的，责任应该由我负责。但主持反右运动的共产党干部却说，发言还是出诸李关平之口。根据“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划李广平为右派并不错。

广平因为对佛学有研究，他反转来劝我不要过于自责，他说：“这是业，是数，躲也躲不脱。”

斯人独憔悴，鲜花插牛屎

广平的处境随着反右的深入更加恶劣。他的出身、家世，已注定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再加上一顶右派帽子，真是情何以堪。至于经济的困难更凭添斯人憔悴。

难得的是，关鹔鹴竟然敢冒反右大风暴，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五日她自己廿八岁生日那一天叫她的徒弟高兰萍上李的门送去人民币二百元。广平当时虽然穷得连吃饭的钱都困难，但书生脾气不改，自然不肯收下。写了一首小诗代简答之：

青鸟何需慰寂寥，四山风雨一楼箫，胜得十幅红笺在，云自悠悠华自娇。

意即有小关的情书十封在手已很安慰了。请关释念。

阴错阳差，到了一九六0年二月廿五日，关鹔鹴和比他大十多岁、曾经结过婚又离婚、且在文革中被揭发对自己女儿有乱伦行为的云南京剧团唱须生的演员徐敏初结婚。正如和关鹔鹴亲如姊妹的上海女记者联谊会主席卢璐说的，这叫“鲜花插在牛粪上”。卢璐应我之约为《百姓》写的哭鹔鹴文是这样说的：

徐敏初闯进你的生活，成为你的丈夫，你和李广平的恋爱，不幸因反右运动而终止。徐敏初和你同事，同台演戏，日久生情。虽然你父亲包括我这班知友都反对，但你在杭州演出时发现怀孕，立即返昆举行婚礼。次年生下小霜，文革中得子小松，家庭可称得上完美，可是经不起社会运动的冲击，幸福荡然无存。徐敏初在文革期间被斗而死，对你打击很大。接着老父亲又患肺癌逝世。长春路的家，虽有灿烂阳光，但放在你卧室一隅的五只骨灰箱——奶奶、父母、徐敏初和妹夫李少楼，令来访客人胆战心惊。有谁能解脱你的痛苦，唯有老“杜”（按：杜冷丁是一种麻醉药）。你也常说：“我嫁给老『杜』了。”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图画！

小关未瞑目，广平含恨死

一九九二年三月六日凌晨，昆明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欢乐的气氛中闭幕。关鹔鹴这位被称为中国京剧艺术的奇才却因劳累过度，就像紧绷的弦突然断裂而猝逝。说认识小关的人为她流的眼泪多过昆明翠湖的水也不为过。起码我本人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已。

回头再说李广平，文革期间的生活主要是靠在北京一家书店服务的胞妹接济。由我儿子介绍几个同学跟他学是学画学书法。广平谅学生都穷，只准每人每月奉上人民币二元，其艰困可以想见。一九六七年云大女生、原来政协政治学校同学罗桂元之女，因跟随广平学习而爱上了老师，广平在极端孤寂中接受了这位小姐的激情。因表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致函约其赴京主编一佛教月刊，广平乃携此女北返，阻于户口问题无法迁移，乃废然返昆。未料罗桂元之子误会广平引诱其妹，赴广平住处，三言不合竟出手掌掴广平。广平平生未曾受辱，乃留字云："我清白一生，无愧天地，不愿受辱，死而无憾！"于是将一百片装的一瓶安眠药吃光，躺在床上。第二天楼下住的友人赵锜的表姐，多年来一直照料广平茶水，到送茶水给他时，才发现他已断气。

广平的一位亲戚后辈李量才和包括我的两个儿子可望、可信在内的几个学生出面办理后事。由于文革武斗死人太多，昆明市棺材店的棺材已经卖光，不得已只好按伊斯兰教的仪式在昆明市郊山麓挖了一个坑，由我妻子杨惜珍拿出三十元人民币买了一匹白布把广平的尸首裹起来埋葬。据可望后来告诉我，坑挖好后，可信还躺在坑里试了一试，说怕李伯伯的腿伸不直。就这样，一代才子结束了从满无限遗憾的一生。

事后广平和我共同的朋友、三十年代就在上海追随鲁迅参加左翼作家同盟的马子华写了两首悼诗：

末代王孙疾逝波　旧话重提奈若何
才艺徒自悲宋玉　红粉知己负黛诺
瑶池不尝长生果　人间只说糜烂柯
招魂各自？淮楚　繁弦促管是挽歌
凄凄芳草忆王孙　鹔鹴裘敝坐酒痕
山盟海誓姬有义　千叮万嘱君负恩
随便开口必招祸　迂鲁坐怀不消魂
书画诗文后继少　唯听乌鸦噪长门。

回归自由，三撞邓小平

●亦余心之所善系，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 ·《离骚》

经过长期监禁以后，我是怎么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某些死硬的国民党极右份子，以他们长期处于宫廷的偏狭观点看，像陆大声这样的人，在大陆不被杀掉，也会关死为止；因此，不可能放出来，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做了"匪谍"。因此，公然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匪谍陆铿"。

这里，不是答覆小人，而是告诉君子，我是怎样选择重归自由的。

没有级别套为副部长级

一九七五年底，中共为了对台湾国民党全面统战，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批准，将所有在押的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国民党人员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还附带一条：愿意到台湾的，可以到台湾。

在处理文武两种官吏时，遇到了我的问题，公安干警问我："你是什么级别的？" 答："没有级别。""为什么没有？""国民党报工作人员，是按自由职业对待，都没有级别。""有级别的就讲级别，这是好事。""好事也不能乱讲呵！""看来，你思想还有顾虑，那我们只有按我们的级别比照来套你的级别。"

"套"的结果，被通知说："北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副部长级，你是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以副部长级落实政策。"这样，我一下子变成了"副部长"。

按规定每人都要填志愿书，填明释放后想干什么？我填的是："经港赴美，探亲访友。"干部说："不行。毛主席只说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毛主席没有说，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更没有说，愿意去美国的可以去美国。因此，你只能去台湾，不能去香港或者美国。"然后以商量的口吻跟我说："你的志愿能不能改一改？" 我说："志愿怎么能改？志愿表示我的衷心愿望，批不批准在你们。"

经过了两次谈话，公安干部终于摊开了："你是国民党新闻界现在在大陆专政机关中级别最高的人。你的问题，云南省不能决定，要报中央。"这使我联想到资深前辈钱沧硕先生，如果不是一九五一年被枪毙，现在也可以一吐闷气了！

邓小平决定，由北京审查

"报中央"，刚刚遇到邓小平恢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云南方面奉命将我的全部档案送北京审查。派出了劳改局长和一个科长前往应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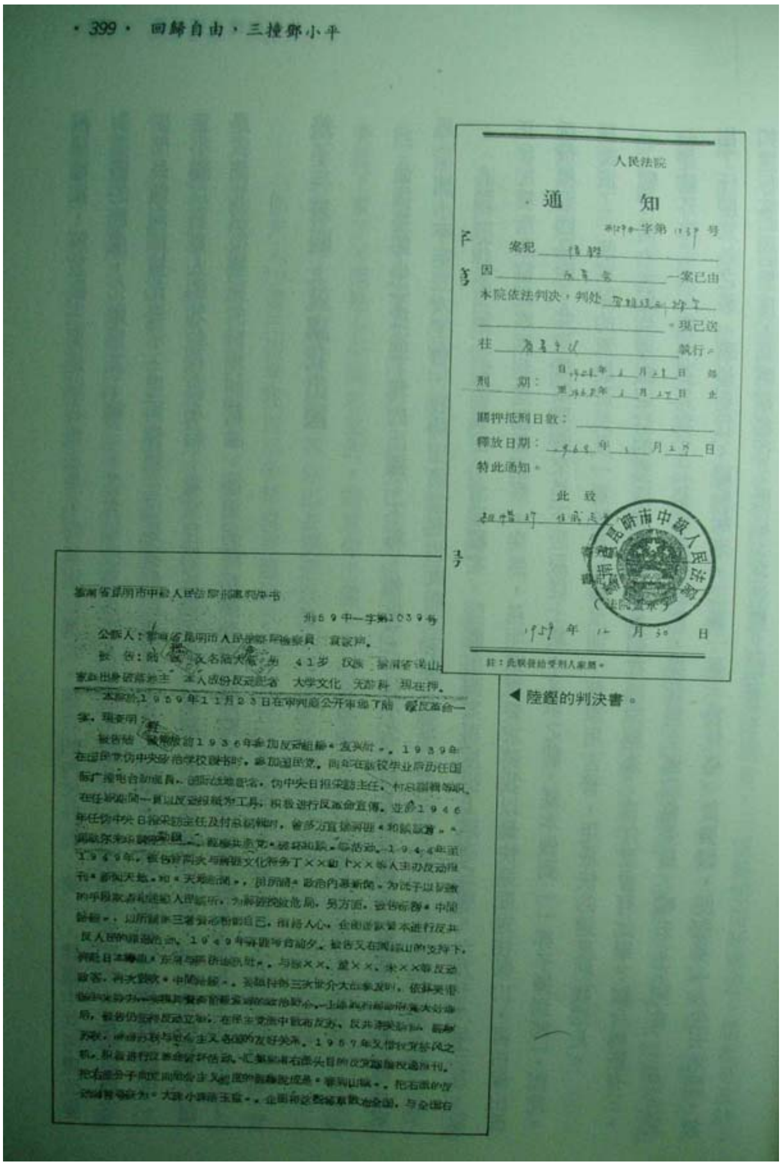
我到北京后得悉，当时由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主持，召集了统战部、公安部、国防部、外交部和中共中央调查部五个部的副部长来共同决定我的命运。

首先，审查："揭发前有什么罪？" 因为当时连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对敌广播，都算是执行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路线"的罪，至于以后在《中央日报》的种种表现，当然更是罪上加罪了。我的判决书甚至把参加发起创办《新闻天地》和《天地新闻》都算做罪。昆明刑５９年中一字第１０３９号刑事判决书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被告曾两次与蒋匪文化特务丁××和卜××等人主办反动报刊《新闻天地》和《天地新闻》，用所谓"政治内幕新闻"为幌子，以阴险的手段欺骗和迷惑人民视听，为蒋匪挽救危局。"

我当时心想，蒋先生若看到这张判决书，也会气得吐血。因为按国民党的观点，恰恰是"掀起危局"或"制造危局"，怎么会说成"挽救危局"呢？

按中共的标准，陆铿解放前罪恶一大堆。第一次捉住就应该判重刑。为什么没有判刑？答覆是：他是从东京飞返的，而不是在大陆捉住的。跟据号召投降的政策，既往不咎。那解放后有什么罪呢？



◀陸鏗的判決書。

根据档案，解放后主要是以右派之身，向党猖狂进攻。进攻的内容计有：第一，建议中共考虑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第二，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向现代化进军的。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熊向辉据此表示，这两条现在已是我们的政策了。另一位代表则说，问题是说早了十几年。童小鹏以召集人的地位作出小节：看来我们是差了他一笔账。既然他请求出国，就让他出国吧！这是我到北京后听到的对我的结论。后来胡耀邦接受我访问时也重复了这句话。

差了一笔账，就让我出国

最后是邓小平批准了我的出国。不巧，他批了以后不久，四人帮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我的出国当然也就搁了下来。

直到一九七七年，老邓复出，清理积案，陆铿出国案再度提上议事日程。一九七八年三月，我正参加云南政协视察团到达腾冲视察，突然，昆明来电要求将我以最快速度送往保山，再由保山改乘飞机返回昆明。共产党做事向来是下级服从上级，文革之前，基本做到“一杆子插到底”，因此，腾冲派了一个军队的驾驶班长及一驾驶兵，轮流开一步吉普车，用最快的速度把我送走。临行前，一起到边疆视察的云南省政协委员和我议论开来：为什么会有此

举？综合判断有三，一是国外来了人，指名要见我；二是考虑代表性，提升为全国政协委员，喊去北京开会；三是也许出了什么意外之事，牵涉到我。总括起来，二喜一忧。我性格一贯乐观，便抱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态度，到哪里都行，所以在飞机上睡着了。

下的飞机，迎接我的是云南省委统战部派来的红旗牌轿车，一望就知道好事近。想起劳改时，跟“同犯”聊天，像我这种人，问题不决于监狱，说不定有一天，突然一部轿车开来说，“陆先生，请上车。”说的大家哈哈大笑。曾经在蒋介石游戈于吴淞口外的舰艇上担任过电台台长的梅文华批评我说：“陆铿这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做梦。”而今，居然好梦成真了。

北京有来文，小平同志批

云南统战部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刚到腾冲，视察工作尚未展开，就十万火急地把我追了回来，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事？”他让我猜，我便把在腾冲临行时大家一块儿作的三个猜测告诉了他，他也笑了起来，反问我：你去年底问题解决后，不是要求出国吗？我说，不错，他说，现在中央批下来了，还是小平同志批的，同意你出国。我问家眷呢？答曰：“缓一步吧！不过欢迎你夫人陪同你到北京作客，为你送行。等你出去安定以后，再接家眷不迟。”

“你夫人”这三个字我近三十年没有听到了，一九五四至五八年，我名义上恢复了公民权，实际上仍为控制对象。偶尔和妻子一起在公众场合出现，别人介绍我都是说：“这为是杨医生的先生!”我只能在肚子里暗自发泄大男人主义：“老子姓陆!”

匆匆改回昆明第三天，我和杨惜珍就到了北京，下榻北京饭店。在童小鹏的宴会上，遇到了公安部第一副部长、后来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和统战部副部长、也就是抗战时打入胡宗南心脏的熊向辉，以及统战部的刘小萍等高干。

看大寨大庆，待我以上宾

童小鹏说，既然到了北京，不妨各处走走。他问我想不想回老窝南京看看，我说不必了。你们不是在提倡“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吗？这两个地方我倒想看看。他表示，没有问题，马上安排。于是统战部排出一位姓胡的科长，陪我夫妇到大寨，安排住在李先念去大寨时住的房子里，以示礼遇。到大庆，由统战部的一位处长耿文卿陪同前往，先到哈尔滨，住在国际旅行社，因为天气冷，特为我们各准备了一件军大衣御寒。哈尔滨到大庆还安排了火车专列，由大庆党委宣传部长迎于车站。再乘小汽车到一个新建的大楼，安排我们于一大套房下榻，还挺别介绍说：“这个楼是第二次『工业学大庆』时建盖的。今天招待陆先生和夫人的这间房，就是华主席住过的。”我除了表示谢意外，还能说什么呢？

大寨所得的印象，即利用三坡发展农田，扩大了耕种面积，并注意开发水利。当地农民的生活确有很大的改善。每户都有了新的住屋。农民的衣着和家中的用具，也反映出正走向小康。不过，劳动强度相当大。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外出做报告，我们会见了有“大寨穆桂英”之称的郭凤莲，给人以能干的印象，谈起大寨的成就如数家珍。后来到海外全面了解大陆情况，才知“大寨”和“大庆”是毛泽东为大跃进书里的两个样板，当时是由全国加以支援才名震神州的。

大庆，我们主要是看了好几眼石油钻井，其所要求的深度，深到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可以看出，采油工人的工作情绪一般都不错。大庆的“标兵”、全国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除外开会，接待的人送了一些宣传“铁人”事迹的宣传品一类的东西给我，翻翻大陆报纸都可以看到。

最难当犯人，最好作客人

回到北京后已接近四月底，童小鹏等设宴饯行。席上，有一位老干部问我：“陆先生此

行总的感想如何？”我半开玩笑、办认真地说：“如果说世界上最难过的是当共产党的犯人，那最好过的就是做共产党的客人了。”说得大家不禁笑了起来。

凌云可能听出我话中有话，便接过话头说：“我讲一下我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被指定负责建盖秦城监狱。建好以后，文革来了，第一个关进秦城的就是我。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一辈子的呵！”

“我理解你这话的意思。”我接着说，“就是要我正确对待自己的遭遇。像你南征北战，经过长期考验，还要蹲监狱。我长期反共，今天礼送出境，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我刚才说那两句话，是实际感受，并不带情绪。”

童小鹏不愧为统战高手，他把话岔开说：“我原来问愿不愿意到南京看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可以去梅园，说不定在那里还可以找到你出席周总理记者会的相片呢！”

俗话说：“不打不相交。”到一九八二年我应廖承志之邀到北京晤廖时，再度和凌云会见，他已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我提出想看看以所谓“美国间谍”嫌疑遭判刑十年而在监外执行的新闻界好友罗孚，他及时作了安排，而且答覆了我问的江青在秦城的生活情况，以示友好。

北京要保证，左右都挺身

话说回来，当我在昆明提出经港赴美的要求时，云南方面表示，北京指示要我首先在香港找到生活保证人，书面保证我在香港生活没问题。他们的说词是：你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如果在香港食住发生问题，流落街头，对政府影响不好。我说，这没问题，我可以换找到朋友担保。他们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那么有把握。差不多三十年没有来往了，朋友还会认你？还愿意保证你的生活？请好好考虑。还是留在国内吧！

我说，不，我还是希望到香港。同时，我对我的朋友有信心，他们会同意作保的。于是我来一个左右开弓，左面给香港《大公报》发行人、老友费彝民发一电、右面给香港《新闻天地》卜少夫、黄绵龄两位老弟兄发一电，结果双双来函表示了愿意保证我在港的食宿。左右两边的朋友都挺身而出，我当然感到莫大的安慰。

为了赴港顺利，北京特别安排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黄文放陪我和杨惜珍由北京飞广州。黄当时的名义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采访主任”，后升任对台事务部部长，兼分社副秘书长。到了广州又加上中国新闻社广州分社主任符国柱，“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于是我在四月卅日与惜珍在广州握别，当日中午就到了香港。被安排住进九龙一间大酒店。给我的待遇，比战犯还好。食住都由中国旅行社安排。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初步了解香港新闻传播界的情况，决定走“自力更生”之路，如让共产党养活自己，就失去了重归自由的意义。经多方打听，知道港九住旅社青年会最便宜。

告别中旅社，决自力更生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找到九龙青年会，接待我的是一位英国人怀特“Mr.White”。我问他最便宜的住宿多少钱一天，他说，港币四十九元，房间没有冷气，洗澡在集中浴室。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记者。再问哪里做记者？我说：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做战地记者。他一听，兴趣来了，说他那时也在欧洲战场，在英军中当一名战士。我故意问他：你知不知道战地记者的级别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上尉（Captain）。他马上举手敬礼。我说：“把手放下，赶紧打折扣。”

于是我得以当时最低价、每日四十港币打八折三十二元入住尖沙嘴青年会。同时，在《新闻天地》社借了三千元，由我二弟陆锵写了一封信给少夫、绵龄两兄，请以他十多年为“新天”写稿的稿费抵充这笔借款。

诸事办好，分别通知了黄文放兄和中旅社的廖、朱两位经理，向他们告别。并感激他们一周来的招待。他们当然是尊重我的决定。老友费彝民兄也赞成我这样做，虽然生活苦一点，但精神是自由的。

行笔至此，我要提出，中共之所以发我出来，与海外舆论的关注是分不开的。根据我和中共打交道的经验，共产党对于舆论的重视远在国民党之上。特别是海外舆论和国际舆论，一九五三年我在监狱里的待遇，突然得到改善。当时，莫名其妙。第一次出狱后才知道，原来是香港《大公报》登了一块〈陆铿其人〉的文章；《新闻天地》又发表了我给卜少夫、丁中江的信。

到港后，受到费彝民热烈欢迎。而他当时在港已成大人物，各国驻港总领事到港，都要向他“拜山”。新华社香港分社自社长起一律称之为“费公”。我因跟他是老友，有时称“老大哥”，有时直呼“老费”，旁边的人为之侧目，不知我是何方神圣。到了解情况后，当然也就见怪不怪了。应该承认，这是我能很快进入香港上层社会的原因之一。

发表大梦文，引起大震惊

这当中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我发表了被称为“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事件。

一九七九年胡菊人主编蜚声海内外的《明报月刊》，为迎接中共建政三十年，组织“中共建政三十年专刊”。当时，经济、文化、教育的文章都找到了。有关政治的文章原来请港大的一位姓李的教授执笔，收到后胡觉得分量不够，便找到了我，请我以亲身经历写一篇有骨、有血、有肉的文章。我当时抵港不到一年半，思想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顾虑，特别是全家仍在大陆，得罪不起共产党。而这种文章，要写得像样子，非打破顾虑不可。因此，婉谢了菊人邀约。为此，菊人让明月编辑孙淡宁来找我深谈，他们人格担保，决不外泄此文作者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三十年大梦将醒乎》一文，全面评价了中共政情，为了思念李荆荪，加上我母亲姓陈，就用了陈荆荪的笔名，没有想到造成大轰动。连台湾方面都认为是一颗反共炸弹，了解中国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总政治部及时内部印发给军官阅读。关于这一点，我后来从王昇将军处得到了证实。

此文发表后，香港报刊揣测陈荆荪是何许人也。得到的综合印象是：看样子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在大陆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解实况；而且，是个老手。总之，猜测得很热闹，连美国国务院都通过《读者文摘》总编辑林太乙向胡菊人探询，菊人问我可不可以告知对方，我因从费彝民处听到中共已指此文为三十年来最反共之文，可能会遭到麻烦，把名字告诉林太乙，万一出事也可以寻找国际支援，便同意了。说明当时的情况是很紧张的。老费推心置腹告诉我说：老弟，这回漏子捅大了，我也没办法帮你了，因为被指为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文章。你虽然用了个笔名，我一看就知道是你的手笔，别人也会猜到。我看，你作好思想准备吧！

我问会不会装进麻袋丢入大海，他说，那不会。再问，会不会弄到澳门押回大陆？他就顾左右而言它了。我当时觉得这不过是反映了一个专业记者的良知，既然已经造成事件，懊悔、自责都没有用，只有看是件怎么演变吧。

梦文传北京，邓小平有评

天下事就有这么巧。这篇文章竟为邓小平看到。新闻圈内传是与《明报》有特约关系的一个姓方的青年人带到北京拿给他的小学同学邓林看，邓林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反映了大陆老百姓盼邓复出的心结，便请她爸爸看，邓小平看后给了十个字的评价：“态度是好的，

观点是错的。”

共产党最重态度，因为那时立场问题。观点则难免有歧异，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可解决。

正在我紧密注视此事演变，并作了心里准备时，忽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约我见面。而他见我面的第一句话：“你那篇文章我看了三遍。”我说：“我知道了，被认为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文章。”他问：“你听那个说的？”我答：“费彝民兄已严厉批评了我，指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文章已经登出来了，有什么办法？！”“不、不、不”王匡一脸说了三个“不”字。“那是费公个人的看法，你们是老朋友，他可能要求你严一些。不过我倒看出你文章中贯彻了一个总的精神，可以用五个字概括。”我有一点沉不住气了，忙问：“那五个字？”王匡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恨铁不成钢!”

老实说，我对着五字评语，感到意外。步出新华社时，产生了联想，这五个字，会不会是那十个字的衍生物？不管怎样，我对邓小平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儿子入医大，'惊动邓小平

除了我们的出国是邓小平批准以外，还有我大儿子可望读研究所，也是靠他“照政策办”的四字批文。

可望在昆明，高中毕业全班第一，老师都认为升大学绝无问题。那知因为爸爸是反革命，结果名落孙山。但这孩子从小读书成癖，不能进大学，就一面攻古文，一面自学攻英文。刚巧燕大毕业的刘德伟老师愿意教，便在白天跟他妈妈上班学牙科之余，晚上跟刘老师猛学英文。

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在邓小平“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下，准许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报考大学和研究院。可望报考原为华西大学后改四川医学院（现恢复华西医科大学名称）的研究生，结果得录取。英文成绩全校第二。他是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引起院方重视，又经复试，教授均甚为满意。但当其他考取的同学都得入校通知，唯他未得时，他向主考的肖卓然教授探听，老教授原是教过他母亲的，就告知，可能是你父亲的原因。并说教授们是要录取的。可望即时将情况写信到香港告诉了我，我在情急之下，毫不考虑就写了下面一个电文：

北京国务院邓副总理小平:

学生陆可望以同等学历报考川医牙周病学研究生，以成绩特优录取。现忽生反复，未得通知入学。相信阁下必能根据政策，扭转四害遗毒造成之偏差。

谨电奉闻，内外俱感。

陆铿谨上于香港

我带着这一电稿到大公报社长室找费老商量，并把电文念给他听，他听后劝我不要发，因为太冒失了。我说，我拿这个电稿给你看，并不是征求你的同意，而是让你知道有这件事。我非发不可，这里面把帐算到四人帮头上，老邓不会见怪的。

老费不胜感慨地说：“大声啊！你这个老脾气就是改不掉!”我说：“老大哥，我的脾气如果改掉了，我今天也不可能跟你坐在这里了。”他一面摇头一面忍不住笑。

没想到，这一电报发生了奇效。可望很快被通知入学。入学后老教授告诉他，“你的事邓大人过问了。他在你爸爸的电报上批了四个字：照政策办。教育部刘部长非常重视，派人来问校方，为什么不准你入学。校方说，因为你父亲是反革命。教育部的人说，反革命那是

过去的事，现在人已在香港了，还反什么革命。而且小平同志的政策不是规定的很清楚吗？主要看个人表现，人是不能自己选择出身的。”

正因为可望的入学是邓小平直接干预的，入学后引起了教授们的重视。有两个教授因好奇不约而同地问他：可望，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吧？他担任什么职务？怎么邓大人会关心你的入学，教育部和校方还受了批评。可望据实答复：我爸爸是个亲美反苏的右派分子。

记平生最不愉快的“合作”

●世情恶衰歇，万世随转烛——杜甫〈佳人〉

●文章憎命运，魑魅喜人过。——杜甫〈天末怀李白〉

时间是在一九七九年，自称出身律师、在台湾曾经经营《台湾日报》的傅朝枢，挟重金从台湾到了香港，他决心继续其在台湾钻营拉拢、怪招叠出的手法，来香港“大展鸿图”。先说服台湾有关方面准予自台结汇出五百五十万美元，在香港创办以《中报》为名之民营报纸，并向其在台当道之友人表示要以中间面貌为国府反共复国效力。傅朝枢未到香港前，就听说《明报》是一份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比较权威的报纸；到了香港后，通过实际生活体验，更感到《明报》的权威。

向权威挑战，正是傅朝枢的愿望。他便以《明报》为假想敌，开始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

首先，他到处打听，《明报》内部除查良镛外，谁的声望最高？经过多方了解，知道胡菊人最受人敬重。胡以一个广东农村来的年轻人，十四岁开始从校役做起，自我奋斗，自学成才，当到《明报月刊》总编辑。《明报月刊》在他的主持下，十三多年来（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已成为海外知识份子的言论重镇，特别针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加以笔伐，伸张民族正气，宏扬中华文化，几乎有口皆碑，于是傅朝枢决定以胡菊人为目标，作为进军香港报坛的第一个猎物。

傅朝枢如何猎取胡菊人

傅朝枢从香港的拜客活动中，探悉徐复观是胡菊人最敬重的长者之一，而他的江西同乡台湾立法委员涂公遂与徐先生份属同辈老友，于是，他备办了礼物向涂公遂请安，表示他准备在香港办《中报》，希望得到乡前辈的支持。同时说明，他心目中合作的对象即胡菊人，据传胡菊人只听徐复观先生的话，所以特了请求涂介绍徐，进而恳求徐介绍他与胡相识。

对于傅朝枢的这一请求，涂公遂欣然应允，马上和徐先生通了电话，介绍傅前往美孚新村徐寓拜访。

徐先生时候谈到他对傅朝枢的第一印象时说：“虽然我感到此人一股俗气，但听其言甚为诚恳，乃介绍菊人与他认识，万想不到此人乃属大奸一类的角色，使菊人上了一个大当。”

傅通过徐先生的介绍与胡菊人联系上以后，在香港最贵的一家海鲜馆“新同乐”酒家宴请胡菊人，两个人一餐竟吃了一千八百元港币，其时合三百多美金，豪奢之状可以想见。

傅朝枢向胡菊人举杯祝酒的第一句话是：

“菊人兄，我想助您做当代的张季鸾！”

在老傅花言巧语，强调“合作”又执礼甚恭下，胡菊人作为对世情的险恶认识不足的君子，很快就和傅朝枢签了约。

约内最重要一点即：《中报》的编辑方针由总编辑订。胡菊人全权处理编政。

说起胡菊人与傅朝枢签约办《中报》，必须交代一下胡在《明报》与查良镛的关系。为什么相处十三年多，相安无事，会一朝离去呢？

按胡菊人当时的想法，他已年逾不惑，因晚婚，两个孩子还很小，在四十几岁的年纪还可以迎接新的挑战，再下去，即使心有余力也不足了。而傅朝枢提供的机会是那样的富有诱惑力。傅承诺《中报》日报、晚报、月刊、周刊一起交给胡主持，连人事行政权都由胡掌握。

再说《明报》查良镛方面，当胡菊人向他辞职时，他不是责怪胡，而是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对胡照顾不够，特别在胡的生活方面，缺乏关心。胡为了买个居所向报社借钱，按月从薪水项下扣还，查虽然同意了，但却没有进一步考虑到胡可能遭遇的生活困难。特别在工资方面，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月薪是港币四千七百元，傅却提供月薪万元，而胡的工作获得较高报酬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查最后提供了比傅还高的薪酬希望胡留下。但胡告诉他以与傅签了约。这时，查良镛表现出其大侠风范，事已至此，除了向胡临别赠言，而且在最好的酒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并以金表相赠，用志友谊永固，坚如金石。

就在菊人和老傅签约的第二天，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他决定和老傅创办《中报》，希望我能帮他的忙。并说：“你是新闻前辈，我不能让你在我下面做事，故请你出任《中报》总主笔，我任总编辑，我们和老傅合作把这张报办好。”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傅朝枢这个人？其人在台湾声名狼藉，谨防上他的当呵！但菊人回答我说，他已和老傅签了约，合约中明白规定，编辑方针由总编辑订。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朋友我只有拔刀相助。

我和傅朝枢第一次见面时，他听胡菊人称我“陆大哥”，他也和菊人一样称我为“陆大哥”，并强调“合作”。而且说，他的任务就是“出钱”，就在一九七九年底，和我情同手足的丁中江从台湾到了香港，傅朝枢要请丁吃饭，丁抽不出时间，改为吃下午茶。

傅一见丁就“大哥”长、“大哥”短，备极恭敬，而且他向我们两人表示他“宁愿做真小人而不做伪君子。”

丁毫不客气地回应傅的自我评价，跟我说：“大声，你看他，就是个小人样子。”而傅朝枢不但不以为辱，反而对着我和丁“嘿、嘿、嘿”地笑，这在我的人生经验中是第一次。

傅朝枢公开宣扬一种“人生哲学”：只要有钱，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

创刊之前先声夺人

由于《中报》八十年代初在港标榜“不左不右，允执厥中”，是个新事物；而且香港社会风闻傅朝枢挟重金到港，大展拳脚，他又从《明报》挖走了鼎鼎大名的胡菊人，胡菊人又找了我这个被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视为异端的记者做搭档，因此这个报尚未出版就引起了各界的重视，突出的表现甚至香港英文《南华日报》，在《中报》创刊前，竟两次刊出对胡菊人和我的采访记。

创刊第一天销路六万份，一份也不少。这在香港来说，也是空前的记录。

可惜好景不长。出报之始就遇到了政策上的冲突。老傅弄来了大量的祝贺傅董事长朝枢创办《中报》的志庆广告，有的来自香港，如林氏兄弟；有的来自台湾，如彰化银行董事长。今天是“一纸风行”，明天是“舆论权威”，后天是“南天木铎”，这些无聊的东西，老傅都

要求胡菊人以第一版全版刊出。胡菊人指出这是“毒药”，别的报头版都以重要新闻呈现在读者眼前，而我们的报头版天天是空白，那不是自杀？傅朝枢强调这关系人情，非登不可。特别是台湾来的广告，对中共更是一种钓饵，即使牺牲一点销路，也是合算的。那知八天下来，销路直线下降，到第十天报纸一下少掉两万多份。读者是公正的，你要欺弄他，他就不顾你而去。胡菊人为了避年一开始就和老傅闹得不愉快，忍气吞声，及至一个月下来，报份只剩三万不到，老傅对胡菊人也就一改礼贤下士之态，双方僵局开始出现了。

开报不到两个月，老傅就玩弄手腕逼胡菊人将编辑部大权交出，派由他的小儿子傅献堂坐镇。同时在编辑方针上由原来的要闻挂帅，改为港闻挂帅。

港闻挂帅，谈何容易？以当时香港销路最大的《东方日报》来说，港闻挂帅，日销三十多万份。但他用了七十多个记者，而且都是拿高薪。《中报》十一个记者，虽有少数杰出的，多数质素平平，竟想与人对抗，实在是不自量力，败下阵来，自属必然。

港闻挂帅不成，傅朝枢鉴于香港《信报》财经新闻一枝独秀，便想分一杯羹，忽然有一天召集会议，宣布翌日改行经济新闻挂帅，如果不同意这一方针，就请离开。而他对新闻经济挂帅的作法是，规定每天报纸头条新闻一定要属财经范畴。结果，有一天实在找不到稍微像样的东西，只好拿大陆的山货金针、木耳每斤各涨价八分为头条，形同玩笑。

在经济新闻挂帅实施期间，老傅从美、加两地各聘一副编辑来主持，并划出三个版面，五个记者归此二人指挥，形成了报纸内有租界的荒唐事，也许可以叫做“一报两制”吧！当然注定非失败不可，结果两位副总编经老傅试用两月余即被炒鱿鱼而去。

经济新闻挂帅失败后，老傅的小儿子，忽发奇想要黄色挂帅，并振振有词地说，香港所有的销量大的报纸，都有黄色版面，要救《中报》，唯有黄色。于是在他主持下，开辟了一个后来美国《中报》“半上流社会”的那种以男女性事为主体的版面，名曰“快活门”。某日竟拟刊出男女性交画片，我当时看到认为太不成话，一气把画片撕掉，投入废纸桶，并电告傅朝枢，决定辞去总主笔职务，与该报告别。并转达中大几位教授朋友朱立等的话：怎么会开辟“快活门”这种低级下流的东西？这样一来，谁还敢把《中报》带回家？只有退报。因为每家都有孩子，决不能容许这种脏东西污染幼小的心灵。

傅朝枢在我的抗议下，同意取消“快活门”。但他说，副刊版面不像新闻，有个周转过程，希望容许他儿子稍假时日，以两个星期为期换版。在黄色挂帅前，《中报》还有一万多份销路，“快活门”一开，马上跌进七、八千，因此，《中报》的同事说：“快活门”不快活。

一年之内五易编辑方针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傅朝枢父子经营《中报》，就是“病急乱投医”的写照。由于一年内五易编辑方针，每改一次“挂帅”，就赶走一批读者；到《中报》一九八 0 年底，兜了一个大圈子改回到“要闻挂帅”时，销路已被折磨得只剩不到五千份了。

傅朝枢的大儿子雅堂，曾在日本读书，对新闻外行，但他也以变换编辑方针为不智，可惜他在傅氏父子三人中，论为人最平正，论发言权则最低。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的同学，针对《中报》这种报业空前未有的特殊事例，即开报时六万份，十个月竟惨跌至不足六千份，进行了专题研究，试找出其症结，得出一个结论，即自有报纸一来，从来没有一个报纸更改编辑方针像《中报》这样频繁的，平均每两个月换一次，不垮势无天理。

不过话说回来，《中报》之所以失败，不能全怪傅朝枢，我和胡菊人也有一定的责任，菊人办杂志虽然成功，但从无办报纸的经验，他在处理行政事务方面特别差，这里有两个例

子可以说明：《中报》创开时，声势浩大，各方面投稿甚为踊跃，编辑部约稿也是有求必应。到结算稿费的账单出来后，送会计室，不了，傅朝枢以社长之身批说稿费标准太高，要编辑部削减。会计部就把稿费单送给胡菊人。菊人因忙的焦头烂额，将单子放进抽屉就给忘了。直到作者纷纷提意见，有的人还在他报放话说，《中报》财大气粗，为何出版两月，稿费都发不出来，一时成为笑话。又如编译组的一个编辑，水平实在太低，无法工作，菊人就另找一个，因事忙忘了将新来的名字告知人事部，到发薪时，傅朝枢坚决不发此人工资，菊人在无可奈何中，只好由自己的工资中拨付。

我虽做过报纸，且当记者有年，但到底已被中共雪藏进三十年，与世隔绝，加上观念陈旧，对海外社会变化可以说是“无知”，全凭过往的一点新闻学知识，不然捉襟见肘。在彭佳木事件上，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当时，中国大陆派到新疆勘探之科学家彭佳木失踪，受到举世传媒关注，《中报》编辑部忽接一来自纽约函，告以彭在纽约出现，并有函致北京周培源。乃致电周培源查证，适其外出。为抢新闻决定刊出，结果摆大乌龙，事后方知是中了台湾特务之计。

至于编辑部里的编辑和记者，大多数都是由老报人刘念真兄在应征的人员中甄选；采访部对于一个新的报纸来说，是冲锋陷阵的尖兵，偏偏《中报》的采访部是最弱的一个环节，采访记者主力来自《工商时报》，这是一张在四十年代末期在香港与《星岛》、《华侨》鼎足而三的报纸，但到七十年代末期江河日下，苟延到八十年代关门。由于记者素质不齐，所以《中报》出师不利。最具体的例子，开报的第一天，我就给采访主任两项采访任务，直到半年后采访主任离职，有一项任务——调查大陆来港移民　的　各种情况，包括合法与非法，就业和犯罪，成功事例和社会困扰——始终未能完成。说起来这似乎是个笑话，但它却是事实。

香港《中报》八０年二月创刊，到四月胡菊人因傅朝枢种种掣肘，心力交疲，而把报纸总编辑位置交出，就注定了一蹶不振。

胡本人退居《中报月刊》，集中精力把月刊编好。他编《明报月刊》曾创造过月销三万七千五百份的成绩，编辑《中报月刊》同样得到读者的好评，一开始，就销一万五千份，后来逐月增加。及至胡不再负责，销路即直线下跌，最后跌到月销不足三千份，此是后话。

魏京生自传造成散伙

胡菊人退出编辑部后，傅朝枢请我以总主笔之身兼管一些编辑部事务，菊人也希望我留下，在精神上对他也是一个支持。没有想到《魏京生自传》导致了约傅决裂。一九八０年秋季，已经被中共判刑的民运人士魏京生，辗转把他写的《魏京生自传》托一位英国学人带到香港，由这位先生当面交给胡菊人，说明这是魏京生的心血结晶，交给别人不放心，相信胡菊人必能作良好的处理。

菊人读了《魏京生自传》极为感动，决定在《中报月刊》发表，同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反应，让尽可能多的人认识魏京生和中国的民主运动。那知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知说，有人自北京带出《魏京生自传》问他要不要买？这真是非常蹊跷的事，《魏京生自传》明明在自己手上，怎么又会有别人来兜售呢？菊人和我商量后回答对方看看东西真假再决定。一看之下，竟是真的，原来菊人手上的是原件，兜售的是影印件。只好据实告知对方，我们已得到原件，谢谢他的好意。

在这种情况下，势非及时处理不可，不能等到下月初月刊上市。我们经过商量决定现在《中报》上发表，然后月刊转载。但因菊人已不进日报编辑部，此事只好由我来办。因老傅早已从菊人谈话中得知月刊将发表《魏京生自传》，我便在电话中告诉他，现因情况有变，

改在日报刊出。他答覆说请我全权处理。

刊出《魏京生自传》时，菊人加了一个按语，大意是此文乃魏京生委托朋友携出指定交给《中报月刊》主编的。任何人摘载、转载、翻译，均须征得《中报月刊》主编的同意，藉以维护魏京生的权益。

那知，刊出翌日，傅朝枢大发雷霆。他指出胡菊人的“编者按”写得不对。我问他：“不对在什么地方？”他说：“按语中怎么可以说须征得《中报月刊》主编同意呢？应该是征得《中报》主持人也就是《中报》机构董事长我傅朝枢的同意。”我向他解释，因为此件是一位英国学人当面拜托菊人负责处理的，菊人为了表示负责才加上这一按语，并没有别的意思。而老傅强调这种作法，忽视了他的存在；起码是菊人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提出要叫菊人自请处分。

我问他：“你说什么？”

他重复说：“胡菊人应就此按语，自请处分。”

我说：“你是在开玩笑!”

他说：“我决非开玩笑，是认真的。”

胡菊人当然不理老傅这一套。老傅见胡没有任何表示，又放出空气说：“如果胡菊人不自请处分，我就在布告板上贴出给他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我当时基于顾全大局的心理，一方面告诉老傅不要逼人过甚，一方面告诉菊人给傅写封私人信解释一下，实际上我是和稀泥。

菊人接受的建议，给老傅写了封简短的信，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那个按语。照理说，老傅应该适可而止了，但他一不做二不休，告诉我说，他要在报头旁边刊出重要启事，扫菊人的面子。我劝傅说：“报纸是你的，编辑部是你儿子主持，你要登什么启事都可以。我们既然合作快十个月了，我要提醒你，菊人手上虽然没有报纸，但他有一批好朋友。你假若在报纸上侮辱他，他的朋友会群起反击的。因此，我诚恳地劝你还是不要登什么启事的好。”

一个插曲——称呼三变

老傅一意孤行。就在他把启事稿交到编辑部的同时，找我谈话，他说：“大声兄，希望你在菊人和我的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一口回绝：“办不到！在正义的问题上是没有中立的。”老傅大叫：“那怕是我爹，他要站在胡菊人一边，我也不答应。”我叫得比他更大声：“我就是要站在胡菊人一边。”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知道，中国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影响到称呼的变化。比如人们喜欢作例子的陈诚对严重（立三）的称呼，起初称“立师”，到任严部下时称“立公”，到严任陈部下时就改称“立兄”了。傅朝枢对我的称呼也是“三段论”。初识时他听菊人称我“陆大哥”，他也以“陆大哥”相称；到我出任《中报》总主笔后，就改称“大声兄”；到最后他与胡菊人闹翻，我拒绝“中立”时，则称“陆先生”了。

想到老傅的各种花样，不禁莞尔。

意存侮辱胡菊人的广告到八0年十一月，终于在《中报》报头旁刊出来了。主要的内容是说《中报》的权源归于傅氏家族、中报董事长傅朝枢父子所有，因此，报纸对外只能由傅氏家族代表。而《中报月刊》主编，只不过是《中报》机构的一个受薪人员。

果然，傅朝枢的启事激起了文化新闻界的公愤，在很短的时间里，香港文化新闻界的朋友后就在各报刊上发表了廿三篇抨击老傅的文章，弄得他灰头土脸。

但他不但不自省，反而把怨怼更集中地放在胡菊人身上，极尽打击之能事。

他宣布了打卡制度，特别声明，即使是总编辑每天上班也要打卡。胡菊人当然相应不理。

他又登报为《中报月刊》招请副总编辑，他找到一个年轻人，每月工资四千港币，而工作呢？就是叫这个年轻人每天坐在胡菊人对面看胡菊人工作，其他什么也不做。这个年轻人感到这件事太荒唐，加上他一向敬重胡菊人，就没有接受，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胡菊人。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原来咋傅朝枢与胡菊人签订的合约中，有一条，即在两人合作期间，甲方（傅）如辞退乙方（胡），要由甲方赔偿乙方若干损失。相反地如乙方（胡）向甲方（傅）请辞，乙方也要赔偿甲方若干损失。因此，傅千方百计压逼胡菊人，只希望胡菊人那一天拍桌子说：

“老子不干了！”

这样，正合孤意，不但解约，且需赔款。傅朝枢一再逼胡菊人离去的如意算盘，原来如此。

从这也可以看到傅朝枢的花样翻新，但比这更荒唐的是对待由北美洲请来的两个副总编辑。

傅朝枢为了搞经济新闻挂帅，分别从加拿大和美国中文报业请来了曹绍沛和董××，名义是副总编辑，工资从优，并提供住房和上下班汽车。

他们初上班的时候，表现出意气风发的神情，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月后因为事实证明经济新闻挂帅不是老傅想的那么简单，报纸销路不升反降。偶一天曹绍沛向我诉苦说，老傅见到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了，怎么办？我说，这又什么办法，只有看他出什么招，冷静应付好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曹董二人很高兴地跟我说：“傅董事长对我们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但打招呼，而且已经和我们签约了。这是我们从美国来的时候就提出来的。”

那知再过一个星期，他们两个哭丧着脸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我们已被通知解聘了，并限期一个星期搬出现在的住处。”我问：“你们不是已与老傅签约了吗？”曹绍沛说：“原来这是一个圈套，合约上写的是乙方在任职《中报》期间，由甲方供应住房、汽车等等，而明天任满三月，今天通知任职中止，当然一切也就吹了。（香港劳工法有三月试用规定）过去有人警告我们说老傅这个人心狠手辣，我们还不相信，真是被他整得哭都哭不出来。”

话回到胡菊人这一边，在老傅步步进逼的情况下，精神上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好在他有一大批朋友支持，还顶得住，不过他病了。我建议他干脆住进医院去，同时请律师给老傅写信，对其一系列的压逼手段提出抗议，指出是一种违约行为。感谢何俊仁律师给了无条件的帮助。

一方面菊人住进了圣保罗医院，一方面报纸上批评老傅的文章不断出现，老傅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只好通过律师与菊人和解，依约付出一定的赔偿，后来这笔钱就成了《百姓》创刊费用的一部分。

后来，老傅大言不惭地说：跟我斗，胡菊人怎么是价钱，主要是陆铿把共产党监狱里学到的那一套斗争术全用出来了，我才同意和解。

平心静气地说，我做了几十年记者，也可以说是阅人多矣。但像老傅这样的角色，确是第一次遇见。难怪国民党、共产党都要心甘情愿地向他献金，成为海峡两岸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傅朝枢现象”。

中共为了对台统战，饥不择食，听傅朝枢胡吹一通，竟信以为真。不仅供给近两千万美

元外汇，一九八一年还由邓小平接见，新华社报道时称傅为“台港名流”，香港新闻文化界为之哗然。缪雨在《东方日报》指出，张三李四，阿狗阿猫，抄家捞家，九流政客，超级龟公，皆说成名流，邓副主席都乐于会见，握手言欢，合影留念。徐复观先生更引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一文评中共统战：“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据悉，北京后来亦承认大量外汇供傅朝枢挥霍，写为“败笔”。而傅能把海峡两岸两个政权都骗倒，正是动乱年代的一个邪门的表征。

艰辛备尝说《百姓》

●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南北朝·鲍照〈拟行路难〉

●世界无穷原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梁启超〈自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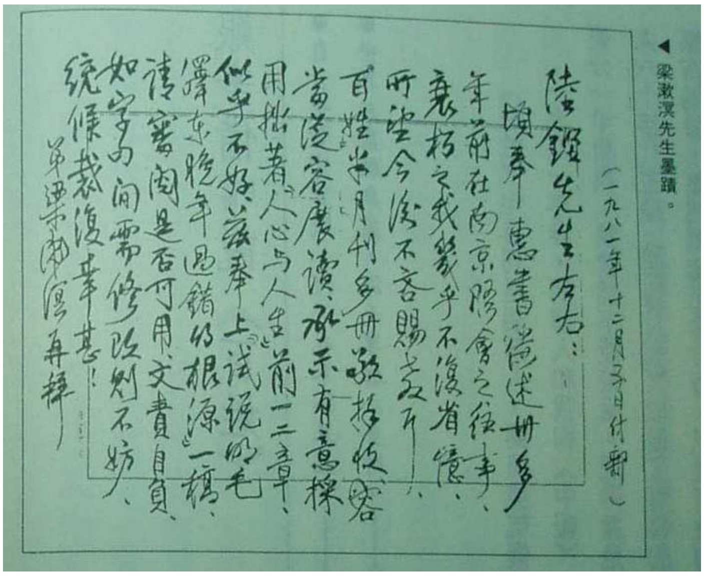
《百姓》半月刊是胡菊人、刘美美伉俪和我三人在香港发起创办的一个综合性新闻杂志。

一九八一年春，胡菊人和我与《中报》的傅朝枢不欢而散。傅朝枢赔偿给菊人廿万港币。菊人要分一半给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记得还是在查良镛兄家里聊天，他建议我们不妨办一个杂志。菊人六十年代主编《明报月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后来主编《中报》月刊也不错。以当时香港的传媒市场看，虽然杂志充斥于市，但从百姓的生活出发，多层面的综合性的杂志，尚付阙如，我们不妨从这个缝隙中走出一条路来。

由于当时月刊太多，半月刊少见，于是决定出版半月刊。刚巧，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问题刚刚冒头，于是便以九七为主题，打响了第一炮。

第一炮是打响了。但要长期保持爆发力却很难。而且根据金庸经验，出版半年后，会出现一个下滑期，必须提高质量，赢得读者的爱好，才能保持上升的气势。这时，梁漱溟先生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梁漱溟批毛，《百姓》受重视


陆铿先生左右：

顷奉惠书，备述卅多年前在南京阳会之往事，衰朽之我几乎不复省忆，所望今后不吝赐教可也。《百姓》半月刊多册，敬拜收，容当从容展读，承示有意采用拙著《人心与人生》前一二章，似乎不好。兹奉上《试说明毛泽东晚年遇错的根源》一稿，请审阅是否可用，文责自负，如字句间需修改则不妨，统候裁复，幸甚！

弟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廿日付邮）

▲梁漱溟先生墨迹。

我和梁漱溟先生认识于重庆，比较熟是在南京，当时他以第三方面的领袖折冲于国共间。

我从费彝民处得悉他的《人心与人生》书稿已寄到香港，准备出版。便写信给他，请求同意选一、二章交《百姓》发表。万万没有想到，梁先生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自北京寄来了《论毛泽东晚年过错的根源》一文，使我们喜出望外，乃于一九八二年新年号刊出。这是中共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由大陆寄到海外发表的第一篇评毛宏文，而执笔者又是望重海内外的大学问家梁先生。他在一九五三年春最高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针锋相对，表现出中国知识份子的铮铮铁骨。而在这篇评毛宏文中，指出毛泽东“荒唐错乱，颠倒疯狂，达于可笑可哀”的地步。其错误的总根源“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份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而励行之，以致造成不少灾难和罪恶，令人痛心，长太息!”

梁先生以当代谔谔一士，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不仅能面责中共之过，且找出暴君错误之总根源，反映出中国知识份子最可贵的精神。引起海内外之重视，是很自然的事。一时造成了“洛阳纸贵”。很多知识界的朋友坦率地告诉我们，是梁先生的文章才使他们重视《百姓》，并成为《百姓》的长期订户。

但应当指出，《百姓》同仁关于一九九七问题的全面报道和结合大陆政情的深入分析，加上像匕首投枪一样的尊子漫画，以及林昶的澳门综合报道是为《百姓》的特色。美联社有一次引用《百姓》关于中共中央文件的报道时称《百姓》为“香港领导杂志”（Leading Magazinge of Hong Kong）。

更应当指出的是《百姓》之所以能撑持十三年，刘美美顶了半边天，经理业务，煞费苦心，不怨不尤，而且做得很出色。

访胡记发表，胡耀邦下台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胡耀邦访问记》的发表，是《百姓》在国际传媒上受重视的另一焦点。当时，左、中、右、独的学者、专家纷纷发表评论，形成一股热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七年被极左派逼迫下台，第三大罪状就是接受《百姓》访问。

余英时教授为《百姓》创刊五周年发表了《敬业的精神》一文。称赞“《百姓》是在海外知识界有代表性的刊物，这几年来一直为中国大陆上九亿五、六千万和香港五百万的小百姓说话。”余教授在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根据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政治只是文化和经济的附生物，不能真正靠它来解决任何基本问题。他强调：“中国政治的品质只有在文化和经济都普遍提高了以后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改造，而提高文化的品质则是知识份子所负的特殊使命。”

在庆祝五周年号上，《百姓》还刊出了梁漱溟、赵朴初、台静农、饶宗颐海峡两岸三地几位大师的题词。而梁先生题的“黎民于变时雍”，这一来自《书经·尧典》的话，反映了老百姓对于变革的欣悦的情怀。

“六四”民运起，《百姓》传号角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把《百姓》推向高峰。《百姓》采访主任张结凤小姐，六四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弹受伤，却为《百姓》换来了染血的如实的激动人心的报道，配合名家评论，使《百姓》销路突破三万份，有关六四事件的一期不得不再版，而且再版也迅即一售而空。

至此，差不多连续两年，《百姓》成了海外民运之声的一只号角。不仅每期都报道民运动态，民运人士也在上面发表文章。

但世间任何事都有高潮、有低潮。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发展，民运也逐步走入低潮，特别是由于利益冲突，私心作怪，民运内部出现了内斗与分裂，社会大众对民运也越来越失望。《百姓》原来有两条主线，一是“九七”，一是民运。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民运有江河日

下之势；九七回归也因六四在港激发了一百五十万人大游行，一度形成高潮，经过近两年不死不活的局面，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减。

十年经风雨，文章动日星

回顾《百姓》十年岁月，正如香港四位作家黄维樑、朱立、岑逸飞、陈闽为祝贺《百姓》创刊十周年，送的对联所写的“十年椽笔经风雨，百姓文章动日星”，概括了《百姓》陪伴香港人走过三千六百五十日的风雨旅程。

十年，《百姓》做到了为港人之忧而忧，为港人之乐而乐。无论是好消息、坏消息，都及时为读者报道和分析。百姓同仁常常是不眠不休。如果翻看从一九八一到一九九一、十年来的《百姓》当可以找到香港九七的转折记录，闻到北京六·四的杀人血腥。并忠实地反映了香港人十年来喜怒哀乐的心路历程。

六四以后，大陆政治形成闷局，人们对政治普遍失望。特别是香港人，眼看大陆一局死棋，无处着力，倒不如回过头来将对政治的关心转回到经济的赚钱为本。以政论为主的杂志逐步为媚俗的刊物替代。整个市场的走势，导致传媒也趋于商品经营。所谓“文人论政”在年轻的香港人看来已经落伍了。

《百姓》从开办之日起就先天不足，严格地说是“白手成家”，能够撑持十年以上，真是艰辛备尝。

经营真艰苦，笔墨难形容

《百姓》之友徐东滨在《百姓》十周年时发表专文庆贺，他说：“十年寒窗的辛苦实在是难以笔墨形容的。三个人十年苦干，才保持了这个水平极高的、充分代表老百姓心声的、提供大量重要而可靠资讯的刊物。”

事实上为《百姓》奉献的决不止菊人、美美和我三个人。诸如历任的执行编辑吴甿、何良懋、陈庆源、许桂林、吴萱大，和最后一位主编刘致新及采访主任黄国华、张结凤等等都是香港传媒的一时之选。

说道辛苦，确实辛苦，参加《百姓》工作的朋友们，都是抱着一分理想来的。《百姓》提供的工资，只是大传媒机构的一半，但每个人都是热情洋溢的为之奋斗。作为老板，说出来可能使人难以相信，我和菊人两个主要负责人，每月从《百姓》得到的收入，只是采访部主任和执行编辑的三分之二。因为考虑到再少，他们就无法工作了。而我们自己，谁叫你有什么使命感？使命感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另一位《百姓》之友程逸兄说的：“在逆境下经营《百姓》，在种种精神物质困难下坚持出版《百姓》，在在望风驶豒，乘风转豒之政治转机时代，仍然坚守中国知识分子自尊自重岗位，不向恶势力低头，这代表中国读书人之道德性格及爱国家爱民族反独裁之风骨。”

菊人是君子，有为有不为

在这里我要特别推重菊人，一位典型的具有丰沛民族情怀、踏实献身精神，有为有守，行于大道的君子。

我比菊人年长十五岁，他以大哥待我，而我行动起来，却像一个小弟弟。当我们结合之初，香港传播界多不看好，菊人生性耿介，大声口无遮拦，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合作好则三月，多则半年，非崩不可。结果，我们竟然合作十三年，有始有终，友谊与日俱固。

为什么会出现此种奇迹呢？徐东滨兄从旁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两个在大节上是一致的，虽然个性完全不同，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大丈夫

的节操为二人所共有。

但是，我应当承认，菊人的刚正节操远非我所能及。这里有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一九八二年香港总督易人，谁将膺命，消息报道不一。《百姓》根据专栏作家毛孟静小姐提供的准确资料，预估尤德将会雀屏中选，及至伦敦宣布，果然是尤德。香港无线电视乃请菊人上电讯加以评述。

我当时认为这是宣传《百姓》的大好时机，乃叮嘱菊人一定要带一本印有尤德像片的当期《百姓》去亮亮相，以广招来。菊人当时未置可否，到他出镜讲述时，竟只字不提《百姓》，我当时很生气，认为他错失良机，而这是花几十万广告费去做都做不到的，此人未免太迂了。

当晚深夜扪心，进行反思，才发觉菊人的品格，远为我所不及。在他看来，电视台请他去讲尤德，如借机推销《百姓》，风格就太低了，既有违专业伦理，也是对听众的侵扰或冒犯，故避而不提《百姓》，做到了苏东坡所说的："躬履艰难而节乃见"。我以有这位临大节而无私的朋友为荣。

忆及《百姓》创刊不久，菊人赴台探望徐复观先生疾病，期间有国民党人士盛宴招待，并表示愿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菊人并没有接受。等《百姓》崭露头角时，大陆有关方面为表示好感，在港盛宴我们二人，当时准备了一包重礼拟在宴会结束时相赠，我及时劝阻。与主人告辞时，菊人说了一句：陆大哥粗中有细，避免了主客两尴尬的局面，实在太好了。

坚守独立的立场，力避左右袒，秉持杜甫"独耻事干谒"的精神，这正反映出《百姓》的性格。

菊人动手术，《百姓》易主人

直到一九九二年，菊人因过度劳累，左右两个盘骨都发生病变，不仅不能坐，连走路都有困难，结果右盘骨动了大手术，左盘骨尚待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即使硬撑下去，也得另请主编。菊人建议出售给对文化事业有感情的朋友。

这时我想到了徐展堂。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组织了一个"港澳知名人士南京中山陵参谒团"，徐和我都是团员。回程时，徐跟我说："陆大哥，我看你这个人很痛快，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我说："好！"他说："你回到香港，我请你住亚洲酒店。"我当即婉谢。因为亚洲酒店是他和新华社合作经营的，他做董事长，照样要付钱。而且新华社不一定欢迎我。

徐表示对菊人很看重，愿意帮我们的忙。我说，不必帮个人的忙，帮杂志的忙，登点广告。从而《百姓》就出现了中华漆厂的广告。

到菊人和我商定出售《百姓》后，我商请徐展堂以三百万港元价购《百姓》，这本半月刊连同价值百多万的九百多呎小写字楼一起出让给他。他唯一的条件即我不能离开，继续担任社长。就这样决定，由律师准备文件成交。

到签约前夕，徐展堂打电话告诉我，不签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台湾驻港代表黎昌意昨晚共进晚餐得知他准备买《百姓》，问他此举是否为了"消音"（消反共之音）。这是多么冤枉的事。我劝他不要为一句玩笑话就改变主意，而且已经通知菊人夫妇明天签约。这说明有人（不是黎昌意）恶意散布谣言攻击徐展堂，说他的目的在于向北京邀功。事实是徐当时相当勉强，主要出于对我的友谊与对菊人的欣赏才帮我们脱困。

梁儒盛加入，《百姓》送了命

《百姓》易主以后，我邀请了菊人的学生刘致新、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出任主编，并

介绍和徐见面交谈，徐重申不干预编辑事务，让致新放手做，菊人备咨询。

不久，曾任香港《快报》副总编辑的梁儒盛找致新谈，他愿拿出一千万港元，再请徐展堂拿出一千万元，两千万将《百姓》改为新闻周刊，大干一场。徐展堂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菊人也觉得是一条出路。不过都说要问问我的意见，我却认为是个冒险。发港的传真指出两点，在中共严密地控制新闻的情况下，新闻从那里来？我们不能编造。再就是办周刊是大资本、大制作，搞不好血本无归。

徐展堂是否看到这一传真件我很怀疑，因为他忙得成了“空中飞人”。等我回到香港，《百姓》已租了新厦，从原来的十个人，一下扩充到五六十人。排场倒是扩大了，内容却令人大失所望。至于资金，梁儒盛原来夸口出一千万，但仅垫款一百多万，造成关门后徐展堂还拿出近千万港币结帐。

办杂志第一炮最重要，而《百姓新闻周刊》第一炮就没打响。担纲的新闻是讲旅游。还有即攻击另一本周刊。像这样的内容，如何吸引读者？最荒唐是负责经销的，原报数周刊第一期销了二万七千本，到后来结帐，却说当初报错了，只是二千七百本，令人啼笑皆非。结果，把原来的读者赶走，又争取不到新读者，《百姓新闻周刊》出版不到七个月，不得不吃回头草，恢复半月刊，但元气丧尽，无力回天，于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寿终正寝。

致函徐展堂，互勉为百姓

《百姓》结束后，我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八日给徐展堂一函。摘要如下：

从《信报》上读到一段预委会的消息，内中提到你。我看了很高兴。反映出你不仅有不同流俗的见解，而且毫无顾忌地提了出来。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为了“一国两制”，有些话是需要有人说的。

《百姓》的事使你受累，我接受传媒访问，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你损失了一笔钱，但没有损失道义形象。从长远看，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从交朋友说，因为支持《百姓》，你起码交了三个朋友：胡菊人、刘致新、陆大声。我们三个都是从内心深处差了你一笔账。

当今之世，人与人之间要想建立“肝胆相照”的友谊是太难了。我和你却建立了这种友谊。曾记否？当你加股《百姓》并成为最大股东之后，张浚生曾跟你开玩笑说：“小心陆铿把你卖了。”你答覆他说：“他不会卖我。”事实证明，你的自信没有错。

再譬如，当《一周刊》报道你发生家变时，照理说是你最不愉快的时候，作为朋友也很难启齿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而陆大声不是一般朋友，我有责任成为你一个诉说对象。经我们两个敞开一谈，不禁哈哈大笑，笑声延续数分钟之久，直达你的秘书吴小姐耳鼓。她一定奇怪，徐先生不是遇到很不愉快的事吗？为什么会和陆先生笑得起来，而且两人一直笑着送我上电梯，这就是真诚友谊的体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你多次劝我，不要老割不断政治是非，年纪这么大了，应该享享清福了。为此，你还间接跟蓉芝提到：“劝劝陆大哥摆脱对政治的兴趣。”实际上，我是对新闻有兴趣，只是因为新闻老跟政治纠结在一起，所以“剪不断”。唐·元稹有句：“一夜思量十年事，几人强健几人无。”愿我们都能看得远一些，看得开一些。《百姓》虽然成了历史，我们还要为百姓珍重！

胡耀邦接受访问，陆大声一言丧邦

●望门投址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浏阳谭嗣同《狱中题壁》

●真诚的人死了，虚伪的人却活了下去；热忱的人死了，冷漠将他埋葬。空谈，托夫（TOEFL），麻将、桥牌、新权威……改革和它的死亡。这世界是个新的迷宫，我问你，耀邦，中国是否有希望？——北京大学校园哀诗（一九八九·四·十五，胡耀邦逝世日）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我的访问 ，交谈两小时，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中共中央（87）八号文件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第八号红头文件，对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作出了说明，其中一条罪状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露了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

本来这个文件只分发到省、军一级。後来，各个地方党员干部，对胡的不明不白去职，表示关切与不解，才渐渐在党员和干部中传开，至於大陆老百姓， 一贯是依靠“出口转内销”，绝大多数人直到四月底五月初听到外国广播，才解答了“为什么”的疑问。但仍然不能得窥全豹。

由于八号文件外电和报刊纷纷揭载，以三个附件公布胡耀邦的“三大罪状”，第三大罪状，直接和我有关，北京的朋友知道胡的罪名和文件轮廓后，以越洋电话告诉我说：“闯祸了。”美联社四月卅日北京电：“文件指出，胡耀邦接受华裔记者陆铿访问时，不跟其他高级领导人磋商，泄露了国家机密。消息人士没有说明这些机密是什么。”英文《亚洲周刊》（Asiaweek），在八七年四月十二日作了较详细的报导。一开头就说：胡耀邦的错误之一，是他在一九八五年接受驻纽约的报人陆铿的访问。八号文件说，胡向“包藏祸心的”陆铿透露了“国家机密”。

该文件第一部分叙述了一九八四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如何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大谈“创作自由”，并保证“党尽量不干涉文艺创作”。该文件还批了夏衍和吴祖光，说“从一九八五年以来，理论界和文艺界的许多老同志走上了与党背道而驰的道路”。极左派最终目标可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和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消息人士说，胡耀邦接受陆铿访问时，王兆国也在座。（陆铿按：王兆国并未在座。）胡想撤掉邓力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位，以王兆国取代。

香港的《明报》和《快报》也分别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五日和五月八、就两日，以“胡耀邦会见陆铿失言”为题作了报导和评论。《明报》说，中共以胡向海外报人透露国家机密成为他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快报》报导，这是邓小平为平官愤而发的一个文件，密件由三个附件组成，第三个附件集中抨击胡耀邦接见陆铿时失言，按性质细分为“五大罪状”。第一部份先对陆铿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然后再指责胡对陆说：“过去在国内你是吃了不少苦的。”“历史上我们该你一笔账嘛！”为阶级投降主义，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胡耀邦的话被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抓住了痛脚，成为罪状之一。其实，胡耀邦向陆铿道歉，表现得富有人情味，反衬出邓力群一伙太过冷血。

第二部份说陆铿给胡耀邦戴高帽子，设圈套，而胡竟上了圈套。这是指陆铿说在访胡之前作了小小的调查研究，分别访问了梁漱溟和缪云台，听了他们对胡耀邦的评价，梁是四个

字："通达明白"；缪是五个字："虎虎有生气"。陆接着说："确实，你给海内外人士的印象，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印象：开明开放，非常豁达；有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当然，也有人认为你不够稳重。"

《快报》指出，陆铿不光是说好话，也指出有人说胡耀邦不够稳重，还说了许多胡耀邦不爱听的话，像人权问题，要求释放魏京生、黄贤、罗孚等人。

如果说，胡耀邦上了圈套，《快报》认为似不公道。胡只是表现豁达大度，如陆铿临别说："我不是来讨账的，我是要通过我一个独立记者的直接观察，认识胡耀邦先生是怎样的人。"胡答曰："哎！个人所得了什么，你应该把重点放在认识国家的面貌上。"答辞是很得体的，无瑕可击。

但中共的传统，一向是"以斗争为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耀邦再大公无私，也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

从我来说，决未料到这篇访问记会被中共的极左势力作为向胡耀邦进攻的利器，甚至成为导致他被迫下台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即使得知闯祸，当时并未产生自责情绪，只觉得是中共的斗争哲学造成的恶果，不过，作为当事人之一，自然产生弄清真相的愿望，应该承认到弄清真相以后，我是深深自责的。

弄清真相得自知情人

但在中共处处保密专政制度下，要想弄清真相，谈何容易。"老天不负苦心人"，终於机会来了。

一九九五年我分别从两位中共知悉内情的高干谈话和文章中弄清胡耀邦被迫下台的真相。

一九九五年三月，在纽约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Andrew J. An than）教授举办对外不公开的中国大陆农业发展研讨会，由海峡两岸人士叁加 ，北京来客唱主角，万里先生原有意不远万里赴会，结果有所不便，来了好几位在大陆上有影响的人士，如吴象、吴明瑜、孙长江等等。其中有一位得悉我将参加，就说这不正是为胡耀邦带来一大罪状的陆铿吗？怎么可以跟这个"危险人物"同堂共话呢？我们还有回到北京去的呀！于是表示他和他夫人都不参加纽约之会，而要打道北返。这一下，主办会议的朋友为难了，只好来就商于我。我表示完全理解，彼此处境不同，心态自然两样，何况我曾被中共中央文件三次点名（一九八七年为胡耀邦下台的八号和十九号文件；一九九一年为许家屯开除出党的文件），于是提议致有关人士一简函，表明"本人此来，动耳不动嘴，更不动笔，请放心。"结果，及时化解了紧张气氛，想不到这位原拟走避之士，和我交谈后一见如故。他坦诚地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

耀邦的被迫下台，你的访问记被用作杀伤力最强的炮弹。其他罪名，都可有不同的解释，譬如，不听小平的话、放松了反资产阶段自由化的斗争、在反自由化斗争中"软弱无力"等等，这都可以有弹性的认知；只有你老兄白纸黑字是没有办法答辩的，使耀邦处于极大的困境。你又在你的访问记中狠揭了邓力群和胡乔木的疮疤，他们在整耀邦时，报复也就特别不择手段。

我当时听了，除了对胡耀邦先生产生一种亏欠之情，还能说什麼呢？

到了同年八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兼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所着"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在香港出版，把胡耀邦之所以被迫下台的情况说得更具体了。

吴江说："在广大干部和知识份子的眼中，胡耀邦是一个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

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一个当政以后依然具有牺牲精神的人，一个为人直率、敢於直言、即使在恶劣环境中也能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一个公道正派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好学深思、拚命工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天真的人，一个好像没有多少政治机心的人，因此信任他的人都为他登上这个岗位而担心。同时，他本身又确有一些弱点为人所议论，或容易为人所乘。例如，他喜欢即兴讲话，讲话又坦率随便，有人对此，时有微词。因说话随便而为自己招来大麻烦的，莫过於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见香港记者陆铿的那次谈话，这次谈话在胡下台时，甚至成为他的一大‘罪状’。”（见吴江着“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页一三〇）。

吴江在其书中提出：“胡耀邦为什么下台？一般归咎于当时发生的学潮，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官方公报更指责胡耀邦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如若根据当时渴望取代胡耀邦地位的某人（按：指赵紫阳）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所做的几乎整整一天的批判发言（这个批判特别利用了一九八五年五月胡耀邦接见香港记者陆铿的某些谈话内容），则胡耀邦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可谓苍天难容。”

应该坦率指出，当读到“数不胜数”、”苍天难容”之句，我才深深感到给胡带去的麻烦之大，而兴起“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慨与自责。作为一个独立的记者，在整理纪录时怎么会想到还要在笔下保护中共中央总书记呢？！何况那是一次录音访问，他怎么说，我怎么记。结果，唉！

说起录音，当我到达北京后向负责接待的中国新闻社社长王士谷和副社长王瑾希提出时，他们表示不可能。原因是并无先例，从来没有人带录音机进中南海访问。而且，即使在美国，记者也不能带录音机进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我说，因为访谈的内容很重要，如果没有录音，记录错误，究竟是总书记负责，还是我陆铿负责呢？老实说，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他们把我的要求报胡耀邦，胡先生却说：“他要录就让他录吧！”说明此公真是一位毫无机心、待人宽厚的君子。

胡率真口无遮拦实例

再以表现其率真的一面看，有一段关于王震的话，是极为生动的例子：

陆：王震老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吧？

胡：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呵！那是南北呼应。

胡：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以上对话见〈胡耀邦访问记〉页一六——一七）

万万没有料到，王震竟凭这段话，对胡耀邦大兴问罪之师，要胡耀邦交代那些地方“南辕北辙”。而且，倒胡过程中，王扮演演了主力角色。

我当时整理录音时，只感觉这是胡的风趣与幽默，并没有认为是个问题。

胡辞职书写给邓小平

我从北京朋友处得悉，胡在检讨中交代了与三个异议分子刘宾雁、方励之和我的接触。说他原来对我并不清楚，访问记发表后才知“陆铿是个坏人”。但他没有想到，邓力群为了想取他而代之，竟违反中共惯例，不通知本人，将胡的检讨书以中共中央十九号文件发出。

不过，对我来说，赵紫阳将访胡记作重炮使用，却出乎意料，正如吴江先生说的：“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按：邓小平接见外宾时曾说过：“天塌下来

有胡、赵顶住”的话。）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指赵）竟忘掉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具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按指李鹏）‘接着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

果然，一九八九年赵紫阳被李鹏等解决。据说一九九五年，他读到吴江此论，颇为不快云云。

至于胡耀邦的辞职书为什么写给邓小平，而不是写给中共中央委员会，或中共中央政治局，这当然与中共的独裁制度有关。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是毛说了算，而在邓统治时期邓说了算，唯一与毛不同的，是邓在重大决策时，还得听听陈云、李先念等的意见。

胡全力推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而且希望老人能做出榜样，主动退休。北京盛传这样一个故事，当邓向胡表示，他打算退休时，胡马上回应说：“我举双手赞成！”邓又说：“目前党内有些同志反对，说不要轻率从事。”胡则说：“我们可以向他们做做工作。”其人天真如此。而到邓小平以同样的话告诉赵紫阳时，赵的回答却是：“您退休了，我们怎么办？”与胡耀邦的态度截然不同。

一九九四年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和他夫人在旧金山我们家作客，我向他了解了王震接长中央党校后公开宣称要打掉胡耀邦“智囊团”的一幕闹剧。顺便问起北京知识份子圈中传说胡耀邦下台的关键在于他举双手赞成邓小平退休，究竟真相为何？

阮铭说：八六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和所谓纵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只是逼胡下台的借口，致命伤确是胡赞成邓退休。十二届六中全会前邓向胡说过：“我全下，你半下。”意思是邓辞去军委主席，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由胡接任军委主席，退居二线。胡当即表示举双手赞成。胡把这一谈话告诉了赵紫阳和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赵本人就不想退居二线，而且势将导致一大批人包括姚依林、宋平等都要退下，这一来，胡就变成了众矢之的。

阮铭转述当北京中共中央进入倒胡高潮时，王震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一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演中说的话，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使我对于中共领导层常常会有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表现，得到了答案。

王震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帝庙里关云长身边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你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什么方励之、巴金都是民族败类，社会渣滓。谁要赞成邓小平退，谁就是三种人（文革结束后，对文革期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份子的合称）。”

我的朋友苏绍智、刘宾雁、阮铭对胡耀邦的下台有个共同的看法，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主张民主、自由，追求进步理想的知识份子代表，但敌不住列宁 、史达林主义分子和枪杆子的联盟，所以成为悲剧人物。

怎样访问到胡耀邦的

按照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一九八四》的预测，一九八四这一年将是独裁横行、民主受制的一年。而我偏偏不信邪，选中这一年，在纽约创刊《新独立评论》，自八月起在纽约《华语快报》上每周刊出一次，以学习胡适先生等一九三二年五月在北京创刊《独立评论》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 ，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到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约了翟文伯、唐德刚、田弘茂、朱永德、杨力宇、 郑心元和我一共七人发起，由香港《百姓》和纽约《华语快报》主办，邀请反映左、中、右、独不同政治立场观点的学者、专家齐集一堂，举行“中国前途讨论会”。

出席会议的包括了美国学界亲台“四大金刚”丘宏达、高英茂、熊玠、翟文伯（还有陈庆、侯继明也是站在国府立场的）；代表左派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台湾研究所所长阚念琦；代表中间力量的有当时正在哥大进修的台湾党外领袖之一康宁祥；代表台独的有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主席郭雨新和萧欣义教授；加上自由派学者田弘茂、朱永德、杨力宇、唐德刚，可以说是最难得的一次聚会。

基于美国社会生活习惯，这一类座谈会听众一般不过数十人，上百人已经了不起，而我们的会举行时，遇着大雷雨，参加者竟超出四百人。临时要求罗斯福旅馆将原订可容二百人的会议厅换成可容纳四百人的大厅，仍座无虚席。听众中包括宋希濂将军、沈策将军、纽约台湾同乡会会长杨黄美幸及美国国务院中国专家柯比德等，特别引人注目。

传播媒介，对此次会议也很重视，除纽约中文传播机构外，海峡两岸官方通讯社和各大报均派人前来采访。北京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女士和记者郭招金（现任香港中国通讯社社长）不远千里专程赴会。

自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海外不少有心人就希望组织一包括不同立场观点人士共同探讨中国统一问题的会，均未能如愿，此次会议得以顺利举行，各方无不誉为创举。

就在会议结束当晚晚宴後，王瑾希女士代表中国新闻社向我发出了访问大陆的邀请。我表示，我是一个记者，要去北京就得进行访问。她说好，你可以提希望访问谁。我说，当然不出邓、胡、赵呵！她让我自己考虑决定，并通知他们。

就在这之前不久，我从在联合国中文部任职的友人夏沛然处听到一个消息，在纽约的几位关怀中国大陆的朋友，应邀到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会后表示希望和中国领导人见见面，北京方面很快作出安排。他们觉得应把平日想提的建议归纳起来到时反映，以表示海外华人的爱国之情。结果归纳出两条意见，一是大家考虑到国际舆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建议宽大处理在押的魏京生，以回应国际舆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是建议中国多派人到外面看看，加强文化、经济交流，以有利于四个现代化。

不料，当邓小平和邓颖超出面会见大家时，由夏沛然代表与会者把以上的建议提出，那知关于魏京生的话尚未表达完，邓小平就板着脸孔毫不客气地说：“我们请你们到这里来，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碰了一个大钉子。还是邓颖超凭政治经验，说了几句慰劳大家辛苦的话，化解了僵局。

因此，我在就在邓、胡、赵三人考虑以那一位为采访对象时，首先排除了老邓。想到以老邓的强势作风，遇到我的穷追不舍，到时候，他很可能把我轰将出来，或者把我丢下扬长而去。而就胡、赵作一比较，胡坦率而赵有城府，加上胡排名第一，连老邓排名都按体制在他之後，所以最後决定提出访问胡耀邦的要求，没有想到，胡很快就同意了。

这里面，当时出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许家屯也帮了忙。我和他谈了中新社邀我北访的消息，他估计邓小平接受访问的可能性很低，而胡却有可能，并答应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我的情况。许后来在他的香港回忆录里透露出了对我的评价：真诚、正直。政治上“批毛不批邓”，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想这也就是他当年向中南海反映的基调。对我顺利访问胡耀邦，当然起了推动作用。

北京方面在一九七七年春由曾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为召集人的五个部负责人，对我要求出国所作的审查结论，直到胡耀邦当面跟我说：“你吃了苦头了！”和“历史上我们欠你一笔账。”我才知道结论原来如此。但这一结论，在以邓力群为代表的中共极左派却视为“阶级投降主义”。

认识胡是什么样的人

我之所以有兴趣进行这一访问，是因自二十岁做记者以来，一向对研究人物有瘾，而胡耀邦当时在大陆排名第一，平反冤、假、错案，口碑载道，很希望通过直接观察，认识一下胡耀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访问大陆，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陆有新闻，从海峡两岸三地看，新闻最多的是大陆，问题在于如何发掘。

其次，就中国的命运看，虽然台湾声称："中国的希望在台湾"，但她同时声称："中国的前途在大陆"。只要大陆实现了自由、民主、均富，台湾、香港还怕什么？因此，能够有和中共高层人士对话的机会，就应该把握住，反映海外华人的意见，使中共有所警惕和改正。

神州百姓的幸福，为举世华人所关注，中共作为统治阶层，自然应对大陆百姓的自由幸福负责。而大陆百姓向来缺少进言的渠道和机会，知识份子本于良知，应该为他们说话。而胡耀邦又是一位比较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的人。

所以我愿抓住这个机会，一尽记者的社会责任。而访问的结果证明，胡耀邦确实是一位心向百姓、值得尊敬的人。

胡原定五月九日接受采访，因当天他要宴请一位纽西兰贵宾，怕宴客时间影响了我和他谈话的时间，建议改在十日，以便有充分机会交谈，反映了他的周到，能为对方着想。

十日的访问在中南海进行，由家人陪同前往。胡耀邦穿了一套普通的灰色西装，给人以短小精悍、和蔼可亲的印象。他立于厅前，表示欢迎，一一握手，集体合影后，杨惜珍和二儿子可信、长孙女赞美三代人被安排参观中南海，再次反映胡耀邦的周到。事后，小赞美说："真是大开眼界!"

胡打破惯例表示歉意

访问时在中南海内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厅进行，大厅正面一幅巨大的工笔花卉和锦鸡双飞图，色彩鲜艳脱俗。正中两把红绒面子的单人沙发，胡和我各坐一把，中间一张紫檀木茶儿，上面摆了一盆鲜花、四个茶杯。我和胡及坐于胡身后作记录的秘书先生各饮一杯，另一杯空着，这原来是接见外宾时给翻译准备的。胡和我的两个茶杯中间，有一个烟灰缸，胡的香烟一支接一支抽。在两个小时对谈中，我喝了三杯茶，胡也喝了两杯茶。作记录的秘书先生，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埋头振笔疾书，他的那杯茶自始至终未动。

访问开始，胡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他诚挚的歉意表示，被"左王"邓力群等弯曲为"阶级投降主义"。在极左分子看来，对一个反革命分子讲这种话，简直是对无产专政的亵渎。

到底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

至于邓力群等在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八号文件中，指胡耀邦向我泄露了"国家机密"。我仔细地又重复阅读了一遍《胡耀邦访问记》，约分六个部分：台湾问题；人事安排；军队问题；邓力群与胡乔木；新闻政策；人权问题。我从这六部分客观地冷静地搜寻"国家机密"何在，发现胡在谈台湾问题时，承认中共如对台用武，还没有力量。他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甚至透露："连封锁力量现在也还不够。"这可能被当作机密。

其次即他说："再过七八年，上十年，我们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的现代化也就有办法了，台湾的广大人民要求回来，就是你那个少数人不愿意回来，那对你就是要带一点强制性了。"

这一段话，可以视为中共武力犯台的规划，不仅台湾反应强烈，蒋经国一九八五年视察

金门时，特别提到胡耀邦对记者发表谈话，毫不隐瞒要对台动武，号召军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连外国通讯社也将它解读为中共准备对台动武，首经法新社根据《百姓》半月刊发表的〈胡耀邦访问记〉引述，再经英美大通讯社转发，一夜之间传遍世界，受到国际重视。

美国国务院以最快速度，于《百姓》上市的六月一日先将〈访问记〉中有关台湾部分及时译出，接着又于六月三日有联邦广播资讯服务处（FBIS）全文译出，并刊载于国务院发行的《每日报导》(Daily Report)。美国国务院并通过外交途径为此文向北京当局表示关切。他们质疑：邓小平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三十五周年北京阅兵时，还表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动武呢？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李洁明在华府代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次新闻简报会说："胡耀邦的话是被一个非常具有进攻性的记者逼出来的。"

知道廿一日，也即〈访问记〉发表三周以后，美联社还自华府发出消息说，关于北京可能在台湾海峡动武的问题，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进行了急速的交换意见。

事实上，胡耀邦先生谈到台湾问题时给我的总印象，仍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而外国记者从新闻刺激性角度出发，把"那对你就要带点强制性了"解读为"动武"，因而引起轩然大波。

除了公开传媒报导，还导致秘密外交。第三世界会议基金会主席瞿文伯教授受台湾方面之托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作了大陆之行，向北京方面转达了台湾对胡耀邦谈话的忧虑。北京领导人表示那只是胡个人意见，且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请台湾放心，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直到一九八七年胡下台后，瞿教授才将这一段秘辛告诉我。

中共之所以把胡耀邦接受我访问，列为一大罪状，明眼人一看就知，仍不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窠臼。

舆论赞扬胡耀邦开明

事实上，胡耀邦不但不是"阶级投降投降主义"，相反地他向中外舆论，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不少好评："原来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都是死顽固，也有开明派。"台湾"四大公子"的沈君山读了〈访胡记〉后，就说："胡耀邦有点可爱。"

绮色佳的杨龙章教授针对胡耀邦向陆铿表示的歉意和慰问著文评论说："这份见面礼有象征性的意义。如果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所有苦海余生的男女百姓表示歉意和慰问，至少，这一姿态表白了胡耀邦个人的心肠。他自己受过不少委曲折磨，能本不忍人之心，体会到别人受过的滋味。从他的口气里，我们似乎感觉到，经受三十多年疾风暴雨摧残的人道主义，已在血腥消散后的中国大陆，重新生出苞蕾。"

龙章作梦也不会想到，胡耀邦所表示的歉意一年半以后，竟成为他下台罪状的组成部分。而胡的含恨逝世以及青年学生对他的吊念，更演变成八九年"六四"震动世界的血腥事件。是上帝折磨可怜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自己折磨自己？！

为历次运动中受诬陷的人平反

不管怎样，胡耀邦用事实（带头为全中国大陆的右派平反，并将数以百万计的戴了三十年、并多数被压弯了腰的地主及富农帽子，统通摘掉。）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在历史上不会被忘记的正直之士。我相信将来人们为中共写历史时，胡耀邦一定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我对胡耀邦下台感到忏悔

胡耀邦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是一九八九年随星云大师率领的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四月十五日到了上海在一个庙里参观时得知的。当时，万念聚集，悲从中来，面对一座大佛，竟至潸然泪下。

作为一个基督徒，跑到和尚庙里，已经令人奇怪了，怎么还会淌眼泪 。原来，真感情是不能分教派的，基督也好，佛祖也好，都劝人行善，而胡耀邦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大善士，大菩萨。试想，上百万人的专政对象帽子，都是他摘掉的，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慈悲吗？！

在返回香港的航机中，我反思了一下给胡耀邦带去的麻烦。我虽然坐了那么长久中共的监狱，付出了血、汗、泪的代价，但“新闻第一”的习惯，仍牢牢扎根思想里，而在处理新闻性的稿件时，只问事实，很少考虑影响；而且作为一个记者在进行访问时，抒发自己的意见，把自己卷进去，比如，访胡时由谈台湾政坛的“见光死”，而讽刺邓力群的“见光活”；再如揭胡乔木为自保而检举邓小平的卑鄙行为；结果，他们为了报复，狠狠整了胡耀邦。而我应该承担“始作俑者”的道义责任。

更使我感到不安的，即胡耀邦见到《百姓》的大样后曾提出七点，请予修订，而被我拒绝。

事情的经过时这样的，当时耿飚的小姐耿燕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许家屯社长的助理，我的《胡耀邦访问记》决定在六月一日出版，她在五月廿九日问我能不能“先睹为快”？我说：“可以”。她于是到《百姓》杂志社拿走了一张大样。我没有想到她回到新华社就报告了许家屯，许家屯认为关系重大，马上派人送到北京请胡耀邦过目。

胡阅后改动了七个地方，其中三处都是“哈哈……”。这本是胡平日说话的习惯，但纸上过多的“哈哈……”似乎不够严肃。问题比较大的是实质的修改，一处是说和王震南辕北辙的话，胡主张这句删去。一处是我谈到胡乔木说：“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也不很好，特别是批邓运动中表现得很不好啊！”胡听我这么一说，情不自禁地说：“哈哈……你们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像上面这类话，谈的时候是顺嘴就出来的，但写成文字，就严重了。所以胡也要求删掉。

还有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指军委主席）了。”这是犯忌的，胡希望删去。最后一点是涉及陈云的，胡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反应对老一辈称呼的小心翼翼。

但当杨齐和牛钊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身份转达胡耀邦的意见时，我所刊载《访问记》的《百姓》九四期已经付印，修改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七处要改的地方，三处“哈哈”，属于虚词口语，无关宏旨。一处称陈云为老同志，要改为老革命家，只不过表示尊敬。至于其余三点，因为都是对事实的反映，相信不会成为问题。

当时我嘴里没说，心里是有衡量的，也就是真正的问题出在讨论台湾的部分，这是会引起国际重视的。既然胡对这一部分未作只字改动，对于他们党内的关系的表述，看来不会严重到那里去。

为了使杨奇、牛钊两位有个交代，我写了一张简函给胡耀邦，除表示因时间仓卒，杂志已经付印，无法改动外，特别提出在整理记录时已注意到不损其形象，如“老爷子”之称即略去，请赐亮鉴，并予原宥。

这是指胡耀邦和我谈到邓小平时，一不留心曾习惯地称之谓“老爷子”，但及时感到不妥：这样称邓，自己岂不成了“儿皇帝”？于是赶紧向我解释：“啊！这是邓家的孩子们对小平同志的称呼。”我感觉得出，胡解释时多多少少有一点尴尬。所以，我在因无法满足他

们要去给予改动的情况下，只好给他一点安慰。至少有损形象的称呼，未在访问记中出现，请他放心。

事后反省，这样做，不是对一个像胡耀邦这样没有心机的人应取的态度。严格说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至少是良心的谴责。

在胡耀邦下台的第三年，听说他健康不好，我特在旧金山买了一盒西洋参寄到北京给他，并附函表示谦忱。后来，一位和胡德平经常来往的女士告诉我说，耀邦对自己上纲上线（指无限提高原则）写检讨有点后悔，特别是对刘宾雁、方励之或你的批评，感觉大可不必。（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十九号文件，未经胡耀邦过目公布了胡的检讨报告。提到陆铿时说，过去不知道陆铿，看了《访问记》，才知道陆铿是个坏人。）

这一信息不能不使我感动，胡耀邦先生在遭遇横逆的情况下，还在为别人考虑，真是一位可敬的君子。

北京作家也是老友的冒舒湮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刘述先，得知胡耀邦下台的罪状之一是接受我的访问时，先后有了相同的反应：“陆大声‘一言丧邦’！”虽然，舒湮是感到遗憾，述先是发自幽默，而我心底泛起的感情竟然是在自责中还产生一种自我原谅的成分，〈访胡记〉起码让中外舆论认识到按列宁主义的模式建立的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共产党中，还有一位秉持真诚的言行，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的胡耀邦。

历史必然会给这位一心为人民的政治家以高度的评价。

老记者、名作家萧乾评（访问记）

兄的《访问记》弟又重读了一遍，仍觉得是采访学的一部 classic。访问有几种写法，在大陆，一般是按照被访问者的路子，他想说什么，就问什么。这种访问记好写。凡是他不好说的，一律避开，专挑他想说的。如访问劳模，即问他的突出事迹。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更是只问他要声明的。我称这种访问记者为“顺势访问记”。这种访问记容易写，然而它总躲开要害、关键，因而看了往往不过瘾。

〈访问记〉我认为是“逆势访问记”极为成功的一种。采访者充满了机智。明明问的都是对方想躲开的问题，然而并不莽撞。问者彬彬有礼，讲求技巧。一些尖锐问题正是随着礼貌之后，冷箭般投射出来，把被访问者逼得无处可躲。

当然这里面有被访问者的素质问题。如果他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客，还是能躲躲闪闪打一通“太极拳”，是对方什么也摸不着的。如逼问得过于凌厉，他甚至可以来个拂袖而去。遇到脾气暴躁、自卫感特强的人，他甚至可以把桌子一推翻，请你走人。

然而胡耀邦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但讲求礼貌，胸襟又分外坦率。不肯说违心的话，更不会使出野蛮手段。

其结果，就是老兄这篇异常成功的访问记。

我认为学采访的年轻记者，应该把你这本《访问记》作为范本；新闻学院应当把它作为教材。成功的采访，不是听任被访者重复那些已知的东西。他应凭访问的技巧、本事，发掘出那未知的。

这些，也不是兄以为然否？

●陆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到欧洲担任战地记者的共八人。萧乾是第一位先行者，陆为后到者（详见《欧洲战地记者行》一章）萧陆订交于一九三九年春滇缅公路枢纽站、陆的故乡云南保山。对于陆选择终身做记者，起了启蒙作用。欧洲战场上相遇加深了友谊。一九四九年陆先后被国共两党下狱，即中断联系。一九五七年萧在北京、陆在昆明分别划为“右派”，一九七九年香港重逢，热烈拥抱，喜不自禁，萧笑称：“同派之雅”。一九八五年陆应邀北访，萧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升任馆长），曾介绍王海容女士晤谈，言明不发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萧二读《胡耀邦访问记》后，致陆一函，述其观感，鼓励有加。一九九六年八月，陆以在台北南港写《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相告，萧回信第一句话是：“兄终于动笔写 Memoir 了，至喜。”萧长陆八岁，但本于中国文化谦逊之道，通信一直称弟，陆则称萧为乾兄。萧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廿三日覆陆函中，最后一句话为“希望与胡耀邦之会见全文收入。”

惜因篇幅以多，未能遵命，只有另行设法出版，有负老友关爱之情。谨将萧八九年四月信中有关〈访问记〉评论发表。信之前段及最后段落因与主题无关，从略。

会见邓颖超，回想周恩来

●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宋·陈刚中〈阳关词〉

●一夜思量十年事，几人强健几人无。——唐·元稹〈西归绝句〉

一九八五年五月应邀北访。自纽约经香港飞抵北京后，我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因采访新闻而认识被我们一班年轻记者称呼为邓大姐的邓颖超，一别已近四十年了。既然来到北京，应当看望一下。同时，对周恩来先生的逝世，就便表示悼念之忱。

当时，负责接待我的是中国新闻社。王世谷社长得知我的想法后，告诉说，按惯例，在北京安排访问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只能一人。我既已确定访问胡耀邦总书记，就不方便再安排访问全国政协主席邓大姐了。

我告诉王世谷先生，见胡先生是为了访问；而见邓大姐不是访问，而是礼貌性的拜侯。请转达一下我的意思，就说陆铿来了，问她愿不愿意一见。而且，我提出一个建议，如果能同时会见现在北京、当年（一九四五至四七年）在重庆、南京一起采访国共和谈新闻的记者朋友更好。(因抵京后即应这班朋友邀尝谭家菜话旧)。

中通社把我的想法通过一位跟邓大姐一直保持来往的新闻工作者陆慧年女士转告了邓大姐的秘书赵伟女士，邓大姐听到后，表示很高兴，连说：“要见，要见!”就这样，有了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之会。

当时，同时参加会见的有原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祝修麟、朱恒龄和我；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徐盈、高汾；原《新民报》记者钱辛波、金光群；原《南京人报》记者王孚庆；原《申报》记者俞振基；原上海《联合晚报》记者陆慧年；原《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正巧自美到北京，代表一家美国公司接洽商务，也赶上这个机会。一共十二人。这是继邓小平一九八五年接见当年在华采访的一批外国记者之后，中共领导人又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交谈活动，也是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被认为是“老朋友”的中国记者会见。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当时任职北京《经济日报》的高汾女士以《老报人难忘的时刻——记邓颖超大姐会见老新闻工作者》为题在该报第一版发表了报导文章。这里摘录三段：

邓颖超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四十年前我们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见面，现在是在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聚会，我心里很高兴。尤其是陆铿远道而来，我表示欢迎。”

陆回应说：“回想当年在南京国共和谈期间，您和周恩来总理、当时的中共谈判代表，对所有的记者都是那么亲切，有问必答。我曾看到过在谈判进行时，周先生曾经声泪俱下，邵力子先生、梁漱溟先生、章伯钧先生等曾经急得跺脚，这一切使我永远难忘。今天看到您，仿佛又回到那些日子、二十五六岁的青春年华。”

邓颖超说：“你对过去的事都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亲切。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在苦难中我们曾共同工作过。”接着，她环视了一下大家。看到从前的英俊小生如今已是皤然白发；从前的小姑娘如今已是脸上堆着皱纹的老太太了。她感慨地说：“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不会老。”

接着，邓颖超讲了一段批评中国大陆新闻报导的话，高汾基于所处环境的考虑省略了，这反映中共领导人中具有远见者是反对“党八股”的。周恩来、邓小平都曾作过类似的批评。

邓颖超首先引用周恩来三十年前参加万隆会议时写给她的一封信中的话:“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她批评中共的新闻传播总使人感到不那么对劲。报导是报导，思想和眼睛却没有面对着群众，面对着读者，到底应该重点放在哪里，应该怎么写，老摆不脱八股。本来在聚会中谈得很活跃的，就不敢写为亲切而活跃的会谈，总是说什么“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会谈”，就不敢加“活跃”两个字。我插话说，今天中新社的两位王社长在座，就会加上“活跃”两个字了。引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我发现我的老朋友们都相当自律。若是当年在重庆、在南京，早已是哄堂大笑了。

邓承认对台湾不甚了了

事隔十二年，会邓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坦率地表示对台湾的情况“不甚了了。”

根据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我自北京发给香港《百姓》杂志的专电（见《百姓》半月刊）：

在会见过程中，邓颖超对台湾情况表示非常关切。她向记者实行反采访。她承认对台湾内部情况不甚了了，虽然基本情况是知道的。陆铿告诉她，台湾居民大部份生活富裕，由于中产阶级起来了，要求参政，政治比较活跃，言论也比较自由，因此在台湾赞成大陆统一的人不多；相反地，提到统一就很紧张。这主要是由于中共过去三十多年来的表现，特别是文革，丧失了人心，故在台湾的人对中共是排拒的，或者说普遍患了“恐共症”。而台湾当局绝不愿变为地方政府，宁为鸡口，毋为牛后。

邓颖超听了记者这段话后，承认统一有困难，她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但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展，因为方针政策对头。我们提出“一国两制”，保证三不变，他们可以放心。我们充分照顾他们的利益，九条（指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身份提出的叶九条）也考虑到台湾人民的利益。他们心有余悸，也难怪。但台湾的安定局面是暂时的，他们的经济寄托在对外加工上。他们还没有了解我们整个方针政策。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呢？同英国都能谈妥，何况彼此是同胞。”

“我们跟台湾讲三通，他们讲三闭，给我们吃闭门羹，谈不拢。他们说我们是搞统战阴谋，我们把一切主张都公诸于世，那有这样搞阴谋的呢？”

邓颖超强调：“这个工作虽然艰巨，但为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做。当然，解决台湾问题比解决香港问题复杂。现在台湾是小蒋先生一言为上，一旦他死去，台

湾会出现什么局面，不出现大乱，也会出现中乱和小乱，出了乱子，主要是台湾同胞受损失。而今天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是美国。”

陆铿向邓颖超介绍了海外学人如丘宏达教授等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见解，指出美国、德国的统一均是经过一段“邦联”的时间，各邦相处融洽，认为进一步合作大家才能进一步发展，所以进为“联邦”。中共现在对“多体制”国家及“邦联”均不考虑，“联邦”也反对，因此看不出有任何和平统一的可能。

邓颖超表示对统一有信心，并表示可以耐心等待。

我发现，邓颖超虽然在同一问题上反映出迫切的愿望，但她去表现得颇有风度，只字没有涉及对台动武的问题。只是从她所说台湾在蒋经国死后可能出乱子这句话，证实了大陆学者在美国发表论文所称，台湾如果内乱，中共要出兵平乱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中共中央当时对台湾局势的分析而来。

邓颖超透露还文革欠账

在八日的会见中，赵浩生根据邓颖超所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是美国”一点，建议中共扩大中美贸易幅度，以经济问题解决改制问题。

他还建议国内抓好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借以对海外华侨和华裔中的十万左右的科技人员回国服务产生好的影响。同时，他向邓颖超诉了一点委屈，说海外人士骂他是“歌德派”。

邓的回答是，你们的意见重要，中央正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下面也有各行其是的。最近我要政协各工作组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资讯，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凡是开头难么！至今，“文革”的欠账算是还得差不多了，但住房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处理的问题是一大摞一大摞，我们不仅要搞和平建设，对世界上说，还得反霸，事情多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我针对过去一起采访国共和谈的记者同业，在北京竟然二三十年没有机会和周、邓交谈，接着邓颖超的话，向她提出一个建议：

在座的一些同业，过去在南京半夜三更都可以打电话把周恩来先生吵醒，查证有关和谈新闻，您也从没有抗议过。而到北京后有的隔了二十六年才见到您，您在台上，大家在台下，遥遥相望。我建议一九八九年在北京举行一九四五到四七这几年所有参加过和谈新闻的老记者来一次大聚会。

邓颖超礼貌地表示说：“你的想法很好。你的批评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现在有些人觉得党与以前的作风不同了，其实，也有客观的原因，以前活动天地，就是曾家岩、梅园新村，现在局面大了，事情多了，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对大家作的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但自然规律使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去年政协开会，拼搏了一阵，参加了小组讨论会，几十个小组分布市区和郊外，够我跑的了。还是感到自己工作没有做足。让我当全国政协主席，感到担子太重。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要花一定的时间。”接着，她热情地说：“许多人体谅我，怕我年纪大，身体不好，不好意思提出见我。其实我还是很想见见大家的，尽管提好了，当然见不见是我的事，这次陆铿回来，他一提我不就见了吗？！”说得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遗嘱邓说有造假

大家关切地问：“邓大姐有没有写回忆录的计划？”她答说：“现实的事整天忙不完，没时间去回忆。活人的是都忙不完，只好把死人的事搁一搁。”并提到：”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跟我叙家常，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我说我没儿没女。他说：你不觉得寂寞吗？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感到寂寞。说真格的，这决不是外交辞令。”

一个多钟点过去了，我发觉主人有点疲累，提议告辞。邓颖超由于年迈，和邓小平一样，一九八五年起已为中共中央定为“保护对象”，尽可能减少其劳累，包括见客，也尽可能减少。她向我们这一班老记者透露，她已两度请求退休，均未获准，理由是时机未到。不过，八日之会，因是见老朋友，兴致特别高。她风趣地跟我说：你后天要会见耀邦，谈天下事，谈政治，而和我的会见是谈友谊，不过友谊中也有政治，引起哄堂大笑。

周恩来逝世后，海内外盛传，由于江青等在文革后期提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毛泽东在谈论《水浒》这部小说时，也说它的重点是批“投降派”，隐喻周恩来。周在为他的膀胱癌绝症最后一次开刀前，曾立下要求八大军区司令员支持邓小平的遗嘱。这些话传的活龙活现，我在向邓颖超告辞时，请求对遗嘱的事加以证实。

邓颖超说：“恩来并没有留下遗嘱，听说有人编造了一个遗嘱，那是假的。”从而澄清了这一段公案。

不过，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曾经情不自禁地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则为童小鹏（曾任周恩来办公厅主任）主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所证实。

抗战大时代统战大开展

我和周恩来、邓颖超伉俪认识，远在一九四一年的重庆。那是一个统一战线大开展的时代，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国新闻学者包括不同党籍和无党籍的记者都兴致勃勃的参加。陪都记者自贡访问团，我和《新华日报》记者鲁明（五十年代任北京驻越南大使馆代办、驻蒙古大使）分配住在同一个房间，彼此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胸无城府。虽然政治立场观点，未尽相同，但彼此都认同大家生活在新闻大家庭里，感情融洽。

当时，国民参政会是团结各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参政议政组织，发挥着战时国会的作用。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有八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王若飞。毛泽东从未出席过；周、邓双双每会必到，对我们记者和颜悦色，热情招呼。从那时起我们就称邓颖超邓大姐，称周恩来周先生。不过，在实际接触中，他们还是要看记者报导的立场观点，区别对待。比如像《大公报》的彭子冈、《新民报》的浦熙修、人称浦二姐，她们进入中共代表团，常常是穿堂入室，而其他记者要访问周恩来，却需要事先约定。

由于中共是非常注重而且懂得利用舆论攻势的；有时且以独家新闻回馈态度倾向中共的记者，给予特殊照顾。突出的事例是，一九五八年中共决定炮打金门，就将这件事提供给老牌记者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发表，轰动一时。

国共和谈周邓敞开大门

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于南京展开，周恩来在梅园新村的门是大开着的，对于自己方面的记者或亲中共的记者，固然在新闻上给予一定的方便，对于代表国民党新闻机构如《中央日报》、中央社的记者也表现出“一视同仁”的欢迎。那时候，老记者范长江和后来在北京出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的梅益任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也都是以朋友的态度接待来自各方面的中外记者。

我生平第一次看秧歌舞，就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一九四六年于梅园新村举办一次与记者同业的晚会，当时主要的节目是《兄妹开荒》；而《南泥湾》的歌曲也是第一次听到。周、邓还对每一位出席晚会的记者赠送一条山东解放区生产的麻织布裤料，质地相当不错。反映了中共的军队是把打仗和生产结合起来的。

梅园新村的记者会当时也是首都南京的一个新闻重点。中外记者踊跃出席。使我永远难

忘的一次是一九四六年五月陆定一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出席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记者会。陆定一强调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受到国军的攻击，国军甚至企图消灭李部，并直指是蒋介石的命令，指控政府方面违背停战协议。

我当时问陆定一，指为蒋先生的命令有何证据？他说是截获了电报。我再问电报的可靠性如何？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一点也不客气。当晚，美联社驻南京特派员米尔克斯（Horald Milks）就以“两个姓陆的吵架”（Two Lu′s Quarrel）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当我与陆定一吵完架，记者招待会结束，大家纷纷离开梅园新村时，我还没有走出大门，周恩来突然出现了，满面笑容对着我问了一句：“怎么样？今天收获不小吧？”我没有料到他会来这一手，只能点头说：“不小，不小！”及至坐上车回报馆的路上才引起了反思：为什么面对陆定一，我表现得理直气壮，侃侃而谈，面对周恩来，就会有吃瘪的感觉呢？

直到隔年马歇尔将军以调处中国内战失败决定回美之前，我对他进行了一次不作记录的访问才得到答案。

马歇尔赞周恩来了不起

我问马帅：“中国的政治人物，你所接触的，给你印象最深的是那一个？”

他说：“周恩来。”接着他简单谈了他对周的印象：“周仪表不凡，风度翩翩，不慌不忙，谈起话来态度诚恳，娓娓动听，有时虽然感觉他是在诡辩，但也觉得机智可爱。他容易得到人的好感，而且给人以他是顾大局、愿意妥协的和平使者的印象。”

我再问：您所接触的国民党人中有没有可以同周恩来匹敌的？他说：“抱歉！没有。”

我后来和曾任外交部长多年的王世杰（雪艇）说起周恩来，王回顾了一九四五年政治协商会议的诞生，告诉我说，当时蒋先生指定他、邵力子先生和陈诚将军三人和周恩来先生商量起草出一个纲要来。王于是根据周提出的“党派会议”的设想，草拟出“政治咨询会议”的轮廓，由周先发往延安，征询中共的意见。周继后在四人会议中表示，雪艇先生草拟的文件，延安尚未能接受，但可以考虑。他本人奉召须返延安一商。雪艇先生当时就感觉周这个人不太简单，因为王草拟的文件，十九都是周提议或已表同意者，周竟说成是“雪艇先生所拟”，显然是预留了推诿或推翻的后路。王判断也可能是因中共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周根本无权提任何新意或接受他人的提议，故来一个“移花接木”。

雪艇先生这一段话，对我以后认识周以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顺便一提，王雪艇先生之所以和我建立了友谊，起于首都记者因他态度过于谨慎，纹风不露，怕见记者，集体予以杯葛，一致拒刊外交部所发官式新闻，是我出面调解，由王向大家表示了歉意，并提出改进新闻供应的办法，从而平息了一场风波。详细经过曾由《新闻天地》报导。一九四七年王在宴请张君劢先生时，特别约我共餐，三人就国共纷争充分交换了看法。王后来在台湾受蒋先生斥责，名以上是因陈纳德的 CAT 事处理不当，实质上王成为陈诚尊重的智囊，加上胡适之、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所谓台北“商山四皓”都在陈的周围，引起蒋的猜忌，迁怒于王，因而受屈。才乃题外之言，谨供参考。

高统战高手记忆力惊人

回头再说周，认识周的人都感到周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好。我一九五四年在昆明出狱，五五年写信给邵力子先生请代谋一学习机会，邵将我函转周，周马上就批交统战部，指定为统战对象，由云南省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就近安排，于是又一度而为民主人士。

一九五六年周为中缅边界问题到昆明，有一次在云南省政协与各界人士见面，在人群中

发现了我，马上走近握手相向说："你还是和南京时候差不多。我是从邵力子先生那里知道你是云南人。"其记忆力之惊人，在我身上也得到印证。

总之，在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周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统战高手。但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尤其是配合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时有责难，指为"过于愚忠"；甚至责以"助纣为虐"。不过，也有人为周恩来辩护。在老毛那种封建法西斯个人专断下，他为了大局也为了自保，除了跟随老毛，没有选择。直到临死前还声嘶力竭地辩解自己"不是投降派"，其内心痛苦可知。一九九四年曾经多年担任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的胡绩伟兄访美，在舍下小住，他因为是中共的新闻工作者中唯一长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和周的接触不同一般，对周的了解也不同一般，在他看来，周恩来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仁者之心、智者之慧、勇者之概的大政治家，书此，以为后世评周者参考。

千古奇冤李荆荪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经》

●天地有穷，此冤无穷。——柳宗元

●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 —— 杜甫

我一生好交朋友，并且交到了几位知心朋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句："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而我何幸，知心竟不止一个，李荆荪就是知心之一。

和荆荪相识于重庆南温泉政校新闻事业专修班。他属甲组，半年进修；我属乙组，一年卒业。我比他早进校半年，而同时结束。他留校任助教，我开始做记者，那是一九四０年的事。

荆荪美丰仪，玉树临风，为人潇洒而心地善良，上交不谄，下交不骄，故我敬之若兄；他看我生性直率，坦诚对人，也颇为欣赏，而待之若弟。

《新闻天地》在重庆创办，荆荪是主要的触媒剂。那是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间，丁中江已在重庆出版一个画报，进一步约邱楠、乐恕人、毛树清、周培敬和我办一个杂志。而卜少夫、罗保吾、刘竹舟、刘问渠还有郑郁郎也准备办一个杂志。荆荪和两边都熟，他和我商量，把两边的力量合起来，我完全赞成。其时我担任《新闻战线》月刊主编，乃将此事请教赵敏恒老师，恒师那时任路透社中国经理，他建议出版一份以报导内幕新闻为主的杂志，并主动表示愿当我们的顾问。于是经过荆荪的沟通，大家坐下来开会。最初准备采劳动组合方式，人人当老板，个个当伙计，除每人缴法币五千元作为创办费外，约定主动写稿只计稿费入账，但不付酬。正式组成时，郑郁郎和周培敬因故没有参加。黄绵龄从缅甸随军回到重庆，因罗保吾、刘问渠推荐，参加进来，共十一弟兄。创刊词由邱楠纸笔，第一稿写好后，荆荪看后提了意见，经改写方定稿。后来我们当中很多人出国，加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都分散到不同地区工作，编辑和经理的任务就由少夫和绵龄长期担任，直到大陆变色，杂志由上海迁香港，这当中我们之间也曾一度产生歧见。荆荪原为触媒剂，后来变成粘合剂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荆荪奉派为南京接收专员，并负责筹备南京《中央日报》复刊事。复刊后先任总经理，后任总编辑。一九四六年我奉马星野师电召自欧洲经美返国，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同年夏升任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与另一副总编辑朱沛人协助

荆荪执行了一条“先日报，后中央”的编辑路线，其目的纯粹是为了把报纸办好。荆荪、沛人和我三人有一共识即“报纸以新闻为第一”，处理新闻尺度宜宽，但一定要求实，不故意刊登也不故意回避不利于政府之消息。

就政治思想说，沛人和我都倾向自由化，荆荪对国民党则是耿耿忠心。荆荪把自己的一切成就，都跟国民党联系起来，认为是国民党给的；十年间由地方小报的校对员而首都第一流大报的总编辑，得志之于，自然地以国士自许，而时时以顾亭林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自勉自励，发愤要做一个为国家光明前途而奋斗的新闻战士。

在具体行动上，他在南京接收汪伪《中央日报》、《中报》及日本总领事馆，主持《中央日报》复刊初期的业务，成绩斐然，奠定了《中央日报》空前蓬勃发展的基础。

一九四七年秋南京学潮兴起，学生扬言捣毁《中央日报》，荆荪号召工人严阵以待，并站在最前端护报。一九四八年多，《中央日报》迁往台湾，由他全盘掌握指挥，有条不紊，博得报社上下一致推崇。

总之，李荆荪之效忠国民党，有事实为证。至于他不反对报纸揭露贪污现象，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

到一九七０年十一月十七日荆荪在台因“匪谍”冤案被捕后，官方竟将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报》揭露孔祥熙的杨子公司和宋子文的孚中公司贪污国家外汇三亿多美金案，算作荆荪的罪状之一。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对荆荪提起公诉，在起诉书中关于犯罪事实部分，指控荆荪“任职南京《中央日报》期间，指使该报记者陆铿揭发『杨子公司』业务机密，致京沪轰动，以策应匪党攻击『官僚资本』之阴谋。”

荆荪答辩明确表示：“事件是由陆铿自己采访得来，并非出于我的主使，更无任何阴谋，我今悔当日政治觉悟不足。”“当时还有一种天真想法，由于《中央日报》发表了这条新闻，还希望大家对国民党刮目相看，认国民党有朝气，诚能如此，就是为国民党收揽人心了。”

接着，他叙述了他对我的看法：“陆铿是非常活跃的记者。他在《中央日报》期间，采访新闻都出于自动自发，可没有一条是根据我的指派。他有发掘新闻的癖好，用不着我督促，如果一连几天得不到独家新闻，他会生病。”

而在我的记忆中，荆荪最初对发这条新闻还是有所犹豫的，他主要考虑会不会有负面影响，而我除了说出正面的道理，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他说，如果你不发这条新闻，我们就打架。最后是沛人提出折中方案，不再头版刊出，而在四版刊出，他勉强同意，说明他一直是站在国民党立场考虑问题的。

荆荪被控为“匪谍”的另外“犯罪事实”就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回给当年福州《南方日报》同事俞棘地一封信中，表示“对不流血革命还不死心，报纸是方式之一。”荆荪后来在自辩中说明，原来在福建同事时，俞是编辑，他是事务员，职务上有清俗高下之分，而事隔不到十年，俞来信有“吾兄绝尘而驰”之句。正如荆荪说的“人，谁不爱谀词呢？这顶高帽子一送，我喜欢他了。于是我与他鱼雁往还。”为了表示自己是有理想的爱国之士，因而抒发了对“不流血革命”的向往。

但荆荪怎么会想到俞棘一直把这封信保留下来，最后端出，作为自己案发后立功脱罪的工具呢？俞诬控李荆荪于民国廿七年间在福州参加匪党组织。甚至在最后“公开审判”时，当庭作证李荆荪确已参加共产党，荆荪在气极的情况下，当场拍着自己的胸口说：“俞先生，良心！”

在那种布妥的圈套中，良心还起什么作用？！

而李荆荪之所以十七日被捕，十九日就自白承认自己共产党，主要是受不了"疲劳审讯"，且被命令于冬季躺在大冰块上。用他刑满释放后向我们好朋友当中的一个透露：当时整个的骨头都酥掉了，叫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那种罪不是人受得了的。

荆荪逝后五年，我问他夫人佩倩，他当时被刑讯逼供的情况是不是跟你谈过？佩倩说，他只讲了疲劳审讯的恐怖，别的未提，可能怕我受不了。荆荪就是这么善良，这样一副菩萨心肠。

荆荪的善良，不仅是对妻子、对朋友，甚至对向他逼供的人也不例外，他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也就是被捕后一年又八个月，经过所谓"公开审判"以后等待判决时写的答辩状，附给辩护律师施莲洁女士的信中特别提到："状中有许多'办案人员'，我希望一个都没有，因为，不论他们对我误解到什么程度（特别是我的根本、我的庐山真面目，一个真真实实的李荆荪），但对他们没有丝毫敌意，因为他们是执行公务，办政治案件本来不易。我希望不要伤害他们，只要能辨明我自己为无罪，尽可能避免在辩状中提到他们。"

看！李荆荪就是这样的人，自己已快被老虎吞食了，还要保护老虎。

从他的答辩中，可以看出：一、精神上受到极大威胁。他一被抓紧警总，办案人员就告诉他，"请你来，不简单；你要离开这里，也不简单。"又说："事情总得有个解决。""法律是保护政权的。""你那时还年轻，还只十八岁。"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卅多个小时的连续疲劳审讯，他为了有个解决，为了不再受罪，为了早点回家，只有承认自己为共产党。于是作了伪供。根据"十八岁"的提示，就推算出民国廿三年加入共产党。后按办案人员意见改为民国廿四年。二、几天之后，发现错了，曾数度翻供，但是，办案人员置若罔闻；相反地定下大纲来，叫他写"自白书"。而且通过办案人员的威胁和警告，他再度产生一个错觉，只有"忠诚"、"合作"，循着承认是共产党这条路摸索着走下去，才能走出监房。因而逼得继续编造下去，而且，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力求编造得合情合理，结果是愈陷愈深。

最荒唐的是，荆荪依照办案人员的提纲，要交代出他在重庆和南京的"上级"，而荆荪在重庆时生活的圈子很小，见过面而确知其为共产党的只有《新华日报》的潘梓年和石西民。此外，明知为左倾分子的，他只知道一个浦熙修，那是在中宣部记者会上认识的，在被迫交代"上级"时，因为根本不存在，只好写出浦熙修的名字。

但是，浦熙修本人并非共产党，她是民主同盟的盟员，人称浦二姐，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为姊妹。任《新民报》采访主任时，非常活跃。五十年代改任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主任，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的女友。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亲笔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点了浦熙修的名。

至于浦熙修与李荆荪，不但谈不到上下级的关系，正如荆荪在自辩中说的："我认识她，她不一定认识我。"而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荆荪的判决书中，竟把一个并非共产党的浦熙修认定为荆荪的共产党上级。唯恐不能取信于公众，还特别把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60）安字第 409399 号、（60）聿达字第 4886 号函及前内政部调查局三十九年六月所编之《共匪重要人物调查资料》影印本附卷佐证。除了说明国民党特务之低能，把明明不是共产党的人，硬说成是共产党，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试想，毛泽东在点名批评浦熙修时，难道对浦熙修的身份（民盟"能干的女将"）还没有国民党特务清楚？

我在一九八 0 年在台北会见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昇上将时，曾提出李荆荪冤案的问题，王表示，决不是冤案，因为证据确凿。反问我指为冤案，有何根据？我答："且不说别的，至少涉及我本人部分，我是清楚的。在南京揭发孔宋贪污国家外汇三亿多美元，明明是

我主动的，倒要诬指荆荪是匪谍时，却把这笔帐算在他身上。另外，浦熙修不是共产党员，在大陆是众所周知的。”

王昇将军当时以客人之礼待我，说下次有机会可以让我去看看档案。到我一九八一年再到台北，旧话重提，王将军说：“这样做，对你不利。”我说：“我不在乎。”他说：“对我们政府也不利。”面对这种情况，我能说什么呢？

但是，由于我在重庆和南京做记者时，建立了浓厚的人脉，与台湾一别三十多年，惟交情仍在。比如与张岳军先生见面时，两人都情不自禁热烈拥抱；与黄少谷先生忆往时双方都忍不住要落泪；与周至柔将军晤谈时，更不胜沧桑之感。至于同辈的就更多了。因此很快地摸清了荆荪案形成经过。

一九七0年正值台湾酝酿内阁改组，周至柔将军以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参谋总长、当时负责国家安全会议之身，可能受命组阁。蒋经国先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再跨半步，就是阁揆。经国周围的人自希望经过能脱颖而出，组阁一展抱负；而一班特务，更盼借此扩大情治权势，乃将周至柔视为“拦路虎”，必欲打击而甘心。特别像沈之岳这样的特务头子，更别有用心地为经国扫清道路。(国民党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才从曾在北京出任国防部长之张爱萍挽沈之岳：“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俱无伤。”联中发现沈原来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而在周至柔身边的两位“智囊”，丁中江不但有国民党革命元老的家世，丁石僧老伯曾任同盟会东京支部部长，而且他本人一直是反共的，可以说“无懈可击”。(后来沈之岳还是借所谓关说案把他打击了一下。）李荆荪虽然曾任南京和台北《中央日报》总编辑，但因三十年代与俞棘在福建曾有一段历史渊源，而俞棘已由情治单位掌控，从俞棘下手，必可罗织李荆荪入狱，果然，就在俞棘诬攀李荆荪以后，李荆荪在俞棘的证供当头而长达三十多小时的疲劳审讯已造成精神崩溃的情况下，终于在一张纸上写下自白书，承认加入过共产党。就在这时，周至柔、黄少谷等向经国求情，说明荆荪之无辜，但回答是，他本人已经承认了。

就这样，李荆荪的冤案铸成；周至柔的组阁当然也随风而逝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荆荪开罪当道，起于他在台北《大华晚报》上的《星期杂感》。由于《大华晚报》是他带头创办，并出任董事长，为了在报纸上略尽言责，故自一九五七年八月至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七日荆荪失去自由为止，每周发表杂感一篇，主要是讲老实话。正如法学教授曾任大法官的林纪东所评价的：“立意清新，含义深远。”但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老实话常常是政府的禁忌，对当权者有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为快。

比如，他反对修改出版法，在《星期杂感》里指出：“此次修改出版法，有一危机倾向，即不以法制，而以人治。”“此次之修正案不但在保障与限制之观点为向后转，即就法制与人治之观点而言，也是开倒车的。”警告说：“撤销登记时斩决，加重罚锾是抽血，抽血过于频繁，亦能以失血过多致死。”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荆荪的起诉书有如下一段：“（民国）四十六之五十九年间，在《大华晚报》撰写《星期杂志》专栏，经常抨击政府措施不当，行政效率太低，制度欠善，以新闻自由为借口。挑拨政府与民众之关系，以及鼓励民营报业反对修正‘出版法’，打击政府威信，以达共产匪党新闻统战及分化离间阴谋。”(按：李荆荪著《星期杂感》已列入时报书系出版。）

原来是一桩“文字狱”！继后，因为他们已拿到俞棘的伪证和骗倒荆荪的伪自白书，足够致荆荪死命。在判决时乐得放《星期杂感》一马，因而“判决书”中指出：“难遽认其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借免遭到制造“文字狱”的批评。

除了《星期杂感》在报纸上触怒当局之外，在生活小事上，无意得罪了蒋经国，也是荆苏致祸之由。有一次，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宴请各报总编辑，荆苏因事忙，及至想起邀宴之事，乃匆匆赶去赴宴，服装比较随便，又未带请帖，结果被警卫阻于门外，虽经解释，仍无法进入，只好折返。事后向同业转告，当时经国曾留位以待，及至终席未见荆苏，面有不豫之色。对荆苏来说，可谓稀里糊涂地得罪了当朝天子。

又有一次荆苏随周至柔将军在总统府国家建设委员会上班，入厕小便，与经国不期而遇，当时愣住，还未来得及打招呼，经国已离去。事后荆苏产生一个感觉：又得罪太子了？

从一般的解释，蒋经国不可能如此小气。但，研究蒋经国多年，写成《蒋经国传》的江南对蒋经国性格的描写，可以说刻划入微："激动起来，涕泪滂沱；冷酷之时，大动杀机。"

世界上的事，有很大的偶然性。人们必然与偶然的交错中，往往被命运所作弄。

而李荆苏就是被作弄得最凄惨的一个。

国民党当局由于李荆苏案受到国际舆论重视，为了表示尊重人权，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在台北举行所谓"公开审判"。事先并对李荆苏发出警告，如果他合作，只处两三年徒刑；如不合作，后果自负。

审判时，荆苏看到自己的妻子和新闻同业，感到自己的责任，应当说明真相，当场推翻了编造的供词，陈述冤情，并愤怒地拍着胸脯谴责了俞棘。军阀审判方面，恼羞成怒，加重判处，以惩罚其不合作之态度，宣判无期徒刑。直到蒋老先生逝世才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让其在绿岛度过那漫漫长夜。而俞棘因诬陷李荆苏有功，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一九八一年，《新闻天地》的卜少夫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写了一封信，经成舍我、程沧波、胡健中、胡秋原新闻界四立委联署，请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专程蒋经国，准荆苏"保外就医"，结果马纪壮不敢转呈，覆信婉拒。

一九八三年三月少夫又为荆苏写信给国防部长宋长志，请求"提前开释"。答覆是"（李某）健康状况良好，生活平静。"而且"可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开释。"也就是一定要关足十五年。不过，到同月卅一日，将荆苏自绿岛移运到台北县土城乡的"台湾省仁爱教育实验所"（多么美妙的名字！）"实施补强感训"。就这样又被"补强"了两年又七个半月，直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晨八时出狱。

由于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出狱后两年多，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荆苏以心肌梗塞猝逝，含冤而死。

在此，只能以另一位姓李的、李煜的一句词来略表哀悼之忱："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我和荆苏，自一九四八年应成舍我先生之约，原拟与朱沛人兄三人一起帮助成先生在南京复刊《民生报》，并积极筹备。不料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中共成为淮海战役）中兵败如山倒，《民生报》复刊之议亦作罢。我转赴香港，荆苏则筹划南京《中央日报》迁台湾。一九四九年我决定在东京办报，过台时与荆苏匆匆一面，询其意向，荆苏表示，决与中华民国共存亡，且已作最坏打算，如果共产党打来，进占台湾，他就效学陆秀夫蹈海。其显示之丈夫气概与忠肝义胆，使我从内心深处敬佩。

不料，一九四九年底我即自投罗网，自东京飞昆明下狱，与荆苏音讯断绝。及七六年底获释，七八年赴港，则惊闻荆苏已遭冤案横逆，囚于火烧岛上。似乎我们兄弟非有一个坐牢不可！

一九七九年十月应当时《明报月刊》主编胡菊人之邀在"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发表长

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即用陈荆苏为笔名，荆、棘一对，盖纪念荆苏兄弟情也。加之吾母姓陈，故名。忆及五 0 年初，董显光先生任命我为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任命书交朱抚松兄转交却遍寻我不着，其时，我已囚于中共狱中。事隔三十年，我重履台湾，不少旧交皆曰：当年若不到大陆坐牢，而出任中广副总，早已飞黄腾达矣。“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答友人曰：以荆荪为人之纯正，对国民党之忠心，尚遭大冤狱；以我之桀骜，发言之无度，加之四十年代即被视为叛逆，旧案在卷，白色恐怖肆虐时，不枪毙才怪。人之生死祸福，岂能判定。最感遗憾者，荆荪在八五年获释回家后，我竟因在台湾黑名单上不得入台，宫廷出身之曹圣芬在国民党中常会中公开指陆铿为“匪谍”，可谓国民党极右份子无知之最好写照。

回顾荆荪之冤案，因长期折磨而导致心脏病猝发逝世，确有五内皆裂之痛。这不只是一个正直而善良的新闻工作者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化民族的耻辱。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手段为什么如此残忍？白色恐怖，赤色恐怖，还有什么色恐怖？究竟要恐怖到那年那月，才能使恐怖在神州大地和宝岛彻底绝迹？！

谈起海外民运我伤心

●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告我们这末世之人。*

——《圣经》多林哥前书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接着是“六四”屠杀，不仅狠狠地嵌进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也震动了世界。

凑巧，苏联的戈巴契夫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举行高峰会，为世界传媒所关注，包括ＣＮＮ在内的国际传媒，派了不少人到北京，原来是要访问中苏两巨头会晤新闻的，赶上了天安门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调转镜头一起对准天安门，就把“六四”事件活脱脱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全世界焦点聚集天安门

谁也没有料到，天安门突然变成了国际瞩目的焦点，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众口同声地说，不管什么理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总是不对的。这其中包括了人民解放军张爱萍、萧克、叶飞等七上将。

连当年批准开枪的邓小平在他去会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前，也由他的么女儿（四川话念）毛毛、邓榕向全世界表示：“这是一个悲剧。”或问，此次事件中，最大的输家是谁？毫无疑问是——邓小平。

一九八九年四月，应王元化先生之邀，在上海参加一个大型座谈会谈时局，我当时“放言高论”说是邓小平如果在这时（即一九八九年春）死去，不管对中国、对他自己都是件好事。因为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主要是邓小平本人下不了决心。他原来是改革的动力，继后变成了改革的阻力。我在发言结束时引用了：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设使当年身便死，是非真伪有谁知。

这一段话，既对邓大人是大不敬，也使在座的不少人为之吃惊，幸而王元化先生的声望还顶得住，而参加座谈的像徐仲玉、唐振楚诸位教授水平也是很高的，所以并未引起波澜。

当时在场参加座谈讨论的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陈奎德老弟事后在普林斯顿告诉我说：

陆大哥，你在上海那次发言，真把人吓一跳。但“六四”事件以后，印证了你说的话。如果邓小平在“六四”前死掉，整个中国的局面就可以避免一场大悲剧的发生。对邓本人的令名也可以保持无损。

我告诉奎德，这是中国人的劫数，在劫难逃。

摆下回忆录，看黄雀行动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写回忆录，“六四”一声枪响，整个形势大变，如再埋头写回忆录，未免不识时务。只有摆下，面对现实。跟着“六四”来的，结果自然是全世界华人对北京的声讨。

紧接着，香港的“黄雀行动”，也就由部分知识份子、商人和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以北京通缉的二十一名学运领袖为主要对象的营救工作展开了。在香港与北京间建立了一条地下通道，而第一批循着这条地下通道出走到香港的就是严家其、高皋一对。

“黄雀行动”的组织者之一是在香港影剧界非常活跃的岑建勋，他和一些因“六四”而激发正义感的工商界人士，在香港一百五十万人大游行以后，针对大陆通缉民运领袖采取针锋相对的营救行动，联络香港、澳门、珠海、深圳的黑社会，由工商界出钱、黑社会出力，就这样，把人一个个营救出来。

人们知道，“黑道中人惯于冒险犯难”，而且经验丰富，他们长于利用渔船和小艇偷渡，知道如何与中共巡逻艇和港英政府的水警轮周旋。由于他们干的是提着脑袋的事情，收取酬劳，未可厚非。首先租用船舶就所费不赀。而且，有时道上的兄弟在救援过程中“出了事儿”，若当场被捕或受伤挂彩，还要花一笔钱安置家属。在营救特别重要人物时还需要同时派出多艘船只以转移视线，收声东击西之效。

至于营救费用的募集也是多渠道的，很多人只知出钱，不知钱的去向。我本人就有过一次实际经验。当苏晓康和远志明两位《河殇》作者出来，我的一个学生是女记者，希望我帮忙筹点钱，于是向一位商界朋友请助，他马上开出一张两万美金支票，由我交给这位女记者，没有几天，苏、远就脱离了，在民阵成立的巴黎大会上与我相会。

珠海特区一间贸易公司总经理怀德基于良知和义愤，还在黄雀行动之先，最早营救出吾尔开希和刘燕。《世界日报》名记者曾慧燕在《百姓》撰文，详细记述了全过程，比惊险的电影故事还惊险。遗憾的是，怀德积极救人，自己却付出惨重代价，公司全军覆没，并连累四个下属，包括他的外甥被中共判刑，身系囹圄。他和另外两人被迫流亡海外，连生活都成问题。

慧燕在文中点出：他付出巨大代价救出来的人，有段时间令他“恨铁不成钢”。一看就知，这话是说得很含蓄的。而另外一位女记者薛晓光则在《联合报》和《世界日报》上却毫不客气地列举事例，批评了吾尔开希在海外令人失望的表现。

听吾尔开希谈当上领袖

吾尔开希怎么当上学运领袖的，在巴黎，我曾坦率地问过他，他说，很简单，天安门学运初起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贴了一张通告，订在某一天在学校某一个教师召开全校各系代表会议，到时候，代表们来了，他宣布响应学生爱国运动以及准备采取的行动，建议大家选出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结果自然非他莫属了。

然后，采用同样的方式，通知北京各高院校派代表在某日某地集会，说明首都高等院校

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并选出北京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主席，因为他是发起者，当然也就顺利当选了。

吾尔开希在天安门站出来，说明了在一个浪潮形成的过程中，谁能触机先，挺身冒险，领导潮流，谁就会在一定的时间，得到一定的拥护。但要真正能掌握形势，引导运动健康发展，光靠大胆是不够的，还得依靠领袖者的素质、识见、智慧与大公无私之心。

事过境迁，曾经参与民运的人回过头来，看看“六四”事件之所以弄得结局如此令人失望，除了邓小平的独断专行，迷信武力，误信汇报，决策错误和李鹏的私心自用，智商低下，能力太差，举据失当之外，在学生和学者这一边也明显的有一定的责任：

第一，缺乏真知灼见，不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应当见好就收，而一味冲动、蛮干，坐失良机。

第二，发动绝食，造成极大被动，迫使当局采取流血措施。

第三，严家其、包遵信等发出五一七宣言，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不但在战略上是错误，在战术上也是失误，造成了邓小平强大反击。

以上三点，集中反映了共产文化对新一代的影响。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大会

我支持海外民运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廿八至三十日赴芝加哥参加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到会的学校代表近二百个，每校两名正式代表，人数特多学校还可有几名列席代表，总数达六百人，真是盛况空前。不能不佩服作为主人的芝加哥大学、伊利诺大学及西北大学的筹备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负责会务组的王晾博士竟因日夜劳累，致使一只耳朵完全失聪；医生给他最重要的药房是休息，而他仍然开车到机场接戈扬、严家其、万润南、苏绍智、吾尔开希、李禄和我等等。

王晾以行动说明了民主就是一种服务，一种奉献。

“中国人一盘散沙”，差不多成了宿命论；“中国人不团结”，“中国人窝里斗”，也几乎被认定为中国民族的劣根性。芝加哥大会则从与以上论断相反的方向，做出了一个团结、和谐、民主的范例。这个会议的过程就是学习民主、实践民主、落实民主、团结前进的过程。当然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与自我牺牲，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委员、来自俄亥俄的杜刚跟我说：“想不到搞民主这么累。我们很多人几乎没有时间吃饭、睡觉。我看大会闭幕以后，恐怕要开追悼会了。”

我和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聊天，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芝加哥大会使他们深刻地体验了一次生动而富教育意义的民主生活。我问年轻人学到最精彩的课程是什么？回答是“Compromise”（妥协）。

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了组织宪章，把这个新生的组织定名为“全美中国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联”。它是留美中国学生学者团体的协调性组织，它规定“全美学联代表留美中国学生学者的意愿，维护留美学生学者的利益，促进中国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的进步。”

联合会主席竞选产生使大会达到了一个高潮。

共和国星群，展中国前景

洛杉矶加大的丁健与威斯康星陈兴宇联手，史丹佛的刘永川与耶鲁的韩联潮搭档出来竞争联合会的主席与副主席。大会在各校代表强烈的要求下，除安排他们四人演讲、回答提问

外，还加了一个两对候选人辩论的节目。这一下吧会场的气氛提高了许多。

四人首先介绍了各自的简历。其中，刘、丁、韩都曾是中共党员，于“六四”后退党。四人经历不同，但都是历次学运积极分子。他们在回答问题和辩论中语言严谨，才思敏捷，博得全场阵阵叫好声。他们逐一阐述了各自对主席、副主席工作的设想、打算；对宪章的理解；对与其他组织关系的看法等。而且，回答了自认的缺点是什么？

我从选举和选举人的热烈、负责、认真的情绪中，看到了民主中国的未来。我想这些人将来学成回到中国大陆去，该发挥多大的作用，促进多大的变革。正如洛杉矶的一位学者汤本侧写此次大会所用的标题：共和国的星群。

芝加哥大会不只是反映了十几万中国留美学生、学者的民主风度，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有决心铲除独裁制度，要在这一代留学生手上改变延续几千年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中国传统政治格局，建立崭新的完整的民主机制。

午夜两点多钟当我回到住宿地时确实感到累了。洗脸时发现两只手掌怎么肿了？原来是鼓掌次数太多，而且太用力所致，当时因为太投入，没有感觉；让热水泡一泡罢！这是多么美妙的经验。

民阵庆诞生，巴黎成重心

“六四”使全世界有良知的中国人在学运、民运和国运上有了共识。

无巧不成书。一九八九，既是中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又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法国有第五共和，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共和？人民这样问。

为了第三共和国这个目标，中国民主斗士会师巴黎，决定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二日，在巴黎第一大学、举世闻名的黎希留（Richelieu）阶梯教室举行。

这里面主要是“六四”以后从天安门广场出来的学生领袖如吾尔开希、李禄、辛若、老木、老鬼等，和学者严家其、苏绍智、陈一咨等以及北京新兴的企业家、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再就是因“六四”的刺激投身民运的大陆留学生及部分社会人士。

没有想到，当我和崔蓉芝抵达巴黎时，被唐德刚和我称为“康大总统”的康宁祥也出现在会场上，海外遇故人，欢欣可想见。

中共在欧洲的机关报《欧洲时报》，九月廿三日发表了以“严家其们分裂中国的企图绝不会得逞”为题的社论，反应了对“民阵”在巴黎成立是相当紧张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政府的态度。“六四”以后，最初表现矜持，但很快就转变为西方政府中态度最强的一个。打开大门，给予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斗士以庇护。

据旅法著名中国作家刘志侠报导，法国政府甚至因“六四”刺激而对香港人表示关心，不排除一九九七年后收留香港人的可能性。

从欧洲各国来说，也是第一次有那么多国家的政党对中国人在海外成立的民主组织给予广泛的支持。除法国执政党社会党派出席外，欧洲议会代表，英国工党、荷兰工党、西德基民党、西德社会党、西德绿党、西班牙社会党、法国共和党、绿党、共和联盟、民主社会中间党和波兰团结工会联盟都派代表出席，一下子使“民阵”提升到具有国际水平，至少在国际传播舆论上可以与中共抗衡，在心理上直接威胁中共的层次。而波兰团结工会代表团参加“民阵”成立大会，更具有重大意义，难怪会场上获得最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家其任主席，众口同一声

“民阵”正式会议是在巴黎郊外一间四星级旅馆举行，全部费用约二十万美元，主要是各地的捐款；而支出大宗是各地代表的旅费。像我们这些支持者，还是自费前往。说明民主是很花钱的事。

谁出任“民阵”首届主席，严家其在当时可以说众望所归。但他自我衡量，有兴趣研究政治科学，对政治并无大的兴趣。他之参加“民阵”，从某一角度看，是被形势“逼上梁山”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太太高皋坚决反对。

到了选主席前夕，万润南表示，如家其不干，他也不干了。这时不少朋友来找我，请我去说服家其，一来，我年纪较大，二来，我不是民运成员而只是支持者，比较客观。我心目中也认为就现有的人才看，家其比较恰当，于是我看先找高皋沟通，提出顾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如果家其拒绝，民阵第一步就可能跨不出去。高皋最后松口说：“那我不管了，由家其决定。”家其得悉高皋的态度软化，便答应和吾尔开希搭班，作为正副主席候选人。二十四日在一场颇为轻松的选战中，以九十六票对四十票击败许思可和杨建利搭班的这对对手，顺利当选。随即开理事会，提名任命万润南为秘书长。

民阵开展工作以后，才发现困难很多。尤其财政困难日渐突出，而很多人期待的中国局势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发生。由于邓小平坚持继续经济改革，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日渐好转，加之民运本身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个别领导人的品质问题还被舆论点名批评。这样，原来热腾腾的一股气，很快就消散了。历史真是无情。

与民阵并肩作战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因为内部纠纷和财务危机，甚至传出有可能解散的消息，造成了海外民运勃兴不到两年就走入谷底。

这时，“民阵”第二届大会于一九九0年九月在旧金山举行，改选万润南与许思可分任正副主席，也只是一个拖局。

这中间，还穿插了海外民运喉舌《新闻自由导报》的风风雨雨。

比较争气而且实际上做了一些事的还要数一九九0年二月在美国成立的美国香港华人联会，简称“美港联”，标志乃美国的香港华人民运力量的团结。其目标定为长期争取中国及香港的民主和人权。也许因为香港人向来对政治兴趣不大，所以在“美港联”内部没有发生争权夺位的问题，反正人人都是服务与奉献，所以还保持了一定的生命力。

陷入共党文化迷魂阵中

一九九三年一月廿八日到卅十一日的华盛顿会议，本来是民运重新整合再出发的会，按原来多数人的期望，“民阵”和“民联”合并，为推动中国民主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因此，最初为各方所看好，包括我在内也兴冲冲地赶去。

两个组织各选代表七十五名，预计一百五十名代表赴会。此外邀请了四十名贵宾，包括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郭罗基、刘青、柴玲、陆铿等。

一月九日我在旧金山“世界公共论坛”会议上遇到方励之，问他参不参加华盛顿会，他说，到时候去“站角助威”，并解释这是北京天桥耍把戏的用语，意思是“帮场子”。顺便提一下，方励之从美国大使馆走出，在邓小平同意下，由美国军用机运离北京，先到英国再转美国。海外民运人士曾有意请他出面领导，为他辞谢，表示只想当一个异议人士。

方励之三十日姗姗来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近百年来，“民主”一词被政治集团使用最多，但对中国是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两个问题，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运以民主为诉求，至少应该论证民主为今日中国所必须，在中国可以实现。

本来，这个会的有关方面事先经过交换意见，同意支持王若望出任合并后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席。但因朱嘉明的策划，要徐邦泰出来任主席，就打乱了原来协商达成的默契。

开会方始，朱跑来坐在我身边，他说：“关于究竟选不选王老师，我很困惑，想向你请教。”还说：自从你批评邦泰没有大开大阖的气度以后，他这次决定要大开大阖了。朱嘉明不愧吴用式的“智多星”，他用我的话来为自己策划的翻案文章作根据。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从大局看，两个组织各并，需要一位新人领导，而这位先生又要有一定份量，王若望刚从上海出来，自为较恰当人选。而且在旧金山，各方面交换意见时，都认为恰当。现在，只有与朱嘉明的个人考量，居然要改弦更张，必然会闹出问题。所以我严肃地告诉邦泰：“你们把王若望抬上去了，现在又要把他拉下来，果如此，你会变为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之说，当然有些夸大，但我已充分估计到，如果把原来商量好的方案摒弃，一定会造成，本来是大团结，到头来将变成大分裂。

事情果然如此，华盛顿会议，民阵、民联的合并不仅未能实现，原来的两个组织，竟变成了三个组织，一个字旧金山，一个在洛杉矶，还有一个在巴黎，较之会议前是更进一步的分裂。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海外民运已经迷失方向，主持者不是奉献自己为民运服务，而是要民运为自己服务，深深陷入共产文化的迷魂阵中。

当然，这里面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由于共产文化在中国大陆支配了四十多年，整个大陆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毛泽东思想笼罩下的一代人，其思想基础是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特别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往往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来掩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实际。

海外民运离开了本土，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初期还可以热闹一阵，到低潮时，由于资源就是那么一点点，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做领导，抢夺资源，甚至花招都使了出来，把中国民族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再加上几个野心家诡计多端，不择手段，人们除了叹息，还是叹息。

这样，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从事民运本来是一种奉献，结果，有的人却是靠民运吃饭，甚至借民运敛财，这不是开玩笑吗？

不过对海外民运失望，并不等于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失望。我们这个民族，经过历史的锤炼，她是会浴火重生的！而且一定会走上民主大道的。

和星云大师结缘

● *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星云*

佛光山文化是台湾的奇迹之一，星云这位大和尚是佛光山的开山宗长。他的愿望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截至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入住南港写《回忆与忏悔录》止，佛光山所属的道场，除位于台湾高雄的佛光山寺之外，在台、澎已有道场四十八所；分布在亚、美、欧、非和大洋洲的道场已有六十二所并在继续扩充中。佛光山所属事业单位，包括文化、教育、出版、慈善和社会福利等也数达三十。

在佛光山文化的普照下，成立的国际佛光会已遍及全世界，佛光会会员也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重庆识太虚，洛城拜星云

抗日战争期间，四十年代初我有幸在重庆北碚认识了太虚大师，知道他提倡人生佛教。后来，得悉印顺长老倡导人间佛教。佛教展现了新天地。但真正把这一理想在中华的土地上付诸实践的是星云大师，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宗旨是“以空为乐，以无为有，以众为我，以退为进；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山道场自一九六七年创建，三十年来，使现代化的佛教文化不仅在台湾崛起，而且推向世界，特别是推向以基督教立国的西方，这是一件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事。吾友唐德刚教授称星云为中国佛教的马丁路德，我认为星云较路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路德只是改革，星云则系开创。

我本人是个基督徒，虽然是个不好的基督徒，但仍然是基督徒，在某些基督徒的眼里，佛教是异教，甚至是撒旦、魔鬼，由于反对拜佛教，连庙宇都拒绝进入。但星云的“尊重与包容”却感动了我，我毫不忌避成为“佛光之友”。

我从小跟祖母生活长大，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经常念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金刚经。因此“观自在菩萨”很早就进入了我的心灵。六十岁时在香港浸信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但佛教和基督教在我思想中却能和平共处。

一九八七年秋，应邀子纽约到洛杉矶参加一有关海峡两岸关系的演讲会。二弟陆锵告诉我，台湾高僧星云和尚，正在找我，他是通过一个在德国留学时结识的建筑工业家陈抗生得知的。希望请我到西来寺吃一次素斋，见面谈谈。

谈政治和尚，见面无忌避

我因记者职业的关系，听过星云的名字，知道他在台湾具有较高声望，且是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被某些人视为“政治和尚”。

我这个人做人的风格就是坦率，和星云第一次见面就提出“政治和尚”的问题，星云不但不以为忤，反而简述佛教大乘与小乘的区别。耐心地解释了人间佛教与过去闭关清修佛教之不同，具有改善社会、净化人心的使命。对于政治，他说：“你固然不必去找它，它却常常会找你。”因此也应有所了解，虽然不必实际参与政治活动。至于他被聘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我体会，当国民党对台湾施行威权统治，整个社会弥漫白色恐怖之时，星云接受国民党的一个“头衔”，未始不是一种自保，因为他初到台湾时曾有被情治机关怀疑来路不明、逮捕审查的经历。何况他力行的人间佛教，又要做入世的事业。

至于他怎么会注意到我，据他说，主要是看了几篇我写的文章，比如发表在司马文武主编的《八十年代》上的〈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不容易听到的声音。特别是看了〈胡耀邦访问记〉，知道我是一个具独立立场的记者，对台海两岸都持善意批评的态度，所以希望和我谈谈。他表示他是中国人，关心中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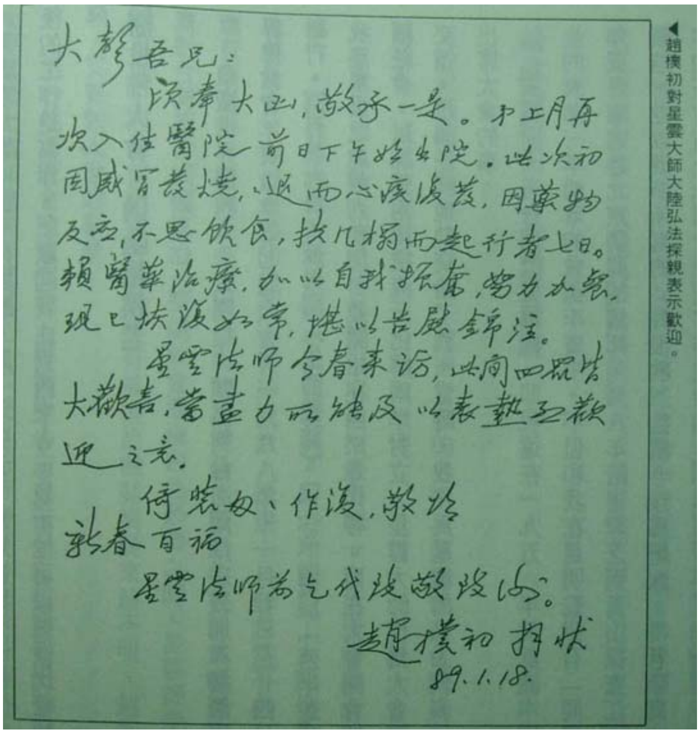
星云大师和我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他知道我担任发行人的《华语快报》已在纽约停刊，今后的工作是写作，便欢迎我住到西来寺，表示他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写作环境。

办世佛大会，通函赵朴老

象征世界佛教人士大团结、关系到台海两岸宗教加深接触交流的世界佛教徒第十六届大会和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第七届大会，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日至廿四日在美国洛杉矶哈仙达

岗西来寺正式举行。同月廿六日，被美国《生活杂志》（Life）称为“西半球第一大寺的西来寺”举行落成典礼。我应星云之邀感到参加，并开始在西来寺作客。而在大会开会期间，因为争取中国大陆的佛教代表团赴会，以加强两岸交流，化解两岸对立，星云大师作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必须与中共方面打交道，这个任务他就交给了我。当时，我作为星云的私人代表，负责交涉迎接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席大会的事。

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渊源，即我还在一九五六年就认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朴初先生的表弟、李鸿章的曾孙李广平，不但和我在昆明监狱有“同窗”之雅，且结为至交。我一九八五年五月应邀赴北京访问胡耀邦，八八年陪崔蓉芝到黄山探查江南墓地，事后到北京，曾两度拜侯赵朴老，并以广平所写的《长恨歌》送朴老作为纪念。朴老除写一幅字回赠给我，并以印有淡绿色文字的石竹笺上“富贵”两字作成对联，交我转赠星云，上联为：“富有恒沙界”，下联是：“贵为天人师”。对星云大师极为推崇，为星云一九八九年的大陆弘法探亲行，打下了友谊基础。当时星云曾和我谈到大陆弘法探亲之事，我乃致函赵朴老探寻有无可能，朴老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覆我一函，对星云大师弘法探亲，作了如下回应：


大声吾兄：
顷奉大函，敬承一是。朴上月再次入住医院，前日下午始出院。此次初因感冒发烧，继而心疾复发，因药物反应，不思饮食，扶几榻而起行者七日。赖医药治疗，加以自我振奋，努力加餐，现已恢复如常，堪以告慰锦注。
星云法师今春来访，此间四众皆大欢喜，当尽力所能及以表热烈欢迎之意。
匆此奉复，敬颂
新春百福
星云法师前乞代致敬候。
赵朴初 拜状
89.1.18.

◀趙樸初對星雲大師大陸弘法探親表示歡迎。

星云大师今春来访，此间四众皆大欢喜。当尽力所能及，以表热烈欢迎之意。

至于“世佛联”大会的举行，星云大师以筹委会主任委员的身份，把主旨定为“发扬佛慧，为和平而团结”，当然也有促成两岸佛教界团结弘法的意愿。他知道第十四届世佛会在斯里兰卡举行，去自台湾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代表田刘世纶女士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中国大陆的佛教代表团为了抗议“两个中国”，宣布退席。十五届佛教会在尼泊尔举行，中国大陆捐出四十万美元给大会筹委会，不但加入了主席团，而且还驱逐了台湾代表。

星云一直煞费苦心地想创造两岸两个佛教代表团共聚一堂的局面，而且预料到此中问题一定很多，他知道我是个急性子，一再告诉我要耐心；我答以，我懂得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蹴而及是不可能的。

好事必多磨，频生新闻题

大会举行期间，关于中国大陆佛教代表团与会，前后发生了五起问题：

第一，北京提出“由于中国佛教协会和台北的中国佛教会同时参加，势将出现‘两个中国’局面。”因此建议“沿用海峡两岸体育界参加奥林匹克方式，即大陆以中国佛教代表团名义，台湾以中国台北佛教代表团名义出席会议。”

星云的答覆是：“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和“中华佛教居士会”并未冠以中华民国的号（英文译名有 ROC 字样为五十年历史形成），与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同时与会，并不能构成“两个中国”。由于同具中国名号，正说明是“一个中国”。只是在“一个中国”之下，有不同的

佛教组织而已。

第二，北京提出“传闻此次『世佛会』，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亦将派人参加。此事如属实情，则中国佛教代表团殊难迁就。”

星云的答覆是：“北京听到的达赖喇嘛将派员赴会，决非事实，因筹委会并未对其发出邀请，亦未闻他将派人前来。”

第三，以明旸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成行前夕，北京方面通过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再次向星云查证台湾的佛教组织有无中华民国字样，当答以英文译名有 ROC 字样。为此，总领馆通知，中国佛教代表团只参加订于廿六日举行的西来寺落成典礼和落成典礼后的三坛大戒及水陆法会；“世佛联”大会恕不参加。而大陆六位法师因加拿大过境签证办理不及，成行亦有问题。

不料《世界日报》刊出台北驻美代表丁懋时要来洛杉矶主持西来寺落成典礼，并发表演说的消息。北京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马上在电话上对我说，他们看到了这一消息，请转告星云大师：“这样做岂不是让我们连落成典礼都不能参加吗？”

星云请我答覆马毓真，这一报导是错误的，西来寺落成典礼是由他本人主持。我问，如果对方问起丁懋时呢？星云大师说，我原来是发过邀请，只是希望他说几句祝贺的话。正当星云为中共的“敏感”而伤脑筋时，丁懋时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不来了。阿弥陀佛！

事有凑巧，中国佛教代表团加拿大过境签证得到通知可以办理。赵朴老决定让明旸法师等按原计划成行。十一月十五日我飞温哥华，代表星云大师欢迎他们的到来。十七日陪明旸等抵洛杉矶。星云在机场迎接。

第四，中国佛教代表团从北京翩然而至，触动了星云的灵感，当夜想出了一个点子，即用中国北京和中国台北解决世佛会两个中国代表团的难题。中文沿用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会的名称。而英文让我和他门下的博士、硕士徒弟，斟酌译出：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和 The Buddhist Associatinon of Taipei China.进一步在英文译名上体现一个中国。

星云基于和赵朴初同具济世情怀的慈悲和对中国统一前景的远见，经越洋电话商量达成了共识。而北京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和台北驻洛杉矶办事处长陈锡蕃也都表现了通情达理的态度。不过因为北京在“一个中国”和“两个中国”问题上特别敏感与小心，马毓真还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朱启祯作了报告。马毓真后来在电话中强调，COMMA，一定不能少。为此，我还向国际法学专家丘宏达教授往返请教。

星云模式终于使在世佛会争执多年不得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海峡两岸两个佛教团体第一次坐到了一个会场里来了！全体会众为星云模式的诞生，热烈鼓掌连续三分钟。不少代表大叫“Wonderful!”

发言责达赖，大陆做笨事

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话：好事多磨。因而出现了第五个问题。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提出了要在大会中发表谴责达赖喇嘛叛国的演讲。

星云大师当然不同意。理由是这纯粹是个佛教的会，没有理由涉及政治问题。

接着，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负责文化工作的一位姓张的领事，打电话给我，转告了马毓真总领事的意见，说中国代表团这么远跑来参加大会，连表个态的机会都没有，恐怕也说不过去吧！

我把马毓真的意见转告星云以后，经过商量，同意安排大陆代表团几分钟发言，但请他们避免谴责的词句，因为这样做，在国际上会引起不良反应。对中国并不见得是好事。

张领事当即送来一篇发言稿，内容非常简单，肯定了大会为和平而团结的精神。只是说，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西藏。

在明旸法师拿着这个稿子照念一通后，会场上没有任何回应。只是不少代表流露出讶异的神情，一位印度代表连连摇头，表示不能理解。整个会场的沉默，说明中共又做了一件笨事。明旸法师事后告诉我，弄不清楚是那个部门的主意，这样做毫无疑义，只会有损中国的形象。但他身为代表团团长，因为命令来自北京，明知形象不好，也只好照念。

星云大陆行，北京礼遇高

“世佛联”大会后，星云大师决定作北京之行。由我先到北京与赵朴老商量全部日程。

一九八九年初，大陆全国政协主席是李先念，赵朴老是副主席。而对台统战为全国政协的任务之一，他们知道星云在台湾的影响力，表示热烈欢迎，由李先念出面会见星云。我了解大陆什么事都讲规格，而且规格越高越好。于是我向赵朴老提出，希望安排由当时身在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一见星云，作一次对外不发表的私人会谈。赵朴老也欣然表示愿意尽力促成。

当我离京返美前夕，赵朴老约我一晤。他告诉我，一切安排妥当，包括杨尚昆会见星云都已讲好。只是有一件事，关系到我的，他深觉遗憾。我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因为〈胡耀邦访问记〉，我被中共中央两次点名，属于不受欢迎的人。这次还能进北京，已是意外。星云大师大陆弘法探亲行，在朴老的支持下，能有如此理想的安排，于愿已足。至于我个人如果当局不同意我随星云前来，也无所谓。

赵朴老说，你陪大师来没有问题。只是在接待规格上，如星云大师被安排与各地负责人在小范围见面时，只能由他的两三位大弟子陪见，你就不便参加。我答：这绝不是问题。不过请您向宗教事务局说明，星云此来，特别邀请两位名教授、佛学家傅伟勋、史学家唐德刚同行，最好让这两位教授也和他的大弟子得到同样礼遇。

就这样，我完成了为星云大陆弘法探亲打前站的任务。

弘法又探亲，万里结胜因

三月廿七日，星云大师率领的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主团七十二人，副团近两百人，浩浩荡荡到了北京，在中国大陆从北到南受到国宾式的接待。被大陆新闻界、文艺界、学术界、宗教界及政治圈视为台湾海峡两岸四十年来最盛大的交流。星云成为两岸阻隔四十年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一位发表演说的台湾来客。他在大陆受到的欢迎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随便怎么估计也不为过。赵朴初居士以“万里香花结胜因”来赞美星云大师的大陆行。而他和星云见面握手时说的：“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更具有历史意义。

我作为弘法探亲团发言人，除和各地的记者同业接触外，事先没有想到的还是在四川文殊院、成都的一座大庙，临时担任星云大师演讲的四川话翻译，不用扩音器面对数千听众传达了法音，“大声”总算用上了。当时人们挤在五个院子内，一部分直站在街头，听星云讲到感人处，自发地齐声高呼“南无阿弥陀佛！”一位成都的记者告诉我，他几十年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可他不知道，我还不是和他一样，也是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了。

俗话说：“好景不长。”到弘法探亲团到达上海时，就听说胡耀邦逝世了。在上海的一座大庙中上香时，我特别为胡耀邦先生上了一炷香，并为他默祷，聊表我对他的歉忱。那知道，当我们转往南京时，天安门事件在南京已有了连锁反应。我打电话到南京大学给郭罗基，他说，南京的学生决定支援北京的学生。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是那么一场

震动世界的腥风血雨。

历史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

天安门事件发生初期，我从北京回到西来寺，接待了包括戈扬大姐在内的大陆作家代表团。他们一行，好友吴祖光、王若水、邵燕祥、梁存诚等好几位朋友是早在三月就来到美国的。西来寺小住后，我陪他们到圣地牙哥参观，下榻西方寺。当时同行的朋友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事件会演变得那么糟，所以祖光、若水等都联袂北返。只有戈大姐因机票回程日期的问题，暂时留下。不料北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她的女儿以越洋电话建议她不忙归去，因而就有了西来寺百日小住的因缘。

后来，因我的关系，好几位民运人士如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等都在西来寺小住。等到许家屯也成为西来寺的客人，北京的意见就更大了。幸而赵朴老通过实际接触，对星云大师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化解了不少误会。

大师为大声，破例寿七十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二日星云大师决定为我七十岁作寿。

谨摘录洛杉矶《世界日报》和《国际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三日的报导如下：

以敢讲敢评的“陆大声”闻名的新闻老大哥陆铿，廿二日在西来寺度过了一个风云际会的七十大寿，与会的亲朋好友，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政界和新闻、艺文界人士，这场盛宴被喻为是“中美五湖四海墨客骚人大会。”

北京来的千家驹，香港来的范止安、曾慧燕，日本来的《朝日新闻》元老记者吉田实，纽约来的唐德刚、郑心元，华盛顿来的张天心，旧金山来的崔万秋夫妇、何凤山、孙芸陈汐、谢善元，台湾来的曾辉光，圣地牙哥来的黎东方，以及方从大陆返美的卢燕等洛城名人和陆铿最后一位红粉知己崔蓉芝，二百多位来宾出席。

美国国会众议院 Marthew G.Martiney，也以“美国之友”表扬状相赠，祝“陆大哥”生日快乐。

一向大胆说话，铿锵有声的陆铿，在斋宴之前的“话说陆铿”漫谈会上，足足听“训”了三个多小时，亲朋好友们恨不得将他们所知所识的陆铿奇闻奇事，统统倾囊吐诉，使得原本排为晚间六时的素斋宴，延至七时半才进餐。最别致的是由星云大师和陆铿用“洛城四大”（左大臧、陈大安、卜大中和称为齐老大的齐振一）合送的一把宝剑切开七层大蛋糕。

为陆铿打破佛光山不过寿的惯例，星云大师以主人身份表示，陆铿在西来寺“挂单”写作这三年，他们相处已成为好友，虽然，陆过去的大胆新闻言论，成为海峡两岸皆不受欢迎人物，但西来寺却十分欢迎这位自由民主斗士。人生七十才开始，星云愿好友陆大声，从今天开始新生活，更健康，更热心助人。

被陆铿形容是“最远来”的稀客，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千家驹，专程前来祝寿，他以一首即兴诗夸赞陆铿的助人为乐精神。

与陆铿相交五十年的崔万秋，八十五岁高龄仍搭机从旧金山赶到，他特别告知“陆大声”这个号，是于右任所赠，困为陆铿经常语惊四座，尤其揭发黑幕，更是不顾一切。一九八五年所写的“胡耀邦访问记”，引致国内外大轰动，间接导致胡耀邦下台，而美国国务院的“每日报导”也英译刊出，“他不仅音大、胆大、肚量亦大，陆大声之名实在名符其实!”

王亦令亮出陆铿拥有“三五牌名记者”的底牌，因其曾接触过美国三位五星元帅——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中国新闻史上留有盛名。

陆铿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牢房达廿二年之久，有人海峡两岸分别去唱歌，也有人两边吃酒席，倒唯独这位老兄，是两边赶着坐牢。暂居西来寺的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陈述她所知道的陆大声，“两年前，在胡耀邦下台前的检查文件里，戈扬看到‘陆铿是个坏人’，直到今年星云大师组团赴大陆访问，她有缘与‘坏人’结识，才发现其性情中人的可爱处。”。已退休的空军军官王秉立，五十年前与陆铿一起关过昆明监狱，他说：“陆铿的囚号是四 0 六，我是六 0 四，多年的监狱患难，我相当佩服他的独特见解。”王秉立回忆，陆铿第二次坐牢，是要求开放报禁，结果以“恶毒向党的进攻”锒铛入狱。特别赠予一句：“但愿人长久，继续发大声”。余兴节目上，张俐敏表演“绿岛小夜曲”，并与寿星合唱“长城谣”。国剧接唱，有王蓝、陈燕贞、王潜洁、张天美、杨富森各唱一段拿手好戏，张天心拉南胡，马梅耶谈琵琶。陶慕廉、李惠英夫妇的跳加官，更将祝寿晚会引向高潮。

回顾我和星云大师的结识，可以说是异数，从佛的观点看，则是缘份。而当代高僧竟然在西半球第一大寺为一个基督徒朋友祝寿。这充分表现了星云大师的宽广胸怀。

星云格局大，天下一家人

我在西来寺寄居五载，每次要离去，星云都不同意，最后，还是趁他返佛光山本山，才与西来寺主持情商而别，回到旧金山居住。

十年交往中，我给星云大师找了不少麻烦。从接待民运人士、到接待千老夫妇、到接待许家屯，不仅使他操心、伤神，而且遭致中国大陆当局对他的不满，最后使他从中共最高规格接待的高僧大德一变而为不受欢迎的人。

难怪有星云门下的个别徒弟背着星云大师对陆大声啧有烦言。其中一位当面和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出家人是吃十方，你是吃十一方了。”

而星云却是另一种观点。他说：“人与人的结交是要有缘份。一般来说，知友多半是三十岁以前订交的，我们两个订交，是六、七十岁的事，这非常难得。”

又有一次，他不胜感慨的对我说：“你是一个既有个性，又自视较高的人。我们彼此能够开诚相见，互相尊重，我能欣赏你的直、谅、多闻，你对我也能做到无话不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只有‘般若’可以解释。”

我除了感动，没有回应。实则每与共话，均会自然想起“万顷波涛黄叔度”，深愧读书太少，不能以“一船书画米襄阳”对。

我通过十年的交往，认识到星云大师是佛教在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关键人物，尽管不少人批评他“政治和尚”，但在中国这个充满了政治的国度，完全与政治绝缘是不现实的，何况他倡导的是“人间佛教”。

但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台湾的奇迹，也就没有星云的奇迹。这是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能出星云的道理，虽然星云生于大陆。同样地因为星云初步实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目标，反过来又充实了台湾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彰显了台湾的光明面。

一九九六年大陆文化史家余秋雨访台，形成了一股余秋雨旋风。到处有人请秋雨演讲，而他却有意拜山、拜谒佛光山。我和星云大师有佛缘，和秋雨有文字缘，乃陪他上山。规程中他说到对星云大师总的印象可以一字概括：大。形象大，格局大，气魄大，心胸大，理想大，秉持慈悲，心怀天下。所以，能把东方佛教在西方发扬，这是创造历史的不朽功业。

义助许家屯再上黑名单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三国魏·郭遐叔（赠嵇康五首）

●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唐·韩愈（答张徹）

一九九 0 年五月一日，当年已有五十二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党龄、曾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人称“许第一”、继后又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代表中共驻港、担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有“地下港督”之称的许家屯，突然到了美国。他对外宣称路由休息，实际上是躲避保守派，特别是李鹏对他的迫害。国际传媒称许为自林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叛逃后，中共出走国外的最高级官员，引起了国际轰动，而我却因友谊的关系卷入这一件事，尤其是在代许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点了李鹏的名，引用一位名作家对他的评价，指为“弱智儿童”，因而正式上了中共黑名单。

我和许家屯结识和往来

许家屯是一九八三年夏天到达香港。他由广州乘火车到罗湖，经过罗湖桥到达九龙车站，穿了一件夏威夷衬衫，裤子不但无缝，裤口也是大而无当，戴一副墨镜，给香港人第一印象很差，报上公开说“像个特务”。他在答覆记者关于他的任务一问时，又说为中国统一而来，更使人感到怪怪的。

他出现于公共场合，穿西装而不打领带，且喜把手插在裤子口袋中，从形象上看是不及格的。

由于我和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是老友，许到港不久，我和费谈到许的形象问题，建议费以朋友的身份给许一个信息，叫他改变一下穿着，注意一下形象。费表示他不便讲，我倒可以讲。我说，我根本不认识许。费说据他了解许准备各方面接触一下，他可以向许推荐先约我谈谈，我说好。

就这样，我和许第一次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会客室见面了。我和他泛谈了香港的特色，强调新闻自由，他认真地听，偶尔提个问题。我建议新华社要改变作风，从原来的关门状态改为打开大门。许表示他也准备如此。我说，来到香港应当注意一下穿着，改变形象；如果代表国家出场，穿西装一定要打领带，或者干脆穿中山装。墨镜不要再戴，因为已有人反映说像个特务。我请他对我的直言不要见怪。他说：“怎么会见怪呢？第一次见面能像陆先生这样坦率，只有感激。此后希望多联系。”我说：“我是记者，下次见面就要进行访问了。这叫先礼后兵。”许大笑。

后来，好几次接触，我提出进行访问的问题，他都说最好先交换一些看法，让他多了解了解香港，再接受访问，如何？而且说，向他提出要求访问的传播媒介，中外都有。接受一家，不接受另一家，也不好。

我表示谅解。有一次，香港吹飓风，挂八号风球，全市停顿，他派车接我去作打风漫谈，谈到他的名字来由他说自己原名许元文，自幼喜爱文学，但因家贫无力上学，只好自学攻读文学作品，有一次读到艾芜小说《咆哮的许家屯》，即以之为名。原来许家屯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小火车站的站名。从这个名字，可以反映许家屯从年轻时就有一点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风球卸下后，他送我出门，道别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今天的聊天不供发表。”我的回应是：“下次见面就非发表不可了，请预先做好准备。”

顺便提一句，他每次送我走时，都要叫他的车服务，我推卸均不果。后来，彼此熟了，便坦诚相告：“你让你的司机送我，我给他的小费是喊 taxi 的一倍，否则拿不出手。你还是为我省点钱，你也省点事吧！”彼此大笑而别。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我的一位教授女朋友要看许家屯，我和她一起从美国飞香港，许先生在新华社内热情接待餐叙，并介绍副社长乔宗淮和我们相识。当宗淮和我握手时，许特别指我说：“他和你双亲都认识。”我告诉宗淮，一九四 0 年到四一年，在重庆是统一战线最好的阶段，国共两边的记者都参加中国新闻学会，因此，我和你母亲（龚澎）曾有一舞之缘。

就在这一次访问前，许让乔宗淮陪我带去的女教授逛街。他接受了我一小时的正式访问，在二月一日《百姓》半月刊第八十九期以〈香港、香港人、香港前进〉为题发表。

这篇访问记，一开始就坦诚：

“在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香港前景研究社’是公开和中共唱反调的，‘前景社’的朋友（老思光、徐东滨、李怡、胡菊人、孙述宪、董千里、郑宇硕、谈锡永和陆铿）并非有爱于殖民主义，更非不愿香港早日回归于中国的版图，而是对中共没有信心。鉴于中共以往三十多年的记录实在太差，香港一旦由中共管治，必然会弄糟掉。”我根据自己对中共的了解指出这是“专政性格”决定的。许家屯对这种对立的意见，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不仅没有视为“异端”，还表示愿意虚心听取。因此有了宴请“前景社”朋友的餐会。在那次餐会上大家毫不客气摆出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即按中共的党性，不干预香港的事务是不可能的，一干预就糟，糟了就要干预，于是更糟，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前景社”对香港的前景是悲观的。

许家屯当时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他反复解释了中共的政策，对于逆耳之言绝不以为忤，相反地还说“颇有参考价值”。后来，他在私人谈话中两次告诉我：“中央领导，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都曾告诉我（指许），香港的事，让香港人管，我们最好少管。只有在英国人耍花招的时候才管一管。他表示，即使九七后，中共也是用政策体现领导，而不是用人来管”。

许家屯在香港六年半，基本上是按“不干预”、“少干预”、“多交朋友”、“多听意见”的方针做事的，因此，他成了香港人的“知音”。这从香港人对他的“去后之思”可以证明。

在八五年一月十二日的访问中，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即陈香梅的妹妹、香港大富豪夜总会的老板娘陈香桃，吹嘘她在廖承志那里看到“廖公主持拟定的一份有关香港前途的计划书”。而且说她“见到了一张派到香港来的人的名单。廖公还介绍了一批包括许家屯在内的重要干部给她认识”。

许对看到计划书等等之说的反应是“根本不可能”。至于介绍许家屯认识，只不过是廖承志宴请陈香梅时，陈香桃随往与许有过同席之雅而已。许说：“我正在想，为什么没有记者老找我求证。”我说：“我今天就是找你求证了。”对于见到陈香桃说派到香港来的人的名单，许的答覆是：“请当作笑话！”

我在访问记里提出一个问题：

“陈香桃为什么要这样乱吹一气？唯一的解释只是小妮子春风得意，也就忘其所以了。”

访问记刊出后，在香港反应强烈：许家屯为什么只接受《百姓》的访问？

哈公在《明报》哈公怪论专栏连骂了三天。而且以“小妮子春风得意”做文章，究竟是为小妮子撑腰，还是借陆铿对小妮子的批评，来个“一石二鸟”，因为是曲笔，本为怪论，

所以未予深究。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一次长篇访问，许和我之间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他六年后赴美，先行和我接触，打下了思想基础。

傅朝枢拿了中共大量外汇

一九九三年一月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除前言和后记，一共十六章。第十一章题为〈敏感的城市〉，又分四节，叙述了他对香港传媒的看法以及北京高层对香港舆论的重视。其中提到他和《中报》老板傅朝枢的接触，他说：

“我跟傅朝枢，主要是北京对傅的《中报》有相当多的资助，通过香港新华分社转给他。”

傅朝枢拿中共的钱，新闻界很多人都知道，究竟拿了多少，则是一个谜。钱复一九八四还是一九八五年在华盛顿向亲台湾的传媒人士透露，根据他得到的信息是六百万美元。大概一九八五年，在香港有一次我和新华社的傅冬（原名傅冬菊，傅作义将军女公子，远在一九四五年就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党，为中共做了很多事，成为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和傅作义之间的传信人。一九四九年后先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转到新华社。傅冬的先生周毅之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于杨奇指导下参加了《香港概论》的主编工作。）吃早点聊天，谈到傅朝枢拿中共的钱，高达六百万美元。

傅冬说：“绝不可能。”理由是“我们（指中共）的外汇相当紧，怎么可能给傅朝枢那么多钱？！”我说：“老傅利用你们的领导人根本不懂台湾，胡吹一气，把杨尚昆等给唬住了。”傅冬说：“任他吹的再厉害，也不值那么多钱嘛！”

没有想到，过了两个星期，傅冬约我吃早点，她主动告诉我：“上次你说傅朝枢拿钱的事，我了解了一下，不是六百万，而是一千万。杨尚昆批的。因为对台经费不封顶。”

老实说，我对中共这一手是感到吃惊的。我了解，大陆老百姓的生活是那么苦，中共为了对台统战，竟这样浪费民脂民膏，实在不可思议。

许家屯抵美后，记不得是一九九一还是一九九二年秋，有一天和千老（家驹）、萧政之兄、卜大中老弟及我聊天，他说中共给傅朝枢的钱，前前后后近两千万美元。我当时的反应是：“恐怕没有这么多嘛！”许马上反驳说：“有些钱是我经手的。”然后补了一句：“傅朝枢这个人贪得无厌！”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徐先生初到加州时，对于他在香港经历的人和事，是很少提的，有时别的朋友提到，他也很少搭腔。其原因据我的观察是，他离开香港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到美旅游休息的态度，即不泄漏党和国家的机密，不寻求美国的政治庇护，不接触民运人士，不公开发表谈话。他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做的。

因此，正如他在《回忆录》前言部分说的：“不少朋友，一再鼓励我把在香港任新华社分社社长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六年七个多月的经历写出来。”这里说的“不少朋友”，就有陆铿一个。我曾告诉他：“不发表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后来，又为什么改变初衷了呢？

这与中共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在他看，不是整个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要开除他的党籍，而是如他所说的“暂时由江泽民、李鹏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一时间回不了大陆。”不过，《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在涉及中共党和国家机密方面，仍有很大保留，不仅我们从旁观察是如此，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惊险的出走，一小时之差

对于他离开深圳直奔香港出走美国这一段，倒是非常惊险，差一点就出不来了。

关于出走的情节他从未系统地说过，只是话题偶尔触及、零碎地说一点，我是以记者的冷眼旁观，把近十次谈天的一鳞半爪凑起来，才得到如下的全貌，可能还不够周全。

许先生先是看到梁湘被整，才兴兔死狐悲之叹。梁湘一九八九年只是在海南省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和平处理天安门事件。信稿并不是他拟的，他见省委书记许士杰签了名，他也签了个名，如此而已。结果江泽民、李鹏叫许、梁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许被接待入京西宾馆，梁就被捕软禁了。

许心想，他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所做的事，绝非梁湘所能比，梁单表格态就丧失自由，而他却参与了中共中央高层处理天安门事件两种方式的斗争。加之，他想到"六四"后他为一件事到北京见李鹏，朱琳对他所说的听起来就反感的话，感到"秋后算帐"势不可免。

许离港到深圳，原来只想就"一国两制"做一些研究工作，为国贡献心力，当时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宋平原已同意，后来又说不行，反映了江、李另有打算。及至得悉香港新华社已将有关他的"材料"写成报告送往北京；看来斗争势在必行。到了正式通知把他平日乘坐往来于港、深之间的汽车收走，他知道动手的日子就要来了。

他先送走了老伴——也是一九三八年就加入共产党的所谓"三八式"老干部——回南京定居。接着和在香港的朋友联系好，四月三十日晨间开车到上水相迎，以免红勘下车受到注意，不声不响地到达香港，翌晨直飞美国。事先约好由我在旧金山接机，然后陪他同机飞洛杉矶。他的儿媳妇也是送走婆婆才到香港美国总领事馆拿到祖孙三代人的签证的。许过罗湖时，海关官员对他像平日一样打招呼，他们绝想不到他这是未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出走。

深圳这边，市委四月三十日上午就收到北京通知许家屯即赴北京开会的通知，还要市委派员陪同。市委决定由副书记秦文俊亲自给送去，以示尊重。刚巧，中共传统纪念五·一劳动节，深圳市按例四月三十日举行纪念大会，秦文俊于开完会再去看许面交通知，那知他到达贝岭居许的居处时，许已人去楼空了。据许讲，时间之差一小时，好险！

香港这边，许家屯连夜给邓小平写了封信。许在深圳时，因事给李嘉诚打了一通电话，未能联系上；李后来电话找许，直找到新华社，造成了轰动，幸而他们并未在翌日采取行动。他们没有料到许会当机立断，走上去国之路。

行笔至此，我想到他曾两次在聊天时告诉我："做梦回到了大陆"。说来也够凄惨的！

事实上，从到美国的那一天起，他就打算要回大陆的。而主动通知北京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见面，也说明了他对大陆、对中共是身心不离的。

与马毓真、朱启祯的见面

就在许家屯到洛杉矶西来寺住下没有几天，他向星云大师和我提出要和北京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见个面，当面通知马他到美国旅游休息。星云极为赞成，并说可以安排西来寺对面一座非常清静的居所、星云大师偶尔用以会客之处见面。与马毓真联络的事，就由我去办。

一九八八年星云大师子西来寺举办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大会和第七届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时，我曾受星云委托与马毓真打交道，有马派张领事代表中方，由我代表星云协商中国代表团赴会事宜，因此与马认识，且在西来寺共餐。

当马毓真在电话中得知许到了西来寺，愿意与他见面一谈时，他约我到蒙特利公园市一家超级市场的大停车场相遇。

当时，马由司机驾车，我有海伦（崔蓉芝）驾车，几乎是同时到达。两部车停在一起，马邀我到他车中谈话，他的司机开车门走出，说明马事先已作交代。我于是钻进他的车中，当时的反应是，这不正是侦探小说里描写的情景吗？感到有点滑稽。

他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谈，事后我想到是避开美国方面的电话监听。

我告诉吗，许到了，住在西来寺后面一个招待宾客的房子里，愿意和他见个面谈谈。他表示听到许到了洛杉矶，也希望和许见面，很高兴有这一机会。于是我告诉他见面的地点，时间由他（马毓真）定。马说，让他安排一下，会通知我。

大概就是停车场相约的第二天下午，马和许建了面；大约隔了一个星期，又和北京驻华盛顿大使朱启祯双双与许在西来寺对面的一位佛教徒的宅邸见了面。事前都礼貌上拜会了星云大师，彼此打了招呼，星云告退，他们会谈，许与马、朱足足谈了两个多钟头。

交谈的详细内容，许没有向我讲，我也没有问。说道这一点，可以说彼此自然有一点默契，即我从来不问他的事，他主动讲，我注意听，但凡写文章或作报导涉及他时，一定先征求他的同意，有时且在发稿前请他过目，主要是为了防止无意间对他造成伤害。

说到这里，不能不写上卜大中老弟一笔。他是一位才子记者，代表台湾《中国时报》驻洛杉矶，许到洛杉矶不久，我就介绍他们认识。大中主动为许先生提供各种帮助，小到开车购物，提供书刊阅读。大到办理延长签证，引导各地旅游，无不尽心尽力。最难得的是，他和许先生结识五年，没有利用接触方便，发过一条消息，写过一篇有关许的文章，纯粹是友谊，令我自愧不如。

我看许家屯这个人

和许家屯先生认识、转眼快十四年了。他到美“旅游休息”也已五年多了。

可以这样说，近六年来除他的家人之外，和他接触最频密的就是我。他知道我是一个一生以新闻事业为职志的记者，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像艾契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我知道她是一个开明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像他被江泽民、李鹏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后，他自称的“党外的社会主义者”。他虽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心仍处于社会主义转型的中国。

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首先在党的机关刊物上提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人，也是正式写出中国人的圈子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文《试论和平演进》的人。

他对于世界前途的发展仍充满着乐观，他认为人类经过无数的折腾，终会找到一条理想之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熔于一炉。对于受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毒害甚深的中国大陆的和平演进，他是具有信心的。因此，虽有家归不得，但他信心总有一天他会平安回家。

他由于曾任封疆大吏，在江苏任第一书记时曾管理过六千万人的事，加上年轻时接触文学，心灵上受过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洗礼，故在港所表现的格局与一般共产党高干不同，与极左分子更是相异。不过，这不等于他处理香港问题全是开明的。相反，在起草基本法时，对某些有关未来香港特区政制的方案，他承认他的观点比当时受到批评的双查（查良镛、查济民）方案还要保守。对于英国人离开殖民地要的一套花样，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在香港闹过有名的“本子风波”，批评英国不按协议办事。但对香港人他不论左、中、右都表现了同胞爱，而且坚信香港人是会把香港治理好的；他所担心的倒是北京某些执行港澳政策的人过左，不能认真吃透（这是共产党的用语）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精神。

许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有信心，曾多次向我提到邓小平对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是有诚意的。只是北京中南海领导的变化会影响到香港的变化。有些共产党员习惯于搞左的

一套，“宁左勿右”是一种痼疾，很难医治。因此，他在其《香港回忆录》中预言，如北京的领导层“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盲动着”，“小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许说：“倒退不仅港人不容，全中国人民不容！故而总体来说，我对香港前途还是乐观的。”

而香港人对许家屯虽不至“有口皆碑”的程度，但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则是不争的事实。香港记者自发地约集起来为他举行送别餐会，共唱惜别歌，在香港固然已成为人们乐道的感人故事。而我自己亲自遇见的一个镜头，也能说明许家屯确为香港人留下了“去后之思”。

就在许赴美半年后，我到了香港，老正兴是我每次必光顾的一家餐馆，以江浙菜著名。当吃完饭付了钱走出来时，突然发现五位服务人员包括一位“部长”（即领班，香港称“部长”）站成一排说：“陆先生，我们想请你带个话给许社长，我们大家问他好！”

当时，我受到了感动。我想这就叫“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许家屯谈陆铿

许家屯在香港结交了很多朋友，不乏有钱有势的。他决定出走时，只通知了一位老友和我。为什么会找上我呢？这与他他对我的认识有关。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三一二、三一三页中有以下两段说明了他的想法：

陆铿坐过国民党的牢，还更长时间（二十多年）坐过共产党的牢。他在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时，不畏权势，勇于揭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宋子文（蒋介石的大舅子）贪污国家外汇三亿美金案，轰动一时。他也是在港主张：“批毛不批邓”，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者之一。他六十五岁生日时，我曾托人送他十万港币贺礼，他接受我的“情”收下了，立即又请原人原款退回，传话是：“感谢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钱。”

除却政治立场上的差异，我欣赏他的真诚、正直。我在北京和公安部长刘复之、安全部长凌云谈到陆铿的为人时，凌云有感慨地说：“当时对这些人的工作做得不够。假如做得好一点，经济上多给些帮助，可能对共产党的态度会好一点。”我讲：“像陆铿这样的人，恐怕未必！”

纬国夫人被毒死·章亚若遭同一命运

●自古佳人多薄命，闭门春尽杨花落——宋·苏东坡（薄命佳人）

蒋纬国将军平时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包括他的部属时，都喜欢讲这句话：“我们是半世纪的老朋友。”

我们认识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当时我在重庆做广播记者。他在胡宗南将军统率的部队任上尉连长，从潼关回到重庆看蒋老先生，在嘉陵宾馆的一次晚会上相识。纬国生来性格开放，热情好友，加上国外留学四年多，对于外国的一套礼节非常熟习，给人以翩翩佳公子的印象。

静宜如纬国，对人很热忱

一九四七年春，我从南京到徐州采访，当时国共两方面军队在山东展开了争夺战。纬国时任战车一团副团长，已与石静宜女士结了婚。静宜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还带着一股稚

气，对人跟纬国一样的热情，说话直来直往，穿着也不特别讲究，看不出是出身棉纱大王之家的小姐。

纬国介绍静宜时，说明他俩是一九四四年西安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小石的开朗大方，给了他极好的印象，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却具有平民姑娘的思想作风，这正是他喜爱的对象。相恋不久，就禀告父亲蒋老先生，于一九四四年在陕西王曲结了婚。

抗战胜利后，纬国被调到徐庭瑶将军主持的装甲兵司令部战车第一团服务。由于他在德、美国学习军事，造就了较高的专业水平，受到同侪敬重。他们夫妇俩陪我参观不同型号的战车时，纬国如数家珍。我让他俩双双爬上车顶，以便拍照。当时纬国还开玩笑说，事先未经报告批准，擅自爬上战车，是要受处分的，姑念南京记者从工作出发，免于追究，下不为例。这张照片成了《新闻天地》第廿一期的封面。

静宜曾在西北农学院学习，并在音乐专科学校学钢琴及乐声，喜欢跳舞。有一次纬国和他双双到南京，还约了我在国际联欢社跳舞联欢一番。万万没有想到，从那以后，再没有机会看到她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在东京做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客人，被招待在代表团的宾馆里，那原是日本农林大臣的官舍，设备相当讲究。当时客人只有三个：蒋夫人年轻时的朋友、盛传和她一度订过婚的刘纪文；蒋老先生的亲家、纬国的丈人、西北棉纱大王石凤翔；再就是我。石老先生听我谈起认识小石，特别表现亲切，说希望和我在台湾一聚。

青春焕发时，不明不白死

谁能想到，小石竟在青春焕发的时刻，不明不白地死去。

一九五三年春，纬国奉派随徐培根上将应美国国防部邀请访美。访美结束返台路过东京时，得到静宜病危、嘱其速返的电报。等他向驻日大使借了钱买了机票，搭民航机回到台北，静宜已在三月二十二日逝世了。

一九八六年在纽约，通过一位上海朋友徐大椿女士的介绍，我认识了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化系主任陈亨教授。他是视觉分子与调控分子生物学的专家，谈起话来给人以天才横溢的印象。他告诉我，他原名陈明，幼年出身于纬国主办的装甲兵子弟学校，能够赴美留学，也是得纬国之赐，因此把纬国看作恩人。但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即纬国夫人石静宜女士的冤死。他是目击者之一，却未能站在正义的立场将这件事公诸于世。下面就是他对我叙述的情况：

陈亨目睹石静宜被害

“一九五三年，我刚刚十五岁，在台中宜宁中学读书。我们这所中学，本来就是装甲兵子弟中学，校长石静宜。宜宁的校名，宜取自静宜；宁取自南京。我们一百多名学生大都是由纬国将军在大陆撤退时用船把我们运倒台湾的，我们对他存着深厚的感情，他也视我们如自己的子弟。我们的学校在台中，常常跑到台北来看他，来玩，包括看最新上片的电影。而有的同学就住到纬国将军中华路寓所，他反正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他夫人、我们的校长跟他一样好客，特别针对我们这些宜宁的学生，非常亲切。”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二日夜晚，我和邱明山和另外一个同学玩够了，又跑到纬国将军家去，但见灯火通明，通过窗户一看，四个彪形大汉架着石静宜，正在强迫她吃一包药，她表现出挣扎，但无可奈何。当时把我们吓坏了，掉头就跑。”

“回到台中宜宁中学后，很快听到石静宜校长病逝的消息，而我心里清楚，她是被害死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了那恐怖的情景，看到了石静宜挣扎的表情。”

“后来，各方面透露出来的情况渐渐具体了，知道是蒋经国干的。蒋经国当时是台湾的ＮＯ．１情报头子。他抓住一个美国援助军用卜疋（罗斯福呢）被调包的贪污案子，据说已引起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的关注，并指石静宜涉嫌关说，为了维护所谓‘蒋氏门庭的尊严’，而且得悉蒋老总统确实震怒了，故假传圣旨，对石静宜‘赐死’。宫廷斗争实在是不择手段，极尽残忍之能事。”

陈亨教授目击四个彪形大汉对石静宜的粗暴，与《千山独行》一书中引用的纬国岳母告诉女婿女儿死前最后一刻情景：“但她要起身时，有四个医护人员，都是男的，进来按住她的手脚，不让她起来，她挣扎，就在这个时候，她就瘫了，不再挣扎了……”非常巧合。何等的巧合！又是四个男的。

不管赐死或害死都是死

当我的《回忆与忏悔录》快杀青时，特别就石静宜的不幸死亡与纬国交谈，讲了陈亨在十年前告诉我的情况。纬国告诉我，他得悉静宜病危赶回台北时，静宜已经死了。他岳母满含悲哀地告诉他简单的经过，最重要的一句话：“静宜不是自杀的。”

我插话说，不是自杀，那就是他杀啰！按照《千山独行》的说法：“蒋纬国一家人都认为石静宜死得冤。”而按照陈亨教授当年目击的情况，明显是被迫害而死。不管“赐死”也好，“害死”也好，反正人是死了。

在《回忆与忏悔录》定稿前，为了慎重，我专程由台北飞旧金山转纽约去看望陈亨教授，因十年未有联系，加之听说他中了风，所以只好通过新闻界即为年轻朋友帮忙寻访，终于找到了这位退休的教授。没想到，他健谈如昔，重义如故。听说我是专为了解石静宜之死而来求证的，他特别约了当年和他同在宜宁中学的同班同学吴绍亮博士，还自康州纽海芬前来和我见面。吴绍亮的哥哥吴启平当时就是纬国的随行参谋，与纬国形影不离。只是纬国赴美，他未跟去；对于石静宜之死，自然了解内幕。不过，吴绍亮与陈亨性格不同，陈外向而吴内向，陈豪爽而吴谨慎，惟他也坦陈远在三十五年前就听到石静宜是“赐死”的，至于到底是蒋老先生之“赐”，还是蒋经国之“赐”，或蒋经国打着老先生的令牌所“赐”，这就不清楚了。

当时这个案子，纬国完全不知道，他被蒙在鼓里，到自己最亲爱的伴侣被乃兄设计谋害、含恨而死，他仍然被蒙在鼓里。善良的纬国，看来只有在天堂和静宜重逢时才得真相大白。

章亚若暴卒实变相“赐死”

从中国历史看，宫廷斗争一直是残酷的，而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再以章孝严、章孝慈的母亲章亚若之死来说，也同样是在一种“赐死”心态下的谋杀。

一九五０年，军统元老，人称“阿公”、曾任军统香港站站长、负责策划陈济棠属下空军投奔蒋介石为蒋立了打工的邢森州先生，在昆明监狱跟我谈天，他因为出任两广监察使时经于右任介绍和我认识，彼此了解，故谈话无所顾忌。

有一天，谈起章亚若，他说是军统接获密报，章亚若在桂林住院生子时，对外有所招摇，故意透露她和蒋经国的关系，因此，戴笠经过请示，奉命将她去掉，乃予以毒害致死。我问邢森州，请示什么人呢？

阿公责备我说，你是做记者的，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除了蒋委员长，谁敢接受戴笠的请示。

关于这件事，八十年代末在洛杉矶和老记者、也曾在台湾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的王康兄聊天，他就说，当一九四二年章亚若生双胞胎时，恰遇他太太也在桂林住同一医院，因

而认识并来往。出院后，他太太去看望章亚若，见到房间里悬挂着一张大的蒋经国和毛夫人像。当时章对外自称蒋营长太太，先生在前方；而王康太太是认得蒋经国的，便指着相片问："这两位？"章亚若答："我先生和我婆婆"王康太太不仅一目了然，而且心中有数了。

试想，如果遇到特务，将是什么情况？

一九九０年，章孝严与崔蓉芝在旧金山凯悦酒店谈江南案和解事，我陪蓉芝前往，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临别时，孝严礼貌地表示，今天未闻陆先生的高见。我说："对你们兄弟，我倒有一个建议——不要搞什么'认祖归宗'。因为据军统元老邢森州先生告诉我，你们两位的母亲就是蒋老先生下令毒害而死的。"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赐死"!

杨惜珍医生和我们的五个儿女

●人的不虔不义蒙蔽了真理，上帝就从天上启示他的义愤.

●患难培养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带来盼望。——《圣经》· 罗马书

杨惜珍是一位有成就的牙科医生。出身于一个法官家庭。她的父亲杨步青先生二、三十年代在南京出任国家大法官，使她自幼受到中国伦理教育的影响，加上现代科学教育，导致她的一生成为良医、贤妻、慈母、孝女、虔诚的基督徒和对社会无私奉献的义工。

渝蓉一线牵，陆杨结连理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南温泉政校读书，突然接到一封寄自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一个女孩子的来信，主旨是打听我妹妹陆敬贤的下落，自称是敬贤同学小时候曾到过我们在古城襄阳的家，还记得那玩游戏的假石山，并见过我。只是那时我读高中，她们都初中。

我回信称以惜珍妹，简告敬贤在抗战初起即被父亲作主嫁给一个军人，辗转落脚在重庆璧山，生活谈不上幸福。她第二次来信就提出挑战："第一次写信就称人家为妹，你觉得合适吗？"我的反应是这个女孩儿不简单。干脆请她作个自我介绍，只差叫她寄张照片。不料她已把医学院刚刚进行的身体检查结果寄来，如身高、体重等等，我感到既有幽默感，又有趣味。

一九四０年夏，我从学校毕业，即将参加工作，她利用暑假自成都到重庆看我，由于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彼此了解家庭及教育背景，又通过信，所以思想沟通的速度，超乎一般常态，更重要的是她呈现了外在和内心的双美，我肯定了应当把她作为一个选择对象，于是开展了三年的恋爱。彼此来往信件有数百封之多，可惜这些本来保存的很好的信件，全在毛泽东减智的文化大革命下给毁了。

但美丽的记忆是毁不掉的。第一是我在一九四一年的成都之行。布后街中大医学院平静的一池春水被我的歌声吹皱。惜珍的女同学们热烈地欢迎了我这重庆来客，而男同学则为之侧目。我的性格和我的记者职业，使我在惜珍的女友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其中有四、五位如邹兆菊、吴玉润、周敬行、柳树嘉、詹威仪，差不多在以后的数十年，一直保持着友谊，直到我对惜珍背叛为止。

第二是惜珍一九四二年的重庆行，因成渝铁路那时只是少数人的设想，往来靠老爷汽车，

她和中大、华大一批同学，中途抛锚在一个小县城，幸而一座天主教堂的外籍神父收容了他们两个星期，为已在华西坝开 Tip Top 咖啡馆的华大学生吕明德创造了追求杨惜珍的条件，她生平第一次躺在天主堂草坪吊床上被推着晃荡，她后来告诉我那是非常奇妙的感觉。

也许有人会奇怪，我为什么事隔五十年还会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是我的第一个情敌。惜珍到重庆后向我全盘托出这一青春插曲，坦率表示，生平第一次尝试到一个女孩子竟然会同时喜欢两个男的。并问我，回到成都后，如果吕明德去找她，怎么应对？我教她一着："对不起，我已经爱上了一个新闻记者。"结果，她如法炮制，对方也知难而退。因而有了一九四三年重庆嘉陵宾馆相当盛大的婚礼，宾客数百，花篮成群，其中竟有行政院长孔祥熙和青帮领袖杜月笙送的。这与不少人见到报上刊出的于右任先生证婚，孙大园、马星野两先生为介绍人的陆铿、杨惜珍结婚启事有关。但也多少反映了广播记者逐渐为社会接受。与我同为最早两个广播记者之一的乐恕人，当场朗诵了祝福的长诗。而我的号——大声，正是于先生在颁赐一副亲笔对联外，送的最重的贺礼。

未婚即得子，离比聚时多

回首前程，我在婚姻问题上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等不及结婚，就在一九四三年春到四川永川惜珍家中去探望她时要求对方作肌肤之亲。天下事就那么巧，一次轻狂就珠胎暗结，使她在毕业之前三个月坐立不安，而且使双方都失去了新婚之夜巅峰状态的喜悦感。事后自责：既已注定鸳鸯牒，何必逢欢突逞狂？！

这一次教训在心理上产生了几微妙的负面因素，是我对惜珍的第一次亏欠，也是首先要忏悔的。

从惜珍来说，由于自幼受了"三从四德"的封建文化传统影响，对于父权和夫权有一种自然的服膺，这在一定程度上宠坏了我。当然，根本的是我本人思想中的大男人主义毒素太深，一切任性而为，很少考虑妻子儿女。

我和惜珍自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在重庆结婚，一九八三年在香港接受一百多位新闻界友好为我们举行结婚四十年庆，到一九八七年在美国分居，前后四十四年中，其中二十二年也就是一半时间我都在坐牢。不坐牢的时间，由于我是个"新闻迷"，生活的主轴是新闻，总是围着新闻转。即使不坐牢，也是满天飞。不是欧洲随军，就是日、没访问，再就是国内到处采访。因此，夫妻聚少离多，是正常现象；夫妻儿女相聚一堂，反变成特殊现象。

惜珍天性仁厚，大处着眼，对我没有半点责备，总是曲于优容。只有一次提出抗议，那是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事，在南京，惜珍任大学医院牙科医生兼任助教，每天早晨七时起床盥洗，进早餐，八时上班，直到下午六时下班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我在《中央日报》任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每天工作多在十六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忙的很，平常都是凌晨三四点回家，这时，她睡得正香，我避免吵醒她，倒头就睡。到她起床上班，正是我酣然入梦时，故双方只能互相欣赏睡姿。有一天早晨，她上班之前，破例将我推醒，说："我们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讲话了。"我说："有什么事，你讲嘛！"突然见她把床一拍，提高声调说："夫妻嘛！难道一定要有事才能讲话，没有事就不能讲话？"我赶紧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实在太忙，对不起！"她才说："今天是你生日，晚上能不能回家吃餐饭？"我当时除自责外，才发觉已一个星期没有回家吃饭了。

父子同出游，一生未曾有

对妻子是如此，对孩子呢？说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直到写《回忆与忏悔录》时才反思了一下，在我一生中竟然没有一次带着老婆孩子假日出游或逛过一次公园。像我这样的爸爸，恐怕天下少有。这与我生来不喜欢欣赏风景有关，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陆大声有兴趣的

只有各种各样的人和新闻。如此一来，整个家和孩子的教养责任，全加在妻子身上。

惜珍大学毕业就做牙科医生，先在空军总部诊疗所，后进空军医院，继入大学医院，再自行开业应诊她不但负责全家生活费用，而且还要给我送牢饭。至于我本人除在南京《中央日报》兼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两年多时间，经济收入较好，对家庭有点贡献，其余绝大部分时间，只是收入仅够自己做记者的支出。对惜珍的唯一贡献是在一九四六年自欧洲转美回国时，将口袋里剩下的一千多美元在纽约为她买了一套牙科器材，供她开设牙科诊所只用。除此之外对她完全是亏欠。

昆明名牙医，受文革冲击

由于惜珍学习认真，技术过关，又勤于钻研，不仅在昆明成为有名的牙科医生，而且是云南口腔学界唯一在《中华口腔科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医生。她还在当局准许“以师带徒”的规定下，培训了不少年轻的牙科人才；这也包括了我的两个孩子可望和可信。老大跟妈妈学医牙，老二跟妈妈学镶牙，不料刚刚可以独立操作，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惜珍服务的医院，她本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戴上白袖套每天扫厕所，只有一般医生不能医治的牙病，才命她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医治。而两个孩子，也在医院喊出“资产阶级接班人滚出去”的口号下被赶了出来。

与此同时，原来她自置的昆明威远街一五八号房屋，也被昆明市政府以所谓“房改”（房屋使用改造条款）加以没收，分配给工人居住，我们的家则被赶到附近只有一间房的临街小屋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惜珍顶住了横逆，一直熬到文革后期，经过不折不挠的抗争，更重要的她是受人尊重的医生，终于把自己的房屋要了回来。虽然被弄得残破不堪，但到底又有自己的家。

老母划地主，冒险迎奉养

最大的奇迹是她在大陆土改运动中，冒险犯难回到湖北广济老家乡下，把被划为“地主”、躲藏在一个亲戚柜子里两个月之久的老母亲不远数千里接到了昆明奉养；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老母送到贵州服务于一个小火车站的侄儿处避祸。这在中共那种严密的户籍制度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威势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她却是凭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认为有了主的恩典，就会有“神迹奇事”。

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三十个年头的“解放”岁月，杨惜珍面临的不单是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还要照顾长期坐牢的“反革命”丈夫和年迈的老母，并抚育五个孩子成长，结果是一门四牙医。

不仅如此，她对老同学、我的妹妹和我的继母也尽可能给予帮助和照顾；关怀及于我的朋友，如送寒衣给李广平，并负责广平自杀后的埋葬费就是一例。

面对大危难，巍巍女丈夫

对我来说，一生中，惜珍为我分担的苦难，虽不惊天动地，亦可泣鬼神。而她表现的沉着冷静，不能不令我佩服。在南京，我面临蒋介石的震怒可能失去自由时，她为我准备了牙刷、牙膏、换洗衣裤的同时，还准备了一把扇子，以应付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煎熬。在广州，当警备司令部抄家时，她虽被迫搜身，仍处之坦然，相反地安慰同住的丁中江未婚妻和乐恕人的女友不要怕。在昆明，当面临镇压反革命高潮时，她总是挤在人群中看张贴出的布告，先看判处死刑的有没有单名，如果都是三个字的名字心才落了下来，而心理上却准备收尸。当一九五八年三·二九之夜我第二次被中共逮捕，全家被抄，公安干部让她在搜查证上签字，她冷静地签下“杨惜珍”后望着我坚定地说：“放心地去吧！五个孩子我会抚育他们成长学

好，不会学坏的。”

我对惜珍虽然充分了解她对我的爱心，但因大男人主义思想作怪，加上一九五四年一月出狱后被公安当局通知不准找事做，处于靠老婆吃饭的地位。心里发生了变态。惜珍体会我的心情，怕直接拿钱给我有伤我的自尊，常常悄悄放些人民币在我衣服口袋里。因此，我常常当着朋友的面自我调侃：现在连理发、洗澡都要用老婆的钱，实在窝囊。有一天为一件生活小事，我突然大发雷霆，甚至拒不下楼吃饭，直逼得她跪在我面前请我息怒。事后想想，自己成天骂毛泽东是暴君；我这种态度与暴君有什么两样？甚至比暴君还不如，暴君是凭权力对百姓施暴，而我是凭妻子对自己的爱心对妻子施暴。我事后为此自惭，她反而为我找理由归咎于大环境。

惜珍对我的个性非常了解，特别是对我在喜欢新闻之外，就是喜欢女人，了解更深。而且有一定的宽容，比如我在欧洲任战地记者回国后，带回了三十几张欧洲各国结识的女孩子照片，有的在照片背后写下不少肉麻的话，像意大利小姐还印下红唇的印迹。她并不以为意，还为我贴好一个相簿，后来被毁于文革，我开玩笑说，老婆的关倒过了，红卫兵的关过不了。

一九八六年的一个秋天，她是真的生气了，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听到了我和一位女士的越州情话，这位女士刚在我们家做过客，她因考虑对方是学界朋友，故以礼相待，邀请与她同房而卧，两人交谈甚欢。而且这位女士诚恳警告过我：“你绝不能背叛杨惜珍，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向你扔石头。”结果，她没想到这位女士也会和我“更有销魂人不见”，因而大怒，约着我一起从六层楼跳下去，我说：“现在还不能。”她问：“为什么？”我答：“因为回忆录还没有写。”

坠入黄昏恋，写信陈背叛

一九八八年我和崔蓉芝坠入爱河，正是面临着“全世界的人都会向我扔石头”的处境。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我写了一封陈情信给她，坦陈了一切，结论是我欠她的情义，不要说这一辈子，下一辈子也还不完。只有请她以基督耶稣的宽容饶恕我这个浪子。我引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指出这里所谓的遮掩，不是掩盖的意思而是原宥（Forgive）的意思。

我跟她说：“四十五年来，我们虽然一直相敬相爱，但我带给你的困扰也一直不断，我想大概是遗传因子的关系，我祖父在青年时代就有‘保山唐伯虎’之称。后来，他有了六个太太。我父亲是个花心大少，你可能也听说过。幸而依靠你的品德，言传身教，使我们三个儿子没有把陆家的恶根继续传下去。”

“四十五年来，你是以基督的爱心在看顾我，百般忍耐，而卧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常常惹祸；用基督的眼光看，也就是‘罪性’。我曾向你坦率地说：‘恐怕一辈子都改不掉了。’而你始终信心十足。”

“为什么到晚年还会 Fall in love？这与一些痛苦的经历有关。总觉得自己受了太多太多的罪和苦，因此，需要抚慰，需要体贴，需要温柔，更需要恢复青春；前三者，从你身上都可以得到，而最后一点，直到我遇见崔蓉芝以后，才有实在的感觉。你可能发现最近半年多以来，我情绪比较高涨，精神状态比较年轻，我想与崔蓉芝的倾心相爱分不开。而她的体贴与温柔，因为没有生活小事的摩擦（这作为夫妇生活在一起时不可避免的），因而更显得单纯。在我身上发生的直接效应是，我虽年近古稀，但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正如好多人见了我以后的反应：最多不过六十岁。你常对我说：‘你的身体真好。’但我却不敢向你道破这一秘密。”

“我现在唯一感到抱愧的是对你。罄南山之竹作笔，倾沧海之水作墨，也写不尽你对我

的情义。”

“八月，我给一个要好朋友（按：指萧乾）写信，谈到我的心境，除了指出一般男士对婚外情只敢偷偷摸摸，不敢勇敢坦陈之外，还跟他说了下面两段话：‘惜珍为我坐过重大的牺牲，我欠她的情债是永远还不完的。好在她现已一心归向耶稣基督，老早产生一种观念，即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归向主，才是最高的境界。我的背叛更可能促成她的精神的升华。而且我有一个自私的想法，她既然爱我，看到我在晚年能重享青春之福，放我一马，也是一种基督爱心的体现。’九月，萧乾兄覆信以老友之情婉转批评：‘兄真乃雄辩家，对此事能振振有词，真是佩服。’我读后感到汗颜。”

惜珍函友好，冷静谈终结

惜珍收到我的背叛的信后，气愤是可想而知的。她在同年九月廿二日给我们的几对好友写了一封长信，并将我的信及纽约一张小报关于陆、崔之恋的报导，影印附寄。她表明态度说：“我的态度是：爱情的结果成了夫妻，夫妻的结合基于爱情，爱情是夫妻的原动力，没有了爱情，也就不是夫妻了。过去屡次伤心事，他都立即放下屠刀，跟我说抛锚一下不都回来了吗？一点都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正如一九六八年刑满时信中所说：年轻时糊涂，中年时身不由己，老年时要补偿一切的损失。（大意如此）因此我憧憬着晚年美好和睦的家庭生活，现在他已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宣告了原动力没有了，美丽的图画被他亲手撕毁了，希望破灭了，我复何待？！”

“我受了这么多的教育，服务社会人群几十年，我有我自己的社会价值，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尊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结婚以来，除了香港那短短几年外，直到如今，家庭生活一直是我在筹划和负担着）难道时光倒流，我还会回到祖母的年代中去？”

“任何事情都有个了结。有好的了结，也有不好的了结，但总是一个终结。终结了，也就了了。不再为它困扰，不再被它折磨。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各人去追寻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共同的朋友凌遇选老大哥和文思荣大姐伉俪，董品祯、封家瑾伉俪，胡菊人、刘美美伉俪，谢君健、徐秀丽伉俪在回惜珍信的同时，还写信给我；包括俞国基夫人陈冷好友，都劝我三思，不要弄得天怒人怨。卜少夫、黄绵林两位《新闻天地》的老弟兄也专门回信给她，但没有给我信，他们了解我的个性，就像张文达、孔文梅对我的了解一样，即使全世界的人扔石头，也只有认命了。

我的连襟龚选舞传来惜珍唯一的盼望：“不要背叛主耶稣”。因为那时我寄居佛教胜地西来寺。

儿女对家变，老五最痛心

至于我和惜珍的五个孩子、三男：可望、可信、可人；二女：南达、南军对爸爸背叛妈妈的反应，正如惜珍给朋友们的信中说的：“因为各人性格不同，表现也就不同。”老五（可人，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在蓝十字保险公司工作。）几乎痛不欲生，曾多日失眠、不食、工作无心，他写了一封绝交（对我）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从我学走路时起，妈妈背着我，牵着咪托（南军），还有大妹（南达）、小伟（可信）和阿哥（可望），每个月爬山路到林家院探监看你，手提肩挂的送吃的、用的、穿的和零花钱给你。到警察派出所打证明，小伟被干部骂得不敢吭声，直淌眼泪，嘴瘪嘴瘪地哭着回来，居民开会，我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孩坐在毛像下，街道办事处的老奶奶把我从娃娃堆里拉出来说，你这个反革命儿子，还想坐在毛主席像下面？对门麻子欺负我，阿哥、小伟、大妹他们在学校里也被欺侮，因为划为‘黑五类’，从小我们心灵就受了创伤，一家老老小小箍在一起，在共产党的炼狱里幸存

了下来，总希望你出来后，我们能得到父亲的爱，圆满的家庭幸福。……在我孩童时代看到别人有爸爸及圆满的家就很羡慕。我的家呢？是一个遭受各种政治压力、歧视及迫害的悲惨家庭，家里任何事情都由被生活和社会压得抬不起头、肩负全家八口人重担的母亲承担。今天，安定、丰富、自由、舒坦的生活刚刚开始，你就作出了辜负、伤害妈妈和我们的背叛。”

老四（南军），虽是个女孩子，但生性豪放不羁，处世机智而大胆，这大概与她的不平凡的生命开始于监狱有关。一九五三年底，云南公安当局准备释放我，考虑到内外影响，决定让我先脱离犯人圈子，跟干部生活在一起一个时期，使身体恢复得好些。同时准许惜珍在星期日探访。多次探访都是利用星期日不提讯，让我们在审讯室内谈心。一关四年，得能团聚，欢欣之情可以想见。有一次又逢星期日，干部全去看电影，我和惜珍一直说到月上东山，天地交泰的激情，战胜了专政与恐怖，不料惜珍竟因而怀孕了。我就向负责审讯的公安厅第八处处长胡殿斌坦陈了一切，说必须让我尽快回家。否则不但对我们夫妻造成困扰，对你们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带来麻烦。胡是一位比较通情达理的人，马上签报，翻过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就放我回了家。南军四岁时，我又因右派被捕。她全是在妈妈关爱下成长的。奇怪的是个性却非常像我。中共大炼钢铁，她当时不满十五岁，在一个工厂做工，也被迫参加。有一天突然不告而别，回到了家。还约了一个男青工一起行动。她妈妈责备她：“你一个人跑回来，已经违反了纪律，为什么还要带一个人走。”她的答覆是：“我不叫他一起走，谁替我背行李。”

文革期间她无学可上，成天读小说，文革后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鉴于父亲做记者苦难一生，遂弃文从商，赶改革开放大潮。惟生性重友轻财，她妈妈批评她“与钱有仇”。一九八八年，在上海遇见了崔蓉芝，表示欣赏蓉芝的风度，但强调她爱妈妈，向蓉芝提出：“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希望把我和我爸爸分开。”

三女儿南达属于中国大陆所说的“老三届”毕业生。文革初起时，昆明举办阶级斗争展览会，刘少奇到昆明，她所在的中学全体出动欢迎。她却被指定与另外三个“黑五类”留校大扫除。

文革期中，为了培养革命气氛，大搞“唯成份论”。在昆明拓东运动场，先由“红五类”作报告，强调划分阶级界限，命令“黑五类”自报身份。南达首先站起来报：“我爸爸陆铿是大右派。”跟着她的思维同学张小头、郭松宁等三人报。一个父亲是地主，一个父亲是资本家，一个父亲是反动军人。于是“红五类”喊：“老子英雄儿好汉”；“黑五类”喊：“老子反动儿混蛋。”然后同声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从初中到高中，所谓“听课闹革命”，一直闹到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南达才和一批同学下放到云南保山芒市和少数民族一起种田，苦累不说，即使发疟疾，第二天照样出工。插秧遇到蚂蟥，脚腿都生疮，打针时，傣族赤脚医生不消毒，结果屁股上烂了个大洞，天天往内塞纱布，后来整个臀部肿起来，才住进医院。她为了证明出身不好不等于劳动不好，拼命地干活，到年底所挣工分名列前茅，但算算钱，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公社的干部问她为什么苦，她说：“我苦了一年，挣得的才抵我妈一个月的工资。”

不过，老三经过农村的锻炼，变成了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到了美国以后，有了自由发展的天地，在经营事业中，展现了她为一般人所不及的才干，而且聚集了一定的财富；对妈妈和老五、老四一样，非常孝敬。我也鼓励他们，应当站在妈妈一边，反对爸爸。

老二（可信）从小不喜欢读书，加上爸爸是反革命，在学校里备受歧视，很怕上学，经常逃课，初中毕业时八科不及格，只有体育一科及格。想不到他和哥哥一起跟妈妈学牙科时，他的镶牙效果竟超过他母亲。“文革”后在北京医学院进修，很多高级医生和教授都找他镶牙。当在昆明被赶出医院后，两兄弟靠推板车帮补家用，累得腰常常直不起来，到现在事过

廿多年，脊椎犹带残疾。不过他经过十年摸索，坚忍奋发，终于找到一个回馈故里云南的途径，先后在丽江和大理两个风景区，以中外合资的方式，建好了两条登山观光索道，为丽江雪山和苍山洱海凭添了姿采。

他对家变情况，最初不大了解，后来略知梗概，对母亲的健康特别关心，经常和弟弟联系，强调："好好照顾妈妈，只要妈妈是好好的，别的都不重要。"

长子深责父，寄望回忆录

最后说到大儿子可望，从小就是一个"书迷"而且越读越深奥，到七岁时已能熟背很多古文，那时正逢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关在监狱里，为待决之囚，惜珍在神经特别紧张时，唯一能对话的孩子就是可望。他以七岁之年，竟能和妈妈讨论吉凶祸福。不论在小学,、中学都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因为父亲是反革命，不能入大学，后得跃入研究院，其过程已在〈三撞邓小平〉一章中提及。三年研究苦读，得硕士学位，到昆明医学院任教。并从事科学研究；在牙科材料发明上，获得突破，连续两次得发明奖及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证书"，成为自学成才的典范之一。并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这时北京和云梦都有记者要求访问，他因一贯埋头读书，不喜抛头露面，均加婉拒。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国全国青联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他被选为云南二十一名代表之一。其中十七名选自少数民族，汉族代表仅四名，因此他成了重点。与胡锦涛、刘延东、刘心武、张克非、贾平凹、吴英辅、陶斯亮、刘再复、刘晓庆、严家其、林丽芳等，共议一堂。他事后告诉我，从这些杰出人才的发言中，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一九八三年我和惜珍带着小孙子（可望子）大卫移民，成年子女不得随行。后来，美国一大学邀请可望讲学，美国移民当局则以有移民倾向拒绝发签证。直到一九八九年他才到达美国，因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医生执照，不得已投考德莱瓦（Delaware）的一家化学公司，竟获录取试用。试用三个月期间，他为这家公司创造了一项专利，转为正式化学师。他从未学过化学，是入公司后日夜自学苦读才掌握了理论。经过继续钻研，到九十年代初再度搞了一件发明，为这家公司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因而升为高级化学师。并提供头等机票两张和五星级饭店订房，让他携眷到夏威夷度假。

当我背叛他妈妈后，他来一信，第一句话："爸爸，因我仍然爱你故写此信。我理解也同情你的心情。但'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这种狂飙式的爱情，在你这个年龄是不可能持久的。请你引镜自照，七十衰翁，眼皮泡肿，油肚下垂，又有性格，崔女士绝不可能爱你超过半年。'愁发含霜白，衰颜寄酒红'。你想以一时的狂迷唤回青春，只是徒然。古人早有诗曰'酒伴衰颜只暂红'。如崔真如你形容的那八个字：善良、温柔、灵秀、通达，则你被踢出她家只会更早一点；若她老实忠厚一点，则你可能呆得略长几天。"

"你知道《百姓》因你的缘故，读者大降吗？你应发一声明，说自己无德无行，不配当《百姓》社长，自请辞去。免得爱护你的朋友如胡菊人先生难堪。'好死不如赖活'，你若被逐，请不要自杀。可闭门静思，把回忆录真实地写出来，才对得起仍然关爱你的人。"

"最后一章标题不准用'婚变'，既俗气又伤害妈妈和我们。因为这是你单方面的事。苏东坡嘲老翁娶少妇诗云：'一树梨花压海棠。'梨花指老翁之白发，海棠指少女之颊红，你可用'梨花海棠'作标题。幸早动笔，我与弟妹等当引颈以待。"

奇特的是，我读了这封儿子痛责老子的信，不但没有生气，反产生莫名其妙的喜悦，这种心理状态，恐怕只能请心理学大师杨国枢教授赐予分析。

八个女性的故事

●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宋·苏东坡（蝶恋花）

抗日先行李德馨

过了七十近八十岁，年逾古稀，回首前程，觉得自己做了不少错事，需要忏悔。比较突出的是男女情节。九十年代初，接受一位青年同业访问，他让我对一生作一自我评价，我毫无犹豫地说了八个字：新闻第一，女人第二。

从九岁起开始感觉喜欢异性，到近七十九岁，七十年来，和女性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自小就产生一种喜女心态，跟女孩子在一起，精神特别好，心里也觉得舒服。小时当然不懂这是什么缘故，慢慢长成了，尤其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懂得了这叫阶级烙印。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最盛时，祖父有六个太太，加上丫鬟、小姐当时是够热闹的。后来，家衰败了，人也四散了，大伯父因爱妾自杀离家出走，大伯母也由我父亲照料，大伯母有四个女儿，我自己有两个妹妹，到我懂事的时候，弟弟还小，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同辈接触的都是女孩儿。

进高小的那年，我十岁未满，老师编座位，偏巧将我编在两个女孩儿的中间。一叫李德馨，是一个城市居民的女儿；另一叫宋美幻，是襄阳有名的基督教堂宋牧师的女儿。他们对我都很好，我对他们，也像对自己的姊妹一样。渐渐地，我感觉不大对了，对李德馨产生了不同于姊妹的感情，究竟是什么，自己也弄不清楚，只是觉得喜欢，甚至多看几眼心里就感到舒服。于是主动和她接近。我的算术很糟，这注定了一生不愿和数学打交道，见了钱就嫌烦，穷了一辈子的根。李德馨总是主动帮我做算术题。国文课，老师叫试写作文，我第一次就写了两篇，一篇自己交，一篇供她抄。

地理课要画图，我就帮她画，画得比自己要交的作业还要完整，获得最高分。她当时讲了一句：“你这么会画地图，将来长大了可以做个旅行家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在欧洲做战地记者，东飞西飞，走南闯北，想起她这句话，觉得是一好兆头。

回忆我正式向她表示爱意的是小学毕业那年，我特意跑到她家，把天主教堂一位意大利神父给我的圣母玛利亚像，栓了一根黄丝带转送给她，还亲自替她挂在颈子上。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亲她一下。

升了中学，男女分部，接触少了，加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逼，青年人自然地进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状态，把注意力集中于国事、国运，讲恋爱的心情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到我进入高中，李德馨进入师范，只见过两面。她毕业前后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朝鲜义勇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就没有再和我联络了。彼此各奔前程，但因共同都以抗战的一代自诩，所想的都是如何报国。不是吹牛，约翰·甘乃迪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句名言，中国很多青年三十年代就实践了。李德馨就是其中佼佼者。

事隔三十年的一九六八年，关在昆明监狱的我，突然由一看守大兵打开了门，说了一声“外调”就被带到一个审讯室里去了。一进门，三个穿干部服装的一字排开坐在上面，指定

我坐在问案桌前的一个小凳子上，只听他们当中的一个以警告的声音说：“陆铿，你要老实一点。我们问你一个人，你要好好回答，不得有丝毫隐瞒。李德磬，你认识不认识？”

一听是河南口音，心想大概是河南来的了。

这对我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问题。谢谢来人把我引到三十年前的岁月，他们问的，不就是我开始懂点事的时候，喜欢的第一个女生吗？于是答：“认识。”不过加了一个“但”字，如果是个女的。

对方说：“谈谈你所知道的她的所有的情况吧！”

我于是讲了小学同班同学互相帮助做功课的情形：我对她产生了幼稚的爱的情形；但初中就分开了，同学不同班，因男女分部教育，很少见面，加之当年日本侵略日逼，青年人中自然产生抗日救国或者说救亡思想。李德磬参加了“朝鲜义勇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到抗战前线去了。就是这么多。

“外调”的人叫我再想一想，还有什么补充的。为了满足他们，我连李德磬和宋美幻及一些女同学花起妆来跳“葡萄仙子”，唱《可怜的秋香》都讲了，惹得他们一齐笑起来。

我趁机表示：“能不能问一声：‘德磬这些年担任什么工作？’”

他们互相咬了一下耳朵，其中似乎是带头的说：“你还关心她呵！她是被打倒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我被带回监房时，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统治真厉害，在其严密的统治下，任何人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且把每一个人的祖宗三代、四面八方的社会关系，都不惜工本的调查清楚。像李德磬和我，不过是小学的同班同学，他们竟不远数千里派上三个人从河南跑到云南来搞外调材料。这究竟有什么价值？像这样全国范围的兴师动众该糟蹋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啊？！

一九八五年我访问胡耀邦后曾到襄樊市一行，希望找到我母亲浅厝在真武庙中的棺木，并看看李德磬的父母。不幸，连真武庙都无踪影了，母亲的尸骨不知被抛在何方。李德磬的家也找不到了。幸而看到了我的表哥陈韬石和小表妹赵惠农（原名学筠）以及当年的同班同学王之铮，他们都是人民教师了。谈起李德磬，王之铮说：“解放后，她是河南省郑州市市长。襄阳同学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位。”

八十年代中，纽约华侨总商会理事长应行久宴请中国大陆来的客人，在座的记得有彭冲和河南省省长何竹康。我向他打听李德磬的下落，他说，文革后调到焦作煤矿去了。

但愿我混沌初开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子（现在如健在已经是八十老妪了）仍然健康地在黄河之畔中原胜地颐养天年！

和李乔芳的师生恋

一九三九年春，在故乡云南保山将祖母安葬后，我请人为我在她坟前照了一张像给父亲。在给父亲的信中说：“祖母落叶归根的心愿已了。我决定投奔抗战司令塔、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的重庆。唯一的愿望是投身于抗战大洪流中受到锻炼。”

我在保山县中的四个学生，四女一男：李乔芳、杨淑贤、张芝新和范邦杰听说我要走了，他们要求跟我同行离开保山，到外面去求学，见见世面。我当时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觉得集体结伴而行，很有意思，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遇到了好大的麻烦，造成了生平第一次遭到软禁。

我和四个学生走后，保山很快传出我拐带女学生私奔到消息。先是把姓范的男同学完全

抹煞不提，后来对另外两个女学生姓杨的和姓张的也不提了。范姓男生在昆报考防空学校获取，先行赴重庆。杨、张两女生到了昆明感觉不能适应，还是家乡好，又回到了保山。而决定继续跟我前进的只有李乔芳一人，于是传说集中到她的身上，说我在学校时就向她鼓吹共产党的一套东西，约她投奔延安。其根据是我在保山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团”用的是“救亡”而不是“救国”。

这里面除了李乔芳的伯父是保山大土豪，名震一方，树大招风外，很多人把我祖父当年携祖母出走的事，和我的出走联系了起来，说成是半世纪前“保山唐伯虎”诱美私奔一剧的重演。

李乔芳当时不足十六岁，初三毕业班的学生。进初中时即修短发着工人装，不照女子打扮，一副男孩子模样。平日喜读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书，思想上受邹韬奋的影响较深，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向往。我在教学时，因为表现了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被她误会为左倾进步青年，她对我有一定的好感，我对她只是觉得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没有料到，我们走后泛起的谣言，倒促使我们的感情进了一步。抵达昆明后，我和他们几个学生借住在昆明如意巷保山会馆里。李乔芳收到从保山家里和她的同学写来的信，绘声绘影，说我和她私奔如何如何，她把信拿给我看，说：“陆老师你看看这些信是怎么说的，我倒不在乎，不过拖累了你，心里过意不去。”我觉得小小年纪又这样的气度，很了不起，反而产生了几分佩服之情。但面对茫茫前途，不得不很郑重地向她表示，我本人是决定继续往重庆走，到重庆后有什么出路，一点把握没有。她如果决定到重庆读高中，当然也可以试一试，但思想上一定要做好艰难困苦的准备。李乔芳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到重庆。就在我们商谈的这天晚上，李乔芳的堂哥李光宗，一个云南部队的军官全副武装找上门来，一进门就打了我一记耳光，他警告：“姓陆的！如果你再约着乔芳一起走，被我们抓住，将打断你的狗腿。”乔芳当场与她的堂哥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强调是她自愿要跟我到重庆读书，不是我约她的。而且说，他们越这样逼迫，她越要跟我在一起。她堂哥狠狠看了她两眼，用鼻子哼了一声，气愤离去。

冲突发生的第二天早上，我和李乔芳搭乘了昆明到贵阳的汽车班车，离开了昆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的位子是分开的，她在前排，我在倒数第二排。开车之前，她发现了她的一个在国民党部队任中校参谋的姓丁的表哥也搭乘同一辆车，于是紧急地和我相约彼此当做不认识，等到出了云南境再说。

一上车，她表哥就发现了她，板起面孔问她到哪里去？她答到重庆读书。表哥再问：“有没有同行的？”她答：“没有。”丁向全车的旅客扫视了一下，他当然不认识我。于是说：“你就跟我走吧！”并跟同车的商量好，对掉了座位，两个坐在一排。不久，我注意听他们的对话，虽不够清楚，却听到她表哥连说了几声“姓陆的”，看来，他有所风闻，但未负有拦阻的任务。

东行至贵州盘县，已经出了云南地界，在一次停车午餐的时候，李乔芳突然当着她表哥丁参谋的面喊我：“陆老师！我给你介绍我表哥。”而且用一种多少带有挑战的口吻向丁说：“这就是你问起的陆老师！”丁当时的表情极为惊诧而尴尬，开始时定定地望着我，从他的脸色变化，可以看出似乎想发作，考虑的结果转为苦涩的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牙缝中迸出几个字：“呵！你就是陆老师！”

经过这一突破，从盘县到贵阳，再从贵阳进四川，在李乔芳的提议下，我们变成“三人行”了。白天吃饭、夜晚住旅社都在一起，表面相安无事，肚皮里各有打算。

在贵阳，我曾试图和她作肌肤之亲，结果被她技巧地拒绝，只互吻了一下。

直到有一天车子到了距重庆不远的綦江，车站上出现了十几个武装士兵，大约是一班人，

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的样子，我预感到会出问题。听到丁参谋告诉乔芳说："本地驻军的营长是你侯表哥，他要来请我们吃一餐饭。"我低声告诉乔芳说："可能会有意外。"李说："放心，我不会离开你。"

在吃饭的时候，侯营长详细地问了乔芳到重庆后的打算，特别问："四叔（即乔芳之父）是否同意你远离家乡？"又问了我的情况，我如实回答。等到午饭过后，回到车站，站长准备照拂乘客上车，这时候，侯营长发出了命令："把姓陆的行李拿下来！"李乔芳问："为什么？"侯说："要把他留在这里住几天。"李的反应很快，马上向爬到车顶解行李的车站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皮箱说："请把我的那个箱子也接下来。"侯营长问："你不是要赶到重庆念书吗？"李非常镇定地说："我要跟陆老师一起走。"侯也许见到李表现的解决的态度，不愿公开放作，说："好吧！一起拿下来。"接着与丁附耳商量了几句，丁乘车走了。我们被侯营长带到他的营部，他叫来他的副官板起面孔说："你把这位陆老师领到你的房间里去照拂他食住，不要随便走动。"副官立正答："是！"侯随即就向乔芳说："去看看你表嫂吧！"一面说，一面领着他的这位表妹、我的学生进入内层。

过了不到一刻钟，侯营长在营长室找我去谈话，他明确地说，他和丁参谋认为我行迹可疑，是否有拐逃他们的表妹李乔芳的情况，需要调查了解；现在他们决定打电报到保山蒲缥去问乔芳的父亲，听听老人家的意见。在蒲缥回电前，我只有暂时在他的营部休息休息。我的生活有他的副官照料，非经他批准，不得随便走动，也不得对外通讯。我要求看点书，他眉头一皱，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三民主义》递给我说："好好读一读《三民主义》吧！"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失去了自由，无可奈何地死啃《三民主义》度日。

我被禁闭是一九三九年阴历四月初五的事，知道当年的阴历端午节清晨，我被通知准备参加被綦江士绅称为"本地最高军事长官"侯营长的端午宴会，并观看城郊江上的龙舟竞赛。侯营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完全不知。是祸是福？一片茫然。我提出在赴宴前要先见李乔芳一面。

乔芳从后堂来到我辈禁闭的副官室，告诉了我过去一个月的故事，原来丁参谋是一个比较有知识的军官，他虽然片段地听说姓陆的老师拐逃了县中的女生，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表妹，但当听了乔芳的陈述以及见了我本人后，他觉得事实也许不像传说的那样恶劣。因此，决定到綦江后跟另一位老表侯营长商量再作道理。他们经过交换意见，决定把我扣留下来，然后致电并写信到蒲缥给乔芳的父亲征求意见。结果，乔芳父回覆说："首先要问乔芳对陆老师的态度如何？然后再问陆老师对乔芳的态度如何，如果两厢情愿，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意见。"乔芳希望我在午宴前向他表兄表嫂表个态。

乔芳的话刚刚说完，侯营长面带笑容地请我后堂去坐。后堂客厅之大，反映了四川有钱人的气派，家具全是楠木雕花的。乔芳指着侯营长太太介绍说："这是表嫂！"我欠身点头为礼，她满面春风地说："请坐。"我一坐下就说：我到重庆的目的是参加抗战。对于婚姻的事，确未考虑。对于引起家乡的流言，感到歉然。但一路来对乔芳所表现的情义和勇气，我很佩服。我应很坦诚地表示我欣赏她、喜欢她。侯营长的夫人开腔："陆老师，直话直说吧，乔芳这次跟你从家乡出来，闹得满城风雨，不管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我们四叔、乔芳的父亲考虑，事已至此，只能促成你们的姻缘，乔芳已没有可能再许配给别人了。她已明白地跟我们说过，她是很喜欢陆老师的；既然你也说喜欢她，那今天的端午宴会就作为你们的订婚喜宴吧！"

我问侯营长什么时候放我们走？他说："你要走，今天下午就有车开赴重庆。"于是，经过宴会的祝酒，我和李乔芳跟随侯氏夫妇草草观看龙舟竞渡以后，便以未婚夫妻的身份踏上了赴重庆的旅程。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失去自由的痛苦和恢复自由的喜悦。

到重庆后，乔芳考入了重庆南岸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并住宿于该校；我则住进了重庆珊瑚坝飞机场附近的一家鸡毛店中。领略“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风味。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报纸的招考广告，想先谋到个职业再说，就如我在前面〈当兵走上新闻路〉一章所述，阴错阳差地考进了中央政校，而且大大得力于綦江软禁苦读《三民主义》，这一门得了最高分。

不过，李乔芳对于我进政校非常不满。在她眼中，我是个进步青年教师，怎么会投到国民党极右派的黑窟里去了。她板起面孔告诉我，国民党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她忘了她本人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又说，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她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视人民如粪土。她强调一个是腐朽的力量，一个是新生的力量，质问我为什么就腐朽而弃新生？我问她这一套论点，是从哪里听来的？到重庆后是不是与共产党有了接触？她说，没有，不过，对我的选择很失望。人各有志，让我当我的“天子门生”，她决定回云南去了。

我告诉她，如果想去延安，可以到化龙桥红岩嘴中共办事处联系或者写信到新华日报社联系，都是渠道。她问我：“你为什么不联系？”我说：“好不容易有学新闻的机会，我又盼望做记者，现在能去南温泉学新闻，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我已决定了走新闻路。”

李乔芳表现的很干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希望你保重，我们就再见了。”当握别时，她忽然从口袋了掏出一些钞票，说：“这是家里刚寄到的，陆老师，你拿一点去用吧！”

我告诉她，政校不但管吃、管住，还管穿，按季节发给制服，另外每月还有二元零花钱。加上，今后学习生活安定了，我继续给《仰光日报》些通讯，也有收入，请她不必为我的经济情况担心。倒是对自己多多珍重！我建议她好好读读书，争取考大学。不管革命也好，报国也好，多读些书，多有些学问、本事，当可享到充实之乐。

令我佩服的是，在她跟我告别说再见时，既没有儿女情长之态，也没有英雄气短之怨。最后一句话是：“陆老师，我会走一条上进的路，请放心！请保重！”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从香港回到昆明，在离昆明赴日前夕，从一个保山老乡处听到了李乔芳的消息。她一九三九年从重庆回到云南后，考上了当时自武汉迁到大理的华中大学。在华中大学森林系毕业后，留校教书。后来一直在大学里教授森林学。但她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的是一根冲天的大树、一个永远的时代女性的印象。

短发、大眼、厚嘴唇，不施脂粉，长年穿一件衣连裤有两根背带的工人装，在她思想里，全世界最伟大的就是工人。她以后是否参加共产党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她是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

政校校花张淑宝

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设在重庆小温泉，专修部和一个学院设在南温泉。专修部除我所在的新闻事业专修班外，还有会计专修科和地政专修科。会计科不少女同学，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就是苏州姑娘张淑宝。

淑宝出身于首都名校南京女中，气质很好，说得一口标准国语。英文有一定基础，中文字也写得不错。生来一双带有魅力的眼睛，五官匀称，身材适中，最具吸引力的是面貌给人以甜的感觉。更难得的是举止开朗大方，从不扭捏作态。当时跟我和乐恕人很合的来，就读于新闻系第九期的毛树清，对张淑宝有一句评语：“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可以带到国际外交场合去为中国人争光。”因而鼓励我说：“陆铿，好好追吧！”

树清不仅为我打气，还自愿做我的“义务情报员”。比如在外交系第九期就读的张乃维，后在台湾外交部任职，官至驻美大使馆公使，当时对张淑宝展开了攻势，被不少同学看好；树清就及时提供“第一手情报”给我。

小温泉到南温泉之间有一条水道名叫花溪，既可览峭壁之胜，又可赏瀑布之美，一如唐朝大诗人王维的诗所描绘的：“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啼鸟忽临涧，归云时抱峰。”在这青山招手、绿水逗人的情境中，我约张淑宝作了我生平第一次长达一公里的与女性漫步。

我这个人生来对风景不感兴趣。在这里顺便举一个例，一九四五年我和树清同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入冬到瑞士休假，欣赏为世界旅游者所赞美的天下奇景。我看后，第一个反应竟是：“这没有什么嘛！”把树清气得大骂：“陆大声呀！你简直不可救药！亏你说得出口‘没有什么’，我问你，究竟要怎样才算有什么？”

对于世人公认的最美的“世界公园”我都不感兴趣，“花溪漫步”，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山水皆有情”的情致。因此，和张淑宝的对话，可以想见，也是干巴巴的。主要是了解她的情况，一如新闻采访，甚至像审讯，当时对于被采访者说来，可以说无趣之至。

就在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花溪漫步”不久，张乃维与张淑宝的“花溪漫步”跟着出现了。我估计未来的外交家一定比未来的记者要会制造气氛一些，承认自己第一个回合就输了。

在乐恕人和毛树清卖力打边鼓的策划下，我出面邀约张淑宝和我们一起在花溪荡舟，坐乘小船之游。这一次气氛比起漫步要活泼得多了。恕人吟了诗；树清讲了国际笑话；我和淑宝都唱了歌。我把一九三七年参加光未然（张光年）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团”学到的歌，一齐献出来。从淑宝的反应看，她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也许是荡舟唱歌受了风寒，入夜大咳起来，第二天告诉淑宝；她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止咳丸，不声不响递给了我。

对我的追求攻势一直有兴趣的一位同班的诗人胡肇封，不仅鼓励我加油，而且，因为张乃维的加入竞逐，竟把它提高到新闻与外交的争战。当时，张淑宝已成为未经选举却被公认的“校花”。学新闻的当然希望此花为新闻人所有，胡得悉淑宝因咳嗽而送药时，即时成诗一首，美化其事。今事隔五十四年，只记得最后一句为：“玉人偷送止咳丸。”

抗战时期的重庆，每年都举行六大学中英文讲演比赛。一九四 0 年的六大学讲演比赛，淑宝代表政校夺去了冠军。讲演稿是由我和恕人共同操刀帮助她写成的。

“形势比人强”，这是很多人都承认的一句名言。中国处于全民抗日之期，空军英雄受到举国人民的敬爱，是极为自然而合情合理的事。就在政校同学关注淑宝动向、议论花落谁家之际，南温泉仙女洞忽然飞将军从天而降。一个名叫杨涌涛的空军飞行员，身穿极为神气的空军皮夹克来会晤张淑宝了。当淑宝和她双双从学校走出到南温泉街市前，老天突然下起小雨来，但见杨涌潮敞开夹克，把淑宝一裹而去。胡肇封看见了站在校门口发呆的我，不胜同情，乃成诗一首，这首诗因记载着我的惨败，刺激较深，所以事隔半个世纪，记忆犹新：

寄情盈盈一水间，花溪漫步似云烟，伫立校门为底事，飞将白羽裹婵娟。

原来，美人跟英雄跑了。

离开学校以后，和淑宝仍保持同学的情谊，未断来往。并认识了淑宝的妈妈和姐姐淑华、姐夫王乃栋一家人。渐渐地恕人和我同她还发展成兄妹之谊。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和杨惜珍结婚，她也参加了婚礼。

世事难料，她同年十二月结婚的对象，不是杨涌涛，而变成了于演存。演存是杨的空军战友也是好朋友，在杨和淑宝的恋爱过程中，他偶尔扮演“电灯泡”的角色。姻缘姻缘，无缘不成姻。最后于、张联姻，组织了和谐的家庭。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三日我随于右老离开南京到了上海，专门去看望淑宝，彼此谈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与工作。她对我十年奋斗表示了极大的肯定，而对她自己则不大满意。我指出，以她的聪明智慧，将来在事业上必然会取得较大的成就。彼此都产生了此去不知何日再相逢的离愁别绪。

一九八一年，事隔三十二年，我到华府去看望好友程淑德，得悉淑宝早已于一九六八年考进世界银行，并且做得很出色，感到极大的欣慰。我们三人在世界银行餐厅话旧，正如杜甫所说："交情老更亲"。对于淑宝已经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深深感谢上帝的拣选。

最有趣的故事是，淑宝因讲的一口标准国语，六十年代初，先经日本广播公司延揽做播音员，后经《美国之音》(VOA)西贡电台聘请为主播，她除了综合各大通讯的新闻，还亲自采访，及时报导了战火中越南的动态，受到国际传播界的重视，甚至被评价超过 BBC 的同类节目。

越战结束，淑宝到了美国，要求回《美国之音》总部工作，不料以非美国公民又无绿卡而被拒，于是转而投效世界银行。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廿二年后她的聪明的女儿于玢(Betty Yu)竟做到《美国之音》总部中文部主任，不仅为妈妈、也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二日星云大师在洛杉矶西来寺为我做七十寿。淑宝和她先生双双参加祝贺。我当场宣布：今天在座的，既有我生平追求的第一个女朋友（指张淑宝），也有最后一个女朋友（指崔蓉芝）。但见淑宝微微一笑，还是半世纪前那样大大方方。

带山野气息的云南姑娘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率领"首都记者团"访问山西，到太原后没有三天，阎锡山先生交给我一份电报，是傅作义将军从北京发来请他的老上司传给我的，内容是盼望首都记者团访问山西后，能转道平、津一行。阎先生交电报时，顺口说了一句："不妨去看看。傅宜生（傅作义的号）支撑那个局面也不容易。"

全团的朋友听到应邀访平、津，大家都很高兴。于是在五月下旬结束山西行后，就由太原飞北平。北平市长何思源和天津市长杜建时双双到机场欢迎。傅作义将军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首都记者团访平津成了当时平津的大新闻。当记者团访问北平后，转道天津，又从天津转回北平时，平津铁路局局长石志仁不仅为我们挂了专列，他还亲自陪同返平。

当专列开动之前，石局长来跟我说，有一位女士有急事要自天津赶回北平，要求搭乘我们的专列，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石局长未免太客气了，车是你安排的，你是主人，我们只是客人，一切当然有你作主。"

鸣笛前，上来一位中等身材、盛装的女士，坐在同一车厢里的最后一排。我当时忙着跟全团的朋友交换下一步访问的日程，没有怎么注意这位同行客。

过了一下，李蔚荣、漆敬尧两位老弟双双告诉我说，跟我们同行的那位小姐是你的云南同乡。

当我们知道她是云南人时，告诉她说我们的团长就是云南人。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你们不要骗我了。云南人，莫说当团长，能够在这种团里当个团员就不错了。"因此，蔚荣和敬尧建议我不妨去和她聊几句，给她一点满足感。

我被他们这么一说，在火车快抵达北平前，特别去到后座和这位云南小姐打个招呼，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一定的山野气，这大概是我们云南人的共同点。人长得相当漂亮，说话却不加修饰，有什么说什么。从她的自我介绍，我知道她出身于云南世家，属上层社会。她姐夫的长辈在抗日战争前，投资北平一家钱庄，抗日战争发生，就认为这一笔钱白送了。谁

也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竟得到北平方面的通知，说有一大笔钱等待他们去认领。原来这钱庄经过八年经营，资本已有很大积累，叫他们派人到北平接受应得的财产，包括位于东四的一座王府。她现在就住在这座王府里。听来犹如“天方夜谭”。

到我们同时走出车站时，看到来接她的轿车，果然比傅作义派来接我们的轿车要新得多。她力邀我和她同车而行，先到她住处坐坐，认认门，然后再回北京饭店，强调云南同乡在万里之外相逢，太不容易。我考虑到身为领队，脱队而去不太好，故婉谢而别。

没有想到，这位小姐是在太热情，我回到北京饭店不到半个钟头，她竟翩然而至，穿了比火车上还要漂亮的衣服，开口就问：“欢迎不欢迎？”当我张开双臂表示欢迎时，她竟然像一团火球扑向我身，不满廿九岁的我，当然任其燃烧。

事后回想这种似乎疯狂的状态，只有在欧洲做战地记者时才有。当时，我和毛树清到了战后普遍陷于饥饿的欧洲，道德沦丧，人欲横流，面对青春的诱惑，差不多每到一个国家，都要留下一个征服的记录才满足地离去。

北平回到南京后，这位小姐的电话就追踪而至。从此，不论是到上海，到广州，到香港，最后到昆明，一片动乱的岁月，这根在平津专列上架起的线却始终未断。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昆明，这位小姐为了欢迎我到春城，把她的众姊妹全都聚集起来。最特别的是她的曾经留法的姊姊，更具有连在欧洲都少有的进攻性，这位浑身充满巴黎情调的小姐，家宴时带头大杯饮酒，酒后发表谈话，说什么陆大声具有“四大美点”：体格美，风度美，言谈美，举止美。唯有一点不够美，就是胆子不够大，不敢迎接她的挑战；令众姐妹一齐为她的大胆而傻眼。

事实上，我当时是被她们称呼的“嫂嫂”所吸引，这是一位面带微笑、素质高雅的小姐。说话不多，而从眸子流光中，呈现一种含蓄的美。她先生留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滞留法国未归，且已另结法国新欢。她见到我这个曾以巴黎为活动中心的记者，难免产生“深闺梦里人”的联想。

过了两天，这位美女在她娘家的豪宅请我赴宴。陪客除原来已见过面的姊妹群外，还增加了她的几位亲妹妹，从八妹到十一妹，当我身临曾是云南省长私邸的大院，面对亭台楼阁园林之胜，不得不对自己原来错估家乡封建落后的观念，暗暗作了自我批评。试想，一个嫁出去的姑娘，当丈夫还在国外，而能在娘家大摆筵席，请一位陌生的男性客人，这真是够进步的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主人没有表现半点羞涩，而是落落大方。

当我情不自禁地问：“怎么弄这么大的 party？”对方非常潇洒地答说：“因为 I like you!”我的反应不是受宠若惊，而是云南了不起！

事隔不过三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我在东京得到卢汉投共、云南易帜的消息。首先投进我脑海的不是巨变，而是两个月前在昆明的遭遇，云南人面临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还是那么沉得住气。整个社会没有半点惊慌。

后来，知道蒋老先生在台湾提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号召，我即时的反应是：真正处变不惊的，应当首推云南人，特别是云南的女性，像高黎贡山样的直逼蓝天，俯视怒江，产生像“滇池睡美人”和“阿诗玛”那样脍炙人口的故事。

富士山的积雪化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从一九四七年二月参加中国记者赴日团首次赴日，五月在南京出版《麦帅治下的日韩》一书，迄今足足半个世纪，前后十游日本。回溯以往半个世纪与日本的交道，除了结识很多男士如元老记者吉田实等外，也接触了不少日本女士，正如旅居日本

半世纪的老友郑炜显兄说的："陆大声是多情却被无情恼"。

我初到东京，看到战后的日本女性，对于她们应对男士的态度，一方面欣赏她们的谦和有礼，另一方面对她们所表示的过度恭敬，感到有点不能适应。

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历劫后，应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邀赴东京小住，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和石凤翔、刘纪文两位先生被接待在代表团迎宾馆中，伺候的下女成群，身为贵宾，自不能放肆。

继后迁往东京新闻街"外国记者俱乐部"，世界各国记者住在一起。那是一个既有严肃的工作，又可放浪形骸的地方。那时的日本，仍是在麦帅旗下的美军占领中，眼见日本国民饱受亡国之痛，处处发挥"用忍"功力，并无同情之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饱受日本侵略之苦，因此，对日本女性，只有性而无情，更不要说爱了。

有时，在卿卿我我之余，竟然会想起南京大屠杀来，因而产生一种复仇的冲动，这是多么煞风景的事！事后想想，完全是一种可鄙的心理状态，怎么可以把善良的日本姑娘和搞杀人竞赛为乐的"皇军"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呢？虽然他们同是日本人，但却有善恶之分；中国人还不是有善有恶吗？

直到我要求崔万秋老大哥介绍女朋友，情况才有了变化。万秋大哥是"日本通"，我们一起访日不久，他就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顾问。为人风流倜傥，曾和毛姬江青有一段情缘。崔大嫂张君惠，我还在一九四０年重庆巴县中学就认识她，为人明智开朗，通达世情深切了解我们这些"臭男人"的毛病，见怪不怪。

崔大哥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为我介绍了一位风度高雅，且有见解的小姐。他叮嘱我说："大声，我给你介绍的这位小姐，不同流俗。她父亲曾任日本文部大臣。这位小姐是独生女，称得上父亲的掌上明珠。她受了完整的教育，在教会大学毕业。你决不可像对待一般日本女子那样地对待她。"

这位小姐长得不算美丽，但很像我生平喜欢的第一个女孩李德馨，给我以温婉的印象。特别是她穿起黑色的晚礼服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参加舞会时，呈现了高贵的仪态。

本来，我和这位日本小姐是不谈政治的，但有一次在友谊温馨的情况下，她主动问起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我答："不好。"见她流露出非常惊讶的神色，我赶紧补了一句："excepet women"她马上正色地问："是不是日本女人在性欲上使你得到了满足？"我当时只好坦诚：日本侵略军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大屠杀，杀了近三十万中国人。以后又在中国的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给中国人的伤害太重了，印象太深了，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这位小姐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情况。历史的错误不能纠缠，日本人应当为侵略中国向中国人道歉，承担罪责。中国人、尤其想你做记者的，应当把侵略者和普通日本老百姓分开。"接着她给我一个亲吻。我感到释然。

事后回想：是不是为她文部大臣小姐的身份所惑，在一种势力的心理下投降？再思，并非这种情况。借一句宋人的词："门第敢言非道蕴，才情端喜是芳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一天，在东京听到这位小姐母亲的寿辰将届，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并与朱将军说好借一部车首悬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轿车（这也是一种值得忏悔的可鄙心态），到新宿她家去拜寿。她最初的反应很高兴，后经考虑，婉言谢绝。不过，她当时说了一句到今天事隔近半个世纪我还记得的意义深长的话：

"富士山的积雪化了!"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因云南于十二月九日易帜，我了接家眷到日本，我匆匆飞返昆明，对所有在日本的朋友老说是一去杳无音信。经中国大陆雪藏近三十年后，一九八 0 年重临睽违一个世代的东京，打听这位小姐，已经不知所终。每每看到富士山的积雪，都有一点怅然若失之感。唯一能做的就是衷心为她祝福！

天天天蓝卓以玉

《天天天蓝》是八十年代风靡台湾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执教于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DSU）已廿余年的卓以玉写的。她除教授中文、绘画之外，还写歌、写诗，并设计制造现代首饰和家具，称得上多才多艺，当然最被看重的是她画的画。她在艺文方面的成就，追根溯源来自书香世第，祖父卓君庸，燕京、北大教授，是以“章草”闻名的书法家。

我因年轻时结交了摩尔根派的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一直认定遗传因子对人影响很大；但我更信后天的努力和师承。卓以玉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位华裔女性美国国家文艺委员会委员，与建筑大师贝聿铭并列荣誉榜上，并在圣地亚哥加大获杰出教授奖，从上千教授中脱颖而出，除本人力争上游，我认为许芥昱生前对她的帮助，怎么估计也不过份。卓以玉在旧金山的“居雾楼”，实际是芥昱对她传道授业、心灵交流之所。而〈天天天蓝〉就是她为许芥昱写的。

许芥昱教授一九八二年一月四日，因加州豪雨成灾山泥倾泄而罹难。

白先勇追思许的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我认识许芥昱完全是卓以玉的关系。”刚好相反，我认识卓以玉完全是许芥昱的关系。一九七八年我在大陆冰封近卅载后得赴香港，八一年重访美国。芥昱因菊人的关系邀我到旧金山州立大学演讲，一见如故。他写过《周恩来传》，便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从中国改革看毛、周、邓。就在这次演讲中，芥昱介绍我认识了卓以玉。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婉大方，亲切热情。

芥昱逝世后，以玉给我和菊人的第一任务，是设法把许的遗著《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设法在香港出版，承波文书局之助，这本书终于一九八三年初问世。她来信说：“《闻一多》这本书，如果没有您和菊人帮忙，大概永远没有机会问世。”接着她提出另一要求：“很高兴您还喜欢这书，不知您有空能为这书写一短介否？看了您的介绍，也许人家会对这书感兴趣。”我当然遵命办理。当她的画册出版时，叫我和夏志清、唐德刚为她各写一篇序，我对印象派作品一窍不通，在被迫交卷时只好不写画而写人：〈卓越在何处〉。

我这人一生最重友谊。对于有些人“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两丢开。”很反感。而对于卓以玉在许芥昱死后，全力以赴整理他的遗著，不惜碰壁、到处托人要把遗著出版，这种精神，突显了做人的道义。《史记》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就在她为许芥昱的遗著和纪念册操心的时候，恰巧遇着我为好友李荆荪的千古奇冤，写文章谴责台湾的特务头子沈之岳等制造冤案。她不但赞美我的大声疾呼，而且利用到台湾开画展的机会去拜侯荆荪夫人，致以慰问之礼。

我和以玉交友的过程中，发现她有几个特点。首先，她很中国化，教书也是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己任。遇有盛会，她多半穿滚边的中国旗袍出席；当她得到圣地亚哥加大最高学术奖时，自称一生有九个恩师，还敬邀在世的恩师祖炳民、林云等上台接受她的叩头礼，这可以说是中国化过了头。

其次，毅力很强。她在大学四年级时结婚生子，为了养育子女，暂停学业，一停十年，到孩子上学，又重拾书本，一口气完成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直到大学任教，这在一般人是

很难做到的。平日也是，要做的事就全力以赴，譬如为了她的英文诗集《千年松》的中译，曾邀我利用周末，住到她家去，挑灯夜战。

其三，女人味浓，白先勇称她是“我最喜欢的女人。”我从和她接触中，发现她虽身躯硕大，但心细如发。不论是处理日常生活或进行大笔作画，都赋予音乐的节奏，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当应邀到她家作客时 ，她从座位的舒适到枕头的高低，都注意到，深感女主人的无微不至。

其四，“给人喜欢”是星云大师的名言之一。而以玉的生活表现即给人欢喜，比如当她接到我寄的一张照片时，及时回信说：“你白毛衣里红衬衫很美，是芥昱喜欢的颜色。”针对我信中流露的“忙”的压力，她引用她祖母的话说：“忙是好景。到度日如年时，就糟了！我为你的忙而高兴。”她知道我喜欢唱歌，便主动叫我唱〔天天天蓝〕和〔相思已是不曾閒〕。

一九八四年四月她陪我采访洛杉矶奥运，与每个中国运动员接触时，都做到了给人欢喜。像女排队长张蓉芳和主力队员郎平都反映说，跟卓教授谈话是一种享受。

其五，她随林云信奉密宗黑教，信到迷的程度。比如家里的桌椅和床位的摆设都有一定的方向。室内陈设镜子、门前装设风铃等等，这从风水的角度看，未可厚非。但平日上街，皮包里都放着一些米粒，遇到花圃和草丛，总喜欢撒上一把；对我来说，就不可思议了。当然这不影响彼此的沟通，而她基于友谊，对我的直言从不为忤，我坦率地告诉她对印象派的画作不敢恭维，因为看不懂。她就建议我到她画室挑选一张看得懂的。有一次她指着题为〈偶然〉的一幅，画面上呈现两片云，似是夕阳西下的写照，我终于有了美的印象。她解释说反映的是徐志摩的诗：“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并补充说：“偶然的相聚，或许会迸发光芒，但情缘尽了，就各奔东西了。”这是何等的潇洒！

“珍重!”是她跟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辞。

如友如母如师的巾帼英雄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是我和杨惜珍医生在重庆嘉陵江宾馆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

就在结婚大典举行的前一天，报纸上刊出陆铿、杨惜珍结婚广告，征婚人请了于右任先生，介绍人是孙伏园和马星野两位名士。

谁也不会想到，第二天就要做新郎的我，却约了年龄和新娘一样大，教育程度和新娘一样高，从外形看美丽虽不及新娘、惟气质高雅则毫无逊色的一位小姐，在嘉陵江畔牛角码头斜坡上相拥着说了足足一夜，正如屈原〈九歌〉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的话。

这听起来极其荒唐，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在回忆这段锥心泣血的故事之前，需要向读者道歉，就是这位女士虽然已经魂归离恨天，但她丈夫也是我所尊敬的朋友。诚然，他晚于其夫人四十二年才认识我。我基于敬爱死者，绝不愿给她所爱的生者带去任何不快。

我应该坦诚，我和这位女士的恋爱，由于她的圣洁、冷静和大智慧，自始至终只属于精神层面，在身体接触上最多限于拥吻。而作为丈夫，将心比心，如果妻子在爱自己之外还曾爱过另一男士，那怕限于属灵范畴，且是昙花一现，但从东方人的老旧观点看，即使豁达大度，仍然难免耿耿，因此恕我不提姓名。

我和这位女士是在政校参加李抱忱领导、指挥的合唱团认识的。当时，重庆各大学在演讲比赛之外，还有歌咏比赛，每年举行，她的歌唱的虽非特别好，但在我听来，也是够婉转动人的。

更重要的，她的为人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和基督教文化结合于一身，端庄娴静，

诚厚笃实，和蔼温婉，而富识见，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女孩子可爱”。但因当时已选择了追求对象，也只止于可爱而已。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工作，她的工作地点为近在咫尺的两路口，遇着广播大厦演出好的节目，偶尔请她来看。由于我是个工作狂，加之，正和杨惜珍谈恋爱，连写情书的时间都很紧，实在很难抽出时间和她约会。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而我那时做助理编辑、广播记者，每月工资八十法币，仅仅够吃伙食、买邮票。连约朋友吃一餐饭的钱都没有。实践证明，讲恋爱也是要有经济基础的，你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的名言谠论。

四十年代初，我们一大堆青年相聚时，她是大家的“核心”，而共同的最高消费，只是四川橘柑和重庆磁器口花生米，香、脆、小，味道好，反正抗战期间，精神胜于物质，所以其乐融融。在谈天说地中，她展现的识见，令人佩服。比如，议论起政校的教育，她一语道破，这只是一个准备培养政治行政人员的学校，而不是培养政治家。她还带开玩笑地拿我举例，“陆铿为什么有点开创和反叛精神呢？因为他在政校只蹲了一年，如果是四年，就不行了。”引起一阵哄笑，嘉陵江畔夜话时，我请她对我作一个评估，她说，你这个人是越艰苦越能发挥才干，你的生命是在挫折中发展，缺点是用情不专，这也是性格使然、无可奈何的事。幸而你还怀抱着对社会的使命感，所以事业比婚姻美满。

我问她怎么看出来的？她说，从她母亲生病住院，我去陪她照护母亲，竟能坐在医院的窗台上睡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醒来，精神百倍，就看得出来。再从和杨惜珍结婚，也看得出来，只因婚前有孕，你就要无愧于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敢做敢当，毅然结婚。她特别声明，决不是鼓励我先乱后弃，不负责任，而是应我出的题目，说出她的想法。

在我结婚的当天，忙得头昏脑胀。直到晚间婚宴结束，和新娘子双双站在嘉陵江宾馆大门口送客，对来宾一一握手致谢。那知突然眼前一亮，一袭金黄色旗袍显露在我的面前，而且手也有点被握得有点痛，原来是轮着这位敬爱的小姐道别了，一切尽不在言中。

原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过彼此喜欢的颜色，她是金黄，我是大红。

自那以后，彼此都是：“从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一别就是一个世代（generation），三十多近四十年不见。

我回顾坐牢的岁月，除了身受折磨，心受创伤之外，也有一个好处，尤其是单独监禁之时，因为被规定不准做任何事，也不可能做任何事，只有回忆与忏悔。最奇妙的是连少覆一封信都记得起来。像对这位女友的亏负，自然是忏悔的重点之一了。

总的感觉是我亏负了她对我的情义。

当时，就下定一个决心，只有有一天能活着出狱，不论天涯海角，都要找到这位小姐，当面向她忏悔，明确地跟她说，我在监牢中虽然多次处于生不如死的境地，最终终于拒绝死亡、绝不考虑自杀的动力之一，即要向她当面说：“对不起，我亏负了你对我的情义！”

“有志者事竟成。”一九八一年冬，我终于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里找到了她。

通过电话联系，我儿子的朋友彭志学、一个杰出的年轻人开车把我送到她家的门口，她竟心领神会地身着家居便装出现，不饰脂粉，一切都很自然，看着我快步走上台阶，然后，她很自然地让我立在她的右侧，用她的右手轻轻拍着我的腰部，两人并肩而立，望着台阶下面正在挥手祝福和告别的年轻志愿司机说：“谢谢你送他来。”（Thank you for taking him here）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监牢中设想了将近十几种跟她重逢的镜头，包括拥抱、握手、吻手、吻额、吻颈、吻发、甚至亲嘴，双手把她整个人抱起来，就是没有想到她这一着，如此自然，如此亲切，如此大方，如此高贵。既像欢迎老友重逢，又像母亲迎接孩子归来。而且是那样地神妙，并非事先设计，正如宋人晏殊〈浣溪沙〉所咏的“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实在是真、善、美的集中表现。

一别三十多年，她竟成了中国文人画家。难怪，艺术家的思想境界，是要比一般人高大的多的。

我从她客厅的陈设中，发现了她的画作。淡雅中给人一种宁静，而这正是我缺乏的。她看我对着她的画发呆。风趣地问：

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看画的？

我们彼此介绍了情况，特别是家庭情况。

她只给我看了她和她先生及孩子的相片，我已经是久仰她先生的大名了，从她口中很进一步了解，她先生不但是值得尊重的学者，也是值得敬重的丈夫，先生对她非常好。不仅相敬如宾，而且相爱极深。至于他们的孩子，只是两句话就可以概括：接受的完整的教育，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成了我做好的朋友（She is my best friend）。

我把我随身带的家人照片给她看，她的反应是：从照片看，惜珍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很多。你们俩都挺好。五个孩子各个有成，日后，你一定是很快慰而感到骄傲的，在这一个丰满的家庭里，辛苦最多最大的是杨惜珍 She has a golden heart toward you!

自此拜访以后，我们就保持联系，遇着到华府，总要抽时间看看她。有一次她还开车送我去采访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她估计谈话不会超过一小时，决定就在汽车里等我，没有想到柴泽民兴致很高，访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我为她等而着急，她反而为我的访问有了超预期的收获而高兴。她就是这样一位善于为对方着想的人。

有一次，我从纽约到华盛顿看她，并感谢她不时从《华盛顿邮报》上剪寄对我有教益的文章帮助我认识世界。她对《百姓》半月刊很有兴趣。称赞“《百姓》办的很活泼又现代化。”承认她对香港了解很少，还是阅读《百姓》才对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约一事有个概念。为了回答她为什么香港回归中国明明是好事，香港人却认为“大限”？成了两人对话的主题。她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谈话延长到夜晚十点以后，意犹未尽，但时间已晚。我征询她的意见，是否把问题讨论告一段落，我就在他们客房里休息？她严肃的说：“不行，我送你回旅馆。”原因是她先生因公去了中国大陆。

从这件事，说明了她对中国的传统道德和基督教文明的自重，是身体力行的。

在我们海外重逢四年时间里，她在通信中一直对我表示了有如老师对学生的期许和母亲对儿子的叮咛。当然主调还是友谊的关切和温馨。

这里，举两个例：

我无论走到那儿，遇到什么人，当这个人向我述说他过去的坎坷，或是痛斥十年浩劫受的苦楚、绝望……我一面倾神的听下去收受他忿怒的表情，到最后，每次我都对自己说“没有陆铿受的苦多”。（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我要是你，知道每星期一有三小时舟车的往返，二小时讲课（指在中大叫《采访学》）我一定要有一个丰富的早餐，鸡蛋、牛奶、面包或其他谷物食品，冲在牛奶中，精神可维持到下午一点钟。

上课时间过于长，就让学生做一件事，你自己坐在那儿休息休息，不讲话，也不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请看，她不仅教我养生，还教我教书，这是母亲和教师的情怀，人间难逢难遇。

我本是一个基督徒，但对天国之说，信仰却不坚定，通过回忆、忏悔，倒真的盼望天国出现，因为在那里，我可以见到我的祖母、母亲、妹妹和很多思念、亏欠和敬佩的长者和朋友，如于右任、徐永昌、赵敏恒、马星野、董显光、李荆荪、李广平、关鹡鸰、朱世明、胡殿斌、胡适、胡耀邦等等。当然少不了这位我从心底敬爱的巾帼知音。阿门！

箱底翻出的香港书简

因为写《回忆与忏悔录》，把自己所存的文件、手稿、书信、照片统统从箱底翻出来，一一检视，看看有什么用得着的。结果，翻到了一九八二年春在香港宴请柳河清、王丹凤伉俪的照片和给当时香港电台第五台台长邓慧娴女士一封信的底稿。

这封信虽然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留下了我感情生活的一星半点痕迹，但也反映了我的生活态度，可以作为投身香港头尾近二十年的纪念。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对“东方之珠”这个充满了中国历史情结、对中国现代化有不朽贡献的国际自由港的爱。

事情回溯到一九八二年春，我尊敬的老友、摩尔根派遗传学在中国的传人、曾在杭州对毛泽东面授现代遗传学的谈家桢教授，从上海给我写了我一封信，交由著名电影明星王丹凤女士带来香港当面交给我，主要是希望我对丹凤给予友谊的照顾。

义不容辞，我决定举行一次比较有份量的宴会欢迎丹凤和她先生柳河清。我问她：“希望和什么方面的人见面？”她的答语是：“最好是各方面的。”我于是约了罗孚和卜少夫、香港左右两边新闻圈的代表人物；诗人戴天；作家、杂志主编胡菊人；曾拍过电影又能写作的唐乙凤；香港电台第五台台长邓慧娴；美国驻港领事；日本驻港领事和法国驻港新闻专员；连同我这个主人一共是三女九男，基本上做到了各方各面。

就在这次宴会上，卜少夫和罗孚愉快地碰了杯，而且相谈甚欢，打破了左右两边将近三十年避免在港公开接触的冷冻局面。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极大兴趣，北京《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俗称“大参考”和“小参考”，都报导了这一消息，说是左右两边人士在陆铿欢迎王丹凤的宴会上碰杯、欢谈。我本人为此稀里糊涂地被台湾加上“为中共统战效劳”的帽子，王丹凤却因而被北京选拔为全国政协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使她有更好地一展长才的机会。

当时对我来说，举行这一宴会，除了因为重视老友的嘱托，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即想借此和邓慧娴女士接触，让她对我增多一点认识。

我因应邀到香港电台做节目，在九龙广播道认识了邓慧娴，她的英文名叫 Agnes。我见她的第一面就为她的温婉风度所吸引，在大方和蔼中有一种含蓄之美。但又不失香港女性特具的开朗。我们有过两次单独约会，气氛却只得一个“礼”字。这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无关系，我既要把心力聚集于新闻上，又在中大和树仁教新闻采访学和新闻事业史。即使有心谈情说爱，也没有多少时间。而 Agnes 由于敬业，她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负责的电台。再加上她个人的情况我了解太少，又不方便向邵庐善等友好打听，香港电台朋友们多以前辈待我，自然地让我不得不产生一种自重的矜持。

结果就造成这样一种形势——攻势未果就“鸣金收兵”。写下并寄出了下面这封信：

Dear Agnes:

好久都想给你写封信，实在太忙。我这人最大的缺点，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优点，即工作

第一。感情上的东西哪怕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 ，一遇到工作，又放在一边了。从这个角度说，一生都在受苦，自己对自己太残酷了。

我从见你第一眼，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也许就是缘份。喜来登咖啡座和青年会休息室的两次会晤，至今我还记得那种气氛。特别是第二次的约会，你盛装而来，我感到的愉快是出乎意外的。最大的遗憾，是我说得太多，你说得太少，如果早知道你去美国旅游以后我们就彼此不再见面，我会一句话不说，专听你的。

人与人的聚合与分离，向来确实其妙。而在感情上留下了缺憾，往往比满足还值得回味。

我曾坦率地告诉你，我很喜欢你。你回答说："若我没有一点喜欢你，我也不会给你电话了。"我的经历让我懂得女孩子讲话总是比较含蓄的，特别是有教养如你。因此"有一点"对我已是很大的鼓励。所以，那一个电话，感情暴露的坦率，通话时间的长，对我来说是来香港后的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了。你当时说，好像回到了孩子的时代。"返老还童"本来是人生难得之事。当然，这里得说清楚，"老"字只属于我，"童"则二人共享。

我现在的处境已经是"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已满枝"。如果谈情说爱，未免不合时宜。但四十年来，从我跨入社会起，我一直在追寻打破性别界限的友谊。它没有目的，没有终极，心灵相通，肝胆相照。也许太理想化了一点，可是人类难道非庸俗不可？

你说过："淡水长流"，本来古人就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说。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非但没有"流"，连"滴"也没有了。我这个人的做人原则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勉强对方。勉强对方就是侮辱自己，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谁愿意受侮辱呢？

好了，此情可待成追忆。缺憾事实上比完美更值得珍贵。望你保重！

You Friend

Thomas

14.Feb.1982

和崔蓉芝的黄昏之恋

●谁道人生五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宋·苏东坡《浣溪沙》

●不信青春换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于右任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旧金山被刺丧命。当时疑云漫天，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舆论注目的焦点，张京育以行政院新闻局长之身在美国 CBS"六十分钟"节目中，回答有关江南案时，咬紧牙关，坚不承认国府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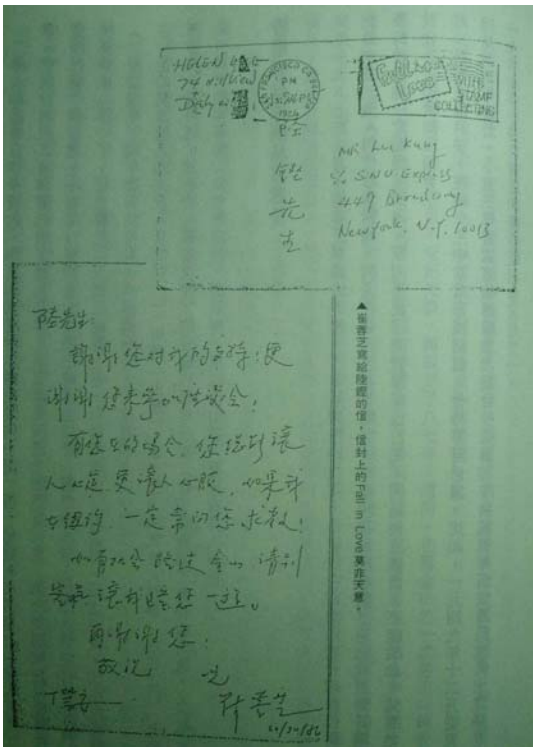
接受访问直指政治谋杀

《中国时报》美洲版采访主任胡鸿仁（现任副社长兼执行副总编辑）对我进行访问，以一个老记者的角度谈谈此案。我开门见山、斩钉截铁地说：江南被害不是仇杀，不是财杀，也不是情杀，而是政治谋杀。同时和我应邀接受访问的阮大方，看法和我大致相同。翌日报纸头版刊出两人谈话，引起轰动，自在意料之中。后据当时担任"中时"美洲版总编辑的周天瑞透露，"中时"美洲版决定关门，与此有关。

崔蓉芝作为江南遗孀对此的反应，自然与台湾当局迥然不同，在她看来，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公道话了。因此，在江南逝世两周年、一九八六年十月她于纽约举办座谈会时，就邀请我出席演讲。

崔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即遭遇如此大事，她不像一般女人哭哭啼啼，神情飘忽，垂头丧气，而是振作精神，冷静应付，处变有序。对朋友则一直表现出热情有礼，加上一股灵秀之气，使人如沐春风。她生就一副眉眼盈盈、天与多情的面貌，使我在座谈会后纽约街头抚着她的手臂过街时，自然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奇异邮戳竟是“坠入爱河”



谁知，当她返回旧金山后在十月卅一日寄到纽约《华语快报》给我的信，信封上赫然盖着美国邮政局有“Fall in Love”(坠入爱河)邮戳的信。内容是：

陆先生：谢谢您对我的支持，更谢谢你来参加座谈会。有您在的场合，您总能让人心定，更让人心服。如果我在纽约，一定常向您请教。如有机会路过金山，请别客气，让我陪您一游。再谢谢您！敬祝

撰安！

晚 崔蓉芝 10/30/86

男人都是会自作多情的。小崔的来信中“让我陪你一游”这一句话，和信封上“坠入爱河”的章，使我自然把二者联系起来，想入非非……莫非是天意？如不是天意，怎么美国邮政局会配合的这么好呢？偏偏选在小崔这封信于旧金山发出时盖上这么一个奇妙的章。看来，她信中自称的“晚”，快要变成“早”了。从而兴起“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的遐想。顺便一提，江南自洛杉矶《加州论坛报》周年庆与我得见，写信给我时，一直自称“晚”

由于我这个人向来是“新闻第一”。所谓“天意”，想一想很快就被人间事、姑名之曰“地情”所代替。当时既忙于纽约《华语快报》的言论和每周一次《新独立评论》专刊的出版，又忙于香港《百姓》的报导和《陆铿新闻信》的撰写，所以金山一游一直没有排入日程。

香港相会表演横刀夺爱

一九八七年十月，崔蓉芝准备去香港，打电话到纽约找我，希望我在香港为她介绍几位新闻文化界朋友认识。杨惜珍告诉她，我人在香港及香港电话。小崔和我电话联系上告知我到港日期。我及时告诉她一定要提前到港，原因是我回美国机票早已订妥，因是便宜机票，不能改动，只有她改而就我，否则就无法相会了。

廿一这个日子，在我一生中常常形成关键，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东京赶回昆明坐牢时廿一；五三年监狱宣布准备放我是廿一；参加中共统战队伍成为民主人士也是廿一。一九八七年十月在香港和崔蓉芝相会又是廿一。

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

江南被害后，不少平日对她倾慕的男士，即向她展开了追求攻势，而她因临剧变，把整个的心法在办好江南遗留下的事上，根本没有闲情考虑别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哀思不觉韶光换，转眼到了八七年。这时，在旧金山的一位男士向她表示倾慕之情，她也觉得应该重作选择，于是相约作香港行，异地而谈，也免得旧金山熟人多而受干扰。这是一位左派人士，抵港翌日就约崔蓉芝去拜会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主任符国柱及该社总编辑等。交谈之下，不知怎么会提到陆铿，符就说“刚刚和陆大哥在一起吃中饭。”小崔随口应了一句：“呵！我来了还没有给他打电话。”想不到符竟如此热心，走进办公室把电话拉到会客室放在小崔面前，我得到崔的电话，告诉她马上去接她。

冲进会客室，但见一屋子人，总有七八个。我告诉小崔：“走，有四五位新闻界的朋友约吃晚饭，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这时，符国柱开腔了：“这怎么行？她是主客绝不能走。”我说：“你们还有这么多人嘛，她改天再跟大家谈。”话未说完，就像一阵风似地拉着崔蓉芝就走了。连房子了坐着的人的面孔都没有看清。

当晚与秦家聪、简而清、李韡玲和她先生共餐。巧的是我在港的临时住处就在餐馆楼上，饭后约蓉芝上楼小坐，这一坐，彼此开诚相见，正是“人生无物比多情”，她才说出当天下午我把她抓走时，在座的人中，其中之一就是在旧金山和她相约香港会的那位先生。结论是：“你太霸道了，不但全屋子的人都无可奈何，我也在你的不容商量的状态下跟着你走。”我提醒她一年前美国邮戳“Fall in Love”的印记不正是天意的表现吗？

从此，两人开展了惊天动地的爱情长跑。我回到纽约后，常常利用清晨吃早点的时间在一家小咖啡店跟她通话，由于声音低而次数多，以致被咖啡店主和顾客怀疑是特务在通情报。只是此“情”非彼“情”，这一美丽的误会，到我跟小崔的感情曝光后，老五的媳妇爱玲才讲了出来，说他们家早已听到了。

黄山定情效李后主故事

一九八八年为了勘察江南墓地，我应蓉芝之约，陪她作故乡安徽黄山行。黄山上，我这头老羊，牵着她那头小羊，健步如飞。我们的生肖都是羊，我大她廿四岁，但她自愧不如我的矫健。抵达黄山的第一夜，就合作演出了拿破仑宫女提着鞋子进入英雄帐的故事，一如南唐李后主与妻妹小周后幽会后所填的词〈子夜〉：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春阶，手提金镂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其罗曼蒂克的程度，自信超过襄王、神女，使我体会到什么是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从而使我得出“可以向全世界宣布陆崔定情”。当时安徽侨务办公室两位干部一男一女陪同照料，所以我们虽然在感情上已经结合，但在社会礼仪上还不能不有所顾忌。

黄山定情后，小崔诚恳的表示：“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你活得快乐。”我除了欣赏她的态度，还能说什么呢？我自喻为“超性情中人”，而中国人向来想爱而不敢爱，决心打破这些束缚好好为自己而活。由一九八八年写给小崔的信中可以找到我的心路历程：

……不知道从那里产生的力量，我竟会产生一种为爱而死的决心，这在我一生中是没有过的，你知道我是一个生命力特强的人，列宁曾经说过，世界上最残酷也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单独监禁，而在我以往二十二年的监禁岁月中，曾被单独监禁四年，不能看书、不能看报，不能写作、不能讲话，甚至不能唱歌，在那只能令人想到死的日子，我从未想到过死，我想的是怎么活着出来，证明民主自由是人的尊严，追求“它”，为“它”献身，是人的最高价值，为什么经历患难，备尝艰辛，现在反而会想到死？唯一的解释就是，你给我的爱，已经

使我得到人生最大的满足，可以死而无憾，过去四十多年来，我曾为自由民主付出很高的代价，今后是要为爱情付出代价的时候。

我们决定把实情分别告诉自己的亲人，小崔的儿子刘家禾听了妈妈的决定后表示说：“我看这些年追求你的人，以 uncle Lu 最好。”儿子从旁观察，给了妈妈很大的鼓励。我给大儿子可望一信，表明不是以父亲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虽然有责备、有批评，说了很重的话，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理解。只是对崔蓉芝缺乏认识，断定“崔女士绝不可能爱你超过半年。”其他子女，有的说三个月，有的甚至判断“只要两个星期，崔蓉芝就会分手。”

当陆崔黄昏之恋曝光后，在港台舆论界引起不少议论，我的一位朋友以齐语笔名发表评论指出：“此情在港公开化，是在八月（一九八八年）陆铿来港期间。陆到新加坡，崔则随行；崔赴黄山，陆亦随行。而在港期间形影相随，明眼人已看出端倪。崔之‘好’，从《江南传》亦可看出，为文者无不称赞其为人。甚至其死对头，对她亦大为称颂。以此为人，不被人所爱亦难。只是未料是陆大哥，又难免引起小小的震撼。换上别的也许会平静些。”女记者曾慧燕在其专栏中谈崔蓉芝，更是赞不绝口，说蓉芝“温婉娴淑，美丽贤惠，识大体，明事理，善良柔顺，坚强能干，集太多美德于一身。江南遇害后，各方评论对江南毁誉参半，对蓉芝则一致称赞，听不到有关她的半句坏话。”而对崔蓉芝到美国监狱中探视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董桂森，并建议法官对董从宽量刑，说董也是被人操纵，体现了小崔的超人情怀。黄谊民老弟以“江南遗孀与陆铿的喜讯”为题发表一专文，最后一段是：“区区实在佩服陆铿的的精力，他可以穿梭大陆、香港、美国，又写那么多文章，竟然还可以有时间谈恋爱，实在令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

善良·温柔·灵秀·通达可爱

自两人结合以来，在生活上，崔即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生活秘书，我的活动日程，都由她代记，而且她是最能干的汽车司机，在记路的本领上，令我佩服之极。只要去过一次，再复杂的路，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烧菜的本领，早在华府就已风传，又快又好。平日吃饭，她总是一人包办，我主动要求洗碗，她都不准，说你有时间多看看书。我写文章时，有的字记不起来，她以政大中国文学系毕业之身随时提供服务。我每次旅行，从订机票，到收拾行李，全由她一手包办，而且效率特高，只在带那几条领带上问我一声。我脾气急，有时甚至骂人，她却以柔克刚，问“要不要泡杯咖啡？”她和我们共同的好友曾慧燕、洪美珍都倾诉过，她是新旧女性的混合体，本意是丈夫为生命中心，做个现代化的贤妻良母，以智慧和知识结伴共同创造未来。江南死后遇到陆铿，成天围着新闻转，但她尽力做到她能做的。

善良、温柔、灵秀、通达使我对崔蓉芝的综合评价。最初，我的很多朋友对我与崔的结合是表示反对的，有的好朋友还写信对我臭骂。但当她们与崔认识后，都一致表示：“好！确实好。像绵龄夫人管国华还警告我说：你可不能欺负她呵！”

在传媒追踪中，我闯了一个祸。

当崔蓉芝和国府的官司获得和解后，不知从哪里吹出一股风，说我是居中翰旋最力的人士。因为与事实不符，我当然做了否认。我对江南案，除了接受访问谈了看法，是尽可能避免卷入、插手的。但崔蓉芝因跟我“坠入爱河”，可能心境有所变化而愿意接受调解，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断。潘启元的太太、《世界日报》驻美特派员俞渊若在台北找到我进行访问，谈我的爱情观，谈我如何看崔蓉芝，以及我为什么不和杨惜珍离婚都谈了。我想访问告一段落，准备起身离去，这时俞渊若说，陆大哥，我有一个私人性质的问题，想了解一下你和小崔的性生活。能不能告诉我一点？我想到渊若曾是潘启元的太太，而启元是我开始做广播记者时的小兄弟，有历史渊源，而且认为她是个女性，从东方人的传统说，女性对生活私事是

会避讳的，能发问已是稀有的了，当不致发表。却没有想到在一九九0年十月廿七日，赫然得见台湾《联合报》和美国《世界日报》刊出的题为“只有崔蓉芝让我恢复青春”的俞渊若“专访陆铿”。其中有这么一段：

“陆铿说，坐过牢的人，对性生活不会有强烈要求，可是与崔蓉芝坠入爱河后，很奇怪的是对性的渴望特别强烈，而且可以说已完全恢复青春，与年轻人同样的健壮。对任何事情干劲充沛，每天工作十余小时不感到疲乏，他相信这是爱情滋润所发挥的作用。”

坦率答问引起责伐之声

这在九十年代初的台湾社会自然引起轩然大波，台湾的一些医学界人士还专为此举行座谈。俞渊若把剪报寄到香港给我，我一看糟了，问俞：“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看。”我除了自省，夫复何言。柏杨于一九九0年十月携香华抵港，在我欢迎他的晚宴小聚时，站在朋友的立场，义正词严地把我痛骂了一顿。胡菊人当时为我缓颊说：“大概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与一般不同，认为什么事都可以直说。”潘启元老弟十一月初给我一信，告知台湾作家杨子在“联副”专栏中发表《陆铿·崔蓉芝·陆太太》一文，他并说：在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下，大多数人对这种叛逆性的恋爱是不能接受的。新闻文化界的“老正经”多是只做不说，或浅尝即止。

后来读到杨子这篇谦称“干卿底事”的文章，写的有理有据有情，且有正义感，令我拜服。

好友警告千万不要滥情

不过，以我切身的体验，投入恋爱可分三个阶段，首先是爱，再就是情，然后是义，恩义之义。而且常常会发杈，同时喜欢几个女人。因此，对婚姻制度产生怀疑。这一荒谬论点在九十年代中期旧金山友人欢宴柏杨的一次聚会上，曾经简述，并博得郭佩誉小姐的回应。事隔多年，查良镛兄约在香港餐叙，我就“立情”三阶段请教他，他的回应是，大概都差不多，因为不可能永远处于狂热阶段，但恩义总是在的。后来，在台北与余秋雨兄谈到这一问题，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的答覆更妙：因为优秀，如果不是优秀，谁又会来跟你谈情说爱呢？不过，我的几位好友包括林山木、骆友梅伉俪在内都非常严肃地警告我，在爱情生活上应力求避免再出问题了。既然公开宣布（按：指一九八九年七月在西来寺寿宴上）崔蓉芝是最后一个对象，就要做到让她是最后一个对象。否则就是滥情了。我对朋友的回答是：我对崔蓉芝的爱，并没有动摇，我已经亏欠了杨惜珍，不能再亏负崔蓉芝。事实上，一九八九年情人节，我俩在旧金山交换戒指已经私订终身，借朋友的话就是“舆论结婚”。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惜珍在我之前蒙主宠招，我就和蓉芝结婚，当然，我希望她活得尽可能长些。否则在我临死时也会学希特勒自杀前和依娃结婚一样。

年龄已近八十岁的我，还能接受朋友这样诚挚的规劝，深夜扪心，一方面说明我这个人性格中的荒唐，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在交朋友上的成功。

因为有很多朋友可以对我说“不”!

古人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我看来，正因近黄昏，所以无限好！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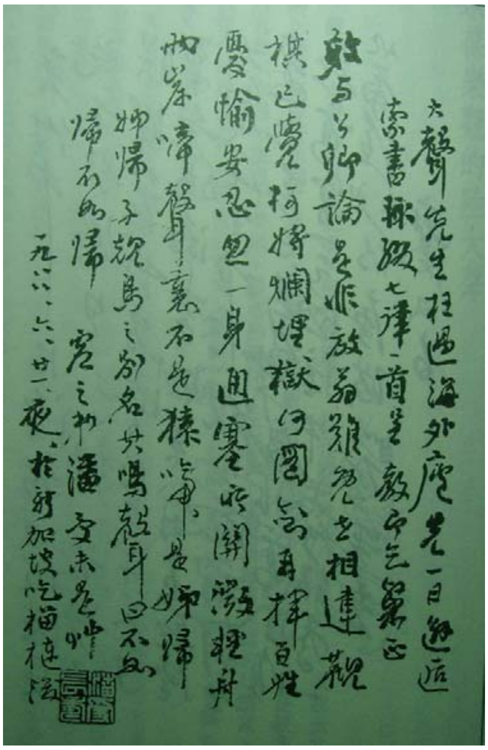
友直谈大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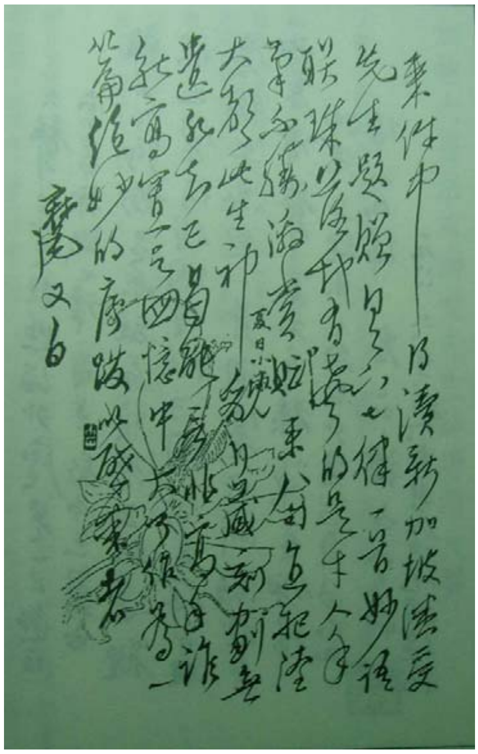
新加坡大书法家潘受先生诗评陆大声

大声先生枉过海外庐，先一日邂逅索书，辄缀七律一首呈教，即乞粲正：

敢与公卿论是非 放翁难免世相违
观棋已觉柯将烂 埋狱何图剑再挥
百姓忧愉安忍忽 一身通塞所关征
轻舟两岸啼声里 不是猿啼是姊归
（姊归，子规鸟之别名，其鸣声曰：不如归，不如归。）
虚之弟潘受未是草。一九八八·六·廿一夜·于新加坡吃榴莲后

曹天戈将军号宣麈，以儒将入蒋公幕。一九五0年初在国军兵败如山倒时于云南元江被俘，押解昆明监狱，因而与大声有同窗之雅，一九九四年在浙江省政协偶读潘受先生时作，乃自杭州函大声曰：来件中得读新加坡潘受先生题赠足下七律一首，妙语连珠，落地有声，的是才人手笔，不胜激赏。赋来八句，直把陆大声此生神貌行藏刻画无遗，非知己何能言，非高手谁能写，置之回忆中，大可作为一篇绝妙的序跋以醒来者。 ——麈又白





永保乐观的陆大声

——千家驹

陆铿、大声先生是名记者，但我认识他，是在解放后的八十年代。一次我去北京开全国政协大会时，他同崔蓉芝也到了北京，我们在北京饭店第一次见面。近十年来，来往较多，特别是我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去了美国，在洛杉矶住了三年多。大声是星云大师的好朋友，我和星云的关系是大声介绍的。在此以前，我给香港《信报》每周撰评论一篇，《信报》特辟一专栏〈千家驹论经济〉，也是大声撮合的。

大声兄出名是由于他是记者，而倒楣也倒在记者身上。他在中国大陆坐了许多年监牢。据我所知，在卢汉昆明起义以后，卢汉把云南所有国民党军政大员都扣留了，包括蒋介石派驻云南做卢汉工作的张群在内。但后来卢汉把张群放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在北京，周恩来曾对我们谈起此事。周对卢汉释放张群甚为不满。他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相交换。

中共对卢汉释放张群不满的事，被卢汉知道后，刚好这时陆铿从香港回到昆明。卢汉就把陆铿扣押起来，变成张群的替罪羊了。大声关了多少年，我不清楚，以后如何释放后出国的，我也不清楚。

大声是一个记者，他的职业道德非常强，吃亏也就吃在这上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便因揭发孔、宋的贪污而触怒当局，被蒋介石召见要他讲出新闻来源。经于右任等元老营救而幸免于难。后在广州又因强调新闻自由，触怒当道而被捕“坐牢”。其中经过已详记于回忆录，不赘。

到了解放以后，他因访问胡耀邦而蜚声中外。他访问胡耀邦的记录曾经美国国务院译成英文而受到普遍重视。胡耀邦却因此备受共产党内的批评，故而胡耀邦有“陆铿是个坏人”之说。从此中共再也不给陆铿签证进入大陆。其实我细读大声对胡耀邦的访问记，并没有甚么不妥之处。不过因为陆铿的问题提的比较尖锐，而胡耀邦的教条主义又不那么严重，因而在“左”的教条主义眼中很多出格，受到指责。胡的“陆铿是个坏人”的说法，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这恰好证明了陆铿是个了不起的好记者。

陆为人胸襟坦荡，与朋友相处肝胆相照，坦率真诚，什么暗箭伤人之类，在他看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好几次大难不死，一方面是他吉人天相，另方面与他的乐观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历尽沧桑，历经打击，但始终那么乐观。他已快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他精神体格还像一个青年人一样。现在他的回忆录快要出版了，我相信一定可以畅销海内外，为专业记者树立一个典范。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于深圳，时年八十八

大汉不呆是个宝——记老友大声陆铿

——唐德刚

陆铿最近给我挂了无数次电话，包括许多次所费不赀的越洋长途电话。他自己直拨之不足，还动员了女友男友一起来，弄得我这个茅庐寒舍简直是“州司临门，急于星火”。所谓何来呢？原来他那十分精彩的《陆铿回忆及忏悔录》，已至杀青阶段。他“自说自话”之不足，还要拉伕拉出一些读者和老相识来“人说他话”一番。陆铿是个草莽英雄，“无冕之王”。痛快之至。你捧他是“陆大哥”也好；你骂他是“四大不要脸”，“色狼、色魔”，“死囚犯”，“土豪劣绅”……只要有新闻价值，照单全收，童言无忌。——“陆大哥”好歹未盖棺而论已定，蚍蜉撼大树，不管摇笔杆子怎么说，一概笑而纳之，照印无讹，只要你肯写！打滚翻身，你怎样也推不掉，非写不可。他并且认定这个题目，就这么写，因为我这个“徽骆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安徽土话”：“大汉不呆是个宝。”陆兄就是位体重二百磅，身高近六尺的“大汉”，生龙活虎，从未“呆”过。

在动笔写此拙文时，我对那位上了他底大当，并大骂“卢铿是个坏人”，终于赍志以终，学生为之暴动的胡耀邦，真有无限同情。——胡耀邦是个红小鬼出身的长征老干部，最后做到全党一人的总书记。他个人的经历、经验、训练、知识和生活习惯，都是在共产党中发展出来的。他的天下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他的天下。因此在他底生活经验里，一个“新闻记者”只是党中一个小干部。他可以颐指气使的小干部。大的新闻官像许家屯，像周南，却不是“跑新闻的”。胡耀邦所知道的新闻记者，都只是共产党极权统治下的新闻记者。他不知道在非共产党极权世界中的新闻记者却是“无冕之王”。他这个“总书记”对应付这种“王爷”没经验。在他心目中，陆铿只是个对他颇为感恩的枪毙未死的死囚犯。他想不到陆铿也是个“王”，并且是个“大王”，“王中之王”。——“总书记”对掌握“大王爷”没经验，在交谈中，他就“上当”了。等到发现“陆铿是个坏人”，那就为时晚矣。 **“陆铿是个坏人”**

“陆铿是个坏人”是胡总书记丢掉纱帽的诸多原因之一。这在中共中央所秘发的红头文件中是有案可稽的。因此这个“坏人”——不，这个《伊索寓言》中所记载的，被装在瓶子中的大魔鬼，在坐了中共廿二年的黑牢之后，一旦被放出瓶子，立刻又兴风作浪起来，连中南海的深宫大内也被弄得天翻地覆。有冕之王竟被个无冕魔王，弄得皇冠落地，龙驭上宾，终于引起学生造反，坦克上街，几乎弄得邓上皇也乔扮农妇（父），落荒而走，千年国史也为之翻出另外一章来。

早知如此，那些自命对反革命派，从不“心慈手软”的中共党内的肃反特务，何不干脆“将错就错”，把他枪毙了是。——据陆铿说，他在死囚牢中，一次狱卒弄错号码，把他与半夜里提出枪毙。在上法场之前，始发现死囚号码上 409 错为 406，一字之差，才又免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杀人有瘾的国共两党特务们，一向都自夸“宁愿错杀一百，不愿错放一个”。这次陆铿这“一个”死囚反革命，显然还是被“错放”了，所以才弄得这么大的纰漏来。他们那时如将错就错，把号码改一下，把他送上法场。人死病断根，岂不一了百了哉？！

美女不如猪肝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我在纽约街头遇到嘻嘻哈哈的陆铿，那已是他在“出瓶”以后若干年的事了。但是抗战中期，我在重庆沙坪坝上，作蓬头垢面的小青年时，已久仰其名。——原因是战时流亡学生，靠政府发放的三两碗“八宝饭”度日，生活实在太苦了。那时父母既不能接济，亲友更投靠无门。平时无差可兼，也无工可打。瘦成三根筋不算，长期营养不良，竟弄得百病缠身。最难熬的则是夜盲。太阳一下山，则一脚高一脚低，走路都成问题。校医老爷讲大话，说你缺少维他命 A，应该多吃猪肝。那时在沙磁文化区中的猪肝，随处可见。但是能挈而食之，那就是天大问题了。有时偶尔发了财，或朋友发了财，请你吃碗猪肝面，那才有神效呢：当晚足下马路便清晰可见；桌上目光可及的视力圈立刻扩大数寸乃至数尺。他换了一个人。呜呼！猪肝面之为用大矣哉。因此那时对我们沙坪坝小青年来说，那就是美女不如猪肝了。——食色性也。食毕竟比色更重要。

为着追求猪肝面，我们那批坝上青年，尤其是学文科的，既无工可打，那只有挖空心思去向重庆各报刊投稿，想赚点稿费以吃猪肝面也。上帝保佑，一稿得售，就可吃猪肝面一小碗；二稿得售，则可请好友共享之——那时我们坝上小青年，除少数高干富商子弟之外，都是共产主义者，有通财之义。

我们那时的投稿经验，大致是一篇风花雪月的小散文，或者可换猪肝面一碗。重庆当时是寒士如云的。那些“大文化人”如田汉、巴金、张恨水等人正在叫啸，要什么“斗米千字”。这时我们小青年看赛那是要求太奢侈了。我们如有“斗米千字”，已是祖宗积德了。——在那十投九被退的激烈竞争之下，重庆“中央日报”的副刊却是个网开一面的肥缺。它早期的副刊编辑是卢前，号冀野、一位酸溜溜的诗词作家。为着时髦，他有时也要谈点“新文学”，谈点什么“横的移植”和“新诗”，但他骨子里还是那种“裤裆巷口路三叉，引得卢前到我家”的，世说新语的那一套。因此各大学中，只会屠格涅夫体的那批小鲁迅们，就被一股脑摈斥了。——卢前那时在沙坪坝兼课，教诗词和文学写作一类的课。那是中国文学系的课，因此卢前的中央副刊便成为他们中文系诸公诸婆吃猪肝面的施主了。

我记得坝上有一次发生一桩吓坏人的情杀惨案——一位男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枪便把他的前女友打死了。然后掉转枪头，对着自己的太阳穴，他也就与女友同归于尽了。这一情杀案因而引出坝上一阵悼亡诗风。中文系一位“小林黛玉”（只记得她的诨名，已忘她的学名），在追悼大会上哭之曰，“霹雳一声双命已，此时爱恨怎能分？”曾引起陪都骚坛震动。卢前这位“副刊编辑”，所看中的便是这类潇湘之作。林姑娘那时是不少猪肝面作“副食”的。

我还记得另位男同学，在空袭中过江游泳，摔伤了足踝，不幸竟引起“破伤风”而死。也有同窗诗人挽之曰：“此间接因空袭亡身，其心甘否？若偶然为游泳伤足，有死理乎？”——有这样的“汉学底子”，卢前卢后的编辑们所掌握的猪肝面也便有得吃了。

我们历史系倾向于屠格涅夫体的“进步作家”们，都瞧不起卢前。我们叫他“卢后先生”。但是看在猪肝面份上，我们也会写一些“世说旧语”，要“卢后”请客。——但那也万般辛苦的。卢后的“园地”毕竟有限，一个中文系已超载。能分给历史系的猪肝面，就所余无几了，哀哉。——中央日报的稿费比同时的其他报刊，要高出一倍以上。

跟女人跑了，不回来了

就在这种长期挨饿，并在日本鬼子日夜狂轰滥炸之下弄得衣不蔽体，鞋袜皆无的瘪三情况中，我们每天看报，总是经常看到“陆铿”两字，跃然纸上。我不认识陆铿，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央”系列的大头头，在报刊上经常写专栏、专访、长篇通讯的大报人，至于在这些专栏里，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今日已完全忘记。但是那时我们那批饿鬼小青年总是以猪肝面作价值标准的——他那一篇专栏或通讯能换多少碗猪肝面？我们的结论是，陆铿的猪肝

面是永远吃不完的。猪肝面者，一切事业之基础也。有吃不完的猪肝面，则这位陆铿就无事不可为了。——食色性也。食之余就是色了。果然（陆铿后来告诉我），他这条色鬼，那时正在泡妞，泡得天昏地暗！——我们那批小青年，就很少泡妞。天一黑看妞都面目不清，从何泡起呢？

陆铿那时，少年得志，又性喜拈花惹草，因此所到之处，无不蜂蝶乱飞。最后化万念于一念，就和我们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花杨大姐结婚了。据情治单位报导，陆铿在婚礼前夕，还偷偷和另一女郎在嘉陵江畔，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呢！——佛教徒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我们的汤玛斯·陆（Thomas K.Lu），却是个基督徒，不在此限。他偏偏恶有善报。他这位夫人，我们的杨学长，却是百万人中难得找到一个的美丽聪明的贤妻良母，牙科医师。到最后陆铿，还是“恶有恶报”，被抓入共产大牢，那些反革命家属，时时都要去看死囚榜上是否有自己亲人的名字。同时那种狂风恶浪的镇反运动，纵是任何铁娘子、母夜叉也受不了冲击，都要和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的。可是我们这位脆弱的美女陆嫂嫂、杨学长，却带了五个幼年的孩子，看了廿二年的死囚榜，而矢志不移——陆铿榜上无名，则送衣送饭；榜上有名则守节扶孤，坚持到底。翻翻我国古代的列女传，有几个是这样的？再看看今日欧美的基督家庭，岂不更是神话？廿二年的活寡，算是“守”过来了。如今定居美国，五子登科，老伴二人，白头偕老，可以安享晚年了。谁知台湾派来了刺客，一声枪响，陆铿又被打得无影无踪了。

我问陆铿的连襟和老战友龚选舞兄，“陆铿哪儿去了？”

龚说：“跟个女人跑了。”

“不回来了吗？”我再问。

选舞说：“他跟女人跑过多少次了。可是这次真的跑了，不回来了。”

一个爱其“跑”，一个爱其“骗”

一次我在校友会上同杨惜珍说：“陆铿听说大陆也回不去了。”

惜珍两眼向我一瞪说：“唐德刚，以后不许提陆铿！再提陆铿，我就同你绝交！”

惜珍要和我绝交，但她和陆铿却始终不忍划清界限。陆铿在死囚牢中，她对他始终不二；如今陆铿“跑”了，她对他仍是矢志如一。——这就是男女爱情之间，“痴”的可敬可爱之处了。陆铿做了“反革命”，要被枪毙。她所爱的正是他的“反革命”。如今陆铿又跟着另一个女人“跑”了。她所爱的也正是他的“跑”。夫复何言呢？！

莎翁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

脆弱的杨惜珍对“跑”掉的陆铿恩爱未了。谁知还有个脆弱的崔蓉芝。分明是被陆铿这个大色鬼骗了。她却也对他一见钟情，死心塌地，独爱其“骗”。又从何说起呢？

海伦（崔蓉芝）和亨利（刘宜良，江南），本是一对情性相投的恩爱夫妻嘛。谁知晴空霹雳，特务刺客的一枪便把这位脆弱而善良的美女，从天堂一下打入地狱呢？就在这四顾无门，歇斯底里的生死边缘，忽然在地狱屋角的微光之中，发现一位，双手伸开，无限同情的老爸爸。这个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孤苦无依的小女鬼，一下便扑了过去，和他拥抱在一起。这一拥抱，对一个小女鬼来说，在情感上就分不开了。…冥冥中有个声音在说，小鬼使不得也。他是个大骗子呢。小鬼哭诉说，顾不得了。爱就爱这个“骗”嘛。不然，莎翁为什么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呢？

陆铿不是贾宝玉。他看来像一个站在佛祖大庙前的门神。但是这门神，在他的粗犷之外，

也另有其温暖率真的一面，这是许多美女、才女、有性灵的女人受不了的一面。这也是他所到之处，蜂蝶乱飞，能“骗女人”的最大本钱。尤其是那些在情感上四顾无门，真空时代，最需要感情的女人。这样这个具有高度父爱与情爱的大门神就能乘“虚”而入了。——现代心理学家说，一个打离婚官司的女人，最容易爱上他的律师，正是这个道理。——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一个有智慧有性灵的女人,一个爱情骗子,专靠一些潘、驢、小、闲的表面功夫，是不能持久的。他在性灵深处，要另有所托。盗要有道；骗子不能不骗啊。此话怎说呢？

“敬业精神，天下第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陆铿与他的朋友之间，处的最绝的恐怕要算傅朝枢了。傅是陆铿坐牢之后，最早的雇主。但是当傅君在纽约办其《中报》时，竟通令全报不许印出“陆铿”二字。足见二人绝交之绝也（据傅说，我是他贵报中唯一享有豁免权的作家，拙作中可提陆铿之名。真是谢谢董事长）。但是傅君也告诉我说：“若论敬业精神，陆铿和胡菊人二人，实是天下第一。”——这句话，实在是英雄识英雄之言。陆铿与傅朝枢二人都是今日海外华人社区中，最标准的草莽英雄。盗亦有道，各有其英雄本色。

陆铿的“敬业精神，天下第一”。此话出于他第一号冤家对头之口，实在是相当公正的。他能敬其所业，就能忠于所谋。一个人如为朋友谋而能忠于所谋，与朋友交才能有信。而陆铿又大汉不呆，精力充沛。为人谋必殚精竭虑，不眠不休，正如一个为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为“她谋之忠”，是尽其所有的。这也是“传必习乎”之一面。——曾子三省，他皆有之，这也就是“读圣贤书，所谓何事”之一事了。

他这么一来，便弄得他的“女雇主”，在情感上，在生活上，在……上，简直不可一日无此君，就牢牢缠住这个大骗子不放了。他分明是个大骗子，侬独爱其“骗”。纵被弃不能羞，就再也不能让他跑掉了。……夫复何言？

陆铿原是一文不名的光蛋，食量大如牛，又善自涂拭，有时也高冠厚履，风度翩翩，俨然高干大官也。这种人终日困于“破瓦寒窑”之内是会被闷出病来，奄奄一息的。他在寒窑之内，反正是个多余的大饭桶、大酒囊、大衣架……留着也无用，倒不如让他“跑掉”的好。这也就是杨惜珍对他“跑掉”之后，既不划清界限，也不穷追喊打，只是扫地出门的道理。——虽然我唐某向她提到陆铿，她就要和我“绝交”。

陆铿本是个大色鬼——但是朋友不要忘了，不论是江湖好汉或革命元勋，也没有一个不是大色鬼的。孙国父说他第一嗜好是革命；第二嗜好是女人。老蒋、老毛尤有过之。陆铿和他们比，虽是个草莽，但是看到美女，便和他们一样的丧魂失魄则一也。（曹长青访陆铿长文标题即“新闻第一，女人第二。”。）何况他这个大光蛋，花子拾金，有此艳遇，王三姐抛下的彩球，一下拣到了；绣枕金猊，被翻红浪，怎能不“跑”。——陆铿对他的夫人心疚无已，惭愧弥深，结草衔环，感恩不尽；但是大汉不呆，“跑”还是要“跑”。

一个要当老板，一个不做伙计

或问陆某既然能忠于所谋，信于朋友，为何与老傅弄得那样水深火热呢？我唐某不敏，和他们两个都是极熟的好友。我对他二人症结所在的评语，他二皆鞠躬如也，完全接纳。

傅、陆二人都是草莽英雄。司马迁《游侠列传》里的游侠。老傅告我，他所拥有的黄金美钞，“再投五次胎也用不完”！他先在台中办《台湾日报》兴隆一时，终被经国强迫收购。他挟巨资先去香港，后到纽约，又办起《中报》来，俨然是台湾《联合日报》的劲敌，海峡两岸都不敢小视。其所以然者是傅老板此君虽独裁专制，但是知人善任。重金礼聘之下，所

网罗的（包括陆铿、胡菊人）都是一时豪杰。他们如能和衷合作，对“两岸三地”正式无坚不摧。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合作”，更不能“和衷”。其所以然者，便是一个要当老板，一个不愿当伙计。

傅朝枢这个财阀、报阀，不管是为名为利，为政治为经济，为……，他办报是有个人目的的。这些目的之外，“做老板”本身也是个目的。他知人善任，量才器使，重金礼聘，但不论你是何方豪杰，你得做他的“伙计”。老板的话是金光闪闪，一句顶一万句的。——傅老板就是毛主席。

陆铿和胡菊人呢？乃至后来的林博文、邱立本、俞国基……也都是一代贤豪！——笔者以一个搞历史的局外人，从旁观察《中报》那时的班底，真是一批不世出的媒体精英，中国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他们的期盼中是，钱由老板出，报由我们办。不痴不聋，不作阿翁。除出钱外，报老板最好别管他事。

“那怎么可以？”傅老板对我两眼一愣说：“陆铿专打高空。要我买爆竹，让他来放？……”

“我们是自由报人。”陆铿也向我双眉一竖，“傅老板只是一个有钱的市井浪人，我们能听他的话？！”

“你看，”我告诉他两位誓不再见面的老伙伴，“你二人，一个要当老板，一个不愿做伙计，就无法协调了。”

“你批评的最恰当，最恰当。”是他二人在不同的地方对我所作的相同的回答。——两个人，一个是腰缠千万的财阀，有钱便有一切。大丈夫当如此也。老子要怎办就怎办。另一个则是一文不名的穷措大。人穷志不穷。合则留，不合则去。几片臭铜之外，你算老几；寡人能做你的 Yesman ？——一个槽拴不住两头叫驴。但在一个读破《游侠列传》的历史家看来两头驴都是英雄好汉，各有千秋！

当然为着职业尊严和个人原则向老板摔饭碗的，也不只陆、胡二人。当“六四”爆发之时，坦克上了街，傅老板对邓大人有知遇之感，通知编辑部要保护坦克，但部内的“自由报人”们，不能容忍。造反有理，乃决定集体摔饭碗，向老板来个“总辞”。董事长毕竟是江湖好汉，不强人所难。同仁好解好散，资遣从优。老板自坐编辑柜。

记得傅朝枢曾向我谈办报经纬，说：“能采访的人，不一定能编。能编的人，不一定能当老板。”确是经验之谈。殊不知反之亦然。如今老板自己来编来访，那就天下大乱了。——老傅毕竟是江湖好汉，拿得起，放得下。蝮蛇螫手，壮士断腕。率性关门大吉。一家生龙活虎，才士如云的《中报》从此就变成历史名词了。在下原是《中报》的忠实读者也。一旦下班无《中报》可读，真若有所失，悲伤不已。这真是由衷之心啊。

老傅其后返台定居，也不时访纽，每来必电约我辈老友到华尔道夫大旅馆，去吃两顿十分豪华而并不太好吃的饭。忙的人是闲不得的。听说傅老返台之后，闲出病来。最近身体不太好。望云翘首，实不胜其怀念也。

发不了财，也饿不死

陆铿基本上是与老傅同一类型的草莽英雄，只是一贫一富，一个模式的两面而已。古人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他二人的贫富均足骄人，但似乎也是命运使然。老傅告我，他在六十年代被经国赶出台湾之前，他原在台中置有大片房地产。他既然满怀怨恙逃往香港，他本想把台中的地产变卖到香港另起炉灶，重打天下。可是经国嫌他在香港反蒋，乃把他的台中房地产扣押，不许出售。老傅恨蒋恨得牙痒痒的却无可奈何。谁知经国此举却帮了老傅的

大忙。经国在一九八八年逝世之后，傅君的老友李总统上台了。老傅财产一经老友“解冻”，不得了，价值连城！所以他向我夸口说投胎五次也用不完。但是经国如果不死，并要实行中山的《民生主义》，“涨价归公”，那老傅也就完蛋了——睹此，你能不相信命运？老傅就是有发财的命。据说大陆上的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坐牢坐了二十年也坐出个财主来。因为他父亲姚蓬子原来在上海也有一笔房地产。文元坐牢期间，他一不能出卖，而不能捐献。如今刑满出狱，共产党已不共产了。上海经济起飞，文元继承亡父的遗产，也就变成了上海的老傅了。——我们二十年前在电视里看到姚君受审时的窝囊像，想不到他二十年后会变成个资本主义的财主吧！

陆铿也想发财，但他没有这个“命”。

一次我问龚选舞兄说，“人不风流只为贫。”为什么陆铿却反其道而行，搞“人要风流只为贫”呢？他这失业流浪汉，不怕饿死？

选舞笑笑说：“他幼年时就算过命。算命的说他一辈子没有钱，也一辈子不少钱用。他饿不死！”

康大总统的“二十年的老朋友”

陆铿最近在台北南港和我聊天时，曾不无感慨的诉苦说，德刚呀，你们多好，有美国退休金可拿，衣、食、住没问题。我在美国未正式做过事，没退休金可拿。现在快八十岁的人了，还要为稻粱谋，好不惨啊！

我瞅着他气宇轩昂，精神充沛，衣着时新……不像个“惨”的样子嘛。又想到龚选舞的话，一辈子没钱，一辈子也不缺钱用。永远饿不死。穷门何在呢？啊，有了。陆铿多的是“朋友”，有“通财之义”的好朋友。古人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吾于陆铿见之也。

记得当年康宁祥先生在哥大进修时，我们不时相见，厮混的很熟。康君那时是个“党外”。我对康君雍容儒雅的风度颇为倾折。心想中国如能进步到实行多党制，康君到不失为一个正派的总统候选人，因戏呼老康为“康大总统”。——一次我发现刚到纽约的陆铿也和老康很熟，同样称之为“康大总统”。我问老康：“你在台湾就认识陆铿了吗？”“不，不，”老康说：“我们前不久才在访问美国时认识的。”我说：“你们看来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呢。”老康笑笑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像二十年的老朋友一样的了。”

吾闻康君之言，不免大悟。因为我第一次和陆铿见面时，也想是二十年的老朋友嘛。——原来陆铿此人，没有什么“生朋友”。他的朋友遍天下，而所有的朋友都是“二十年的老朋友”。甚至未见过面的朋友，也是二十年的老朋友。

多的是孟尝君

陆铿是个口无遮拦的大砲。他在大陆被“放生”到香港，一出来便颇有知名度。我的好友，台湾的纺织工业家，那位有名的“文化界大护法”，陈宏正先生，闻其名也想一识其人。因此在一次乘访港之便曾写信给陆先期相约。陆铿回信说他初来香港，衣不蔽体。听说台湾衣料甚好，宏正此次来访，盼能带两套衣料来，做两套新西装穿穿。宏正得信大乐，不但衣料遵嘱带去无讹，凡和穿西装有关事物，领带、袖扣也一并带去。——此事如对一些“生朋友”、“新朋友”来说，似乎就显得不太正常了。但在“二十年的老朋友”之间，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更亲切了——他们原是“二十年的老朋友”嘛。

记得旧社会中的春联，曾有联曰：“居家有道唯从俭，处世无奇但率真”。这就是“处世无奇但率真”了。“率真”是一种“天赋”，不是人人都有之的。有此天赋而行之，则“二十年的老朋友”遍天下。无此天赋而谬行之，变成打“抽丰”（秋风），敲“竹杠”，则不堪闻

问矣。——君子小人别，原在一念之间嘛。陆铿今日（据他自己说）正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闭关写自传”。陆某是个“所在成市”的大公关。别说南港里那座熙熙攘攘的“活动中心”之内他闭不了关；他在共产党的死囚牢内也闭关不了。——他对一些走向法场的死囚有时还脱袜相赠，因为在阴地府之内是不能赤脚的。

闭不了关，那末自传就慢慢磨下去了，磨下去那个达官贵人的招待所中的二爷们，对一些“食无鱼，出无车”的文化光蛋亦不会有好脸色的呢。一笔可观的“招待费”，还要靠“护法”的朋友们，不断的解囊相助。好歹陆铿二十年的朋友遍天下，而老朋友之间又多的是孟尝君。孟尝君们对“弹铗而歌”的好友是要鱼有鱼，要车有车的。他们总会制造点借口，设计点演讲、上电视，提供点干薪，务必让一位有志气，要面子，又誓不食嗟来之食的老朋友，不致沦为饿莩！

一次我称赞范止安兄有义气，不时接济穷朋友当然也包括陆铿。止安说：“陆铿有此需要，又不贪，人也很正派。”这可以说是知己之言。知交遍天下，又有此需要，又不贪，人也正派，这就是他一辈子没有钱，一辈子不少钱用，也绝对饿不死的主要原因所在了。这就是陆铿的命；这也就是陆铿其人。

最后就要再提提他的“大汉不呆是个宝”了。

西村成雄和张学良

我们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便是我们语言文字里蕴藏着千万句成语（包括今日大陆上的顺口溜）。而这些成语往往都是经过长期锤炼的辞简意赅的真理。我们安徽的“大汉不呆是个宝”，便是其中之一。

一个人如生的个头太大，其五脏六肺和全身经络，由于超载，运转行动，往往都有欠灵活，以致先出“呆”像。一个大汉如运转灵活，行动便捷，脑筋灵活，毫无呆像，那就真是个“宝”了。陆铿便是这样的一个“宝”。——他身高六尺，体重二百磅，拳大腰粗，方头大耳。在上节我曾说他像佛寺里的门神。但这门神毫无“呆”像。陆铿不走路，一有事就“跑”，或大跑或小跑，跑是他的专业。嗓门又大，在任何交际聚会中，只要有陆铿在，就听他一个人讲了。一次我也住在同一座旅舍的另一层，打电话找他有点小事乞助，他说：“我马上就来。”我电话筒刚放下不久，便听到有沉重的跑步声，一开门果然是大门神，含笑而来。

这次在台北，我忽又收到陆铿紧急电话，说老朋友俞国基兄娶媳妇。“国基不知你爱台北，但你一定要参加婚礼啊。”我说：“那我得买点礼物啊。”陆说：“我办我办，我以后和你算好了。”时未到半天，他又来电说：“你不用出钱，一切都办好了。”——原来他把这消息也告诉星云大师了。星云说：“应该送点礼吧。”陆说：“应该吧。”星云说：“那末你和唐教授都不用送了，包括在我的一起吧。”结果星云大师送了新婚夫妇一笔可观的礼，并在其中拨出一小部，说是陆铿和我分送的，弄得我好不尴尬。但是陆铿已经“办好了”。我又从何扭转乾坤呢？酒席中陆又替我介绍认识了吕秀莲“县长”。——吕县长搞台独，陆铿显然全力反对的。但私人之间，英雄识英雄，仍不失其为“二十年老朋友”也。

去年春季，我的日本朋友西村成雄教授正在写一本日文的《张学良传》。他从三藩市回日本，希望便道经檀香山访少帅一下，那怕“只见一分钟”。住在三藩市的朋友，认识少帅的多的是。但屈指一算，朋友之中真能帮助西村去一访张汉公的，恐怕只有一个并不熟识少帅的陆铿了。我就把陆铿的电话告诉了西村。果然这个“为人谋必忠，与朋友交必信”的陆大汉，终于把西村弄到夏威夷，让那位不愿见客的老隐士张学良在郊外乘轮椅散步时与一个来自日本的访客西村成雄，“偶遇于途”。少帅对这位不速之客印象甚好，竟然把西村带回寓所，谈了个把钟头，并且照了许多像。——这就是别号大声的陆铿，也是我所知道的陆大声。

转型期的中国是五光十色的。真历史比假小说更有趣十倍。写历史的人不能只看重帝王将相科学名家，什么孙、袁、蒋、毛、邓；什么顾维钧、胡适之、李宗仁。光看中他们，这多彩多姿的时代就失去它的真相了。我们也要写写和我们同级同等的草根小民和草莽英雄，他们才真正是这个时代中“沉默多数”（Silent Majority）的代表，这个时代中真正的主人。因撰〈记老友大声陆铿〉供众二十年老友一笑。也让后之读者知道知道我们这个滑稽的时代。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花园小洋房

老虎记者

——胡菊人

人生际遇无常，又受时间空间的隔阻，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而又结为知交，是靠一种缘分的。我与陆铿大哥本来天隔一方，他在昆明的监狱里，我在自由的香港，彼此年岁相差了一大截，资历、背景、性格都完全不同，自他出狱并来了香港之后，彼此成为肝胆相照、忧患与共的朋友，情如兄弟，共同创办事业，试问事先怎么想得到，不能不归之于缘分，这个缘分，在我这个小老弟来说，感到是平生难得的机遇和幸运。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刚来香港的日子，卜少夫老大哥为他接风，我忝陪末席。在此之前，我已略为听闻他的事迹，特别是揭露孔宋贪污案，本已对他十分钦佩。此刻亲见其人，亲耳听到他的讲述，在满座的唏嘘、赞叹和庆贺他逃出生天的话语中，我五内触动，热泪盈眶，当时我的感触，虽然隔了快二十年，到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印象很深。

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是为《明报月刊》向他约稿。那是一九七八年，要出版《中共建政三十年》特辑。是孙淡宁大姐出面邀稿的，她在大陆时就知道陆大哥。陆本来犹豫，后经认真考虑，才执笔撰写。不过事后这篇题为〈三十年大梦将醒乎？〉的辉煌巨文，我读原稿时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发表后读者则更是交口称誉，认为是评论中共数十年以来极少数最精彩的文章之一，有事实、有理据、有感情，痛快淋漓，真是第一流的文章。《明报月刊》这一期自是洛阳纸贵，《读者文摘》林太乙要予转载，台湾方面有人向我接洽购买万部，大概是“内部发行”，那时候《明报月刊》还是被定为“匪情刊物”。

接着，我们就开始了共事十多年的日子。先是与傅朝枢先生合作创办《中报》和《中报月刊》，我才真正认识他做事的冲劲和干劲，他作为总主笔，又刚来香港,对香港社会并未熟悉，但他马上就进入情况,知道什么新闻重要，在他总主笔的社论写的非常精彩之外，还约了很多好稿，并且利用任何机会去取得大陆的独家消息，布置新闻线索，譬如刘少奇在家乡获得平反，就是他事先联络蔡省三先生乘到大陆旅游之机而获得的，轰动全球。对于香港新闻，他认为重要的，甚至自己去采访。这本来不是他的职责，但因为采访部最初没有做好，他只好自己出马。

然而令我感念最深的，是傅先生对我作“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要求他保持中立，他大声地回答说：“在道义问题上是没有中立的！”其实他可以置身事外，然而他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对我的帮助很大，也给我以极大的安慰。我们知道，他当时要养家，《中报》是他来香港后的第一份工作，没有了这份收入，生活就会马上陷入困境。但他全然不顾，一心以朋友道义为重。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俗世间又有几人能之？

我们先后离开《中报》，吴甿、张文达、林也牧、黄锦江诸兄亦陆续离开，一起创办《百姓半月刊》。余纪忠先生对我特别同情，予以鼓励，并义助一笔创刊费。他本来是不要我还的，但在《百姓》逐渐有了盈余，五六年之后，我分三批汇寄归还时，余先生把最后一批退回，说是已经还清了。这是对我于困境当中仗义之助，我是铭心感激的。

在《百姓》十多年当中，我和陆铿大哥合作无间，他后来到了美国，身兼《华语快报》的重责，对于《百姓》的工作亦毫无半点松懈，写稿、约稿、采访、开座谈会，如在香港一样。遇到有什么大困难，他就会马上从纽约赶回来。在这十来年中，他每自美国回港，我就增加了信心，整个办公室也立刻添了生气。这是因为他充满了工作的劲力，点子又多。在他秉性而言，似乎天下无难事，任何困难都有办法解决的，他自命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并非虚言。用大陆的通俗话来说就是“富有战斗精神”，愈是艰难的事情，就愈会激发他冒险犯难的勇气。在他这部回忆录中，应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

在这里，我只举出一个在他看来十分平常的事例。有次香港打十号风球，他早上起来就要上班。但走到街上，狂风暴雨、无电车、巴士任何交通工具，按常情常理，应退回家中等待风小的时候再出发。但他面对风雨的横暴，绝不退缩，就要和大自然斗一斗，从北角到湾仔步行到办公室。这可以反映出他平生所遇到的横逆，如为了新闻甘冒坐牢甚至杀头之险，而仍然硬冲过去的英勇个性。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无论从面相、身材、健力、动作、衣色、声音、动劲等各方面综合来看，我除了形容他像一头猛虎之外，实在想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描述。特别是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向来是直来直去的，头部绝少左顾右盼，也不向后望，一往无前，这不正是老虎的特征吗？以他采访新闻勇往直前的精神，正足以证明他性格中的虎性。

不过，采访新闻并不是单靠横冲直撞的“虎性”就能奏效，这当中还需要很多的说词、技巧、机灵、待人接物的态度、博取别人的信任、审时度势的考量，千变万化，花样百出，这于他是优为之的。我听过他说以前在大陆一些采访的故事，如何运用机变，不禁拍案叫绝，不知他在回忆录中会不会写出来。就在《百姓》时期，也有不少。单以采访班禅夫人来看，如何了解她的际遇，如何探到她的住址，如何赚到守卫森严的警卫的开门放进，如何让班禅夫人接受访问，实在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又如访问胡耀邦、许家屯，也经过很多的曲折。

我想说明的是，不少友人说他粗枝大叶，其实他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也可以用他的字迹来说明他这种个性。很多人说他的字迹难认，写得龙飞凤舞，在似与不可似之间，有大而化之的味道，然而其实若一笔一划细细看来，却是清清楚楚，好不苟且、笔划又极为深刻用力的，但表面看来却令人飞舞凌乱、“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叹。我觉得从他的字体，最可以显出他粗中有细、刚中带柔的一面。但本质上还是耿直。

又有人批评他“口疏”，藏不得秘密，也许在小事上是这样的吧。但是他如果要守秘，却是守的极紧的。当年他揭露了孔宋大贪污案，供给他资料消息的那个人，晚上跑到他家，跪在他的面前，请他不要说出来。他说：“我即使杀头也不会泄漏，你放心好了。”结果在逼供之下，确实承担了杀头的危险，也没有说出来。而且一直守秘了几十年。我想就凭这一点，加上他为新闻而坐牢、受苦受难，和他采访的精彩业绩，矢志一生为新闻事业服务，视新闻为第一生命，综合来看，实可以称为“新闻记者的典范”。

他极为重友情，是一个可以为朋友赴汤蹈火、救难扶危的人物。如对于李荆荪之冤案，他愤愤不平，上面我提到〈三十年大梦将醒乎？〉这篇文章，就用了“陈荆荪”这个笔名，以表示对李的怀念。后来李荆荪在台湾出狱，不久逝世。陆大哥在纽约，一定要去台北在他灵前鞠三个躬。但在当时他列入台湾黑名单，连时任国安会秘书长、他的老朋友蒋纬国将军都告诉他，他若来台，不能担保他没事。但他坚决要去，以表他的哀痛的心情。是我判断当

时形势，即当时申请入境的种种迹象，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力陈利害，传真给美东的杨力宇教授转给他，他才万不得已的打消赴台之意。对于他这决心冒着再次坐牢之险仍要送李荆荪最后一程的冲动，我深深体会到他对朋友是如何情义深重。

当然，任何人都有缺点的，陆大哥自亦不能免。他这本自传定名为《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为什么要忏悔，我亦知道，这里就不再说了，且看他书出来以后自己怎么说吧。

在知道他的回忆录写的七七八八之时，我在四月底在《明报》上写了〈一部值得写的自传〉的小文，点出了这部自传的历史价值所在，附录于下：

一部值得写的自传

胡菊人

人世间的传记多的不得了，但并不是每一部传记都是值得写的。有巨贾请倪匡为他写传记，倪匡回答说："你又不是在学术文化上有贡献，在文学艺术上有建树，对国家民族有功劳，为什么要为你写传记？"说的真好。

但有一个人是绝对值得写传记的，那就是陆铿。自他于七０年代末从大陆到香港后，我就听到不知有多少朋友敦促他，把他的经历和遭遇写出来，这当中也包括我。而他自己，亦有强烈的写自传的意愿。但是十多年来，虽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

去年，他下定决心，借住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专心写他的传记，现在已完成了七七八八，只差最后两章，已商定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不久即可面世。我衷心为之欣庆，期待着先睹为快。

天可怜见，朋友们敦促他写出里的经历和遭遇，竟是苦难的记录，他坐过国共两党的牢，先后二十多年，受尽苦楚，经过险被处决的鬼门关，结果还是活着出来了。此种勇气和坚毅，非常人能为。苦难固然引人同情和叹息，忍受苦难的煎熬亦令人佩服，然而苦难的由来却是因为内战中共军渡江时发了准确的新闻，在反右时说了应该说的真话，而在更早的时候，则是冒大险，犯天颜揭发孔宋贪污案，可以说苦难的背后是为了正义。为了正义而受苦，正是他的自传值得写的原因。

那是一个勇敢的中国记者的经历，反映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记者是如何的艰难，同时，也反映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副面貌，表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又怎可以不写出来呢？

陆大声——闯荡江湖的好汉

——冒舒湮

对老友陆大声，我要说的话很多，一提笔却又觉得茫然无从落墨。这是因为可以说的太多，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大声值得称道的事很多，是一位江湖异人；而他可议之处也不少，正如月有阴晴圆缺，天象如此，人事岂独免？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说穿了，人家的私事，我们无权干预。西方人说得好："那干卿底事？"（That’s not you business）何况为人立场不同、价值观念有别，你以为对的，我未必苟同，尤其是涉及私生活的事，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很难求得定论，也不必统一观点。

大声的工作做的出色当行，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名记者。他为人豪爽热情，急人所急，又能为人所不为，相交遍天下，知己半海内。他的大半生业绩，无论识与不识、是友是敌，众口皆碑。这已经是不争的公论。

不过，他也有为一些人訾议的地方，就是他晚年和海伦（崔蓉芝）的黄昏恋。思想保守的人，对此颇不直大声所为，认为他有背传统道德，“糟糠之妻不下堂”，更有指他是“现代陈世美”的，虽然他并未招为洋驸马。他的结发夫人杨惜珍，曾为他蒙冤受难，数十载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成人，是位值得同情的伟大母亲和贤惠妻子。有人便因而非议大声的抛弃原配、另结新欢。我无权勉强人家改变那样的观点，但情感本来是难从理智的方位来评断臧否的。感情是顺乎自然而发生的，无法计较是非。十九世纪哲人狄德罗说过：“人民无穷无尽地痛斥情感。人们把一切痛苦都归罪于情感，而忘了情感也是人的一切快乐的源泉。”大声和海伦的结合，使大声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呈现满园春色，绽开无比艳丽的花朵，等于延续了他的生命，从而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更何况他的妻子杨惜珍已原谅了他，我们似乎无必要哓舌。

我和大声、惜珍，都是挚友，至今尽管他俩的关系发生变化，我依然不改初衷。惜珍是一位为社会尽责、口碑甚好的牙科医生，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能以博大宽仁的高姿态处理这件大事，是她的理性战胜情感，进入了精神升华的境地。她认为，大声吃了半辈子苦，到晚年让他心情愉快，也是应该的。这是何等仁厚的伟大情操，确非常人所及。惜珍不从个人恩怨来决定爱憎，这是她的明智处。她为大声做出极大的牺牲，但她能以社会效益为重，而不追究大声的责任，正是她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形象所致。惜珍能为大声开脱，外人又何必死死纠缠？我同情惜珍，也不否定大声。

男女之私，情感的事是很难予以判断曲直的。大声的孩子对父亲的转变，极其不满，责备乃父：“一个进天堂，一个入地狱。”大声对之，不以为怪，反自我嘲讽：“对，妈妈进天堂，爸爸入地狱。”气量也够宽宏的。这正是大声之谓大声，与他在工作上表现的一股闯劲息息相关，斯闯荡江湖的英雄本色也。

试观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巴尔扎克的情欲大于理智，他和众多的女性发生关系，一生中收到一万二千余封女人的信。一位伟大的作家在情欲与理智的斗争中表现如此，说明他将纯情理想化而赢得伟大的成就。但丁九岁时初次见到贝亚德，便留下永恒的爱恋。以后，贝亚德的名字，成为但丁创作的动力。在《神曲》中，贝亚德是但丁进入天堂的领路人，是推动但丁走向世界文学巅峰的精神女神。但丁的青年时代，也放浪过、风流过，到处寻找女人，列举在他的作品〈六十〉一诗中便不下六十人。但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历史，决不会把此事放入但丁的档案内，决不会愚蠢而残酷地苛求这位伟大的诗人。歌德认为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他认为人应当有“第二次的青春期”，他自己就有多次的青春期，七八次热烈的爱情历史，每一次恋爱都使他重返青春。歌德和十九岁的贝蒂娜相爱的事，发生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他要从这位少女身上找回逝去的青春岁月。歌德在八十二岁时完成了《浮士德》，而在翌年逝世前他还为他心爱过的女人写下最后一首情诗。如果没有多次爱情的激发，就没有歌德。如果雨果生活中失去了他的情人，人类世界的文学宝库中也许要减少许多美妙的篇章。毕卡索就在数不清的女人身上获得灵感。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也许可当个好记者，但很难成为一个大作家获绘画大师。

大声在某些方面与但丁、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毕卡索相似，这正是他在事业上取得高度成就的动力。

我不主张一个人用情过滥，爱心不专，但从大声这样的人来说，是合乎他的性格的，也是不足为病的。

●舒諲，原名冒舒諲，明代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之后，当代诗文家冒广生先生公子。家学渊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造诣亦高，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所写《董小宛》一剧，在重庆上演时，陪都为之轰动。

大声结识舒諲于抗日战争时期之重庆，未料，两人恋爱及结婚对象均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牙科之女生，故有特殊连襟关系。舒諲因思想进步，早岁即为共产党同路人；而大声则思想反动，和共产党长期处于敌我矛盾状态。惟在向往民主自由上获致共同语言，保持友谊不辍。舒諲身居都门，且有侍广生先生应毛润之邀赴中南海作客，谈诗话词之机缘，而坚持说真话，则始终如一也。即使在《人民日报》发表之散文，亦不改其风格。

大声在感情上背离原配后，为不少老友所不谅，而舒諲、玉润伉俪则表示同情，往来如故。得悉有《回忆与忏悔录》之作，抱病撰此文相勉，谨以数语为介。

陆铿，陆大声

——卜少夫

画鬼容易画人难。

人都不知鬼是如何形象，可以任意涂抹；人是日常见到的，不能随便勾勒，一定要刻划出他的神态来，所以画人比画鬼难。

陆铿，陆大声即将出版他的回忆录，要我写一篇介绍他，谈他。我们相交已半个世纪，知道他的太多太多，反而不知如何下笔。既然他有命，限时交卷，也不得不信手拈来了。

他现在没有任何头衔，就是“名记者”三个字，或者成为资深报人。全身都是记者细胞，横冲直撞，五十多年，可以说无往不利。他在制造新闻，也在捕捉新闻，他的经历，也是可圈可点。有人说，没有做过牢的记者，不算记者，当属偏狭只见。他坐过牢，但他很少标榜只有他是记者，别人没有坐牢的条件，所以不是记者等等。

也正是由于他有这段苦难的日子，在生活自由的时候，他创造了第二春。友好们批评他背弃患难夫妻，我的内人苛责他：“你有第二春，杨惜珍（他的妻子）的第二春在哪里？”我认为他是在争取补偿，补偿他在牢狱中白白消失的好时光的损失，值得原谅吗？莫衷一是。

他的采访生活多姿多彩，出狱后更有声有色，游荡于海峡两岸之间，撰写了极富新闻性的精彩报导，胡耀邦、星云大师，一时的新闻热门人物，不知是他增加他们的知名度，或是他们增加他的知名度，其实彼此都已知名。

卢骚的回忆录，那样的坦白直率，较少的，大部分不免自我膨胀，自我夸张，同时也省略若干不可见人的事件，陆铿的回忆录全文，我未读到，如有上述情事，也不意外。不过，一个新闻记者一生记事，柏杨说，不过眼前一些浮沉的泡沫。但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浮沉的泡沫必不可少，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陆大声的著作，与所有的新闻从业员的著作相等，不是什么经典之作，但是反映了时代，是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见证。

肝胆相照·道义相许

——丁中江

我和大声订交于民国卅一年冬，当时我是重庆《国民公报》的记者，大声则代表重庆《侨申报》，我们一起参加四川自贡市政府邀请的自流井盐业访问团，彼此一见如故，很快的成为好朋友。不仅因为我们都对新闻工作具有浓厚的兴趣，志同道合，而且我们又同为云南人，更难得的是我们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人之相交，能有这么多巧合，实在很不容易。岁月如梭，我们订交时间为少年，转眼已经过了五十五个年头，少年书生今已年届八十，白头相对，历经世变，回首前尘，不胜感慨系之。

他终身以“记者”为职志，真是一以贯之。自我和他递交以来，他没有一天改变记者的立场，任何时间，任何困难，任何打击，他都是记者本色。近年来常在电视上看到他白发苍苍跻身在记者群中，采访重大新闻，从不自惭年迈，老而弥坚，乐也陶陶。

早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他开始记者生涯，就废寝忘食，以猎求最大新闻为人生大快事，我曾笑他说，你未来的最大悲哀就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大新闻，感到活着没有生趣，最后只有自己创造一个 惊世骇俗的大新闻而死，结束一生的采访生涯。

他的这本《回忆与忏悔录》写出了他所经历的、震撼的一生。做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的经历的确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空前绝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走遍了欧洲战场，又在亚洲亲见投降后的日本。在欧洲和亚洲，美国三位五星元帅，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他都打过交道并与马帅又书信往还。在战后的南京，他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为揭发孔宋贪污国家外汇而抗颜面对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又在办广州《天地新闻日报》时遭广州警备司令部逮捕拘押。在大陆变色后的云南，两度遭中共拘押坐监廿二年。一个人前半生做了国共两党的牢狱，时间又那么长，却能依然故我，继续特立独行，继续终身的记者生涯，已是奇迹。更独特的是他离开大陆后，在香港办《百姓》杂志，到北京访问中共总书记长谈两小时，他的〈胡耀邦访问记〉竟成为胡耀邦被迫下台的三大罪状之一，这真是让人呢难以置信。两年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秘密出走美国，是他在旧金山机场接机，并与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联络好，安排许家屯到洛杉矶的西来寺暂住，这又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中共认为这出戏是他参与制作、导演和一同演出的，因而他成为中共不受欢迎的记者，再也未能取得中国大陆的入境签证。

可是，在那些年代，他也不被台湾当局欢迎，被拒于台湾门外。很荒唐的是他不受欢迎的理由竟然说他替中共做统战，这样的大帽子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公开讨论，国家安全局也肯定他为中共统战。由于他八十年代初来台湾是我出面邀请，办理一切手续，而且国民党和情知单位也都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所以每一次讨论陆铿的专案，总是把我的名字列上，并且注明我是他的至友。有人告诉我，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国家安全局张王敬煦曾说明我和他的关系，特别指出，陆大声在先父逝世昆明时，挺身出来料理一起治丧事宜，并办纪念会，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照顾我的母亲，所以我们是生死之交，我热心邀请他到台湾来，纯为私人情谊。汪局长这番话确是事实。

先父在一九五六年与昆明逝世，大声刚好第一次出狱，为先父之丧，代我尽人子之道。虽然云南变色已十二年，我们之间阔别也十二年，时间空间都有了大转变，然而我们之间情谊不变，先母多次来函都重提及父亲丧事全由大声持内外，并且恭请母亲迁往陆家，大声每天早出前及晚归后，必陪伴母亲，备述外间一切，嘘寒问暖，母亲和舅舅都说大声代中江尽孝道，有古人风。然而不久反右运动，他被划为亲美反苏极右份子，又锒铛入狱，一坐十八年。他前后两次入狱，合共做了中共牢狱廿二年。第二次出狱后不久他竟获准到香港，这也是一大奇迹。

民国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年四月卅日他到了香港。廿九年前的一次冒险旅行，投入变色的昆明而竟断送了人生最好的三十年青春，他却斗志不懈，竟然重新投入自由世界，继续为新闻自由而奋斗。不过他的一些表现，比如撰文〈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发表〈胡耀邦访问记〉，都是出人意表，为他人所不可能做到之事，故而引起很多人、甚至许多他的好友的怀疑。我虽然没有怀疑他为中共做统战工作，却在生活上和观念上与他有很大的落差，毕竟他和外间生活有将近一个世代的疏离，而这些年的时光，正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生涯，他无法了解我们在海外如何艰苦的奋斗，正如我们无法了解他长期的牢狱生活一样，因此我们之间会产生很多误解。不过我们毕竟是肝胆相照，道义相许的知交，所以一些误会通过接触逐渐冰释。

他一生多采多姿，为人所不能为，所不敢为，因此，他最初向我提出要写《回忆录》的计划，我是双手赞成。一个毕生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近六十年的人，在垂老时把他动人而精彩的采访生活写出来，本身就是六十年现代史的见证。有血有泪，许多内幕世人尚不详知。而其中表达的忏悔之情，更具陆大声的特色。所以这本《回忆与忏悔录》的问世，将是一部不朽之作。

祝我的老友长寿，待他一百岁时写这部《回忆录》的续集。届时，除回忆外再无忏悔。而那时的中国，将会接近我们这一代人所追求的理想的中国。

一九九七年六月，香港回归前于台北

体健·胆高·脑强·声大

——徐佳士

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人比龚选舞兄更了解我们的共同导师陆大声先生。读了选舞的陆大哥素描后，我就觉得再也无法添加任何有意义的笔墨了。

这儿我能做的，是设法用比较抽象的概括方法，做一番综合。今天我要像大约半个世纪前，还是一个实习记者向他的采访主任交稿一般，小心翼翼列出下面这几点研究结果：

体健：几乎没有人特别把身强体壮列为陆大哥的成功因素，只有当卜少夫先生和陆铿先生“二老”近年来相遇时，偶尔竟相揖言“我比你先走”，而使人发现这两位标准记者具有这个共同的“标准”——体健如牛。

在这儿，体健是一个简化了的词儿。这个“体”包括心理和身躯两部份。陆大哥的心理状态的健康和壮实，跟他的体能相等，像这么一位有如此健康胸襟的人，那能没有正常的脑波、血压、神经系统、皱纹稀少的皮肤和结实的肌肉？

胆高：这儿胆高一词意味着勇敢和识见（所谓胆识）。“胆子大一点”实在南京《中央日报》我们做记者的人，时常被这位采访主任叮嘱的一句话。他把我们大胆采访得来及大胆写出的新闻，非常大胆地承担一切可能的危险后果，送到编辑台上坚持刊登出来；他当面向权威隆高的党总裁雄辩滔滔，说明自己冒犯孔宋的作为就是遵从“校长”的教育宗旨，都是胆识的表现。

脑强：在陆大哥头盖骨下面有一具特高效能的资讯机器——电脑。它的高强能吸收（in-put）和处理（processing）的能力，让他的读者能够享有那么多富美的 out-put。这部“电脑”中储藏量之丰，和调取的便捷，正是这本回忆录能够产生的主要原因。陆大哥告诉我，回忆录中的这许多人名、地名、时日和其他细节，都是从记忆中掏出来的。他没有笔记，坐牢和奔波使他无法为自己的生活来做笔记，做了也无法保存。

声大：于佑老为陆大哥取“大声”为号，是来诠释“铿”，一般人觉得这也足以描绘其说话的分贝高度，但是“声大”一语更可用来形容这位记者对社会的影响力。有人要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另有人要破例接受他的采访，这显然都是因为他的声音足够强大，所以要想加以压抑，或者要借用其权威向广大的社会发言。

一个身心健壮、有非凡胆识、超人智力、令小人畏惧、影响力无远弗届的新闻记者就是陆铿。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于台北新店山居

粗中有细，有胆有识

——我的同事、连襟、朋友

龚选舞

和陆大声先生交往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在这翻天动地的五十多年间，我们先是同事、继为连襟，最后变成了好似兄弟的朋友。说是同事，显然有点高攀，事实上，当他以权高、声宏、量大而又威重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地位，把握这个新出校门，到处碰壁的土包子任为“临时试用实习助理记者”，对我这个尚未支薪而只领津贴的额外人员而言，所谓同事，只不过是他路老总手下的一名小小伙计罢了。说是亲戚，我们固然同为司法前辈扬大法官步青名下两位乘龙快婿，只不过他是早进门的三姐夫，而我则是名列第四的么女婿。事实上，我之能够顺利完婚，他在一旁也着实帮了大忙。至于朋友，我们也是着着实实也吵吵闹闹地做了五十年；只不过他永远像位大哥，而我则一直忝附骥尾。

有了这般真、也如此亲的绵密老关系，陆大哥一直认为我是最为了解他的亲友；而我自忖，对这位最富传奇性的大哥，我也该是认识得最清楚、也最深入。

无视禁地无惧当道

一般人看来，高达、挺拔、豪放、大胆而气势甚盛的陆大哥，视为粗线条的新闻界英雄人物。一辈子只知道不顾老命地冲锋陷阵，挖掘要闻，好像他这个人一路只凭猛冲急闯，便已平地崛起，在新闻界成就大名。

当然，搞新闻，一定要胆子特大而冲刺有力，表面上，求名心切、不顾一切的陆大哥也

确是如此。年轻时，我们亲眼得见他为了争取新闻，不惜夜以继日地东冲西闯，既无视于警卫森严的禁地，更无惧于手操生死大权的当道，以是，我们便送给他“陆大哥”的名号。

可是，仅凭大胆直冲，大不了能在新闻界里成为一位颇有作为的“拼命三郎”，却不能直上九霄、悠游禁区的探来震动大地的头条大新闻。

说得更清楚一点，陆大哥除去坐牢的廿二年，而能以二、三十岁青年和六、七十岁老翁，先后在南京、香港、美国和在中国分别以极短时期，采来最大新闻，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平地掘起、闹翻了天的大风暴，大胆固属有助，但真正成词大功的，却还靠他暗地里的精心设计和妥善准备。

换言之，是他的有胆有识、粗中有细，才使他在新闻界成了大功，久享大名。

下面，便是他有勇有谋的几个例证。

重点突破树立权威

抗战胜利，《中央日报》迅即于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十日在南京抢先复刊。不久，《新民报》、《扫荡报》（后改为《和平日报》）、《南京人报》、《益世报》、《南京晚报》、《大刚报》、《朝报》相继出报。而国内各大报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北平《华北日报》、天津《民国日报》、广州《大光报》……以及美联、合众、国际、路透、法新、甚至塔斯社等国际著名通讯社，也纷纷在南京设立颇具规模的分支机构。一时，华洋记者云集，金陵顿成东方新闻重镇。

起初，华洋同业，各有门路，各显神通，一时难以分出高低。《中央日报》在新闻学者、职业报人马星野先生主持下，虽以新闻翔实、编排大方、资料配合及时、副刊多采多姿而迅速在本地领先，但仍遭沪上各大报轻视，特别是西方各大通讯社人员，更不把这家“官报”放在眼里。

复员第二年（一九四六）初，原驻艾森豪盟军总部的年轻记者大声陆铿道经英、美返国，即以廿七岁青年出任中央日报社采访主任。他看出要建立央报在新闻上领导地位，必先从培养大记者、争取大新闻入手。于是，在社长马星野及总编辑李荆荪的全力支持下，他首先整顿采访组，招请一批新姿大学毕业而有志从事新闻青年，分别负责各类新闻采访工作，好好地守住一般阵地，（后来在新闻界赫赫有名的祝修麐、徐佳士、漆敬尧、张士杰傑诸兄，固属当年陆氏手下新锐，而李蔚荣、潘启元两兄也曾在社交多方协助，至于在下，其时也追随上阵，充当马前小卒。）然后腾出他自己，全力专门突击重大新闻，并务求快速、专有！

首先，他体察出当时全国一致注目的是国共之间谈谈打打变化莫测的和谈新闻，而其主轴则为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与美国调停使者合成的军事三人协调小组。其时，小组三方面负责人发布新闻的方式完全不同：美国代表尽量给予洋记者们方便；被马歇尔特使尊为谈判第一好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则独占“国内市场”，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不断地对各方巧妙的提供其有利于共方的新闻与背景资料。至于国府代表徐永昌将军，则一味遵行其在军令部长十年任内养成的守口如瓶作风，不仅不发一言，而且不见人影。

正当中国记者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时，陆大声却想出一条妙计（有人说是“毒”计），并随即施展。首先，他在央报上刊出“徐永昌将军失踪”消息，引起各方注意与疑虑，接着，当美方人员也惊异地向国府探寻，而最高当道也下条子查问究竟时，他才侃侃据实上告——确实是找不到徐将军，也就不知道国府方面对于军事调处的意向与看法。最后，当蒋主席也认为在这类影响重大新闻上不能尽让共方占先甚至独占时，也就示意要徐将军开口。

俗话说“不打不成相识”，经此一番折腾，徐将军先是奉命经常与大声兄保持联系，并

相机告以新闻发展与国府立场。久之，徐将军发现广与各方面接触的陆大声多有见地，颇有助于许对全盘局势的了解时，他俩很快就变成了忘年之交。记得有次大声兄要我随他访徐氏时，见他俩不拘形迹、交谈一如老友的情状，我还以为他们相交多年哩！多年后，大声兄陷身大陆，而我与徐氏相逢台北时，徐先生在殷殷询问大声遭际之余，竟不觉感伤流泪。

（另一位在台深深系年大声的是党国元老于右任先生，于先生与大声特别投缘，四十年代初，大声即出入于门，而于老亦对其待若子侄。大声之号即于老取的。复员到了南京，大声常能自于府获取高层独家新闻，有时，为证实中枢要会是否举行，常以电话向于府秘书、副官常洵，对方无不据实答覆。国府迁台，在下每与于氏晤谈，多避免语及大声。因偶一提及，总令于老感念之余，流泪不已也。）

自大声与徐氏间建成新闻管道之后，在当日视为顶尖热门新闻采访上，很快便树立最高权威，渐渐地，国内各报及国际各通讯社一见央报常有此类独家消息，乃纷纷与他交友，向他“请益”，向他求证，而他也就也就取得了要闻首席记者地位。

接下去，报社更在他已经建立的领导基础上，采取了一连串增益并巩固他的权威地位的种种举措。

访日访美抱负得展

马星野先生是当年以“学者从报”的典型，他自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成归国后，先在他的母校国立政治大学创建了新闻系，继续任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及胜利复员，在担任了短时期的中宣部驻京特派员后，更兴冲冲地出掌国民党党报龙头的南京《中央日报》。

我说他兴冲冲地接下央报，一点也不夸张。在此之前，从读新闻、教新闻、到管新闻，一路上只不过是纸上谈兵，难以一展抱负。胜利给他带来机会，让他得以执掌一家首都大报，印证所学，那有不兴奋之理。

那时，他自己还不过是为三十六岁涉世不深的青壮年，所能、所愿延揽的也多是一批二十来岁的年轻学生，以是，当日担任央报要职的全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他们中，如总编辑李荆荪、总经理林遇选、副总编辑朱沛人、副总经理黎世芬、主任秘书周天固、资料室主任耿修业（后升副总编辑）以及先任采访主任继升副总编辑的陆铿，全都是当年马老师的得意门生。早年同窗、而今共事，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一组生气勃勃、合作无间的工作团队。举一个例，李、凌两位为求编、经两部密切联系配合，便曾经交换职务，搞得全报上下一时竟分不清他们谁是编辑、谁是经理！而在新闻的大政方针上，甚至党政段戏的应对上，马对李、陆更是言听计从。

住在楼上楼下的李、陆两位，证实交称莫逆。记得陆大声刚升副总编辑不久，报社突然宣布李总因病告假、陆副总越次代理。可是，晚间李总依然照常上班，倒是陆代总突然不见。第二天看报，才知陆大声参加了中国总编辑访问团，应日、韩、占领军麦克阿瑟元帅之邀，与新闻界日本问题权威陈博生、王芸生、崔万秋等前往日、韩访问去也。

未久，旧事重演，当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旧金山航线开航，邀请全国各大新闻单位总编辑组团前往美国访问时，健旺如常的李总再告病假，而英气勃发的陆代总又与其他资深报人陈训悆、赵敏恒、费彝民辈，同机访美去了。

事后，谁都明白报社之所以连续采取这种“假病虚代”举措，主要的是加速促成陆大声兄在京沪平津记者群中的权威领袖地位，而大声兄亦不负马老师和李大哥的苦心培植，先在东京、汉城归来后撰写了一时脍炙人口的《麦帅治下的日韩》专书，而在美京短暂停留，随

团晋见杜鲁门总统之际，更分函美国政要、提出问题，进行开创性的书面访问。等他回到南京，被访诸公也纷纷函覆，就中，不久前始自中国调处国共纷争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还恳切修书答问，给予央报一次最大的专有、最大的胜利。

硬闯上层兼交下层

陆大声在采访上的有胆有识、粗中有细，在南京时代，还有着下述的几个例证：

——记得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前述马歇尔元帅奉召返美、出任国务卿要职，这是一条特大新闻，大声兄这天一早就赶到报社，先拨了好几通电话，获致了有关线索，接着匆匆回家，换了身当年在艾森豪总部担任随军记者时的美军制服，然后乘坐联勤总部借拨央报的那辆军用吉普，并令随车借来的驾驶兵载他直驶马帅公馆。

一到公馆大门，马帅正准备动身，门前几名警卫正想查问陆的身份，他已盎然直入，向马帅侍从副官表示是专门来送行的。就是如此这般，他终获追随马帅之车直驶机场，单独亲睹了蒋主席和夫人话别马特使的场面，还留下历史镜头。

硬闯，证明他大胆、机智而有气派，但是如果没有那辆吉普、那名驾驶兵，和那套美军军官制服，经他细心安排，供作他的道具，不要说是登堂入室，同赴机场，恐怕连一点边儿都挨不上。

——闯入上层，足见大声兄的“高”招，但在同时，他却也能屈而就下，技巧地钻入底层。说的更清楚一点，他不仅惯于结交权贵，对那些权贵手下的副官、司机之流，也交了不少朋友。记得在那些年头，一遇中枢有什么大小聚会，大官们总是高居厅堂，饮宴谈论，历久不辍，而等在外面的副官、司机为了消磨时日，只好躲在门房或是墙角，打打扑克，推推牌九。大声兄为了获取新闻线索，有时也就放下身段，和这帮“最接近高层”的哥儿们在一起吃喝玩乐一番，组成他的新闻网。每逢春节，陆大声都会自掏腰包分发礼金给这些网众。

其时，华北五省，分属孙建仲的保定、傅作义的张垣、和阎锡山的太原等三个绥靖公署，而在上面又摆上一个李宗仁主持的北平行辕，彼此相互牵制，各自为战，也个个挨打。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石家庄因李（宗仁）孙（连仲）意见相左而告失陷，国府仍决心统合华北战场，让能征惯战的傅将军以华北“剿匪总司令地位总绾全局，统一指挥。”

这是军事上一件大事，大声兄凭经验看得出傅氏在受命之前必将晋京密商，乃在与上述哥儿们交往之际，请他们代为注意。果然，几天之后有人向他提供线索，指出“你要找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南京，晚间在某处和我家老板一道开会……”

大声兄届时前往，意外发现中枢派给傅将军开车的，正好也是他的一位朋友，乃借机钻进车去与那位司机朋友闲聊，不料即在此时，傅将军会毕出门，一上车，发现大声兄早在里面，只有摇头叹道：“你们干新闻的可真厉害！”

于是，第二天的《中央日报》头版上又有一则独家特大新闻。

——然而，最终让陆大声称霸报坛、慑服群伦的，还是他一举而制服了位高权重的外交部长王世杰（雪艇）的得意之作。谁都知道学者出身的王部长秉性谨慎，且几近懦弱，自从被迫当宋子文的“替死鬼”，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送掉了外蒙、削弱了东北，从而引发了舆论界的交相指责之后，乃干脆来一个“闭关自守”，关上了外交部的一切新闻通道，不见记者，也不发有实质的消息。

这样做，不啻断送了外交记者们的“生路”。

外交部既不发稍有价值消息，记者们就来个一致反击，拒刊外交部长演说、迎宾一类的

官式公报。双方坚持，彼此封锁，前后竟达一个多月，一时，外交部竟然被人忘掉，好像不再存在。

不过，日子久了，双方表面彼此坚持，骨子里却都不禁有些着急。

这是，站在一旁，善观火色的陆大声，一见时机成熟，乃出面转圜，在中央日报社三楼大宴宾客，邀请王部长与京沪平津各大报社外交记者共聚一堂，握手言和。他的这次成功的“外交手法”，不唯大大提高他在新闻界的声望，也让京中达官贵人对他刮目相看。

自然，当年在南京，让他在新闻史上，占据光荣一页，也永受各方称道的，还是他对孔宋豪门违章霸结外汇案的大胆揭发，、和事后在层层重压下的一力担当。不过，这件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的本文中定有详细的追述，在这里，我也就不再多说了。总之，那几年由于他在南京的实具惊天动地之能、频作惊世骇俗之举，在记者群中一直被视为神出鬼没的孙悟空！而中外媒体派驻南京记者，一如徐佳士兄在《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纪念册所写“一个不颁文凭的学府”文中所说，每天不到《中央日报》跑上一趟，便觉得工作尚未结束。

提拔后进坚持专业

前述李总荆荪为了让陆副总顺利访日、美，不惜称病告假成全，一时成为佳话。不久，大声兄为了让我能以小记者而出大差，也着实扶了我一把。

记得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凌晨，我正在报社宿舍里睡得好熟好熟，突然被人摇醒，睁开眼，一看站在床前的，可不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陆大声。

“报社派你出差，赶快起来穿好衣服。”站在一旁，他不停催促。我意识出有点异常，一面穿上挂在床头的一套崭新英国呢料订制西装，踏上一双时兴拔佳皮鞋，一面匆匆洗刷，然后轻轻问了一声：“一早出差，请问要到那里？”

“参加记者团前往延安，一小时内便要起飞。”答覆虽然简单，却震醒了睡在对铺的同学而兼同事的漆敬尧兄，只见他睁大眼，摇摇头，一副难以相信的样子。

接着，在敬尧兄的祝福下，我便随同主任乘车向机场出发，路上，他说延安风沙太大，还陪我绕道城南盛锡福满了顶呢帽。带上新帽，我一看我这身新郎官似的打扮，心里不禁想到，飞到那边，我这些宝贝行头不就完了。于是，我不禁有点儿埋怨：“如果昨晚先告诉我，我也好有一番准备。”

“昨晚宣布是你，今早你就走不成啦！”他笑着回答。

说起昨晚，我便想起昨晚发生的事，原来，国军早在三月十九日更突然“打下”红都延安，新闻界一直殷切赶往采访这次意外的决定性大胜，乃几经交涉，国防部方才答应在四月四日指派三架客机，载送四五十位中外记者前往。

这时，李老总改任总经理，总编辑改请老报人王新命副主总笔兼任。早在抗战时期，当共产党《新华日报》在陪都重庆开办时，王先生便有前往延安创办《中央日报》之意，继因中共阻挠未成。此番一听延安收复，老先生便决定亲自出马，以了心愿。想不到就在此时，他老人家创办的一家上海私立中学却发生学潮，非他亲自前往处理不可，王先生打听记者团还有几天才走，乃赶往上海，准备记者团出发前夕赶回。

谁知四月三日他自上海搭乘的也快车竟然在苏州出轨，而他一时也无法觅得其他代用交通工具。午夜一过，由谁代他出此大差，变成众人热门话题。于是，包括主笔、主任和副总编辑朱沛人（政校新闻系首期老大哥）在内的一群“高干”便云集编部，名为议论，实则竞逐。不料，凌晨一时，自社长室与李代总编辑商讨一阵下来的大声兄却笑着告诉大家：“人

选已定，不敢有劳诸公大驾。”

此语一出，诸公莫不怅然而去，而我这个刚刚挣脱头上顶着的“临时、试用、实习、助理”四顶帽子的新进记者，更是悄悄地回房休息去了。想不到，第二天出差的居然是我，事实上诚如大声兄所言，前一晚如果宣布我去，一定会引起大家争议的。说来我的那次出差，与李老总“请假”让大声兄出国，情况大有差别，因为，副总编辑代总编辑办事时理所当然，而我这名小记者之瓜代老总编辑前往延安采访，便是上头的提拔、和自己的运气了。

昔日，在一般报社中，积有压抑后进的传统，一名记者要熬出头，必须一步一步慢慢地爬，可是，在适才适用的前提下，当日央报诸公却宽宏无私、不管那些老套！

回忆起来，尽管一路风沙、尘灰没踝的延安之旅，果然报销了我的新衣新帽和新鞋，却也让我在当年南京的新闻界提早闯出一点名号。尤其是我的第一篇报导，被大声兄加了一个“延安脸谱”的标题，引人入胜，博得好评。

四十多年后，我与由同事又变成连襟的大声在海外重聚，一天，偶忆旧事，问他当年为何派我去出那趟大差，而且事先不让我知晓？他回答说，当时他认为采访原是作记者的专业，有事需要安排采访，自然要先考虑派记者。否则，大员尽出大差，小记者拣蒜皮，不唯搞乱制度，抑且打击记者群的士气。派你到延安，派徐佳士随桂永清出海，都是基于此。

为郑毓秀董显光欣赏

在这里，我要插上一段。大声兄在央报大胆揭发孔、宋霸占外汇、并以显著标题刊出国代“请杀陈诚，以谢天下”新闻之后，相继引起大风大浪，自觉服务公营报社可能逐步受限，乃毅然辞职，改任老报人成舍我先生主持的北平《世界日报》南京特派员之职，整天坐着成老板新购美国制造深红耀眼豪华汽车，四出采访。有次，司机眼尖，瞥见成老板挤在一个车站人群中等巴士，大声兄即命停车，请成上车，并问怎么在这里等巴士。成答：我的车不是你用作采访了吗？你的事重要。陆答：你的人也重要呀！一时传为佳话。

不久，大陆变色，大声兄远赴香港、日本打算另创事业，而我则以央报驻台特派员名义，追随央报总经理黎世芬兄先期去台筹开央报台版，其时台湾省府仍由魏道明先生主持，对央报不多理睬，让我们遭遇不少困难。一天，大声兄突然来台，一见面便说要去台北宾馆借辆汽车，邀请我们一同遨游。世芬兄与我都不相信他具有如此神通，不意时他果然乘坐台字第一号礼车返来。事后，他告诉我，一九四七年他为了便于采访新闻，曾半开玩笑地拜在魏夫人郑毓秀女士名下。而今，远道来访干娘，借车还不是说上一套便行的事。原来，一九四七年春，他首次访台，魏道明主席设宴欢迎。饭后，魏将一封台币送给陆，陆不仅峻拒，且指为侮辱，弄得气氛极为尴尬。不料魏夫人、大律师郑毓秀却以教训口吻说：“你不要搞错了，我们见你从南京来，身上没有台币，给你一点方便。你偏偏想歪了！伯聪是行贿的人吗？你陆大声又是受贿的人吗？”迫得大声兄只好道歉。在不打不相交的情况下，认她为干娘，陆乘势拥抱了她一下。

那时，世芬兄原打算请他留下帮忙筹备，他说他只想自己办报。准备在东京复刊广州被封之《天地新闻日报》。他一度赶往嘉义空军十大队驻地，与好友、时任基地司令的衣复恩先生团聚。不久，又转到日本去了。

一九四九年底，朱抚松先生突然驾临寒舍，说是新任中广总经理董显光先生要请大声兄返回中广担任副总经理，但那时大声兄行迹不定，无法联络。过些时，更陷入大陆。其后，偶检视存卷，还发现抚松兄留下的大声兄的入台证。于是，我想：“如果他当年留在台湾，也许就免了一场牢狱之灾。”可是，话也难说，在当时日益紧缩的台湾，谁知道他又会闯下什么大祸！

发表〈三十年大梦将醒乎？〉

延安之捷事后证明只是一种“假象”（恕我心存忠厚，不想说得更为难听）。接下去，国军一路“转进”，共军长驱南下，在下跟定报社返往台湾，大声兄一家却阴差阳错的陷身云南老家，受尽折磨。翻过六十年代，我家移居巴黎，陆、龚两家开始有着联系。在大陆全面挨饿之时，吾妻惜瑜千方百计以油脂寄其姊惜珍，稍解艰困。等我们一九六七年再移居纽约，大声兄虽仍系狱中，但所获待遇已逐年改善，最后，更在中共政策性放松放人之际，得以赴香港。

一向，我对粗中有细、有胆有识而又能随机应变的大声兄十足的有着信心，认为当年他既能迅速地在南京闯出天下，在香港，他必将突破困境，另创天地。那时，他与在昆明卫生界受到尊敬的杨医生惜珍姐姐租了一间小房，偏处美孚新村。可是，就在那间兼作书室的陋室中，他却洋洋洒洒此写出了那篇〈卅年大梦将醒乎？〉的传世佳作，首先揭露了被誉为清教徒式的革命社会，不仅一样的有着弥漫前朝的贪墨腐化，而且还变本加厉。

这篇大作首先获得《明报月刊》的权威主编胡菊人先生击节欣赏。用作月刊“中共建政卅周年特辑”的“重磅炸弹”，刊出后更让举世迸发了石破天惊、原来如此的巨大回响。连台湾当道也在等不及为他办理入台证之前，转邀他前往访问。

从此，胡、陆两位素味平生的文士变成了如兄如弟的知交。先是，胡先生在受托创办香港《中报》之际，礼聘大声兄担任主笔，未久，两人更在退出“中报”之后，合作创办了八十年代中极具影响力的《百姓》杂志。

这样，平地又是一声雷，大声兄在大陆系狱廿二年、被人遗忘之后，不仅重又站起，而且在热心参与中国、香港事务的研究、讨论、论述之后，在海内外传播界再受尊重。

把左中右独请在一起

在香港再度崛起之后不久，他又兴冲冲前来美国开辟第二战场，出任纽约华文报纸《华语快报》发行人。这家新起之秀侨报的实际负责人是兼营华语电台有成就的刘恕（亚瑟）夫妇，也是当年合创《新闻天地》十一位发起者之一、故人刘竹舟先生哲嗣。亚瑟从小就佩服陆叔叔钻天入地、神出鬼没的本领，盼望这位重入江湖老报人为报社冲出一条大道。

大声兄一开始便主张把《快报》冲出侨社，办成一家以政论见长的政治性报纸，从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起，便在快报开辟“新独立评论”周刊，一心想承传老“独立评论”香火，以达到书生报国目的。

“新独立评论”前后出刊约近三年，逐渐形成为各方面讨论中国统一问题的主要刊物，作者包括丘宏达、唐德刚、高英茂、田弘茂、朱永德、郭雨新、康宁祥、李慎之、熊玠、陈庆、翁松燃、谢扶雅、沈君山、丛苏、王鼎钧、周策纵、姜敬宽、杨力宇、邵玉铭、宦国苍、张旭成、徐东滨、沈策、萧秋义……等，可谓集左中右独之大成。

接着，在周刊已经建立的学术基础上，他再以香港《百姓》半月刊和纽约《华语快报》共同主办名义，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纽约中城罗斯福旅馆召开了“中国前途讨论会”，让左中右独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齐集一堂，自由而热烈地讨论了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路向。会议原定在一间中型会场举行，可是，倾盆大雨也阻止不了与会者的热情，为让四百多位踊跃与会者都能获一席之地，主持人之一的郑心元兄临时与旅馆商理换了一个更大的会议室，仍然是座无虚席。

这次会议的召开，十足地显示出陆大声的人缘既好、组织才干更高，事实上，为使分别来自美、加、台湾和大陆的立场不同的各方著名学者专家如期赶来参加，他前后函电交加的

足足忙了两个月。

美国、两岸三地的传媒对此也甚为注意。北京“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不远千里专程赴会。多年来，公私各方一直有人邀请不同立场的人士，共同探讨统一问题的愿望，均因问题过份复杂而未能如愿，想不到唱独角戏的陆大声却把它顺利完成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旁注意观察，觉得他从创办《百姓》、“新独立评论”，结合各方人士，一直到这次讨论会的召集，都有前后关联的脉络可寻，而次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所以单独约请他前往北京见面，多半也是由此发觉他这个人颇不简单，而乐于接谈。就这样，他青年时代，蒙蒋老总统亲自接见，严询新闻来源，他也当面顶撞于先，至此，复与胡总书记，抵掌而谈天下大事于后，亦可谓为国史异数了。

一向，陆大声就是这样的粗中有细、有胆有识，表面上你只见他嘻嘻哈哈、吵吵闹闹，但是骨子里他却精于策划，看得清眼前复杂多变的环境，充分地随机应变，做得恰如其分！

在这里，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当年，大陆民主杰出人士方励之避难北京美大使馆经年，终获自由之际，中西记者纷纷追踪访问，方先生对大声兄供应新闻特多。同业对此，不免有厚此薄彼之感。后来一打听，原来陆在他幽居使馆的两年中，即不断寄给外间有关他的新闻、评论，积久，彼此乃成知交。

也许，这可以说是大声兄爱交朋友使然，但是，在职业上，他也获得一份报偿。

最后，站在五十年亲戚立场，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先岳父母杨步青先生陈春梅女士，育有四位千金，具慧丽过人，就中，三姐惜珍以能干、大方，早年更被誉为中央大学医学院校花。大声兄与伊结缡未久，不幸集蒙冤被囚，先后多达廿二年之久。期间，惜珍姐日送牢饭、夜裁寒衣，对外则独持门户，对内更抚养陆、杨两府老小共达四代十口之多。及避难来美，亲友原期两人彼此扶持，百年偕老，不意大声兄竟忍心出走，弃家不顾。

据我们所知，初时大声兄为掩饰内心矛盾，曾放言高论，故示从容而事实上则深为不安，如在离家前夕，即曾数度颤抖几乎不能自恃，反映思想斗争激烈。迩来在台撰写回忆录，亦一再声言，将以“回忆与忏悔录”名其新书。

概略言之，在职业生涯中，他不仅成功，且足为后学楷模；但在家庭里，他却不但失败，且有负于家人者也多得太多。难怪他曾经对我表示，像他这种人如生在包龙图时代脑袋非被铡刀铡掉不可！

一九九七年初春与纽约

我看陆大声嚎啕大哭

——刘宾雁

我和陆铿先生第一次会面，是我第一次访美的一九八二年年底，在纽约张文艺先生家里。他的苦难经历，我早有所知，因而一见其人，就颇感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受过半生苦难、坐牢二十几年的人呢！这些年，我见过的受难者是在太多了，其中也不乏坚忍刚毅、百折不挠之士。但是纵使这种人，灵魂和肉体受到的长期折磨也总会留下某种痕迹，不是在形容上、也会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然而我面前这位仁兄，朗朗的笑声和笔直的脊梁、反应的敏捷和谈

吐的爽利，哪里像是一个在铁窗中度过将近一万个朝夕的人呢！

我见过的人们中，有的仅仅“上访”几个月，精神已经有些失常。从国内到国外，我常常遇到的一个疑惑是：那些行为卑劣、引人憎恶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自个人品德操守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经历的迫害或忧患造成的精神失常呢？

可作相反标本加以剖析

陆铿真是可以作为一个相反的标本加以剖析。我的经验告诉我，人的主体状态——他的精神实质和性格以及神经的坚韧程度，外界环境之侵蚀（无论是致命的摧毁或诱人的腐蚀）造成的伤害之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陆大哥的热情豪迈，刚正不阿，如快人快语，人所共知。但一九九一年的一次事件中他的表现，仍令我感到震惊，大概将为我一生中难忘的十大印象或五大印象之一了。

洛杉矶有一家《新闻自由导报》，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刚办的。一九九０年，热心的民运人士权华经过长时间努力，成立起一个理事会，请我担任主席。本来心想无非是挂个名罢，后来却忽然认真起来，觉的把这张报纸办好，设法打进国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他们登报纸招聘，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总编辑，我推荐已在《导报》工作的程凯先生担任。程凯自十六岁起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后又任《海南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干得很出色。天安门运动后被迫逃亡海外。我心想，到哪里找一个更理想的《导报》总编辑呢，便来推荐。不料讨论这个人选的理事会竟花了一天时间，我费了很多唇舌，才被接受下来。其实我连程凯的长相都不记得——不过在《人民日报》每年一次的全国记者会议见过面——打打招呼而已。

一部电脑引致人事纠纷

程凯上任不久，《导报》便有了明显的起色。但是刚刚干了三个月，忽然传来了程凯决定辞职的消息。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爱国华侨曾把一部电脑借给《导报》，用来排版。这位先生很富有，本来是愿意捐赠这部电脑的，但他留了一个心眼，担心这家报纸有一天可能被共产党或国民党势力所掌握。一九九０年年底，他发现《导报》新成立的理事会里有几位国民党人士，其中有一位还是十分活跃的，便要求收回电脑。经我请求，他同意暂缓。但到了一九九一年年初，他发觉《导报》的执委会（设在理事会下，掌管报纸）负责人倾向国民党人士，便决定无论如何要收回电脑。怎么办呢？执委会主席权华主张放弃电脑，到外面去排版。总编辑程凯懂得一部电脑相当于一家报纸的排字车间；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尚可，排字车间却不能没有，便坚主必须买一部电脑。到外边排字组版，每月开支也要二、三千元，并无这笔经费；权华就主张编辑部裁人，由五人减为二人。但这又是程凯所不能接受的。报纸虽小，倘要办好，必须改进，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完成组稿、编改、采访、校对、发行和广告业务等工作的，更何谈改进？权华坚持她的主张，于是程凯便愤然递交了辞呈。权华并未挽留，另有两位编辑，也决定去职。

我觉此事严重，便电告权华暂勿接受程凯的辞呈，待开过理事会再说，她也表示了同意。然而事后她还是接受了辞呈，并决定由理事会王超华代理总编一职。

陆铿是《导报》的顾问，我请他列席理事会会议，他很是踌躇。我力请他参加，才同意。当时我想：大声为什么犹豫呢？是不是不愿卷入这类纠纷呢？——他毕竟住在西岸，而当时民运内部分歧已经明显，权华夫妇又非一般人物，他总不能不考虑今后自己在加州的处境吧？

开会那天，他按时来了，坐在我的旁边。主席权华宣布议程。第一项，“刘宾雁主席宣

布开会”；第二项是“选举大会执行主席和秘书”。

会议议程人手一张。我也有了，却完全没有理会有什么问题。这会并非“大会”，理事会总共只来了九人。还要选一个“执行主席”吗？我想都没有想这里边有什么奥妙。看来是早有准备，“执行主席”的候选人虽然迟到，还是全票当选了。

大声责权华搞阴谋诡计

这时忽然间，听见一声大吼。陆大声说话了！议程上没有这一项。他开门见山，向执委会主席提出抗议：“权华呀权华，我一直认为你这个小姑娘（不小了，四十岁上下，当然也早就不是姑娘了）非常优秀，甚至想过你有一天可能当国务院总理呢，怎么今天你搞起阴谋诡计来了呢！”

不用说，全场震撼，人人愕然。大声继续大声说，比平时更大声，那音量和气势就可以想见了：“刘宾雁先生就是理事会主席，他大老远从东岸赶来，你为什么不准他主持会议，还要选个什么执行主席呢！……”

这时——这是第二次令我、也令所有人感到震惊了，一位七十岁的长者，为人固属激情份子，喜怒形之于色，然而想不到他今天会激动到这程度，竟放声大哭起来，在泣不成声中，他又说：“你分明是想剥夺他的发言权嘛……”

都知道陆大哥心脏不好，此时已气喘吁吁，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怎能不担心他出事？众人七嘴八舌急忙劝慰老先生消气，千万不要过于激动。

还好，陆大哥平静下来了。我的心（不是心脏，另一个心）却不能平静了。因为事情同陆大声本人利害全然无关，他不过是《导报》的一位顾问，比我还远上一层。他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出于一种道义感，及对权华的失望和对于她采取不正当手段的愤慨。

出于道义不涉个人利害

会议结束后，《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小姐来访陆铿，问他为什么会嚎啕大哭。陆铿回答说：“我太伤心了，因为民运如此艰难，还要搞内斗，实在令亲者痛，仇者快。”说着说着，他又流起泪来。翌日《世界日报》刊出了陆铿流泪、刘宾雁痛心的有关报导。我意外地发现：原来大声和我一样，都曾对权华有过很大的好感和很高的信任。我是一九八八年到加州理工学院给中国留学生做演讲时偶然认识权华的。她的丈夫在那里读博士，她本人在东岸读书。此人容貌平常，矮矮胖胖。剪了短发，衣着朴素，健谈而说话很甜，给人的感觉是热情、亲切，似乎随时准备着给你以帮助。

谈吐中看得出一定水平。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便形成一种个人魅力。我同时也了解到她夫妇积极于社会活动，观点和我一致，主张民主。

其实也只有这么一点短暂的接触，心里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记得有人劝我以留学生为题材写一点报告文学时，我就想到可以把权华和她丈夫写进去。这就和大声的“国务院总理”是一个路子了。

这时候，我在观察海外民运中的是是非非时，已经觉察到中国人对于与自己利害无关的事的那种明哲保身、明知不对却不说话以免得罪人的态度之可怕了。并深感此害不除，今后中国人必将吃大苦头。这一次我见到一位饱经忧患、自然也深谙世故的中国老人，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拍案而起，仗义直言，自然大受鼓舞，也对陆铿兄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我请他来，虽因预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会有麻烦，却并非借他一臂之助的意思。他是顾问，

没有投票权。不过是希望有一位他这样的人做个见证而已。想不到他竟能在此大张正气。

有组织有预谋多数得胜

然而后来也叫人伤心，无论是陆大哥的拔刀相助，或我在会上的短兵相见，两员老将最后都败下阵来。每次表决，都是七：二，我是永恒的少数。若非马大维先生陪榜就更可怜，必定是八：一了。

我去洛杉矶前，曾向全美学自联主席为成立“自由民主党”而和权华夫妇打过交道的一位先生打听其为人。得到的回答是这对夫妇非同小可，南加州的留学生基本上都在其掌握之下（《新闻自由导报》理事会中的多数是这支力量的骨干分子）。他没说，但我后来从不止一个来源处获悉，这对夫妇在那次筹备会上也有非凡表现。以致那个党最终告吹。

大声能一眼看穿会议议程中埋下的问题，却无法看到会前和幕后的种种部署，以及那些理事们同权华之间亲如手足的关系。既然讲民主，你怎能战胜一个有组织又有预谋的多数呢？

会议的最后一天，程凯提出一个方案：他不再坚持编辑部全员不动，可以裁减一人，把省下来的薪水用于分期付款购买一台电脑。这不是两全其美吗？编辑力量基本不减，又有电脑可用，几个月后就归自己所有，那减掉的一员又可以归队了。这个方案还有何可以挑剔之处呢？我认为程凯的复职是必定无疑了。

想不到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宣告她要和程凯竞选总编辑一职。她说她的施政方针和权华的主张一样，还是裁人三个，到外边排版。她还说，她知道这样做《导报》只能维持，不能改进，而且她只干三个月，就要去读学位。

记下来投票表决，仍然是七：二。这位女士光荣当选。我失败了。

《新闻自由导报》本来是十日刊，权华主办的理事会成立后改为周刊。经过这场风波，这张报纸又由周刊变为双周刊了。

这就是两位老将出马不抵一员小将的故事梗概。然而我这三天时间也并未白费，收获是进一步认识了一位老将和一位小将，也间接增长了一些新见识，对于中国今后的主要敌人将主要是中国人自身这个问题，心里更清楚了一些。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于普林斯顿

长幼之谊·情同兄弟

——梁钦东

陆大声先生是我最敬佩，同时也是最亲密的前辈朋友。事实上，由于他出道很早，无论从年岁上、经历上，都应该算是我前辈的前辈。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知道陆铿这个名字是在一九八一年中。说起来那还是因为我的祖父梁漱溟先生的缘故。那一年六月一日，《百姓》半月刊在陆先生和胡菊人先生手中诞生了。孩子啊上大学的我，暑假里从杭州浙大回到北京，照例去木樨地祖父家里住几天。因为生平就爱“翻书”，这次居然在祖父的书桌上翻到了两本刚收到的《百姓》杂志。那年头，大陆的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难得看到政治宣传以外的新闻和观点。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两本杂志

读完了，好像久旱的枯草吸吮到春天的露水，那感受怕是没有类似经历的的人所难以体会的。

不久，看到陆伯伯写给祖父的信。原来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期间，祖父曾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担任国内第三方面的主要调停人，而陆先生恰是活跃在谈判场内外的记者。相隔几十年，这一缘份终于被续上了。此后两人不时有书信来往，《百姓》杂志也不断地寄来。间中亦曾有杂志被大陆海关查扣的事发生，执着的祖父还写信查问到底是什么内容犯了当局的忌。

祖父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完成，陆伯伯提议选书中一部分在《百姓》连载发表。祖父回信说以政论杂志刊行学术著作似不尽相宜，如编辑以为可用，另有一篇短文可发，并要求不要删改，文责自负云云。随信他就寄去了他的〈试论毛泽东晚年错误之根源〉一文。《百姓》很快就在下期刊出。记得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是祖父的钢笔画像，同期还发表了陆先生等人的评论文章。由于文章于同一天在香港的《百姓》半月刊和台湾的《中国时报》刊出，而且是老人家几十年来首次在海外发表言论，又据说这是一向将毛泽东冠之以“毛匪”的台湾报纸首次出现“毛主席”字样，因而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连大陆的高级干部内部刊物《参考资料》都给予全文转载。一时间各方评论如潮，有的说梁先生是在赞毛、褒毛，有的则说是批毛、骂毛，甚至还有人怀疑文章的真伪，说从杂志上刊出的原信影印件看来，字体龙飞凤舞，不像是出自九旬老人之手。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旋风”。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还派人来找祖父谈话（我当时刚巧在场，记得是以副部长平杰三为首的三、四位高干），要求祖父今后在文章言论上要小心，有文章的话可以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祖父听了也只是点头而未置可否。然而后来的一、而年内祖父还是在《百姓》上发表了回忆蒋介石，及呼吁大陆实行政治改革等文章。

初次见陆伯伯的面试在一九八五年。那一次他应邀访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胡见面前，他先来访问祖父，并询以对胡的评价，祖父以“通达明白”作答。而陆与胡见面的开篇正是借用了祖父的话。

不久以后，陆伯伯就写信给祖父说他以为梁家后代应该有机会出国学习，他愿意为此尽力 。而且说到做到，很快为我联络好了学校并找到奖学金。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在陆伯伯的帮助下来到美国读书。第二年夏我自东部转学去美国西海岸，特别先去看望当时正在洛杉矶西来寺着手写回忆录的陆伯伯。我们两人用几天时间把收集到的所有纪念祖父的文章做了一番整理，这部题名《中国的脊梁》的纪念文集收集了两岸三地不同观点、不同倾向的纪念评论祖父的文章，很快由《百姓》杂志社出版。

到西部入学以后，每年放假都会去旧金山停留一阵子，常有机会见陆伯伯，并慢慢地与崔蓉芝阿姨和她的儿子刘家禾相熟。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我在旧金山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因为住处相距不远，常常在周末去看他们，他们也把我当作家里人，从不客套。记得有一次严家其先生来访并住在他们家，我刚好也在，到了晚上要睡觉时大家请严先生睡客房，而我则在起居室里睡一晚。严先生客气地推辞，陆伯伯马上说：“不必客气，钦东就像我干儿子一样的。”

作为长辈，陆伯伯对如我一样的年轻人总是以他的仁慈之心来爱护和提携。每次遇到有客人常常还是名人，他一定会把我向人家一一介绍，还免不了褒奖一番，使我一个后辈在客人们面前不感到拘束和自卑。他一旦在报刊上读到有关建筑的文章，也一定会剪下来留待下次见面时亲自交给我，用心不可谓不细。我的学业情况、个人生活、读些什么书，以至恋爱对象，也都是他每次关心的话题。

另一方面，虽有这些年龄、辈份、经历上的差别，陆伯伯却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以平

等的姿态像朋友一样的待人。认识不久，他就告诉我说：“你愿意喊我陆伯伯也行，喊我陆大哥也可以。”他的朋友中从年逾古稀的长者到二十来岁的青年，称呼他用得最多的就是陆大哥。他还风趣地告诉他的大儿子陆可望：“好好努力，表现得好，以后可提升你做老弟。”

记不得有多少次陆伯伯拿出自己刚完成的文稿给我看，然后问我主题清楚不清楚？论据充分不充分？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他老人家笔耕几十年，却不耻于让我一个晚辈给他的文章提意见。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坐在他家的厨房里隔着小餐桌长谈，古今中外，上天入地，无所不及。最常说起的还是中国的前途，两岸的关系，每次他也一定会问我的看法，鼓励我讲自己的意见。让我感觉虽然是面对着著名政论家谈政治，却像是与自己的兄长话家常。

当然，和陆伯伯在一起最大的享受，还是听他谈自己。他老人家这几十年阅历丰富，交游广阔，加上博闻强记，讲起少年时照顾祖母返乡路遇劫匪，青年时赴欧洲采访的种种见闻，中年在大陆廿二年的牢狱之灾，晚年到海外以后的风风雨雨，以及经历中一些不足为外人道者，他总是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时而妙语如珠，引人捧腹，时而言辞凝重，发人深思。我一个晚辈得以有幸分享他一生的经验及其引申出来的人生道理，实在受益匪浅。现在他的《回忆与忏悔录》终于要出版了，我为陆伯伯高兴，更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人能从中得一些启发高兴。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一日于旧金山

后记

陆大声

从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到达香港之日起，朋友们就鼓励我写回忆录。一九八八年和四月在佛光山西来寺开始动笔，由一位老友张屏之抄正；三个月后他转回上海，不久病逝。怀念故人，不胜感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思想所受冲击至深，跟风投入海外民运，作为民运支持者参加了芝加哥大会、巴黎大会、旧金山大会、洛杉矶大会、华盛顿大会。小型的活动，更不计其数。终于发觉离开了本土搞民运，是脱离实际的，乃转而继续对邓小平的研究，继《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后又出版了两本有关邓的书。

一九九六年在台湾纺织工业家、柏杨称为“文化界大护法”的陈宏正兄的安排、督促下，才定下心来，回到回忆和忏悔上。宏正的美意和不断地查问进度，给我以七八岁时读私塾，老师逼着背书的感觉，有点压力，却有上进的喜乐。而友情逾半世纪的老友衣复恩、萧瑛华伉俪的关怀也是一种动力。

感谢中央研究院给我提供了面对青山写作的机会，近史所陈三井所长和所内很多朋友给我的关爱，远超过“关爱的眼神”。陈永发、熊秉真、罗久蓉三位学者还帮我查证历史故事。吴凤莲小姐整齐的打字，战胜了我的“鬼画桃符”。而杨国枢副院长赐序，对我来说，显然比“摸头”要愉快的多。好友司马文武以专业记者的高标准相勉，使我产生了一个奢望：但愿新闻传播界的青年朋友们能从我的经历中得到一点灵感，从我的错误中汲取一些教训，我就大慰平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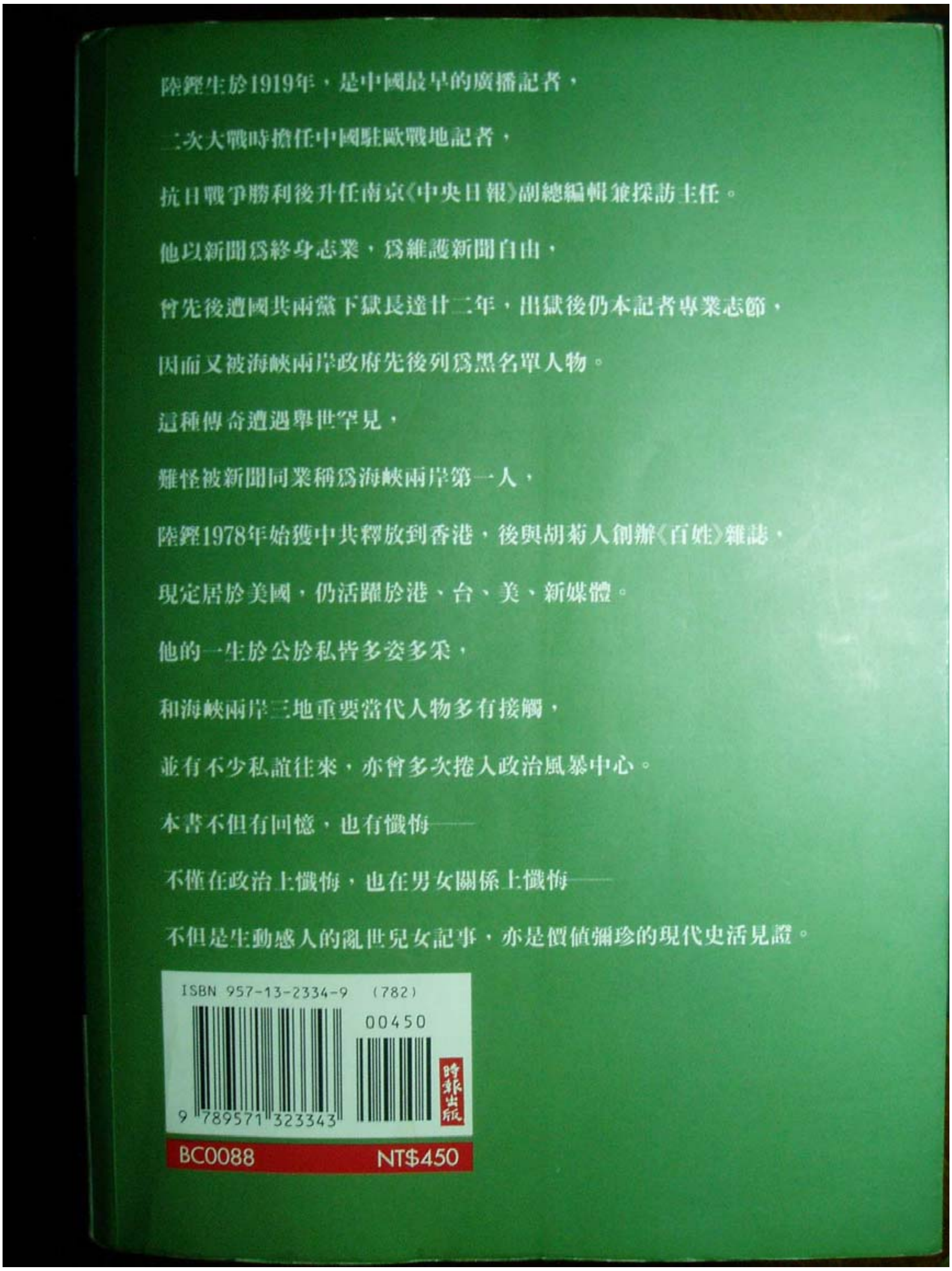
感谢余纪忠老大哥的鼓励和时报出版公司的支持，在莫昭平小姐的具体策划下，这本书出版速度之快、质量之好，首先我作为作者就非常满意，相信读者也会满意。

最后还得提一提我大儿子的挑剔，他指出原稿的某些不足之处，使我不得不修改充实。杨惜珍通过龚选舞提供了宝贵的照片。乐恕人提供的照片，使焚毁于“文革”的欧洲战地记者照得以补上。崔蓉芝不仅担任二校工作，并把散乱的资料整理出个头绪，连遗忘在箱底的、珍贵的如潘受先生墨宝也能找出和读者共享。而十位好友，年高近九十到年轻三十余，本着“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精神，谈论陆大声，各有所见，多予肯定，令我不无汗颜。总的说明了这本书的出版，是共同心血的结晶。

谢谢读者购读这本书。敬祝健康！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台北南港

封底


陸鏗生於1919年，是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
二次大戰時擔任中國駐歐戰地記者，
抗日戰爭勝利後升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
他以新聞爲終身志業，爲維護新聞自由，
曾先後遭國共兩黨下獄長達廿二年，出獄後仍本記者專業志節，
因而又被海峽兩岸政府先後列爲黑名單人物。
這種傳奇遭遇舉世罕見，
難怪被新聞同業稱爲海峽兩岸第一人，
陸鏗1978年始獲中共釋放到香港，後與胡菊人創辦《百姓》雜誌，
現定居於美國，仍活躍於港、台、美、新媒體。
他的一生於公於私皆多姿多采，
和海峽兩岸三地重要當代人物多有接觸，
並有不少私誼往來，亦曾多次捲入政治風暴中心。
本書不但有回憶，也有懺悔——
不僅在政治上懺悔，也在男女關係上懺悔——
不但是生動感人的亂世兒女記事，亦是價值彌珍的現代史活見證。
ISBN 957-13-2334-9 (782)
00450
9 789571 323343
時報出版
BC0088
NT$450